

【法】谢和耐 著
耿昇 译

中国社会史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尽管历经数代学人之努力，西方研究华夏文明已经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就我们的阅读范围而言，其中惟一人之学力而写成的中国通史，仍只有法国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教授谢和耐先生的这一部。此书用一支加浓大笔有机地贯通所有相关的史料，在西方久负盛名，被誉为不可多得的汉学佳作。

92441

【法】谢和耐 著

耿昇 译

本书责任编辑委 刘 东



中国社会史



(苏)新登字第 001 号

书 名 中国社会史
著 者 [法]谢和耐
译 者 耿昇
责任编辑 孙立 杨健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激光照排公司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2.25 插页 2
印 数 1—5000 册
字 数 545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441-6/G·374
定 价 25.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借鉴与创造。为此，我社在优先出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关于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著作的同时，也适当选择一些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较有影响的著作出版。海外学者占有的丰富资料，他们的研究视角和某些方法，对我们认识中国的国情，评估中国文化的传统、心态及其前景，从而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的建设，都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当然，他们的著作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甚至同我们存

DQ52/04

在着某些原则分歧,这是需要读者加以认真审察和辨识的。同时,任何借鉴都代替不了自己的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要靠我们自己从中国当代的实践中去概括和总结。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丛书只求为此提供某种有益的参照和比较。如果这套丛书能在这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将感到欣慰。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年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1988年

中译本序

我从未曾想到过有朝一日能看到本书被译作中文并在拥有大量最优秀中国史学家的国家中发行。如果不认为对该译本的兴趣足以说明一名西方人的中国历史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话,那么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应得到如此之殊荣。事实上,它本来恰恰是为西方大众写成的。

本书的目的无疑在于供大学生们作教科书之用,但也是和主要是为了使法国人理解中国文明在所有领域中都博大精深、瑰丽多彩;同时,也旨在反击某些错误思想。有些人幼稚可笑地认为中国是孤立的并相信所谓中国人之惰性。非常遗憾的是,为了铲除这些错误思想,尚有许多事情要做。

自从本书的初稿在1964~1972年间写成之后,又有许多著作出版了,特别是中文、日文和重要西文的著作;同时,又已完成了许多考古新发现。为了注重所有的新知识,则必须将本书彻底改写,那将是一项巨大工程,需要付出很多精力。正因为如此,在本书1980和1990年的法文版重版本中,我被迫仅限于纠正某些错误和修改我觉得不满意的某些段落。但启发本书的基本思想无疑始终都是成立的。本书的目的在于指出,在数千年的和不停顿的发展中,于其历史上的每个时代,

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技术、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互相影响。中国以其幅员和气候的差异性而独自形成一个世界。它始终对外开放,同时也不断地受远近不同国家的影响:西域、印度、伊朗、伊斯兰世界、地中海国家、东南亚、美洲和欧洲国家;但它同时也不停地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或直接或间接地施加最为广泛的影响。若没有中国,世界就不会成为它今天的这个样子。归根结蒂,人类在整个发展中都是互相联系在一起。

我非常注重技术史。同时,我认为虽然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但它们对于改变历史却起着决定影响。诸如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器、战车和文字,公元前1000年就在延伸于从东欧到蒙古之间的全部平原和草原地区的做为坐骑的马匹,战国时代的炼铁、以合理方式套马车以及脚踏马弩等等。从10世纪起便经常性地印刷著作使中国印刷术较欧洲先进了500年,而水稻种植业的进步又促使形成了一个市民发展高潮并使城市人口高度集中……所有这些新事物都同时要伴生根本的变化。

最后,西方论述中国通史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多位合作者的成果。对于作为唯有一位作者的本书来说,这可能是一大长处,大家始终都可以从中发现同一种灵感在启发着全书。

我如何表达对本书的译者耿昇先生的全部感激心情呢?我永远无法充分赞扬他的毅力、坚持不懈的精神、对法语的令人赞叹的精通及其对于译文准确的关注心情。他为翻译此书而必须克服的困难是不胜枚举的。但本译著仅仅是他翻译的有关中国和东亚文明的数目庞大的法文著作之一。

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

法兰西学院教授

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91年11月于巴黎

目 录

中译本序 1

导言 1

- 中国的地域与居民 2 汉族人 6 生活方式和文化
12 农业发达并占有优势地区的定居民 13 草原地区
的游牧民 14 喜马拉雅群山及其周边地区的山人 15
华南和东南亚的混合文化 16 西域绿洲的定居民和商
贾的文化 17 欧亚大陆的交通道路 18 中国社会的
历史发展模式 20 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 27 中国的
文字 30
-

上古时代

第一编 从古代王权到中央集权国家 37

第一章 上古时代的王权 37

一、新石器时代之前 37

夏王朝 39

二、上古时代的王权 40

青铜器时代的第一个王朝——殷商 41 占卜和祭祀
44

第二章 诸侯国时代 47

一、上古王权的衰落 47

周王朝的最初几个世纪 48 传统纪年体系 49

二、从诸侯国到王国 50

公元前9~公元前7世纪的贵族社会 50 贵族制度的衰亡 53

第三章 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55

一、变化的加速 56

政权的变化 57 战争的变化 58 经济发展高潮
与技术革新 60 社会的动荡 64

二、国家的革命 66

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 66 新国家的新颖特征 67

第四章 上古时代的遗产 70

一、公元前10~公元前6世纪的传说 70

经典著作 70 经典传说相对较晚的特征 73

二、伦理和政治思想的觉醒 74

儒家的祖师孔夫子 74 墨子——一个聚徒讲学学派的创始人 75

三、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的文化潮流 76

国家的理论家 77 从宗教修持到哲学：道家 80
孟子 82 荀子 84 辩学家和五行学家 85
文学 86

军人帝国时代

第二编 中央集权国家的兴盛衰败 91

第一章 开拓疆土的帝国 92

一、由秦至汉 92

中国各地区的统一和最早的开拓倾向	92	秦帝国的崩溃和汉帝国的开国	94	法制的稳定性	94	压缩“封国”和抑制帝国贵族	97
二、汉王朝在亚洲的大举开拓	99	蒙古和西域	101	满洲和高丽	104	北方的军事组织	104
		汉王朝进入热带地区	106	向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最早开放	109		
第二章 大举开拓的因果	110	一、经济和政治	111	贸易与开拓	111	赏赐礼物的政策和丝绸贸易	112
				胡族人的汉化及其内附天朝帝国	115		
		二、经济和社会	117	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飞跃	117	富商和望族	120
				自由经济还是控制经济	121		
第三章 贵族地位的上升和政治制度的危机	123	宫中的篡权阴谋	123	复兴帝国的新基础	125	公元1~2世纪贸易关系的发展	127
				新帝国自创建到184年起义之间的发展	128	救世主般的革命者	129
				受军阀混战主宰的帝国	130		
第四章 汉代的文明	131	五行经学	131	多样化的传统	132	谶纬学的发展	134
		经学与时代现实的关系	135	各学派之间的争鸣和各种倾向之间的对立	136	经学的鼎盛与汉末文化的复兴	139
		作为综合和政治与伦理反思的史学的出现	140	宫廷文学	141		
第三编 中国的中世纪	143	第一章 胡族和世族	145	概论	145		

- 一、从军事专制到无政府状态(190~317年) 147
 三国时代,中国北方的曹魏王朝 147 蜀汉国和吴国
 (四川和长江流域) 149 内战和汉化雇佣军的反叛
 150
- 二、长江流域的世族统治 152
 东晋 152 宋 153 齐 154 梁 154 陈
 156
- 三、中国北方的汉化胡族王国和帝国 156
 五胡十六国(4世纪) 156 拓跋族的崛起和北魏帝国
 的形成 158 中国北方的紧张状态、断绝交往和分裂
 形势(534~577年) 162
- 四、交流、影响和对外关系 163
 中国南方、东南亚、印度洋 164 满洲、高丽和日本
 165 蒙古和西域 167

第二章 中世纪文明 170

- 一、玄学、美学和诗学 171
 从法家的正名论到本体论思辨 171 人性、自由、美学
 和诗学 174 道教界 177
- 二、佛教的大虔诚 178
 佛教传入中国 179 佛教的适应过程 181 佛教
 在中国发展的大高潮 185 宗教、社会和政治 187
 进香朝圣 190 汉文佛教译经和文献 191 佛教
 对中国社会的贡献 193

第四编 从中世纪到近代 198

第一章 贵族帝国 198

- 581~683年时代的政治史 200
- 一、唐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201
 大兴土木工程 202 行政制度 203 司法制度

205	土地法	206	兵制	208
二、7世纪的大开拓	211			
事件	212			
三、684~755年期间的政治史	214			
武后和韦后	214	唐朝的盛世时代	216	755~
763年的武装叛乱	217			
第二章 向近代的过渡	218			
一、安史之乱的后果	218			
大倒退	218	税制改革和社会演变	220	水稻种植业的首次大发展
植业的首次大发展	222			
二、帝国的藩镇割据	223			
政治演变	223	一种新的政权形式	225	10世纪时的地区独立和经济发展
时的地区独立和经济发展	227			
三、结论	229			
一个新社会的曙光	229			
第三章 从向世界开放到回归古典传统之源	230			
一、中世纪文化的顶峰	231			
史学和诗学	231	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	233	
二、外来的影响	238			
伊朗的影响	239	7~9世纪的中国和伊斯兰教	241	
三、唐代文明的影响	244			
中国在日本的影响	245			
四、“民族主义”的反抗和回归中国传统之源	246			
“古文”运动	248	法难的镇压和佛教的衰落	249	

自宋至明的官僚帝国

第五编 中国的“文艺复兴” 255

第一章 新社会 257

一、历史和政治制度 258

事件 258 新的国家 260 变法运动 263

二、军队 266

从募兵制到雇佣军制 266 火器 268

三、新社会 270

一个食租的阶级 270 土地问题 271 城市的飞速发展 274 一个流动性更大的社会 275

四、经济的发展 277

食物的增加 277 手工业生产和经商的发展 278
商业的国家 280 货币经济的发展 282 航海的发展 284

第二章 中国“文艺复兴”的文明 287

一、复兴的条件 288

学术文化和民间文化 288 木版和活字印刷术 290

二、科学和哲学 293

宋代的文字作品和科学的发展 294 科学考古的发轫
296 史学的新倾向 297 宇宙论和伦理学,一种
自然哲学的形成 299

三、结论 302

第六编 从汉化诸帝国到蒙古人入主中原 304

10~14世纪的游牧民和山民 304 三代游牧骑兵 305

第一章 汉化诸帝国 306

辽人的契丹国 306 牧民和骑兵的西夏帝国 309 女
真人的金帝国 311

第二章 蒙古人人主中原 313

一、蒙古的社会制度 316

蒙古人剥削制度的建立 316 民族歧视 318 税制和对中国财富的掠夺 320 起义和对占领者的抵抗 322

二、东亚、基督教社会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 323

基督教国家的使节和商人 324 赴欧亚大陆的零散中国人 326 蒙古人占领下的文学、科学和宗教 330

第七编 专政君主和太监的统治 335

第一章 重建和开拓 336

一、元帝国的解体和明王朝的建立 336

领土的解放 336 农业经济的恢复 338 人口的控制 340 专制主义的倾向 341

二、继续扩张 343

蒙古、满洲和越南 343 大规模的海上远征 344 收缩的开始 348

第二章 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迁 349

一、政治的发展 350

太监和秘密警察 350 迁都 351

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352

军户问题 352 匠户的逐渐消失 354 社会动乱 355 经济的变化 357

三、外患 359

蒙古人的攻势 359 海盗行为 360

第三章 近代中国的开始和明末的危机 364

一、城市的复兴 364

大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高潮 364 技术的发展 366 市民和商人的新社会 368

- 二、最后 50 年的危机时代 368
 - 财政危机 369 政治危机 371 人民大起义 373
 - 满族的威胁 374

第四章 明代的文化生活 375

- 一、正统派和独立派 375
 - 心学派的发展 376
 - 二、1550~1644 年间的“文艺复兴” 378
 - 反传统主义 378 科学新思想和实学新兴趣 380
 - 市民文学 383 结论 384
 - 三、欧洲的入侵和耶稣会传教士 385
 - 第一批天主教传教士抵达东亚 386 对话的困难 388
 - 最著名的从教人 391 相互影响 393
 - 四、对明末历史的全面总结 395
-

近代中国

第八编 专制的宗法制度 399

第一章 清朝的征服与开国 400

- 一、满族势力的发展 400
 - 形成时期 400 清人入主中原 401
- 二、延搁和困难 404
 - 南明的抵抗 404 海盗活动的猖獗回潮 405 三
 - 藩之乱(1674~1681 年) 407

第二章 开明专制君主 408

- 一、思想领域的统治 409
 - 知识精英的归附 409 一个“儒教”帝国 411
- 二、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帝国 412
 - 蒙古、西域和西藏：战争、宗教和外交 412 新疆的建

制	414	大陆性和世界性的帝国	415
三、繁荣昌盛的时代	416		
农业技术的发展顶峰	416	“工业化”的大手工业和史无前例的贸易发展	418
人口增长和移民	421		
四、边境冲突	422		
在东亚与俄罗斯移民的最早冲突	423	移民人口的起义	424
越南人的海盗活动	426		
五、政治和社会风气的腐败	426		
腐化的发展和最早的农民起义	426	政治制度的弊病	428
第三章 17世纪中叶~18世纪末的文化生活	430		
一、17世纪的哲学家	430		
17世纪文化思潮的连续性	431	批判专制主义和中国文化史初探	432
进化论的社会学	433	顾炎武——近代史学和训诂学之父	435
恢复实学和新教学法	437		
二、开明专制君主统治下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	438		
伦理范畴	439	皇帝和富商们对文学艺术事业的赞助	442
三、18世纪的文献考证高潮和哲学家	445		
考证派的形成	445	戴震——科学家、博学家和哲学家	447
一种历史哲学	449		
四、耶稣会士的业绩与中国对欧洲的影响	450		
科学事业和耶稣会士在华的影响	451	向中国的借鉴和欧洲的反响	455
第九编 从衰退到外辱	460		
第一章 大衰退	461		
一、衰退的内部原因	461		

二、走私和海盗	464		
贸易逆差	464	第一次鸦片“战争”	467
通货问题	470		
三、中国和西方	471		
第二章 社会爆炸及其后果	474		
一、太平天国	475		
一种革命传统	476	太平军起义的发展和遭镇压	
	478		
二、其他的起义	481		
捻军	482	移民	483
三、后果	485		
复兴农业的优先性	485	被迫加重贸易负担	486
政治变化	488	矛盾的产生	490
第三章 现代化的失败和外国入侵的加剧	491		
一、现代化问题	492		
工业化的最早努力	492	失败的原因	495
自由企业还是国有经济	499		
二、外国入侵的加剧及其后果	500		
被奴役地位的加重	501	四面包围	503
经济的后果	505	心理和政治	506
三、结论	510		
第四章 19 世纪的文化潮流	511		
改革后的儒教	513	正统派的反抗和改革派的复兴	515
复归被遗忘的传统	518	西方科学的影响	520

当代中国

- 第十编 灾难深重的中国** 525
- 灾难年代的开始 525 惶恐的表现 528
- 第一章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崩溃** 529
- 一、中国经济的崩溃 532
- 战争赔款的巨大压力 532 经济上受外辱 534
- 自然灾害 537
- 二、人口的迁移和社会的变迁 539
- 人口的外流和迁移 539 中国社会的解体 542
- 第二章 20 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发展** 546
- 一、袁世凯时代 546
- 旧制度的灭亡 546 袁世凯的独裁 549
- 二、军阀混战时代 550
- 内政与外国的干涉 550 从孙文(孙逸仙)的奋斗到蒋介石的胜利 552
- 三、南京政府的 10 年 554
- 民国政权的基础与特征 555 农民革命家和日本侵略满洲 557
- 四、从日本侵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560
- 重庆时代 560 1946~1949 年间的内战 562
- 第三章 哲学和文学的发展** 563
- 日本的影响和进化论哲学的发现 565 西方的入侵 567
-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571 历史科学和精确科学 573
- 第十一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新篇章** 576
- 新政权的创新特征 577
- 一、从与苏联的结盟到决裂 579
- 苏联的模式 581 大跃进 582

二、从与苏联的决裂到毛泽东的逝世 584

1960~1965年的短期恢复 585 文化大革命 587

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589

三、从毛泽东的逝世到80年代末的中国 590

跋 593

附录 596

一、参考书目 596

1. 期刊 596 2. 通史著作 598 3. 断代史参考
书目 604

二、历史纪年表 627

1. 中国历代王朝大事年表 627 2. 中国的历史和文
明大事纪年表 630

三、谢和耐教授主要汉学著作目录 684

1. 专著 684 2. 论文 684

译后记 690

本书的目的(或者更应该说是其抱负与奢望)是使其作为中国社会文明史的入门著作。它要论证中国形成的阶段、其相继的经历以及世界各地在历史长河中为充实丰富她而提供的因素、她所施加的影响以及她对于历史的贡献^①。至于她今天显示出的面貌,则确实是其悠久历史的产物和结果。同样,人们也不能企望在完全不懂自文艺复兴、中世纪和上古时代以来为其形成作出过贡献的外部一切的情况下而透彻地理解我们自己的欧洲国家。一旦与大家一道使中国脱掉她那奇妙的历史幅度的外衣之后,那就会彻底误解中国的真相。

中国的重要地位并不仅限于其居民的数量以及这个具有 10.2 亿人口的国家那尚潜在的势力。它还具有更要广泛得多的意义,同时属于过去和现代的范畴。中国文明曾是人类中很大一部分的启迪影响者,将其文

① 我们必须考虑到现在尚缺乏有关中国知识的任何一种和甚至是最初级的教科书,尚且丝毫不必讲那些错误思想和成见了。由此而产生了逐步从事将各种事实纳入到其历史背景中的迫切性,同时也要尽量使将其发展中的不同领域联系起来的纽带变得更为清晰易懂,如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中国社会与东亚其他文化以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的关系、技术、文化生活等……

字、技术、人生观和世界观、宗教和政治制度赐予了全人类的这一部分。朝鲜、日本、越南等作为中国移民的国家也都属于同一文明圈。但中国影响的辐射范围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这些地区，如在蒙古和阿勒泰的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中、在中亚、西藏和整个东南亚。它也触及到了一些更为遥远的地区。直至今天仍不知曾向它借鉴过许多内容的西方，很不了解自己欠下中国的一切文明债，而西方若无这些借鉴就不可能具有它今天的面貌。

综合概述是相当艰难的，本书只是作一次尝试，因为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们对于中国社会、中国文明史的全部研究无法与为了理解我们的古典社会、我们欧洲国家所作出的巨大辛劳相比，后一类著作的数目已经过份庞大而无法使人全部熟悉和利用。当涉及到着手处理延伸于 3500 多年之久的如此丰富多彩的事实时，空缺、缺陷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在这些不利条件之外，应再补充以属于另一个范畴的困难。后天获得的全部基础知识都是既来自日常生活中的无意识学习，又来自真正的学习，而这一切手段对于任何希望初步了解东亚国家的人都很缺乏。虽然全人类的 1/3 生活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在今天已经变得渺小的世界上，它事实上已经是我们的近邻了。但我们的文化仍在坚定地坚持“西方特征”。如果着眼于欧洲显得仅仅是欧亚大陆上的一片延伸之地和其历史就如同是欧亚大陆历史上的一个具体案例的观点，那就还要求作出进行想象的艰苦努力。

中国的地域与居民

中国的社会史涉及到了一片非常辽阔的地域，它们又远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从西伯利亚延伸到赤道，从太平洋沿岸一直到达欧亚大陆的腹地。这样辽阔的地域在地理背景中具有一种很大的差异性和一种综合性的结构，有关这种地貌的知识对于理解历史

是必不可缺的。但我们于此仅限于重提一下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大陆性整体的群山特征，在西南由于神奇的特大群山和辽阔高原的衬托而更加突出了，它们是由自兴都库什到印度支那半岛和喜马拉雅山麓的起伏地带以圆弧状形成的；辽阔的草原（更确切地说是牧场）被沙漠分隔开了，而沙漠戈壁又覆盖了包括西伯利亚森林和华北耕作区之间的辽阔地带；由大河大江的冲积层形成的肥沃平原（满洲的松花江和辽河盆地、覆盖了 30 万平方公里的华北中央大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广州地区的平原、越南的红河盆地和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其他冲积层平原……）；从阿穆尔河（Amour，黑龙江）入海口到马来半岛所延伸的漫长海岸线、从日本群岛直到地域更加辽阔的印度尼西亚大岛屿（菲律宾、婆罗洲、苏拉威西、印度尼西亚和苏门答腊）存在着延绵不断的一大串大大小小的岛屿。气候因素再加上这种多样差异性；受季风反复变化影响的东方和南方地区与亚洲腹地那干燥的大陆性气候相对应。但地域（纬度）的影响也并不算太小。这样一来，中国既是西伯利亚式的严寒和隆冬地区，又是赤道带的潮湿和闷热地区。

居住在世界上这些地区的居民人口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其生活方式、文化和语言而各自有别。语言标准无疑是大家想到引以为据的第一种标准。

东亚语言一览表^①

“阿勒泰语系”诸语言			东北亚语言	
突厥语族	蒙古语族	通古斯语族	朝鲜语	日本语
维吾尔语	蒙古语	满语		

① 除了日本语之外，本表中罗列的所有语族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台湾）出现了。为提醒起见，我们还将提到印欧语言，它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由 1.5 万名塔吉克人（伊朗语族）和 9700 名俄罗斯人所代表。

续 表

“阿勒泰语系”诸语言			东北亚语言	
哈萨克语 乌兹别克语 塔塔尔语 撒拉语 柯尔克孜语 裕固语	达斡尔语	锡伯语 赫哲语 鄂伦春语		
汉藏语系诸语言				
藏—缅语族	傣语族	苗—瑶语族	汉语族	
藏语方言 缅甸语 中国西南和印度 支那半岛的藏— 缅少数民族语言	暹罗语 老挝语 中国西南和印度 支那半岛的少数 民族傣族的语言	中国西南和印度 支那半岛上的少 数民族的语言	北方方言 吴语 粤语 南闽语 北闽语 客家语 滇语	
南亚语言(孟—高棉语)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高棉(柬埔寨)语 占人(越南和柬埔寨、东海岸的少数 民族)的语言 孟人(下缅甸)的语言 云南、印度支那半岛和尼科巴群岛 的孟—高棉少数民族的语言		马来语 爪哇语 印度尼西亚的其他“马来—波利尼 西亚语” 台湾的少数民族语言		

14 东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语属于五种不同的语族,其地域分布相对比较清楚,唯有华南和印度支那半岛除外,那里各种语言的交错混杂现象严重。

——从西伯利亚到汉族语言和文明的居民占大多数的华北,

有大量人口向西域和更远的地区流动,其语言也就与突厥、蒙古和通古斯语(过去被称为“乌拉尔—阿勒泰”语)族联系起来。

——从语言学角度上来讲,与汉语以及和它具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完全不同,朝鲜语和日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语族,虽然它们都与突厥、蒙古和通古斯语具有某些相似性。

——汉—藏语系的居民区同时覆盖了喜马拉雅群山区的全部高山和高原,印度支那半岛地区和中国中原(也就是从阿穆尔河流域和蒙古到缅甸、老挝和越南边境的 21 个省的居民)。从操各种语言的人数来看,明显是汉语方言语族在这一片地域辽阔而又千差万别的领土上占据主导地位。

——孟—高棉语族在中国西南出现得很少,在印度支那半岛的代表性却要大得多。

——最后,在更偏南部的地方,马来亚和东南亚的大岛屿是所谓“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使用范围,其地域事实上从马来亚向北一直延伸到台湾岛并向西延伸到马达加斯加。

东亚各不同语族的这种分布保持着对一部非常悠久历史的回忆,它代表着这部历史的终点。如果说人们完全不可能知道非常古老时代的形势如何,那么其发展的基本线条相反却是我们所熟悉的。如果自第一个千年纪初期就产生了以其古、中、近代形式出现的汉语语系的各种语言从黄河流域先向长江流域、后向华南和东南亚发展,以及傣语、藏—缅语和孟—高棉语从长江流域和汉藏走廊向华东与印度支那半岛流动和扩展,那末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自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也向东南和更远的地区扩展过。最后,印欧语言(龟兹语、焉耆语、于阗语、东伊朗方言)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代都出现在西域的诸绿洲,但它们于我们当代却从那里完全消失了。

汉族人

在东亚形成的这片地理和人文的辽阔领域中,属于汉族语言和文化的人口在今天形成了一个最大的集团。他们的开拓领域延伸于近 1500 万平方公里的地面上,从西伯利亚(北纬 54°)到帝汶岛(南纬 10°),从棉兰老(东经 126°)到欧亚大陆的腹地(印度西海岸孟买的子午线,东经 73°)。从其人口 3/4 为华人的城市新加坡到阿穆尔河流域,其间距离就如同从都柏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部边境一样遥远。

中国这些人口的总数于 1986 年已超过 10 亿。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辖范围之外的东亚汉族

人口统计表(1986 年的估计数)^①

台湾	19500000
香港	5600000
澳门	300000
新加坡	1800000
泰国	11000000
马来亚	6400000
印度尼西亚	5100000
越南	1500000
总计	51200000

汉人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他们在形成的中国中原的 21 个省中确实占大多数(于其中还应该再加上台湾省),但却不停地向这些

^① 为提醒起见,我们应重提一下华人团体在印度、马达加斯加、南部非洲和南北两美洲的存在。

省份之外扩展,从而形成了连成一片的近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其地域几乎与我们欧洲一样辽阔,一直到达苏联边境。本著作中经常参照的这 21 个省份具有介于罗马尼亚和希腊之间地域的面积,其人口的密度于 1975 年尚可以与欧洲国家的人口密度相比较。在当代,唯一的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省份江苏省(上海 1957 年计有近 700 万人口,而在 1986 年却有 1200 多万人了;南京有 160 万,江苏超过 50 万人口的城市很多)于 1957 年就在其居民密度上超过了荷兰。

但也存在着一个“域外的中国”,由大部分定居在东南亚各国(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华人集团组成。他们在马来亚(在那里形成了其全部人口的 1/3 以上)、沙捞越(婆罗洲的西北海岸)和泰国为数很多,在越南、柬埔寨、爪哇和菲律宾的数量也远不是可以忽略的。新加坡、马来亚的檳城和马六甲、越南的堤岸都是华人城市。

具有汉语和汉文化的不同居民人口远没有形成一个清一色的整体,而是以他们的传统、风俗、民族组成和方言而互相区别。由于缺乏可以使我们在欧洲于法兰西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罗马人之间作出那样明确区别的民族标准,在华人世界中掩饰着一种很大的差异,它是历史的产物,在过去无疑比在今天更为明显,那里的教育和交通的方便程度趋向于模糊或抹煞不同地区的固有特征。不过,研究撰写汉族居民的移民史以及华人语言和文化的不同居民的民族志可能是一项最庞大的任务,可能从来未被人以系统的方式触及过,在这一方面往往都缺乏文献。

汉人占大多数的中国省份与欧洲国家的面积比较表(平方公里)

中国省份	面积(平方公里)	欧洲国家
四川	569000	
	550800	法国
	504900	西班牙

黑龙江	463600	
	449200	瑞典
云南	436200	
甘肃	366000	
	311700	波兰
	301100	意大利
	243400	罗马尼亚
广东	231400	
广西	220400	
湖南	210500	
河北	202700	
陕西	196750	
湖北	187500	
吉林	187000	
贵州	174000	
河南	167000	
江西	164800	
山西	157100	
山东	153300	
辽宁	151000	
安徽	139900	
	132500	希腊
	127800	捷克斯洛伐克
福建	123100	
	110950	保加利亚
江苏	102200	
浙江	101800	
	93000	匈牙利
	41300	瑞士
台湾	35960	
	30560	比利时

17 虽然它们具有会使我们联想到一种母语在某个限定地区所采取的形式那样的方言名称,但汉语方言却是由数百万人口所讲的。它们彼此之间具有一些如同在欧洲把同一个语族的语言分别开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某些整体(大家于其内部会遇到一些重要的变化)的差异那样明显的区别。

然而,我们应该指出一个相对统一的群体的存在。这就是北方方言群——由 1953 年普查中统计到的 3.87 亿人所讲,共形成三个不同的方言集团。这些方言的相对一致性可以在介于蒙古和长江流域之间所有地区的历史过程中产生,同时也可以由近代向东北(满洲)和西南(云南与贵州)诸省的大量移民所造成的人口混杂来解释。中国南部和东南方言的差异以及它们之中的数种古老特征相反却都证明了这些地区人类群体的相对稳定性,它们也可以通过在那里自上古时代末期以来一直在扩大的汉族移民的连续浪潮来解释。

汉族占大多数的省份和汉族居少数的领土上的居民统计表
(1957 年的人口普查和 1986 年的估计)

汉族占大多数的省份

省份	1957	1986	省份	1957	1986
四川	72160000	101880000	江西	18610000	34600000
河南	48670000	77130000	云南	19100000	34060000
山东	54030000	76950000	黑龙江	14860000	33110000
广东	37960000	62530000	陕西	18130000	30020000
江苏	45230000	62130000	贵州	16890000	29680000
湖南	36220000	56220000	福建	14650000	27130000
河北	44720000	55480000	山西	15960000	26270000
安徽	33560000	51560000	吉林	12550000	22980000
湖北	30790000	49310000	甘肃	12800000	20410000
浙江	25280000	40300000	青海	—	40700000
辽宁	24090000	36860000			

直辖市

直辖市	1957 年	1986 年	面 积
北 京	—	9600000	16800
上 海	—	12170000	6200

续表

直辖市	1957年	1986年	面积
天津	—	8080000	11300

汉族占少数的领土(自治区)

自治区	1957年	1986年	面积
内蒙古自治区	9200000	20070000	11775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640000	13610000	1646900
西藏自治区	1274000	1990000	1221600
宁夏回族自治区	2050000	4150000	66400

说明,广西虽然是一个汉族占多数的省份,但却被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请注意,广西未出现在本表中。

20

汉语方言(1953年的统计,以百万人为单位)

北方方言(四类)	387
吴语(四类)方言	46
粤语方言(五类)	27
湘语和赣语方言	26
客家方言	20
闽南方言	15
闽北方言	7
累 计	528

说明:这些数字既未考虑台湾的汉人(现今有1300万人,其大多数操闽南方言),也未计算东南亚的汉族移民区(1100万人),他们根据其出身血统而分别操粤语、客家语或闽南方言。

完全如同欧洲的人口一样,中国的人口是无数次人员混杂的产物,而这些混杂又都是由战争、异族入侵、移民渗透、人口迁移、毗邻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所造成的。突厥、蒙古、通古斯、朝鲜、藏—缅、傣、苗和瑶、孟—高棉民族以及有时甚至是来自印度、伊朗和

东南亚交界处等较远地带的民族为汉族人口的形成作出了贡献。中国北方的民族组成在历史的进程中曾由于发祥于草原地区和北满的操阿勒泰语的民族所提供的新因素而经常更新，中国西部省份的人口组成则由于喜马拉雅群山区山民与青海半定居民的杂婚而不断变化。民族杂婚在中国南方也很严重，在那里进行移民开拓的努力到我们今天共延续了 2000 多年。在整个中国的西南地区（贵州、云南、湖南、四川、广西和广东省），还继续存在着非常多的非汉族种族。

如果说汉族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那末属于其他民族的中国公民在 1957 年就已经代表着 4200~4500 万人了。这些民族中的 50 多个受到了官方正式承认并享有一种相对的政治自治权。

因此，我觉得汉族人口远不是如同人们先天推理性地想象的那样形成了一个清一色的整体，相反民族差异性在某些省份中极其复杂。那些操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的民族也继续存在于台湾岛的北部和东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非汉族民族(1957 年的普查数字)

21

名称	民族—语言族	地域	人数
壮	傣	云南、广东	7800000
维吾尔	突厥	新疆、甘肃西部	3900000
彝	藏—缅	云南、贵州、湖南	3260000
藏	藏	西藏、青海、四川	2770000
苗	苗—瑶	西南各省	2680000
满	通古斯	东北、内蒙、北京地区	2430000
蒙古	蒙古	内蒙、东北、甘肃、青海	1640000
布依	傣	云南	1320000
朝鲜	朝鲜	东北	1250000

这些非汉族人口是这样一部历史的最后残余；它以汉族语言和文化人口之持续不断的发展为标志，同时也以随着他们的拓疆展土和通过与更遥远文明的接触交流而使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经改造、丰富、多样化的文化取得胜利为标志。民族的混杂、不同居民之间的借鉴、同化现象（汉人采纳了游牧民的生活方式或中国南方土著人的生活方式，中国南方诸省的某些民族与汉人再没有任何区别了），导致从一种历史视野的角度上突出了生活方式和文化的重要地位。

生活方式和文化

如果说东亚和中国（世界这一部分的所有语族都出现在那里）的语言状态就已经揭示了其居民的复杂性，那末其他因素事实上可以更加突出远东的人文现实。那里的采摘业、狩猎和捕鱼、饲养和农业以不同的发达形式构成了人类的基本活动，因为人类首先必须养活自己。他们又以掠夺（侵袭、抢劫、海盗）和商贸活动来补充，这些生活手段与以它们为其基础的文化维持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生活方式为对历史的任何全面解释都提供了基础。

22 最重要的是地理因素。正是地理促使形成了某种生活方式并强加给它一些限制。在某种海拔高度之上和某些气候条件之外，小麦就要让位于大麦了，蒙古那辽阔的草原牧场更有利于大规模的饲养业而不是农业，需要大量灌溉的水稻种植业最理想的选择地是温带和热带那些能灌溉的平原……当然，我们无疑不应受一种地理决定论的支配。能灌溉的稻田通过梯田便可以向丘陵地冲击并以灌溉而扩展到干旱地区。中国北方和蒙古南部既适宜农业，又适宜饲养牛、羊和马。由这种海拔高度所造成的生活方式，可以使人理解它们的前进、后退及其共存。这种现象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并且可以部分地解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接触和互相借鉴。但

人类社会的这种将它们和与之相联系的生活方式扩大到天然界限之外的深刻倾向、地理条件给人类活动造成的这种相对自由性，与生活方式的一种基本划分（因而也是对文化和文明类型的一种基本划分）相矛盾。人们可以在东亚形成的这片辽阔无垠的地理范围内辨认出与特有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四大文化群体：

——从事发达的和占优势的农业之定居民文化圈。具有汉族文明的居民和深受他们影响的所有居民均属于这种文化类型。

——从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La taiga，本指亚寒带针叶林。——译者）到华北农业地区和从满洲到伏尔加河下游盆地的草原与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文化圈。

——喜马拉雅辽阔的群山区及其毗邻地区的那些同时从事养殖业和农业的山地人文化圈。

——热带地区的混合文化圈，这些混合文化把具有不同程度的原始农业形式与狩猎和饲养业结合起来了。这些过去曾非常发达的文化今天正处于消失之中。

为了更为完整起见，我们还需要在这四大文化群体之外再补充西域绿洲定居民和商贾文化群体。

农业发达并占有优势地区的定居民

正如在世界的其他部分一样，正是最发达的农业形式可以使人口得到最迅速的增长、组成了丰盈的储备并形成了组织完善的国家。这样一来，那些伟大文明便开始了。但在延伸于东亚所有的平原、谷地与肥沃高原之上并使生活在类似地理条件下的居民也采用它的生活方式的这一文化圈内，则必须区别出两类不同的农业：

——一种要上溯到新石器时期的旱作农业，其粮食作物是大麦、各种谷类和小麦。在相当于中国北方的旱作农业区中，灌溉是

23 以零星的方式实施的,它可以使收成增加和稳定。尽管农业在这些地区占优势,饲养业(牛、羊、马)在上古时代(公元前第2~1个千年级)也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并在长时间内保持了一种远不能被忽略的地位。但农业定居民与游牧民和山地人不同,他们厌恶食用奶制品并减少了肉类在他们的食物中所占的比例。

——水浇稻田的耕作,它在公元后最初10个世纪期间只得到了缓慢发展,仅仅在该时代之末才得到充分发展。这种农业技术的发源地很可能是多元的(北印度和主要是长江下游盆地),但应该是取得了一种非常广泛的成功,发展到了可以灌溉的所有温暖和潮湿地区(中国的热带和亚热带平原与谷地、印度支那半岛地区、印度尼西亚、朝鲜和日本)。水稻种植业的发展在东亚人口史上代表着一个新阶段,它从公元8~10世纪起为世界这部分地区的文化输入了新的生命力。

此外,东亚发达的农业形态丰富多彩。它是以一系列的进步和变化为标志的。除了水稻耕作技术的改进之外,由于选择优良品种、在13世纪时引入高粱和从16世纪起引入美洲的农作物(甘薯、花生、玉米、烟草、土豆),所以一千多年以来引起了许多根本性变化。

草原地区的游牧民

这些操“古阿勒泰语”和“阿勒泰”语的居民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上曾扮演过一种重要角色并对其文明施加过深刻影响。他们的主要特征是:

——住窠(蒙古包)、畜群(黄牛、绵羊、马匹、骆驼、牦牛)和其他财产(妇女的首饰形成了游牧民的动产)的活动性。在平原上的夏牧场之间和避风谷地的冬牧草场(冬窝子)之间的迁徙往往不会超过150公里。但牧民部族可以在需要的情况下做远距离旅行,他

们一般只有在更强大部族的威胁下才会这样做。

——一种习惯于日常战争训练(驯马、狩猎、骑射或打枪)的生活方式。

——畜产品足以维持主要需要(奶、马奶子酒、奶酪、酥油、毛织品和毛、皮和皮货、作为燃料的干畜粪)的经济。抢劫(入侵定居民或毗邻部族、掠夺商队)、定居民的馈赠和商品的交流可以为这种经济提供某些补充,这就是从10世纪起的金属、粮食、丝绸、²⁴奢侈品和茶叶。抢劫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在冬季获得粮食补足,但也经常是强迫定居民开放市场。然而,游牧民并非完全不懂种植大麦(燕麦)、小麦和谷子,他们在某些时代也发展了一种冶炼业。此外,定居民、农民和手工匠役在游牧民中的存在是历史上的一种常见事实。

——草原居民在西伯利亚森林地区为获取毛皮而狩猎的猎人和生产纺织品与金属的定居民、喜马拉雅群山中的山地民、从中国西北(甘肃省)的一系列绿洲到河中地之间的定居商人、中东和东欧居民之间的居民所扮演的重要中间角色。

——以弱小部族对强盛部族的依附、畜群主与奴隶或农奴群体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一种部族社会。

——部落联盟和政治集团的不稳定性。我们应该指出,经选出的头人在他们之中的权力受到了骑马和全副武装的军人大会的限制。他们与定居民的交流接触和贸易关系成了经济和社会的借鉴与改造的缘起,而这一切在最早的一段时间内可以加强政治组织并使草原社会富裕起来,但长此以往却由于部分部族或其贵族的定居化而引起了紧张关系和内部分裂。

喜马拉雅群山及其周边地区的山人

山人的扩张发展区域延伸在近400万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其

人口在 1957 年估计约为 300~400 万人。一种粮食农业(低产而又压饿的粮食,尤其是大麦、小米、黑麦、荞麦,有时还有在避风谷地生长的小麦)在那里与黄牛、牦牛、马匹、绵羊和山羊的饲养结合起来了。与草原地区的牧民之牧业相似的大饲养业在青藏大高原上也并非从未出现过,但冬天圈养和夏季进山放牧的山区牧业在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区占绝对优势。自然条件的多样性(高原、大山和谷地)解释了牧民或农民的专业化,或者是由同一批居民使牧业和农业结合起来了。与石砌平顶(有时也呈数层塔状)的耕农住宅相对应的是牧民的黑帐篷。由于黩武好战之习俗,喜马拉雅山群山中的山民(藏族人、羌族或唐古特族人、嘉绒人、彝族人、纳西族人或摩梭族人)对商队发动攻击并入侵定居农民的地区。他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向东方即今之甘肃、四川和陕西诸省以及向北方的绿洲地区侵犯或涌入。

25 华南和东南亚的混合文化

这些今天正处于衰退中的文化过去曾大幅度地向长江流域和东南亚传播。它们把采摘业、狩猎、饲养业和不及在汉人中那样发达的农业形式、海岸和江河中的捕捞业结合了起来。它们面对平原水稻种植业的发展而向山区的退缩以及它们向南方的全面收缩使得让古老时代再现变得很困难了。为了能适应更加艰难的自然条件,某些集团被迫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并转而接受一种流动农业的形式,这种农业形式从很古老的时代起就出现于东亚,但今天仍被中国南方和印度支那半岛上的一大批少数民族采用,如广西、广东、贵州和云南的瑶族和苗族、越南北部的苗人和蒙(Mhông)族人、海南岛山区的黎族人……这种非常粗放的农业是借火烧灌木丛或森林而从事的刀耕火种,从而导致了村庄随着土地在 4~5 年之后的地力耗尽而迁徙。其农作物都是用掘地棍播种的根块作物

(芋头、山药)、旱作粮食作物、山地稻和自几个世纪以来的玉米。这些古老居民中的一部分,特别是生活在海边和以捕捞为其主业的居民们都消失了,或者是与采纳了他们的海洋生产技术的那些从事发达农业的定居民们融合了。某些集团接受了水稻的种植术,中国西南的一个重要少数民族傣族、于1957年就普查到780万人口的壮族人、缅甸的掸族人、越南的泰族人(土人、黑泰与白泰人、侬人)中的情况即如此。他们在印度支那半岛的大江大河之三角洲上创建了一些组织严密的国家。这些居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相对比较为人所熟悉,可以使人追踪他们自中越边界和中国中南部向更偏南方地区的迁徙(经伊洛瓦底江流域而来的缅族人、经湄南河流域迁来的傣人、自湄公河流域迁来的高棉人、自红河流域迁来的越南人)。

虽然历史的发展导致了水稻种植业从长江流域一直向爪哇发展,中国南方却以其古老的居民、语言和文化而与东南亚密切地联系起来。同一批藏—缅、傣、苗、瑶和孟—高棉少数民族也出现在中国南方和印度支那半岛的山区。

这些具有千差万别文化的民族(我们通过文字史料和考古而熟悉了他们)的某些典型特征一直延存到我们今天,这就是流动农业、吊脚楼住宅、饲养水牛、酿制助消化和发酵的腌鱼、使用葵叶、运用背篓、使用口吹羽管琴(老挝的羽琴和中国的笙)、使用铜鼓、创造人类和洪水的神话,此外还有崇拜蛇、龙、犬、虎、萨满教……许多这类文化特点甚至在中国南部和印度支那半岛那些更为发达的民族中也非常广泛地传播。 26

西域绿洲的定居民和商贾的文化

中国有一系列连绵不断的绿洲,它们把甘肃西部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两端及帕米尔以远地区的锡尔河和阿姆河(希腊人所说的

奥克苏斯河)流域连接起来了,这就是通过北路的酒泉、安西—哈密、吐鲁番、龟兹、阿克苏,通过南路的敦煌、鄯善、尼雅、于阗、叶儿羌,农业定居民和商人地区的疏勒、浩罕、塔什干、萨马尔罕、布哈拉等地。这些绿洲曾是亚洲所有迁徙民族的集散地,其中包括操印欧语的民族(龟兹人、于阗人、粟特人、萨尔特人……),操“阿勒泰语”的民族(匈奴人、突厥人、回鹘人、蒙古人……)和操汉—藏语的民族(汉族人、藏族人、唐古特人……)。1900年在甘肃西端敦煌城附近发现的5~10世纪的纸本写卷的丰富多彩性揭示了这些绿洲居民的多民族性或世界性特征,其中的汉族人、草原游牧民、喜马拉雅群山的山民和建立于帕米尔以远地区的汗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未停止过争夺对于该地区的控制权。除了大批汉文写本之外,在敦煌还发现了大量藏文文书,同时也有回鹘突厥文、粟特文(东伊朗语)、唐古特文、于阗文和龟兹文、梵文和普拉克里特文的文献。

这些过去非常活跃的绿洲成了伊朗、印度、近东和地中海居民的影响传入东亚的主要交通大道之一。

欧亚大陆的交通道路

作为结束,我们应该为远来文明的影响保留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广义的东亚特别是中国社会于其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与欧亚大陆的西部和南部维持着关系。这些关系提出了彼此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三大类问题:经商大潮的问题(海上贸易和陆路骆驼队)、军事大扩张和外交关系的问题、大宗教传播和朝圣进香的问题。由于根据时代不同而使最经常往来的不是同一批道路,所以与东亚不同地区维持关系的也不是世界的同一些组成部分。从中国的上古时代末期(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9世纪,绿洲道路扮演了一种重要角色。更靠北部的草原大道在13和14世纪则把蒙古

和中国北方与欧洲和近东国家密切地联系起来。此外,公元2~8世纪的印度—伊朗、公元8~14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从16世纪初叶开始的欧洲海上扩张,都对欧亚大陆的文明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²⁷

那些穿越欧亚大陆而通向中国社会边陲的商贸中心经常有来自西域、印度和中东诸邦的商人、使节和布道师们来往。中国沿海的口岸也以同样的方式成了原籍为相差悬殊地区的航海家与商人们的聚散地,如高丽人和辽东人、山东海岸和江苏人、浙江的日本人、东南亚和印度洋人(印度人、伊朗人、阿拉伯人)、广东和福建的西方人(从16世纪开始)。旅程的遥远和每年季风的节奏规律,解释了为什么外来移民和远方影响之传播的代理人都形成于这些海港以及位于中国社会的商业大动脉上的都市中(把陕西的渭河流域与长江下游地区联系起来的道路、从广州经湖南的湘江流域与江西赣江流域联系起来的长江航路、长江流域以及把杭州地区与开封和北京地区联系起来的大运河……)。中国的大都市(特别是其京师)自古以来就是世界性城市。反过来,中国的军人、使节、朝圣进香人、商人和工匠也都访问过亚洲的几乎所有地区。

东亚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一种固定模式的类型学以及对外来影响的重新提及,都会使人理解世界这部分地区的人文现实的复杂程度和丰富性。如同欧洲的省份一样,中国中原及其毗邻的每个地区都具有其各自的历史,这部历史也是其拓殖史、它在数世纪以来所属的那个政治团体的历史、它从土著民族中接受影响的历史、近邻或遥远民族的历史。语言、风俗和传统、人文类型到处都保留了对要追溯到不同程度的古老时代的历史记忆。

中国社会比其他任何一种社会都更与那些其生活方式和文化与自己相差甚殊的民族保持着长久的接触和交流。同样,中国接受过其贡献的那些文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前伊斯兰时代的伊朗、印度、伊斯兰社会、基督教西方)的特有的天才都与中国自己的才

华完全格格不入。由于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参与其形成的、前来丰富它和改造它的因素具有如此之大的差异，所以中国文明如同历史上的其他大文明一样是一部持续创作的大作品。

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模式

经过研究分析，那些使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与西方国家历史对立起来的根本差别，被发现是一种准确性的差异。这并不是由于缺乏资料，这类资料的内容如此丰富，数量又如此巨大，以至于对它们的利用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但是，例如 16 世纪的意大利或法国史可以逐年地被人了解，而且对在该世纪期间产生的历史变化的研究可以被深入到尽可能详细的程度，而中国历史在西方相反却不大为人所熟知，以至于人们还经常是笼统地指 3、4 个世纪之长的含糊时代。所以，明代（1368～1644 年）有时被作为一个非常统一的整体而提及，于其中仅仅能为某些重大事件具体定位。但这个时代的“历史”仍需要有限时代的阶段和逐地区的研究，因为明代的中国覆盖了从热带地区到西伯利亚的一片相当于 10 倍法国国土的面积。

一直到中世纪研究发展起来之前，我们的中世纪始终被认定是一个愚昧和停滞不前的时代，而史学家们的著作却揭示了一种丰富的和复杂的发展，赋予了似乎是死亡的东西一种生命、色彩和运动。中国的历史就如同我们那未经探讨过的中世纪一样，被反复指责为停滞不前、周期性循环先前的状态、相同的社会结构和相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持久性，这都是对于一种仍不为人所熟悉的历史价值的判断。毫无疑问，自本世纪初以来，在中国、日本和西方国家为中国历史所写的大量著作都使我们的知识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尚谈不上如同人们可以对西方历史所作的那样深入探讨非常细微末节的问题，人们远未达到足以使人想到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

欧洲的发展相比较的那种研究分析水平。

然而，大家可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区别出一些过去曾有过天壤之别的社会—政治组织形态。事实上，在上古时代（公元前 1600 ~ 公元前 900 年左右）的宗教和战争的君主制与在公元前 3 世纪末建立起来的由领取俸禄和可以罢免的官吏治理的中央集权帝国之间没有任何共性。公元前 10 至公元前 7 世纪的社会以其无数的小公国（其首领由出自豪门望族的官吏协理）及其家祭等级在当时完全是新颖独创的，也是原始的。但从其创建时代起就发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变化则要比人们所普遍想象的那样重要得多，因为它们都被词汇的单调性掩饰起来了。公元 3~4 世纪之间，在长江流域的帝国中组成了一个具有庄园和附庸、实行族内婚的望族阶级（门阀），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央政权，从而形成了在中国的其他任何时代和其他任何地区都未曾有过范例的现象。一个社会把宋代（960~1279 年）初期的政治制度以及在官吏中的派系斗争 29 与在 14 世纪末叶由明朝开国皇帝创建的专制独裁帝国分隔开了，况且还有一种使人把汉—满族的大清王朝于 1911 年的灭亡视为一种 5000 年政治制度之结束的蜃景幻影。如果说在所有皇帝中的第一位——秦始皇（公元前 221~公元前 210 年）和最后一位清朝溥仪皇帝（在尚为幼童的时候就以宣统的年号执政，1908~1911 年）之间确实始终存在着皇帝和王朝世系，那末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也有某些很深刻的差异，它们取决于国家组织、经常执掌实权的社会集团（贵族、军队统帅、以地租为生的士大夫家庭、宦官太监……）。希望在整体上和于其存在的整个期间都把中国社会制度定性为帝制是一种严重的方法错误。因为政治制度是活的机体，它们要不断地适应社会和经济变化，以使之不至于在一段短时间内与这种变化处于矛盾状态。

我们所惯于在君主制和民主之间确立的区别过份专断了。完全如同历史不具有纯民主的模式一般，中国社会中的君主制度也

远未能排除任何节制性的机构和任何表达民意的形式。对最弱小者的剥削、专断和暴力并非是中国社会中的一种独创。经过全面斟酌之后，人们在历史上的所有其他民族中都绝对找不到比中国更公正和更人道的社会了。人们可以用最灰暗的色调来描绘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史，对于欧洲的情况也很容易干同样的事。

一种基本的轮廓可以使人们对从上古时代到今天中国社会中政治形态的相继变化奠定一些思想观点。

一、上古时代

公元前 1600～公元前 900 年左右。这是一个宏伟文明的时期，中东^①为同一时代提供了一些类似的例证。国王是贵族阶级中的第一人，他的排他性活动是祭祀和战争，故既是战争统帅又是祭礼之司祭。他的所有活动都依赖于王宫，而王宫则一无分别地同时承担着政治、宗教、军事和经济的活动。在公元前 900～公元前 500 年左右时，一种既互相结盟又彼此对立的贵族城邦制度取代了这种王权形式。小公国或分封国的诸侯们彼此团结在一种以与家族、宗教、战争和经济相对应的宗法关系和祭礼特权之上的等级核心中。但这种制度在该时代之末衰败下去了，一些彼此之间进行斗争的大王国形成了。

30 公元前 500～公元前 220 年左右。贵族社会的这种危机由于君主制的发展而得以解决，导致创建了一种中央集权的国家。由于取消了封邑和排除了上层贵族，所以中央集权的国家是直接以农民阶级为基础的，后者是经济力量和兵力之源。

① 我们在本著中采纳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所说的“中东”一词，以指从北印度平原直到地中海之间延伸的辽阔的地理范畴。它与“近东”一词相对立，后者的词义仅限于指东地中海沿岸地区。

二、尚武的帝国

公元前 220~公元 190 年。这种国家类型通过征战而发展到了所有古代王国。但中央集权有利于宫廷和有损于官僚队伍,从而挑起了两场危机,其中第二次危机导致了一种彻底的无政府状态。

190~310 年。互相争夺权力的独立军阀最终瓜分了整个中国——中国北方、长江下游和四川。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种军事专制政权,但却遇到了其发展要追溯到公元 1~2 世纪的大地主家族日益增长的抵抗力量。

310~590 年。自公元初就定居在中国北方的非汉族居民在那里创建了一批王国,其政治制度是汉族社会、草原游牧民社会或汉藏走廊地区山人社会之国家传统的一种综合。北方诸王国越来越变得汉化并依靠一个混血的军事贵族阶级,它们由这些王国中的最强大者所统一。但在长江流域,于公元 4 世纪初叶逃往那里的汉族精英们形成了一个实行内婚制的望族阶级。他们在相继于南京创建的诸王朝中掌握着事实上的权力,直到北方的一位皇帝将整个中国社会重新统一为止。

590~755 年。在新帝国开国之初行使统治权的汉—胡族贵族与一个新的官僚阶级开始了斗争,而这后一个阶级是为了加强国家的施政栋梁而形成的。把土地租给农民阶级和控制自中央集权国家创建以来一直在华北持续存在的土地所有权的制度,从公元 8 世纪末就处于衰败之中,而且还可能由一种农业税制度所取代。由对耕田的权力取代了对于人及其劳动的权力。征兵制也以类似的方式很快就取代了雇佣兵制。

755~960 年。统一了中国所有地区的军事贵族在官僚阶级于前一个时代期间形成的同时便遭到了排斥,那些军事冒险家们曾组成了雇佣军队并且瓜分了中国的所有地区。

三、1644 年之前的官僚帝国

960~1280 年。重新统一是这些军阀的功业之一。但选拔官吏的需要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官僚队伍的迅速发展和国家行政机器的改善。比欧洲早五个世纪的大量印刷著作的技术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以及直到近代始终统治中国政治生活的文人阶级的膨胀。除了 31 在蒙古统治时代之外，这个阶级后来经常与中央政权发生冲突。

1280~1370 年。向中国中原借鉴了其教育制度的非汉族帝国在前一个时代期间就于北方边陲形成了。它们从 13 世纪初叶起被蒙古人消灭了，而蒙古人的专制和封建制度所依靠的基本上是一支非汉人的队伍。该政权通过征战而在 13 世纪末扩展到了南部中国，但却被于后一个世纪中叶开始的人民起义所席卷。

1370~1520 年。源自这些人民起义的帝国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其非常强烈的专制倾向。由于中央政权不信任其代理人，于是便以一种秘密警察的手段进行控制。

1520~1644 年。政治制度之僵化般的严厉性以及 16 世纪的社会经济变化，从 1600 年左右开始引起了一次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它很快又由兵变和农民暴动所继续。

四、近代中国

1644~1800 年。在 17 世纪上半叶期间夺取了满洲的某些已经汉化的民族利用了当时在中国呈现的混乱状态而通过征服取代了原来的汉族统治者。在他们入主中原的翌日建立的军事和封建政权逐渐地变温和了，满族人在主要方面仍采纳了前朝的制度并企望取得旧文人士大夫阶级的支持。他们的合作使新王朝避免了在 17 世纪上半叶产生的危险紧张状态。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促进了社会的和平。

1800~1900年。一场金融财政危机、一种腐化的发展和一种经济衰退加剧了从1800年左右出现的局面。19世纪上半叶持续发展的恶化形势导致了1850年和1870年之间的一场令人生畏的大动乱。在19世纪末年,西方民族(很快又加上了日本)的压力激起了国家和社会的瓦解以及民族独立的丧失。

五、当代中国

1900~1950年。许多新政治潮流出现了,其中主要由在大通商口岸和东南亚形成的商业资产阶级所代表。但实权却掌握在新军事将领手中,他们获得了外国列强的支持。这场长期的危机由建立一种军事专制而部分地解决了。军事专制由于农民游击队的发展而被最终清除了,而农民军领导人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1976年。模仿苏联制度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恢复了经济并谋求一种根本的社会变革。但在受毛泽东的空想主义观念鼓动的大跃进期间(1958~1959年),突然加快了发展步伐。1960~1961年间出现的自然灾害以及苏联与中国的决裂标志着1949~1976年间的大转变。直到由毛泽东在军队的支持下于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对现实的关注又重新占了上风。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夺回领导权并阻止革命陷入消沉。然而,仿造苏联模式的社会结构阻止了大风暴的发生。³²

中国社会政治史的这篇非常简单的梗概并未考虑其发展中的其他重要观念,如具有汉族语言和文化的口口膨胀、政治统一的广度、军事发展和拓殖现象的时期。上古时代的中国小城邦仅仅是辽阔的未被垦殖地区中的一些飞地,而且不会越过黄河下游的界限之外。中国北方平原的开发仅仅从公元前4~公元前1世纪才开始。南方各省的垦殖则是从公元前3世纪末开始的一个漫长时期的现象。公元6~8世纪的尚武中国转向了西域并将其权力一直发

展到位于帕米尔以远的地区。12~13 世纪的中国则是一个海洋和商业国家,受到了草原帝国蚕食侵犯的威胁。18 世纪统治了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汉—满族的大清帝国更注重大陆问题而不是贸易,尽管当时很活跃的贸易使中国南方和东南方的沿海省份具有了生气。

这篇梗概介绍也未考虑到科技史的重要阶段,科技连续发展之后紧接着就是新的人口发展高潮。如果说上古中国的所有地区肯定只拥有数百万人口,那末公元前 4~公元前 2 世纪的技术大发展(农业、冶铁业和机械业)很可能就导致了现知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揭示出来的人口净增长,即在公元 2 年时为 5700 万人口。技术改革的第二个大阶段介于公元 8~11 世纪之间(水浇地和水稻种植的发展、选种、印刷术、纸币、新机器、远洋大帆船的出现……),并导致了一次新的人口增长高潮,从而使中国的人口在 11~15 世纪之间超过了 1 亿。美洲农作物的传入、从 16 世纪初叶开始出现的手工业发展高潮最终使历史在该世纪和 1830 年左右得到了最疾速的发展。更近期的发展始于我们当代并且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的人口爆炸为止,始终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同步。

如果说思想史、宗教史和文学史在本书中占据着一席之地,那也不是把它们作为一部自给自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史的附庸,而是因为这两种历史本为一体,它们的区别仅仅是人为的。最重要的是重新提及或指出中国社会具有一部文化史,这就是说在知识和思想的所有领域中都产生了这种陆续积累的经验,这种作为任何历史之特征的新旧知识的结合、深入与发展。我们必须同时指出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方向、新奇特征、使中国与世界其余部分联系起来并且可以解释各种发展的非常普遍之相似性的外来因素之影响。对于使中国佛教虔诚的大规模运动与中世纪基督教运动相似的类比、对于把 17~18 世纪的中国大思想家们与我们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联系起来的远距离的相似性,谁又会不感到惊奇呢?对于

西方在近代中得以向中国提供的内容，它们也远不像外行们倾向于去臆想的那样是全新的，如数学、伦理和政治思想、社会学、历史评论和文献考证在那里于漫长的岁月中就发展起来了。当西方发现中国时，中国在许多领域中都与之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

中国文明显得似乎与一种发达的农业类型有关，而这种农业又几乎完全局限于平原与河谷地。在汉地或已被汉化的地区，大山从未被开发过，并且始终是另一类不同的居民们的领域。此外，饲养牲畜又仅限于在驾套和驮载牲畜方面必不可缺的需要。当饲养牲畜（黄牛、马匹、骆驼、绵羊和山羊）在印度、中东、地中海盆地和欧洲已经在经济与观念中扮演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角色时，当农业和牧业在所有这些地区结合起来时，东亚却是世界上在牧民界与耕农界之间作出明确划分的唯一地区。这种足以掩饰远东新奇特征和其影响后果的那种曾经是非常重大的对立，无疑表现了各种文明的特有选择之一，但它也受到了舆地学的促进，因为大牧业区始终位于黄河流域肥沃大平原的西北和北方。

近代人都强调指出了农业经济在中国各地的绝对优势。但我们觉得，一种近期的和相对特殊的形势，激励他们以过份独特的方式突出了中国社会的农村特征并且由此而得出了一些笼统的结论。确实是继一次深刻的经济萎缩之后，中国在 20 世纪上半叶变成了农村团体缺乏有机组织的混乱社会，以农业为唯一收入来源而艰难地生活。而在东亚的其他民众眼中看来和对于世界的其余地方来说，中国直到非常近期的时代都以其经济中的农业基础之外的其他特征为标志。

中国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在一种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展了人类社会史上最为完善的复杂政治组织形式。令人确实感到非常惊

奇和瞩目的是一种统一的施政制度在如此早的时代就得以扩大到一个如同欧洲一般辽阔、其人文的差异也足可以和欧洲相媲美的大世界中。人们会联想到米拉波(Mirabeau)^①针对1789年之前的法国所讲的话,他把法国视为“散民的一团无组织的集合”!中国也是那些使用了最多的精力来以系统的方式组织其地域的社会之一,如组织起了道路、驿站、仓库、带城廓的城市、防御城墙、调节河流、水库、运河灌渠……中国社会中政治功能的发展及其较所有其他领域(军事、宗教、经济)的功能所占的绝对优势,是中国最典型的特征之一。

但中国文明首先是一种技术文明。与使用毛皮和毡毯的游牧民相反,这种文明很早就创造了非常高超的纺织术,从第二个千年纪末起便有了丝绸纺织术,从13世纪末起有了棉花纺织术。它同时也在烧窑技术领域表现出了卓越的天赋才能。一方面是陶瓷制造术:中国的陶瓷史是世界最丰富的历史之一,瓷器制造术从12世纪末起就在中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精美程度;另一方面是冶炼术:第二个千年纪末的商代青铜器是空前的精美产品,炼铁业从公元前4世纪末就变成了中国的一大工业,中国的冶炼工人在两个世纪之后就会成功地大量生产钢铁了。虽然大家近来把中国文明定性为“植物文明”(指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文明),但中国在亚洲的所有民族中是最精于冶金术的国家。

中国的工匠和工程技术人员被延请到了伊朗,甚至是俄罗斯……一直到公元19世纪时,中国仍是一个出口豪华奢侈品的大国,其交易激起了世界范围内阵阵贸易潮流,如公元前3世纪到19世纪的丝绸以及瓷器、棉织品、茶叶。但我们也应该提及铜镜、

^① 米拉波(Victor Riqueti Mirabeau, 1715~1789年)侯爵是法国的政治经济学家、重农派思想的先驱和倡导人,著有《人类之友》和《税收原理》等书。——译者。

漆器、小五金、家具、书籍和绘画。由于在东亚存在着很活跃的贸易潮流，所以欧洲的沿海民族从16世纪初叶开始都在想方设法地跻身其中，一个纯属农业经济的中国不可能会对它们产生任何影响或吸引力。

因此，人们普遍形成的有关中国社会的思想是错误的，但它却反映了被模糊而零乱地感觉到的一种普遍真理：不仅是宗教和战争活动，经济活动也由于政治功能的突出优势而在那里未达到过在其他文明中的那种独立性和独特性。在中国社会中无疑存在着一些独立的宗教生活形式、传统和行伍军人界、一个摆脱了国家控制的很活跃的商业领域，但任何神职阶层、任何军事等级、任何商业阶级都从未曾在那里达到夺取政权的程度。这无疑正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恒量常数和最大新奇特征之一。它在这方面有别于所有其他社会。

人们在中国既发现不了人类社会团体屈从神界的现象，也发现不了属于印度思想界所特有的那种认为世界是出自宗教仪轨之创造并由这种信仰崇拜仪轨来维护的世界观。草原牧民也不能像农业和手工业文明造就的中国人所做的那样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游牧民懂得什么是占有财产，因为他们每天都在这样做。所获财产的所有权、严格意义上的奴隶制、主宰统治权、对牧场的分配以及对在抢劫过程中夺取的财产和人员的分配都是游牧民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组成部分。它们使人想起了一个在实力和权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而对其思想状态和行为来说，则由于我们那印欧语、拉丁语、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的历史，也比对中国社会中的这一切更为熟悉。口头诺言在上述这些只是在组成国家的短暂期间才使用文书字据的民族中，正像文书对于中国社会，具有特权般的杰出价值和效力。

普遍被认为是强制权和主宰权的政权在中国则如同是生气蓬勃和整顿秩序的本原，即使这种观念未排除使用暴力和粗暴干预

也罢。但那里的强暴始终附带有思想改造。在此问题上的错误是仅仅把强调风俗之调节功能视为专制制度的一种借口或托词，而它本来却表现了一直延存到我们当代的一种特权政治行为的方式。这样一来，人们在自认为是揭露一种地道的专制独裁政权之假面具的时候却完全误解了。

这种看法陷入了有关中国思想基本特征的一片危险之地。人们应该知道这里是在讲什么，讲的是哪个时代、以及人类活动的哪个领域和哪种社会环境。然而，在所有那些与这个社会有过接触的人来看，这一切都非常明显，它与我们受到培养并且今天仍在那里生活的社会是大相径庭的。中国的基本传统（政治、宗教、美学和法学的）都与印度社会、伊斯兰世界、西方基督教社会完全不同。此外，那些其范畴已发展到了喜马拉雅群山那令人望而生畏的屏障以远的文明之间也有大量和经常的接触交流。中国根本不懂先验论的真谛、利己思想和严格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观念。除了相反的情况之外，中国对于互益性、相关性、相对影响性、远距离影响、模式和作为有机整体的范畴思想之概念的偏爱要甚于专制、物质与精神截然有别的思想。它既未使用美索不达米亚社会方式的完整统计法，也不使用印度方式的成套分类法，这都是一些最逼真地表现了中国思想中的生灵与社会秩序的变化不定和富有生气的象征体系。它的逻辑并非出自对语言的一种分析，而是以维持具有互相对立和相辅相成价值的征兆为基础的。文字也可能与这些深刻的倾向完全不相干，而这些倾向最后使以损害语言为代价的征兆更具有特权了。

中国的文字

某些密切关系把文字与文明联系起来。如果没有这种最终导致控制时空传播和记录事件的手段，那末那些大文明就不可能

发展。但所使用的文字的类型本身就会对它们的基本方向具有深刻影响。汉文字比其他任何文字都能使人更好地理解这些重大影响。它既由于其原理(每个文字符号于其中基本就相当于一个语义体)又由于更为复杂的原因而提供了唯一的一种非常别致的文字例证,它曾为人类的如此一大部分充当了某种表现手段。这种文字的复杂性无疑更有利于能够接触到它的社会阶级,但却远没有人们可能试图假想的那样复杂。那些能够阅读的人在历史上的所有社会中从来都是仅仅形成一个少数,受教育人的比例在中国社会中始终都要高于西方,尽管拉丁字母的学习并不要求作出长期的努力。在中国,对于识字和书本知识的重视解释了这样一种奇特现象。

相反,汉文字组成要素准则的新奇性在许多领域中都有过重要影响,也就是说这种文字与在时代的发展中所产生的语音组成无关,并与方言的变化甚至与语言结构的差异也都无关。从秦朝于公元前3世纪末强行规定在中国所有地区统一汉字书写准则之后,这种文字始终是政治统一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同时也是由于语言(方言)的差异性、政治和行政方面的原因,一种为了阅读和能使中国所有地区接受的书面语言才在中国发展起来了。直到我们近代,没有任何口语标准不是采用强制性原则的,同样的著作都可以用方言高声阅读。每当人们不能用口语交流时,文字始终可以使人互相理解。由于它特有的功效,所以汉文字变成了在中国文化圈和受中国影响的整个亚洲的一种通用的表达手段。

那些其语言与汉语具有深刻差异的民族(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都采用了汉文方块字,他们过去和现在仍以自己的方式和根据自己特有的习惯而阅读。直到法国征服越南和日本吞并朝鲜之前为止,汉文字始终都是它们的文化和行政语言,正如在中国的影响于日本国占优势的整个时代一样。因此,存在着一种系统的中国文学,其作者、诗人、史学家、小说作家、语言学家或哲学家根本不

是汉人,而是朝鲜人、日本人和越南人。在此意义上,人们甚至可以说在东亚有一个以使用汉文字为特征的真正的文明集团。

40 这种文字原理之新颖特征的另外一种后果涉及到了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圈国家中形成的知识与文化的类型。它对于语音变化缺乏敏感性,并由此得以形成文字传统的一种持续性,此种持续性未出现在其他任何文明之中。如果说其文风根据时代和著作体裁而变化,那末相反在阅读写于公元前 2 世纪的一篇著作比阅读一部在当代用古文写成的著作不会有更多困难或者说是困难更少。这样就可以解释中国知识的传统特征,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令人瞠目地积累了词汇短语的领域中,形成了一种无止境的词汇表,也就是无数词的一批辞书条目。这是由数代诗人、政治作家、史学家、伦理学家和学者们持续贡献的结果。中国文字传统的这种奇特的持续性造成了阅读著作首先要求有一种广泛的文化知识,而这种文化的掌握要比掌握文字本身的过程长得多。它同时解释了文字作为施政工具的作用,以及善于施政者的文化和具有雅兴的“文人”那突出的权威。在希腊—罗马社会中颇受重视和尊重的雄辩演说术在中国文明的地区中仅仅占据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由于文字与中华世界的政治、社会、美学和文化诸方面的亲密关系,所以它已经起到了理解其文明的入门作用。

作为结束语,我们还必须指出一种奇特的反常现象。这种如此复杂和显得如此不适用的文字却以非常简练的草书形式成为历史上的第一种速记文字。汉文以一种常用的习惯用于速记谈话、政治讨论、法律诉讼、那些思想上入迷者的长篇讲演,它很早和很广泛地被用于若用拼音字母文字不大容易达到的目的——迅速记录讲话。一部于 988 年在巴格达写成的阿拉伯文著作介绍了著名的穆罕默德·拉齐(850~925 年)的惊讶感,他发现一名中国人(无疑是途经阿拔斯王朝京都的人)在口授下翻译和记录希腊医学之父加利安(公元 2 世纪)的著作。

汉文远没有形成一种特殊的例外,而是启发东亚创造了一些同类型的文字(10世纪的契丹文、11世纪的唐古特—西夏文、12世纪的女真文、14世纪的越南字喃文),其书面形式用于了组成日本识字课本和朝鲜文的拼音字母。

上古时代

第一编 从古代王权到中央集权国家

41

第一章 上古时代的王权

42

一、新石器时代之前

自本世纪初叶以来^①，在中国内地的所有地区及其边陲发现的数目极其庞大的考古发掘物，特别丰富了我们有关最古老历史的知识，同时也经常能印证文献资料。它们也深刻地改变了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传统印象，这种文明似乎是相当多元文化的产物。

人们对在公元前 8000 年左右以一种仍属非常初级的农业经济取代完全以狩猎、采摘和捕捞为生的居民之经济的时代尚不甚了了。但有关此后数千年的考古资料却并不缺乏。可以断代为公元前 6500~公元前 5000 年左右的聚落遗址废墟在渭水流域(今陕西)和黄河中游的数目很庞大，已经揭示出了一种非常发达的农业(种植谷子，也就是意大利的一种狗尾草属植物和干粒稷；家庭驯养猪、犬，可能还有鸡)，使用品类

^① 这一段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杜德兰(Alain Thote)先生的资料。

43 繁多的石器和骨器。陶器当时还相当粗糙,在外形和装饰方面却因地区而有明显差异。但最古老的和大部分都装饰有鸡心状图案的陶器碎片却是在中国南方发现的。这些诸多的遗迹向我们提供了要大大早于 5000 年的一种伟大的南方新石器传统的存在证据,它至今已不再令人怀疑了。

对于晚于这个时间的时代来说,近期的发现说明了分布在辽阔地理范围内的众多差异甚殊的大文化:

1. 仰韶文化,通过从甘肃到关中大平原(包括了山西和河北南部地区的数百个遗址,它们已通过包括碳十四在内的测定而认为应断代为公元前 5150~公元前 2960 年之间)而为人所知。这是黄土地区,它们无疑正是降落在更新世土层上和今天存在于西北厚土层中的细微尘埃。这种远不是清一色的文化一般均是以对农业经济的重视为特征的,然而这种农业经济又与狩猎,捕捞和采摘以及锄、铲、刀、磨等石器时代的工具,饲养猪、犬,可能还有饲养牛科动物的经济结合起来了。陶瓷器在制造技术、彩绘或鸡心形装饰方面则具有巨大的地区性差异。最漂亮的陶器一般都装饰有几何图案,但有时也装饰有非常明显的黑色或红色单线条勾勒的图案。

2. 大汶口文化(约为公元前 4746~公元前 3655 年)覆盖了山东半岛和辽阔的黄河冲积层大平原的部分地区。其经济如同仰韶经济一样也是以谷子种植业为基础的。陶罐的形状更为精致,其装饰是以镂空洞眼、涂敷或以编制的筐篮留下印痕。其差别幅度和泥坯的匀质性说明有过对粘土的选择。

3. 在长江的中下游,人们共区别出了基本与仰韶和大汶口文化是同时代并处于一种可比技术水平上的四种其他文化。但它们都以一种差异特别大的地理背景而与前者相区别,这是指以“日本人工培植稻属植物”和“印度人工培植稻属植物”之名称而出现的水稻,于公元前 5000 年左右就形成了这些地区的基本粮食作物。水牛的驯养也与犬和猪的饲养同时出现了。木制和骨制工具超过

了石制工具,建造住宅房舍引起了使用榫舌与榫槽的巧妙组合木架的问题。最古老的织布梭子也是在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到了第四个千年纪之末,陶瓷的煅烧温度达到了 950~1000℃。

4. 更靠南部一些,在沿海省份福建、广东以及台湾,一些似乎是较晚期才从事农业的居民显得曾实施过一种原始的园艺形式。它们至今仍不为人完全熟悉。

夏王朝

随着新石器时期中期的不同文化的发展和扩大,接触和交流日益增多,范围更广泛和更统一的集团就形成了。人们在第四和第三个千年纪期间发现了意义深远的发展(非常精细的打制玉器以及长江下游的竹子加工、丝绸和麻织的手工艺,石器、贝器、骨器和木器的改进,更为经常地使用制造陶器的转筒,在中国北方出现的其壁极薄和极精致的瓷器)。某些特征就已经预示着青铜器时代的来临:某些陶瓷器的形状、通过火烧动物骨骼的办法而从事的占卜、在地平面而不再是于半地下建造住宅、大型的夯土土方工程、与奠基或坟墓有关的祭祀……铜或者是含铜比例很高的合金已被开始加工。虽然人们尚未掌握可以明确地与夏王朝(传统上认为其时代为公元前 2207~公元前 1766 年)联系起来的任何考古资料,其历史也仅仅保留了其君主的名表,但人们在这一问题上还是掌握了已属于青铜器时代并且能使该王朝的存在变得更为真实可信的一大批资料。

很可能正是在很发达的新石器文化的这种大背景下和在居民相对稠密的自然环境中,出现了城邦—宫廷,稍后不久在第二个千年纪时代发展起了一种以掌握青铜武器为基础的政权。其基本状况与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埃及最早文明诞生的背景很类似,后者也是在大冲积河流域或盆地出现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最早的城邦—宫廷和中国文明的最早表现形式追溯到第三个

千纪末叶。

45

二、上古时代的王权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有数量巨大的考古发现了,自1950年以来又成倍地增长,但青铜器在黄河下游的出现仍保留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使考古学家们感到吃惊的意外特征。在中国青铜器之前似乎并没有一个人们在该大陆西部发现的使用纯金属那样漫长的时代。它的出现似乎比在中东更晚。相反,其技术却很快就于第二个千纪的下半叶达到了一种在其他地方始终未出现过的尽善尽美的程度。东亚的某些特征也可能将会解释这种缺乏长期反复探索和这些如此飞快的发展。龙山陶工的高超技艺、他们似乎能够获得的高温、东亚技术传统中的锤打和锻造都会使人倾向于支持金属合金业的一种独立发明。如果人们在青铜器问题上就如同在其他文明因素的情况下一样绝对不能排除任何外来影响,那末这些影响明显很快就被纳入到上古中国的背景中了。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在黄河下游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文明策源地,它具有新颖特征,其威望影响在整个东亚都会令人感觉到。

有一些认真严肃的原因促使我们把青铜器文明与龙山文化联系起来,因为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的典型特征:

——使用数层夯土的做法。

——以用厚层夯土城墙来加强城市居民点的保护。

——以用火烧脾骨的办法来进行占卜。

——在山东(龙山)的薄胎黑陶与商代青铜餐具中出现的彼此之间很近似的非常典型的形状。

最后,那种认为最早的王朝是自东向西迁移京师的历史传说,既与山东龙山文化的策源地和商代更靠西部的京城吻合,又与它们各自的形势都相吻合。

如果说预示着该王朝的政治组织形式很可能早于商代的王权(君主制),而且有关存在着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夏王朝的传说并非没有任何基础,那末青铜器技术的迅速发展则与上古文明的一次显著的发展高潮相吻合。商一般王朝的最后京师的遗址(位于河南的东北部,今安阳附近,于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被占据)就已经揭示了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拥有一整套精湛的技术和其先驱罕知的知识。在一般情况下,文字、车辆、建筑术、占卜手段、青铜艺术、各类祭祀明器、装饰图案都是以已经形成的很完善的形式而出现在黄河下游盆地……自1950年以来,所获得的新发现无疑可以使人在某些情况下于时间方面追溯得更为古远一些,但对于何以在每个领域中都能达到商朝最后一个时代的精致程度和复杂性之发展尚未能作出更多的说明。如果人们有权把该王朝的开始(无疑也是青铜器时代的开始)断代于公元前17世纪中叶或末叶,那末为了描述商代文明,相反则被迫主要参照在安阳的考古发掘。

商朝(或者是根据在最后一个时代使用的名称而称之为殷王朝)最后一个京师大商或大邑商的遗址曾在该王朝最后11位国王执政期间被占据,而该王朝可能共有约30名国王。据传说认为,该王朝在包括介于鲁西、冀南、豫西和皖北之间的地区曾六迁其都。所有遗迹都分布在大片地域中。考古发掘已经使人得以清理出了一个小城堡,其夯土城墙呈东西和南北走向,就如同在晚期的中国北方城市中一样;同时还有一些包括有甲骨的坑穴,这些甲骨是用于以火从事占卜的,其中许多甲骨上面都有卜辞;长方形地基和建筑物的遗址,带有石砌地基和用于支撑木柱子的青铜垫;带有祭祀用的人和犬之墓道(祭祀过的人被抛在建筑物之外并使其面部转向户外,佩带有战斧和戈,在他们身旁摆着青铜容器);五条葬有驾

轅的车及其车夫们的墓道。在某些墓道中发现了被斩杀者的遗骸，而在其他墓道中则有一些无身躯的首级。最后，那些明显属于国王寝陵的大墓葬也已经被发掘出土了。这类发掘物中的大部分都会促使人假定存在着与建筑有关的仪轨，以战俘作祭祀的行为在1927年和1936年间还实施过。

47 自1950年以来，商代的大量其他遗址都于中国北方发掘出来了。最重要者是1953年在河南郑州郊区发现的。人们在那里清理出了厚20米的一堵夯土城墙以及住宅、作坊、带有青铜模的冶炼炉以及数量庞大的陶器。任何如同安阳墓一类的大墓葬都未曾发掘出土过，但正如在商殷的最后一个京师中一样，其占突出地位的方向是南北和东西。青铜器的做工都比较简单，但技术的精湛程度已经超过了中东青铜艺中最古老的遗迹中的那些同类物品。

上古时代以青铜铸造的仅有物品是兵器、祭祀明器、车辆和盔甲。商代末年的铸铜器皿具有一种复杂而精致的装饰，其风格和图案都相对稳定和数目有限，在象牙、玉石和木制物品上表现出来的情况也相同。它由典型的单线条勾勒图案和动物形状组成，非常对称地排列在一个中心轴的两端。这种在新石器时代完全绝迹的动物艺术突然出现，并似乎形成了东北亚青铜器时代的特征。人们直到南西伯利亚和特别是在卡拉苏克（鄂比河和叶尼塞河上游）文化中都发现了这一切，它似乎与商末和周初的中国青铜器有着联系。对商朝青铜器的分析揭示了根据各种不同物品所需合金的种类而具有铜和锡的一种变化不定的比例。它们含有5%~30%的锡和2%~3%的铅。其中最漂亮的器皿当然是祭器，存在种类繁多的形状，各自相当于某些特定的祭祀习惯。这些器皿在商代尚只有一些很简短的铭文或者具有无疑是表示了家族爵位的价值。这类标记内容也出现在兵器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者是戈，戈是人们仅仅在东亚才可以发现的、用于钩住敌人并最先打击敌人的一种斧一刀。

轻盈而坚固并带有多辐大轮的战车已经属于在下一个时代所

使用的那种类型了,但似乎传播得不太广泛。它酷似在青铜时代的亚洲西部所出现的那种战车(我们顺便提一下,战车和为拉车而驯马的做法,在公元前 17 世纪左右就已经出现在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了)。它是一种带方厢曲辕的车,由两匹套在索套上的双马拉车,这是在马胸带和牲口脖套发明之前于世界上广泛使用的唯一一种套牲口的办法。此乃供国王和上层贵族专用的作战和阅兵工具。《诗经》中的古代诗歌于公元前 9~公元前 6 世纪描述了阅兵车及车上所套马匹的美丽。

战车和用于战争的某些兵器(特别是一张显得似乎强有力的组合式弯弓)也被用于狩猎以及金石文献中经常提到的国王銮驾仪仗的出行。当时的大猎物(各种鹿科动物、野牛、熊、虎和野猪)非常丰富。

考古和钟鼎文资料至少可以使人形成一种有关商代社会类型的基本看法。与晚期史料的比较同时揭示了一种基本的吻合、大量的类似性(周代社会似乎完全是派生自商代社会的)和许多新奇特征。⁴⁹

带郭的城池、战车、兵器和青铜器是一个高贵阶级的典型物品,而该阶级则可以通过参加祭祀和战争而被确定。考古发掘和金石钟鼎文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最多的资料,因为人们只能隐约窥视到一个农民阶级的存在,其耕作方式和农具(石刀和弯把木铲)似乎与新石器时代的这一切没有多大区别。王宫是国王个人至高无上地统治一个贵族社会的所有活动的中心。此外,在宗教、战争、政治、行政和经济职能之间有一种密切的结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真正的无分别。王统世系是一种图腾氏族组织的首领,该世家之族长于其中同时是家庭崇拜的首领。当时已经存在着一些地方政权,它们颇似稍后时代所出现的那种封地采邑。这些权力相当于“侯”与“伯”的封号,由王族成员行使,但有时也由一个名称不同的世家所行使。商朝的辖地扩大到了整个中原并在长江流域的某些

地方越出了这一范围。商王朝地域之外和被认为是“蛮夷”的民族与青铜器时代的人共同生活在这一领域,而且他们与商民族更多地则是处于一种敌对状态。这些民族在江苏北方和淮河流域为数特别多。

殷商文明正是以宗教修持及其突出的地位而与此后时代的文明有着最明显的区别。人们应该强调指出:以火进行的一种占卜的地位在此后的时代中仅仅起一种次要作用了,对已辞世国王的崇拜的优先性、祭祀的豪华特征,以及以活人作祭祀的做法即将在周代趋向于消失。

占卜和祭祀

为了占卜目的而火烧祭祀用过的牲畜的骨头之习惯是西域的特殊做法,该地区相反却不懂得在欧亚大陆西部相当习以为常的以查验祭祀动物内脏来从事占卜的做法。这种习惯从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在青铜器时代臻于完善并且得到了很大发展,它变成了王家活动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并产生了一种做为专家集团特有领域的真正占卜术。用于占卜的甲骨在当时是极其精心地加工处理的,包括有椭圆的洞形和分层次的环形痕迹,它们可以使人在火的作用下获得呈T形(也就是指这类相当古老的占卜的“卜”字)的裂痕。大约到了安阳时代之末,使用龟背甲的做法才得到普及。自20世纪初叶以来,带有卜辞的近10万块龟甲骨已先后被发现。除了数目很小的一部分之外,它们全都出自商一般的最后一个京都的遗址。在这一数目之中,近50000片甲骨文已被刊布并作了研究。最早9件刻有卜辞的甲骨是在药店中发现的,它们在那里被以“龙骨”之名而出售。它引起了题铭学家王懿荣(1845~1919年)的注意并被其友刘鹗(1857~1909年)考证为商代文献。自从这个时代以来,大批中国学者们都专心致力于研究这些卜辞(或者叫作“甲骨文”),同时也由于由中央研究院于1927~1937年从事的发

掘活动以及自 1950 年以来所获得的发现物而使人对商代的认识发生了飞跃发展。这样一来,商王朝最后阶段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形态的那些直至最具体的细节都得以澄清了,虽然尚有许多难以断定的地方,但收获却是相当大的。

经过火烧和在某种意义上用作已获符号之诠释的卜辞,其目的是形成可以发展占卜术的档案。这些档案形成了中国最古老史书的最古老形式,它们最早就赋予了这些档案的主要特征:它与政治活动的密切联系及前人科学的外貌。占卜确实涉及到了与国王职责有关的一切活动:祭祀先祖和神灵、军事征战、任命官职、宣召入宫、建筑城市、农村与气象(雨、旱和风)、疾病、旅行、感梦、生子、未来一旬或未来一夜的吉凶征兆。

对这些卜辞的研究提供了汉文方块字的最古老形式并且揭示了中国文字符号传统的奇特持续性:今天使用的文字要通过一种持续不断的发展而一直上溯到公元前 14~公元前 11 世纪时的甲骨文。这种上古文字已经很复杂并且具有了近 5000 个不同的字,其中有 1500 个已经被以可靠的方式释读出来了,它具有可以使此后得以发展的大部分组成原则:除了简单的符号(文,对物品或物品组成部分的通用标志或具有很粗略线条的图案)之外,当时就已经有联合使用的符号(字)与之并列存在了。但正如在中东最古老的文字中一样,有时会出现某些文字符号被用于与其独立本义无关的语音作用。

负责王家占卜的卜师和司书录事集团(在安阳时代就有过不少革新派和传统派学者)同时也负责数字和历法问题。人们在甲骨卜辞中就已经发现了两种计数形式,它们一直行用在中国社会的整部历史中。一种是持续的十进位计数法,它至少是以一~一〇的 10 个简单符号与一个指百和一个指万的数字来持续记录;此外还有两组更为复杂的符号,其一是十进位(天干),其二是十二进位(地支),它们的结合应用于形成一个六十甲子纪年周期的双重符

号。这些符号仅仅用于记录日子，六十甲子仅仅从公元前 2 世纪起才被用于指年代。10 年和 10 年的结合在商代是划分时间的基础，人们发现国王的名字始终都包括用于指 10 年的符号之一。它似乎是相当于应为他们举行祭祀的日子。

当时存在着在不同时间或以稍微不太正规的方法来从事的大量祭祀仪轨。其中最重要者都与对已故国王（有时王后也与这种仪轨有联系）的祭祀有关。卜辞或甲骨文可以使人编定商代列王的完整名表，其时间甚至可以上溯到该王朝创立之前。王位由长兄传幼弟，当兄弟辈世系绝灭时，又由舅传甥。这样一来，虽然商代国王名表共包括 30 名君主，世系的数目却只有 18 代。此外，这幅名表除了某些具体情节之外，都与晚期传说所保留下来和人们在司马迁于公元前 1 世纪修成的《史记》中发现的名表相吻合。

当时用于祭祀的牛、羊和猪的屠杀数量很大。屠宰 30~40 头牛为同一位先祖作祭祀的现象并不罕见。某些汉文方块字用于指 100 头牛或 100 只猪的祭祀，或者是指以成 10 头的不同动物所作的祭祀。祭祀物在晚期已不再如此丰富，这可以促使人想到牧业在这种古老社会的经济中所占据的相对重要地位。祭祀可以利用大宴会的机会而确保对财富的一次再分配。它也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破坏，特别是当为国王举行葬礼时更为如此。

商代中国最动人的形象是由 1927~1936 年间在安阳发掘的大型王陵向我们提供的。王陵呈大十字架状，包括一个南北向的长方形墓穴，带有一个较小和较深的中心坑。两行（有时是四行）15~20 米长的进口墓道一直通向主墓穴。木制王棺陈殓在中心墓穴之上，而在墓穴中宰杀了一只狗以作祭祀。在进口墓道和围绕该墓道的平台之上，已经发掘了全副武装的人员之遗骸（这些人无疑是国王的侍从和仆役）、马车及其马匹和车夫、陶器、青铜器和其他珍贵物品。殡葬仪轨活动把国王个人与其被祭祀的最亲近的仆从联系起来，而且还要求国王以及最珍贵的宝物被其身份的标志（其葬

和主要是其马匹)所簇拥,这种做法也出现在青铜时代的多种其他文明之中。

卜辞也提到了其他宗教仪轨。一种叫作“帝”或“上帝”(该名词于很久的晚期又被用于指最早时代的神话君主们,并被第一位皇帝于公元前3世纪末用来创造一个新名词“皇帝”)的大规模祭祀似乎产生了一尊最高神的思想,这种神是政治秩序(保护城市和军队)和自然秩序(雨、风、旱)的保障。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太重要的神:东王母、西王母、四方之主、流经南阳附近的黄河之源、某些神山……各种萨满(尸,该词也具有“尸体”的词义,系指周代殡葬仪轨中的死者之代表)和巫士(巫)似乎介入了某些宗教崇拜仪轨。52

用活人作祭祀的做法似乎是商代文明的特征之一,其中的某些祭祀似乎与建筑物的开工仪轨有关,其他的祭祀则显得与殡葬仪轨有关,或者属于为纪念已故国王而举行的祭祀活动的组成部分。唯有要求国王最亲近的谋士和嫔妃们在死后陪葬的做法断断续续地残存下来了。在第一个千年纪,这些活人祭祀者也越来越多地被模拟人像或画像所取代。

第二章 诸侯国时代

53

一、上古王权的衰落

根据一种没有理由提出质疑的传说,正是建立在陕西的一个名叫周的城邦消灭了商一般王朝。这一事件似乎可以被断代为公元前1050年或公元前1025年左右。该城邦国家位于商朝领土之外,与那些西部地区的胡族居民保持着接触和联系,它似乎善于利用适宜养马的有利条件,泾河上游和甘肃西北地区在过去几个时代都是建种马场的宝地。周人的风俗习惯无疑比殷人更为黠兵尚武,他们似乎更为广泛地使用了车辆并发明了由四匹马并列拉套

的新型车。

周王朝的最初几个世纪

54 诸如由传说介绍的那种周承殷业的历史值得于此简单地提一下,这是由于周王朝的缔造者们对鲁国的文人派别(也就是所谓的“儒教”传统)具有的威望。

周王朝的人马在晚期历史上在一位以文王之名而为人所熟悉的人的统率下向河南进军,当时的殷朝末帝正忙于与淮河的“淮夷人”作战。在周军胜利挺进期间,文王死于一次战斗中,武王继而登位。殷军在黄河北岸的牧野战斗中最终被战败,殷朝末帝纣辛被斩首。文王和武王被原殷民和曾遭受过纣辛暴政的胡民尊崇为解放者。武王获胜之后将城邦的治理权委托给了武庚(此人是已被斩首的暴君之子),他返回陕西后便很快就晏驾了。在武王的继承人成王(与淮夷结盟的武庚曾利用他而举行反周复殷的暴动)统治期间爆发了动乱。青年成王之叔周公组织了防卫和反击战。殷王朝被推翻,淮夷归附了他们。周王朝从此之后便有两京,即今陕西西安附近的宗周和今河南洛阳附近的成周。为了更好地确保对殷朝故地的统治权,周王朝敕封其世家和盟族成员统治旧城邦以及当时创设的新城邦。

人们后来可以从传统历史中得到的内容涉及到了在成王的两任继承者统治时期已被同化的异族人起义问题、在穆王(公元前10世纪中叶或末叶?)统治时代向西北(甘肃,无疑还包括今新疆东部)开拓的努力、该国与被称为“犬戎”的西北民族和苏北民族(淮夷)的战斗。

据自1950年以来发掘出土的遗址和卜辞来看,人们似乎确信了第一个千年初曾是一个开拓的时代。周人的拓殖当时达到了今北京地区、山东的东北端和长江下游平原。

相反,公元前9世纪末和公元前8世纪无疑就相当于一个削

弱和衰败的时代,这可能应与胡族的攻击联系起来,比如,在宣王时代(公元前 827~公元前 782 年) 狁人的入侵, 狁是一个草原民族,他们当时可能就已经会骑马了;在幽王统治时代(公元前 781~公元前 771 年),爆发了犬戎的入侵。在厉王(公元前 878~公元前 828 年)统治时代,周朝王室进入了其衰退时代,人们正是从此时起才掌握了一部断代具体而准确的历史,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准确时间约为公元前 841 年。

传统纪年体系

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将周王朝分成了两部分。该王朝的国王们把主京立于渭水流域的时代,这就是被称为西周的时代,从公元前 11 世纪末到公元前 771 年;在迁都成周(位于今河南洛阳附近)到周王朝被秦国于公元前 256 年消灭之间为东周时代。但是,还存在 55 有其他的传统分类法,其中之一是以山东的鲁国编年史的存在为根据,它涉及到了公元前 722~公元前 481 年。由此而产生了借鉴自这部编年史书名的“春秋”时代之名。最后,公元前 221 年帝国统一之前的时代则以“战国”之名而著称,这是由于它那连绵不断的战争。这个时代的开始时间有时被断代为公元前 453 年晋国(延伸于山西以及河北和河南部分领土上的诸侯国)领土在事实上的分治之时,或者定为公元前 403 年由周王对这次分晋和自这次分裂产生的诸王国(韩、魏和赵)的正式承认之时。

考虑到礼仪、祭祀传统和家族等级的实质内容一直存在到公元前 5 世纪的下半叶,而它们后来却被废除了,所以中国古代史学家们便把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对立了起来。事实上,在从上古王权(其主要特征一直延存到周代初期)趋向中央集权的国家和帝国的统一之复杂发展中,从未出现过这种持续性的断裂。

二、从诸侯国到王国

我们对于周代社会的所知主要出自一部以疏证名义而对鲁国编年史进行增补的著作《左传》(系指《春秋左氏传》或《春秋左传》的各种书。——译者),它们无疑是于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时集成的。对于借助于其他成文史料和考古文献而复原公元前9~公元前7世纪时中国诸侯国的社会类型来说,这些传说似乎是相当忠于真实情况的。

公元前9~公元前7世纪的贵族社会

人们如此滥用了“封建”一词,以至于它失掉了任何意义。我们最好是放弃使用它并仅限于以特有机构来确定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特征,这种制度在中国社会的漫长历史中最为接近西方史学家们首次赋予这个形容词的意义的政治制度。此外,由于使政治组织依赖于家祭制度并把战争功能与宗教功能结合起来的密切关系,中国的社会制度是非常独特的。它出自上古王权并始终与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它是以一种封邑和家祭等级为基础的,其顶峰便是国王领地和
56 是对周朝先祖的祭祀崇拜。国王享有“天子”的尊号,被认为其职务承自“上帝”,唯有他自己才有权祭祀上帝。渭水流域的周宗^① 都是整个周代城邦集团的文化中心。已故国王的寺庙正好位于那里。

在每个城邦之中,权力均由其势力取决于其战车数量、宗教特权(对某些祭祀的权力、表演特定的舞蹈和赞歌的权力……)、其传统的古老程度及其与王室的联系、拥有的诰身或财宝(青铜器、玉器、磬和钟乐……)。为了使对已获得的权力永远不忘,自穆王即位

^① 周代的镐京应为宗周,但谢和耐先生却始终都写作 Zhou zong,即“周宗”之对音——译者。

(公元前 10 世纪中叶或末叶)以来,习惯法要求必须在用于祭祀先祖的青铜鼎上雕刻有关国王登基或封赏典礼的记录。这样一来,人们就知道了敕封一片采邑、一个庄园或一种官职都伴随着各种赏赐:服装、织物、青铜兵器、车、祭祀明器、贝币、仆人、牲畜……

领土是以一种蜂群分巢的方式开拓的。可以赐予某个尊贵家族一种在某片特定的和界限明确的领地(封地,系指采邑。这里是暗示征地,“封”标志着其界限)内的宗教与军事权力的分封制,归根结底仅仅与一种广泛的家族与分封等级内的王权异曲同工。这正是分化成“大宗”(王室家族和封王家族之宗)和“小宗”的家祭等级,它确保了整体的凝聚力。主祭司为在每个氏族内部历代始终受尊崇的一位立祖人的直系后裔,其继承人的整个世系均如此,而小宗的族长仅仅允许于其府宅中崇拜直系尊属的四代先祖(父亲、祖父、曾祖父和高祖父)。在所有的贵族家庭中,至少从商代末年起,其通例是正宫王后的长子将继承职务和祭祀特权。这样就可以解释对于立太子和立正宫的重视程度了。

“国”(该词指以城墙环绕的城邦)的组织是王室组织的再现,在被称为“公”(该尊号稍后不久将与一种王公贵族等级结合在一起了)的公国首领周围有许多“大夫”和“卿”。“卿”字最古老的含义揭示了其职务同时具有侍从和宗教的特征,这就是指大型斋供的司祭人。其族长为卿和大夫的豪门望族在“公”的身旁承任事实上变成世袭的职务。作为报酬,他们要与其职务同时而于其带郭之城(鄙)外的领土上获得邑(或采邑)。大夫和卿有权指挥那些出自小宗的士,后者的主要职能是于其车队中效力。农民们提供“徒”并耕种其收获专供贵族享用的土地。

除了他们于其公和自己家祭时任大司祭的职务以外,卿和大夫也如同国公和王宫中的高级官吏一样具有应其上司之召而参加战斗和提供战车与士兵部队的义务。因此,军队组织仅仅是政治和家族组织的摹拟。 57

人们洞察到了这个以家祭等级和对先祖特权的维护为基础的社会是怎样出自一种王权于其中似乎是至高无上的更为古老的环境。所以,在商代,对已故国王的崇拜及其世家之威望居高临下地激励和主宰了全部社会与政治组织时,已经建立起来的更复杂和稳定得多的制度导致了王权仅仅扮演一种仲裁人的角色。由国王赐封的职务和特权在原则上是可以撤销的,但诸侯国的发展和高级官吏家族势力的加强都趋向于使之变成世袭性的,从而使一种原来肯定是比较灵活和完全依附王权的社会等级变得僵化了。此外,这种发展在公元前 8 世纪上半叶由于陕西居民的攻击和国王采邑的缩小而加快了速度。除了在迁都时作为周王的主要盟友而又很快失去其优势的郑国之外,其他的强大诸侯国也都在中原形成了:宋、魏、鲁、曹、陈、蔡……公元前 8 世纪时的数目很大的一批小城邦共可数到一打之多。此外,自周王朝创立以来,王族世系体制变得更复杂了,因为除了与周“同姓”并与其世家相联系的家族之外,还出现了其他“异姓”世家,其先祖曾是最早国王的旧盟友。商朝自己的世系也未曾中断过,它继续存在于河南西部的宋国,安阳王权的古老传统在那里保持下来了。

在这一批如同群星般的和弱强不等的古国中,再不是国王的宗教和战争统治权占优势了,即使还存在尊重他们的仲裁权和依靠他们的思想权威的习惯也罢,仪轨行为和前人的学问是一种新秩序的基础。正是这一切支配着那些互相结盟和对立的城邦之间的关系,它们由于战争、仇杀、联姻、盟约、财产和服役之交换而分裂与联合。随着诸侯国的发展和王权的衰落,一个新的社会和新风俗都出现了,那正是一个嫉妒其特权并注意礼仪问题的贵族、一种贵族军人的理想、一种荣誉和权威的伦理。

在确保社会团结统一的祭祀和礼仪等级制度与王室世系高出一切的特征相联系的范畴内,这样一种社会明显表现为过渡性的。王权的衰落,进一步加强了地域性差别的地理分布、公国那扩大和

形成大政治团体的倾向都可能逐渐地改变在城邦之间建立起来的平衡并使贵族诸侯国社会进入趋向崩溃的道路。

贵族制度的衰亡

58

在整个春秋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中原的旧城邦(其王统世系要上溯到周王朝的创建)“中国”(该词后来被用来指整个中国)和开始形成疆圉更广与势力更大的政治团体的周边城邦之间的一种全面对立已经出现,领土的分裂在老地区始终都比在新地区更为明显尖锐。这些正在形成中的大诸侯国是:山西汾河流域的晋国,这是一片适宜养马的山地,那里的政治组织是军事组织的延续;山东西北的齐国,它是一个由于盐、鱼、丝绸和金属交易而致富的沿海诸侯国;长江中游地区和湖北谷地的楚国,其国王如同周王朝的君主们一样享有“王”的尊号,统治了由土著部族居住的辽阔疆土。这后一个具有半蒙昧文化和其语言属于与汉语不同的另外一个语族的王国从公元前 704 年起一直发展到了河南的南方。

外部的形势可能会加强这些诸侯国的势力和权威。定居在中国北方的居民在公元前 8 世纪的入侵就已经非常具有威胁性了,这种入侵在公元前 7 世纪下半叶进一步加剧,从而导致齐国和晋国的王公们充当了部落联盟首领和汉族地区保护人的角色。非汉语部族的这些攻击很可能是由草原地区最早的游牧民集团开始对他们施加压力而促成的,草原游牧民无疑当时就已经懂得驯马术以便能乘骑马匹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促进了称霸活动的高涨。齐国的称霸在由桓公(公元前 685~公元前 643 年)于公元前 651 年主持的会“盟”而得以确认,晋国的称霸是由文公(公元前 636~公元前 628 年)于公元前 632 年组成联盟的时候形成的。

但在公元前 5 世纪初叶,继楚庄王于公元前 597 年击败晋军之后,霸权的性质和意义发生了变化。从这一时代起,最强大的诸侯国把它们的意志强加给了最弱者,在威胁之下举行的会盟仪式

变成了调节某种力量对比形势的手段。

随着地域性大集团的发展,王国之间的斗争倾向于具有一种新特征,那些结盟和对立的、由于国家的传统和同一文化类型联系起来的诸侯国极力以武力调节,这已不再是家族争执了,战争对峙又由一种更为深刻的对立而加强。山东的齐国、山西的晋国和陕西的秦国都各自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征和某种个性,它们将这一切的大部分原因都归咎于地理条件的差异性:山地或平原、牧业的富裕性、近海和捕捞规模、交通便利和商业活动、不同居民集团之间的关系、距离远近……中国北方的这三个诸侯国都过份接近中原城邦而无法与之非常明确地区别开来。但对于楚国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它的独特文明似乎是长江中游的“夷”民土著传统和“中国”的“汉族”传统之间的一种综合产物。此外,东南地区青铜文明的传播可能产生了另外两个不同的王国,其文化与黄河流域的中国文化的差别没有那样大。这就是一直延伸到长江下游平原与湖泊地区的吴国和浙江北海岸的越国。这些航海人和船夫的王国于公元前6世纪末的发展导致了其西邻楚国的衰落。在夫差国王统治下(公元前496~公元前473年),吴国一直向长江中游和山东以南扩张。但其宿敌——越国勾践王(公元前496~公元前465年)最终夺取了胜利并且在获取其征服成果的同时灭掉了吴国。楚国和越国在后一个时代(也就是战国时代)仍继续威胁中原小城邦的和平与独立。

在一个其基础属于宗教和祭礼范畴的社会内,军事因素所占的突出地位可能会使之变质。事实上,不仅诸侯国之间传统关系的类型受到触及,而且由于社会制度形成了一个整体,城邦内部望族之间的关系也受到触及。贵族社会危机的征兆从公元前600年左右起日益增多。人们确实发现在公元前6世纪期间出现了某些新机构,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王权及其独立性。最早形式的农业税于公元前594年和公元前590年出现在鲁国,在公元前543~公元前

538年于郑国也曾被提及。古代赋的目的就在于为国王提供一支军队,它日渐地由一种军械和粮食的分担额(税)所取代。雕刻于青铜器上的最早成文法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法律和税收恰恰在后来被鲁国学派的礼仪文人学者们视为对形成旧制度之基础的传统习惯的最早侵犯,它们成了那些成功地行使政权的望族之间互相斗争的标志。这些斗争从公元前5世纪初叶起变得激化起来了。在山东西部的鲁国,三个强大的卿之世家孟孙、叔孙和季孙夺取了诸侯国的统治权,仅仅为合法世家(其先祖是由周王朝的创始人分封的)保留了一种名义上的角色。在晋国,当时统率三国三军的六卿争夺权力,他们之间的斗争导致了公元前453年瓜分晋国的领土并形成了三个独立的政体,分别由韩、魏和赵三家统治。在齐国,王统世系的所有特权都于公元前386年最终被田氏所篡夺。

这些内讧和篡权都是战国时代诸多战争的前兆或前奏曲。它们已经预示着未来的变化:权力集中到唯一的一个人手中以及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第三章 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61

从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221年帝国统一之间的战国时代,就是这些特殊时代之一,其中相继和伴生的、互相交织在一起和彼此之间又互为加强的变化加速了历史的发展过程,激起了社会、风俗、经济和思想的一种全面变化。这种演变进程在最开始时很缓慢,到公元前6世纪时才勉强地显露出来,但随着接近公元前3世纪末而加快了变迁,以至于其差异一代比一代更为深化。

出发点肯定是贵族社会之制度及其信仰的危机,而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时上层贵族与把权力集中到诸侯国或王国首脑手中的最早措施之间的斗争揭示了这一切。如果人们能够确定帝国

一、变化的加速

统一之前最后 3 个世纪的基本倾向之特征,那么就可以说政权在设法摆脱它自己受束缚的包袱,也就是在公元前 9~公元前 7 世纪时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家族和宗教背景。随着它摆脱这一切,它越来越清楚地被设想为一种独特的实体。如果声称国王曾试图摆脱大贵族家族强加给他的控制权,那也无法解释全部现实情况。事实上,在这场传统与时代新要求之间的斗争中,正是政权本身改变了其性质。

政权形成这种特征并加强其权威的倾向不可能与一种军事扩张主义绝无关系,诸侯国为拓疆展土、增加收入财源和实现称霸而发动的战争是对中央政权反对大官僚贵族斗争的共鸣反响。内部问题和对外战争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成了这个时代变化的真正动力。所以“战国”时代确实名副其实,正是一种战争推动力把上古时代末期的中国各地都引上了中央集权国家的道路。

本处根本谈不到深入探讨占据了整个时代的战争和结盟的具体细节。其先驱者的数目是七个:“三晋”,也就是自晋国分裂出来的韩、魏和赵国;由田氏统治的古老而又富裕的齐国;其势力在不久之前才表现出来的两个王国,也就是其都城位于今北京地区和距游牧民们的草原非常近的河北燕国,富有马匹并且其风俗粗犷而又好战尚武的周初故地陕西的秦国;最后是长江和汉水中游的半汉族的楚国。这就是战国“七雄”。它们之间有时结成短暂的联盟,有时又分裂对峙,而这种联盟有时候有利于魏国,有时又有利于秦国,它们形成了这个战争激烈时代的两个主要对立国。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最古老传统的占有者——中原的诸小城邦都被它们周围的列强吞并了。

先祖的习惯表现得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与时代的需要相矛盾。如果国王(无论是合法者还是篡权者)希望维持其权力,那就必

须拥有他自己的资源、军队和执法人。所以他必须征募新的人员，而为了他们的利益又必须剥夺那些望族世家的世袭职务。

政权的变化

在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中，有一支小小的专业队伍发展起来了，其职务主要是与祭祀和战争有关，但也与掌管王府和管理庄园有关。除了由大夫和卿（主管行政的职务司徒，主管战争的大臣司马、主管公共工程的司空、主管刑罚的司寇等职）世代相袭占据的最高级职务（其具体情况从此一诸侯国到彼一诸侯国变化不定）之外，确实还存在着许多虽不显赫却又是必不可缺的职务，这就是太史、内史和具有许多下属（卜、巫、史、祝、宰等）的负责先祖事务的官员、为国王个人服务的内廷官吏：御马官、御车的仆夫、负责战车的人、主膳官……正式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出自于一个其祭祀地位和经济状态要远远低于大夫与卿之家族人的阶级。他们出自小宗家庭和偏房夫人的儿子（庶子），他们属于“士”（小绅士）集团。但这个63小贵族阶级的角色是军人、有文字记载传说的捍卫者、各种知识的专家，即将变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了。国王确实正是在该小贵族阶级中征募其最早的执政官。这正是为什么在导致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之后用于指在春秋时代战斗的贵族们的“士”字最终具有了“文人”的意义的的原因，他们善于执行主要是具有文职特征的政治职务。

在一种中央政权的新类型趋向于形成的同时，地方的权力则彻底改变了。当由国王敕封的采邑或“封”的古老习惯往往都伴以赐予宫内外的职务时，祭祀铜鼎铭文都试图强调指出其世代相袭的特征，它在中原的诸侯国中是地方权力的唯一来源，于是在秦、晋和楚国中便出现了一个新的字眼“县”。所获得的采邑无疑都被置于诸侯国王的直接权力之下并从他那里获得了一个“县”的名称。最早将该名词用作这种特殊意义的时代应断代为公元前 688

~公元前 687 年。这种创新肯定未产生后果,因为“县”在仍处于春秋时代的传统制度中很快就完全变成大夫或卿家族世袭的了。但是,它与更为古老一类的采邑——县的原则有区别,亦即其获得领土之特征在稍后不久又提供了一种彻底改变地方政权的手段。当诸侯依靠小贵族阶级的支持而摆脱了大家族的控制时,新获得的领土都避免了上层贵族的传统兼并,一直被维持在中央政权的直接归属之下。“县”于是便变成了一种新型领土统治权(由中央政权的代表控制的行政管理区)的模式,而且在国王强大到足以打倒卿和大夫古老家族的那一天,这种模式便可以扩大到整个王国的领土上。这就是秦国在孝公(公元前 361~公元前 338 年)统治年间商鞅变法时所发生的情况。就在此时建立了一种行政制度,也就是后来秦汉帝国的制度:领土等级与官吏等级相吻合,县都被归并成了更大的地域范围并获名为“郡”,县和郡各自有一个首府和它们的行政长官(在县中是县令,在郡中是太守)。

64 因此,这就是发展的方向,它通向了一种以一支官吏队伍的存在(这些官吏是经选拔的、领取俸禄和可以被罢黜,受中央政权的节制,而他们的权力被视为中央政权的一种延伸)和把领土分成了许多行政区的做法为特征。但是,仅仅是在魏文侯(公元前 445~公元前 395 年)和秦惠文王(公元前 337~公元前 325 年)统治时代才出现了一种“相”的新职务,随着这种职务又出现了以系统的方式区别文武官职的习惯。只是到了公元前 4 世纪期间,才建立了由官吏们管辖的首批行政区。为最终达到由中央集权国家的开国而导致的彻底变化,则必须在豪族之间的斗争以及在中央政权为摆脱传统控制而作出努力的高潮期间出现的政治发展之中,再补充也曾为新型国家的形成作出过贡献的其他因素的伴生性活动。

战争的变化

在上古时代和春秋时期,战争是一种高贵的行为。拥有战车、

战马和青铜兵器仅为参加战斗的少数人的专利权，这是贵族血统人员以英勇行为在旷野中对峙的较量。由农民组成的一批小人物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扮演一种次要的角色。但是，礼与传统等级的衰落在使斗争更具有尖锐激烈性的同时，也在公元前4~公元前5世纪时开始改变战争的特点。现在已不再是以表现出勇敢和在情况允许下表现出慷慨精神了，而是要以取胜和征服领土而出人头地。战车的数量在春秋时代末期增加了，过去仅限于某些对峙的战斗延长了时间，而且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时人们发现又发展起了包围战。战争的领导权趋向于变得不再是贵族们的事务（他们中的兵器业变成了与举行祭祀并列存在的一种传统了），而是战术和战略专家们的事务。对于效率本身的追求成了战争变化的起因，其发展同时表现在军队的组成和对于囤积粮草的重新重视程度方面。从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起，步兵的发展逐渐地缩小了兵车的作用，最终引起了与驾御马车相联系的贵族生活方式的破灭。某些革新促进了战斗形式的这番变化，它们可能是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向草原借鉴的刀剑以及弓弩和骑兵部队的出现。用脚拉开的弓弩要比上古时代和游牧民族那对弧形的反曲弓更有力和更准确，它可能成了在中国社会中最常使用的兵器之一，而且在直到宋代（10~13世纪）之前都以不同形式作了改进。它传播的时代可以被断代为5世纪下半叶（据杨宽的考证），但这也可能稍微晚了一些。至于比战车更为灵活和速度更快的骑兵，则于公元前4世纪出现在北方的王国中，在那里与草原骑兵们的戎装（衣裤）同时是由于模仿游牧民族才被采纳的。

自公元前6世纪之后，陆军部队得以发展，如在晋国，于山区反击山西诸部族的战斗；在吴国（很可能还有越国），那里有着湖泊和大量的河流，其地形很不适宜使用兵车。由此一直发展到公元前3世纪的步兵大部队。这种发展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甚至可以说中央集权国家的开国与战争技术的这种发展具有密切的

联系。那些贪婪地进行征服和争夺霸权的诸侯国国王们，对于古代之“徒”（步兵，春秋时代贵族战争中的一种仆役）特别重视，并最终在战斗中赋予他们一种直到那时始终遭到拒绝的地位和职位头衔。中央集权国家的形式与农民阶级晋升为一种独立耕农和士兵的身份是同时发生的，占有土地的权力和在战场上获得荣誉的权力是同时存在的。

但从公元前 6～公元前 5 世纪起，冲突的持续时间与激烈程度、鼓动公元前 4～公元前 3 世纪的诸侯及谋士们的“现实主义”思想等，也是重新关注经济问题做法的起源，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把经济意识作为特殊现实之起源，因为胜利属于拥有更多的人员、更多的各种资源和粮食储备的人。

与政权和战争有关的变化都具有一种经济和社会的背景，我们最好强调指出其全部意义。

经济发展高潮与技术革新

公元前 4～公元前 3 世纪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经济飞速发展和技术革新的时代。此时，渭河流域、中原和四川成都盆地由于受到诸侯们鼓励的大规模开荒垦殖而变成了持久耕作区，一种高技术的农艺（使用肥料、不同类型土壤的区别、对于耕种和播种时间的注意、排水……）也于此时发展起来了。对使沼泽地变干涸和在盐碱地排水形成了这种坚决发展农业政策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当时的大型灌溉设施力求达到能够为土地开发和在干旱时期引水的目的。其中最著名的灌溉工程在邺地（位于邯郸附近，地处今河北的东南）、四川成都地区和陕西渭河流域。作为这些大规模水利工程倡导人的水利专家们也是名垂青史者，如魏国的西门豹和史起，秦国的李冰父子与郑国。

在公元前 4～公元前 3 世纪时，开始出现了中国社会中的第一个人口发展高潮。如果说人们从来无法估计春秋时代的人口密

度,那末一切都表明当时的人口尚很稀疏。即使是在汉族城邦最为稠密的地区,如黄河流域和中原,农业技术也只允许有很小的人口密度。相反,公元前3世纪的文献(特别是《韩非子》)都强调了人口密度的一次迅速发展,它一直持续到前汉(西汉)。这就解释了由人们所知道的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所提供的数字——在公元2年为51671400人,也就是说比在同一时代前后对整个罗马帝国所作出的估计数字稍多一些。⁶⁶

垦殖和开发新土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央政权对于人员的直接控制,定居在新土地上的农民不再如同在旧采邑中那样依附上层贵族了。垦荒可以使人扩大其行政管理区。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由于技术的发展而得以促进。那些近代史学家们,特别是中国人杨宽和日本人增渊都强调指出了铁制农具的传播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当时的铁制农具取代了木器和石器雏形,从而可以使人将土地耕得更深,也方便了垦荒和大规模的工程。这些农具并非是锻造而是铸造的。事实上,中国社会由于其冶炼术经验而似乎能够直接成功地铸铁,并不像欧洲国家那样经过了冶炼的漫长过渡阶段。首次对于一件铸铁器的记载被断代于公元前513年;它意味着当时的铸铁术已经被掌握并被经常使用。⁶⁷

考古资料都比较晚了,仅仅从公元前400年左右起才出现,这是一个铸铁已成为一种真正工业的时代。可以被断代为战国时代的铸铁器的遗物(斧、铲、刀、剑……)已在自1950年以来发掘的遗址中大量出土。但是,特别是在北京附近的燕国古都的遗址上,也得以发掘到曾用于铸造铁器的模子。比青铜器更易碎和不太锋利的铸铁却有比青铜器更能大量生产的特大优点,尤其是在诸如山西和陕西那样的富矿区更为如此。此外,我们觉得似乎是由于将铸造与锻打结合了起来,铁制兵刃从战国时代就开始与一种其用途始终都更为普遍的青铜兵器相竞争了。

大家可能会对中国在钢铁冶炼领域中的这种“先进性”感到惊奇：中国人从公元前 2 世纪就会生产钢了，而欧洲则必须等到中世纪末叶才会参与铸铁的最早试验，必须等待更长的时间才可以生产钢。但这种时代上的差异所揭示的不只是一种先进与落后的差别，而是不同文明中工艺传统的新奇特征。它可以非常清楚地通过在中国社会中铸造青铜器时所获得的经验（那里由于铜和锡的短缺而首次使用了钢）和通过在战国时的鼓风设备的改进来解释。但似乎仅仅是到了较晚期的汉代，才出现了双效的活塞鼓风机（风箱），它由于一种阀门体系而可以使人获得一股持续不断的风力冲劲，由此又产生了一种高温。这类鼓风设备从 16 或 17 世纪就引起了欧洲人的注意，在中国一直存在到当代。

铸铁的后果是使中国社会很早就习惯了这种模具和用同一工具进行系列翻制的生产方式，而它从近代工业发展以来才变得为我们真正熟悉起来。当在上古时代每件青铜器普遍都形成一单件时，铸铁使用的模具却被用于批量生产，它们往往是为一次操作而生产多件同种物品而被设计出来的。

68 其他的技术进步涉及到了运输工具，如被套在绞棒轭上的马匹之单辕木车在战车时代就让位于双辕车。此外，在世界的其他部分于非常漫长的时代中都始终是唯一的套车方式的绞棒轭似乎被马胸绊和胸套所取代。这种新的装备用具以及后来在公元 5~9 世纪之间才出现的套车轭圈形成了畜力车牵引方式中的一大进步，在使马匹解脱了遏制它们的车轭之压力时，它们变得更容易驾御和可以拉更重的负荷物了。那时仅仅用一匹马就足以拉过去需要两匹、有时甚至是四匹马才能拉动的载物。一种非常著名的观点是认为在中国战国时代的社会中出现的铸铁和合理套车术这二者都是在中世纪末才出现于欧洲的。我们尚无法绝对地证明这两种情况，但它们的传播却是很可能的。

也是在公元前 4~公元前 3 世纪，在中国就广泛流传着这样

一种习惯——使车轮的辐条与车轮(锥形轮辐)平面相比稍微倾斜一些,从而可以增加对侧向撞击的抗力。

如果说战国时代是一个历史上最富于技术革新的时代,那么这肯定是由于越来越激烈的战争带来的需要。为了确保他们各自的独立和增加其诸侯国的军事势力,诸王们并不是仅仅关心发展农业生产。他们都在如饥似渴地追求新的财源,这就是位于耕田之外的地面,此外还有沼泽区以及直到那时始终向前来寻求木材和在那里捕捞或狩猎的农民开放的荆棘丛林和森林,它们由于其矿产品和动植物产品而已开始被诸侯们夺占和开发。对于商品和市场中的店铺制订了税收。但处于蓬勃发展高潮中的商业和手工业活动导致了一个新商业阶级的出现。如果说经商贸易在春秋时代仅限于诸如珍珠玉器那样的奢侈豪华商品和仅仅是那些与王宫维持着特殊关系的商贾们的事务,那末大规模的贸易却在此后的一个时代发展起来了,它涉及到了巨额消费品(织物、粮食和盐巴)、⁶⁹ 金属、木材、皮革和毛皮。最大的富豪商贾们把手工业大企业(特别是矿业和炼铁业)与这些买卖交易联系起来,增加了其从业人员和商务代理人的数目、并拥有了真正的江河船队和车队。这些新活动摆脱了宫廷经济的传统范畴以及受宫中贵族控制的职业队伍,如陶瓷匠、车匠、弓弩制造商、皮革匠、篾匠、雕刻匠……但是,大商业的承包商形成了最经常以其纳税和业务而参与富国活动的一个社会集团。他们是诸侯国王们的盟友,有时甚至是谋士,他们似乎曾对于上古时代末期的政治思想发展施加过很大的影响。

诸侯国的都城也不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中心了。它们都倾向于变成商业和手工业大中心,最新的考古发掘揭示了其城郭在战国时代末期的扩大。在这些繁荣的城邦中,人们可以举出山东西北部齐国之临淄(它是当时最大和最富裕的居民点之一)、河北东南⁷³ 赵国的邯郸、魏国的温、楚国的郢、周之洛邑、韩之荥阳的例证。这样一来,公元前3世纪战争的目的往往就是征服其大经济中心。

商业贸易和私人手工业的发展解释了上述城市的扩大以及金属钱币(其最古老的样币要上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发行流通。考古发掘证明,这些具有四个不同种类的钱币流通于那些界限非常明确的并且无疑就相当于大经济单位的地理范畴。这四类钱币是:布,其形状模仿了铁铲的外貌,行用于韩、魏和赵这三个自晋分出的诸侯国;刀,呈刀状,流通于东北地区,如齐、燕和赵国;蚁鼻,呈贝币状,这种古老“钱币”聚装饰、元宝和吉祥物的多种功能于一身,流通于楚国的湖北和湖南;圆形和中心带圆孔的环钱,发行于西北的周、秦和赵国。在齐国,正是国家自己从事铸币,但呈铲形(布)和刀形(刀)的钱币似乎往往都带有它们被发行的城市名称,这要归功于富裕商贾们的积极活动。

74 经济发展高潮仅仅限于在汉族地区产生影响,与毗邻民族的经济关系是在帝国形成之前的最后两个世纪期间才得以加强的。其京都位于今北京地区的燕国与满洲和高丽北方的部族通商;赵国和秦国则与草原游牧民通商,秦国的丝绸似乎是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时传到了北印度,由此而产生了用于指丝绸产地的Cina(秦)之印度文名称。在中国南方,楚国似乎于同一时代发展了它与热带地区土著居民的关系。在顷襄王执政年间(公元前298~公元前263年),组织了对四川(巴蜀之地)、贵州(黔中)和今云南昆明地区(滇池)的一次军事远征,传说中认为楚国的士兵在那里定居并与当地的女子们婚配。周边大诸侯国的这种贸易扩张促进了汉族在边陲地区(南满、蒙古,今中国的南部和西南部省份)的拓殖,从而为秦汉帝国的大规模军事扩张开辟了道路。

社会的动荡

经济发展和革新的时期,即中国各地统一(公元前221年)之前的两个世纪,也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

古代的贵族社会无法抵御正在寻求独揽所有大权的国家新首

脑对它的打击,也不能抵抗经济变化那更深刻和更强大的影响。其家世自上古时代以来一直延续的豪门望族都崩溃了,它们被排斥到政权之外并最终遭到摧毁。过去在岁月发展中被特别小心谨慎地保存下来的对他们的崇拜则随着其采邑和城邦的消失(被并入到诸侯国的领土中了)而消失了。上层贵族阶级的衰落与中央政权同时得到的加强却把大批寻求职位的士引向了诸侯宫廷。这些人具有各种艺术修养并怀着应召为国王效力的希望而炫耀其才华,他们包围了国王最亲近的朝臣谋士们。这样一来,在王国周围和大臣们身旁就形成了一些门客集团(宾客、舍人),他们成了权威和势力之源。大史学家司马迁于其《史记》(公元前1世纪的著作)为这些谋士中的四君子保留了传记,他们都因善于以其慷慨行为和荣誉感而吸引了数千名门客: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时,正是在这些社会阶层中发展起了政治和伦理反省、韬略科学、辩论艺术……这种时局有利于教派和学派的出现,其专心关注之点始终都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不可分割。

大贵族和小贵族阶级并非是唯一受到触动者。古代史籍仅仅提供了一些稍纵即逝的光束(在管家监督下的集体劳动方式、重大宗教节日中的集体婚礼、受季节周期支配的宗教生活)的农村那个含糊不清的社会经受了深刻变迁,从而促进了其地位的变化(参加战斗和有权获得土地)。

导致富裕承包商和大地主这样一个小阶级出现的经济发展不会一视同仁地有利于所有人,相反却加重了不平等性。贫穷农民负债累累,最终被从他们的土地中驱逐出去了。这样一来,由于债务而出现的佃农、长工和奴婢(因违犯刑法而沦为奴婢者是中国社会中出现过的唯一奴隶制形式)的数目增加了,无地的农民被雇佣于正在发展中的工业(矿山、炼铁厂、盐场、手工业作坊),或定居在诸侯们竭力开发的新土地上。所有这些变化使未经分裂过的农民大

家族突然破裂，并导致了古代村社的解体。当时的条件都有利于奠定中央集权国家之基础的大改革。

二、国家的革命

“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

——由秦始皇所立石刻

产生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变法运动仅仅代表着战国时代的潮流之一，因而不可能孤立于这个时代的各种倾向的整体之外，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丰富的时代之一。但是，稍后被称为“法家”的改革派的功劳是设计出了新国家的基本制度，因而也设计出了帝国本身的体制。因为，首先在秦国以最系统的方式实施的变法，后来在这个西北地区的诸侯国于公元前 230～公元前 221 年间的开拓期间被运用到整个中国的所有地区。

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

78 如果与法家派人士相联系的现实和积极的潮流变得越来越清楚其目的、手段和哲学蕴涵了，如果它最终导致出现了公元前 3 世纪时的最大思想家韩非（公元前 280？～公元前 234 年），那末它于其原则上却符合下述两种实际关注之点，它们主宰着帝国形成之前两个世纪的全部政治生活，这就是“富国”（赋予国王强盛的物质手段）和“强兵”（以兵力确保国王的一种霸权或一种世界性的宗主权）。秦国似乎比其他任何一个诸侯国都更具有实行彻底变法的有利条件，而这些变法可以使它成为一个强大的和与中国社会中直到那时为止曾经有过的所有国家都具有深刻差异的国家类型。秦国孤立地生活在渭水盆地并受到了不受外部攻击的良好保护。秦本来是一个穷乡僻壤之国，相对比较落后，它在那里很容易通过垦殖而扩大其管辖区，其贵族的势力也似乎并不太强大。一些支持一

种现实和专制政治的谋臣们在那里自贵族商鞅(公元前 390~公元前 338 年)直到富商吕不韦(秦代最后一位国王亦即帝国缔造者的大臣)而代代相传。

公孙鞅是商氏的公子,更以商鞅之名而为人所知,他与河南的小城邦卫国(这是与出自三家分晋的那个大诸侯国魏国不同的另外一个国家)的贵族家庭具有亲缘关系,是秦国最早大变法的巨匠。他最早为大梁(今开封)魏惠王的谋士,可能是于公元前 361 年到达秦国。由商鞅鼓动的第一批变法措施可能是于公元前 359 年颁布的。其目的在于建立 5~10 户的负有集体责任的准军事性的集团(连坐法)、不再把未分开的家庭而是将已被缩小的家庭作为税收制度的基础,为军功创建爵位等级(这些等级预示着秦汉帝国的二十一等爵)、鼓励垦荒和农业生产、把在战争中未立战功的贵族家庭成员贬到平民百姓的地位以及赏赐新的爵位等级占有者们土地、奴婢(懒散的无所事事者都被沦为奴婢地位)和衣服。新的一批改革措施可能是于公元前 350 年付诸实施的,即在迁都咸都(今西安的西北,位于渭河左岸)之后。他们颁布了废除不分家的大家族制、建立县、重新划分领土和统一度量衡的法律。

当秦国于公元前 340 年战胜卫国之后,公孙鞅获得了商地以作为其效力的犒赏。但这位变法改革家激起了旧贵族的仇恨,在他充任其谋臣的那位国王死后又遭车裂。其他人可能继承了其事业。

新国家的新颖特征

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和旧社会的同时灭亡可以再恰当不过地用“革命”一词来定性。它提供了皇权的基础并继续砥砺着中国社会中最基本的政治观念。公元前 4 世纪中叶,在秦国创建的中央集权国家于东亚历史上占据着一种特殊地位,可以与希腊—拉丁社会和西方世界的城邦之建立相媲美。此外,在它们之间具有深刻差异的同时,也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相似性:在中国就如同在希腊—

79 样,贵族社会的危机导致了贵族制度的一种“民主化”。农民地位上升到士卒并摆脱旧的豪门望族的束缚,进入了一种从贵族的旧等级转向中央集权国家新范畴的等级制。在同一意义上,意味深长的是,过去指相当于我们中世纪那种附庸领主出征的义务服役(中国人的赋,也就是封地和采邑的享有者在人员和车辆方面的负担额,到了春秋时代末期变成了一种税物分担额)的名词最终也运用于由国家政权强加给每个人的人头税和其他杂税上了。

如果说中国社会中的不同发展归根结蒂是一种很新颖的发展,那是由于春秋时代的社会制度丝毫不具有与下述纯属于印—欧社会和古代希腊所特有习惯的可比因素,也就是在权力上平等的军人大会,城邦大会显得如同是对它的一种移植。

这些变法改革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把原来依附于望族家庭的农民变成了新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势力的基础。这种生产职能和战争职能的结合未曾以如此系统的方式出现在其他任何文明之中。其间虽然也有过一些断层期,但直到公元 9 世纪,它始终是中华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但这些可以充作士兵战斗的耕田人既不是专制君主的臣民(虽然该专制君主拥有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的相机行事权,也主宰着每个人的生死权),也不是具有共同决定其城邦事务权力的平等公民。人们所犯的错误是仅仅把在公元前 4 世纪形成的新政治制度视为专制主义的一种庸俗化形式。事实上,国王于其中并不行使一种名副其实的专断指挥权,而更应该是于其中代表一种维持秩序并使之更富有生命力的权力。

在战国时代显示出来和形成的法律观念与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对此名称的理解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既非诞生于习惯法,又非出自一种对冲突的仲裁行为。它同样也不是一种反映了某种共同愿望的公约之结果。这是一种客观的、公开的、高于一切并排除了任何歧意解释的法制观念,它是根据称职与不称职、功与过的显示表而对充任公职的人员作一种全面划分的手段。它同时也是一种威

力无比的手段，可以主宰所有人的活动以使之趋向最有利于国家强盛和民众和平的方向。它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秩序，不可能会与事物和众生之本性相矛盾。卒于公元前 234 年的韩非提到了对法律的检验，高度重视国王根据对所获得情报作合理化斟酌以更清楚地了解其国情。法律是使天下祥和之源，酷似所有度量之基础的律，其名也使人联想到了模式和尺度的思想（“律”在帝国时代适用于刑法）。

变法改革是一种人们可以称之为合理性思想的表现。其目的在于用统一的规章制度来取代形成古代社会（大家也会倾向于称 80 之为旧制度）特征的法律、特权和习俗的错综复杂性及其贵族世系、依附关系和地位等级。国家制度（文武百官、按照排除了任何不公正和任何徇私情而实施的赏罚制度、根据所作出的效劳而赏赐的荣誉爵衔、家族集团内部的集体责任和必须揭露犯罪行为的义务、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取代了过去的习惯、礼仪和伦理。作为新国家特征的因素是其全部功能均以客观标准为基础的。

国家革命的后果是很深刻的，而且还发展到了所有领域。中国社会当时失去的历史因素以及历史的发展变得使古代社会越来越难以理解的成份无疑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如果这场大动荡在秦国是早熟和激进的，那末中国社会中其他地区的变化则不太快和比较晚，这种落后使某些传统得以延续，尽管中央集权国家正向这个时代的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尽管秦始皇为摧毁一切可以使人联想到旧社会的东西而作出了巨大努力。在东部地区，山东齐鲁文化的古代中心似乎在大转变中成功地保留了它们的部分传统。这样就可以解释这种文化于后来的汉代在一种有别于帝国统一之前的那种背景下得以复兴的情况了。

第四章 上古时代的遗产

自上古时代遗存下来的有文字记载之文献,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可与西方的《圣经》和古典传说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这些著作或者更应该说是带有歪曲和错误而流传下来的著作,成了自公元前 2 世纪起直到当代积累起来的卷帙浩繁的诠释之对象,它们曾被作为教育的基础以及哲学、政治和伦理思考的依据。中国思想史中的一大部分正是在岁月的长河中处理这种颇为受人尊敬的遗产的各种观点和观念的历史,中国社会始终在这种遗产中从不松懈地寻求某种已失踪的智慧之遗迹。对古文献从行文和哲学观点上进行的注疏考证经常被认为是某种一成不变的正统思想的表现,但它相反却是激烈的和互相矛盾的大辩论的内容,产生了严重后果,其反响一直延长到我们当代。从全盘考虑来看,大家似乎更应该接受它那好像与我们自己基督教传统的相似性。

一、公元前 10~公元前 6 世纪的传说

经典著作

通过文字和口碑而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文献均出自周代朝廷和诸侯国宫中的司书录事与史官界。它们都被断代于公元前 9~公元前 6 世纪。这就是说本处是指具有政治、宗教和礼仪特征的文书,而且与人们于第一个千年纪初叶和诸侯国时代洞察到的社会类型相吻合。当时存在着一个贵族阶级,其主要职务是战争和祭祀,时刻不忘地肯定和确认其权力与特权的古老历史。这些文献中的最大一部分似乎均出自王宫。其中的一大部分档案文书以其语言和内容而更为接近被断代为同一时代的青铜铭文(敕封或赏赐文书、一次诉讼之后作出的判决书,但也有一些仪轨性舞蹈剧本的

片断)。这些文献被汇编成一册,叫作《书》或《尚书》,其中近乎半数的篇幅在今天已被考证为真实的。该文集的不少章节都是转引了一本有关庆祝周武王战胜殷代末帝之大捷的战争舞蹈的小书中的内容。出自其传统在宋国保存下来的一些殷朝礼仪舞蹈的类似片断也似乎曾与讲演、致词和盟辞一起被收入到《尚书》中了。

祭祀以及诸如宴会和射箭那样的礼仪性仪轨的赞歌形成了另外一部叫作《诗》的文集中的绝大部分内容。由非常正规的诗阙组成的这些诗歌是在周王宫廷中演唱的,由舞蹈和以钟磬乐为主的音乐相伴。它们的内容在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时似乎变得更为丰富多彩了。它们又由一种新的体裁所丰富,这就是《国风》歌,其灵感启发似乎出自青年男女农民在春天时的轮唱歌曲。这些情歌的形式比古代的宗教赞歌更具有灵活性和自由性,它们是由民间内容和单调歌曲组成的,把自然和村社生活的不同时期与由互相对歌者表达的感情结合起来了。

编年史与档案文书、舞蹈剧本和祭祀赞歌出于同一社会背景,它们也是以文字记载的最古老传统的新颖形式之一。它们是对似乎是在其祖庙中向国王或诸侯世家的先祖宣布的事件所作的逐日、逐月、逐季和逐年的记载,这就是人们也可以称之为礼仪性的文献。它们似乎继承了安阳时代的辞卜档案,其目的是创建一种在外交、宗教、天文和自然博物方面的先人的科学。这样一来,人们无疑就可以同时解释记述的极其枯燥乏味的文笔、刻板的公式化特征、术语和时代上的具体性问题了。在主宰撰写编年史的观念中,时间连词都与事件密切而不可分割,时间和空间显得具有了特殊功能。

最古老的编年史似乎要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司马迁以从他那个时代起就已失传的文献为基础,把公元前841年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具体确切的时间。唯一的一种文献的大部分内容都被保存下来了,这就是山东的鲁国编年史,后来根据每节开头都记

载的季节而被称为《春秋》。其中已经保存下来的部分涉及到公元前 722~公元前 481 年。某些著作中提到的晋国和楚国的编年史在公元前 1 世纪初叶都被收入到司马迁的《史记》中了。最后,公元 279 年发掘到的一座魏王墓使人得以重新发现山西这个王国的编年史。刻在竹简上的该文献的原文(由此而产生了其名《竹书纪年》)于其传播中残损严重,仅仅在 1917 年才由大学者王国维作了部分复原。

如果人们可以假设认为中国社会史中的这些最古老的形式如同是甲骨卜辞档案的延续,那么占卜本身则在周代最初几位国王时期曾以独立的方式得到了发展。在由于其受崇拜的特征而得以特别长时间地保存下来的火卜发展的同时,一种既方便又复杂的新占卜法问世了。它是以摆弄用蓍草茎(筮)制成的很轻便的签来从事的,其双数或单数可以使人组装成由六整行(单数)或断行(双数)形成的形象。这些共有 64 支的卦签(筮)反映和确定了宇宙的一切可能的结构,由于具有改变各行的可能性(阳或阴)而使之于其发展和衰落中具有一种动力。以蓍草签进行占卜的专家们(筮)继承了殷代占卜师们的传统,可能会从一种作为由相反相成的力量与功能形成整体的世界观中得出其最早内容,而且还促进了数学的早期发展。他们的感想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科学和哲学之源。

每个城邦都似乎拥有它自己的占卜传统,但唯有在周朝宫廷中使用的易书才能被保存下来。它获得了《易》的名称,人们一般均译作“变化”。在那些最古老的和用简练的、含糊不清的、具有其意义已失传的丰富专业术语的解释规则之中,又在第一个千纪期间补充了整整一大批诠释和注疏,它们证明了占卜传统的持续丰富过程。

84 这就是于其中保存了上古时代的司书录事、史官和卜士界之最古老传说的四部文集(《书》、《诗》、《春秋》和《易》)。那些似乎作为其传播之源的鲁国文人又从中加入了《礼》,提供了在生活中每

种情况下都必须遵守的详细规则；此外还有一部音乐论著(《乐》)，它在汉代已佚。这六部著作根据口碑或文字传说而被辑成不同文本，又以伪书作了修改和补充，在汉代被刊为《六经》之列。

经典传说相对较晚的特征

用一种极其简练和很难诠释的语言撰写的最古老的著作仅仅形成了古人遗产的很小一部分，其他那些更具有丰富实质内容的文献于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又补充入其中，它们的目的是为了补充和注疏这些经文。它们属于这样一个时代，即古代社会于其中已经处于衰落或其崩溃的前夕。所以，这些著作在与更为古老的传说相联系起来时却具有了新生事物的特征，人们于其中辨认出了当时的理论和伦理观念的影响。这样一来，“阴阳五行家”分类理论的影响在诠释鲁国国史(《春秋》)的《公羊传》中非常明显，《公羊传》似乎是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左右写成的，与这部编年史的另外一部注疏著作《谷梁传》是同时代的。《周礼》或《周官》的撰写基本应断代为与其他礼书(《仪礼》、《礼记》和《大戴礼记》)为同时代的作品。在记录非常古老传说的同时，它又为行政上的乌托邦保留了绰绰有余的位置。由不完整的和于上古时代末修改过的文献而形成的混合拼凑性著作《左传》的绝大部分内容是由一部有关使晋国与齐国对立斗争的半小说化的编年史组成。

因此，中国可能从其最古老的遗产中保留下来的内容主要是出自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的传说，它们是在汉代和直到公元3～4世纪时辑录并往往又经篡改歪曲过的。所以，从古典传说的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人们绝对无法回避的问题，也就是它们的诠释注疏和晚期补充的内容问题。

二、伦理和政治思想的觉醒

儒家的祖师孔夫子

那些在汉代被视为属于文人学派(儒家)的人都仰仗一位名叫孔丘的圣贤之名望。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将其名字经拉丁文化之后写作 Confucius(孔夫子)。他遗留下的著作仅限于几种其真实程度不同的传说和他的语录《论语》(其行文是在他死后由其弟子们整理出来的)的文集。人们可以严格地称为“儒教传统”者是由一大批无论于其性质还是内容方面都互相不统一的著作形成的,它们囊括了经典及其最古老的注疏书,《论语》以及公元前3世纪的著作。它们证明了这个社会和政治上都具有深刻动荡的时代之标新立异与典型的发展方向。如果说由西方人生造杜撰的“孔夫子主义”(Confucianisme, 儒教)一词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它明显远远地超出了这位大圣人本人的范畴。

人们无疑可以把孔夫子及其时代断代作为一种伦理反思的初期,而这种伦理反思却似乎是由于贵族社会的危机和礼崩乐坏而引起的,正如他于其施教中赋予上古时代著作的地位所揭示的那样。孔夫子属于司书录事和史官的传统阶层。这些阶层由于越来越多地侵犯习惯法和古代法规而激起了反感,他们可能真正被引向了既在品行中又在名词的使用中复礼的正确行为方面了。这就证明了一种古老的和往往是空想的礼仪与“正名”理论的晚期发展。我们觉得为了确定与已获得的独立地位无关的“君子”之特征而在这些阶层中作出一种努力是理所当然的事。这至少是大家可以从洞察到的基本方向。作为一个培养一些“君子”的很小学派的头面人物,孔夫子(传统上断代为公元前551~前479年)非常注重演习符合礼仪的举止,这是个人修身的原则,它可以控制其举止、行为和感情。他们的伦理是对人类的一种经常反思的成果,未曾有

过任何抽象的强制行为。它是注重实际和生气勃勃的，该圣师同时考虑到了其弟子们的各自特殊情况和各自特有的性格。所以，能够造就完人的“仁”（大家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仁爱 and 宽容思想的情绪）的品德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和人物而采取不同接触办法的目标。智慧只能通过所有时刻和终生的努力才能获得，也就是通过控制日常行为中的任何一点细微末节、遵守社会生活总则（义）、尊重其他人和尊重自己、互利的意识（恕）来获得。大师所注意的并不是一种关于人的抽象科学，而是囊括了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一种人生艺术。道德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而并不是贵族世家的固有品质。孔夫子把鼓舞其时代上层贵族的竞争思想与他认为过去曾支配了人际关系的正直、信任和融洽、谅解品质对立了起来，同时又把个人修养与公共利益等同了起来。

这样一来，从一种首先希望忠于传统的教育中出现了某些新思想。它们在另外一种历史背景下随着孟子（公元前 4 世纪中叶）和荀子（约为公元前 298～公元前 235 年）时代而得到了发展并产生了一些新意义。如果说该大师在汉代和尤其是从宋代（10～13 世纪）开始获得了一种特大的荣耀，那是因为在上述时代之后为理论和教理带来了新内容。

墨子——一个聚徒讲学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约为公元前 480～公元前 390 年）较孔夫子晚 60 余年，他显得如同是一个由“士”组成的学派之宗。该派与儒教那朴实的教派相反，应该说是在公元前 4～公元前 3 世纪时取得了巨大成功。墨子对于时代的冲突大动感情，仇恨其令人厌恶的后果越来越明显的小集团思想，所以他希望创建一个以“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为基础的新的平等社会。他抨击了利欲思想、奢侈生活、囤积财富、发展军事势力和他认为仅仅是一种抢劫形式的战争，并作为纠

正时弊之良药而提出了一种普遍“节用”的思想、一种统一的开销准则、一种严格守法的思想和尊天事鬼的思想。他认为家族私利是争执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主张实行全面的利他主义（兼爱）。他的弟子们在一种教派信仰的鼓舞下生活在贫困之中，为避免战争而居间调停并以武力保护已受到不公正攻击的城市（非常奇怪，人们正是在这些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者中得到了有关战国时代军事艺术或兵法的最确切的资料）。被归于墨子名下的著作的最大部分是由道德家们的说教组成的，其中的内容无疑正是他主张的目标：《节用》、《非攻》、《无志》、《明鬼》、《非儒》……墨子支持一种依靠士的专制政权，他希望能使所有人都接受一种伦理方面的习惯法。

87 这个奇怪的学派在帝国统一之前的两个世纪期间似乎曾培养了大批弟子，但却未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其烙印。该派最显著的贡献涉及到了讲学艺术，墨子及其弟子们都为了施教而培养了“辩乎言谈”的辩术，从而促进了思想连贯性和句子灵活性的发展。他们都希望借助于例证而阐明其施教的内容并以类推的办法发挥这些内容。

三、公元前 4 ~ 公元前 3 世纪的文化潮流

在公元前 5 世纪时开始令人感觉到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以及中央政权依靠小贵族阶级的倾向解释了门客、教派和学派激增的原因。那些追求职位的“士”想方设法地以能够确保他们得到权贵们保护的手腕而出人头地。此时正处在一个诸侯们都在伺机攫取所有可以使他们巩固政权并战胜争霸对手的良策、计谋和手段的时代。因此，这些艺术首先涉及到了管理国家，其中有一部分如外交手段、游说艺术、政府秘密行事的学识都具有“文”的特征，而诸如战术、战略、剑术等则具有“武”的特征。这也是可以使王国变富（农艺、水利）或可以使国王得以增加一些能使他实现神圣强大势力的手段。这些艺术和不同技术的著名大师们都出现了，而且还在他们

周围聚集了一批数量不同的弟子。他们依次向各王国传播其教义，有时也被留宿于王宫中或谋臣家中。学派的与日俱增和这种传播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时变得特别明显了。人们无疑应该把孔夫子和孟子本人(其弟子们除外)视为属于一个其未来发展已经初见端倪和初露锋芒的时代。

这些施教的实际目的及其与当时对于政治、社会和经济关注之间的密切关系，解释了它们中的大部分兼收并蓄的特征以及互相施加影响的便易性。人们于此所面对的不是没有利害关系的哲学体系和机构，而是一些在它们之间有时很难作出明确区别的思潮。然而，这种实际方向丝毫不损害由这个时代的中国思想家们提出的问题的价值和纯哲学意义，当时只有一种抽象的和逻辑性很强的哲学研究方式。

国家的理论家

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的所有思潮中，最重要者无疑是由稍后被称为“法家”的思想家们所代表的。至少该学派是根据同时代的国家和社会的变化而作出了最有实效贡献的一派。然而，法家的历史并不为我们所熟知。被归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国变法的88首倡人商鞅的著作《商子》或《商君书》被认为是成书于此人生活时代数世纪之后的一部伪作。一部写于战国时代的混合性杂作，被归于公元前7世纪时齐桓公的上卿管仲名下，它促使汉代的传记学家们把这个半传说性人物捧为法家第一人。人们根本不知道谁是申不害和慎到，他们在汉代被列入法家之列，其观点都不大为人所熟悉。唯有著名思想家韩非(公元前280~公元前234年)的一部著作《韩非子》的绝大部分内容似乎是真实的。法家思想于其中是以最明确的形式出现的，如同是一种总结和反思的结果，适用于整整一系列有关国家管理和组织的经验。这些经验同时涉及到了外交、战争和经济，也涉及到了行政，符合公元前5~公元前3世

纪对于加强王国经济和军事势力的普遍关注。

但法家学者们的功劳是理解到了国家强盛的根本在于政治和社会制度,他们的新颖之处是曾希望该国及其臣民服从于法律的最高权力。

据韩非子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使国王成为恩德、荣誉、惩罚和刑罚的唯一实施人。如果他将其任何一点微不足道的权力授予他人,那末他就会制造很快将会篡夺其权力的对手。同样,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权限必须作出非常严格的限定和分配,以使不会出现任何职权冲突,官吏们也不会利用其权力的不明确性而窃取一种不应得到的权势。但首先是制定客观的、强制性的和全面的规章制度,这样才能确保国家功能的运行。法家于其哲学倾向中以一种坚定不移地忠于客观的愿望而引人注目。法律不仅仅应该是公开的、人所共知的、排除了任何歧意解释的,而且它的执行本身也应该摆脱人们那些既不可靠又变化无常的判断。衡量在战争中获得的战功、以斩下的敌人首级数目而计算勇敢精神的等级,这一切都可能显得是一种略微粗俗些的做法。它的优点是使任何讨论都摆脱了(除非是以一种客观的标准)一切仅仅为观点的东西。中国的全部法权思想始终以法家赋予它的最早方向为标志。行政首脑法官的作用并不是权衡斟酌是非、从其良心深处判断罪行的严重程度和纯粹以武断的方式量刑,而是正确地判定违法行为。其任务仅限于此,因为这种断案量刑会自动地引起由法律条款规定的相应惩罚。在政府机构中,通过使用文书(施政报告、统计帐目、日常要事……)、会计、客观证实的方式(印鉴、只要合在一起便可以通过标记的吻合而足以揭示其真实性的两瓣符),就可以确保严格执行命令。社会制度的作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才华正是根据其实际效果(功能)而作出判断的。

89 选举人才的问题对于从道义上支持政府的道德家们来说至关重要,但对于法家们来说却无关宏旨。国王只需要招募一些特殊人

才,他不需要依靠其运气,只要传唤任何应召的人就足矣,因为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必然会确保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转以发挥功能。道德品质是没有用处的。更为糟糕的是,它们在授予有德之士一种有可能危及国王和法律的至高无上权力时,可能会把国家导致崩溃。正如《商子》一书所宣扬的那样(尽管其时代很晚,却依然忠于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的法学家传统),政治并非伦理之事。政治仅仅是保证和维护国家优势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手段和计谋。

法律条文的目的不仅仅是以彻底的方式改革政治组织,而且在于改造整个社会。罪行等级和荣誉阶位形成了一个双方都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制度,应该能最终导致一种持续的社会等级,它始终要接受修改,可以主宰臣民们的任何行为并使他们为国家服务,优待那些其活动被认为是有益的人(士卒和粮食生产者)和惩罚其他人(流浪汉、寄生虫、豪华奢侈品的制造者、好争斗的人和哲学家)。历史条件(农民最终于其中提供主要士卒的军队的发展,为进行持久战而必须的充足储备)确实刺激了绝对首先重视农业生产的做法。因此,农业被认为是任何经济和军事势力之“母本”(根、杆),与次要和附属于“末”端的流动手工业及贸易相对立,后者无节制的发展可能会引起国家的削弱与毁灭。所以,必须对使民众脱离其本职的所有活动都加以遏制、为反对投机犯而斗争、控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以及货币的发行。因此,人们从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发现,一种在中国社会中曾得到巨大的早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初露锋芒。

如果说国王是决定社会等级和奖惩的唯一源头,那末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其权势。他的权力仅限于立法和建立所有人都熟悉的客观标准。他的公正不倚是完全彻底的,酷似天理般的公正。在这一问题上,韩非身上的道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90 其他的影响也对法家的形成起过作用。甚至在一种以国王和法律的至高无上性为基础的国家理论形成之前,那些为了使其外交手腕获得成功的人就以被严加保密的秘诀(术)之手段来利用有利的机会和形势(势)。以具体而又特殊的时空观念为基础的这种政治活动观,似乎是当诸侯们希望利用贵族社会的动荡而摆脱贵族豪门的束缚并试图称霸时首次迫使人接受的。然而,法家应该在这种秘密手段和方法的概念中占据一席之地,与为了确保国家职能和社会基本组织的一整套法律并存,国王应将其个人权势的一部分归功于法家。

最后,大承包商中有一些在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时充任了诸侯们的谋臣,如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越国的范蠡,他是第一个主张“富国强兵”的人;公元前4世纪魏国的白圭与公元前3世纪末秦王的大臣吕不韦。这些人的品德影响了法家的形成。使用算术客观论证的方式,甚至是秘密手段(韬略)的思想本身,都是法家和商人界所共有的。

在法家的思想观念中,最使其同代人和汉代人感到惊奇的是他们主张所有人在法律面前都平等。司马谈在公元前2世纪时写道:“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①。但是,尽管中国社会发生了后来的变化,法家在法律以及政治、社会和行政组织领域中的贡献仍是根本性的。法家直到我们今天仍未停止影响中国的政治思想。

从宗教修持到哲学:道家

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是一个不安宁的、混乱的和社会大动荡的时代,这可能特别有利于宗教思潮的发展。早在公元前5世纪,由墨子领导的一个学派就已经以其笃信宗教和确保普遍救度

^① 这段文字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译者。

的抱负而引人注目。对于那些大家稍后称之为“道家”的人来说，每个人和所有人的救度并不存在于一种集体修持中，而是寄托于避静之处，寄托于其举止行为可以使人摆脱尘世并能控制尘世的修持之中。在所有这些人中，现在仅为我们保留下了一些寓言、象征性的小故事和论战性的文集。其中最重要者是《庄子》，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出自一个天才作家和无疑也是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作家之一的庄周（约为公元前 370～公元前 300 年）的作品。另外一部稍晚一些的文集《列子》似乎是模仿《庄子》而写成的。在这两部著作之外又增加了一本包括有预言家格言警句的小册子，它们无疑可以用作静修的内容，其晦涩难懂的程度吸引了许多的诠释者，这就是《老子·道德经》。

书中许多段落可以使人猜测到使用了很可能要古老得多的巫术——宗教修持。正如葛兰言(Marcel Granet)先生强调指出的那样，道教思想家们的出发点不是哲学的，而是宗教的。其目的是通过使用食物、呼吸（闭路呼吸）、性行为、体力锻炼和无疑是炼金术⁹¹等科目的训练而保养和延续其生命力，这一切都符合“养生”一词的意义。这是使身体保持纤细而优美的手段，以使它变得永不受任何伤害（水、火和野兽都丝毫不能伤害一名圣贤）、获得在精神恍惚的游行时自由地于宇宙中嬉戏的能力以及无限地推迟人的衰老。所有这些修持术从汉代起便为人们相当熟悉了，它们似乎曾经是从最上古时代起就出现了的巫教派的特权。

正是在这种巫术传统的基础上和其他思潮（但与巫教思潮绝对相对立）的影响下，道教哲学似乎才得以发展起来。道教思想家们使一种独立的、自然的、自由的和欢乐的生活与伦理、仪礼和政治组织的约束强制性以及墨子那些悲惨的信徒们宣扬的祭祀对立起来了。人世间的苦难均出自自由修身强加给人性的歪曲、羁绊和多余的累赘，其作用是削弱了生命本原。为了过上一种充实和完善的生活，则应避免任何空耗精力、恢复处于天然状态的万物之

“朴”、符合世间生活的节律、交替度过冬眠和自由嬉戏的漫长时期，于其娱乐和舞蹈中模仿出于本能地懂得生命保健秘诀的动物。完全如同宇宙万物一样，必须保持安静、息怒和圆满的无动于衷。那些骚动不安的人、拼命追求财富和荣耀的人、希望拯救世界的人、忠于为国家服务的人只不过是一些大傻瓜，只会浪费其生命力和禁绝达到真正圣洁的任何希望。

同样，也必须摒弃任何推论性的思想，因为具有社会功能的语言是人类与宇宙万物自由交流的主要障碍之一。所有的区别都是随意性的。生与死仅仅形成同一种实物的两个轮番变化的阶段。庄子向诡辩家们借鉴了他们的辩证法，以证明语言能对抗全部虚浮。使用语言的任何说教都是虚幻的，古人的著作仅仅为他们自己的发泄物。圣贤是以直接的方式、通过其难以觉察到的影响、一言不发地教育和改造其弟子的。在由完全的寂静和完全的空虚提供的这种直接和普遍的知识之外，仅仅有一些短暂的、偶然的、不能持久的和相对的真谛。仅有的真正真实是这种不明确的变化能力，道就是宇宙自生性的这种内在原则。

道教在中国社会中可能对中国思想和宗教运动的发展有过一种重要而又经常是非常突出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科学观念的形成和某些新发现。但它尚未发展到政权观念（其基础之一就在于拥有巫术—宗教权力）以及政府理论方面，它的影响在这些方面都不是显而易见的。

孟子

相对于国家机能本身的运行和建立其发展所必须的制度而言，人们关注的是创新精神，反对的是那些认为政权的基础在于国王能力的观念。后者是伦理观念的发展趋向在那些仰仗孔夫子名望的人中从事彻底更新的一种旧思想。“仁”不再是贵族世家所专有的了，它变成了所有人都可以伸手即得的伦理品德。孟子（公元

前 4 世纪下半叶)认为,能够表现出与上古时代的神话英雄(尧、舜和禹,后者是夏王朝的缔造者)及周代(在这些时代呈现了一种圆满的社会和谐)最早国王们相媲美的一种仁的国王必然会作为普天下之主而被整个中国社会所接受。这里已不再是指一种以宗教为基础的宗法势力了,而更应该是简单地指一种宽宏大量和关心个人福利的品德。当时最重要的并不是土地,因为始终都有数量充足的土地,当然也不是财富和战斗力(若无士与庶民的支持和帮助,这一切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而是人类。然而,贪婪、自私、权力欲,这一切在驱使国王们成倍地加强对平民的统治及其苦难时,就会使他们失去国民的同情。在这个暴力和放纵欲望的时代,社会权贵中的敢于以一种充满勇敢精神的挑战来恢复先王之人道主义政府的人,就必然会如同煽动起一场革命,所有受压迫的国民就会如奔向其救世主一般地望风而归之。

这种在叙述该大师语录的著作中作了大量发挥的内容(人们于其中还发现了一些属于经济和税收范畴的建议,孟子主张恢复井田制——把土地分成九等份之方形的制度中那理想化的“公田”的旧做法和减少经商税)与人性的一种乐观观念联系起来,人类从一诞生就孕育着使他们实现完人所必须的伦理品质:仁、义、礼、智。这些萌芽或者可以通过教育而得以发展,或者会通过环境的有害影响而被窒息。

孟子是一个没有多少标新立异的思想家,他可能仅仅从公元 9~11 世纪起才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是由于他的人性观与某些佛教理论(佛性在每种生灵中都是天生固有的)之间所具有的类似性,以及他的政治思想与在宋代发展起来的哲学和伦理倾向的全面吻合。《孟子》一书后来变成了“理学”正统的基础文献之一,明代(公元 1368~1644 年)和清代(公元 1644~1911 年)的专制和家长式的帝国都采纳了它。

荀子

荀子(约公元前 298~公元前 235 年)的思想比孟子更为深奥和更富有独创性,他与其同代人韩非一样成了公元前 3 世纪最强有力的思想家之一。此外,他的思想可能同时向法家和道家借鉴了许多内容。荀子在世界史上无疑是第一个曾辨认出了伦理之社会起源的人,他拒绝将处于未开化状态的人性视为超出无政府和不合理倾向之复合体以外的其他内容,善和理均诞生于由社会生活本身强加的纪律。正是社会以它对人的欲望、残暴和天生自私施加的经常性抑制才疏通了这些富有生命力的力量,制服它们并使它们转向有利于所有人和每个人。义和行为总则(礼)使每个人都能学会控制自我、体面和公正的意识。节日和礼仪、音乐和舞蹈都是一种趋向和睦的驱动力。社会制度培养了人。

但义和礼远不是一名立法者的武断之作,它们被构想得如同是客观的现实而不是伦理品德。它们是历史的自然产物,因而归并成了一种合理性的本原,社会本身就是任何理之原。社会秩序和理结合起来了。

如果对级别和地位的“分”符合“义”并未受到了所有人的承认,那末争论和吵闹就会摧毁可以使人类集团具有集体力量的社会凝聚力。因此,最重要的是这种“分”要明确清楚,名要符实。人们在荀子的著作中发现了对“正名”理论的最佳阐述之一。这种理论出自司书和史官界中,他们把使用符合仪轨传统的名词视为表达一种伦理观的手段,“正名”理论变成了以功过为基础的一种新秩序的方法。在定性之时,也就是在赐予尊号和级别的时候,国王颁降了能确保整个社会正常发挥功能的命令。这样一来,国王就不介入争执,而是仅满足于建立一种能避免发生这一切的机构,因为它是以前所有人的同意为基础的。人们于此发现了与在韩非著作中的相同措施:国王并不指挥,也不直接介入具体问题,他是非

常公正的,成了一种宇宙秩序之源的保障。

人们在荀子的著作中就如同在中国其他思想家的著作中一样,并没有发现更多的有关某种意义上似乎是西方思想的组成部分的概念,即认为宇宙秩序的本原是人类的一种约束和控制力。在春秋时代,宇宙秩序之原存在于一整套礼仪规则 and 家祭等级中,它在孟子的书中却是注定要成为天下之主的国王行为之自发效果。这就是庄子有关圣贤之“仁”的结果、《荀子》中出自社会生活的客观机制之产物,或者是《韩非子》中有关国家首脑制订的基本准则。⁹⁴那种认为宇宙秩序只能出自一种自动调节和如同是有机体一般的思想也出现在宇宙观中,任何个人的力量都不能支配自然,而自然的平衡却是由相反相成的力量或道德的作用才得以确保的,其盛衰系由季节的接续交替表现出来的。由此,大家可以理解当中国和欧洲文明在17世纪接触时对话的困难性。从他们的倾向来看,基督教传教士们要么是把“天”(上天,自然秩序)的概念看作一种简单的机械观,要么则是独神崇拜的残余。

辩学家和五行学家

辩说是墨家的创新特征之一,它也是类比学、长期发展的比较学和重复论述法的基础。它既呆板迟顿又臃肿晦涩,绝不适用于王宫的辩论和外交会晤。它不是指说教,而是用简单的几句话会博得同意。所以这种辩说是很激烈的、含沙射影的、粗暴的或嘲弄性的。争论者们所攻击的目标都是无所不及的:伦理和礼仪准则、轶事趣闻、寓言故事、历史掌故、悖论、得出荒谬结论的推论等。为了使对方感到茫然失措和遭到突然袭击,人们根本不害怕使用荒谬虚伪的论据。因此,战国时代的政治背景促进了一种其特点很新异的辩学的发展,它因其主要是实用主义的目的而与希腊社会的诡辩术有别,后者则与司法和政治辩护的惯例相联系。辩说的时间是审慎而有分寸的。由于受使用一种无法区别单数和复数、抽象和具体的

语言所引起的障碍,中国的“辩者”们也既未有余暇非常深入地发展他们对语言的研究,也不能形成一种名辩逻辑。惠施(约为公元前380~公元前300年)及其更为著名的继承人公孙龙(约为公元前320~公元前250年)是其著作的某些片断和名字本身被保存下来的仅有的两个人。人们为把以对大小、时空、运动、单数与复数思想的分析为基础的一系列悖论归于这些人物的名下。这些悖论于其时代取得了某些成功,但却代表着对于那些始终无解的抽象概念进行思考的一种努力。

中国辩学或名学(逻辑学)确实不是沿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而是沿中国社会中的数学首创者占卜术士们开创的一条道路发展的。掌握数学和适宜反映时空具体价值的符号组合在其中可能充当了哲学理论和科学的基础。这种评价社会的方式绝不像其他诸多方式那样不合理,它能够证明其在历史发展过程的诸多领域(化学、磁学和医学……)中的启发价值。恰恰是在战国时代,继承自卜士界的分类理论似乎被系统化了,正是卜士们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并将同时为互相对立和互相补充的基本功能(阴阳五行)纳入到时空的整体中。这些功能的兴衰与接续交替可以使人既能很好地解释自然秩序,又能诠释历史。它解释了政权的诞生、鼎盛和衰落。这些理论符合一个社会和政治动乱时代的需要,但它在秦汉帝国时代可能获得了一种非常广泛的成功;它似乎在齐都临淄的稷下(今山东益都)“学府”中受到了特别研讨,那里同时存在着各学派的代表人物。传说中把使这些宇宙观系统化的功德归予了邹衍(约为公元前305~公元前240年)。

文学

人们称之为战国时代的中国哲学家(诸子)都使用了丰富的口碑和文学文献,他们向这种文学借鉴了趣闻轶事、寓言故事、逸事、譬喻或谜语,人们现在尚可以在不同文体中重新找到这一切。这种

文学的部分内容可能是以文字记载的形式搜集到的,同时搜集到的还有从这个时代至公元前2~公元前1世纪时的其他传说,以编年史或经小说化的传记、讲演集、被归于著名人物的言论集(其内容往往是混杂而不一致的)。《穆天子传》是279年在河南的一座战国墓中发现的,它介绍了穆王(其传说的年代为公元前1001~公元前947年)赴西部地区的游记。《穆天子传》是一部以体裁分类的轶事集。如《吴子》,这是一部被归于魏国一员名将名下的兵书;《管子》,被归于公元前7世纪的齐国上卿管仲,它是由互不协调的部分组成的一部政治和经济论著;《国语》和《战国策》都是历史文集,其中加入了某些一部分是春秋时代和另外一部分则属于战国时代的言论集。

人们现在已经疑心,在这种体裁差异悬殊的文学中会有一种跨民族的民俗影响,当时的历史背景(在西域存在有印欧民族的居民、阿契美尼德朝波斯在公元前5世纪一直扩张到了河中地,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时中国与印度社会的关系)可以解释这一切。印度的神话地理似乎间接地影响了邹衍的宇宙观,他认为昆仑山占据了宇宙的中心位置,它是苏迷卢(Sumeru)山在中国的相对应之山。至于埃利亚的芝诺(Zénon d'Elée)的飞矢的故事,也出现在中国辩学家或名学家中了……

但是,完全如同神话地理很快就被抛弃而由实证观念所取代一样,中国社会中最古老的神话已开始被融于具有世俗特征的历史模式中。这部其内容构成一直持续到汉代的历史修改并吸收了某些神话与传说的片断、其意义尚不为人所理解,并已被改变成历史资料的宗教内容,故又把它纳入到一种可以上溯到第3个千纪初叶的一种连续的年谱中了。那些被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的⁹⁶不同教派和学派采纳来作为保护主的文明英雄们(黄帝、伏羲及其妹女娲、神农、尧、舜和夏王朝的缔造人禹……,人类应将其基本制度以及平天下的功劳归于他们)发现,在一部已被断代的历史中为

自己提供了一席之地，而这部历史与继此之后的时代具有一种圆满的连续性。

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战国时代之末则以一种新诗体的迅速发展而令人瞩目。这种新诗体出自楚国，充满了借鉴于土著文化的内容。它无疑属于一种更古老得多的传统，于公元前3世纪初叶以该国的一位贵族屈原而首次变得名震遐迩了。这是一部具有宗教影响和灵感的诗，具有抒情特征，韵体自由，有时激烈紧张，有时又雄伟壮丽，被阵阵惊叹声所打断。其中有几首描述了寻找所召请的神灵的巫士之旅行，从而使人联想到了“真人”们的远游。据庄子认为，真人可以乘风驾云、跨日骑月并赴宇宙之外旅行。在屈原的赋于汉代变成某种珍贵内容和用华丽辞藻作诗歌般的描述之前，它曾由其弟子宋玉和景差模拟过。

军人帝国时代

第二编 中央集权国家的兴盛衰败

在汉代的 4 个世纪期间(从公元前 2 世纪初叶到公元 2 世纪末叶。正式的断代是公元前 206~公元 9 年为前汉或西汉,公元 25~220 年为后汉或东汉),发生了一场触及到社会、政治力量的分配、居民重新分布、汉族社会与草原的关系以及经济的重大变革。所以,大家可以在由秦始皇确立的那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所遭受到的持续变化过程中区别出某些不同的阶段来,它处在公元前 210~公元前 203 年的那场灭掉了秦帝国的内战和于公元 190~220 年灭掉了后汉王朝的那场诸侯混战的无政府时代之间。

继公元前 2 世纪前 60 年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时代之后,便是汉武帝执政年间(公元前 141~公元前 87 年)的军事大开拓,它伴随着对北方和西北方领土的开发的巨大努力。帝国的强盛是以被迫应征入伍的大批小农为基础的。但在汉武帝执政年间发展起来的君主专制的倾向,于他晏驾之后激发了官吏队伍与宫廷的一次大决裂,内宫变成了由太后家族策划的阴谋中心。这些阴谋导致了王莽于公元 9~23 年的篡政。然而,前汉王朝最后 50 多年的政治危机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大变革以及部分古代游牧民族的缓慢同化。这些不同的因素促进了一个富裕地主阶级的形成,以

及一股涌向定居在北方和西北方边陲的移民潮流与小农阶级的迅速减少。所以,继王莽篡权的汉朝皇位空缺之后,复兴的王朝依靠的是向它提供了行政和政治官僚队伍的新贵族阶级。经过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之后,困难又重新出现了,这就是由宦官和贵族家庭代表的宫中各界之间的冲突;接着是由受道教影响的人民大起义表现出来的农民危机,它削弱了中央政权和方便了奉诏镇压起义的军阀们的上台。从公元190年起,汉朝的皇帝们就只有一种名义上的权力了,而全面的无政府激发了城市经济的衰落。

第一章 开拓疆土的帝国

一、由秦至汉

中国各地区的统一和最早的开拓倾向

秦朝自商鞅变法的改组之后,第一次伟大的武功是它于公元前314年取得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胜利,接着便是于公元前311年占领四川成都平原(蜀地)和秦军进入川东(巴地)的由非汉族部族居住的山区。对汉水上游的占领(公元前312年占领了汉中)使秦国得以在公元前278~公元前277年间向湖北扩张而损害了楚国的利益。楚国的都城郢(今江陵)陷落入了白起将军的手中。后来接着又是对秦国东部韩、魏、赵国的一系列进攻。秦军一直推进到河北东南端的赵国京城邯郸,但被迫于公元前257年放弃了对那里的包围。公元前249年,秦国吞并了河南东周的一小片领地,这样一来就结束了周代国王们的尊贵世系。

以武力将中国各地区统一起来并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的秦王政(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嬴政)于公元前247年即位。在10多年的征战中,他灭掉了韩(公元前230年)、赵(公元前228

年)、魏(公元前 225 年)、楚(公元前 223 年)、燕(公元前 222 年)和齐(公元前 221 年)等战国六雄。他在于公元前 221 年完成了统一中国所有地区的大业之后,采取了“皇帝”的尊号,它从此之后始终为中国君主们的常用称号。但是,秦王政后来在历史上则以“始皇帝”之名而著称。

在继于公元前 237 年被翦除的商人吕不韦之后出任丞相的李斯的匡扶下,始皇帝将过去在秦国使用的行政制度扩大运用到了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与整整一系列的统一措施相配合的是将领土划分为 36 郡,郡的数目很快就增至 48 个;铸造了唯一的一种圆形和带中心方孔的铜币,其样品一直保存到当代。此外还统一了度量衡、创造了一种准备取代直到那时在中国各地使用的不同类型的文字的新标准字体、统一了车轴距。各诸侯国为抵御其邻国而于各自的边境上筑起的古长城都被拆毁推倒,私藏武器严遭禁止(在京都用没收来的金属铸造了 12 尊巨像)。但当时也为整治国土作出过巨大努力:修建了驰道和灌渠、在北部边陲修筑了万里长城。这道长城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帝国免受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匈奴人的入侵,它重新沿秦、赵和燕国过去于公元前 300 年左右修造的古防御工事的路线走向,自甘肃南部向北直到辽东半岛以北(东经 $104^{\circ}\sim 123^{\circ}$)之间作了不间断地加强和延长。一支由 10 万人组成的远征军于公元前 213 年在蒙恬将军的统率下向栖身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人发动了进攻。他在中国南方和越南的“夷人”地区也采取了军事行动并在那里设置了新郡。其中心设置于番禺(今广州)、广西东北部的桂林和象(河内)。秦王朝对福建土著民(闽越人)发动的进攻最终导致在今福州地区创建了另外一个郡。这些边远领土被那些遭流放的“囚配”们居住。政府的驻兵与永无休止的叛乱反抗作斗争。在继秦始皇晏驾之后出现的动乱中,土著民摆脱了中央帝国的控制并不断地向他们发动战争。但这些地区已被汉地产品所渗透,已由战国时代的商人和冒险家们勘察过,一直保留

着天朝入主的痕迹，人们于一个世纪之后还在那里发现了秦始皇时代的士兵与囚配们的后裔。

104

秦帝国的崩溃和汉帝国的开国

从甘肃到高句丽和从福建到越南的军事行动的频繁次数、大兴土木工程的规模(筑城、驰道、驿站、灌渠、万里长城)，再加上于骊山(咸阳以东 50 公里处)深处修造一个神奇的陵墓、极端严酷的刑罚制度，似乎使秦始皇的暴政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了。除了国民的不满之外，还要加上被剥夺了权力并遭流放贬谪的旧贵族(12 万户“豪富”都被迁至京师地区)的仇恨以及文人界的抱怨。始皇帝怀着排斥那些居然想批评新国家的说客们的意愿，查禁了所有书籍，唯有医书、农书和卜书例外。这就是公元前 213 年的那一次臭名昭著的“焚书”，接着是在咸阳处死 400 多名反对者。始皇帝晏驾后的翌日便爆发了最早的起义，当时其小儿子以“二世皇帝”之名继承了皇位。公元前 209 年，爆发了陈胜和吴广领导的人民起义，很快又有由项氏家族领导的楚国旧贵族阶级的暴动。

105

出身平民的秦朝小官吏刘邦作为起义领袖而增加了自己的权威。刘邦首先是在项羽(公元前 232~公元前 202 年)麾下作战，项羽封他为汉王，后来则与其盟友发生了冲突。公元前 207 年，他指挥其军队越过了秦岭，于次年在渭江流域灭秦。这一年在理论上是汉朝新帝国的开国年代。刘邦于公元前 202 年消灭了其对手而称帝并立都长安(今西安)，位于咸阳的东南。正如项羽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刘邦为其旧战友们封敕了贵族尊号和封地。

法制的稳定性

法制国家是从公元前 4 世纪中叶起在秦国建立的，其基本原则被始皇帝推广运用到了整个中国，它以确保对农民阶级的控制和组织的一种无多大特色的行政军事组织为基础。这种政权和社

会新观念之基本特征实际正是寄寓于农民和国家的这种直接关系中。尽管具有这些相似性,前汉仍为秦王朝的继承者。传统历史确实更乐意为秦帝国蒙上一层格外昏暗的色彩。暴君确实迫害了文人,而文人的影响在汉代相反却变得占据优势了。汉朝政权的基础最开始就是秦国和秦帝国的那一种。同样的观念在哲学和宗教领域中也占据优势,相当于经院式繁琐哲学的思想体系为世界和社会的变化提供了一种全面解释,这就是山东与河北沿海地区占卜师与巫术师阶层的道教徒们的学说。从表面看来,其基本形势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始终相同。武帝政权(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向漠北蒙古、高句丽、西域、中国南方和越南的大规模扩张,乃是经过约一个世纪的间断之后又继续了始皇帝的攻势和远征。

长此以往和由于一种应该是受到了各种不同因素(经济增长、中原社会与草原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以损害官吏队伍的利益来加强内宫势力、削弱国家对农民阶级的控制、贵族豪门地位的上升……)影响的复杂发展,汉帝国才越来越远离了其原有状态。

虽然中国第一个帝国的刑法的极端严酷性被汉王朝的开国君王大大地缓和了,但由刘邦建立的政治和行政组织却与秦朝没有任何区别。依然同样是将国土划分为郡和县,同样的京师和地方官吏的三官制,由大司马、大司徒和大司空分别负责文职、武职、政权的监察和管理。“法制”帝国不仅仅沿存于直接属于中央政权的领土上,而且也存在于先被敕封给帝国缔造者的战友们和后来又封给皇家宗室亲属们的“封国”中。国力之本原在于由国家对所有人口和个人的直接控制。这就引起了使用准确地普查人口的办法(那些自汉代保存下来的人口普查数字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准确者),每个臣民都须交纳一种用钱币计算的个人税(这种人头税甚至也涉及到了幼童),并服每年的徭役和兵役。此外,法律的奖惩制度(司法判决、赐爵、晋升、特赦……)可以使人把全部居民分成连续的“二十四爵”系列。晋级是在武功、向国家输交或由国家收购的

情况下而获得的。刑罚会导致贬职和剥夺拥有爵位，从而确保在犯罪的情况下会减少处罚。特赦有时会免除债务并同时给予晋升。它可以起一种矫正某种极端严酷的立法之过火程度的作用。官府在特赦的情况下可以向农民的村社(里，村庄)赠送祭祀用的酒和牛，以便为社(土地神)举行每年的斋供。这些“里”以其团结一致和它在地方一级上施加的伦理压力而加强国家对民众的控制。里长是在最年长的成员中选择的名士，他们强迫人遵循一种以幼从长和以尊重等级为基础的伦理。

107

法制帝国是以将人类集团划分为很小的单位为基础的，大型的“里”、重要的社祭、大批私人门客的存在确实形成了其活动的最大障碍。所以中央政权的控制在最新定居区最为坚强；在居民最早定居的老区，帝国政府应由望族组成。这就是山西的情况，那里家族之间的对立是持续不断的仇杀之根源，而中央政权的代表并无能力制止这一切。大家就是这样来解释人口迁移的一种作用的。国家有心迁移那些有影响的豪门望族，让他们离开其原来的环境以便剥夺他们的所有权力。它同样也关心扩大垦殖区和移民地，因为对于由移民组成的人口，也就是由囚犯、不法之徒、士兵和已经汉化的农民等人口的控制更容易一些。

移民在符合政治意图本身的同时，也符合经济和军事目的。它们减轻了居民最稠密地区过剩人口的压力。他们可以开发北方诸省和蒙古边陲地区的荒凉土地，由此而使奉命防御来自草原入侵的军队的军需供应更容易了。早在公元前198年，属于山东北部的齐国、长江中游以及汉水下游的楚国故地的富裕和有影响的望族就有10万人口被强行迁至京城地区。这是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世纪末和对于改变中国北方特别是西北的人口分布的相当重要的一大批类似措施中的第一项，因为那里的“屯田”系由其家眷随军的士兵们居住，它们在武帝执政年间(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数目倍增。

完全如同秦国一样,西汉实施一种大兴土木工程的政策,其中大部分都具有战略或经济特征。公元前192和公元前190年,渭水流域的男女农民都被征调去建造新京长安的城墙。他们在这两年中的每一年都达到了近150000人。但国家后来却越来越多地使用士兵和罪犯。公元前132年,10万名士兵被调遣修复黄河堤坝的一处决口。正是这些士兵和苦役犯于公元前102年把万里长城从兰州的东北一直延长到甘肃西端的玉门关,他们也在蒙古的居延(黑水河)地区、酒泉和张掖郡的东北与北方建修工事。公元前76年,另外一条加强工事则建于南满,它由刚刚被流放到那里的青年流民和罪官所筑。除了城墙和野外防御工事之外,运河和道路都建造成了,它们在加强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的同时,也符合经济需要。公元前129年,在河南与陕西之间开凿了一条150公里长的渠,以便把渭水流域与黄河沟通起来;公元前95年,又开凿了100多公里长的渠,把渭水流域与更靠北部的泾水流域沟通起来了。灌溉工程在武帝以及紧接其后的几位继承人的统治时代,于整个中国北方都是不胜枚举的。在西汉时代修筑的大道中,应该提到经褒斜谷和穿过终南山的那条把京师与成都连接起来的道路,从公元前130年起修建的从四川通向富饶的广东平原上的道路。除了于悬崖绝壁之上被迫修造栈道的技术困难之外,又增加了在西南地区就地在土著部族中征募的劳工的暴动。

108

压缩“封国”和抑制帝国贵族

但是,如果汉帝国的全部制度均承自秦制,如果它具有一个“法家”国家的所有特征,那末它早期的衰弱却解释了某些妥协。

汉朝政权正是在一种混乱和全面暴动的气氛中诞生的。它从战国时代继承的地区性倾向,在公元前230~公元前210年间由帝国强制实行统一的短暂时期和秦帝国时代之后始终表现得很活跃,这是因为汉帝国从一开始便仅仅在古代中国的部分领土上以

直接的方式行使政权。在汉帝国于公元前 2 世纪初叶所拥有的 54 个郡中,有 39 个(也就是全部疆域的近三分之二)属于被于公元前 201 年敕封给帝国缔造者的旧战友们的“封国”。这些“封国”中的大部分政权都与在皇帝领地中的政权相同,由受皇帝敕封的刺史节制。这些封国均位于帝国的东部地区和长江流域。如果大家将这些“封国”的创建视为上古时代分封制度的一种再现,那肯定是大错特错了,上古时代的“封建”已经最终消失了。但这些诸侯国的王侯们所享受的相对独立却形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一种威胁,中央政权在公元前 2 世纪期间曾极力削弱他们的权力。

在高祖皇帝(公元前 188~公元前 180 年)执政期间,被帝国缔造者封为诸侯国王侯的那些旧战友们对皇权表现得过份独立了,最终为了皇亲国戚们的利益而被取缔。在高祖的继承人文帝(公元前 179~公元前 157 年)年间,谋臣贾谊(公元前 200~公元前 168 年)和晁错(公元前?~公元前 154 年)建议削夺王侯们过份强大的权力(削藩)。最后,在景帝(公元前 157~公元前 141 年)执政年间酝酿着一场危机,最终导致了由吴王和楚王一手炮制的“七国之乱”,他们的封国都位于今江苏省内。王师于公元前 154 年取得了平乱的胜利,从而确保了中央政权对于距京师最遥远地区的权力,这是在武帝盛世(公元前 141~公元前 87 年)开始之前 13 年的事了。公元前 124 年,淮南王刘安(其封国在安徽)又企图(但也是徒劳无益的)动摇皇帝的监护权。他于两年之后遭处决。早在公元前 127 年,便通过了一条导致封国和帝国贵族最终崩溃的法律,从而结束了将尊号与封地传给唯一合法继承人的法规,规定要在所有儿子之中进行平均分配。继武帝临朝之后,王公们丧失了他们的全部领土权,给他们留下的唯一特权是征收一定数量农户的粮食税。因此,武帝统治期不仅表现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时代,也是一个内部巩固的时代。

在整个公元前 2 世纪期间,中国的基本倾向是加强中央集权。

由儒家谋臣们在官中所获得的影响和自秦继承而来的法制的温和化使人无法对这种基本方向提出质疑。秦朝最严厉的法律实际上于公元前 191 年被废除,当时被秦始皇禁止的书籍又重新开禁了。公元前 167 年,肉刑拷打被从刑法上删除了。此外,作为法家重大原则之一的那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做法在汉代初年被维持下来了,但与此同时,那种引入以社会地位(贵贱和尊卑)和亲属的亲疏程度为基础的差别之倾向,在仰仗文人传统的权势谋臣们的影响下也表现出来了。这样一来,早在公元前 176 年,贾谊的一道上表就引起了对过份无分别地执行法律的不妥之处的注意;皇威影响到了那些以其爵位或血统而接近君主的人,因而最好是使国家的上层人物避免犯下与普通刑罚不可分割的丑恶行为。正是这样的一种考虑解释了那种最终迫使以特别宽容而允许犯有死罪的贵族自杀的习惯,然而,只有经过一场长期的发展之后,根据亲属亲疏关系(由在每种情况下所要求的守丧方式和持续期所表现出来的亲疏关系)以及根据受害者和犯罪者的身份而分等级的刑罚制度,同时还有属于贵族和官吏的罪犯等级(八议,也就是在将档案传呈皇帝的情况下)的特殊程序才得以发展,一直发展到 7 世纪时《唐律》所具有的那种非常完善的形式,而《唐律》则是完整地流传给我们的第一部刑法集。自汉至隋之间的中间时代的那些立法者们成了法制的这种令人钦佩的系统化的创始者。

二、汉王朝在亚洲的大举开拓

大家可以认为,西汉的全部政策都受草原问题的支配和指导。来自草原的骑射手们的入侵无疑不是新鲜事物,因为他们在公元前 5 世纪末曾经威胁过从甘肃到满洲的秦、赵和燕国,激起了首批防御长城的建造。但这种危险在公元前 3 世纪末增加了。事实上是在秦末爆发农民起义期间和在激起覬覦最高权力者们之间大动干戈的内战期间,在草原地区形成了由匈奴人领导的一个很大的

游牧部族的部落联盟。

大家为了知道匈奴人和匈人(Huns)是否同族同源的问题已经进行过长期辩论,名称的相似性可能是骗人的。但这个对于历史并无意义的问题却造成了时代的差距。完全如同草原上的其他汗国一样,匈奴汗国从贝加尔湖一直延伸到巴尔喀什湖,向南一直拓展到北纬 40°附近的地方。它包括了具有各种血统的部族,其语言与我们在一个很晚时间才知道的蒙古语、突厥语和通古斯语中的“阿勒泰”语族有联系。那些被接受为其部落联盟首领的最强大部族的名称被推而广之地运用到了所有这些部族,晚期的蠕蠕(柔然)、突厥和蒙古族人的情况也如此。匈奴汗国由一名叫作冒顿(Maodun,更应该为 Modu,公元前 209~公元前 174 年)的单于创建,持续于公元前 204~公元前 43 年之间。这就是把草原部族分化为内附中原的今内蒙古地区的南匈奴与位于相当于今外蒙古的北匈奴。从冒顿时代起,匈奴的势力一直扩张到塔里木盆地。在其子老上单于统治时代(公元前 174~公元前 160 年),匈奴人向操一种伊朗方言和分布在绿洲地区与甘肃的大月氏人施加压力。他们逐渐被向西驱逐,这些印欧语系的民族最终定居在印度社会的西北边陲。这些情节可以使人理解为什么汉代中国中原人的开拓不仅限于蒙古,而是一直扩大到了整个中亚。

汉朝于公元前 100 年左右的拓展表

公元前 136 年	从四川经云南通缅甸和经贵州从四川到广东的道路开始勘察。
公元前 135 年	对福建越国发动的初次进攻。
公元前 133 年	一支 30 万人的战车和骑兵部队远征蒙古的匈奴人。
公元前 130 年	为进入从四川到缅甸和从四川到广东的道路而作出新努力。
公元前 128 年	对匈奴人发动攻击。在满洲和高丽北方的战斗。

续表

公元前 124 年	对匈奴人发动第一次大举进攻。
公元前 123 年	对蒙古地区发动新攻击。
公元前 121 年	对匈奴人发动第 2 次大举进攻。
公元前 119 年	在蒙古地区的第 3 次大举进攻并取得对匈奴人的重大胜利。
公元前 117 年	在甘肃西部和甘肃中部设立敦煌郡和张掖郡。
公元前 112~ 公元前 111 年	对南越国(广东和越南北方)的远征并将其领土划为九郡。
公元前 110 年	对福建越国的远征和平定该国。
公元前 109 年	远征北部和中部高丽,灭云南西部的滇王国。
公元前 108 年	在高丽的北部和中部创设四郡,对西域的第一次远征。
公元前 105 年	汉朝遣使底格里斯河畔塞琉西国。
公元前 104~ 公元前 101 年	在西域和帕米尔的远征。
公元前 102 年	把长城延长到甘肃西部的玉门关。
公元前 101 年	消灭锡尔河上游盆地的今费尔干纳的大宛国。
公元前 97 年	对匈奴人发动的新征战。
公元前 90 年	在西域、蒙古和吐鲁番地区的征战。
公元前 86~ 公元前 82 年	对云南西部昆明部族的远征。
公元前 78 年	对满洲的远征。
公元前 77 年	对西域的远征。
公元前 72~ 公元前 71 年	反击匈奴人的征战。
公元前 71 年	军事干预位于阿勒泰和天山之间的准噶尔。
公元前 67 年	对吐鲁番的远征。
公元前 56 年	设立西域都护。

蒙古和西域

农民起义与内战结束了由秦始皇开始的进攻性政策,万里长

城在公元前 3 世纪末到公元前 2 世纪初叶之间被抛弃而不设防了。定居在蒙古和鄂尔多斯的游牧民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入侵中国北方。他们是通过主要大道而入侵那里的,其一经过今山西省北端的大同地区进入汾河流域,其二经鄂尔多斯之路和陕西河谷地而通向了长安地区。汉朝军队于公元前 201~公元前 200 年之间的战败造成了向长城以南的全面撤退,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135 年左右。汉王朝被迫实行一种以“和亲”之名而著称的绥靖政策。一名汉公主于公元前 198 年下嫁给匈奴单于,汉朝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但从文帝(公元前 179~公元前 157 年)时代起,皇帝的两位主要谋臣贾谊(公元前 200~公元前 168 年)和晁错(公元前?~公元前 154 年)就批评了这种安抚政策。连绵不断的侵犯、汉朝政府变节反叛者数目的增多、匈奴人日益增加的勒索激起了某种态度的变化。在向游牧民奉送赏赐的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势力和财富。当中央政权得以巩固时,又控制了进入长城以外的入侵道路并重新采用秦始皇曾使用过的开拓政策。当公元前 133 年在宫中举行辩论时,采取强硬措施的支持者们战胜了支持求和的人。此外,张骞的著名出使理应在数年后更有利于使人们坚信发动一次全面攻击的必要性,以证明汉王朝可以在西域找到盟友。张骞于公元前 139 年出发去寻找匈奴宿敌月氏人,在游牧部族中被囚禁而滞留 10 年,最后越狱而到达锡尔河上游的大宛国(费尔干纳)。他又从那里到达了阿姆河南部的大夏(巴克特里亚),在那里栖身的月氏人变成了定居民,他们在当时的希腊人中却以印度—斯基泰人之名而著称。张骞于公元前 126 年返回长安,于公元前 115 年再度出发前往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养马民族乌孙人中,重新访问大宛,然后前往康居(粟特人)和西域诸绿洲。他从那里返回来时坚信所有这些地区都对中原产品有着强烈的兴趣,其中最珍贵者是丝绸。他声称对所有人都可以用礼物而换得支持汉朝的事业。张骞的出使向当时中国中原所揭示的正是商业贸易的存

在,在西域和位于帕米尔以远地区,这种贸易主要是涉及到了中国丝绸和其他产品。

因此,我们觉得在促使汉王朝于一代明君武帝时代(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向外开拓的诸因素中,不仅仅是中央政权的巩固和强大军队的组成,而且还有一种财富和经济发展高潮使中国天朝得以巩固它在所有近邻中的威望。大家实际上不应该忘记,外交活动在汉朝进入满洲、蒙古、西域和热带地区时所起的作用如同军事开拓一样重要。

对匈奴人最早的大规模胜利攻击发生于公元前127和119年。汉朝共投入了10万多名远征军,既有骑兵又有步兵,于公元前124、123和119年向蒙古地区进兵。从公元前115年起,汉帝国实际上对其北部边陲已不再感到担心了。公元前108年,在设置了高丽北部和中部的四郡之后,从日本海一直扩展到了云南的昆明地区,从敦煌一直到达越南中部的岷港。

但不要认为汉王朝曾得以在各地都建立了一种固定的政权,在许多地方事实上仅仅是由驻军确保的汉朝的一种进入,军队控制了其内附往往不稳定的居民中的交通大道和要塞。汉王朝在甘肃和北部边陲力求最大限度地稳固其立足地,在那里创办屯田,屯田的双重任务是开发由垦荒和灌溉而获得的领土并确保后方的防卫。

在甘肃省,敦煌和张掖诸郡是于公元前117年设置的,武威和酒泉郡是于公元前115年设置的。从此时起作出了巨大努力以在西北地区建立移民区,大家可以把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定居在那里的人估计为200万人。某些数字就足以使人联想到移民的规模。公元前127年,共有10万农民定居在鄂尔多斯河套西北和蒙古中心的朔方;公元前102年,18万屯卒前往酒泉和张掖郡居住;公元前120年,继在山东西部发生大水灾之后,70万难民被迁往陕西。这些移民活动相当频繁,足以改变中国北方的居民分布,他们无疑对

于黄河流域人口最稠密地区的农业经济具有有益影响。

满洲和高丽

汉王朝向蒙古和西域的开拓与它向东北(满洲)和高丽作出的推进努力是同时代的。其目的在于结束匈奴人对东胡和乌桓人(他们是满洲东南和辽河流域或南满的养马民族)的影响,同时也在于确保帝国对这些地区通商道路的控制。中原天朝很早就向满洲移民了,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而且可能属于燕国(其京师位于今北京附近)的移民遗址也确实在满洲发掘出土了。另外,山东沿海与仅仅距那里有120公里左右(也就是从西西里到突尼斯的距离)的辽东半岛之间(无疑同样也包括在山东和高丽之间)的海上交往关系要早于汉代。因此,大家可以解释,汉朝于公元前2世纪末是为了把南满平原和朝鲜半岛纳入到帝国版图中才作出了系统的努力。经过公元前128年对东胡人的一次胜利之后,汉朝在满洲建立了许多郡。在公元前109和公元前106年之间,朝鲜的大部分地区均被征服(西北的乐浪郡、西南的真番、东北的临屯、北方鸭绿江两岸的玄菟)。朝鲜的西海岸直到公元4世纪初叶始终属于中国王朝。汉族入主立足的这个时代解释了朝鲜半岛考古遗迹的丰富程度。直到近期发现其他遗址之前,始终是朝鲜乐浪的汉墓提供了这个时代壁画的最美标本。

北方的军事组织

如果把万里长城仅仅看作是游牧民社会与汉地市民和农民社会的明确分界线,那就过份简单化了。中国社会的北部边陲形成了一个农民和牧民的生活方式既对立又互相交织和结合在一起的地区,大家在那里于岁月的发展过程中有时会看到牧场的发展,有时又会看到耕田的衰落,有时是征服,有时又是以定居民来开发这些荒凉的土地。完全如同某些游牧部族转向农业一样,汉人也采纳了

游牧民的生活方式。抵御来自草原入侵的问题属于一种既为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同时又为军事的背景，这是由于同化现象、外交策略和贸易交流。万里长城仅仅形成了一个更为广阔范畴的因素之一。那些互相联合起来实现了对入侵部族的共同防御、驿站、工事和前哨兵营、军屯、被流放民开发的领土、饲养马匹……

汉朝在北部边疆的军队和防御系统组织都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事了，这既是由于发现了数量相当多的木简和竹简文书，同时也是由于本世纪初以来在汉代的中国大长城中从事的发掘。这些简牍数目文书出土自西蒙古的黑城(居延)地区和甘肃西部的敦煌地区。简牍数目共有1万余支，它们都是报告、公报、帐册、士兵书信、法律文书片断……它们是以当时最流行的简牍的形式出现的，一般都仅载有一行文字，其中提及的时间在从公元前100至大约公元100年之间。

大家在边界附近共发现了两大类部队：一方面是被称为“河渠卒”或“库卒”的屯田士兵，另一方面是驻守前哨阵地的士兵。警戒、巡逻和训练占据了第一线防守部队的绝大部分时间。每个烽燧都与附近的其他烽燧跟后方以信号系统保持着经常性联络：白天是红蓝小旗和狼烟，夜间是烽火，由于某种如同埃及吊杆一类的旋转长杆而使人能更加清楚地看到烽火。对于这种以相当复杂的秘码而得以迅速传播有关军队运动和进攻的比较准确消息的信号系统，公元前166年就已经于文献中提到了。全部被发出和收到的信号都被以文字记录下来。有一种严格形式化的施政陈规，即强迫每个驿站或烽燧首领都保留相当多的一批通报并形成丰富的档案，它们不仅仅涉及到了军事活动，而且还涉及到了军需供应和库藏武器(弓、箭、弩和投石器……)。当巡逻时，士兵们都经常坚持把铺成宽条的细土或沙地摊平以便能发现游牧人的脚印。士兵们负责维修兵营、用坏模制造并在阳光下晒干砖坯、拾捡柴薪和制造箭矢，他们也训练控制关隘和治安管理。经过边境哨所的一切都是受

到严密监视的对象,如人员、畜群和商品。当一名逃犯受到搜捕时,便向他们发出一支明确的号箭。使用过所的先例应上溯到战国时代,在汉代被得到了明确证实,就如同使用警犬一样。边界哨兵还需要满足外交使节骆驼队的征调。因此,当时的文献揭示了落到汉长城兵营中的任务之纷繁性,真正的军事活动仅仅形成了中原社会和游牧民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外貌。

汉朝的军队是承袭秦国和秦朝中通用的征兵制度而形成的。身强力壮的丁要在30岁时应征入伍,必须在皇帝的御林军中服役一年,在原籍郡中服役一年。这至少是位于京师附近地区的情况。在边陲地区征募的登记入伍士卒都驻留于那里。但大家在边陲地区也可以发现以银价招募的雇佣军。至于武帝时代的远征军团,他们则由大批胡族辅助军队、汉族雇佣军、被接受以服军役代替服刑的囚配军组成。此外,继武帝之后,减少由征募所提供的军队将成为基本倾向……后汉时代的军队将主要是由老兵、雇佣兵和大批胡族辅助兵组成。

汉王朝进入热带地区

汉人向长江以南的开拓形成了东亚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这既是因为它共持续了近3000年的时期,又是因为伴随它发生了多种变化(居民的迁移运动、民族融合、旧文化的消失或改造、互相借鉴……)。这些古老民族在今天的残余仅仅形成了既不能提供有关古代文化的确切观念(尽管某些特点具有引人注目的稳定性),又不能提供古代不同民族分布的基本观念的一种残余。某些民族似乎已经完全消逝了。那些具有独特文明的大土酋管辖区和大王国都逐渐被天朝的远征和一种逐步的同化所消灭或化为乌有了。唯有考古学才能对某些这类原始文化投下一束强烈的光芒。由此,汉

116

示。该王国的经济是以大饲养业和农业为基础的，它在战国时代末期和公元前 2 世纪时曾与东部控制着位于四川和广东之间道路的夜郎国尚武部族、云南西部的昆明部族以及成都平原上的汉人保持着关系。它占据着位于长江上游和缅甸之间的要塞。其商业财富解释了它得以发展一种特有的青铜艺术的原因，这种艺术中掺和进了多种影响，其中最明显和最出乎预料的可能是鄂尔多斯和草原的影响。昆明湖东南的石寨山考古发掘提供了带有小贝壳的卓越非凡的青铜器，这是王族家庭的御用品，其盖子上都装饰有凸形画面，它们形成了有关其居民的经济、宗教崇拜和日常生活的珍贵实证。滇王国被汉朝军队于公元前 109 年消灭。其国王将其尊号一直维持到昭帝（公元前 87～公元前 74 年）执政期间，但继一次叛乱之后被取缔了。汉王朝的开拓移民可能未让这种独特文明残留下任何踪迹。

公元前 86 和公元前 82 年，对云南西部昆明部族发动的远征使汉王朝入主的地区一直扩展到缅甸边境。由缅甸北部的掸王国于公元 100 年左右（公元 94、97 和 120 年）进献的贡物一直被运到了洛阳。

1924 年，在距河内以南约 150 公里处的清和地区的东山发现的又一处遗址揭示了另外一种青铜文明，它基本上是同时代的文明。那些居住在吊脚楼上的渔民—猎人—农人的文明是以使用铜鼓为特征的，其装饰图案表现了一些其中绘有以羽毛为饰的舞蹈艺人的宗教场面。在乐器中，大家提到了芦笙，这是一种口吹琴，在热带地区流行很广，由此而衍生出汉地的笙。草原和汉地的影响在东山文明中是显而易见的。在那些输入物品中，计有战国时代的一种容器和一把剑，同时还有王莽时代（公元 9～25 年）的铢钱。

滇与东山文明中的真实情况在其他古代王国中也无疑是相同的，但我们没有掌握其任何考古遗迹。面对大海和被其大山隔绝的福建以及浙江南部在公元前 3～公元前 2 世纪时就形成过这样的

一个独立王国,亦即闽(福建和福州河的古称)之越人形成了众多的渔业民族之一,他们自上古时代起就占据了位于浙江港湾和越南顺化之间的所有海岸。秦始皇的远征在那里仅仅是一次无希望的事业,但汉王朝却于公元前2世纪末以武力进入那里并于公元前110年摧毁了闽之越国。

117

具有肥沃的大平原(广州地区的西江流域、红河三角洲)上的全部沿海地区(由广东和直到今岷港附近的越南组成),从战国时代(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起就被汉地贸易渗透进去了。在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公元前214年间发动的远征之后,他便在今桂林(广西的东北)、广州和河内诸地驻军。但在秦帝国崩溃之后,在那里又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其统治家族可能是与汉族混血的赵氏,这就是南越国。该王国的居民应该是傣族和孟—高棉人的先祖,其主要经营活动似乎是贸易和捕捞业。其最重要的港口是广州港、合浦港(珍珠捕捞场地区,位于广东雷州半岛的西部)和一个位于胶州湾的港口。其贸易涉及到了象牙、珍珠、玳瑁、犀牛角、植物纤维纺织品和海岛奴隶。经过多次干预(其中最早的几次要追溯到公元前181年),汉朝的几支远征军于公元前113年进入了广州地区和红河三角洲,南越(南粤)国的领土于两年之后被改建成汉朝的郡。

然而,在汉朝政权于中国南方和越南控制的热带与沼泽地区中所呈现的经常性不安全的气氛中,那里的植物和经常是山峦的地势令人佩服地适宜丛林游击战,突然袭击和伏击战持续不断。在相当于王莽执政(公元9~23年)和汉朝复兴初年的混乱时代,汉人在云南、广东、越南北部和中部的移民大幅度增加了。但从公元40年起,人民起义在红河三角洲风起云涌,从而又导致了今越南的北方和中部以及广东西部合浦地区全部居民的起义。征侧(Trưng Thắc)和征貳(Trưng Nhi)两姊妹(其长者不失时机地取得了太后的尊号)是这次大反叛的首领。她们在当代被尊为越南的

民族独立英雄。然而，汉将马援(公元前 14~公元 49 年)被任命为“浮波将军”，于公元 43 年平息了这次叛乱。

向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最早开放

汉王朝在广东和越南的立足使中国的影响扩大到了东南亚。在柬埔寨发掘到的青铜斧模仿了汉斧的式样，可断代为公元 1 世纪的汉代陶瓷碎片也在婆罗洲的东部、爪哇的西部和苏门答腊的南部被发现了。同时，汉代各郡向南的扩展得以使东南亚和印度洋国家首次与中国社会建立直接关系。《汉书》中的一段文字(卷 28 下)提供了公元前 1 世纪时通向南海和印度洋诸海道中的第一种路程志。但这些关系仅仅是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才得以真正发展起来。继印度—伊朗人在海上扩张之后，从公元 3 世纪起紧接着便是中国南部的航海高潮。考古(广州地区、广西桂县、湖南长沙的墓葬)揭示了汉代舶来品的输入：玻璃、琥珀、玛瑙、光玉髓。东南亚籍的奴隶买卖交易已由某些墓葬中的小雕像得以证实。中国的非本地植物茉莉于公元 3 世纪开始在广州地区栽培。印度的使节于公元 89 和 105 年曾出使汉朝宫廷。有关中国与爪哇岛之间正式关系的首次记载被断代为 132 年。

印度—伊朗海上贸易的发展无疑可以通过航海技术的进步来解释，印度与中东和地中海之间交换的发展、佛教的传播、那些摆脱了对感染之恐惧的商贾们的宗教、在欧亚大陆的北方之路受阻绝时对新产金地区的发现，无疑是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亚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是东亚诸国沿海平原印度化之起源。它也可以解释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东部地区之间断断续续的接触。这种印度—伊朗贸易的大站之一似乎是湄公河三角洲上扶南(Phnam)之古柬埔寨王国的一个港口。在该古城的遗址上，已经于那些被断代为公元 2~6 世纪的古迹之中发现了一枚于 152 年轧制的罗马钱币，带有孝子安东尼(Antonin Le Pieux, 138~161 年)人

头像,另外一枚上带有马可·奥勃留(Marc Aurèle,161~180年)的肖像。《梁书》(502~557年)卷54提到,大秦国(“大秦”一词系指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的商人在汉代就经常访问扶南国。120年,大秦眩人(幻人)作为礼物被缅甸的一个王国送到了洛阳宫廷。166年,罗马商人(也可能是帕尔米拉的叙利亚人)遣使,曾在越南中部海岸停留,汉文史料中提到了这一切。另外两次类似的遣使则于226年在南京和284年于洛阳被提及。

东地中海和中国南部之间的这种远古关系仅仅具有一种简单的新奇意义,它们揭示了具有某种经济意义的贸易交流的存在,它们都受到了中国丝绸之吸引力的刺激。

第二章 大举开拓的因果

完全如同匈奴游牧大汗国的势力在草原地区很可能是由于从汉地输入铁和丝绸而初步形成和进一步加强的一样,汉王朝在亚洲开拓的根本原因无疑正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高潮。汉代中国不仅仅从这种经济发展高潮中得到了它在外部之威望和势力的本原,而且还在蒙古、朝鲜、西域、中国南部和印度北部方向进行了贸易,它们在吸引了汉朝贵族们注意力的同时也刺激了军事和外交的发展。但中国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由汉王朝对其邻邦采取的赏赐政策却逐渐改变了早期的局面,并引起了胡夷族内附汉帝国的形势。以至于从公元前2世纪末起,它再没有必要支持同样的开拓努力了,从而造成了汉族向北方和西北移殖浪潮的倒退。

此外,汉帝国与其邻邦关系的这种变化以及经济发展的高潮,导致在武帝时代(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曾造成汉朝鼎盛的阶级逐渐分化瓦解,这就是士兵—农民和小农阶级。正是其财富和势力不断增长的贵族家庭成了公元25年继王莽篡政而造成汉朝皇位短暂空缺期间之后复兴汉朝的缔造者。

一、经济和政治

120

贸易与开拓

早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期间,贸易交流似乎在赵国和秦国向蒙古和西域的方向,在燕国和齐国则向满洲和高丽方向,在楚国则向四川和云南等方向发展起来了。被断代为战国时代的大批刀形币(明刀)已在满洲和朝鲜北方的考古发掘中出土。它们证明了在位于今北京地区的燕国与东北领土之间贸易的存在。此外,一切都似乎说明秦国的丝绸曾向西出口,很可能正是继这些出口之后,丝绸之国才在印度为人所熟悉。“支那”(Cina,丝国)一名似乎要追溯到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

中国各地区与亚洲大陆不同地区之间的这些贸易交流在汉代可能得到了增长。然而,许多迹象促使人把汉朝自公元前2世纪末起的开拓与通商大道的发现联系起来,而正是这些大道将当时的汉族社会与中国南方、东南亚、西域、印度和伊朗边陲联系起来。张骞上表指出了西域和位于阿姆河南北地区的居民对中国丝绸的强烈兴趣,正是这种原因才决定了汉朝向塔里木盆地和帕米尔开拓的重大决策。张骞在他于大夏居住期间,发现了经缅甸和北印度而传来的邛竹杖、蜀布,从而鼓动武帝对云南发动远征以控制该地区的道路。这正是唐蒙根据在四川与广州(番禺)之间有通商道路存在的事实而得出的推论。当唐蒙于公元前135年出使广东时,他发现了一种以从四川输入的用水果制成的蜀枸酱,这就是汉朝对贵州发动远征的起因。

在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经济发展高潮的同时,其政治扩展当然也会增加贸易规模并使把贸易、战争和外交联系起来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自朝鲜到亚洲腹地的汉朝军队的驻扎、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对通商大道的控制都为商贾们创造了一种特别有利的形势。汉

代的草原骆驼队都成了真正的流动城市。公元84年,北匈奴的遣使赴长安,单于自己及其王室成员都参加了该使团,由一支以10万头牲畜组成的队伍陪同。公元135年冬,乌桓人在一次抢劫中夺获了河北汉族商人带领的一支由上千辆货车组成的车队。在边境城市中建立了一些大市场,兵营中的士兵们在那里参与交市。在北京西北位于今张家口(喀勒干)城址的城市中,乌桓人和鲜卑人于西汉末年前往那里交市,它就是建于边境上的这类大型互市中心的一个例证。该城正可能是在公元2世纪末叶由于黄巾军于184年起义造成的难民潮才初具规模。

在这些“国际”贸易交流中,很难严格地在私人的贸易以及本为纳贡的官方贸易的形式、目的在于加强把汉王朝与其近邻维持的政治和有时是家族联系的换货之间作出明确区别。商人们混入了官方的商队之中,也如同官方商队一样地利用了汉朝驻兵的保护。甚至是某些来自遥远王国的商人们竟然厚颜宣布是其国的使者。武帝时代由汉朝军队凿空西域之后紧接着便是汉族商人如潮水一般涌向绿洲地区。但无论如何,汉王朝似乎是将其整个对外政策都建立在这种贡礼和特别是珍贵物品的交换之上。汉王朝排斥了捐客商人,他们在帝国的边境上以经营汉地产品(特别是丝绸)而致富并加强其威望。汉朝人的目的主要不在于扩大他们的直接统治区,而是扩大其外交关系。所以,他们首先和最经常的是仅限于以在商队经过的要塞驻兵的方法控制通商大道。不仅仅在西域绿洲的情况是如此,那里始终都受到草原人入侵的威胁;在中国西南山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那里由土著部族的人口居住,他们的内附始终是犹豫不决的。

赏赐礼物的政策和丝绸贸易

汉王朝为了扩大在近邻中的影响、博得其邻邦对自己事业的支持和煽起敌人的分化,实行了一种摆阔讲排场和慷慨大方的政

策。这种政策以其极高的代价和系统化的特征而使我们瞠目结舌。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无疑都从未曾作出过如此努力以向其近邻奉献礼品和将赏赐上升为一种政治手段。在汉朝立国的4个世纪期间，草原和绿洲上的居民（在不太明显的程度上还有中国西南山区的居民）都获得了其总量无法计算的丝绸（这是中国的主要贸易财富）和其他中国产品。这些赏赐物在公元前2世纪初叶就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了，在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得以迅速增长并于后汉时代达到了顶峰时期。¹²²

几组数字便证明了这种增长：

年 代	散丝(斤)	成卷的丝
-51	6000	8000
-49	8000	8000
-33	16000	18000
-25	20000	20000
-1	30000	30000

公元91年，汉朝向南匈奴赏赐的丝绸数量达到10090万枚钱的价值；同一年，绿洲诸小王国获得的丝绸相当于7480万枚钱。但从公元前2世纪末张骞第二次出使准噶尔和帕米尔起，中国天朝的产品和丝绸在西域就变得特别丰富，以至于它们在那里丧失了其一大部分吸引力和价值。

大家可以估计到，汉帝国于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50年左右之间的岁收入基本达到了100亿枚钱的价值，尚不包括皇帝的一笔可达到80亿钱的私人收入的款项。然而，在这100亿钱的岁入中，有30~40亿枚都因被每年赏赐给藩部人而消耗掉了。大家可以想象对中国财富的这种重要抽取（它可能同时既会促进手工业生产又可能削弱帝国的总体经济）及其对于在西域、北印度、伊朗、地中海盆地之间贸易交流的促进作用。

如果能够确信中国产品的交易要早于由秦始皇统一中国,那末向匈奴和西域诸国的赏赐就肯定使这种现象具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经过欧亚大陆的大规模丝绸贸易在公元1~2世纪的东汉时代仍在增长。它同时涉及到了中国中原、西域、北印度、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把黄河流域与地中海联系起来的名震遐迩的“丝绸之路”途经甘肃诸城市、今新疆自治区领土上的绿洲、帕米尔、河中地、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盛产玉的于阗绿洲就位于从南方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路上,它似乎曾是丝绸集散转销的大中心之一。可以断代为西汉的一些丝绸织物残片已在位于于阗以东绿洲上的尼雅发现,这些丝绸与在大家断代为公元83~273年的帕尔米拉(且兰)墓葬中发掘到的那些纺织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不过,印度似乎经常充作中国和地中海之间的丝绸贸易的转运站。中国丝绸肯定是在四川制造的,或者是来自该地区的,从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起,在恒河与印度河平原就以Cin国(也就是秦国)产品而闻名于世。但根据某些考古标志来看,汉朝在武帝时代向西域的开拓似乎发展了中国与印度西北部的关系。然而,被运到罗马帝国的部分丝绸织物可能是直接从印度河流域进口的。由于安息人特别是纳巴泰人(Nabatéhs)对于商品课以25%的重税,从而控制了河中地、伊朗和地中海之间的贸易,罗马于公元1~2世纪时鼓励经南方而绕过安息帝国的海上贸易。此外,大家还知道于公元97年由汉朝派遣出使大秦(这是指东罗马帝国的一个名词)的副使甘英被安息人劝阻而未能继续其旅行。

如果说一大部分中国丝绸取道近东和地中海盆地,那末大家也不应该忘记它们的交易事实上一直扩展到整个亚洲,正如考古发掘所证明的那样,丝绸织物已在“丝绸之路”以外发掘出土,如在内蒙古的黑水河、位于乌兰巴托北方130公里处的诺音—乌拉、布里雅特西伯利亚的伊尔莫瓦—帕德,甚至一直到达克里米亚和刻赤。

胡族人的汉化及其内附天朝帝国

赏赐给胡族人的礼物符合一种明智和长久的政策。这里最早是指笼络吸引他们,使他们脱离统治着草原地区和西域诸绿洲的匈奴人的强大部落联盟,而长此以往,便是意欲让他们习惯于奢侈豪华生活而使他们潜移默化。

伴以特殊赏赐的豪华接待仅限于朝晋汉朝宫廷的匈奴豪酋单于或西域那些小王国的王公们。内附长安的单于们最早几次入朝参拜形成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后来,汉人由于它们招致的巨额开销而害怕这些过份频繁的会盟联姻行为。公元前3年,汉朝拒绝接待南匈奴的单于;公元45年,他们放弃了将纳贡制度扩大到准备向洛阳入供礼品和人质的西域十八国。这种制度对于汉帝国比对于其近邻更为不利。

由皇帝正式封敕官号和授印,以及承认内附帝国的所有地区一种礼仪性级别中的等级,对于藩王来说也具有不可忽略的利益。以血统关系与刘氏家族联系起来(和亲)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那种以和亲而加强政治联盟的做法后来又由许多汉族的帝国或已经汉化的帝国所沿用,一直到大清王朝时代为止。汉公主把中原天朝的风俗、习惯、文化和豪华都传入了藩邦异国。她们在这些地区的存在使那些使节们的来往变成正当的举措了。但汉代最常用的做法之一却在于向帝国宫廷遣送人质;西域诸国的王公和部落联盟的豪酋们作为内附的保证而将其亲生儿子送到京师作人质,这些人质在京师由皇帝出资而维持富裕的生活,在那里接受汉式教育,并往往都受敕封在御林军和宫内任职。他们被汉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所征服,一旦返回其国之后便成了传播汉族影响的代言人。人质制度可以确保避免断绝联盟,此外还可以成为一种最容易地介入盟国王位继承事务的手段。¹²⁴

汉王朝对军事进攻与外交活动、赏赐丝绸和其他汉地产品(匈

匈奴单于们的墓葬提供了大批的漆器、玉器、陶器、铜镜、钱币和丝匹)、封敕尊号、联姻和人质制度的长期坚持产生了效果。在汉王朝与从满洲到西域的那些由内附中原的民族形成的“属国”之间建立了经常性的关系。匈奴在公元前3世纪末创建的具有不同血统的部族联盟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开始解体。公元前61年,匈奴人分裂成了互相对立的五单于集团,其主要单于之一呼韩邪单于于公元前51年内附汉朝,从而加快了这一过程的发展速度。公元前43年,草原居民分裂成了内附汉朝的南匈奴和与汉帝国敌对的北匈奴,这种分化使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圆满告终,附近的部族和基本上相当于今天内蒙古地区的部族成了定居民社会与一直游牧在贝加尔湖以北地区的最尚武的游牧部族之间的缓冲区。公元前36年,汉王朝实际上用了一个世纪才消除了草原民族的威胁。

中国社会北部边陲的民族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西北的羌人发展很快,他们从公元前98年起就向汉朝纳贡,基本上是半定居民,在牧业和抢劫的收入之外,再加上农业和贸易岁入;而在公元1~2世纪之前的今外蒙古地区的发展却并非如此明显。蒙古东北部的民族乌桓人经常与定居民接触,很早就深受汉族的影响的渗透,大批地加入汉朝军队并于其中组成了一支骑兵部队。他们的北部近邻鲜卑人相反却始终都忠于其游牧生活方式,表现得更具有咄咄逼人的好战性。他们于公元140年入侵中原,迫使汉王朝向他们出让了一片很辽阔的土地,并于156~178年间又重新表现得活跃起来了。

汉王朝在获得了从此后置于其保护之下的一大批部落集团的内附之后,又竭力加强它对这些“属国”的控制。这些“属国”在原则上仅仅是内附者,可以自由地继续行用他们自己的而不是被人强加给的生活方式。“属国”先向军事领土(部)和后向普通行政区域(郡县)的变化始终在持续,此种变化主要是在武帝时代与公元2世纪之间延续于帝国的边陲上。从公元前2世纪末起,由内附汉朝

或被降服居民组成的普通行政区(郡县)在南蒙古、甘肃、朝鲜(高句丽)、云南、广东和越南北方组建而成。但将古老的游牧民以越来越完整的方式纳入中华帝国版图中的倾向在有汉两朝以来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这种过程受到了部族内部变化的促进:它们变得越来越富庶、其居民的繁衍增长速度,以及选择一种定居或半定居生活方式的倾向。大约在公元前 50 年左右,内附的匈奴总人口似乎共计有 5~6 万人。而公元 90 年,其人口却达到了 23.7 万人。汉族官吏们竭力使原来的游牧民转而从事农业劳动,其农业劳动对于帝国来说则是一种额外收入之源。征募古老的游牧民入伍参军的做法同时也得到迅速扩展。应征男子们的妻小都在后方被扣作人质,在他们背叛朝廷时就遭杀戮。

内附部族受到了中国官府和平民百姓的盘剥,他们要求这些部族为其效力、服徭役和纳税(所以山西的匈奴人就被太原地区的豪门富户用作农业工人,甘肃的羌人也要被迫为交通运输负担沉重的征调任务)。这些部族也在绞尽脑汁地设法动摇从公元前 1 世纪起就强加给他们的过份沉重的压迫,整个东汉王朝期间都被他们的反叛搅得动荡不安。此外,这些部族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比外蒙古的游牧民们更为容易激起不满。虽然汉朝害怕他们入侵,外蒙古的游牧民却继续从中国天朝接受丰厚赏赐礼物。

二、经济和社会

生产的飞跃、技术的进步和经商活动的发展是汉代中国的军事、外交和商业开拓的背景。历史发展的这些不同形态确实是不可分割的。但它们同时涉及到了公元前 2~公元前 1 世纪的整部社会史。

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飞跃

中国社会从公元前 2 世纪下半叶起便表现出了一种引人注目

的生命力,文献和考古的那些相互吻合的资料证明了这一切。它利用了该帝国之前两个世纪的那个富有新鲜事物的时代所完成的发展和政治统一为它带来的便利条件。

127

冶铁的发展于汉代一直在继续。无疑是必须等到6世纪才可以看到描述一种混合冶炼方法的程序,这是近代西门子—马丁(Siemens-Martin)冶铁法的先祖,但中国人是在公元2世纪就懂得用以同时加热和加工的办法冶炼的具有不同含碳量的铁来生产钢。从这一时代起,钢铁兵器便取代了青铜兵器,而战国时代普遍为人所知的似乎仅有这种青铜兵器,那时所炼的铁主要用于生产农具。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战国时代的刀剑、戟和弓弩的构件都是铁制的。老普林尼(Pline L'Ancien,公元23~79年)的资料吹嘘了由赛里斯人(Sères)生产的铁的质量,证实了汉文文献中对汉朝向西域绿洲秘密出口铁和传播冶炼术的含蓄记载。此外,炼铁手工业是这个时代最活跃和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在公元前117年建立国家对铁和盐的专营时,共由官府创建了48家冶炼厂,每家工厂都使用了从数百到上千名不等的工匠。这些工匠在私营炼铁厂中被以“童子”(该词系指少年并使人联想到了一种奴隶地位)名称称呼,他们都是从军人或刑囚,其生活状况经常迫使他们起来反抗。

除了至少在一个世纪期间未以严格的方式对盐和铁的两大领域实行国家专营之外,同时还有一些私营和国营企业并存。这就是丝绸纺织业的情况。其运营引起了沉重负担和其产品大部分都被用于向藩部民族送礼的国营作坊位于京师(长安)以及各地区。在鲁西南的齐国故都临淄,这些作坊使用了数千名工人。但也存在着一些由富商家族创办的私人企业。而主要是在四川和河南制造的漆器的情况也如此,在考古遗址中重新发掘到的几件载有主持制造它的匠师的名字,其他的器具上未带有任何标记,可能出自私人作坊。考古发现和某些文献的暗示可以让人揣测到私人企业在汉代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另外一项重要的手工业是铜业,其主要产品是铸币(私人铸币很早就遭到了禁止),此外还有铜镜。公元1世纪时,这些镜子变成了一种出口商品,大家发现其图案和铭文体裁从该时代起便发生了变化。现在,从西伯利亚到越南,甚至直到南俄罗斯,都发现了许多铜镜样品。

在农业生产和技术领域中都出现了明显的发展。铁制农具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时的质量最佳,牛拉犁的使用得到了普及。在武帝时代作出了巨大努力以增加水浇地的面积和开发中国北方的新土地。一些农业科技专家们负责传播新的耕作方法,某些官吏们极力促使从公元前1世纪末起就已经定居在万里长城之外的游牧部族转向耕种粮食作物。一种按“代田”进行轮作的方式从公元前85年起开始传播。但主要粮食作物仍为上古时代的那一些:大麦、小麦、谷子,于这些农作物中再加上大豆和当时还只具有一种相对规模的水稻。苜蓿(苜蓿草)是自公元前2世纪起从西域地区传入的,从而得以发展中国北方的养马业。 128

从王莽时代(公元9~23年)起便出现了水碓(水磨)。这往往是指一种带有水平凸轮的碓,它由一个无疑是在水流中横置装置的水轮为动力。但公元31年的一篇文献提到了在炼铁炉中使用水力来带动活塞鼓风机的情況。

在战国时代(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就出现了一种合理的套车方法,当时的两根车辕开始取代单辕木车。汉朝充分利用了在运输领域中的这种重大技术革新。但另外还必须提到一种车子的发明,其意义可能会被错误地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公元3世纪在四川出现了双轮车,但其图像则应上溯到公元1~2世纪,它是在交通道路仅仅缩小为狭窄的羊肠小道的所有地方都适用的一种工具。由于其重心位于轮轴的附近,所以它可以使人无须费多大力气就能搬运重达150公斤的负荷量。

与近代中国相反,汉代中国(这种现象在唐代仍然是真实可靠

的)拥有大量作牵引和驮载用的牲畜,如马、牛和驴。用作坐骑或套车(但也仅仅用于驮人和用于战争)的马种从公元前2世纪起就得以改良,这是由于与自大宛和伊犁河流域的乌孙领土上引进的公种马杂交的结果。至于原出西域并由匈奴人引入中国北方的牲畜毛驴,它由于其耐力和价格低廉而受到了汉代社会中所有阶级的好评。

富商和望族

公元前2~公元前1世纪时所表现出来的技术进步、生产的飞跃和商业大潮的发展不可能不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影响。作为法家传统的继承人,汉帝国极力遏制豪门富户的野心和抱负,为了其外交和军事开拓的需要而努力形成一个重要的国家管理部门(冶炼厂、盐场、丝绸作坊……)。但它只能把这种努力维持一个多世纪,放松控制的做法从公元前1世纪中叶起加快了,从后汉(公元25~220年)时代起便变成普遍性的了。只是在这个时代,定居在各个省份的豪门望族才得以形成。

但是,实在说,即使是在国家对帝国经济的控制最为有效的时期,中央政府也必然会重视当时的贵族们。从全局来看,汉代社会特征之一确实是存在着非常富裕的家族,他们把农耕事业(谷物或水稻生产、养畜业和养鱼业……)、工业(纺织、冶炼、漆器……)和商业结合起来了,拥有着充足的劳动力。在那些以农业为其主要收入的地区,富裕家族仅限于对贫苦农民施加压力,以放高利贷而导致负债者出租或出售土地。这无疑就是具有法家倾向的官吏王温舒于公元前120年逮捕和审判的那些作为农村小恶霸的千名乡绅的情况。但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所有地区,其他资源又补充了农业收入。

在这一点上,大家可以把被舆地学家们称为红色盆地的四川成都地区的形势视为非常典型的例证。它是汉代中国最富庶和最

活跃的地区之一。对盐井的开发、炼钢、生产漆器(在朝鲜西部的汉墓中已经发掘到了于四川制造的漆器,那里距成都约有3000公里左右)、锦绣以及织物、牛和铁的交易,这一切都解释了从公元前2世纪起就得以在那里形成的巨额财富。成都最富庶的望族之一卓氏家族拥有面积辽阔的耕田、鱼塘和围场。它还拥有冶金企业,于其中共雇佣800名奴婢,并在与西南的土著人、那些将头发扎成网眼状的夷人从事钢铁的交易中发财致富。汉族人与土著部族之间的这种贸易似乎经常采取送礼和回赠交换的形式,这无疑比那种依靠一部有关商品价格的准确帐目的商业交易更为符合土著人的心理状态。大家提到过丝绸和其他中原产品的一种巨额礼物的例证,其回报是用随后送去的马和牛而支付的。

但是,事实上四川的实际情况也适用于汉代中国其他许多地区,它解释了一个向帝国提供其行政官吏的富裕望族阶级的存在。该阶级远不是仅仅从事农业生产,其经济基础在更大程度上则是工业和商业。这一点肯定就是解释了汉代中国的“奴婢”数目相对较大的原因,他们都是囚犯和无偿还能力的债务人,大部分都被雇佣于大型手工业企业中。

在公元前1世纪时伴随着经济高潮的土地兼并集中,可能向公元初年左右的统治者提出了一个严重问题。篡政者王莽在公元9~23年间所不能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这也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130

自由经济还是控制经济

对于商人的仇视曾对中国社会的命运施加过特别深刻的影响和使中国文明具有一种典型特征,这一切可以通过复杂的和多种多样的原因来解释。从帝国统一之前的时代起,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传统都在对豪华奢侈和无益开销的异口同声的抨击中联合在一起了。但这种抨击的动机却根据思潮而各有不同。儒家传统抨

击的是挥霍浪费、狂妄自大和缺乏道德的标志,追求豪华的情趣在孟子的著作中就已经做为农民苦难的间接原因之一而受到责难。道家思想家们认为,豪华奢侈是诡言之源和混乱的原因,而它又被墨子的弟子们以一种严肃的理想、全面的节俭朴素和全面平等的名义进行了抨击。但这种对立仇恨的最深刻原因似乎是出自国家的统治者和政权。商业活动是社会不平衡的一种因素,因为商贾们的财富可以使他们确保其对贫穷者的统治、重新购买农民的土地,并在他们的矿业、冶金业或手工业企业中如同奴隶一般地使用那些被他们沦至赤贫的耕农。经商活动在造成无益开支的同时也背离了使国家能生存下去的基本的和必不可缺的活动:粮食的生产、为供养军队和外交活动(丝绸礼物形成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所必需的织物、开销手段和大型工程。商人和工匠们造成的损失同时是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汉代中国的气势和活力大部分都是由于自战国时代以来所实现的技术发展和粮铁盐帛的生产飞跃。使商贾们放弃这些财源或让他们对此实施专营,那就是接受了帝国的衰落和崩溃的事实。和平与统一仅仅在政权可以控制和分配主要财源时方为可能。

早在公元前199年,在最激烈的内战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简化商人们的生活排场。丝绸服装、马匹、佩带兵器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遭禁的,由此便可以得出结论:对待商贾们的严厉政策仅仅是在当时权势已经很强大的吕后即将夺取政权的时候才得以缓和。太后经常表现得对巨商极有好感并与他们相勾结,因为后宫行政机构的组织以及某些可能更为古老的传统使这种共谋变得不可避免了。然而,反对经商主义的反响仅仅在公元前2世纪末的武帝时代和在由于一种开销极其庞大的军事外交开拓政策造成的亏空逆差的压力下才表现出来。公元前119年,因此而开创了对船舶和车辆征收一种统一税。同一年建立了并于公元前117年扩大运用到了整个帝国的对盐铁实施国家专营的政策。自从战国时代开始,铁和

盐就形成了最活跃和最有利可图的两大工业,中国稍后的其他王朝都受其影响,这种措施在一段时间内缩小了那些工业和手工业主的巨商们的势力。但大家将会发现,帝国政权在武帝时代相对摆脱了巨商们可以为它提供的帮助。完全没有必要如同后来在唐、宋或明代那样利用富商们的效力,亦即授命他们确保对北方军队的粮食、草料和其他物资的供应,因为这种供应在此时主要是由屯田确保的。对盐和铁的两种垄断专营于公元前98年又由对酒的一种不太重要的专营所补充。无论如何,由国家采取的经济控制措施及其对商人的憎恶明显都与帝国的财政状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歧视经商的传统仅仅为由于当时的困难而制订的政策提供某些论据。其证据是继武帝晏驾后于公元前81年在宫中展开的是保持还是废除垄断专营制度的论辩。数十年之后于公元前73年和公元前49年之间发表的有关这些争论的长篇评论,以《盐铁论》为题而有幸为我们保留下来了。

第三章 贵族地位的上升和政治制度的危机 132

宫中的篡权阴谋

汉帝国在本世纪初叶的衰落是一种要追溯到1个多世纪之前的内部发展之结果。在公元前179~公元前141年的文帝和景帝执政年间时,皇帝的官吏、大巨和谋士们都通力精诚合作辅政,使皇权得到了巩固。许多专制倾向在武帝的漫长执政期间(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就表现出来了,它在霍光将军辅政期间占了上风,霍光是接受武帝遗诏的顾命大臣。正是霍光从公元前80年起建立了其专制,在所有的政权要职上都安插了其家族的成员。在他于公元前68年逝世之后引起的反响(公元前66年的一场大诉讼导致了对他满门的抄斩),并没有对将权力集中在皇帝自己手中的

做法提出质疑。皇权失去了由全部行政官吏和谋士们组成的支持和抗衡力量,所以它很快就成了宫闱阴谋及皇后家族之间斗争的赌注。一种专制的和强大无比的权力必然会落入宠臣、后妃和太监们的手中。前汉末年如此强大的太后家族之一成功地匡扶其一位成员登了皇位。这就是篡政者王莽,他曾创建了一个昙花一现的“新”王朝(公元9~23年)。

133 前汉崩溃的另一种同时存在的原因是农村越来越快的发展。土地被兼并到了最富裕者之手(地方贵族、商人、望族),从而造成了王莽即位时不能解决的农村社会压力和经济困难。其目的在于限制扩大私人地产的第一批诏令应断代为公元前1世纪的最后几年。它们直到公元3世纪末一直由一大批类似的诏令所继续,后者似乎也是普遍无效的,从而证明了国家在维持对小农阶级的控制和保护中遇到的困难。

王莽极力寻求以激进的措施来矫正他继承下来的困难局面。这批措施包括使所有土地和所有奴隶(这些人却代表着不足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其地位与罗马的奴隶们完全不同)的“国有化”、相继多次的货币改造和铸造旧型新币。此外,新王朝的登基也导致了所有尊号和全部制度机构的变化。这种改制的狂热既由于权力被篡夺又由于受到当时的宇宙论以及古老观念的影响而更强烈了。王莽改制是以一部后来被认为是可疑的著作为依据的,它是晚期写成的,但具有无疑是很古老的丰富资料。这就是《周礼》或《周官》,它非常系统地编制了周朝的官府表并将一整套官职划分成天官、地官和四时官等。

由王莽采取的激进措施依然无效,因为它既引起了富裕地主们的不满,又未能为农业危机提供挽救办法。继国家没收土地之后的重新分配可能无法执行,对钱币的操纵也引起了经济的全面混乱。由一位具有女巫本领的女子“吕母”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于公元17年出现在山东。此外,次年又爆发了由樊崇领导的农民起义。继

黄河下游的水灾之后,起义扩大到了整个中原。那些扮作魔鬼面庞的起义军被称为“赤眉”军。他们的宗教领袖是山东的某一位“城阳景王”,他自称与汉代的吕氏家族具有血缘关系并通过通灵人的媒介作用而表达其意愿。这场具有一种独特的政治和行政组织机构的运动的目的是确实是复兴汉室。但与这次动荡和这几次农民起义同时出现的是汉朝旧贵族和地主大家族的抵抗与反叛,它们威胁着新的王朝。正是这两种力量的结合最终于公元前 23 年取得了胜利。在篡政者失败和死亡之后,原籍为河南南部南阳地区的刘氏旧家族的代表之一夺取了政权并复兴了汉室。这位叫作刘秀的人以光武帝(公元 25~57 年)之名执政,他平息了农民起义军的残余,并摧毁了在甘肃东部由隗嚣和在四川由公孙述组成的独立王国。

复兴帝国的新基础

134

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拥有一种无特色的行政和军事组织并将之扩大到所有平定地区,而忠实于这种由国家直接控制农民阶级的政策的前汉王朝,则在不足一个世纪期间成功地排斥了那些可能会对中央政权的行动造成障碍的人,但后汉则依靠使之掌权的新社会阶层——中原和特别是河南的大地主家族阶层。从长安迁都至洛阳不仅仅可以通过位于陕西与河南关隘之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解释,还可以通过支持它的这个新阶级的存在来解释。为了反对拥有封地者、贵族和富户的势力,前汉王朝曾极力依靠大批的小农。但社会的发展、同一社会内部的迁移和起义可能适得其反地在公元前 1 世纪末和后汉时代加强了大地主们的势力,这就是皇亲国戚、地方上的高级官吏和望族。

中国的人口流动在公元 1 世纪前 25 年间加剧了。这是由于汉朝的防线全面后撤到了在武帝时代由军屯和移民开发的北方与西北地区,同时也是由于汉藏走廊地区的游牧民与山区部族定居在万里长城以外,而这些已被汉朝政府安置并受其剥削的民众经常

不断地起义暴动。人口外流特别有利于中原南部地区和四川红土盆地,在某种不及如此重要的程度上也有利于长江流域(湖南长沙郡在公元2世纪的人口普查时其居民人数约为235825人,而140年便达到1054372人的数目了)。背井离乡的原军屯中的农民寻找耕地的潮流又增加了大庄园中的劳动力。这样一来就发展起了一个依附富裕家庭的“客”户阶级,也就是一些定居的佃农、后来以“部曲”或“奴婢”之名而著称的私人卫队。国家对小农阶级(前汉的一大部分财富应归于他们)的控制也一举削弱了。后汉的缔造者即后来的光武帝是地方上的这些大地主家族的典型代表。他仅仅是在利用农民起义而经过数次未果地反对王莽的暴动之后才成功地夺取政权。他在安阳附近拥有辽阔庄园,由带城门的城墙保护,庄园内有本身的市场。一支私养庄兵在确保其防卫。大地主阶层于新王朝初期保持了一种统治地位并于2世纪时与宫中太监发生了冲突。该阶层在农业方面表现了一种首创精神:灌溉了面积辽阔的耕田、发展了牧业和养鱼业,从而确保了在混乱时期的一种彻底的经济独立。其成员中的某些人似乎积累了大量财富。当皇帝的姻亲丞相梁冀于159年被处死时,据说拍卖其财产回归国库的钱财多达30余亿枚铜钱,于此中还要减去每年近半的粮食实物税。这些拥有自给自足庄园的豪门望族已经预兆着晋代和南朝世族的出现,其势力受到了城市经济衰退的促进。

完全如同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一样,帝国与边陲民族之间的关系自武帝执政和霍光将军辅政期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帝国对于蒙古方向再也不会感到有切肤之患了,匈奴的势力自其分裂时代起就不停地衰落,而这种衰败又由于班超于公元1世纪末在蒙古和西域发动的进攻而加剧了。在那些保持了游牧民生活方式的民族与定居农业民族之间,那些被不同程度地汉化和最终定居下来的部族充当了帝国的保护。从未有人指出过北匈奴人于公元89~90年的危险入侵和2世纪时草原地区最强大的攻击。这都是

河北与山西的鲜卑人先于 140 年和后于 156~178 年的所作所为，它们似乎并未产生严重后果。相反，汉王朝与定居在中国中原的那些古老游牧部族、西部和西北部边陲上的那些定居在甘肃与陕西的古藏族山地民之间出现了严重麻烦。他们的起义在后汉王朝期间始终未停止过，在公元 2 世纪时又日益增加。从公元 107 年起，某些谋士甚至考虑（由于羌人的反叛）从西北防线上全面撤退，此防线自甘肃中部的贸易中心武威（凉州）一直到陕西西部之间的辽阔地区。这些内附帝国并被大批征募加入汉军中的藩部民是那些自公元 4 世纪初叶起形成中国北方独立王国的部族之先祖。

公元 1~2 世纪贸易关系的发展

前汉时代为了削减商贾们的势力而采取的措施似乎最终收效甚微。后汉时代对于内地与边陲地区全面放松控制、光武帝复兴时对于垄断权的分散等，加强了私人贸易和走私贸易的重要地位。胡商番客的人数似乎从来未曾像在公元 1~2 世纪时那样庞大，这些胡商番客的存在无疑解释了为什么外来影响在后汉时如此活跃。我们重新提一下，正是在这个时代，也就是在欧亚大陆上的丝绸贸易发展到最高潮的时代，佛教已开始渗透进中国。至于走私活动，它们都与对于出口那些可以称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主要是铁和兵器）的禁令有关。某些考古资料证实了文献向我们提供的内容、那些带有汉文铭文的兵器和铁制农具都在辽东半岛北部的一座可以断代为武帝时代的夷族墓中发掘出土了。1915 年在阿富汗的咀叉始罗（Taxila，白沙瓦附近）博物馆中展出了一件中国的弩，它出自于公元 30 年建造的锡尔卡坡（Sirkap）的安息人第二个宫殿的废墟之上，该弩最近已被考证清楚了。此外，由汉王朝采取的保护措施也未能阻止中国铸铁工们的技术秘密地在亚洲广泛传播。前汉末年的陈汤将军曾断言，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不久前刚刚学会制造锋利兵刃。费尔干纳的大宛国的情况似乎也如此。这里

136

可能仅仅是指从中国引入的炼铁炉。但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依据是由在于阗东部的尼雅绿洲上发掘到的铸铁厂遗址所提供的。铁工业可能在塔里木盆地一直维持下来了,其产品是在西晋时代(公元 265~314 年)从中国天朝的边陲引入的。

新帝国自创建到 184 年起义之间的发展

公元 25~88 年在复兴了的汉王朝的前三帝时代就相当于一个稳定内部和对外扩张的时代。作为王莽篡政之原因的太后家族与太监们现在都被排斥于政府之外了。在红河流域和越南中部,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土著民起义的爆发而造成的局面被马援将军(公元前 14~公元 49 年)于公元 43~44 年平息。匈奴人由于过分分裂而无法在王莽时代的内战中利用中华帝国被削弱的处境,不再对中国北方施加严重影响了。在西域,往往是由班超将军(公元 32~102 年)主动组织的远征使得汉王朝于公元 73~94 年间恢复了对诸绿洲的控制。公元 73 年于哈密(伊吾)建立了一个都护府,自公元 16 年起封闭了的帕米尔之路又重新由汉朝军队打通。西域的 50 多个小王国于公元 94 年向洛阳进贡。但汉王朝后来仅仅在 125~150 年间才恢复了对西域的统治。

京师的政治气氛从和帝执政(公元 88~105 年)起便恶化了。与皇室联姻的家族也就是被称为“外戚”的家族利用了年幼而软弱的顽童皇帝相继登基的有利条件,恢复了他们已丧失的巨大影响,这就是和帝(公元 88~105 年)执政期间的窦氏家族、安帝(106~125 年)执政期间的邓氏家族、顺帝(126~144 年)执政期间的梁氏家族。宦官们的势力也同时表现出来了。公元 135 年,他们获准收养子嗣,其权力与其财富同时获得了迅速增长。农业大庄园地主(大家提到了一位宦官的情况,他拥有 31 处住宅和 640 顷耕田)也经营大规模的贸易并拥有工匠奴婢。出自下层阶级的这些宫中仆人在朝廷所拥有的权威、他们对皇帝政策和选拔国家公职人员所

施加影响的不良后果等，都引起了大地主家族和出自这些家族的文人官吏们的强烈反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私党，宦官们于 167 年战胜了他们，其所有成员都被罢黜职务并遭流放。但这次失败尚不足以打倒那些大地主家庭，其势力在各省中尚完整无损。这场斗争直到 184 年爆发农民大起义时才告结束。一时间遭到削弱的太监们又利用农村的混乱而恢复权力，但最终却于 189 年被河南的一个望族的成员袁绍消灭，袁绍在夺取洛阳之后共杀死了 2000 多名宦官。

救世主般的革命者

公元 2 世纪末年确实是以一场极其严重的农业危机为标志的。大约从 170 年左右起，一些流浪农民集团便开始威胁地方上的平静。但时隔不久，继黄河下游的一次水灾之后，受道教影响的一场广泛的救世运动在山东与河南交界地区发展起来了，并最终于 184 年导致了一场令人生畏的黄巾军大起义。他们的首领是张角（太平道的第一位“大贤良师”，“太平道”一名使人联想到了一种实行所有人都一律平等和财产公有制的黄金时代）及其两个兄弟张宝和张梁。张角拥有一种布道人和巫医的才能，因为水灾之后的瘟疫曾肆虐于黄河下游地区。他也是一种宗教的“教皇”，其奉事之神是黄老道，这是神话君主“黄帝”与经神化后的“老子”的结合。该教派按照军事化进行组织，早在 184 年就已经拥有全副武装的 36 万名信徒。最高权力归由张角及其两兄弟组成的“三位一体”神来确保，此三人分别自称为“天、地和人公将军”（即天公将军、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于他们的麾下统率有完整等级的首领，其职务同时是军事、行政和宗教性的。道会门将其一大部分时间用于宗教活动：一连持续数日的“会”或“斋”。在这些宗教活动期间，参加者前来公开忏悔其罪孽并从事由反复和无休止的跪拜、伴奏的音乐和集体鼓动所引起的神灵附众人之身的活动。这一切有时是一些狂

138 欢场面，男女“合气”。于春分和秋分节时举行分发勇士符和具有医疗作用的魔法活动。太平道的教理宣称疾病是罪孽的结果。这种救世宗教把阴阳和五行的宇宙论与道教传统以及对黄老的崇拜结合起来，其经文是老子的《道德经》以及一种揭示了较为晚期传说的经文《太平经》。

另一种教派的组织和教理都酷似黄巾军，但其活动地域仅限于四川和汉水上游地区，它在中国西部也于同一时代发展起来了。它是由天师张道陵（张陵）创立，此人被认为能支配天、地和水神，要求其信徒们交纳五斗米，由此而产生了其道名“五斗米道”。如同黄巾军一样，五斗米道的信徒们使用了神灵附身的做法，相信神符的作用、对罪孽作忏悔的效果和疾病的宗教起源。病人必须隔离并孤立地生活在简陋小屋中。但其互助的机制似乎比较发达，能为旅行者免费提供住处和组织具有赎罪意义的修路工程。此外，个人财产的所有权似乎已遭废除。

黄巾起义在此种宗教得以立足的所有地区于 184 年农历二月间爆发了，这一年是以干支纪年的“甲子”为标志的，也就是一个新甲子的第一年。起义军以他们头扎的黄巾为标记，连克鲁豫数城，虽然在洛阳遇到了何进将军的抵抗。张氏三兄弟死后（他们于起义初期便被杀），这场运动于 185 年扩大到了把山西与山东分隔开的太行山地区，于 186 年蔓延到陕西、河北与辽东，于 188 年席卷陕西。公元 190 年左右，五斗米道的信徒们成功地在陕西建立了一个独立政权，由张道陵的孙子张鲁统治。

受军阀混战主宰的帝国

大家可以认为这个时代的皇权仅仅是在名义上存在了。实权属于曾受命镇压黄巾军的军事将领们，其中有一些参与了 189 年的事变。这些军阀计有原籍为甘肃东部的冒险家董卓、袁绍之堂弟袁术、一名太监的养孙和原籍为安徽的曹操（155～220 年）、公元

222年在武昌创建吴国的孙权之兄孙策(175~200年)。在189年处置了宦官们之后,董卓率军向洛阳进发,并匡扶汉朝末帝献帝登基。次年,其军队(如同曹操的军队一样包括有大批胡族和夷族人)洗劫并火烧了洛阳。汉朝的皇家藏书阁和档案在这次火灾中丧失,其损失似乎要比在秦始皇时代的“焚书”严重得多。但公元192¹³⁹年,也就是在迁都长安的二年之后,董卓以其凶暴和残酷而变得臭名昭著,从而遭诛。正是从此时起,曹操的势力形成了,他逐渐剪除了中国北方的异己以及在179年创建了一个独立政权的袁术,从而为一个新帝国奠定了基础,但该帝国却一直只是有限地存在于中原和北方诸省。

由于农民起义和特别是由于从190年起互相对立的军阀之间的战争造成的蹂躏,可能导致了一种城市经济衰退,在渭河流域以及豫北尤为明显。在国家亡破和军阀胜利的同时,在汉代手工业和城市大发展之后出现的这种经济衰退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汉代末年,便已经进入了中国的“中世纪”。

第四章 汉代的文明

140

五行经学

汉代出现了一种似乎曾在对预兆的解释和在讖纬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胜利。这里是指以一种对宇宙提供了全面解释的时空对应关系为基础的经学。这就是大家所说的“阴阳五行说”。五行和阴阳是存在的方式或根本力量,相继经过了发展、鼎盛和衰落时期。上古时代的易家(占卜师)学派是对六十四卦和八卦的诠释者,他们成了这些在战国时代和主要是在山东被系统化的观念之起源。最著名的理论家——齐国的邹衍(公元前305~公元前240年)似乎将其诠释方法扩大运用到了所有的知识领域;天文学、星

131

相学、舆地学、历史学和政治学。邹衍的基本理论将政权的承袭与根据一种以新破旧为顺序的五行承袭(土—木—金—火—水)联系起来。

141 这些理论在中国的所有地区都在秦王国统一时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在《礼记·月令》一节中发现的正是这些理论,其文又由《吕氏春秋》所重复,后一部著作被认为表达了当时的全部所知,综合了所有的学派。它是由吕不韦的门客们共同编写的,吕不韦是河南的富商,曾任秦公子的谋士,后从公元前 237 年一直任秦始皇的相国。吕不韦聚集成了一种私人小朝廷,包括约 3000 名原籍为邹衍故乡齐国的才子,同时还有赵国和楚国的道教天师,但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人。秦帝国的整套新礼仪都是根据与五行有关的理论以及五行、四方、星辰、颜色、音律、品德、本味、情欲、土容……的相互体系建立起来的。标志着水的基本功能战胜了火(周王朝是由此而执政的)的新王朝开国了,而帝国的全部制度都应该与这种新功能相吻合。它强行规定了旗帜的黑色、证实了法律的严肃、经常使用在长篇契约中起决定作用的数字“六”,甚至连礼帽的形状也如此。

多样化的传统

人们经常强调可能继承了秦代法家帝国蒙昧时代的“儒教”之复兴。在汉代,对经典的研究确实受到国家系统地鼓励。它们变成了一种必须定为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之源。从公元前的 136 年起,便创建了一支“五经博士”的队伍。他们于武帝(公元前 141~公元前 167 年)在位时代为数共达 50 名,在昭帝(公元前 87~公元前 74 年)时代为 100 名,在宣帝(公元前 73 年~公元前 49 年)时代为 200 名。他们的人数在后汉时代更多,可能在宫中和在政治制度中施加过一种相当可观的影响。在大众伦理方面,汉代的重点也确实放在了尊长和敬老的道德上。孝变成了选举官吏的标准之一,与

此相违的行为都要受最严厉刑法的惩处。为了祭社神而举行的村社会议受到了鼓励,因为大家将此视为一种加强社会凝聚力的手段,并使人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以年龄和由国家封敕的尊号(而且这一切也似乎完全符合法家传统)为基础的等级制。

但我们应该避免作出与时代精神相矛盾的截然区别。在战国时代末期和汉初的第一个世纪中,事实上很难在阴阳专家、巫师、道教徒、精通周代古文献的文人(这些学者们分别被以“方士”、“术士”、“道人”和“儒”的不同名称称呼)之间作出区别。曾经驱逐了说客、辩士与理论家的秦始皇也依然保留了由七名代表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一个国学,它已经是汉代建立太学的先兆了。大家完全有理由坚持认为,这个时代的皇帝及其统治阶层对于道教观念和修持术的狂热与对于确立“儒教”正统的关注同样大。 142

在秦始皇时代非常强大的道教思潮于汉代仍然在继续。这就是对于根据不同的修持术(炼丹术以及营养、性合、呼吸和运动等修持术)的方法而能使人实现身体的生命得以延存之秘诀的信仰、相信在岁月的流逝中以不同身份表现出来的仙人的存在、相信位于东海中的福岛。山东和河北沿海的道教巫师(方士)于汉宫中保持了他们在秦始皇身边所拥有的那种权威。道教得了惠帝(公元前159~公元前157年)、文帝(公元前180~公元前157年)的娘娘窦后、诸如《新语》作者陆贾(高祖时代,即公元前206~公元前157年,《新语》是一部于其中解释了秦亡汉兴的神秘原因的著作)、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以及撰写过一部叫作《太玄》的道教著作的杨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那样的文人士大夫们的青睐和庇护。道教哲学于公元前2世纪末在淮南刘安王的宫中颇为时髦。

人们还知道道教的宗教形式在民间的作用和重要地位。最近和最强大的道教运动——黄巾军和五斗米运动于公元2世纪末不仅以一种千年理想国,而且以一种有组织的教会、一种宗教崇拜仪轨和一种伦理教义的存在为特征。然而,这些民间思潮的影响通

过那些出自民间的皇后与嫔妃们的媒介作用而一直渗透进汉宫中了。在黄巾起义爆发的开头几年,对黄老的宗教崇拜传入到宫中,而道教也以一种政治理论的形态出现,遂以“太平”一词使人联想到了某种完美的和谐状态。

因此,人们既不能为“儒教”保留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又不能避免强调汉代文化生活那惊人的特征。

谶纬学的发展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时代的整个思想都充斥着五行经院哲学。在同一领域中,在秦代和继此之后的时代之间从未有过断裂,而只有承袭。如果允许谈论经学和“儒教”的一种复兴,那么这种复兴就是在阴阳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因此,它具有深刻的新颖特征。

五行经学确实能够作为对经典作一种新诠释的基础,这些经典是由口头传说保存下来的,从公元前2世纪又重新出现了。这个疏证新学派的创始人是董仲舒(约为公元前175~公元前150年),其主要著作《春秋繁露》既是对《春秋》和《公羊春秋》的疏证,又是对他自己理论的阐述。但董仲舒的根本灵感启发则是借鉴于阴阳和五行经学。阴阳五行既是宇宙之苍穹,又是伦理、社会和政治秩序之本原。

经典是上古时代受崇拜的著作,是著名圣贤们的作品。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心目中,它们会被认为包括一种秘密学问,对它们的诠释只能属于世代相传其奥义的那些专家学派。自邹衍时代就风靡一时的宇宙论是一种传统的诠释,既能满足这种似乎是当时之基本特征的综合概括和全面诠释的需要,又能满足经典疏证者们的关切心情。这样大家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些由于过份简练而往往是晦涩难懂的文献很早就被认为是预言集,为什么谶纬在前汉时代与日俱增。谶纬中有大量关于数字、吉凶预兆、天界与地域之间关

系(分野)、历史事件和王朝承袭的思辨。它们非常注重天地之象征性的图。其中最著名者是由神龟为禹帝送去的《洛书》和由出自黄河的龙马送给神话君主伏羲的《河图》。它们形成了两种重要谶纬的内容(《河图纬》和《洛书纬》)。

谶纬学诠释和预言占卜之风潮,使为政治目的而利用征兆的做法,大约于公元初年前汉末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倾向对于科学知识并非毫无影响。对于天象观察的关注确实是相当古老了,但人们仅仅是从公元前 28 年起才掌握了对太阳黑子的一种系统记述,其测量对于今天的天文学家们并非毫无意义。也正是在汉代,张衡于 132 年发明了世界史上的第一台地震仪。由张衡设想出来的仪器可以使人在理论上确定作为天象无常标志的地震之方位。据说它预报出了发生在甘肃的一次地震。此外,人们还注意到了汉代天文仪器的迅速发展,这种发展从由耿寿昌(约为公元前 75~公元前 49 年)发明并于公元前 52 年呈奏皇帝的浑仪开始,一直到由张衡创造的浑天仪。浑天仪带有赤道圈、黄道、正中面和横面,已被断代为公元 124 年,132 年又为它配制了一种受漏刻控制而昼夜转动的机制系统。

经学与时代现实的关系

144

由于五行经学或至少是它的基本类别(五行)和基本对立(阴阳)对所有思想都实施了一种真正的统治,所以它出现在预兆的解释者、经典的注疏者、道教传统的思想家(成书于公元前 2 世纪末的那部具有道教和神秘倾向的《淮南子》,完全如同董仲舒的著作一样充满了这种思想)、直至在那些谴责玄学的弊端与过份迷信的人中了。

大家可以思考这样一种成功的原因。很可能是企图对宇宙提供一种全面解释的经学的发展受到了政治形势的促进。似乎并非全无可能的是,随着帝国的创建、郡县等行政区制对古代的诸侯国

的取代以及对城邦豪首先祖崇拜的绝灭，政权似乎失去了任何宗教基础，它感到了依靠一种具有巫术特征的宇宙论（其主要内容均借鉴自上古时代的思想）的需要。这些因素当时都被纳入到同样也是千差万别的思想体系中去了，这些思想体系中既有五伦或五常之连续性的理论，它解释了以新道德对旧道德的破除；又有与之截然相反的理论，后者认为新道德是从旧道德中脱胎出来的。如果它符合那种认为国王的活动是如同整顿天下秩序一般地设想出来的非常古老的传统，那末其背景在帝国时代却完全不同了，此种背景就是那些理解了古代礼仪的巫术—宗教意义的法学家们的法律和积极措施。秦始皇本人自认为是创世神和造物主，他将其规范准则、度量衡、新文字强加给了社会，故赋予了社会一种形态，同时他还创设了一种连续的爵位等级并设立一系列奖惩等级，从而塑造了社会。

在阴和阳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理论的影响下，法家人物作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享有特权的工具，而设想出来的制度又由一种巫术—宗教意义所丰富，刑罚均为凶事，宽大的赦免都是吉事。皇帝有权根据其意愿而确定宽严的幅度，以使凶和吉都不会以其过火行为而危及宇宙的和谐。在一个被设想的宇宙帝国中，君主及其官僚们于他们的郡县中是一种全面秩序的鼓动者和负责人，而这种秩序又是由五谷丰登、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既没有互相诬蔑又没有战争和抢劫行为的形势表现出来的。

各学派之间的争鸣和各种倾向之间的对立

西汉时代经文传统和疏证学派的多样性可能是相当简单地被归结为两种突出倾向的对立。当大部分疏证经文的人以通过口碑渠道而流传下来并在当时记录成文字的文献（今文）为基础时，某些在帝国形成之前以“古文”写成的经典抄本也都被重新发现了。这些考古发现可能会引起一次争论，其意义要远远超过文献真实

性的唯一问题,其反响直到 19 世纪中叶才使人感觉到。第一次重大发现几乎可以肯定地要追溯到景帝时代(公元前 156~公元前 140 年),或者据其他人认为仅仅断代为公元前 93 年。《尚书》、《礼记》、《论语》和《孝经》与新文本的抄本都在孔府的一堵墙中发现了。大圣师家族的后裔之一孔安国在武帝时代(公元前 141~公元前 87 年)是第一位对这些文献感兴趣的人,据说其释读具有很多的困难。但这些古文文献的专家们似乎很快就于其周围集聚了所有那些反对作经文式诠释并拒绝把经典视为预言集的人。如果说大家似乎可以把“今文”文献的支持者们与那种邹衍曾为其最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齐国星相和占卜传统联系起来,那末他们的反对者则更应该是与大圣人的故乡鲁国的伦理和礼仪(但更应该是唯理主义的)的传统联系起来。然而,新的倾向可能推迟出现了。当公元前 51 年在宫中举行对立学派代表人物大辩论时,董仲舒的解释获得了胜利。在西汉末年,“古文”传说的支持者,如皇家文阁的目录学家和帝国统一之前的古文献的刊布者刘歆(公元前 32~公元 23 年),却显得孤立了。当时,反对意见不仅仅涉及到了同一部文献的不同文本,而且也涉及到了其学说内容不同的著作,所以《公羊春秋》就成了“今文”的典型著作,这是由于董仲舒对此表示的关心及其谶纬学的背景。但当左丘明的巨帙编年史《左传》被认为是对鲁国编年史《春秋》的疏证文时,《周礼》却成了“古文”的典范著作。篡政者王莽对“古文”传统支持者们的偏爱在汉室复兴时可能恰恰对他们造成了损害,但这场运动很快就向广度发展,东汉时代最著名的疏证学家便以“古文”文献为其研究的基础。《左传》、《周礼》、《国语》的疏证者贾逵(公元 30~101 年),在其诸多著作中特别是写了一部对鲁国国史三种疏证文之比较研究著作《春秋三传异同说》¹⁴⁶的马融,人们应将《诗经》、《仪礼》、《周礼》和《礼记》、《论语》和《尚书》的疏注文归于其名下的著名学者郑玄(127~200 年)等人的情况均如此。东汉时代,“今文”传统的唯一一个重要代表人

物是何休(129~182年),他的著作涉及到了对公羊的诠释,但他的理论却遭到了郑玄的批驳。最早用古文汇辑起来的文献在汉代之后最终被人接受了,特别是在457~465年的刘宋王朝和长江流域的中国梁王朝(502~557年)更为如此,后来在隋帝国(581~618年)中也如此。“古文”的胜利导致汉代浩繁的讖纬文献几乎全部灭迹了。直到18和19世纪,某些学者和哲学家才敢于无所顾忌地为一种已遭人遗忘的传统恢复名誉,这就是董仲舒的著作、《公羊春秋》和何休著作所代表的那种传统。

对古文文献的释读无疑是对金石碑刻重新产生兴趣的原因。第一部汉文字书(因为大家不能把《尔雅》视为这样的字书,它是在帝国形成之前的一个不为人知的时代问世的,表现得如同是一部百科全书性的著作和一系列的诠释)出现于公元100年左右。这就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其中分析了组成在帝国统一之前由李斯设想出来的比较古老文字的简单和复合偏旁首部。这部字书著作共包括分布在540个首部之下的9353个文字。

从前汉末年起形成的古文传说的唯理主义的反响,无疑应与在古文传统的支持者中表现出来的倾向相联系。它可以由诸如《赋》的作者和《易经》专家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音律专家和博学家桓谭(公元1世纪初),特别是一部有关批评其时代的迷信的巨著《论衡》的作者王充(27~97年)等人得以阐明。这些作者们肯定不会超越其时代的思想范畴(阴和阳、天和地……之间的对应和对立体系),但人们不能否认他们对于逻辑推理具有一种敏锐的意识和对于合理解释具有一种强烈的兴趣。王充对于物理学、生物学和遗传学问题极其关注。如果说他有时也求助于古人的权威,那么他更愿意使用实验手段并力图仅仅通过自然原因来解释自然现象。王充如同桓谭一样也是唯物主义者,他不否认人死后可能不再有任何东西存在了。完全如同火需要柴薪一般,思想、意识和感受也不能独立于身体而存在。在批判其时代的一种特别强烈

信仰目标“命”之概念时，他却把人类命运的多样性视为三种独立因素之结果。这三种因素就是天生的博学与文化爱好、形势和事件的偶然性，但也有（王充由此而表现出了他该是多么受其时代的束缚啊！）从人一诞生就对他施加的星辰影响。

经学的鼎盛与汉末文化的复兴

147

经学在后汉时代放射出了最强烈的光芒，这是由于当时有一些著名的注解者。如马融（公元79~166年），他对鲁国编年史的三种疏证文（《公羊传》、《谷梁传》和《左氏传》）作了一种比较研究。此外还有大名家郑玄（127~200年）。由蔡邕（133~192年）编纂的《六经》（《易》、《书》、《春秋》、《礼》和《乐》）的全文，于175年镌刻在京城 的碑上。人们在此后的很长时间之前未曾发现过如此有利的形势，因为经学和“儒学”即将进入一个漫长的衰落和沉寂的时代，它事实上一直持续到11世纪的一种新伦理哲学和玄学的发展高潮期间。

汉代末年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已经促进了某些新倾向的出现，它们是以恢复战国时代的传统为标志的，如庄子和老子的哲学性道教、墨子学派的正名论和辩证法、法家。如同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一样，思想家们似乎被分成了两种反衬对比的态度（即“自省”和向往一种强制性的秩序）和两种选择（即无政府状态和专制）。这样一来，王符（约为公元90~165年）的《潜夫论》（其书标题恰恰使人联想到这种拒绝陷入腐朽堕落世界的行为）是对当时政治风气以及商业与手工业占据的过多地位的批评。法家理论之复兴的影响于其中已经令人感觉到了。但崔寔（约为135~170年）的《政论》又是一位坚信以不顾忌法律上或事实上的特权来严厉执法以加强国家之理论的支持者的著作。

汉末表现出来的新倾向在公元3~4世纪时充分发展起来了。当时正开始形成一场后来统治了中世纪整个中国思想界的大规模

宗教运动。公元4~8世纪的中国即将成为一个佛教文化的中国。

作为综合和政治与伦理反思的史学的出现

148 自战国编年史开始的历史编纂学传统的缓慢发展以及最早的青铜铭文时代(公元前9~公元前8世纪),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才最终产生了一部综合性著作,它就是中国最大史学家之一的著作。司马迁(公元前135?~公元前93?年)的《史记》继续了其父司马谈的著书事业,它利用了过去所获得的全部资料并于同时提供了长长的一系列官修史书的第一种体例模式,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汉—满族的大清帝国时代。司马迁继承了战国时代各种编年史那非常明确具体的年代框架(按照皇帝在位年号的年、月、日的顺序记载),从而确保了中国的史学家们的著作那令人注目的明确具体特征,从最早的那些已作出断代的事件(公元前841年)一直到近代始终如此。他同样也继承了这样一种古老的习惯——严格地转载皇权正式文献的文本。最后,他吸收了记述艺术、在外交召对和战国时代的学派争论中经发挥的故事与言论的大部分内容。尚未被遗忘的整整一大批口碑文献就这样在汉代被汇辑起来了,如很快就被做为鲁国的编年史《春秋》、《战国策》和《国语》的解释与疏证的左丘明的巨帙编年史。司马迁利用了中国文学史上最美的文风之一和综合概括的一种巨大力量,根据口头传说、文献、档案和同代资料而首次对自起源以来整部中国社会史都作出了梗概性描述。《史记》是一部具有政治和伦理感想的著作,它启发了此后晚期重要断代史的作者们,也就是自公元82年由班固及其妹班昭修成的《汉书》开始的历朝断代史的作者们。所以大家便在这些著作中发现了由司马迁采纳的三种主要分类:帝王纪、志(有关礼、乐、历书、百官、地理、兵、河渠、食货、刑法……)和传(其中包括了有关藩邦的某些非常珍贵的资料)。

散文在诸如司马迁、贾谊(公元前 200~公元前 168 年)或董仲舒(约为公元前 175~公元前 105 年)那样的大作家、史学家、政论或帝王纪作者们的著作中似乎达到了其充分成熟的时代。散文同样也适宜于论述、记叙和演说,它恰恰是以其既严格又优雅、既灵活又能追述的简练特征而负盛名。它似乎是利用了战国时代千差万别的体裁中作过尝试的一切不同经验。柳宗元和韩愈于公元 800 年左右希望推崇的,以及明清两代作家们竭力模仿的,也正是这种散文。

宫廷文学

公元前 2 世纪的王宫,尤其是梁、吴和淮南王宫以及皇宫都是一种文学、科学和艺术活动的中心,这里尚未提到战国时期的那些诸侯国的王宫。国王和皇帝于其周围有一支艺人、眩人、舞伎、卜师、文人和学者的门客队伍。正是公元前 122 年因反叛而被处死的淮南王刘安的门客们纂写了一部具有道教倾向的著作,其书名为《淮南子》。但它却以其深刻性和严肃性而成为一种特殊的例外情况。当时的基本倾向是宫中生活的消遣娱乐和文雅考究,它解释了一种后来于公元前 2 世纪~公元 3 世纪之间得到了特别发展的体裁。赋派生自楚国的抒情诗“楚辞”,它显得如同是一种采取韵律文风的描述,有时其范围很广,以狩猎、猎场、宫殿、王宫和皇宫中的游戏娱乐为内容。此外,这种未被中国传统分类为诗歌的体裁又以其夸大、夸张、抒情为特征,同时又以其简练、词汇的深奥和考究为特征。它在汉代特别受到青睐,以至于没有任何文人不试图以此而名扬四海。赋的最著名的作者是贾谊(其著作都是他在湖南流放期受对大诗人屈原的怀念之激发而写成的)、四川人司马相如(公元前 179?~公元前 117 年,他的赋后来受到了许多人的模仿)、另一位四川人杨雄,还有著名的《两都赋》的作者——史学家班固。这后一首赋稍后又由天文学家张衡(公元 78~139 年)于其《二京赋》中

模仿。

这些文雅考究与对于民间诗歌、音乐以及由武帝时代的大开拓开始的一切来自异国之物的突出爱好兴趣并不矛盾。汉帝国是由平民创建的，它长期以来保持了其出自平民的遗风。为了谱写对于皇家太庙的新赞歌，于公元前 120 年设立了一个乐府，其任务是搜集民间和具有异国情调的音乐与歌曲。农民歌曲、舞蹈、西域胡乐和乐器就这样得以大量地传入当时的文化界。这个机构于公元前 7 年在仇视新生事物的正统文人的压力下被撤销，它可能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一种深刻的影响。一种新诗体——五言（后来从西汉末起是七言）律诗的古诗在公元 1~2 世纪期间出现了。这种新诗体向民歌借鉴了其最早的内容，它后来具有一种神奇的前途并可能在经过长期发展之后导致了律诗，其规则是在唐代（7 世纪）确定下来的。那些令人赞不绝口的《古诗十九首》就是中国古典诗歌那长期而颇具权威的历程中的第一座里程碑。

民间传说、巫术和宗教性的道教以及外来文化对于汉代艺术那种非常强烈的影响解释了它的气势和生命力。这些优秀特征也出现在于朝鲜、满洲、河北和山东发现的壁画、墓葬与庙宇的碑中镌刻的人物画面、柱廊（山东、四川和河南的雕刻）上，以及特别真实和栩栩如生的墓俑（各种人物和建筑图案）中。

于汉代末年开始的时代以其某些表象而与我们欧洲的中世纪颇为相似。它从一开始起就以国家的衰落、城市经济的崩溃和帝国的解体为特征。当这个时代中国社会中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华北地区于公元4世纪初分裂成许多个其统治阶级为胡族血统的王国时，一种唯恐失去其特权的强大望族却在长江流域中形成了，而且还将其意志强加给中央政权。在文化领域中，汉代那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已被完全遗忘，经典文献再也无人研修了，而同时又出现了一些个人主义的倾向和一种文学艺术的纯美学观念。中国的中世纪也是一个宗教极为虔诚的时代，大家甚至可以说这个时代的中国是佛教国家，就如同我们欧洲的中世纪是基督教国家一样。

但相似性无疑仅仅到此为止。因为在中国北方于很早的时候(从5世纪中叶起)就出现了中央集权国家的一种复兴，而长江流域的南朝时代在文学、艺术和思想方面则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此外，从5世纪末开始的商业经济的复兴却导致了南方贵族的迅速衰落，他们在6世纪中叶的战争期间消失了。这可能会在北方促进国家权力的巩固。如果说气氛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汉代和东晋南北朝时代(317~589

公元 220~589 年纪年表

中国北方		四川	长江流域和华南
三国(220~263年)			
魏(曹魏), 洛阳, 220~265年		蜀汉, 成都, 221~263年	吴, 南京, 222~280年
于 263 年吞并蜀汉 →			
西晋, 都洛阳(265~316年)			
于 265 年继承曹魏			
于 280 年吞并吴			
于 317 年撤退到南京			
东晋(317~420年)和南北朝(420~589年)			
五胡十八国, 304~439年		成—汉, 成都, 304~347年	吴(222~280年)之后, 东晋, 317~420年, 立都南京
北魏(拓跋魏), 386~535年			← 于 347 年吞并四川
439 年统一中国北方, 从 493 年起立都洛阳			宋(刘宋), 420~479年
			齐(南齐), 479~502年
中国东北	中国西北		
东魏, 534~550年, 立都鄴(河北南部)	西魏, 535~557年, 立都长安		
北齐, 550~577年, 立都鄴	于 553 年吞并四川 →		
	北周, 557~581年, 立都长安		
	← 577 年吞并北齐		
	隋 581~618年		
	581 年在长安继承北周		
	于 589 年吞并陈 →		

第一章 胡族和世族

概论

从汉末到隋唐统一帝国之间的持续时代(即从公元 3 世纪初叶到公元 6 世纪末叶)的历史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于最好是对事件的纵横交错的纷繁性保持某种距离,以强调突出某些基本的持续性。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到了中国北方,其余的则涉及到了长江流域的中国。

1. 游牧民的定居化过程从前汉末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瓜分了中国北方或于公元 3~4 世纪之间成功地统一了中国的各王国和帝国。内蒙古、满洲、中国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向定居民的这种缓慢而复杂的变化过程,是直到近代的东亚史上的一个恒量或常数。

2. 中央集权制和国家控制的倾向似乎与抵御草原入侵的问题相联系,但也与移民拓殖、分配土地和干旱地区灌溉的必要性相联系。它们始终存在于中国北方,特别是中国的西北方,从秦汉直到隋唐时代均如此。这些倾向既是曹魏国中又是北魏国中所特有的现象。国家在分布居民以及社会和经济组织方面都应扮演一种积极角色的“法家”倾向,似乎是中国北方的典型特征。 155

3. 在中国北方建立政权的另外一种特有倾向是其军事上的扩展政策,它是由草原地区的威胁所激起来的。曹魏王国、建立在渭水流域和甘肃的“五胡十六国”、公元 5~6 世纪的北魏和北周帝国都将其目光盯住了西域、蒙古、满洲和高丽,完全如同在它们之前的秦汉帝国和继它们之后的隋唐王朝一样。它们的外交和军事活动的目的在于加强其对付入侵的防御体系和控制通商大道。

南方地区也具有有一些典型特征,这就是直到 6 世纪都相对稳

定。

1. 内地的傣、藏—緬、苗—瑶族，可能还有孟—高棉以及沿海的马来—波利尼西亚族的土著居民在那里占有最大部分的领地，属于汉语和汉文化的居民当时刚刚开始长江流域的平原上、杭州湾的南部海岸和广州平原中居住繁衍。这些具有不同和独特文化的民族遭到大量杀戮，被驱逐到了深山中，并被征募和收编进中原汉族的军队中。由于当时缺乏劳力和兵源，再加上汉族贸易的渗透，他们都被缓慢地汉化和同化了，同时由汉人控制的地域也在扩大。汉人和土著民的这些接触形成了互相借鉴之源，其尚不太为人所熟悉的规模似乎是相当可观的。

2. 汉族人向长江流域和华南的移民是经过几个相继的高潮而完成的，新移民和老聚落民之间的对立竞争制造了一些只能逐渐克服的困难。在所有的情况下，最早建立的聚落都极力强加给新来移民一种较低的地位。

3. 长江流域和华南那很小的人口密度、他们那相对的贫穷性（商业活动仅仅在南朝末期才开始发展，水稻种植技术的进步仅仅是在公元7~8世纪的唐代才产生）、这些地区的遥远距离及其移殖民的特征，与一种似乎曾是引人瞩目的稳定社会—政治形态并非风马牛不相及。中央政权的衰弱和世族的强盛形成了汉末与陈朝崩溃之间在南京建立的诸帝国的典型特征。从公元4世纪到6世纪中叶，人们发现了一种世族贵族（门阀）的诞生和发展，他们只在彼此之间通婚，掌握有最重要的官职衔位并设法迫使中央政权承认了其特权。

156

四川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岷江流域红色盆地的情况就很特殊。那里由于其土地肥沃、气候、矿产资源与商品集散地的地位而非常富庶，成都平原位于通向云南、缅甸、印度西北部、贵州和广东、长江流域、汉水上游和渭水盆地、青海与西域绿洲诸条道路的交叉路口。该平原及其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相对偏僻性解释了它那非常明

显的自给自足的倾向。成都平原事实上仅仅通过很难进入却容易控制的两条主要道路与楚秦古国之地相沟通。向北是把四川与渭水流域联系起来的狭窄山道；向东是夹在危险激流中的山峡之间很狭窄的长江水道，形成了进入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唯一进口。这种奇特的形势解释了为什么除了在许多完全独立的时代之外，四川有时要依附建立于渭水流域的政权，有时又从属于长江中下游的王国或帝国。所以，大家在那里发现了与中国西北和长江流域不同的影响。

四川在公元 25~36 年间的赤眉起义时独立于中原王朝，后来在 180~215 年间当张道陵及其孙张鲁在那里组织了一种宗教国家时又重蹈覆辙。继延存于 221~263 年间的蜀汉王国时代之后，四川在 304~347 年间于一个出身于古藏族氏族的山民统治下，又经过了一个新的独立阶段，这就是成汉王国，为“五胡十六国”之一。

一、从军事专制到无政府状态(190~317 年)

三国时代，中国北方的曹魏王朝

虽然汉王朝于公元 220 年前尚未灭亡，但曹操从公元 3 世纪初年起就在渭水流域和中原执掌实权，大家可以把魏王国(220~265 年)的开国时代定为 210 年。当时，曹操以有利于他的形式而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他的野心促使他去征服长江流域，但公元 208 年爆发在湖北长江流域的著名战役赤壁之战标志着对他这种扩展政策的遏制。孙权(185~252 年)和刘备(161~223 年)的联军迫使曹操遭到的失败，形成了中国分裂成三国的三足鼎立局面之前奏。这三国就是曹魏、由刘备建立的蜀汉(221~263 年)和由孙权建立的吴国(222~280 年)。

157

曹操实施的政策与以汉末文化界的强大力量形成的倾向相吻合，这种倾向是典型“法家”的，也就是中央集权和专制的。曹操建

立的政权具有一种军事专制的表象。这种新政策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创建了大批屯田。在一个农民起义和内战导致农业生产的明显衰退的时代，这种制度符合经济和税收的需要。所以，曹操创设的屯田与西汉时代的屯田不同，它们并非始终都由农业屯卒而是由失去土地的农民居住。这些屯田并非全部位于北方边陲，而是一直扩大到了帝国内地。在豫东有些规模很大的屯田包括了数万人口，人们甚至在淮河流域也会经常发现这类屯田。屯田客要被迫接受一种准军事组织，从国家手中接受农具和耕畜。

农屯的创设和扩大有助于启动经济和加强防御。它们与一种巨大的重建努力同时出现：排灌水工程、建造水库等……但它们也有一种更为重要的目的——重新掌握那些摆脱了国家控制并趋向于定居在地主富户家中的流民。曹操是一个太监收养的孙子，与汉末的望族没有任何血缘联系，他设法以损害那些在 189 年杀戮宦官之后立即强行登上舞台的乡绅大家族的利益为前提而加强自己的势力。

曹操的军队最早是由雇佣兵、旧土匪和流民、汉人和胡人（匈奴、鲜卑、乌桓、羌）的一种大杂烩组成的。他正是依靠这些军队而获得了其全部权势。为了确保其正在形成的帝国能有正常的征募兵员，曹操设立了职业士兵家庭“士家”，他们只能彼此之间通婚，慢慢地也可能会形成一种军事等级或种姓。完全如同过去在秦朝一样，征战的天职受到了授予尊号和物质利益的鼓舞。但曹操根据更广泛地利用在中国北方定居的旧游牧民的作用而重新改组了其军队，正是他们为他提供了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最熟练的骑射手。大量的征募以及对于草原部族的偏爱（曹操允许一大批匈奴人长期定居在陕西的东南），加快了一种同化过程。在 4 世纪初叶，当已经汉化的旧游牧民在中国北方形成独立王国时，这种同化的影响已大白于天下了。

曹操政策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加强了刑法，这是对后汉时产生

的法纪松弛作出的反响。正是在曹操死后由其子曹丕于公元 220 年宣布登基而创建的曹魏王国中,对在汉代4个世纪中所完成的法律事业作了首次总结。魏国的“新律”在中国法律史上标志着一个重要时代。它启发影响了于泰始年间的 268 年颁布的《晋律》的编纂者。《晋律》要比汉律详细得多,凡 2926 条。它后来又由两位著名的法律诠释人作了疏议,这就是杜预(222~284 年),他是一个以其工匠之才能和注疏《左传》而闻名的人物;另外一个人是张斐(生卒年月不详)。

曹操及其继承人的大业之特征是对政权的效率及政治集中的关注,这一切都表现在选择一种晋升官吏的新制度中,其目的在原则上是惠顾优者和确保公正的选择,其具体做法是把所有官吏们分成九品。

但这种制度很快就变得有利于那些得以在军功中出人头地的世族了。事实上,对于曹氏家族的危险恰恰正出自这个新阶级。如果根据司马家族的例证来看,那末这个阶级的上升似乎是相当快的:司马炎,其祖父曾在四川主持了对蜀汉的多次远征,摧毁了由公孙氏在辽东建立的独立国,其父组织了魏国的军队并统率这支军队于 263 年灭掉蜀汉帝国的军队,两年之后便在洛阳夺取皇权并创建了新的晋王朝(265~316 年)。

蜀汉国和吴国(四川和长江流域)

四川和长江流域的两个短暂帝国的诞生不仅可以通过汉末的动荡与经济的衰退来解释,还可以通过其地理和社会特点来解释。这就是长江下游平原上的汉族拓殖地的分裂使孙氏家族(仅仅是与曹操相对立的军事将领或军阀)的斗争具有了一种独立战争的意义。所以,吴国中江南(该词系指位于长江下游以南地区)望族的影响无疑解释了 229 年的迁都,其京都最早建立在长江和汉江的汇合处武昌,后来迁至南京。从黄巾军起义时代起,这些富裕的移

民家族就动摇了中央政权的监护。他们为了自己的防御组织起来，并且可以根据需要而向山越人求援，山越人是被天朝的移民驱向高山的土著人和前往那里寻求安身之地的流民。为了使在长江流域出现一个独立国，只要华北的动乱加剧和军民共同联合起来就足矣。

159 一种类似的现象也可能出现在四川。四川是一个富裕而又相对偏僻的地区，那里的土著居民同样也很多。它受惠于汉室帝胄刘备的威望及其丞相诸葛亮(181~234年)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当吴国受到长江流域最强大望族的一种联盟之统治时，在四川却是中央集权的倾向取得了胜利。蜀汉如同魏国一样是一个受“法家”大臣们统治的国家。然而，其势力在诸葛亮死后被削弱了，并于263年终被魏国吞并。

内战和汉化雇佣军的反叛

司马家族的掌权证实了司马、崔和夏侯氏……等望族掌握国家权力的胜利，可能使政治集权的努力变得更困难了。司马家族在夺权之前就致力于取消由曹氏家族创立并作为其权势之基础的屯田。所以，新帝国为了加强自身力量而采取的措施(颁布一部新刑法，阻止望族垄断政治和行政职权、限制大庄园的面积和属户的数目)本身就显得根本无效。从该王朝创始起，27名皇亲(尚不包括“外戚”)都享有巨额俸禄(最高级别者可获数千农户之税收)，有权在敕封给他们的疆土上任命自己的官吏并被允许维持其数目为1500~5000名的府兵。在10年之前于279~280年成功地把长江流域(吴国)统一到帝国版图之内的吴帝国的缔造者，于290年晏驾时，一个贾氏望族的上升导致了贵族及其在各地之门客们的分裂。动乱从291年一直持续到305年并引发了一场真正的内战，它以“八王之乱”而著称，在7年间使宗室诸王们发生内讧。形势从6世纪最初几年起急转直下，而且是继已遭内战蹂躏的地区发生饥

荒的旱灾和蝗虫侵袭之后。此外，定居在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并被大批征募入伍的山地民和牧民利用全面的混乱而反叛，而且还形成独立的政治实体。从 304 年起，一个古藏族的氏族家庭在四川创建了成汉王国，而陕南的匈奴人宣布独立并采取了同一个朝代的名称——汉，后来又称作赵。公元 311 年，匈奴人的首领刘聪夺取洛阳，长安于 316 年也在另外一个名叫刘曜的匈奴首领的攻击下陷落。这就是西晋那短命帝国的末日。

公元 4 世纪初叶，饥荒以及政治、经济和行政方面的混乱肆虐华北，在那里爆发的部族起义又引起了汉族居民的大批外流。当东晋王朝于 317 年在南京（建康）建国（该王朝似乎在 309 年左右就达到了其鼎盛程度）之后，这种局面仍在持续。难民潮是以两种平行潮流发展的，其一是从河北和山东向淮河流域、长江下游、浙江和福建流动，其二是从陕西和山西向长江中游、云南和越南的红河流域流动，但河北的少量难民也流向了南满。共有 100 多万人口就这样于公元 4 世纪前四分之一年代迁移了。在这种促进了汉族居民区扩散的现象中（正如历史上的其他大危机所造成的那样），非汉族居民的活动似乎只起过一些次要作用。此外，如同大家有时所做的那样，把公元 4 世纪初叶中国北方胡族人的起义爆动与欧洲在一个半世纪之后所经历的那些大规模入侵相比较则不完全正确。事实上，并非是异族入侵引起了晋王朝的崩溃和其他几个汉族王朝向长江下游的撤退，其原因首先应该是混乱和灾难。胡族人仅仅是利用了这种无政府局面，当他们夺取政权时就已经定居在中国中原了。他们远非始终都是粗犷的山人和具有尚武风俗的游牧民，相反却深受汉人习惯、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匈奴人于 444～454 年向俄罗斯南部、欧洲和东地中海的推进就如同逊尼特人先前于 356 年向伊朗的推进一样，都是那些无疑是来自阿勒泰山附近的真正游牧民之所为。大家无法把这些入侵与西晋末年在中国中原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此外，即使匈奴人和匈奴人之间就如

同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某种亲缘关系,或者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对于历史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唯有生活方式、社会—政治形态和文化才是重要的。

二、长江流域的世族统治

继晋王朝向长江流域撤退之后,政治气候起了变化,从此就不再是是否要有中央集权的问题了。在宋(420~479年)和齐(479~502年)王朝期间,曾以连接不断的方式极力地而又是收效甚微地企图粉碎世族的势力。人们相反却发现了一个实行内部婚姻和分成等级的门阀的形成,这些门阀直到6世纪中叶仍在宫中和地方上握有实权。这个世族阶级是由6世纪初叶从北方迁来的豪族以及长江流域和杭州湾沿岸聚落中最富裕望族的后裔组成,它们后来受到了皇权的承认和册封,被免除了赋税和徭役。由于最重要的是要证明其家族的古老性和知名度,以便接受职务和特权,所以他们绞尽脑汁地续家谱。其构成在宋王朝末年已经接近大功告成了,以致于能促使立法、接受和认可正在行用中的准则,即禁止世族家庭(名家)和平民(寒门)之间通婚。这个拥有封册的内部通婚的世族的组成、其势力的上升和后来从6世纪中叶起又迅速衰落,形成了南朝最为独特的社会现象。

东 晋

317年由司马氏宗室的一名王子在南京建立了新国家,它首先要与移民的棘手问题作斗争。新迁来的人数如此庞大,以致于朝廷决定对他们进行单独造册登记(为了对他们作普查而使用“白籍”,而对老居民则使用“黄籍”),甚至趋向于在某些地区创设“侨郡”。政府无法阻止使低层移民依附于豪门富户现象的急速发展。他们变成了大地主的“客”和“奴婢”。国家过份软弱而无法想到如同在中国北方那样限制庄园的面积或控制依附户的数目。此外,统

治权始终属于世族(王氏、庾氏、桓氏、谢氏)继激烈斗争之后相继掌权。

然而,尽管东晋王朝很衰弱,但它仍然不仅能抵抗来自北方的袭击和阻止苻坚的攻势(383年的淝水之战),还于347年成功地吞并了四川,从而为在南京建立的王朝开辟了一条通西域的交通大道。

导致了晋王朝覆灭的危机同时表现了定居在地方上的世族和军阀们的势力。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江西赣江流域和湖北的部分领土事实上已经摆脱了中央政权的控制。但南京政府为招募“部曲”以及世族的依附户曾作出过努力,这似乎曾招致了包括太湖和浙江北部沿海之间地区的一种缓慢的不满情绪。这种局面应该是有利于在400年左右从宁波地区开始的一次农民起义的成功。其首领是孙恩,率领一支由海盗和天师道徒组成的混合军队。此人和他那祖籍为山东的父亲一样,是加入道教教派五斗米道的信徒。他在浙江沿岸的航海人、渔夫和海盗界中征募兵员,而且他也无疑与今杭州、绍兴和宁波地区的大地主们保持着关系。起义军乘“楼船”出发,组成了“魔军”,从舟山群岛兴师蹂躏了海岸地区并很快就威胁着南京。他们于402年被挫败,这次失败于其队伍中造成了多次集体自杀。然而,平息孙恩起义的战斗使得那些奉命镇压的军事将领们得以步履青云。桓云利用了这种局面而在南京篡权,但次年却在那里被他的对手刘裕所杀,反对北方诸国的斗争为后者获得了很大的名望。这位刘裕于420年创建了一个新的宋王朝,取名为南宋或刘宋。

宋

162

当刘裕于南京夺取政权的时候,我们觉得,由4世纪初叶的移民造成的困难似乎已得以消除,北方人已融合在当地居民的残余中了。从刘宋王朝开国起,实际上就取消了从前的黄籍和白籍之区

别,以便统一税收制度。该王朝的初年被建立在陕西与河北诸王国的进攻所骚扰,但长江流域的帝国后来却在元嘉年间(424~453年)享受到了一种相对的安宁,发展了它与西域和日本诸小邦之间的关系。这个和平时代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出身卑微而通过一次兵变才掌权的刘氏家族为了重新确立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而作出的努力引起了世族大家族的反抗。同时,北魏帝国的大军一直进军到长江流域,它的攻击削弱了该王朝。某位曾镇压过一个王子反叛的将军萧道成利用中央政权的这种衰落而扶植其心腹之一登基并最终于479年夺取政权。

齐

在由萧道成创建的短暂的齐王朝时代(479~502年),有两件引人注目的事实需要提及。这就是为削弱世族势力而加强中央政权以及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大规模贸易发展高潮。伪造作为课税基础的户籍要遭到严刑惩罚,而新政权同时又极力支持平民百姓升任到统治岗位上去。此外,正是抑制世族的这些极端行为导致了该王朝的崩溃。杀戮世族在5世纪末年掀起了动乱,其采邑被封在湖北北部襄阳那战略地区的一名皇帝的堂兄弟,起兵反叛并向南京进军,而最终迫使对方禅让皇位。此人就是萧衍,也就是后来的梁武帝(502~557年)。

梁

中国长江流域从5世纪末起在经商活动方面的觉醒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商业的发展加速了一个世族门阀的崩溃,而该世族门阀的一大部分势力出自圈地和大庄园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它无疑与南海和印度洋的贸易发展有关,并标志着导致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诸省于10~13世纪经济大飞跃的一次大变革之始。人们于5世纪末确实发现了长江上通商的增长以及来自东南亚和印度

—伊朗世界的大批外商的存在。位于长江沿岸的城市以及最南方的广州发展起来了，国家开始利用贸易税收的可观收入。

在梁武帝执政的漫长岁月中(502~549年)，这种经济发展仍在继续并且得到了巩固。梁武帝的周围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谋士，如特别是以其哲学著作而负盛名的沈约(441~513年)和诗歌作品的作家徐勉(466~535年)。公元6世纪的上半叶是一个繁荣与和平的时代。这是南朝贵族文化中的黄金时代。已经适应了长江流域的中国社会形态并受到了宫廷及世族门阀支持的佛教，又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但当时正处于一次导致了南方世族消逝的严重危机的前夕。 163

由曹氏家族设立的“士家”或“兵户”制度在东晋时代得以维持下来了，国家于4世纪仍勉强地保持了对军队的控制。公元5世纪时，事态已经大相径庭了，因为自宋(420~479年)起已经开始使用由地方官吏和世族门阀(贵族大家族)于各地征募的雇佣军那种半国家半私人的部队。这些兵痞匪帮部队的制度使人联想到了欧洲的“大军”，他们一般都是由某些军事冒险家(如同罗马的雇佣军队长一类的人物)统率，并可能危及到了中央政权和导致了梁王朝于6世纪中叶的崩溃。西魏(中国的西北部)的某位叫作侯景的将军原来曾投靠、效力梁王朝，而于548年反叛并率兵进攻南京。在直到他于552年死亡之前相继发生的动乱期间，西魏从陕西的渭水流域开始对帝国发动了一系列大获全胜的进攻。553年，他们占据了四川，从而切断了南京与西域之间的联系，夺取了控制着进入汉水流域门户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襄阳，接着又进入湖北西部并一直进军到长江中游的江陵，并在那里扶植他们于襄阳俘虏的统治家族萧氏的一位宗王登基。湖北的这个新的后梁王国很快就被在渭水流域建立的政权所控制，那些政权是西魏(535~556年)、北周(557~581年)和于589年统一了这些小王国的隋王朝(581~618年)。在西魏于四川和湖北建立之后，内战仍在长江下游继续。

陈

其封地在武昌地区(当时比南京地区更为繁荣)的军事将领陈霸先于 557 年夺取了政权并创建了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陈朝(557~589 年)。

陈帝国出自梁末的军事叛乱和内战,它属于和先前在南京建立的诸王朝完全不同的类型:世族被从政权中驱逐出去了,大都未从杀戮中残存下来。唯有梁王朝贵族中的一小部分人得以在长安的西魏人中找到庇护。该王朝被肢解了其西部省份,遭到了削弱,从此只能依靠其军队了。它在西部受到了后梁攻击的威胁,在北部受到了北周和北齐进攻的威胁。它收复寿阳(位于南京以西 200 公里处,今寿县)的胜利却未产生多少效果。该王朝在隋朝开国皇帝于 589 年统率大军奔袭南京时崩溃了。

三、中国北方的汉化胡族王国和帝国

五胡十六国(4 世纪)

西晋末年定居在中国北方的非汉族血统居民的起义迅速地导致了中国北方的分裂,即从满洲南部一直到西域东部绿洲,从四川一直到山东,分裂成了几个小王国,而其统治阶级往往均出自北方和西北边陲。一个其政治史极为混乱的时代从 4 世纪初叶起开始了,它仅仅在由一个鲜卑部族的后裔于 439 年统一中国北方时才告结束。陆续吞并和新政权的相继出现、京师相当频繁的变迁(如在 407~431 年间,夏族人将其政治中心从陕西北方迁到了西安,然后又迁至甘肃东部的天水,最后迁至天水东北的泾河上游),这一切使得任何论述都变得不可能了。民族的多元化、他们与汉民族混血的程度、各自所处的发展状态(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汉化并定居了下来),再加上其政治史的复杂性。但大家可以指出,中国史

学家们称之为“五胡”(匈奴、羯、鲜卑、羌和氐)的这些民族与两个不同的民族集团相联系。其中一部分(羌和氐)与晚期的吐蕃人和唐古特人有亲缘关系,他们祖籍中国西北边陲并操汉—藏语言;其他的民族则是草原游牧民的后裔,他们的语言属于突厥、蒙古和通古斯语族。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似乎差异悬殊甚大,羌和氐未曾有过游牧社会的部落和贵族制度,似乎仅仅有过一种军事类型的组织。

五胡十六国

165

国名	统治阶级的血统与地区	继承的诸王国	断代
前赵(汉)	匈奴(山西)	后赵	304~329
成汉	氐(四川)	东晋	304~347
后赵	羯(河北)	前燕	319~351
前凉	汉(甘肃)	前秦	314~376
前燕	鲜卑(河北)	前秦	349~370
前秦	氐(陕西)	西秦	351~394
后燕	鲜卑(河北)	北燕	384~409
后秦	羌(陕西)	西晋	384~417
西秦	鲜卑(甘肃)	夏	385~431
后凉	氐(甘肃)	后秦	386~403
南凉	鲜卑(甘肃)	西秦	397~414
北凉	匈奴(甘肃)	北魏	401~439
南燕	鲜卑(山东)	东晋	400~410
西凉	汉(甘肃)	北凉	400~421
夏	匈奴(陕西)	北魏	407~431
北燕	汉(辽宁)	北魏	409~439

因此,这些民族(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他们中的精英分子)把他们特有的社会和政治传统与对汉族观念和制度的广泛借鉴结合起来了。他们的统治阶级被如此深刻地汉化了,以致于他们自认为是

中国北方古老政治集团的继承人。山西的匈奴人自己也采用了汉族大王朝的名称，完全是战国时代的古名称于4世纪时又重新出现了。五胡十六国时代在陕西有秦国，在山西有赵国，在河北和山东有燕国。唯一特殊的是位于甘肃的那些王国，它们都采纳了该省中心的“凉”的名称（今武威）。那些统治家族与形成居民绝大多数的汉族人的杂婚现象特别引人注目，以致于要想在汉人和非汉人之间作出区别简直是痴心妄想了。所以，大家不能从下述事实中得出任何结论：在4世纪初年与439年之间于华北相继出现的十六国中，只有三国被认为是由汉族血统的家族创建的，这就是314~376年的前凉、400~421年的西凉和409~439年的北燕。

在4世纪的中国北方那极其复杂的政治史上，唯一的一个突出事实是由一个古藏族血统的家族建立的大王国的形成，这就是前秦国（351~394年）。这个建立在渭水流域长安的王国的最大君主是苻坚（357~385年），他于370~376年间成功地把中国北方统一成一个军事强国，并威胁着建于长江流域的东晋帝国。据传统认为，苻坚可能于公元382年发动了对南方的一次规模极大的远征，史书中提供的士兵数目是共有步兵60万和骑兵27万投入战斗，这实际上是经过夸大的数字。但他却在安徽中部的一条河上遭到了影响其终生命运的失败。这就是著名的淝水大战（383年）。

拓跋族的崛起和北魏帝国的形成

拓跋小王国的地位上升并于5世纪上半叶征服整个中国北方，这就以典型的方式说明了定居在这些地区的游牧血统民族的发展。那些其定居化现象最为激进和其统治阶级汉化程度最深刻的政治集团，很快就受到了那些保留了游牧民尚武风俗和仅仅向汉地借鉴一些为形成一个国家所必不可缺的制度的民族之威胁。这些民族的领土都位于定居农业区和牧民草原的交界处，它们在那里控制了通商大道并且很容易为其军队征募兵员。

西晋(265~316年)曾寻求与鲜卑人结盟,鲜卑人是原籍为南满的游牧民部族,他们于公元3世纪前往蒙古的东南部定居。他们在山西北部向拓跋氏(鲜卑的三部族之一,即拓跋、宇文和慕容)出让了一片地盘,于315年赐予其首领一个代王的尊号。“拓跋”是桃花石(Tabgatch)这个民族名称的汉文对音,他们这样便在入侵中国北方的主要必经之路上占据着一种战略地位。早在公元4世纪末,他们便成功地控制了位于鄂尔多斯和北京东北部的西拉木伦河(Siramuren)流域之间的所有地区。由于他们采纳了魏国的古名(他们在历史上以西魏之名而著称)并在386年立都于山西最北部的大同,所以又侵犯后燕国的地盘而扩展到河北,并于公元5世纪初侵占了河南。在东晋人对北方诸国攻击的帮助下,魏王朝从此时起便发动了一系列全面获胜的攻势,从而使他们统一了中国北方:占据陕西北方的夏人于431年被吞并,辽东(南满)的北燕于439年被吞并,甘肃的北凉也于同一年被吞并。公元440年,他们夺取了甘肃的武威地区(凉州),从而为他们打开了通向西域的道路。

北魏实行了一种“法家”式的政策,以国家在人口控制和分配中的干预为标志,但这种政策同时又由于草原尚武民族的粗犷和严厉特征而更加激化了,游牧民具有某种把定居民视同牲畜的倾向。国家的工匠们实际上都在他们的作坊中被当作囚徒一样看管了起来,而且不允许于其等级之外缔结婚约。他们对自由工匠实行严格监视。农民阶级受一种军事编制制度的控制,它使人联想到了秦代的做法。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在每一级上都设置对官府负责的长。为了增加在干旱地区的垦荒,北魏实行了一种根据已达到耕田年龄的人数而强制分配土地的制度,7世纪的隋唐两代仍受这种制度的启发和影响。他们向佛寺分配重罪民犯和官奴,后者取名为“僧祇户”,负责开发荒芜的土地。但他们尤其广泛地让移民居住在京城大同地区和陕西的领土上。

北魏时代移民表
(公元 5 世纪上半叶)

年 代	居民出生地	人 数	居民移居地
398	冀和鲁北的鲜卑、高丽人	100000	大同
399	汉地的望族	2000 户	大同
399	豫之汉族农民	100000	山西
418	冀之鲜卑人	?	大同
427	夏国居民(陕西)	10000	山西
432	辽东人	30000 户	河北
435	陕西和甘肃居民	?	大同
445	鲁豫汉族农民	?	黄河以北
449	长安工匠	2000 户	大同

仅仅在道武帝(386~409年)执政年间,被从位于太行山以东地区向大同周围放逐的人数就高达 46 万。

171 这些经常发生在开拓新疆土之后不久的移民活动有助于一种经济、政体和风俗的缓慢变化,其影响在 6 世纪时已被充分感觉到了。事实上,许多因素都有助于汉族影响从北魏于 4 世纪末叶立都大同之后的发展。随着帝国将人口极多的定居民纳入其疆域范围内,利用汉地制度和求助于汉族谋臣的需要都令人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人们在这一问题上可以提及由大臣崔浩(381~450年)在大同宫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向北魏国中引入了汉族的行政管理方法与刑法。外蒙古游牧民蠕蠕或柔然人(他们无疑都与 6~8 世纪时入侵欧洲的阿瓦尔人具有相同族源的关系)的入侵、进行反击的必要性(北魏于 429 年发动了对柔然人的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控制西域诸绿洲所具有的战略和贸易利益等,把北魏王朝置于了与前汉族帝国相同的地位处境。定居倾向的发展、由于步兵在对长江流域诸帝国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使马匹贬值、出自农

业收入(粮食和纺织物)比重的增加,逐渐地改变了帝国经济。最后,汉地手工艺产品所施加的吸引力、对豪华时髦的追求、汉族文化的威望、佛教的突出影响等,都改变了拓跋望族的思想情感。

5世纪末那非常深刻的发展变化使迁都一事变得不可避免了。朝廷放弃了位于草原边界的大同,于494年迁都大农业区中心的洛阳,那里距大同南方的直线距离为600公里。北魏于前一年在自311年就被放弃的东汉与曹魏帝国故都的遗址附近重筑带郭的新洛阳城,并于501年进一步扩大了该故都。

无论如何,迁都洛阳导致游牧血统的统治阶级中汉族影响得到了发展,后来可能是由于孝文帝(471~499年)及其继承人等皇帝们的缘故,自从在河南立足起就系统采纳的汉化措施进一步加速了发展。鲜卑血统家族的服装、语言甚至姓氏都遭禁。皇族以采用汉姓“元”而作出了表率。鲜卑贵族和汉族望族之间的通婚受到了鼓励。在所有领域中,这是统治阶级的一次迅速而深刻地向汉族风俗和习惯的转化。草原上的尚武传统很快就仅仅成为一种对遥远过去的回忆了,而追求奢侈的癖好又在孝明帝(515~528年)时代的胡太后以及鲜卑世族供养的豪华建筑中自由放任,这就是佛寺和多层佛塔、铸钟和供像。征服了这个时代上层社会的宗教虔诚运动则以卖弄豪华为特征。洛阳城是东亚的一大佛教中心,它在其巨大的城郭内炫耀其珍异物和财富,该城东西延伸10公里,南北7.5公里。在548年之后数年刊行的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中为我们保留了这样一句话:“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

有一种现象可能促进了旧鲜卑贵族与汉地社会环境的结合, 172
这就是自5世纪末开始表现出来的经济飞跃,无论在中国北方还是在长江流域均如此。虽然中国社会的这两部分形成了政治分裂,但它们却以相同的步调节拍生活,彼此之间的交流也非常频繁。在北魏人中,与西域贸易的恢复解释了胡商在洛阳的影响,洛阳的整整一个区慕义里都供他们专用。人们在冀南的北齐(550~577年)

可计算到祖籍为乌浒水流域的大批粟特商人。

中国北方的紧张状态、断绝交往和分裂形势 (534~577年)

持续于整个5世纪并于6世纪中叶得以加速的发展是鲜卑社会内部越来越激烈的紧张关系之源,向耕耘和汉族生活方式的转化主要涉及到了宫廷各界,推而广之也涉及到了起源于游牧血统的上层贵族,但驻守北方边界的军队和游牧于农业区边界的部族却始终都忠于草原的古老传统,尽管他们也受到了汉族的影响。对于宫中各界和文职高级官吏的仇视与怨恨似乎是在这个勇士和牧民的社会中逐渐积累起来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这种社会沦落到了次要地位。在5世纪上半叶的开拓时代,大部分均出自游牧部族的将士受到了优厚的待遇和尊敬,但统治者自从迁都洛阳开始便对军事问题愈发不感兴趣了。

保卫帝国并抵御对北纬41°一线的草原地区之入侵的那些由鲜卑、柔然和突厥敕勒人组成的军队于523年反叛了。这就是“六镇起义”,其后紧接着便是10年内战(524~534年)。当临朝执政的胡太后(她为佛教付出的巨额开销导致了抢劫活动和反叛)于528年命人杀了孝文帝并扶植一幼童登基后,山西的军队和部族便向南调动并夺取了洛阳。胡太后及其幼主都被淹死在黄河中了,两千名朝臣被杀。接着便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当时形成了于534~535年瓜分魏帝国的两位军事首领的势力。这次地域划分反映了作为内战起因的政治与社会对峙:在高欢(496~547年)将军庇护下于534年立都于邺(河北南部)的东魏,是一个传统的帝国,它敌视汉族影响并由游牧血统的军人统治;而宇文泰(505~556年)将军于535年在长安扶植拥立了西魏的第一位君主,该国政权相反却由洛阳的被汉化的贵族残余所统治,为了其文职政权组建和其军队而广泛利用了汉人的帮助。

173

人们都会怀有一种想法,认为将军们掌握实权的这些帝国不会持续很久。继宇文泰于556年晏驾之后,其长子创建了一个新的周王朝(北周,556~581年);次年,高欢的一名堂兄弟也以同样的方式篡夺了邺地的最高权力并创立了一个新的齐王朝(北齐,557~577年),它一直持续到被周灭掉的年代。作为结束,皇族女系的一位叫作杨坚的亲属在长安夺取皇权,创建了新的隋王朝,并于589年结束了中国北方与长江流域的那种事实上是从222年开始的漫长分裂时期。

隋帝国和唐帝国的初期,在各方面都继承了从535年起在长安建立的诸帝国到杨坚篡权之间的体制。它们的大部分制度都是在西魏和北周帝国中诞生的。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涉及到了军队组织,这就是府兵,其创设一般都被归于宇文泰,并被断代于550年。尽管发生了王朝的更迭,其统治官僚队伍、政治观念以及社会在宇文泰时代和7世纪中叶之间未有任何变化。如果那种把中国公元589年的统一视为历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之观点是正确的话,那末仍有一些明显的持续性把隋和初唐时代与北朝特别是与西魏、北周帝国联系了起来。

四、交流、影响和对外关系

综览一番中国社会史,便会使人对于由汉族人与那些和他们的文化及生活方式不大相同的民族之间的交流所确保的不停的致富过程,保留一种很重要的位置。草原、汉藏交界处和华南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的贡献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毗邻文化的影响在所有领域中都使人感觉到了:套牲口的方法、马鞍、马蹬(5世纪)、修筑桥梁和山路的方式、草药和毒药学、航海术……中国中原地区的笙是向热带地区的居民借鉴的,追根溯源就是老挝的芦笙。稍后不久,到13世纪时,正是南方诸省的土著民向汉人传授了棉花的种植和纺织技术,这一切后来在蒙古人时代广加传播并变成了中国

的重要工业之一。甚至汉族人的宗教传统同样也带有向毗邻民族借鉴的痕迹。如有关诞生自原始卵并创造了人类所有种族的犬槃瓠,这个神话传说一直保存在当代中国南方和印度支那半岛上的许多民族之中,它从战国时代到汉代之间传进中国民间文学中了。楚辞(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保留了对似乎并非是起源于汉地的巫教传说的回忆。这几个例证就足以使人联想到汉族文明欠下其近邻的文明债。较遥远地区文明的贡献也不能说不重要。然而,在这些交流与借鉴的漫长历史中,中国的“中世纪”是最丰富和最有成效的时代之一。

中国南方、东南亚、印度洋

虽然无法勾勒其详细的历史,汉语和汉文明居民向位于长江流域以南热带地区的渗透在南朝时代(六朝:魏、东晋、宋、齐、梁、陈)获得了明显的进展。公元3世纪的吴、蜀以及4世纪的东晋都试图利用一直延伸到其地界以南的那些未知之地的财富: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今越南的北部与中部……由于缺乏劳动力和士兵,他们组织了对土著民族的多次远征并大举征兵。公元5世纪的刘宋王朝被迫对吞并了其领土的部族发动了艰苦的战斗。

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地区从4世纪起便开始为人更清楚地了解了。公元304年,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植物学著作,它涉及到广西和交趾(越南红河流域)的木、草、果、竹类植物,这就是《南方草木状》。在东晋于347年征服四川之后,一位叫作常璩的人撰写了一部地理和历史著作,它包括了贵州、云南、四川和陕西南部地区,其书名叫作《华阳国志》。人们于其中发现了有关这些地区的植物、动物、物产和习俗的资料,其中大部分地区当时仍由土著部族居住。

拓殖和军事开辟的努力越过了华南和越南的边界而到达了海外地区。吴国在3世纪时就已经有一支海军并对台湾(除非是指琉球)岛(夷州岛)、海南岛(珠崖)、高丽南部的济州岛(Quelpaert)发

动征战。吴国对于南海沿岸地区怀有政治和贸易上的野心，它在东北海中有着战略利益。228 年左右，它从海路遣使赴湄公河三角洲上的扶南国(Phnam)，来自印度洋和中东地区的胡商经常往返于那里。中国出使古柬埔寨的这一使团的主使是朱应和康泰，他们在那里遇到了贵霜人的印度帝国的一名使者并留下游记。前者留下的游记是《扶南异物志》，后者留下的记述则是《吴时外国传》以及一部有关柬埔寨风俗的著作——《扶南土俗》。

175

中国长江流域与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关系在 4~6 世纪期间发展起来了。齐与梁帝国均与越南东南沿海已被印度化的王国林邑(稍后又以占婆之名而著称于世)、扶南、爪哇岛、印度和锡兰保持着关系。印度诸王国和锡兰遣往南京的使节的人数在 4 世纪末和 5 世纪中叶相当多。正如在军事大开拓的其他时代(11~13 世纪和 16~19 世纪)一样，中国社会与东南亚和印度洋关系的这种发展高潮处于一种更广阔得多的背景中。南京诸王朝对海外诸国的兴趣与印度—伊朗海军的飞跃发展以及中东、印度洋和东南亚之间贸易潮流的发展是同时代的。这样就可以解释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沿海平原的逐渐印度化过程，同时也解释了在中国南方的城市与长江流域何以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原籍为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外国人，如越南人、占婆人(林邑人)、扶南人(柬埔寨人)、锡兰人、南印度和北印度的印度人、东伊朗人等。这些经南海前来的外国人各自都对佛教传入中国社会作出了贡献。

满洲、高丽和日本

魏和吴帝国在公元 3 世纪的斗争赋予了位于中国社会东北地区一种新的重要地位。然而，汉代的开拓促进了汉族移民在南满和高丽的立足。从公元 2 世纪末开始，辽东太守公孙氏家族就利用黄巾军的起义和蹂躏了中国北方的内战之混乱局面而在南满建立了一种独立于汉朝的王国，其主要财富似乎是由饲养马匹和马匹交

易而形成的。曹魏于 231~238 年间可能灭掉了该王国,然后它又在高丽(朝鲜)立足,在那里于半岛的西部重建了乐浪和带方两郡。汉人在高丽的存在可能一直维持到 313 年左右。

曹魏继汉王朝之后成为东北的强国,它也与日本(倭)诸国保持着关系。早在汉王朝统治时期,倭人(根据这个汉文词的意义,“倭人”意为“矮人”)的许多酋长国就习惯于向汉朝纳贡。这些酋长国很可能就位于九洲的北部,考古发掘在那里获得了大批汉代的遗物:青铜镜、铁器、王莽时代的铢钱。一颗封印是由汉代的某位皇帝赐给“倭奴王”的,它于 1784 年在该地区发掘出土。这件物品长期被认为是赝品,而自从近期(1956 年)发现了一颗来自云南东部古代滇王国的类似印之后,它才被承认是真品。公元 3 世纪时,正和吴国作战的曹魏与日本诸小国之间的关系似乎加强了。倭国向魏王朝的四次遣使以及魏向日本的两次遣使的事件都在 238~247 年间被提及了,考古学以在日本发现的中国魏代纺织物、金器和镜子的数目而证实了这种交换的持续性。人们将会注意到,由蜀人陈寿(233~297 年)撰写的《三国志》描述了经由对马和壹歧群岛而把高句丽南部沿海与日本群岛联系起来的道路。

中国北方与日本之间的这种关系从公元 4 世纪初叶起松懈下来了,亦即继西晋帝国(265~316 年)分裂和在半岛北方创建高句丽、在西部创建百济和在东南部创建新罗国之后。

吴王国(222~280 年)缺少马匹,而且也在寻求与公孙氏联盟以对付其强大的北方近邻,这便解释了经海路向满洲多次遣使的原因。这些使团之一可能共包括 8000 人,他们分乘 100 多只船舶。这也可能是一支远征军,其目的是为了助正受曹魏进攻威胁的公孙氏一臂之力。定居在南京的一位东晋和尚被认为是于 384 年将佛教引入到百济王朝宫廷中的人。最后,在 5~6 世纪期间,日本诸小国由于对与北魏联合起来瓜分了该半岛南部的另外两个朝鲜王国的高句丽的野心感到不安,遂试图与南京诸王朝结盟,这些政治

形势使日本与这个时代的中国长江流域地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了。

蒙古和西域

草原文化在中国北方的影响是相当可观的，这无疑要比它所显示出的样子重要得多。从中国上古时代末期开始，向草原人的借鉴就相当多：为骑兵驯马的技术、养马术、长裤、马鞍、公元前4世纪到汉代之间发明的马胸带、5世纪时的马蹬子、5~10世纪之间的轭圈等等。如果说从汉代起就出现了栖身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的越来越快的汉化过程，那末反过来的现象也不能说不太重要：中原的尚武传统和某些制度都是向草原社会借鉴的。但汉族与游牧族文化的这种结合又被披上了一种遮羞的面纱。事实上，自从北魏于5世纪末立都洛阳之后，能够使统治阶级联想到其游牧血统的一切都彻底失去了威望。魏国的断代史——撰于551~554年的《魏书》极力把拓跋氏王朝说成是一个典型的汉族王朝，人们读起此书来也不会想象该王朝出自刚刚勉强被汉化的草原游牧民。从公元500年左右开始，便出现了种种明显的倾向——抨击他们的制度和风俗中与汉族标准比较起来似乎是荒谬的一切，这种倾向导致把4~5世纪胡族王国和帝国那非常奇特的时代融合于中国断代史中的持续而又统一的体系中了。在唐初(7世纪)，执掌大权的混血皇族无疑也保留了对那些新贵们的成见，对于在他们的远祖中有些目不识丁的、一般均生活在其帐篷中和以饲养与抢劫为生的游牧民感到羞耻。所以，7世纪修成的《北史》不能向我们提供“五胡十六国”以及迁都河南之前的拓跋魏帝国的实际情况。唯有互相印证、无意间遗留下的资料和推论方才作出某些说明。

原籍为满洲、蒙古和汉藏走廊地区的部族在中国北方定居的后果是既改变了中国社会这一部分中的民族成份，同时又改变了其思想状态和传统。汉人与草原人或山地人之间的通婚在民间是

司空见惯的现象,这种现象从6世纪初叶起继北魏采纳系统的汉化政策之后日益增多。它们导致形成了一个混血贵族,隋唐时代的许多望族、公元600年左右和甚至是直至8世纪上半叶的那些皇权的最忠实支持者也都带有突厥或鲜卑血统的姓氏:宇文、慕容、令狐、独孤和尉迟……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胡族血统却被以采纳一个汉姓的办法掩饰起来了,就连享有完全是汉族之李姓的唐室也是半突厥人。

向西域发展的两大时代是处于整个“中国中世纪”的两端,这两个时代分别是公元前2世纪末到公元2世纪中叶的汉朝和7~8世纪的唐朝。但汉族地区与位于塔里木盆地和昆仑山脚下的绿洲之间的关系在两大开拓时代之间并未中断,当时的汉族军队一直冒险挺进到帕米尔,有时甚至一直到达河中地。曹魏王朝曾极力重新插足于这些绿洲。公元3世纪末,只有西晋王朝的威望才可以解释268~289年由西域诸王国以及东南亚诸国向洛阳遣使的次数:鄯善(卡克里克)、于阗、龟兹、焉耆和大宛于271、273、285、和287年入贡,林邑(占婆)和扶南(柬埔寨)于268、284、285、287和289年纳贡。公元285年,一名中国使节被派向大宛以册封该地区君主一个王号。公元4世纪时,立都于甘肃中部武威的前凉(316~376年)王国一直扩展到高昌(吐鲁番)地区。前秦的强大君主苻坚在376年和吕光将军于384年的远征之后,甚至使塔里木盆地承认了其权力。前凉王朝(386~403年)的攻势可能一直推进到焉耆和龟兹。在北魏吞并其王国时,北凉(401~439年)的统治家族在吐鲁番寻找避难处,他们在那里创建了一个新的高昌王国。最后,在于439~440年间征服了甘肃之后,北魏人也必须立足于西域并在大同接受20多个绿洲王国的纳贡。¹⁷⁸

此外,与大家根据距离和天然屏障而可能会相信的情况相反,在4~6世纪期间,于南京相继建立的那些王朝,既与西域又与位于曹魏帝国和北魏东北的地区(满洲、高句丽和日本)有着关系。青

海(库库诺尔)的游牧民吐谷浑人(Tuyuhun)确实曾充作长江流域诸王国和绿洲诸小国之间的中介人,而继吐谷浑人向鄯善和且末(车尔臣)的扩张之后,这些关系在6世纪上半叶甚至变得更为密切了。它们只是随着西魏于553年占据四川才停止。

唐朝向西域甚至直至伊朗边境的扩展并不是以突如其来和出乎预料的方式进行的,相反却在突厥最早对中国北方入侵时就以一种重大的外交活动的时代作为前奏曲,这里是指从公元535年起建立在长安的诸帝国与位于玉门关和敦煌以西的地区之间的外交活动,正如西域和萨珊朝波斯派向长安的使节数目所证实的那样。

553年,唃哒和波斯遣使。

558年,唃哒和波斯遣使。

560年,龟兹国遣使。

564年,粟特(撒马儿罕)遣使。

567年,布哈拉(乌浒水流域)遣使。

574年,于阗国遣使(贡马)。

578年,波斯遣使。

正如中国南方和长江流域的城市在六朝时代(222~589年)接待了数目越来越多的原籍为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外国人一样,中国北方的城市中心也发现自己那里形成了来自西域绿洲和位于锡尔河与印度—伊朗现今边境之间的胡商们的聚落,如吐鲁番、龟兹、于阗、疏勒、撒马儿罕、布哈拉、巴克特拉、白沙瓦的人以及东伊朗人、加湿弥罗(克什米尔)人、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印度人。经南部海港和甘肃之路进入天朝的商人、官方使节、人质和布道祖师在中国社会史上的这个关键时代施加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经过持续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中的一个适应时代之后,佛教可能从4世

179

纪末~8世纪末之间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巨大的宗教虔诚运动,深刻地改变了早期的传统并在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周边地区留下了持久的痕迹。但在佛教影响的同时,印度、伊朗和希腊文化的影响也在中国中原和西域令人感受到了。

第二章 中世纪文明

从汉朝衰败到隋唐贵族帝国的形成之间延续的四个世纪,是中国社会文化史上最复杂的时代之一。它令人惊奇地丰富,充满了新鲜事物。首先是一种玄学的发展,它完全摆脱了汉代的经学,从4世纪初叶起又由大乘佛教和持一切皆空教理的佛教提供的内容所补充。此外还有一种艺术和文学业余爱好、一种与古典传统绝对矛盾的追求自身美的享受,同时还有对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最早与最杰出的评论尝试;手工行业从绘画的水平上升到具有丰富文化内容的精巧艺术之行列,世界历史上做为绘画内容和艺术作品的风景画首次出现了,在诗歌方面则出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空前大飞跃。最后,一种神奇的宗教虔诚运动也发展了,其形态差异如此之大,其效果又如此广泛繁多,以至于在一部中国社会通史中只能略加提及。

社会和政治史的复杂性、中国北方和长江流域的单独发展、地区的相对隔绝、南方向北方的借鉴又增加了这种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190年左右到3世纪末,伦理和哲学的发展使长江流域在历史上出现第一个“王朝”的时代变成了承上启下的时代。4世纪时,在战争连绵不断的、庸俗的、几乎是无文化的、深受草原和汉—藏走廊地区影响的中国北方与贵族和文雅的以及具有粮食、僻静幽闲住所和宫廷生活的长江流域的中国之间,出现了深刻的差异。这种如此鲜明的对照后来在5~6世纪期间减弱了。佛教信仰以一种相同的虔诚热潮沟通了古代社会的所有部分,而这个社

会自从北魏时代起就越来越汉化了。北魏后来终于迁都洛阳(494年),那本是中原政权从公元1世纪到4世纪初叶之间一直维持的地方。

这—个多世纪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形势使人得以理解其伦理气氛。豪门世族之间的派系斗争、强大世家那自行变作封闭望族的倾向、南京诸帝国的软弱无力、政治斗争的虚荣心,这一切肯定不会与形成3~6世纪文明社会背景之特征的个人反省以及自我追求艺术的态度毫无关系。这样,人们就可以解释长江流域诸帝国中诗社之优势、隐修和修道生活方式的成功,最后则是衰落和混乱中的最后蔽身地宫廷的作用;在中国北方,外来的大宗教在粗犷的、强暴的和半蒙昧的社会中受到欢迎,而从曹氏到司马氏分裂的帝国的暴君们都给予佛教以保护,使佛教虔诚非常迅速地发展。

一、玄学、美学和诗学

从法家的正名论到本体论思辨

在汉朝衰亡时产生了学派传统的断裂以及似乎改变了所有前景的非常深刻的伦理政治危机。经学研究在马融(79~166年)和郑玄(127~200年)时代放射出了其最后和最美的光芒。洛阳太学于175年将蔡邕(113~192年)正定的《六经》文字勒石立碑,此举具有象征性意义。这些受人尊崇的经典(除《易经》之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不会再成为令人非常关注和密切注意的目标。如果人们可以列举在汉末和11~12世纪宋代的伟大复兴之间的某些著名经典疏证家,那也只能是一些孤立的人物,他们继承了汉代的传统,但却既未动摇行文诠释的方法,又未触及含糊不清的哲学。

公元3世纪末的动乱以及继此之后的4世纪初叶的胡族部族揭竿而起,都分别加速了文学传统的这种衰落。汉代的档案和皇家藏书阁(石渠阁)在董卓雇佣部队于190年洗劫洛阳时都被毁,由

曹魏王朝汇辑的文集可能也于 311 年遭到了类似的命运。我们顺便指出，曹魏和西晋的皇家藏书阁都按照新的分类法而分成“四部”（经、史、子、集），这种办法后来一直被人们接受。该藏书阁搜集了一大批竹简文书，它们是于 279 年在某位魏王的墓葬中发掘到的，可以断代为公元前 299 年。在这些文献中，便包括魏国的《竹书纪年》，它仅仅是借助于各种著作的引文而以片断的方式流传给我们的。但主要是从汉末起就很明显的伦理危机在引起政治和哲学思考之复兴与深化的同时也把文化生活纳入了新的轨道。

人们从公元 2 世纪下半叶起就目睹了战国时代（公元前 4～公元前 3 世纪）思潮的一场复兴：法家、正名论（也就是确定社会地位和处境的理论）、老子那具有玄学倾向的道教。但其观察问题的角度则与公元前 4～公元前 3 世纪时完全不同，在公元 3 世纪上半叶形成的思考内容涉及到了社会的功能组织、其必要的和自然的等级划分、个人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根据个人的能力和特征而作出的等级划分。社会秩序只有在为每个个人都确定合适的“分”（这种“分”又是根据个人的“命运”决定的）时才可以得到确保的思想，普遍获得了这个时代思想家们的赞同。人们又在曹魏《新律》的编纂者和一部叫作《人物志》的性格学论著的作者刘邵（3 世纪上半叶）的身上发现了这种倾向，他表现出了法家概念与正名论的密切联系；人们在《庄子》的著名疏证者郭象（卒于 312 年）的身上也可以发现这种倾向；王肃（195～256 年，大家把抛弃了繁琐诠释的经典疏证著作归于他）也非常关注社会等级问题。

人们在这些发展方向中发现了当时政治形势（曹操及其继承人创建了受法家影响的一种军事专制）的影响、汉代那特别兴盛的理论对个人命运组成因素的影响以及一种行政措施的影响，这种行政措施根据公职候选人的行为和人格而对之分类，并用一种简短而切中要害的准则来总结办案的官员——“中正”们的工作。从公元 3 世纪初叶起，人物分类就变成了中国知识界讨论（也就是被

称为“清谈”的自由而公正的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彼此斗口才、比滑稽的有趣答辩和使用高雅语言的这些清谈,可能逐渐地将其性格学的内容扩大到了文学、艺术、伦理和哲学问题上。清谈继在4世纪初叶的大规模移民之后,变成了南朝门阀小集团的典型特征。这类“清谈”的一些古老例证都被保留在5世纪上半叶的一部著作中了,这就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此外,南朝时代的整整一大批卫道著作可能向互相牴牾的古老讨论习惯借鉴了其形式。这些论著成了在4~6世纪的文人佛教徒及其对立者中最受青睐的武器,从《牟子理惑论》(其时代不详的著作,写于越南,它无疑是这种体裁的最早著作之一)一直至于510年左右出现的巨帙对话录《弘明集》等著作都是如此。

在作为3世纪典型特征的法家和正名思潮发展的同时,从2世纪末起又表现出了对被置于老子名下的一部讖纬著作《道德经》和对《庄子》的新兴趣。它于3世纪导致了一种新的哲学方向,即把周代的古占卜书(《周易》或《易经》)与这两部著作联系起来。这就是大家所说的“玄学”,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无名论》和《无为论》的作者何晏(卒于249年)、卒于23岁的天才哲学家和《老子》与《易经》的注释者王弼(226~249年),被郭象(卒于312年)收入他自己的疏证文中的一大部《庄子》疏注的作者向秀(227?~272年)、人们把《崇有论》归于其名下的裴頠(267~300年)。这都是玄学派的支持者们触及到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被想象出来的“有”和“无”之间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关系,而是如不可分割一般。有特定的、有名的、变化的和多种多样的东西,它们都有其必需的反面,其本体论的基础是作为一切可见现象之源的根本的无;有或无的优先性、圣人缺乏或存在情欲、思想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音乐之本性……

这些本体论的思辨在诸如郭象那样的人身上与法家和正名论的解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它们在310年左右向南方大量移民

人性、自由、美学和诗学

之后应该是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成功,在4世纪期间又因大乘佛教提供的内容而面目一新。一切皆空的大乘佛教教理具有吸引“清谈”和辩论“有”与“无”、“体”与“用”的业余爱好者们的因素。它与玄学观念的明显相似性在近一个世纪期间掩饰了与汉族传统相对的外来哲学的根本差异。

玄学那神秘和本体论的思辨在3世纪时经常与一些保守的社会理论相联系,其灵感启示则取自于战国时代道教运动的深刻倾向。这种运动相反却在文学界由反传统的态度所表现:蔑视礼仪、放任自流、对于政治生活的无动于衷、对自发性的癖好、热爱自然……思想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厌恶规章、为艺术而酷爱艺术则成了延续于3~4世纪的整个动乱时代的特征。人们甚至还可以讲一种在整个中国中世纪都占据统治地位的“唯美主义”。第一批表现出了这种与古典传统明显格格不入之倾向的就是那些被人称为“竹林七贤”的人。这是一个由一些生活放荡不羁的文人组成的小集团,诗人和音乐家嵇康(223~262年)是其中的最著名者。在向长江流域大量移民之后,同样的思想状态、对自然和自由的同样爱好也自然长期流传于望族中。人们在著名书法家和诗人王羲之(约为307~365年)的周围又发现了同样的一批人,中国文学和书法史上最著名的一段插曲则与王羲之的名字相联系。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地区)举行的兰亭会上,共有41名诗人经过多次畅饮之后从事了一次即席赋诗的比赛。

自《古诗十九首》(抒情诗的第一种典范,无疑应断代为后汉)以后,直到7~9世纪的古典诗黄金时代,中国诗歌一直在持续的发展并以一些伟大的名字作为其里程碑。如果说建安时代(196~220年)著名诗人们(建安七子)及其同时代人曹操与其子(曹丕,187~226年,魏文帝;曹植,192~233年)的著作尚为那些参与了

军事和政治活动、忠于通俗内容、充满汉代乐府之生气与纯朴特征之辈们的作品，那末4~5世纪的诗歌相反却表现了在政治上的超脱和为自身而追求美的技巧，后者就好像是南朝时代末期的典型标志。在嵇康和阮籍(210~263年)的著作中已经相当明显的道教倾向又出现在田园诗大诗人陶潜(陶渊明, 365~427年)的作品中，而山水名胜诗人谢灵运(385~433年)则是最早受佛教影响的诗人之一。

对于大自然的兴趣(正如通过道教观念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那里是可以过一种自由、纯洁和不受岁月干扰生活的仙人居住地或圣地)成了使诗歌与绘画等传统文物同时变得丰富起来的现象之源。在公元4~5世纪时，除了文人或道教徒传统的人物画、某些神灵鬼怪画和宫廷内部的生活画面之外，也出现了山水风景画。风景画受道教内容和观念的主宰，仍保留了其与巫术相关的记忆，但却已经符合对纯美学的关注了。因此，这种风景画在中国的出现要比它在欧洲于一种相差甚殊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历史早1000多年。从绘画不再如同在汉代那样作为一种手工艺品的时代起，其发展无疑是相当迅速的。它可能与书法相联系而变成了文化界最受欢迎的艺术之一。颜色千差万别，可以表达一种更复杂范畴的新的表现手法(表达多种观点，通过分层次的不同面而表达远近……)也都出现了。最早和最大的画家之一诞生于陶潜之前10年和谢灵运之前30年。此人就是顾恺之(354~406年)。

对于作品的与伦理范畴内的任何观念都无关的独立美学价值的高度重视、对于以批判方式进行分析以及对其分类的关注也成了中国中世纪的一大新鲜事物。使鉴赏和标准变得高雅起来的追求在曹魏和梁王朝之间的时代变得很明显了。第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是诗人曹丕(公元3世纪初叶)的《典论·论文》，其中比较了汉代的赋与诗歌作品各自的优点。当时就已经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观点在启发曹丕的判断了。道教大师葛洪又重复了这种做法，他于其

《抱朴子》(大约成书于 317 年)中宣称伦理学和美学彼此之间是互相独立的。后来过了很久,5 世纪上半叶的梁人钟嵘于其《诗品》中极力把自汉至梁的 123 名诗人分成三品并以大量评述来补充这种分类。特别是刘勰撰写的《文心雕龙》(6 世纪初叶)和著名诗文集《文选》(约为 530 年)的刊行,标志着这是中国文学评论史上的伟大时期之一。《文选》系由梁王朝宗室的一名太子选编,它直至今日仍为从前汉延续到 6 世纪初叶之间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史的主要史料之一。

一种分析和评论绘画的相似努力则与这种文学批评的努力相吻合。人们应感谢南齐(479~502 年)末年的谢赫编成了一部《古画品》,它评论了 3~5 世纪的 27 位画家的作品;陈代(557~589)的姚最又对目录作了续编《续画品》,其中研究了梁代的 20 位画家。

186 公元 4~5 世纪以及公元 6 世纪上半叶可以被视为南朝文学史上的一个成熟和重要革新的时代,而在陈朝(557~589 年)却开始出现了一种衰退,它无疑可以通过这后一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来解释。当时的倾向是从事表面化研究。一种以语意对立和语言谐和、四六言句的巧妙配和为基础的文风于公元 6 世纪时在赋文中获得了胜利。这种文体以“骈文”或“四六文”之名而为人熟知,并以战国时代末年和汉代的赋为远祖,但它在公元 6 世纪时具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矫揉造作和系统化的特征。最后,大家可能在一个相近的领域中发现了陈朝末帝宫中的矫饰、受艳情启发影响和诗歌之成功,其代表人物就是诸如徐陵(507~583 年)和江总(519~594 年)那样的诗人。陶潜、谢灵运和颜延之(384~456 年)之辈从中汲取内容的那些活的源泉似已枯竭。但这种在一个衰落时代的对形式化的追求不会是完全无益的,唐代的诗人们就懂得在他们对先前全部传统所作的总结中利用这一切。

道教界

玄学的信徒们在把对《老子》和《庄子》的研究与对占卜经典《易经》的研究结合起来时，致力于追求玄学和本体论的思辨，这实际上并没有多少道教的内容。上层社会的这些人士——“清谈”的爱好者们未曾接触过自上古和汉代就在他们之外持续存在的道教之宗教的、学术的和修持术的思想。真正的道教是一种具有不同程度的秘密思潮，其发祥中心是有时加入了五斗米道的庄子大教派的小圈子，而五斗米道是通过通灵人而作出神启和与天师变形有关的传说的占有者，并以师徒相传的该教派最高奥义为基础。从这各界中出现了一种圣徒传式的文学，其最古老的证据是由刘向于公元前1世纪末辑成的《列仙传》，后来又由佛教徒们模拟并获得了巨大发展。人们也应该把从干宝(317~420年)的《搜神记》起获得了巨大成功的神怪志异故事集的出现归于这些阶层。这些文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佛教故事和起源于道教的故事混合在一起了。

然而，道教界的主要目标是追求长生不死术、养生术和纯洁自身。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内所追求的诸多试验均与寻求长生不老药有联系。据李约瑟(J·Needham)认为，大家应该把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发明(特别是炼钢时使用的淬火术的发明)归功于这些试验。有关这种中国炼丹术(其实实验操作涉及到了水银、铅、硫、金和银)的最古老文献是于公元2世纪撰写的《周易参同契》。而具体内容则由公元4世纪初叶道教学术史上的最大学者之一葛洪(283~343年?)所写，他是一部道教修持术著作《抱朴子》(约为公元317年)和一部仙人传《神仙传》的作者。葛洪似乎主要是掌握了药材配制技术、炼丹术、医学和天文学。他也可能在热带地区(特别是广州)的长期居住期间学到了土著居民们的诀窍秘方。葛洪的主要继承人在华南是陶弘景(456~536年)。他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

思想家,掌握了其时代的所有知识:数学、阴阳理论、舆地学、炼丹术、医学、药学……既有儒教又有佛教的传统。人们都把一部对古药理学论著的注释文《本草经集注》归于了他。葛洪在华北地区对寇谦之(363~448)也产生了影响,后者是出自长安一个富门豪户的著名人物,该家族自称与天师世系谱有联系,其中第一位祖师就是五斗米教的创始人张道陵。寇谦之于424年与北魏宫廷保持着关系并且成功地使太武帝(424~451年)能听他讲道。他于讲道时声称辨认出了一尊道教之神的化身。当对佛教僧众们发动法难时,他与文人大官吏——太武帝的大臣崔浩串通一气。但对立宗教的影响却使人感到了,人们应把受佛教戒律启发的最早道观机构的创设归于寇谦之,人们从此时起就发现了道教信徒队伍的诞生和发展。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模拟了佛教僧侣界,同时也拥有经文、道观和仪轨。

二、佛教的大虔诚

由于地域扩张以及所触及到的从伊朗边境到日本、从中亚到爪哇的居民数目庞大和形式多样,佛教在亚洲的传播成了一种比几乎是同时代基督教在欧亚大陆的西部的传播在规模上更要大得多的现象。随同佛教而来的文字传说的广博性、教派的多样性和文化内容的丰富性又增加了这种现象的复杂性。

当佛教从公元1~2世纪开始进入中国社会时,它已经具有一种悠久的历史了。它于此期间已充满了伊朗和希腊文化的影响,尚且不讲它向北印度和南印度借鉴的全部土著基本内容。在宗教虔诚非常强烈的时代(5~8世纪),它在中国社会之外的佛教化地区一直持续发展。但这些后来的变化伴随着它从8世纪起在吐蕃所具有的形式也波及到了中国历史,变成了喜马拉雅山区山地民和草原游牧民的一大宗教。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佛教影响在东亚发源地的这些发展和差异。如果说传入中国的佛教实质上是西域绿

洲以及位于阿姆河东南地区的那一派,那末其他许多教派在某些时代也大放异彩,更具体地说是位于克什米尔、锡兰、苏门答腊、恒河流域等地的佛教教派影响了中国中原地区教理的发展。

但更有甚者,诞生于印度东北部的大宗教可能在中国适应了一种与它在其中诞生的那种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在它的某些内容符合属于汉末和晚期中国社会各界所特有的关注与传统的范畴内,佛教被传入到了中国社会中。一种佛教教派就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它以其僧众、僧阿兰、庄园、寺户而根据望族、村社、国家权力的不同需要和利益而形成了。佛教以其社会、政治和经济作用,通过它对于4世纪左右和11世纪初叶之间的思想所实施的真正统治,并由于它直到当代对文化史施加的有时是神秘而又深刻的影响,在那里同时丰富和打乱了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的传统。

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之所以蔓延到了亚洲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那是由于它沿着通商大道前进并受到了交流大潮流的推动。这一方面是由于把阿姆河流域与甘肃联系起来的一线绿洲,另一方面是印度洋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所沿用的海路。内大陆贸易的突飞猛进和海上交流的发展几乎是同时代的,而且是从公元初年起产生的。

另外,还必须使公元前6世纪末产生于恒河中游地区的佛教,在以新内容自我丰富的同时,又逐渐不再是那些断绝红尘者们所专有的圣洁手段,而变成向所有人开放的一种普度众生的宗教。一种高僧传应该是在该时代发展起来的,它使历史上的佛陀环绕着一种奇特的光晕,符合世俗信徒们的兴趣(释迦牟尼的前世轮回,即本生事,它说明了该大上师的利他主义品德),其他与他相似的佛陀(首先是未来的救世佛弥勒)的形象也逐渐明朗化了。在佛教中形成了一种崇拜,包括对舍利、大师、佛教圣徒、罗汉、神仙的崇拜。这种发展产生于出自大师教义的教派内部本身。但它可能是

189 在公元初年左右于印度西北部造成了一股强大的革新潮流,它脱离了该大师的教义而取名“大乘”,无限地增加了宗教形象的数目(无数世的现在、过去和未来三时佛与菩萨,他们出于对众生的慈悲而推迟了进入涅槃的时间,以便皈依众生并且从轮回转世的永久痛苦中救度他们)。佛教就这样变成了世俗人的一种宗教,由从印度河流域到阿姆河盆地之间延伸的那片注定要成为贸易地区的商人们所选中采纳。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这些地区与印度影响结合在一起的伊朗和希腊文化影响似乎也强有力地帮助了这种发展。正是在这种诸文明的汇合处,佛陀无疑是首次被描绘成人形,一种受希腊文化影响的雕塑艺术(西巴基斯坦北方白沙瓦地区的犍陀罗学派,其影响一直向东传播,这就是德里与亚格拉之间的孔雀城的学派)发展起来了,舍利塔(宰堵波)的形式在这些地区起了变化并向高水平发展,佛教摩崖石刻的习惯做法也被人接受了,喀布尔西北部的巴米羊石窟则提供了这些石刻中最著名的例证之一。

阿育王时代(公元前 272~公元前 236 年)的印度孔雀王朝帝国一直向兴都库什发展,这已经加速了佛教在这些地区的立足(支持佛教的阿育王石刻是用一种遭歪曲的梵文写成的,这就是普拉克利特语,用阿拉美文和希腊文写成)。但正是贵霜(印度—斯基泰帝国,来自甘肃的大月氏人和吐火罗人)帝国(其鼎盛时代处于公元 50~250 年之间)的形成,似乎在佛教向西域直到向中国社会的发展中起了一种决定性作用。立都于白沙瓦(布路沙布逻;丈夫城)的该帝国控制了印度的西北地区、克什米尔、今西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的东部边陲、阿姆河流域和塔里木的西部盆地。此外,中国向西域的开拓以及塔里木盆地和黄河流域之间贸易的发展,可能促进了佛教影响在中国的渗透。

因此,历史背景同时解释了某些相差甚殊的传统在中国社会中的突出地位,这些传统来自位于印度河流域与伊朗东部之间的

地区、河中地、克什米尔和西域绿洲(主要是于阗和龟兹);它们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佛教影响首先是在中国北方的商业城市民界中让人感到的。汉文佛经的最早译师并非是印度人,而是安息人、粟特人和印度—斯基泰人,或者是由粟特或印度—斯基泰血统的父母在中国中原或中原边陲地区所生的人。

对汉帝国佛教僧众教团的首次记载应被断代为公元 65 年,其地域被定位在江苏北部很靠东的地区。人们由此可得出结论认为,佛教已经立足于这些商业与国际性的中心地区,这就是甘肃诸城市(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以及藩邦人很多的京师(长安和洛阳)。

佛教经海路进入中国似乎是比较晚期的事了。印度洋与东南亚之间的海上贸易似乎应首先造成了印度支那半岛的江河流域、其后造成了苏门答腊(巨港、渤淋邦)、爪哇沿海平原的“印度化”和“佛教化”,它们解释了原籍为介于印度河与东伊朗之间地区的商人和出家人首先在今越南北部(河内地区)、广州以及长江流域的存在,其次是在印度以及锡兰岛之间各省的存在。但这种现象似乎仅仅从吴国(222~280 年)在长江下游形成、商业活动在越南红河流域和广州平原地区的地理人文范畴内大发展时,才使人明确地感觉到。公元 3 世纪初叶,就已经提到了交州(河内地区)的大批外国人,当时从印度文译作汉文的最早译经师之一的康僧会于 247 年到达南京,他在越南诞生于一个定居在该地区的粟特血统的商人家庭中。

佛教的适应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并适应于中国社会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其不同的表现形态似乎彼此之间相对独立。外来宗教从未以一种完整整体的形式在中国存在过,其组成部分可能杂乱无章地如同是由崇拜供像的宗教仪轨、一种尚不为人熟悉的修道生活、一大堆伦理规

则、各种不同教理、三昧静修或因兴奋而狂舞的修持术加在一起。一方面是仪轨和虔诚,另一方面则是教理和哲学,它们首先彼此互无关系地发展起来了。这就是佛教特别引人注目的某些组成。由于纯属于中国社会各界的某些传统与它们所具有的相似性,这种外来宗教在基督纪元最初几个世纪中被认为是道教的一种变种,甚至那种认为佛教是古代道教影响之产物的思想(由此而出现了老子化胡的内容)也随着时代发展起来了。但无论道教的作用多么重要,也是中国社会中的所有宗教、伦理和哲学传统以更广泛得多的方式和由于某些相似性而促进了这种全面的同化现象,它同时涉及到了公元 2~8 世纪的社会史和政治史。

191 佛教在中国存在的第一种可靠证明是于公元 65 年提到了建立在江苏北部贸易中心彭城的一个寺院,系由皇家宗室某成员所建。当 166 年在汉宫中举行仪轨时,佛陀在那里显得与黄老的道教之神有联系。依然是在彭城,一篇经文揭示了 193 年由一位地方上的小王公建立的一座具有佛教风格的塔,它同时也提到了举行斋供的做法和为供像开光的佛教仪轨。这些证据表明其早期发展尚不为人所知,而其作用无疑是重要的宗教仪轨活动。来自西域的宗教以其新颖特征而引人注目;不可避免地会唤起都市界的好奇心和注意力;立佛、跪佛或卧佛,以豪华衣服和装饰品点缀;以单调念经相伴的仪轨;不为人所知的歌乐;其顶端与中国古代建筑术中的横水平线截然不同的舍利塔,并在建筑物的顶端竖起高杆……

宗佛仪轨活动提出了一个具有根本性和广泛意义的问题,也就是由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生活方式同化佛教的做法。无论是哲学和教理范畴内的借鉴,还是夹杂着中国北方半蒙昧君主们之恐怖的对巫僧的崇拜,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社会从 5 世纪末起所经历的强烈虔诚的整个运动,甚至也无法解释佛教在中国到底是怎样变成一种大宗教的。在宗教仪轨和土著僧伽的问题上,出现了一座地下的和使人很不熟悉的工程,唯有其成果在佛教以其僧侣、信徒和

阿兰若而变成一种中国宗教时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相反,人们对于在公元初 4 个世纪期间利用某些类似性而向佛教借鉴的属于文化或修持术范畴内的一系列内容之不完全消化却了解得更多一些。人们可以列出这些借鉴及其中国的对应内容的一幅统计表:

——羯磨(通过转世而对行为的报应)的佛教教理与中国的个人名份之观念。

——色空的大乘教理与玄学派对于有无的本体论思辨。

——一方面佛教的利他主义、纯洁性和伦理(五戒主要是抨击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逃避公共生活的上师与断绝尘世的天师之修仙和理想生活。

——佛教的瑜伽修持(禅定,控制呼吸、视身体如腐烂物、彩色形象之显现……)、因兴奋而狂舞和道教的出神入迷。

——佛教和中国的巫术(占卜、医学和幻术)。

如果说第一部印度经文的汉文编译本(《四十二章经》)可以被断代为公元 100 年左右,如果说洛阳和长安的译经活动在汉末(尤其是在安息僧安世高于 148 年到达京师之后)以及在曹魏帝国(220~265 年)远不是可以忽略的,那末佛教的影响首先就仅局限于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也就是与胡商聚落保持直接接触的各界之范围,人们于其中无疑可以计算到大批出生在中国和在不同程

192

maraksha, 230 年左右诞生于敦煌, 其父母为印度—斯基泰血统) 于 284 年定居在长安之后, 大乘佛教的某些教理内容才开始传入京城的望族小范围内。这正是以向秀和郭象为代表的玄学取得胜利的时候。从这个时代起并经过汉族上层阶级向长江流域大量移民之后, 人们发现热衷于“清谈”的各界对于佛教空宗教理、对于羯摩和通过轮回转世而使生灵永存之教理颇感兴趣, 一场大规模的佛教传播运动发展起来了。由于望族界对于佛教的这种纯哲学的兴趣, 所以才在南京诸帝国中产生了世俗界和最早僧伽之间的一种互相渗透。具有高深中国文化修养(这是当时的文化,《老子》和《庄子》的疏证文于其中占据着一种重要地位)的文人僧侣并不罕见, 汉僧支遁(支道林, 314~366 年。其影响在江苏以南和浙江以北以及在京城都很大)可以被视为这些有文化教养的出家人的一种典型表率。

这种哲学家的佛教是玄学传统和向大乘经文(《般若波罗密多经》和《维摩诘经》)借鉴的神秘论与本体论思辨之混合物, 其成功似乎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420 年)。这种佛教在中国北方却未出现过, 来自西域的具有深奥学问的传统仅仅从 4 世纪末起才在那里开始扎根。经过导致了晋帝国在北方诸省的崩溃和胡族王国的形成的动乱之后, 正是后赵君主石勒(319~333 年)和石虎(333~349 年)在河北西南部的王朝显得好像是变成了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一位无疑是龟兹血统的僧侣佛图澄(圆寂于 349 年)由于其占卜师和巫师的才能而受到了这两名胡族暴君的赏识, 这是继 4 世纪初年的大规模移民之后, 佛教在中国北方第一次发展高潮之起源。仪轨和虔诚、巫术、对于三昧禅定修持的爱好, 形成了这类宗教的特征; 它受到了建立在这些地区的短命和粗暴的游牧藏族血统王朝的庇护。但国家的保护可以促使修道中心的崛起和佛学研究的发展。继 4 世纪中叶之后, 长安变成了这类研究的主要中心。¹⁹³ 汉僧道安(314~384 年)是佛图澄的弟子, 于 349 年被石虎的继承

人召到了长安，他成了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颇为关心小乘的禅定修持、《般若波罗密多》经文中一切皆空的教理、旧译经文的历史（大家都把于其中附有很具学术价值之传记的佛教著作的第一部目录《综理众经目录》归于了他，它共有 600 条目录），并成了崇拜弥勒菩萨的首倡人，也是第一个颁布修道戒律和对小乘作经院哲学式分类的人，又是第一个注重突出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对的佛教特有意义的人。他的影响无论是在中国北方（他在长安的教派可能因大译师鸠摩罗什而一直持续到 5 世纪中叶），还是在长江流域的中国（道安于 365~379 年居住在汉水中游的襄阳，他与东晋帝国的佛教中心维持着关系，其数名弟子后来都定居到长江流域地区了）都很大。

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大高潮

5 世纪的初叶由于中国长江流域的慧远(334~417 年)和中国北方的鸠摩罗什(350~413 年)这两大高僧而辉煌一时，它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决定性转折期之一。于是，佛教就在这种由整个宗教团体形成的非常复杂的现实的所有领域中都获得了其独立性。有关印度和克什米尔大教派的知识获得发展并具体化了，译经的质量和价值获得了显著的进步，大乘所作的贡献再也不仅限于一批哲学观念了。世俗和宗教界的虔诚与统一思想本身形成了这场运动的特点，佛教由此而变成了一种伟大的救度宗教并开始充满中国社会。此外，5 世纪的最初几年标志着一个有组织的僧众集团的初创（该集团由于某些重要的毗奈耶译经而拥有了明确的戒律），它以从中国僧侣前往印度化地区“求法”的人数增长为特征。这就是说，他们前去向胡族大师们学习，并携回了一批尚鲜为人知的文献。

这些进步是自从中国社会与西域、印度和伊朗边陲的胡人的重要宗教保持接触以来所产生的缓慢而成熟的结果。但龟兹鸠摩

罗什和汉僧慧远这两位高僧的著作也不会与此毫无关系。

194 慧远诞生在山西北方的一个文人家庭中，从青年时代起就在河南接受了一种经典教育。他皈依道安，并很快就成了其最杰出的弟子之一。约为 380 年左右，慧远前往位于九江以南的名山庐山，在那里的东林寺创建了长江流域的最大佛教中心。由于他与东晋末年的望族文化界保持着关系，所以他也与鸠摩罗什^① 维持着涉及到了教理观点的学术通信。他很关心禅定修持术——它在修道传统中是一种可达到智慧（即对绝对而不是推论现实的自发思考）的手段，他向其世俗弟子们传授圣像的使用方法以及把佛陀化现成为能使世俗人得到的三昧修持方法。402 年，慧远集中了其整个僧众集团，亦即把僧俗人都集中在一躯阿弥陀佛像之前，他们共同发愿将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大乘佛教的主要代表人物就居住在那里。这就是使全部信徒所共有同一种信仰的首次表现，而佛教于其中显得如同是一种普度众生宗教的第一种环境。此外，作为慧远教义之特征的内容，似乎是使中国精英理解形成佛教实质的要素，并且是使之彻底区别中国社会中宗教文化传统的要素。

鸠摩罗什诞生于龟兹绿洲的一个贵族家庭，曾在说一切有部教派的小乘传统和佛教瑜伽修持（禅定）占统治地位的迦湿弥罗学习。他在疏勒皈依了大乘宗。返回龟兹之后，他被强大的前秦王朝的吕光将军囚禁并被在武威（凉州）扣押 17 年之久。后秦的“吐蕃”君主姚兴在 401 年征服甘肃时也皈依了佛门，并将这名高僧于次年迎至其京师长安。从此时起，鸠摩罗什组织并主持了一个译经小组，其活动扩大到了佛经的几乎所有领域，如以比较准确的方式翻译或重译巨部大乘经、律著、禅宗教义书、经院哲学和繁琐哲学的重要著作。鸠摩罗什获取荣誉的最大原因之一是他在 4~5 世纪

^① 鸠摩罗什曾在中国南方主持译经活动——译者。

向中国中原传播了一种出自大乘佛教并以一种辩证法为基础的中观学派,宣扬对于从法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内容,从表面真实来看则是错误的,或反之。在可能使人达到作为佛教目的本身的这种全面解脱的法与色之间存在的辩证法,是被人经常使用的论据。

因此,慧远和鸠摩罗什的时代标志着一种博学的、清醒的知道其新颖特征的佛教之出发点,同时也是在5~8世纪的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中广泛发展的一种佛教虔诚的出发点。从5世纪初叶开始,与大乘佛教中的某些最著名经文中的人物相对应的东亚佛教中的一些特别著名的人物出现了,如弥勒菩萨、观音菩萨、文殊、普贤、阿弥陀佛和药师如来……从这一时代起,在6~8世纪时导致了纯粹是中国式佛教派别的宗教思想的形成。 195

440年可以被视为中国北方政治和宗教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拓跋氏的北魏大帝国直接控制通往西域道路的时间应该被断代为这一年。经过在424~448年这一短暂的时代中由天师寇谦之保护的新生教道教派在北魏宫中受宠之后,佛教又倾向于变成一种国教。高僧昙曜于470年左右被敕封为僧统,也于同一时代形成了直接属于寺院的一个特殊阶级(僧祇户)。当时的北魏京都大同西部的著名云岗佛教石窟和雕刻工程开始于489年。在北魏于494年从大同迁都洛阳之后,新京城变成了亚洲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佛教虔诚似乎正是在这个时代同时在北方和长江流域达到了顶峰。这个强烈信仰的时代也正是北魏胡太后和“菩萨皇帝”武帝(6世纪初叶)在位的时代,它一直延续到武则天后统治的时代(690~705年)。

宗教、社会和政治

从300年左右开始,望族集团所表现出的兴趣、诸如中国北方的石虎(333~349年)那样的胡族血统的君主对于僧人的虔诚、印度经文最早的译本以及最早的皈依,并不意味着一场强大和全面

虔诚运动的存在。相反,当中国开始遍地建佛塔和阿兰若、在山崖上挖凿大量佛教石窟、出家人的数目迅速增长时,当从4世纪末开始提到最早的神秘自杀时,这种现象并未简单地改变社会等级而仅仅是改变了事物的性质。为了理解它,人们应该研究社会现象学;城市和村庄的居民区、豪门世族的墓地、为祭祀土地神的汉族祭祀组织(社)、范围更大的村镇集团(邑)。佛教皈依最早主要并不是个人思想意识之事,而是加入一个信徒集团。佛教远不是要取代宗教生活的古老形式,而是在传统类型集团内部形成并根据其模式而创建了新集团。它就这样被深刻地汉化了。最重要的事实是以宗教崇拜的新地点(寺庙、阿兰若、山寺、朝圣进香之地)为中心而对社会物质进行重新分配,其表现形态不但是宗教的,而且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的。

佛教在中国南方适应了一种以拥有庄园和食客的望族势力为特征的社会。寺院连同其庄园和寺户以世俗界为楷模。在中国北方,中央政权的力量相反却导致佛教去追求作为一种受宠之源的君主们的支持。这些社会和政治特征解释了为什么佛教大中心都分散在长江流域和中国南方(除了南京之外,便是江陵、襄阳、鄱阳湖附近的庐山、苏州地区、浙江绍兴地区、最南端的广州地区、四川峨眉山……);在中国北方,其中心则相当于各京城。如果说南方的一位诸如慧远(334~417年)那样的高僧意图明确地肯定僧伽对于政权的相对独立性(他阐述“沙门不敬王者论”原因的著作被断代为404年),而北魏的僧统法果(圆寂于419年)则试图把皇帝比定为佛陀本人。那种把佛教僧伽纳入国家范畴的倾向曾清楚地和多次地于5~6世纪在中国北方表现出来。隋唐两代重新统一的中国继承了望族和国家在宗教政策方面的双重传统,这就是严格地减少僧侣和对他们实施严密的控制。它们在446年于北魏和于574年在北周就表现出来了,于9世纪时在那里取得了胜利。

佛教僧众在政权的促动下曾同时试图确立它对于国家的独立

性(慧远于5世纪初叶是第一个奠定僧侣界独立原则的人),出家人无论在刑法方面还是在公共义务方面(徭役、赋税和人头税)都不接受普通司法的管辖。此外,僧伽的财产都被认为是不可剥夺的,由僧伽的禁令保护而不受任何私自占有。这些特权相反却导致了对修道规则的尊重(剃度、独身、遵守宗教戒律)和了解仪轨与经文。在保护新宗教和主动采取虔诚行为(度僧、造寺、各种布施……)的同时,政权则从自己一方极力对佛教僧伽实施一种控制。但这种信仰的发展从5世纪起变得如此普遍和如此强大,以至于这种现象可能成了大量经济和政治困难之根源,国家面对这些困难时往往都表现得无能为力。数量过份庞大的假度僧使国家失去了其部分收入、劳动力和兵源,寻求寺院保护的农民大众人数的增加,由一系列的赏赐或伪造出售土地而使土地被兼并,维持出家人的生活以及组织斋供而导致的数额相当可观的开销,铸钟和铸像而引起的金属匮乏,寺院的经济实力、占有面积非常辽阔的山地和耕田、水碓和油梁的地产,与皇帝后宫嫔妃和贵族们相勾结并利用了无数次同谋关系的僧侣们的隐蔽权力,由佛教对传统伦理道德造成的损害(巨额开销、家庭关系的破裂、免除对国家的义务),某些教派的颠覆特征,所有这些由于新宗教的影响而造成的弊病,都经常不断地受到最关心国家利益的官吏们的揭露。这样就可以解释为减少从教人士和僧侣数目以及为限制僧伽财产而作出的努力了。这就是佛教徒们自己所称的“四大法难”(四次灭佛),即446年的北魏灭佛,574年的北周灭佛,842~845年唐代的灭佛和955年后周的灭佛。这些企图中的前两次都发生在中国北方,它们在那里受到了嫉妒佛教僧侣特权的道教界的鼓动。第三次在唐代发生于一种非常不同的背景中,这种背景就是对非常广泛地渗透进中世纪和初唐中国社会中的外来影响的“民族化”运动及其反响。

197

进香朝圣

有关传入中国的佛教之有文字记载的传说不具有任何连贯性,而且是出自大乘和小乘的不同宗派。此外,经常使用借鉴自道教传说的相似辞语的最早期译本都是不完整的,读起来很困难,有时其中也纳入了一些由口头提供的传说。当从4世纪末起,佛教开始以其极端特殊的差异性而被人更好地熟悉时,这些不足和弊病也开始被人感觉到了。这就是进香朝圣的主要动机:必须确立真宗和从“佛国”取来更多数量的真经。所以,那些指由于纯洁的虔诚心而前往圣地旅行的“朝圣进香”之术语,该多么不适宜指由中国僧人穿行亚洲而完成的长途跋涉啊!至于印度东北和西北的圣地与佛教史上的重要地点的吸引力,它们事实上只在主要发生于5世纪末叶到9世纪初叶之间的朝圣进香的大规模运动中,扮演一种次要角色。

现在已知的第一名汉族朝圣取经人是朱士行,他曾于260年前往于阗学习并在那里一直居住到圆寂为止。大约也在同一时代,著名的译经师竺法护(Dharmaraksha)进行了一次赴西域绿洲的旅行,并于265年返回长安。然而,那些于3世纪末和4世纪前往西域地区的大部人却始终不大为人所熟悉。当圆寂于385年的高僧道安撰写其《西域志》时,可能利用了由这个时代的朝圣取经人所提供的资料。不过,仅仅是从400年左右开始,赴西域和印度的汉僧的旅行才日益增加。第一位在绿洲地区、印度和东南亚留下了其长途旅行游记的名僧是法显。他在60多岁高龄时于399年离开了长安,可能朝拜了龟兹、于阗、疏勒、罽宾、高附(喀布尔)地区、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他在孟加拉湾的港口多摩利帝(Tamralipti)乘船出发,先到达了锡兰(师子国),然后又到达了室利佛逝(Cri Vijaya,今苏门答腊东海岸上的巨港)。在他于412年返回广州的行程期间,曾偏离航向而一直到达山东海岸。他携回了

大批经卷稿本并且在南京与印度僧佛陀跋多罗(Budhabhadra)共同译出了其中的一部分。法显撰写了有关他 15 年间经由 30 多个国家的一部游记。这就是《佛国记》(《法显传,佛国记》),它是该时代完整地遗留下来的唯一一部游记。5~6 世纪写成的其他大部分游记确实都已亡佚或仅仅以片断的方式保存下来。刘宋僧法勇于 420 年偕 25 名教友从四川向西域出发,经印度洋、东南亚和广州而返回中国。其《外国传》的片断也被保存了下来。但智猛的《外国传》却丝毫未被保留下来。他于 404 年与另外 15 名僧侣离开长安,于 424 年返回甘肃武威。若无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已被断代为 547 年)对洛都市场的著名记述侥幸为我们保留下来的资料,那末我们对于魏代笃信佛教的胡太后的使者宋云出使印度西北一个王国的情况就不会知道任何详细内容。宋云于 518 年由一些汉僧陪同途经了吐谷浑人的领土、罗布淖尔、位于克什米尔以西地区的于阗绿洲、乌仗那、犍陀罗以及他在那里居住了二年的印度河上游地区。他于 522 年返回了北魏首都。其个人的游记《宋云家记》现已失传。

至于那些前往西域、罽宾、今阿富汗北部、恒河和印度河平原、南印度、锡兰、苏门答腊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中国朝圣进香人在旅行期间所作的游记,由于其简练和具体的特征,已成了有关这些地区在 5 世纪初叶至 8 世纪末叶之间的历史的最珍贵资料。如若无法显的《佛国记》、由 6 世纪初叶北魏酈道元(?~527 年)辑成的历史地理疏证文《水经注》中搜集的资料,若无由僧人道宣(596~667 年)于 650 年完成的有关 7 世纪印度文明的重要著作《释迦方志》、7~8 世纪朝圣进香人所作的详细记述,那末我们实际上就会丝毫不知道在中世纪初期印度化亚洲的历史。

汉文佛教译经和文献

200

印度佛经(梵文、布拉克里特文和巴利文)的汉译经文分阶段

延续了近 10 个世纪。最早的译经被断代为公元 2 世纪下半叶，最后的译经则应断代为 11 世纪。它们覆盖了印度和佛教化地区的所有佛教教派，形成了一批数目相当可观的经文：共约有 4000 万左右的汉字和 1692 种经目，其中的某些经文在不同时代曾被多次翻译。这就是在曾被用作佛经传播工具的亚洲各种语言中现存的有关经藏（被归于佛陀的说法）、律藏、论藏、经院哲学文献的最丰富和最广泛的史料。

首先经过第一个摸索探求的阶段（这就是“古译”），其中的译本或由于过分牵就中国大众而太蹩脚或由于过份确切而几乎无法理解了。由于在 5 世纪初叶形成了以龟兹僧鸠摩罗什为首的译经小组、稍后不久又有了原居住在扶南并被梁武帝于 548 年从广州召至南京的天竺僧真谛（Parāmartha, 500~569 年）的译经小组，译经的严格性和文笔得到了巨大发展。这就是“旧译”时代。第三个阶段是随着 7 世纪的译经师们而得以超越的，他们强制性地规定了一种统一的词汇和一种技术上的严格性，从而使唐代（7~9 世纪）的“新译”失去了先前时代作品所具有的文学意义。

从一开始起，译经小组似乎就是根据在 5~8 世纪行之有效的原则组成的。这些小组共包括数目相当多的汉族和胡族僧俗合作者（其任务无疑被越来越严格地确定下来了），他们高声口译经文、以文字作记录、核对其意义的确切性、加工润色其文笔和确保最终定本译经的确切性。

译经的序言、跋尾和题跋以及经书目录提供了有关经文被翻译时情况：将之传入中国的人士、有关著作本身的传说、其作者、印度与佛教化地区佛教学派与新派的宝贵资料。正是由于这些表现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具体和准确性的非常深刻之爱好的资料，人们才得以再现亚洲的佛教史。在 515~946 年间，我们共计算到不少于 14 种有关附有疏证和各种资料的汉译佛经的目录。其中的最著名和最确切者是僧祐和尚著的《出三藏记集》（515 年），它重复

并公布了今已失传的道安经目(374年)和僧智昇的经目《开元释教目录》(730年),并成了汉文经学的代表作之一。

甚至除了印度经文的译经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从4世纪起发展起来的丰富的汉文佛教文学。这就是有关印度或中国佛教史、大藏经疏注文、中国高僧传集、中国教派史、伪疑经等的著作。这些数目巨大的宗教文献、译经和在中国本土写成的著作,都不会不对世俗体裁的中国文学施加影响。

佛教对中国社会的贡献

在印度和伊朗之间的地区,希腊文化的影响始终相当明显,足以对佛教艺术留下深刻的烙印,它从原来仅仅是象征性地变成了可以用具体形象表现的了。这样一来,一种印度、希腊和伊朗影响的混合艺术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一直传到了西域的诸绿洲,再从那里传到中国的北方、朝鲜和日本。中国和日本的某些雕塑像于其波浪形皱褶、姿态和面庞中保留了对希腊供像的模糊记忆,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统一性的一种确凿明证。

与雕塑艺术同时,一种完全属于印度—伊朗边境和印度风格的建筑术传入了中国北方,这就是在山崖上挖凿的石窟建筑。印度、阿富汗和西域的这些山岩僧伽蓝(喀布尔西北巴米羊的遗址提供了一种最为著名的例证)已由法显在他于5世纪初叶朝圣进香时、宋云于6世纪初叶出使印度北方时、玄奘于初唐时所指出。在敦煌附近的千佛洞遗址开凿的最早石窟可能始于366年。在5~8世纪之间,其供像特别大的山寺石窟往往都是从山崖本身之中延伸出来的,它们在从四川直到山东和从甘肃直到河北的中国北方日益增多。最为精美和最庄丽的山寺群落往往是根据皇帝的圣裁而由信徒们合作建造起来的,它们以我们的“主教堂”或“大教堂”的方式证明了在这些时代控制了中国社会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宗教虔诚运动:例如大同西部的云岗石窟,那里的工程持续于489~

523年,后来于隋末又重新开工,那里最大的雕像有40~50米高;再如北魏从5世纪最后几年开始继大同之后于新都洛阳以南开凿的龙门石窟,那里的工程在6~7世纪时几乎未曾中断过(龙门的大日如来及其二弟子的雕像是在627~675年间竣工的);又如甘肃天水附近的麦积山石窟。但除了这三处著名的遗址之外,在魏、齐、周、隋和唐朝这个修建阿兰若和中国佛教建筑的黄金时代中,要列举在中国北方挖掘的佛教石窟则会太冗长了。来自咀叉始罗(Taxila)、孔雀城(Mathurā)以及于阗、龟兹、吐鲁番诸绿洲等地的影响无疑也解释了人们从一个遗址到另一个遗址所发现的风格之差异。这些遗址中的大部分都保留了可以断代为五代和宋元王朝(也就是10~14世纪)的晚期工程遗迹。这是一种处于其衰落期的虔诚和一种失去了生气和气魄的艺术之明证。

洞窟的石壁和寺院的墙壁提供了一种宗教绘画的载体(佛陀前世的本传场面、佛教诸神、对地狱的描绘……),摆脱了潮湿侵蚀和文物破坏之劫难的仅有重要例证位于敦煌附近的千佛洞。5~6世纪时的某些绘画同样也存在于吐鲁番附近的阿斯塔那。这种民间的、受西域和印度西北部影响的艺术,帮助我们想象出了由于诸如吴道玄(吴道子,诞生于680年左右,长安寺院宗教壁画的作者)那样的著名艺术家们使之享有盛誉的佛教绘画之伟大传统的真实内容。

完全如同在5~8世纪时流传得非常广泛的佛教绘画仅仅留下了一批数目很小的遗迹一样,现在也只剩下了最古老的佛教建筑术的一些很罕见古迹,虽然7~8世纪的某些寺庙的模式却在日本被虔诚地保留下来了。众所周知,中国最新颖的佛教建筑之一是塔,这是以中国建筑术造成的唯一的高层建筑,一般呈多层楼形,较少见的则是覆盆状。其模式在岁月的流逝中发展变化很大,它们最早(2~3世纪)是木结构的,后来更多的则是砖石和泥水工程,在宋代有时也有铁塔。佛塔直到唐代普遍为四角形,后来又是八角

形和十角形的，拥有的层数变化不定，每层的高度一般都是自下而上地递减，除非其高度是固定的（10世纪时）。最著名的佛塔（如在6世纪初叶于洛阳永宁寺矗立起来的高120米的佛塔）都已消失了。对于一直保存到我们今天的最古老的塔，大家只能提及嵩山的嵩岳寺石塔（520年左右）和两座于7世纪建于唐京长安的土木结构的塔。

人们肯定不会不重视宗教节日和表演一般都会对艺术活动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所提出的看法也适用于佛教。大批艺术家、画家、铸造家、雕刻家、建筑家都依赖寺院、世俗集团或富裕信徒们向他们的订货而生活。行佛仪轨和表演节目、窟中燃灯、定期展示保存在大型香火圣地的宝物，都可以同时服务于下述目的：传播佛法以及它的传说故事与其主要教义、以导致每个人的合作与参加的活动来使社会团结和宗教感情得以加强，以及一种全新的美学界的形成。大家可以把感受性的一种深刻而又全面的变化归功于佛教，这种新宗教把装饰、对同种图案的不知疲倦的重复（产生了木版印刷的宗教活动）之兴趣和追求豪华的兴致（涂金佛像、珍贵织物……）传入了中国社会中，但同时传进去的还有追求宏伟和风雅。所有这些倾向都与在线条和动作方面的那些由条理性、严格的明确性和正确性形成的古典传统背道而驰。

从艺术到文学，其距离是很容易跨越的，对于其中之一方适宜者对于另一方也会行之有效。所有倾向均相同，对它们的充实也相当重要。大乘宗的大佛塔在5~9世纪的中国的传播要比经典更为广泛，它适应了漫长的文学发展、同一内容的反复重复、诗和赋的混合。其气派更为自由一些的佛教诗歌影响了中国诗的发展。佛教不仅丰富了文学的内容，提供了借鉴自佛陀前世本传、入冥故事、朝圣进香、佛教名人的举止行为等无数内容，它也产生了新的文学体裁：当众说法、上师与世俗弟子之间的对话录、以诵读部分与演唱部分互相交替的办法将感化场面表现出来。它就这样促进

了一种通俗语言文学的发展以及传奇、小说和戏剧的未来发展。

随着佛教的全面胜利,世界观本身也起了变化:难以计量的时空无限增加、限入无休止的转世轮回中的人类命运(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的众生于其中混合在一起了:神、人、地狱生灵、饿鬼和畜生或傍生)以不可避免的方式屈从于行为之果的神秘现象。

但在佛教连同它同时带来的和有时也沾染上了伊朗与希腊文化影响色彩的印度文化的因素之中,印度的世俗科学占据了一种肯定是不容忽略的地位。印度的算学、星相学、天文学和医学在4~8世纪之间传进了中国社会中,这是由于“婆罗门教”著作的译本,但令人遗憾的是其汉文本和印度文本均已佚。一部论述404种疾病的印度医学著作也列在了147年到达洛阳的安息人安世高的译本中。一行和尚(683~727年)后来于721~725年组织了一次科学考察,其目的在于测量夏至和冬至时日晷上的影子之长度,在从越南中心地带直到蒙古边境之间共分布有9个观察站(北纬17°~40°之间)。此人非常精通印度算学和天文学。印度科学的影响从600年左右到8世纪中叶之间特别容易被人感觉到。

204

印度人精通语法学和语音学内容的例证可能会在中国鼓动人去分析语音,尽管其文字写法似乎具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印度名词术语的对音和尽最大可能地忠实表达神秘佛教的巫咒(真言和陀罗尼)之迫切性也确实推动了中国语言研究的发展。如果用产生了声母和韵母的其他文字的办法来为汉文方块字的读音记音法(反切法)被归为了吴国的孙炎(卒于260年),那末它无疑是在印度影响之外发展起来的,而晚期的研究却并非如此了。在424~453年间对于韵法的研究由沈约(441~513年)而得出了对古汉文四声的最早定义:平、上、去、入(带有塞尾韵的字)。它们可以使人以更为严格的方式确定吟诗的规则和成为整整一大批韵文辞书的起源:

陆法言的《切韵》(601年)。

孙愐的《唐韵》(751年)。

陈彭年的《广韵》(1008年刊印)。

丁度的《集韵》(共 53525 个单字,11 世纪中叶)。

金代韩道昭(1115~1234 年)的《五音集韵》。

从 16 世纪中叶起,历史语音学的学术研究正是部分地以这些宝贵资料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人们最终将会在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中发现,通过僧侣界的媒介作用,某些起源于印度的财政制度也得以在中国社会中立足:带抵押物的借贷、为了取得共有资本利润的金融机构、拍卖和更为晚期的彩票。

总之,在中国和印度社会之间交流接触的伟大时代(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到 9 世纪),佛教在中国的贡献显得相当重要。在拥有经典和宗教著作的良好藏经楼的寺院成了教育与知识的主要中心的整个时代,人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佛教文化。这种形势,在日本延续了更长时间,而在中国则应该是持续到 842~845 年间的大规模法难和遣散出家人的僧伽之时代为止。

205 第四编 从中世纪到近代

206 第一章 贵族帝国

从6世纪末开始的时代表完全处于人们所说的中国“中世纪”初期，它因其人员（贵族及其附庸：客、部曲、奴婢）、经济、文学和艺术、宗教信仰（人称唐代为佛教的黄金时代）而应该属于这个时代，它应该是东亚从中世纪社会向“近代”的过渡时期。未来变化的先兆标志是在持续于755～763年间的安禄山武装大叛乱的翌日才出现的。所以，如果不考虑为以神秘的世系观念为基础的传统式“王朝”断代，那末我们于此就可以把唐代分成两部分并且把第二个时代与紧接其后的一个时代密切联系起来。事实上，在安禄山叛乱之后并非仅仅是一般的气氛改变了，而且还有政治空气、经济、法规制度……907～960年的所谓五代时期仅仅为合乎逻辑的续篇和于8世纪末开始的发展结果。一个“向近代过渡”的时代继承了其基础是在590～625年间确立的“贵族帝国”。

207 由于581年开国即位的隋王朝结束了中国北方的非汉族血统诸帝国的存在，在8年之后实现了中国全部地区的重新统一，所以隋王朝被普遍视为中国历史

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但在强调这类政治事件的时候,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却得出了下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首先,它掩饰了某些根本的持续性,同时又忽略了最深刻和最有意义的变化。无论是由杨坚(541~604年)将军篡夺北周的政权,还是唐王朝的缔造者李氏家族于618年登上皇位,都未在政治人员队伍、社会类型和在根本传统中同时伴生彻底变化。此外,有关民族纯洁性和文化纯洁性的主张都是荒诞滑稽的。隋帝国(581~617年)和唐帝国(618~907年)与4~6世纪的胡族王国和帝国相比较,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汉族王朝,但它们在开国时政治、社会、民族与文化基础却都是西魏(535~557年)和北周(557~581年)那已经被高度汉化的帝国了。相反,从中唐和8世纪末开始出现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在11世纪时产生了一个与6~7世纪完全不同的社会,就如同文艺复兴时代和中世纪的欧洲之间的差异那样。

中国的长江流域与华北之间的重新统一确实扩大了视野,赋予了隋唐时代的中国一个向海外即热带地区和东南亚诸地开放的门户。唐朝也确实继承了南京诸王朝的艺术和文学传统的珍贵遗产。但中国南北方的这次大一统并非是以突然降临的方式产生的,整个6世纪期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和人员的接触以及商品、人员和思想的交流都为此作了准备。6世纪前30年的洛阳和梁武帝时代的南京均属于中世纪文明的同一黄金时代、属于受一种强烈的宗教虔诚鼓动的同一种贵族社会,它们因商品经济的觉醒而增加活力,并由取道西域山道和印度洋海路的巨大贸易潮流所渗透。此外,把政治统一的功劳仅仅归于隋王朝也过分武断了。四川从553年起就归附于西魏王国,而魏王朝于同一年在湖北省扶植了其傀儡之一,实际上也形成了其潜在的组成部分。自534年左右被分裂并遭受战争蹂躏的中国北方的统一应归功于577年的北周。在589年灭掉了已经削弱的陈帝国时,隋王朝仅限于结束了一个在36年之前开始的过程,其主要因素之一无疑就是由西魏建立的兵

制的重要地位。

581~683 年时代的政治史

隋王朝(581~618年)是继北周统治家族的一名姻亲发动的军事政变之后在长安创建的。此人就是杨坚将军,他本为渭河流域和甘肃东部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杨坚以文帝之帝号而执政于581~604年;于589年灭掉了自3世纪初叶起在南京相继建立的六朝的最后残余。传说中把他与他那被以最黑暗的色彩描绘的继承人对立起来了:弑父的凶手。炀帝(604~617年)可能是由于其大兴土木的疯狂、追求豪华的享受、对待民众的邪恶和残酷而导致了失败。大家都抨击他从事大规模的工程和高丽发动耗资巨额的征战。但这是官修史书中最善于津津乐道地谈论的内容:一个王朝的末帝只能是某种耻辱的对象。事实上,隋朝两代皇帝的政策具有一种引人注目的连续性,他们所作出的努力可能一直延续到下一个朝代的初期。大运河的开凿以及在洛阳和长安(大兴城)地区建造大型粮仓是从隋文帝刚一执政时就开始的,而隋文帝最早的创举是在渭河与洛河流域建立规模宏伟的两京。长达350公里的大长城是于585年在西北修造成的。形成隋炀帝执政期特征的是海外开拓政策。组成一支海军战船队、把扬都(今扬州)发展成了第二个京都以及远征台湾和琉球、从巨港到苏门答腊地区的赤土国、越南南部东海沿岸那稍后又以其占婆的印度名字而著称的林邑,在文帝执政期间就已开始。对于实际上与突厥人结盟的朝鲜的高句丽发动的首次陆路和海陆征战发生于598年,也就是在炀帝首次远征高丽之前13年时。但这种强有力和具有威望的政策在隋代第二位皇帝统治期间却开始引起日益增多的困难:从611年黄河下游水灾起,河北与山东的农民揭竿而起。继为高丽的三次灾难性征战(612、613、614年)所必需的征募兵员之后,形势恶化了。隋王朝与突厥人的关系于618年变糟了,因这一年又发生了由贵族发

动的首次暴动，这就是杨玄感之乱。

奉命在山西中部太原防守游牧民入侵的将军李渊(565~635年)在其子李世民(598~649年)——后来的太宗皇帝的鼓动下，于617年起兵反叛，与突厥部族结盟并向长安进军，最终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唐王朝。李渊就是后来的高祖皇帝(618~626年)。

唐朝初年是一个内部巩固的时代。巩固内部的措施包括：于628年结束的平息动乱、政权的改组、把帝国划分为10道(在8世纪时为15道)，很快就为它们任命了负责行政、财政、司法的节度使，该官员同时也负责刑法、农业制度、税收、军队和教育(在长安和洛阳两京创建大学和高级学堂，建立州学和府学)。这个时代之后的事件，便是626~683年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开拓之一。唐朝军队取得了对定都于贝加尔湖以南的鄂尔浑河流域的东突厥人的决定性胜利，挫败了铁勒突厥人，确保了东蒙古的回鹘突厥人的内附以及西北的吐谷浑人和唐古特人的归顺，在吐鲁番灭掉了已成为长安与塔里木盆地和河中地之间关系障碍的高昌王国，在伊犁河流域击败了西突厥人并打通和控制了绿洲之路。

唐朝在亚洲的威望达到了其顶峰，诸如环王(占婆、林邑)和真腊(柬埔寨)那样的东南亚诸国也都承认了中国的宗主权。在朝鲜，高句丽被击败，新罗归附。唐王朝在河中地设置中国的府，一直介入到北印度的华氏国(巴特纳，戒日王朝，605~647年，在摩揭陀)。

这次奇特的开拓之基础，便是本处亟需阐述清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一、唐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从6世纪末年到625年左右，完成了一项伟大事业，它提供了某些经济 and 制度的基础。若无这一切，7~8世纪的中国对外开拓就是不可能的。

大兴土木工程

在 587~608 年之间,修成一个水上交通网,由运河和经整治的供航用的河流组成,以便将黄河、渭河流域与一直到杭州的长江下游地区连接起来。该航运网于 608 年由一条确保洛阳地区与北京地区之间交通的运河而延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大运河。它总长为 1500 公里,宽约为 60 米左右,运河沿岸由一条皇家大道环绕,沿途遍布驿站(人们在长江之北的扬州和洛阳之间共计算到 40 多处驿站)。在从洛阳到长安的沿途,建造了一些大型储仓,其中规模最大者位于洛水与黄河的汇合处,其储量为 2000 万石,也就是 1200 万百公升粮食。这一航道系统是为了战略和政治目的才修造的,旨在便利中国北方和中国长江流域在全国统一之后的交通。但漕运水系在太宗统治时代(626~649 年)也只能确保向洛阳运送少量的大米(1.2 万吨),当时的大部分贸易仍由丝绸组成。不过,继长江下游南方水稻种植业的发展之后,运输吨位数在一个世纪之后增长到 5~10 倍之多。所以,大运河的漕运在 8~9 世纪时的经济发展高潮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们得以使唐政权在安禄山叛乱(756~763 年)之后的困难条件下维持下来。尽管在将洛阳和长安两京连接起来的约 400 公里左右的地段中完成了这样的工程,但由于黄河水流急湍以及河南与陕西交界处的山地特征,其交通从来都不畅通。中转换船始终是不可避免的。当渭水枯竭时,宫廷和中央衙署被迫耗费巨资迁往洛阳,因为那里的供应比较方便。

长安和洛阳这两京于公元 600 年左右根据宏伟的蓝图而重建。隋唐两朝的长安城外郭东西长 9.7 公里,南北宽 8.2 公里。该城呈矩形,共计有南北大街 14 条,东西大街 11 条,大街宽 70~150 米,以栽满树的护壕沟环绕。这些街道把全城分成了 110 个带界墙的居民区(坊)和由漕运沟通的两市,而城北的两大院墙内坐

落着皇宫和官府区。但必须指出,两京规模上的等级变化始于 501 年北魏对洛阳城的修筑。后汉时代的洛阳内城仅仅长 9 里(约为 4.5 公里)和宽 6 里(3 公里),魏王朝京都的内城已达到了隋代长安的规模。我们是否应该把将城市视为具有壁垒保护的一大兵营的新观念看做是草原民族的影响呢?至于其规模略逊于长安城规模的新洛阳城,它同样也是根据一种棋盘状平面图建造的,大约与东南大都市扬州是同时建成的,那里在 7~9 世纪时的胡商番客似乎相当多。隋朝的第二位皇帝似乎曾预见了中国长江下游航行和贸易的发展高潮,他希望将这后一个城市作为继洛阳之后的第二个京城。

如果说在 600 年左右建筑的这些城市及其漕运系统可能形成了 7~9 世纪的中国经济骨干,那末当时在法制、行政和军事制度领域中完成的事业同样也不失为重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隋代与初唐的立法者是可以追溯到曹魏和北魏时代的悠久传统的继承人,他们懂得使过去的成果系统化并为新帝国提供其势力的主要因素之一。

行政制度

213

中国的行政管理在 7 世纪时达到了其成熟时代。其巧妙而又复杂的组织机构为其先前的长期发展提供了证据,它值得于此至少作简单的描述。

中国行政制度的起源很早,它们被断代为由上层望族承担宫廷职务的时期,这些职务后来于公元前 4~3 世纪时被公职所取代。所以,词汇中有时也保留了对上古时代官职的个人与家庭特征的记忆。然而,从帝国时代开始,官府便倾向于组成一支相对独立的队伍,意在形成对于在宫中形成的派别(阉党、后党和将军集团)的平衡力量,同时也与皇帝的专断权力相抗衡。国家机器在 7 世纪时得到了改进,在 11 世纪时又获得了新的发展。但在宋朝(11~13

世纪)之后,尤其是在明清两朝,国家机器又向专制独裁的方向发展,由此既在中央政府又在各地限制了自由与权力。

唐代的中央政权衙署在长安占据了一片4.5平方公里的封闭地区,这就是皇宫之南的“皇城”。这一政权机构共包括四个主要部门。

——尚书省,组成了六部的一个整体(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

——门下省,扮演一种传达和审查诏令之中心的角色。

——中书省,掌管起草官方文告诏书。这后两个机构对基本政策实施一种监督。

——政事堂,参加者除皇帝之外还有一些均为六部尚书的大贵族和重要官吏,形成了一个国家朝堂机构。

但另外还存在大批其职务比较有限的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御史台,这是对官府实施全面监察的机构,其职务是纠正各种罪恶(行贿、贪污、舞弊……)和接受下属的控告。大理寺最终决断争执最大的案件,唯有它才有资格宣判死刑。其他机构的任务是掌管水道与漕运、军器、弘文馆、国子监、宫禁宿卫、内宫、太子府等。

各地区或更应该是大区(唐代“道”和宋代“路”)的一整套官府均附属于这种中央政权,帝国的领土就被划分成了这样的地区。²¹⁴在最低一级上是县,这种行政区最多包括数万居民。一批县(平均为四、五个)形成了州的领土,其州治所在地设在主要的城市中心。这些州的规模差异很大,大部分叫作“州”,但其中有一些被称为“府”。它们根据其人口密度不同而规模变化不定(面积最大者也就是人口最少者)。州基本上相当于具有中等面积的法国的省。皇家官府为各地区封敕的官吏数量很少,每个县一般仅包括一、二人。所以,皇帝册封的官员要由一支地方征募的人员协助。官员们都是在该地任职数年的外乡人,必须确保获得当地豪门望族们的支持并在执行中央政府指示的范围内表现出灵活性。但他们那皇家官

员的身份也保证他们具有相当大的权威。

在其辖地有时延伸到非常辽阔地区的府之上,最终也存在着某些专门机构,它们往往都具有军事或财务特征,其目的是协调和控制各府的活动。这些机构都被委托给高级官吏主持。

司法制度

215

唐代司法与行政文献的重要文集都保存下来了,另外一些还可以部分地复原。这就是由日本著名的中国法律史专家仁井田陞搜集到的法律和行政法令的情况。《唐律》于624年写成初稿,于627和637年修订,附有653年的疏义,这就是《唐律疏义》,它是现在完整地流传给我们的第一部中国法典。它的直接“先祖”是564年颁布的北周律,而后者本身又是曹魏和西晋(268年)那不太完整和不太精确的法典的继承者。这是对一种无裂痕的逻辑之令人赞赏的构思,尽管它有那样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对于这种法律的基本原则、观念和范畴的分析可以说是从未有人从事过,但这项任务将会具有很大的意义。它肯定揭示了一整套心理和玩弄一些极端新奇观念的把戏。我们可以说,这里实际上是指一部以某种刑罚的连续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其中认为犯罪的严重程度并非与其性质有关,而是和罪犯与其受害者相比较的地位有关。在有亲疏不同的亲属的情况下,这种地位由亲属关系所要求的长短不一的守丧期的类型所决定,在其他情况下则根据等级关系(皇帝、各种级别的官吏、平民百姓、具有奴婢地位的人……)所决定。除了其预审者和有时是调查者的角色之外,法官的任务并不是权衡和斟酌责任。这种任务也不是“宣扬法律”,相反却是根据由法律为他提供的模式而准确地为罪行量刑,即通过“论”的办法来进行,要遵循根据具体情况和严格的增刑或减刑而规定的标准量刑。中国法律的这些特征都很古老了,这同时也解释了在语言以及观点中存在的罚罪标准与概念的绝对相应(语言中仅仅有一个字“罪”)。刑罚的等级

包括一系列的惩罚,它们随着其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变化:藤条抽、竹杖打、强迫劳动、强迫劳动和流入二罪并罚、绞死和斩首。法律与其他类型的立法不同,它仅仅具有刑法之特征。《唐律》凡 12 篇,计 500 多条。

1. 名例:定义与基本准则。
2. 禁卫:侵犯禁地(宫殿、营门、城垣、关塞……)。
3. 职制:官吏们行使职权时犯下的罪行。
4. 户婚:涉及到农民家庭的法律(田、税、婚)。
5. 厩库:与畜群和官库有关的法律。
6. 擅兴:与征兵有关的法律。
7. 贼盗:对人和财产犯下的罪行。
8. 斗讼:在撕殴中犯下的罪行。
9. 诈伪:伪行和诈伪。
10. 杂律:具有特殊性质的各种法律。
11. 捕亡:有关逮捕罪犯的法律。
12. 断狱:有关行政司法的法律。

216

土地法

7 世纪和 8 世纪上半叶的唐代土地制度具有历史上最显著的新颖特征之一,这就是使用了一种可以在一个多世纪中确保税收

定不变的做法而不仅仅涉及到了财产,也涉及到了人丁;租(以粮食交租)、庸(各种徭役)和调(交纳布帛的税,养蚕地区是交绢,其他地方特别是西北则交麻布)。租和调与两类根本不同的地产有关,它们恰恰是以新的土地条件相区别。这一方面是大作物(小麦、谷子、大麦)田;另一方面则是用于住宅、花园、从事丝绸或绢生产的家庭小手工艺所必需的桑田或麻田的小面积土地。当大作物的土地应该根据每个家庭的成年人(丁)数而分作“口分田”时,其他同样也有限的地产则被视为“永业”。份额不太大的“二分田”也为老、笃疾、残废、寡妻妾、商、工、僧和尼作了规定。“狭乡”的份额比“宽乡”更少,因为那里的人口稠密。最后,对一大批土地则作为法律的许多例外情况来处理,它们未被用于分配并被排除在由田令规定的制度之外了,如公廩田、职田、皇帝的赐田、庙田、军屯、民屯等等。

这种税收和土地制度导致了一种很确切的人口普查、对于每个乡地籍的一种具体确认以及根据法令而确定的年龄组内部的人员分类:“黄”(婴儿)、“小”(儿童)、“中”(成年人)、“丁”(壮年人)和“老”(老年人)。人们很久以来都由于这种行政控制的复杂性而认为“均田法”仅仅在理论上存在过。但在甘肃的敦煌绿洲和西域的吐鲁番(高昌)发现的7~8世纪的写本则提供了其运行功能的佐证。某些吐鲁番文书提供了有关根据口分田制度而归还和分配土地的情况,而敦煌户籍则提供了有关家庭状况、每个成员的年龄、准确地测量土地及其四界的情况。它们都被断代在一个这种制度已处于衰落却尚未消失的时代。

这种制度可能仅仅真正实施于旱作区,也就是说从中国北方诸省一直延伸到淮河流域。再更靠南方一些,稻田形成了很难再细分成小块的耕作单位,用于整治和灌溉耕田的投资使产权感更为强烈了。中国麦田区与稻田区之间的差异在8~11世纪之间水稻种植发展高潮时更为加剧了。它们在明代(14~17世纪)仍然很明

显,于当时发现了一种大致相当于在小麦区、高粱区和水稻区之间的基本对立的双重税收制。

兵 制

7世纪时隋唐军队的核心是贵族,正是关内(陕西和甘肃东部)和在较小程度上的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望族为精锐部队提供兵员并配备军官。正是这些家族的人在精良部队,如禁军和卫军中服役。与传统的模式相反,6世纪的统治阶级以及在隋代和唐初出自该阶级者并不是一个士大夫文官阶级,而是一个具有军事传统的世族。它对于战争事务的癖好、对马匹的爱慕、对饲养业的兴趣可以通过他们那游牧民的后裔和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漫长影响来解释。如果没有这个贵族阶级所特有的尚武品德、荣誉感和好动的雅兴,那么隋唐的赫赫武功就是不可能的。

兵制的有效性确实促进了这些成功。但这些制度最早又恰恰是根据那些具有武功传统的家族而设想出来的。本处是指一种“府兵”制,各由800~1200人组成,在陕西集中驻扎在京师附近,在山西则驻扎在突厥人入侵的必经之路和中国北方边陲的太原地区。这种征兵制在北周时代仅仅适用于志在从事刀兵的家族,似乎只是在唐代才扩大到了农民阶级。事实上,颇有意义的是唐初颁布的府兵制规定骑兵必须自己提供马匹与部分兵械。如果本处是指普通农民,那末这种事态就是不可想象的了。很明显,在这个时代就如同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一样,在军队中存在着任务的分工。农民不大习惯于骑马,而且还是平庸蹩脚的骑手。除特殊情况之外,他们都不是可以与草原人相抗衡的战士。相反,农民却提供了大部分步兵,他们都善于固守要塞、占据地盘,经常被用于这些必不可缺的任务:生产军队的粮秣、运输和驿使。精锐部队、快速干预部队并非是由农民组成的,而主要是由内附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汉化的游牧民组成,或者是如同在6~7世纪的情况一样,是由

胡人和汉族混血儿、选择了草原人习惯与情感的半汉族人所组成。

一种牲畜在唐帝国的防卫政策中起过决定性作用,这就是马匹,即以弓弩武装的骑兵们的坐骑。马匹的饲养是在7~8世纪时以系统方式发展起来的。如果大家相信文献记载的话,那末唐王朝于其初期只拥有少量马匹,共有5000匹,其中3000匹可能是在隋代于长安西部的赤岸泽沼泽地饲养的,另外2000匹是在甘肃西部由突厥人饲养的。但很快便创建了国家种马饲养场,并迅速地获得了成功。因为从7世纪中叶起,唐王朝便拥有70万匹马,分散在覆盖了辽阔面积的陕西和甘肃军马场。在这些马匹中又增加了平民所拥有的和大家并不知道其数目的那些马匹。但私人饲养业在中国北方似乎特别发达,特别是在甘肃东部、陕西和山西。大家已经看到,府兵制规定,士兵(至少是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也就是那些属于贵族或望族者)应该各自提供他们本人的马匹。在8世纪上半叶,皇族宗室成员、高级官吏和将军们都拥有马群、牛群、羊群和骆驼群。中原军队拥有最大数量马匹的时代恰好相当于7世纪中叶发动大规模攻势的时代。直到665年,马匹的数量很多,价格也很便宜。但稍后不久,突厥和吐蕃的入侵瓦解了种马场,马匹的饲养业似乎衰落了。713年,在皇家御马圈只能计算到24万匹这种牲畜了。由于饲养业的复兴和向草原牧民的收购,其数目于725年增至40万匹。727年,在黄河上游的银川建立了马匹交易市场,突厥人前往那里出售其牲畜以换取丝绸和金属。但在安禄山叛乱前夕的754年,养马场中的官府马匹数目仅为32.57万匹。一直到该时代,在整个草原地区和中国北方最常见的仍是蒙古小马,但它们当时却已处于灭绝之中,仅仅残存于准噶尔地区。这是因为,由于西域和位于帕米尔以远地区诸王国奉献的贡匹,它们已与大批不同品种的马匹杂交。如703年向唐朝宫廷奉献的大食纯血马、由吐蕃人于654年奉献的小野马,同时还有霍罕、撒马尔罕、布哈拉、219
基什、喀什、买卖城(恰克图)、弭秣贺、库塔尔马、健陀罗、于阗、龟

兹马、贝加尔湖的黠夏斯马等。

中国7~8世纪的北方贵族都热衷于养马。上层社会的人骑马旅行。无疑是从伊朗引入的马球游戏在长安风行一时。对于马匹的这种酷爱无疑解释了它们在绘画中所占的地位,诸如韩幹(约为720~780年)那样的某些画家都专长于画马;同时也解释了它们在唐代雕塑中的地位,正如太宗皇帝(626~649年)墓中的精美浅浮雕和墓俑所证明的那样。但唐代的马具有一些揭示了外来影响与中东和河中地品种杂交的特征,它们比于唐代之后又强有力地重新出现的蒙古小种马更为高大和细长,正如元代(13~14世纪)和明代(14~17世纪)的绘画所证实的那样。

在763年的吐蕃入侵期间,官马场的大部分马匹都被抢走。这种入侵标志着中国西北地区养马业的最终衰落。唐朝此后就只能使用一些权宜之计:向私人(在京师地区就为宫中的御马厩购得了万匹马)和游牧民(815~816年间在鄂尔多斯地区就用1万匹丝绸购马)购马。一种不成功的尝试是在从农民手中夺取了所有权之后,于817~820年间在陕西、河南与湖北北部的农业区建立国家饲养场。在758~759年反击吐蕃人的战斗中曾帮助过唐朝的回鹘人,作为补偿而获得了几乎是对马匹贸易的绝对垄断权。他们贪得无厌,唯利是图,以非常昂贵的价格向唐朝官府出售劣种弩马。在8世纪末,一匹回鹘马要卖40匹丝绸。

养马的最佳地区似乎位于甘肃东部、陕西的泾河流域和山西的西部地区。当天朝政府不再能保护这些地区抗御山民和游牧民的入侵时,它也就失去了其在西域的干预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从而处于被迫要向河南和东南地区退缩的地位。这无疑正是从宋朝直到由女真征服的960~1128年之间的衰微的原因之一。

中国天朝军队的布防颇能说明问题(大家在这一问题上可以指出的看法不仅对于唐代才有效),他们都集中在京师的周围和北方与西北方的漫长边界沿线。他们的主要任务确实是保护帝国不

受来自边境的袭击和入侵,确保中央政权防御在各地爆发的叛乱。布防在京南的卫兵和驻扎在宫北的禁军形成了预防发生政变企图的直接保护。此外,这些卫兵也为皇帝游幸翊卫,或者是完成大朝会时的特遣队,炫耀力量和豪华的任务在原则上都委托给了精锐部队。至于戍边部队,他们则根据其类别而承担两种不同的任务:或者是由骑兵组成其最积极成员的远征军,或者是由卫戍部队负责守卫国防线和交通中心。驻扎在各地的部队仅仅代表中国军队总数的很小一部分。皇帝的权力对于这一方面似乎很少会感到担心焦虑。只要在农民起义尚未变成真正的武装叛乱并且有时会得到上层阶级帮助的漫长岁月里,它们就不具有严重的和紧迫的危险。这仅仅是一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团伙,以抢劫为生,以难以进入的大山为巢穴或藏身于沼泽地区。他们的装备很差,一般都无力攻击皇权代表人物居住的带城郭的城市。总的来说,土匪强盗的抢劫行为仅仅为一种长期的、慢性的和尚可令人忍受的灾难。此外,还可以与土匪头子们谈判,以封给他们官号和官职的办法对他们实行招安。无论如何,为了维护地方上的和平,政权首先依靠的明显不是武力。往往是仅有政权机构就会绰绰有余地对付这一切了。小单位的居民集团对每个人的行为负责,有义务揭发罪行,官吏和乡、里、族长从帝国初期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全面和与习俗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约束体系(以至于大家往往都会感不到其束缚了),由此而产生了它们那非常明显的效力。

二、7 世纪的大开拓

从公元 6 世纪末起,中国社会便得到了加强、富裕和组织,于是便试图将其影响扩大到外部并将入侵那里的居民驱向边陲地区,如青海的吐谷浑人、四川边境的唐古特人、蒙古和准噶尔的突厥人与其他游牧民、东蒙古和满洲辽河流域的契丹人、朝鲜北部的高句丽王国的人。中国社会同时受到了外来威胁和它自己发展的

激励,促使它加强其力量。

事件

草原地区的形势自6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一个由突厥人领导的游牧部落联盟的形成而发生了变化。一个草原新汗国的这些缔造者于552年结束了蠕蠕人(柔然人)对从鄂尔浑河流域一直延伸到贝加尔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地区的霸权地位。突厥人的威胁比其先祖更为危险,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修建长城的伟大时代之原因,它处在继公元前3~2世纪的万里长城之后和发生在15世纪的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修筑长城的时代之前。

221

如果说北魏于423年仅限于加强秦汉时代的古长城,而于446年加强了其地处山西极北端的都城大同的防御工程,那末北齐则于555~556年修建了新的防线,于557年和565年又在部分地区加倍修成双线,这是沿着一条比秦代加强工程大大偏南的基线。它与后来明王朝于15世纪时所选择的是同一条基线。

当中国北方于577年被北周王朝统一时,突厥人和汉人的关系得到了改善。直到这个时代为止,中国北方两个彼此之间互相斗争的帝国都认为寻求与突厥人结盟是有利可图的,而统一却改变了该问题的已知条件。它形成了中原王朝继汉代之后在亚洲发展第二次大规模开拓所必需的条件。

突厥人于582年分裂成了两个部落联盟,也就是鄂尔浑河流域的东突厥和阿勒泰地区的西突厥。这次分裂似乎并未削弱他们的势力。他们于同一年大批进入了万里长城以内,隋王朝被迫于585年向西延长了由北齐人修建的防御工事。新的一段长城共延伸350公里,也就是说从鄂尔多斯直到黄河上游的今银川(宁夏地区)。在584年缔结和约并紧接着于590年将一位汉公主赐婚于一名突厥可汗之后,这种入侵中断了一段时间。但这些人于600年左右又重新展开攻势并于601年一直推进到长安之郊。于608年被

驱回青海湖一带的突厥人的威胁却仅仅在 630 年才被排除,即当唐朝确保对鄂尔多斯和西南蒙古的控制而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之时。

630 年这一年标志着唐朝在太祖和高宗之间(626~683)于亚洲大开拓的开始,突厥人的失败为中国天朝的军队和政权于 630~645 年打开了西域之路:640 年进入了哈密和吐鲁番(由汉族移民创建的高昌国),658 年进入了焉耆和龟兹,河中地诸绿洲后来也相继落入了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在帕米尔以外设置了中国的行政区,分别创建了康(萨马儿罕)、安(布哈拉)、石(塔什干)、米(弥秣贺)、何(屈霜你迦)、曹(卡普塔约)、史(基什)诸州。648 年,王玄策将军的一支无疑是由尼婆罗和吐蕃人组成的军队发动了对北印度的一次远征,到达了华氏国(Patna)地区,以便能以有利于中国的方式解决摩揭陀小王国的王位继承问题。在东北,满洲和几乎是整个朝鲜半岛都于 660 年左右被置于了唐朝的控制之下。662 年,中国介入了位于底格里斯河畔的泰息丰萨珊王朝的内部事务,当时正值波斯帝国受到了倭马亚大食人推进之威胁的时代。唐朝之控制向这些辽阔领土的扩展,导致创建了六个“都督府”或“都护府”,它们是一种军事保护领地。这就是设在河内的安南都护府以及北庭(别什八里,今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南部)、甘肃西部的安西、辽宁(南部满洲)的安东、鄂尔多斯西北的安北和位于蒙古同一地区东北的单于都护府。

唐朝从高丽到伊朗和从伊犁河流域到越南腹地的开拓,无疑是 7 世纪亚洲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它导致产生了一种卓越的军事和行政组织:由骑兵组成的干预部队的灵活性与快速性、饲养马匹、为西域军队粮秣给养的供应而建立军屯、驿站系统、频繁的外交活动。但这种把唐代中国变成当时亚洲最大强国的奇特开拓却是脆弱的。完全如同在汉代一样,京师与唐朝在西域控制的地区之间距离很遥远而且交通很困难,从而解释了唐朝对这些地区占

据时的极不稳定的特征,因为必须耗巨资在那里维持军屯。塔里木盆地最靠西部的绿洲疏勒距长安近 5000 公里,把安西与哈密和吐鲁番联系起来的羊肠小道要穿过水源很稀少的沙漠地区。在更远的地方是位于帕米尔以远的领土,只能经由翻越它们会成为一种真正的战功的山口才能到达那里。

如果青海和甘肃的吐谷浑人与唐古特人的归附是从该王朝初期就获得的,如果说突厥问题主要是通过 630 年的大规模进攻以及后来草原部分部族的内附和逐渐定居而解决的,那末游牧民和山地民的入侵可以说是从未停止过,从而又重新在西域绿洲内附唐朝的问题上提出了质疑,并且威胁了驻军和商队的安全。唐朝迫不得已地组织了对伊犁河流域的一次远征以平定突厥人,唐军直到 748 年才摧毁了他们那位于楚河流域的都城苏亚卜。随着吐蕃人的扩张,又出现了新的困难,吐蕃人在 670~678 年间入侵了绿洲地区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了于阗、叶儿羌、疏勒和龟兹;后来又有大食人的扩张,它导致了中国在伊朗影响的退却并且很快就威胁到了唐朝在河中地和疏勒地区的远征。

三、684~755 年期间的政治史

武后和韦后

7 世纪末叶和 8 世纪的最初几年由唐太宗(626~649 年)和唐高宗(649~683 年)的一名老妃子的神奇形象所控制,她名叫武曌(624~705 年)。武氏从 654 年起影响很大,于次年成为具有正式头衔的皇后,并在高宗于 683 年晏驾后事实上执掌朝纲。她剥夺了合法继承人的权力,于 692 年自取“则天皇帝”的尊号,创建了她后来成为其唯一一任君主的周朝。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皇帝。这 15 年(如果考虑到武则天事实上掌权的整个时代,那就是 22 年)的插曲只能通过当时的政治社会和佛教的决定

性影响来解释。武后从她可以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时候起所作出的全部努力都倾向于从政权中排斥西北望族的代表人物，他们自该王朝开始起就占据了所有的要害职位，特别是控制了通过门下省的中介作用而管理国家的权力。在高宗于684年晏驾的翌日，则天就杀害了数百名这类望族以及李氏皇家宗室的许多成员。她将宫廷的常驻地从长安迁往洛阳，从而比较容易地摆脱了望族的控制。但她也希望通过科举而促使形成一个征募来的国家管理人的新阶225级。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在汉代的招聘和晋升官吏中仅起过一种次要作用的科举考试只是从669年起才真正以系统的方式组织起来了。这种在中国社会中曾起过如此巨大作用的制度首先成了掌握在武则天后手中的一种政治武器。她于690年成了皇帝，改变了一整套官僚机构和行政组织。她也正如近七个世纪之前的篡权者王莽一样，受到了《周礼》这部令人质疑的经典的启发。她又改变了地名并创造了19个新字，而且其使用也变得具有强迫性了。

对于武曩那奇特的高升和登基称帝，若无佛教僧伽的帮助和神秘支持，那也是无法解释的。佛教从6世纪初叶起变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她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虚构假造了佛教授记，诡称太宗的旧妃子为未来皇帝和弥勒菩萨的转世化身。弥勒是救世佛，相当于“救世主”，对他的等待在过去就已经蛊惑了许多个千年至福的教派。武则天本人过去在太宗于650年晏驾后，曾在一座尼庵中遁入佛门。她极端虔诚和迷信，以其虔诚（度僧、造寺、建筑、铸钟和像……）而使僧伽享受到了最高的礼遇。正是在她统治下，在山崖上开凿了洛阳南部龙门山谷的巨大卢舍那佛及其二弟子的雕像。

武则天掌权的时代以及继唐王朝于705年复兴之后的前五年（武后在这段时间内仍然非常强大）是一个奢侈豪华和全面放荡的时代。宗王和公主、高级官吏、宠臣和大寺院都大发不义之财并扩大了他们的地产庄园。享受口分田的小农阶级被税收和各种负担

压垮了。佃农的数目大幅度增加。

唐朝的盛世时代

8 世纪的上半叶(或者更确切地说应为 710~755 年)是唐朝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中国在亚洲的威望辐射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达到了顶峰。京师长安变成了一种世界文明的中心,西域、印度和伊朗的影响都在那里汇合起来了。古体诗和佛学研究放射出了其最为灿烂的光芒。

226 从 710 年起,于 690 年被则天皇后赶下台的睿宗皇帝的儿子李隆基(685~762 年)铲除了韦氏家族,他在从 712 年起以玄宗(712~756 年)之帝号执政之前曾先让其父登基。这个伟大的统治时代以整顿财政、行政和政治习俗而开始。在 721 和 724 年间,曾极力复原户籍以纠正纳税户数的悲剧性锐减。曾使唐朝得以于 7 世纪向亚洲开拓的府兵制的衰落促成了军队的改组,改革增加了军事将领们的自由权和主动权。对于在武则天统治时代受到忽略的皇帝御马场的一种最佳管理可以使他们重新得到极其丰富的马匹。应吐火罗以及受到大食人入侵威胁的该地区其他王国的呼吁请求,唐朝介入了乌浒河流域。723 年,阿穆尔河(黑龙江)边陲地区的狩猎部族靺鞨国变成了中国的一个都督府。从 745 年起,为了阻止大食人向河中地和伊犁河流域的推进,唐朝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击。

但出现了一些缓慢的变化,它们可能最终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之一。田制继续在倒退。随着在北方边陲创建被置于“节度使”指挥之下的“藩镇”或“方镇”,军事将领们的权力增大了。由职业士兵组成的重兵的形成是对中央政权的一种威胁,但国家对军事首领的宠信厚待在玄宗统治时代又只会增加这种威胁。用于军队的开支从 713 年的 200 万贯(每贯 1000 文)增加到 741 年的 1000 万贯,755 年又达到了 1400 或 1500 万贯。然而,唐朝被迫

向云南南诏这个藏—缅王国的压力屈服。于750年左右把对西南道路和领土的控制权抛弃给南诏了；唐朝在今俄国突厥斯坦的反攻却以一次失败而结束。这是指在715年，由高丽族的高仙芝将军指挥的唐军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怛逻斯战役中被大食人击败。以“回鹘”人之名而著称的半定居的突厥人的一个汗国从745年起在敦煌西北的哈密地区形成了。

政治方面，在唐朝于705年复兴之后紧接着便是西北旧贵族阶级的重新掌权，从此时起他们又与经科举而选拔的新官僚阶级处于斗争之中。这场冲突于736年达到了顶峰，即当出生于热带地区的混血儿——文人官吏张九龄（678～740年）和渭水流域贵族的代表人物李林甫（？～752年）相对抗时。到了玄宗执政末年，当他对于治理国家已失去了兴趣并在745年入宫的著名贵妃杨玉环的影响下把重要职务托付给杨氏家族成员时，事态似乎复杂起来了。继李林甫于752年死后，宠妃的堂兄杨国忠与安禄山将军竞争丞相的职位。任命杨国忠占据这一职位导致在755年末爆发了安禄山大规模的军事叛乱。

755～763年的武装叛乱

227

中国军队从高丽到伊朗的军事扩张和一系列的成功似乎在玄宗执政期间（712～756年）导致了一种连锁反应。中央政权似乎忘记了职业军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一种自然的倾向产生的，这些军队受他们自己利益的鼓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越来越远离了文职官员的思想状态。增加军队的自主权、调整指挥权、依靠职业军人，这样就可以获得一种进攻性的和夺取胜利政策的手段，不过这种举措也削弱了国家。然而，在8世纪上半叶期间增加军队将领们权力的倾向又由对内政方面的考虑而得以加强。为了粉碎杨玉环贵妃亲属们的势力，尤其是在四川割据了一片采邑封地的杨国忠的势力，于737～752年间主持帝国事务的丞相李林甫

第二章 向近代的过渡

一、安史之乱的后果

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史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因为它在所有领域中都同时伴随着或接着产生了一种明显的方向变化。这场危机似乎促进了在7世纪上半叶还只是刚刚开始的变化:对外关系、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从755~763年的可怕年代起都迅速地起了变化。

大倒退

在这次危机期间,帝国边陲曾建立的一整套防卫体系都土崩瓦解了。自从大食人于这次叛乱之前数年占据了疏勒地区之后,唐

极力讨好北方军队的将军们。李林甫主要是把赌注押在了胡族血统的将军们身上,希望他们能比汉族军队更容易被驾御和操纵一些。这样一来,在自隋王朝对高丽发动战争的时代起,就由大运河直接提供给养的今北京地区,独自兼任三个节度使之指挥权的安禄山将军发现自己受到了朝廷的充分宠信。安禄山由于其粟特族血统父亲和突厥族血统母亲而具有了出自乌浒水之北布哈拉粟特人的姓氏(安),其名字则是对于伊朗名字 Roxane(光明)的准确对音,这也是亚历山大大帝迎娶的大夏公主的名字。在755~756年的冬季,安禄山率其军队向洛阳和长安挺进,两京无力抵抗而陷落了。此后的悲剧性事件(皇帝避难于成都,在安禄山于757年逝世后,由史思明继承他率领叛军,新皇帝肃宗在吐蕃和回纥人的帮助下艰难地重新收复两京)无疑于此不会占据一席之地,因为本书只能是对中国历史的简单浏览。相反,最重要的是应该强调指出这一悲剧之非常严重的后果。

帝国对帕米尔的控制权便丧失了。合法政权的主要盟友回纥人于757年扩展到了甘肃，所以回纥人统治了地处从甘肃中部的武威到吐鲁番之间的所有地区。吐蕃人的势力也表现出来了，他们侵入了西域诸绿洲、青海和甘肃。763年，他们占据了黄河上游的宁夏，抢劫了甘肃东部的皇家御马场的马匹，甚至还进入了长安。从790年起，位于玉门关以西的所有领土都最终脱离了唐朝的控制。如果大家想到了中原地区自汉代以来就与西域和位于帕米尔以远地区维持着稳定性关系，那末这就是一个对于中国文明史具有严重影响的事件了。 229

在东北，新罗国自7世纪末起就在朝鲜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此时则宣布独立于唐朝。最后，在介于四川和缅甸之间的地区，原来都是一些已被汉化并由汉族、印度和吐蕃文明渗入的藏—缅语系的小邦，它们有时与唐朝有时又与吐蕃结盟，而从7世纪中叶起得到了发展。其中最强大者是南诏国，它吞并其竞争对手并从750年起开始扩张，尽管唐朝曾派出远征军以平定之。南诏王国在9世纪时变得具有威慑力了，直至对成都地区发动攻击并于827年夺取了红河流域和河内。在唐朝865~867年的一次讨伐失败之后，它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成功地占据了四川的首府。这个西南的王国从902年起又以大理（位于云南西部湖泊洱海的西岸）国之名而著称，可能一直延存到13世纪中叶蒙古人平定该地区为止。

继7世纪和8世纪上半叶大开拓时代之后出现的这种全面退缩，又于10世纪时随着在东北形成了一个已经汉化的契丹国以及唐朝失去了对红河流域的控制权而更加严重了。越南经受了1000多年中国政权和开拓地的深刻影响，于939年动摇了在广州建立的南汉王国的监护权，从而始终保持了其独立性（如果排除蒙古人占领的时代或15世纪初叶越南成为明帝国组成部分的短暂时代）。

税制改革和社会演变

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发生的变化，同样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这就是税收组织，它们与政治体制、社会现实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230 为了提供粮食税而在大耕作区实施的口分田分配制，在它依靠于一种定期公布于众的人口普查结果和一种地籍明细登记的范畴内，是复杂而脆弱的。此外，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性和人口居住的不平均性，根本不可能到处都实行统一的法律。在缺乏土地的地方，允许居民们自由迁移。在以麻田取代小片桑田土地的所有地方，把做为口分田而分得的土地纳入到家庭财产中的诱惑力很大，正如在整个中国西北的情况那样。最后，预先防范多种违法行为的田令，反而提供了逃避法律的机会。因此，从7世纪末叶开始，享受到口分田的小业主阶级便开始解体，伪造户籍的现象变得普遍起来了。

这种现象的原因无疑是多种多样的：游牧民或由吐蕃人对边境地区的入侵而引起的自发迁徙、水稻种植业和贸易交流大发展的淮扬地区的吸引力、能够向处于困境中的农民发放高利贷的富裕地主们施加的压力。但无疑正是由最富裕和最强大者对于最贫穷者的这种剥削，造成了8世纪期间的税户的迅速减少。控制了政治生活的西北豪门望族、皇家宗室贵族（皇帝的直系亲属和姻亲、皇妃家族）、将军和高级官吏以及大寺院，在7世纪和8世纪上半叶都拥有私田，它们被以不同的名字称呼，其中的“庄园”为其面积最辽阔者。做为一种乡下别墅和乐园的这些庄园，包括农业经营之外的农民开发设施：山岭中的山地、同时做为粮食耕田的果园。他们在江河上游建立的水碓，有时成了与失去灌溉用水的农民们发生争执的原因。可是，这些私人庄园在该王朝的初期因兼并农民土地而得以扩大，从而使其性质发生了变化，“庄园”一词被用来指

由佃农和雇农耕种的大型农业企业。这些大型庄园可能如同罗马的别墅一样导致产生了晚期的小居民点,宋代的许多城市于其名称本身(庄)之中就保留了对这种起源的回忆。这些变化无疑可以由中国社会从8世纪起出现的商业发展来解释。

为了重新将那些从普查中消失的家族及其土地登录入籍,于8世纪上半叶做出了一些努力,但事实证明根本无效。所以,当时又开始使用一种新的纳税形式,它不仅仅涉及到了耕农的家庭(丁),而且还涉及到了土地(地头钱)和农作物的收成(青苗钱)。这种做法在由杨炎于780年进行直接纳税的著名改革时,得以系统化和普遍化,这就是分夏季和秋季收税的“两税法”。

但农业税的改革(仅仅有一部分用于维持地方预算)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找到新的收入来源,因为许多地区都摆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可以对日常生活消费品课税的国家专营权,或在收获时或在与它们的分配相应的级别上实施征税,从而可以使人以与政治形势独立无关的稳定收入来填补逆差赤字。在8世纪期间于长江流域和四川出现的经济发展高潮,能够确保这些新课税形式的成功,而它们又是受到了公元前117年在汉武帝统治时代确定的国家对盐铁的著名专营权的启发。在国家政权控制生产地区(从河北直到广东地区沿海诸省的盐场、山西南部的盐湖和四川的盐井)的范围内,实施的最可靠和最有利可图的盐业专营于759年建立起来,而对酒的专营建立于764年,对茶叶(其消费迅速得到了发展)的专营建立于793年。从780年起,盐业专营为国家赢得了其半数收入,到806年则达到了600万贯钱(每贯1000枚),到808年又达到了880万贯。因此,财税制度和不同类型的税赋分配在760~800年间彻底改变了。不仅仅农业税改变了性质,也不再是以耕农而是以土地为基础了,但起源于商业的税收制度却倾向于形成比以小农阶级为基础的直接收税制具有更大的规模。这种倾向在宋代(960~1279年)加强了。

国家在税收领域中的行为导致了有利于富商的结果，因为他们负责征收盐税。它无论如何也为他们提供了掌握巨额资本和增加其经济实力的机会。长江流域和中国北方之间、四川和浙西(江苏南部和浙江南部)之间的贸易交流从 800 年左右起就落入到非常富裕的商贾们手中了，他们变成了官府忠实的经纪人，如位于大运河畔和长江以北 20 公里处的最大商业城扬州的盐业巨商、四川成都的富裕批发商。人们发现了 8 世纪期间茶叶贸易那异乎寻常的发展(把茶叶作为饮料的用法在唐代已开始扩大)。从 8 世纪末开始，对于茶叶(其产地位于安徽、浙江、福建以及四川)贸易征收的税金达到了 40 万贯铜钱，也就是说接近盐税巨额收入的 12%。

茶叶商人在信贷转移(转帐)的新方法的发明中起了巨大作用。在 806~820 年间，出现了最早的汇兑票，被称为“飞钱”。前来京师出售其货物的茶叶商人们把他们的利润所得转往在长安代表其地方政权的机构(进奏院)，并从该机构处获得欠债的收据，从而使他们一旦返回其原籍时，便可以在被扣除了于京师提前征收的税款之后而以现钱结算。到了 9 世纪末叶和 10 世纪初叶，商品仓库、邸店、两换店以及后来四川成都的贸易商行，都发行可以转让的库存票据，这就是现今银行票据的先祖。由国家发行的纸币于 1024 年才在四川出现。在一个商业交易迅速发展的时代，支付手段的匮乏是转帐方法革新的原因。

水稻种植业的首次大发展

232

在 8 世纪时，中国社会的重心开始从渭河流域和关中平原(这种重心从上古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起就确立在那里了)向长江下游平原转移。历史上的这一重要现象无疑与同时代水稻种植业的进步和长江地区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而长江地区本为丝绸、茶叶和盐(淮河盐场)的产地。直到 6 世纪时，人们使用的耕作方法始终都是在曾播种过的同一片土地上收获水稻，从而使休闲期变得必不

可缺了。在唐代,插秧的种植术可以迅速增加产量,而且在 8 世纪时,先是由于引入早熟品种,后是由于系统的选种,使产量更进一步增加,从而使水稻种植成了世界上最精巧的农业技术之一,以致于直至当代都是粮食单产量最高的耕作技术之一。在唐代也出现了适宜这种耕作的农具,其形状已经非常接近于现今农具了,如可以用脚踏的方法从一个平面上把水提升到另一个平面上的龙骨车、耙和稻田犁。水稻种植业的这些发展可能不仅促进了长江流域的移民,而且由于公元 600 年左右为了战略和政治目的而修建的漕运系统也确保了为中国北方补充资源,因为华北的生产始终受到变化无常的气候的影响。据当时的人口普查,位于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人口在公元 600 年左右到 742 年之间,从 300 万纳税人口增长到 1000 万;唐代中国所拥有的大约 5000 万人口中,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国北方,但那里却出现了人口的微减,北方诸道中在此期间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75% 下降到了 53%。在裴耀卿(681~743 年)以设立节级仓库(734 年)而改革漕运体系的年代,大运河上大半运输量的增长无疑可以使人确定是长江下游的农业发展形成高潮的时代,共有 700 万石(也就是 4 亿公升之多)的大米在 734~736 年间被输往中国北方。

水稻种植业的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唐王朝于公元 756~763 年的大危机之后的复兴。淮河和长江流域的大米仓逃脱了战争的劫难,中华帝国的整个经济从 8 世纪末起都要依靠该地区。

二、帝国的藩镇割据

233

政治演变

如果说中央政权能在税收领域中表现出某种惊人的适应能力,那末在公元 780 年和 850 年左右之间则出现了唐朝政权的真

正复兴,但它相反却在整个帝国中恢复安史之乱以前的行使政治控制方面失败了。

叛乱前夕的安禄山那特别强大的势力是由于他身兼范阳(北京地区)、河东(山西)和平卢(山东)的节度使,他拥重兵多达 20 余万,其骑兵约有 3 万匹战马,尚且不包括东蒙古和满洲南部游牧部族可以为他提供的援助。但叛乱的原因本身和节度使在事实上的独立性却并未由于叛乱平息而被化解。合法政权相反却被迫在各道中增加藩镇,并且为了与叛乱作斗争而扩大节度使的权力。到了唐代末年,人们共计算到 40~50 个规模不同的藩镇,这种制度一直延存到五代时期(907~960 年),当时的藩镇数目尚有 30~40 个。

公元 742 年左右存在的十大藩镇

名 称	治 所	兵 员	马 匹
安西	龟兹(塔里木盆地)	24000	2700
北庭	别失八里(今乌鲁木齐附近)	20000	5000
河西	凉州(甘肃中部)	73000	7900
朔方	灵州(黄河上游)	64700	13300
河东	太原(山西)	55000	14800
范阳	幽州(今北京地区)	91400	6500
平卢	营州(山东)	37500	5500
陇右	鄯州(青海)	75000	10000
剑南	成都(四川)	30900	2000
岭南	广州	15400	0

中央政权曾经被迫承认的节度使们之事实上的独立,这可以说是引起了帝国的分裂与唐王朝的崩溃的原因,但其崩溃速度则似乎是由一种奇特的流窜性起义而加速的。

继蹂躏了中国北方的饥荒出现之后,874年在山东、河南和 234

江苏的交界处形成了一些“响马”。次年，他们找到了两名“贩盐白丁”作为首领。第一位是王仙芝，他于878年归附唐朝之后被处死；第二位是黄巢，后来就以其名来称呼这次流窜性的起义了。起义军从山东西南部兴师，以后流窜遍了中国所有的交通大道，抢劫最富裕的城市和蹂躏沿途的一切。他们开始攻击黄河两岸的城镇。878年，他们离开洛阳南部向长江中游进军，先到达鄱阳湖，又辗转于安徽和浙江，再到达福州，后于897年到达广州并杀死了该城的富裕胡商番客。他们后来又取道广西和湖南，于880年末占据了洛阳。起义大军多达60万人，如同潮水一般地于次年初进入长安。京畿及其附近地区都被投入了火与血之中。黄巢起义军被政府军驱逐出了长安，但政府军接着又进行劫掠。黄巢于5天之后又回到那里，按照他的说法是使这座灾难深重的城市“浴血”或“洗城”。当由已经归唐和汉化的突厥人李克用（856～908年）指挥的沙陀鞑靼部族的部队于883年收复长安时，那里仅仅是一片废墟了。在该王朝末期的混战时代，李克用成了觊觎皇权的人之一，而在923年创建后唐时他终于如愿以偿了。唐朝的皇帝们变成了最强大的藩镇的玩物傀儡，他们从885年起除了短期外就不再居住在长安（那里在7和8世纪时是象征着唐朝荣耀和光辉的占地辽阔的大都市），而是居住在洛阳。

归降了合法政权的一名黄巢旧部朱温（朱全忠，852～912年）占据了河南东部的战略要塞开封，并于907年创建了新的梁帝国（后梁），这一时间标志着从885年起就丧失了实权的唐王朝在名义上的灭亡。

一种新的政权形式

造成唐朝衰亡的直接祸首是那些奉命指挥藩镇的被称为节度使的人。正是这些人及其军队从中央政权手中夺取了对各道的控制权，并导致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全国大分裂而亡唐。

如果说最早的节度使尚属于贵族或文人士大夫成员的话,那末中央政权从王仙芝和黄巢起义(874~883年)之后开始被削弱,则促进了藩镇中旧政权框架的废除。由于在已变得独立于中央政权的军队中并不罕见的一种民主选择,也正是军队自己委命其将军并擢升他们到“节度使”的官阶。这种选择仅仅受民望、军事才能和已获得的权威的影响,所以那些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也都被推上了各道的政权。于907~960年间相继在开封建立的五代中的第一个王朝的缔造人朱全忠,便是一名破产的乡间文人的儿子。他最早为佃农,后来在军队中任河中行营副招讨使,又由于在与黄巢作战中屡立奇功而被任命为节度使。在四川割据了一个王国的王建过去是一名旧“贼”,后来投军而选择了行武生涯。钱镠曾是吴越国(江苏南部和浙江的北部)的第一位国王,他最早是一名失去土地的农民,后投杭州豪门的府兵。后来统治闽国的王氏兄弟过去曾是河南之“贼”。各王国的其他缔造人也如此,如长江中游的荆南王国的缔造者过去曾是开封一位商贾的奴婢。另外一个王国——楚国的创立者马殷的情况也如此,他先是木匠,后来从事抢劫行为。正如大家已经看到的那样,后唐的缔造者李克用(856~908年)曾是突厥沙陀部的一名首领,他在黄巢起义时投唐效力。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当时的不合法夺权的传统仍很活跃和强烈,密切的依附关系将地区性的暴君与其将军们联系起来。在贼匪与起义暴动阶层中,最流行的做法是结拜成盟兄弟,这种盟誓引起了比血缘关系要求更多的义务。但是,人们也发现收养的做法在唐末的独立军队中发展起来了。作为一国之长的将军当时常收养他们的部将和大臣为“义儿”。这种虚构的血缘关系解释了私人禁卫军与个人雇佣军之间的紧密团结,他们在所有地区都形成了以排斥其文官的办法来取代中央政府权力的新政权的最坚实基础。兵力集中到了各国首领手中的现象成了五代时期和宋代初期的特征。根据这种现象来看,从9世纪末独立的藩镇到

由宋王朝的缔造者重新统一中原地区的发展乃是连续的，宋帝国直接出自唐末的那些独立的州。

唐帝国的割据以及从藩镇到国和帝国的变化表

藩 镇		国	帝 国
山西北部	883 年	晋 895 年	后唐 923 年
河南东部和淮河上游	883 年	后梁 901 年	后梁 907 年
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	892 年	吴 902 年	吴 927 年
河北北部	894 年	燕 909 年	燕 911 年
渭河西部盆地	887 年	岐 901 年	后唐 923 年
福建	896 年	闽 909 年	闽 945 年
四川	891 年		前蜀 907 年
湖南	891 年	楚 907 年	
浙江	898 年	越 902 年	吴越 907 年

注：此表说明，后来五代十国在事实上的独立是从 9 世纪末获得的。

在最早的一段时间内，节度使自己指定他们的继承人，朝廷所能做的一切只能是承认批准他们的选择，至少是试图以其权力来认可它无法阻止的事，节度使们的权力不失时机地将要变成世袭性的了。在第二个时期，也就是大约在公元 900 年左右，独立地区取名为“国”，其首领于数年之后毫不犹豫地篡夺了皇帝的尊号并建立了王朝。把相继在开封建立的“五代”与瓜分了唐朝旧帝国剩余部分的“十国”区别开来的唯一差异仅在于：建立于开封的那些政权控制了 237 中国北方更为辽阔的一片领土，它们都被认为是唐朝的继承者。

10 世纪时的地区独立和经济发展

唐末中央政权的削弱促进了地区性倾向的重新活跃，而出自藩镇的诸国往往都相当于自然大区。四川蜀国、广州南汉国、福建

闽国、湖南楚国、浙江吴越国……的情况即如此。其独立性使这些地区显示了其天生的志向，即以独立的形式发展其经济和建立对外联系。某些近代史学家们把由王小波和李顺于993~995年间发动的四川织锦工匠的起义视为一种自治活动，认为其目的在于要求当宋帝国吞并四川时仍延续其经济与政治独立，因为当时起义的工匠受到了开封地区织造厂锦绣产品的威胁。在长江流域和沿海省份的港口，从8世纪开始表现出来的经济发展高潮似乎并未被放慢。与内地诸省份的陆路交通都很困难的福建闽国，以发展海上交易并出口福建、浙江和安徽制造的丝绸和瓷器而致富了。广州的真正发展高潮发生在10世纪初叶。建都于长沙的楚国增加了它的丝与绢的生产，从其向北方的茶叶输出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四川、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地区似乎经历了从10世纪并延续至11~13世纪，即直至蒙古人入主中原(1273~1279年)的一个繁荣时代，而北方却饱受了于890~923年间使之不间断地遭到蹂躏的战争之苦。长安变成了一片废墟，洛阳的人口锐减，这样大家便可以理解为什么从907年起继承唐朝的诸政权均定都于更靠东部的地区，直至建都于大运河口。北方军队的兵源匮乏，甚至还出现了所有身体强壮的人都被征募的现象，无论其年龄有多大。开小差的逃兵为数众多，为了避免这种现象，他们在人脸上用烧红的烙铁打上印记。这类的逃亡直到10世纪末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为了淹没敌军占据的领土而打开堤坝的缺口之后，河堤都丧失了其坚固性。黄河大堤于931年决口并导致了一场大灾难。此外，位于北京以北地区的突厥—蒙古族契丹人发动的进攻，更加剧了建立在开封的诸政权的全面不安全性与不稳定性。

三、结论

一个新社会的曙光

在整个唐代期间,尤其是在该朝代的末期,某些新生事物出现并将深刻地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即将出现变化的最早迹象已经可以使人勾勒出一种与7世纪时的中国完全不同的中国形象了,它从中世纪时代接受了北方的社会和政治传统、六朝的文学和艺术遗产。

这些内容主要有:

——西北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望族阶级的衰落以及后来的消逝,同时也更为普遍地排除了7~8世纪的旧统治阶级。宋代的社会将是一个新人的社会,与唐代初期的望族或文人没有任何承袭关系。

——最终取代作为自秦汉以来之传统的征兵制。由雇佣军组成的职业军队于9~10世纪形成,由此而产生了有关政权的新定义:国家首脑的支柱不是一批被推上政权的望族,而是一支忠于皇帝本人的精锐卫队。

——无多大表面意义而又具有根本性后果的税收制度的变化。如果说自上古时代末期以来,国家的突出权力涉及到了人员及其生产力的话,那末导致耕田的分配和田产的限制变成必不可少之后果的原因,正是杨炎于780年从事的改革。这些改革由于移民和控制人口的困难性而变成必须的了,它最终导致了拥有耕田面积之权力的转移,从而加强了与传统格格不入的一种所有制观念。如果说使用雇佣军队可以通过某些政治形势来解释,那末它同样也与国家放松对个人的控制密切相关。

——不再可能取道西域而旅行是佛教僧伽衰落的特殊原因。从10世纪初叶开始,游牧部族势力的复兴导致了一个汉化大帝国

的形成,这在过去尚未有过先例。北部边界的关闭导致了政治和经济重心向东部和东南部的转移,这种现象在中国的长江下游地区之越来越明显的发展得到了加快和加强。与7世纪时把目光转向内陆亚洲的中国相反,从唐代中期开始,中国却将目光转向了海洋。

238 ——长江下游的中国农业、商业和城市的发展高潮,这要归因于水稻种植的进步、把长江流域和四川与中国北方密切联系起来的新贸易交流(茶叶、盐、北方军队的粮秣供应……)的发展、新的经商技术(后来产生了银行支票的可转让存款)的出现。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专营制度促进了一个新的大商人阶级的出现,但它却无法摆脱政治权力的监护。

——一种技术新产品的出现,这就是以木版来印刷文献和图案,它在引起知识迅速传播的同时也导致了统治阶级社会基础的扩大,同时还导致了以文字流传而不是口传的民间文学的诞生。

240 第三章 从向世界开放到返归古典传统之源

7~10世纪的文化史与同一时代的政治发展具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相似性。做为中世纪时代传统的继承者,7~8世纪的中国把佛学和律诗研究发展到了顶峰。它忠于3~6世纪的“唯美主义”,但也略做了一些革新,唯有在表现出了某种早熟的沉思反省之努力的历史领域除外。中国欢迎从外国传给它的一切,它对于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也施加了一种深刻影响。中国的光芒无疑从未如此光辉灿烂过。但中国从8世纪中叶起从其对外开拓上的后退又引起了一种自我收缩,以及对于外来文化的仇视和返归中世纪时代之前的中国传统之源的反作用。虽然这里仅仅是指一些倾向,但这些倾向却在11世纪中国的伟大“文艺复兴”时变得占据统治地位了。

一、中世纪文化的顶峰

史学和诗学

完全属于南北朝时代(4~6世纪)的传统在隋唐时代仍在延续,直到8世纪中叶始终占据统治地位。

中国长江流域于6世纪特别盛行的四六文诗歌的雅致文风和爱情诗体裁在唐初仍然得到了精心研究,文学批评始终以对作品的纯美学评价为基础。从人们对于一部最佳文学作品选《文选》始终有兴趣,这件事即可以证明这一点;李善于658年刊布了其著名的注释并于719年收入到《五臣注文选》中了。我们同样还可以举《历代名画记》为例,张彦远于其中汇集了他对于从晋至841年的371位名画家和书法家的评述,这就继承了南朝绘画评论著作的传统。

唐代是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根据严格的规则而把调与韵的反复变化结合起来的律诗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诗歌继承了由悠久传统构成的丰富遗产,包括从汉代朴素而动人的抒情诗一直到南朝最后一个王朝中那些颓废而又过分雕琢的诗。但雄浑遒劲的文风同时也在一个向草原、西域绿洲和远方文明开放、同时从社会观点上看又是越来越不封闭的中国中更新了启发灵感之源。诗学已不再像在南朝时代始终所维持的那样仅仅是一个排他性的贵族阶级的特权领域了。从7世纪末叶开始,科举制促进了新社会阶层的上升。有一种思想使我们觉得非常奇怪,却又与当时中国社会的伦理和行为实践相吻合,这就是认为只有在拥有一种诗词修养的条件下才会成为完人,因而在选拔官吏时强制实行一种最受人重视的诗词考试制度。如此的条文规定与这种文学体裁在7~8世纪的神奇发展肯定不无关系。我们还应该把皇帝们对文学艺术事业之赞助(712~756年执政的伟大的玄宗皇帝就同时是诗

人、音乐家和演员)的影响以及长安纨绔子弟们和大批赶考举子们经常出入光顾的青楼卖唱女子界所起的重要作用计算在内。

18世纪初叶(1705年),汇辑出版了《全唐诗》,其中包括了48900首唐诗,它们是2300位诗人们的作品。在那些最伟大的名家中,我们可以提及初唐时代的陈子昂(661~702年)、宋之问(卒于710年左右)和沈佺期(卒于713年);在玄宗那光辉灿烂的执政年间与肃宗执政年间有孟浩然(689~740年)、王昌龄(?~755年)、王维(701?~761年)、李白(701~762年)、高适(702~765年左右)和杜甫(712~770年);在出现了新的改革倾向的9世纪上半叶有白居易(772~846年)及其朋友元稹(779~831年),最后是大家称之为“小杜”的杜牧(803~853年,以与其著名的先驱“大杜”杜甫相区别)、李商隐(812~859年)和温庭筠(812~870年?)等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具有独创风格和具有个人特征的诗人。他们同时提供了有关他们各自生活的那些各不相同的时代的见证。

自汉亡的混乱时代之后,经学研究的形势从未曾像在隋唐时代那样光辉灿烂过。由孔颖达(574~648年)和颜师古(581~645年)编定并于653年刊布的《五经正义》事实上仅仅是对孔安国(公元前2世纪末)、郑玄(127~200年)有关《易经》等书笺注的辑录。另外一位经学家陆元朗(陆德明,约为581~630年)在其著作中,对3~6世纪于玄学中颇受青睐的著作兴趣颇浓,他曾撰写过《老子》和《易经》的释文。

相反,在7~8世纪的史学中出现了新的方向。史学著作于唐初取得了巨大发展并走上了一条很快就会暴露出危险的道路。除了由李延寿(生卒时间不详)所撰的北朝断代史《北史》(645年)和南朝断代史《南史》(659年)之外,另外五部断代史也都由一些官修历史小组所编纂。这样一来,《隋书》的不同组成部分是于622~656年间完成的,《梁书》和《陈书》修成于629年左右,北周王朝的

断代史《周书》成书于 636 年,《晋书》成书于 645 年。这些编纂著作的机械特征、由政权对其写作的控制、当权者强迫作者们在某些问题上沉默和失真,以及在考证和协调方面的失误,从 8 世纪初叶起就可能成了一位独立思想家的批评内容,这就是 710 年出版的刘知几(661~721 年)的《史通》。它是世界文献史中出现的第一部这类著作,标志着在史学和历史编纂学问题上一种考证研究的开始,它后来在 11 世纪时得以发扬光大,稍后在章学诚(1738~1801 年)时代便发展成类似于维科(Vico)和黑格尔(Hegel)的一种历史哲学。刘知几当时确实已经预言了宋代的史学家和 17~18 世纪的哲学家们的降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下述原因:他拒绝任何不合理的解释(把王朝的周期变化与一整套五行理论联系起来)、在历史中只愿保留人的作用、对于撰写各地的城市以及氏族和动植物志之必要性的看法、要求按讲话时发言的形式本身而准确记录讲话(语言就和人一样,保留了其人格化的特征)、对经典的批判态度,以及对于客观性的极其注意并且寻求历史真实的标准。 243

就在考证思想的这种觉醒表现出来的同时,无疑是与此有关的新史学著作类型也问世了。它们符合时代的需要和对于社会制度史的一种新的关注,同时也证明了由官修史书那陈规旧习的特征所引起的反响。这都是一些不再限于断代之传统范畴、还更包括了一些更为广泛时代以便揭示在时代的发展中对社会制度造成变化的政治和历史的百科全书。刘知几的儿子刘秩的《政典》(740 年)和杜佑(732~812 年)那部著名的《通典》即如此。《通典》是从上古时代直到 800 年的一部政治制度史,人们于其中发现了有关美索不达米亚的库法这个巨大穆斯林中心的记述。11~12 世纪宋代的那些历史巨著正是属于这些最早的类书系统。

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

在从 6 世纪末叶到 9 世纪中叶的隋唐时代,中国曾是佛教这

种世界性宗教之最为灿烂夺目的一大中心，尤其是对于大部分亚洲居民来说更为如此。中国的威望影响既是由于此种原因，又是由于它从高丽到伊朗之间屡次发动征战并取得了胜利。对于东倭日本和高丽来说，唐代的中國就如同是佛教的第二故乡一般。这首先是由于中国离它们比印度更近一些，但同样也是由于其遗迹和传说、阿兰若、著名的朝圣进香地及其著名法师之权威。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发现在五台山（山西东北部）。骑着大象的普贤（Samantabhadra）菩萨经常出没在四川峨嵋山的云雾之中。佛教在隋唐时代是中国文化圈中的社会文明和政治制度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里的寺院同时是世俗和宗教的中心、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中心。与一种文人、诗人、画家和书法家僧侣的类别相对应的是虔诚的、对佛教哲学感兴趣的禅定静修之爱好者，善于从教理观点上与寺院或山寺中的出家人进行辩论的世俗人的类别。

人们发现了一种典型中国化佛教的兴旺发达，它在诠释和教理领域中作了一些改革。这是一个在日本长期存在的那些大教派得以形成的时代，也是由于从印度佛教化地区传来的新内容以及大批新传说而使佛教在中国得以丰富的时代。

244 中国佛教教派的历史很复杂，我们在本书中对其具体细节不可能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将仅仅提及，它们的形成与由它们的那些极力设法将其教派之起源追溯得尽可能古老的信徒们确定的传说不同，相对来说是比较晚了。我们将仅仅提及那些最重要者。某些教派取得了很广泛的成功并一直扩展到世俗界，其他教派相反却从未越出过宗教僧众的狭窄范畴。折衷主义的教派天台宗（天台山是浙江西北部的一座大山）的情况即如此，该宗系由智顓（538～597年）和尚创建。据该教派认为，大乘宗的各种不同经文都可以从年代上排出顺序来，系为那些不同的声闻者所写，其中包括作为佛教实质本身的经文《法华经》。此类情况也出现在被称为“华严”宗的教派，它是由居住在长安的一个粟特人家族的法藏（643～712

年)僧所创,以《华严经》为基本经文。

其第一位祖师是善导(613~681年)的净土宗在民间取得了非常广泛的成功,这可以通过从5世纪初叶的慧远时代起,对于无量光佛(阿弥陀佛)之虔诚的强大思潮的发展及其修持的简便性来解释,这就是转生于净土的心愿和对阿弥陀佛不停地顶礼。

典型的中国教派禅(日文作Zen)宗形成于8世纪并始终是最活跃的教派之一,它可能在文人中受到了热烈欢迎。中国禅宗与印度的禅(dhyāna,“禅”字即为它的汉文对音)宗不同,该教派抛弃了由掌握起来极为困难的静修的类型、而且只有经过长期苦修才能达到“存在的极限”的做法。于700年左右由半胡人的广东僧慧能(638~713年)创建的教派无视传统观念,敌视任何制度、任何教理、任何经文和任何仪轨,其目的在于顿悟。为了使心灵摆脱任何有分别的“想”和“我”的概念,人们于仪轨中使用了悖论、对于荒谬内容的平静思辨(如同“公案”那样的情况)、迂回的答复、叫喊声,甚至有时还使用棍棒来殴打。

但唐代正是通过其进香朝圣人和译经师而成为东亚佛教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7世纪的两位最著名的朝圣进香高僧是玄奘(602~664年)和义静(635~713年)。

当玄奘于629年独自一人进入西域的沙漠中时,他已经是当时通过汉译本而可以使人学到的佛教哲学方面最高深教理的博士之一了。他此行的目的是得到一部有关思辨哲学的重要论著的稿本(名叫《瑜伽师地论》),同时也是为了扩大其知识以便解决佛教不同哲学派别之间出现的矛盾。他在迦湿弥罗(克什米尔)度过两年之后,到达了摩揭陀的原始佛教圣地(波吒釐子城和比哈尔的伽耶城),并于王舍城(今拉杰吉尔)附近的著名佛寺那烂陀寺学习了5年。他后来又从北向南和从东到西游览了整个印度,向最著名的大师们学习。此时他已经以自己透彻掌握的梵文而可以与他们并驾齐驱了。他返回中国之后于647年,便用这种语言为今阿萨姆的

迦摩缕波的国王翻译了《老子道德经》；他同样还以其对佛教玄学及其既广博又难解的论著的深奥学问而著名。玄奘在离别16年之后于645年返回长安，直至圆寂前都主持着在中国佛教的整部历史中都是最多产的译经组。在这18年的工作期间，大家应该把自印度文译作汉文的所有译经的近四分之一归于他个人之力（在6个世纪期间，由185个译经小组翻译的总数为5084卷经文中的1338卷）。

在法师返回中国一年之后，其弟子根据他的游记写成了有关他从西域直到德干高原以南和从喀布尔地区直到阿萨姆之间旅行过的地区的一部全面著作。这就是《大唐西域记》。该书提供了亚洲这些不同地区的气候、物产、风俗和习惯、政治制度和历史以及佛教形势的资料。玄奘的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撰写始于他圆寂的翌日和修订于688年，它特别涉及到对其西域之行的详细记述。

7世纪时另一位著名的朝圣进香高僧是义静，他于671年乘一艘伊朗商船出发，以图到达印度。在经过苏门答腊的东海岸，在室利佛逝（今巨港）的佛教重要中心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于673年在今加尔各答附近的孟加拉海岸的耽摩立底下船登陆。然后他又从那里到达摩揭陀国并在那烂陀寺住了近10年。30年前玄奘也正是前往那里求学的。义静于685年离开印度，经由与前来时的同一条海路重返室利佛逝，并在那里一直停留到他于695年返回中国为止。他在洛阳受到了武则天皇后的亲自欢迎。义静在室利佛逝撰写了两部著名的史著，并于692年将其稿本寄往广州。其一是有关印度和东南亚佛教状况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另外一部是有关在7世纪时前往佛国的一批中国高僧的传记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仅仅有唐代两名求法人的游记残存下来了，这就是新罗僧慧超的游记，他经海路到达印度并于729年经西域返回中国；及悟空

和尚的游记,他曾前往今阿富汗的北部地区和恒河流域。悟空于751年从长安出发,于790年经疏勒和龟兹绿洲而返回中国内地。

在被吐蕃人和大食人占据的西域道路已封闭和842~845年间的佛教大规模法难期间,中国佛教僧伽的四散可能导致了前往印度求法进香活动的衰落。最后一次重要的求法进香活动可能是以官方的形式组织于966年,共有150多名僧侣参与了这次活动,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经由西域绿洲到达了印度(捷陀罗、尼婆罗和摩揭陀)。他们于976年返回了中国。

玄奘以其布教和译经(他一返回长安就于646~648年译出了《瑜伽师地论》的大部分内容)为手段,在中国介绍了唯识宗那学问非常深奥的和煞费心思构想的哲学。据该宗认为,色界是我们心的造物。尽管他后来对于其弟子们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而且在日本也使人感到了这种影响,但却仅仅局限在僧侣精英的小圈子中。玄奘是一个非凡的印度学家和严谨的语言学家(大家应感谢他确立了非常严格的翻译规则),他在中国佛教史上显得如同是一个例外。他是唯一的一个能够在广度和复杂性方面掌握佛教哲学之辽阔领域的人。 246

被称为真言宗的密宗佛教在唐代的传入,可能具有一种更为广泛的意义。这种以真言和巫术圈子为基础的佛教主要是以一种纯洁化和与象征性思辨有关的形式而为人所知,它从7世纪中叶起似乎在印度获得了巨大发展(一些真言法师从该时代起就在那烂陀寺施教),并很快就扩展到了锡兰和东南亚。它也不失时机地传到了中国中原和吐蕃。密教经文的汉译本在8世纪时日益增多。在最著名的法师和译师不空(Amoghavajra,705~774年)之前,有两位印度人分别于716年和719年到达中国。不空诞生于锡兰,在青壮年时于中国成长,而在741~746年间又返回锡兰,他从756年起在长安翻译了一大批密教经文,并且在唐朝宫廷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真言作出了印度佛教向中国提供的最新贡献，它在后来指引中国社会进入了新道路并导致了僧众集团衰落的巨大变化的前夕传入中国。印度文化与中国之间密切关系的漫长时代也随着这种宗教衰落而暂告结束，不空于 774 年的圆寂以其独特的方式象征着中国中世纪的结束。

但我们还应该指出，印度和中国文明之间的接触并不仅限于佛教那已经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接触交流。唐代初期印度的世俗科学也传入了中国，许多原籍为印度社会的学者在长安和洛阳十分引人注目，论述天文学、星相学、数学和医学的“婆罗门”著作的译本，在 7~8 世纪时相当多。但中国数学反过来也影响了印度数学。

二、外来的影响

247 唐朝前半期的上层阶级酷爱和迷恋胡人的一切：舞蹈、音乐、娱乐、烹饪、衣服、住宅……草原和西域自汉以来一直对中国北方施加影响。但经过 7 世纪初叶的大规模反攻之后，通过遣使、纳贡、布道、商队和求法进香而日益增加的交流接触，中国的渭水和黄河流域与蒙古、塔里木盆地以及位于帕米尔以远地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了。胡人聚落比在汉代时为数更多，他们定居在甘肃、陕西和河南的商业城市，同时也出现在大运河沿岸和广州。可以说，这个时代的中国文明是世界性的。唐都长安是亚洲所有民族的聚汇地：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高丽人、于阗人和龟兹人、粟特人、迦湿弥罗人、波斯人、大食人、印度人、僧伽罗人等。7~8 世纪的绘画和墓志铭证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兴趣转移到了那些肤色一般都深暗而鼻子突出的远方藩部。他们略带一点讽刺意义和某种嘲弄倾向地保持了对这些民族的充满新鲜的记忆。异族、远方的文化成份、异国方物（奴婢、动物、植物、食物、香料、药物、织物和珠宝……）不会不对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施加影响，同时又以它们提供的新内容而丰富着唐朝的文明。所以西域和印度的乐舞改

变了中国社会的情趣。印度的音乐先经过西域(龟兹)和后经由真腊与占婆而传入中国中原,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被保存在日本的宫乐中了。出自西域的一切都受到了上层阶级的青睐:吐鲁番、疏勒、布哈拉特别是龟兹的乐舞。这种龟兹乐和汉地音乐在整个中国都既新颖又受到高度好评地结合起来了,甚至在凉州(武威,甘肃)那座商业城中也令人强烈地感受到了,那里似乎是西域和印度—伊朗社会的影响向中国中原传播的重要中心之一。

伊朗的影响

来自波斯和印度的两大文明潮流在从阿富汗延伸到乌浒水流域和塔里木盆地绿洲的整个地区都互相交织在一起,并以其相互的贡献而得以丰富。西域和中国北方最活跃的商贾都是原籍为撒马尔罕(中国人称之为“康”)、弭秣贺(米国)、基什(石国)和布哈拉(安国)的人员,他们的语言是粟特语,也就是一种东伊朗方言,它由从乌浒水流域到渭河流域的所有交通大道的沿途人所运用,是西域最大的交流语言。由于贸易交流从布哈拉向木鹿(Merv)、从巴尔赫向赫拉特方向发展,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伊朗的影响相当广泛地传入了中国。在唐朝挺进到帕米尔以远的地区时,对伊朗的内政也产生了影响。萨珊朝的波斯向长安派遣的一个使节于638年被提及。于642年开始的大食人入侵更加密切了伊朗宫廷和高宗皇帝之间的关系。甚至是遥远的拜占庭也想到了要与中国结盟,故于643年派了一个使节到达长安。661年,亡命于吐火罗(巴尔赫地区)的萨珊朝末代君主卑路斯(Péroz)向中国求援以抗击倭马亚(伍麦叶)王朝的进攻。它于次年组织了一支远征军,一直挺进到底格里斯河畔的泰息丰并重新扶植卑路斯复位。但这位不幸的君主以后又被迫重新流亡,于674年到达长安并在那里非常体面而隆重地受到了高宗皇帝的召见,高宗敕他右武卫将军的封号。他于674年回归西域,后于708年再赴长安,而到达之后不久

248

即客死于那里。

在7~8世纪的中国艺术和工艺中,伊朗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所以,起源于波斯的锻打和雕镂金银器的一种新方法在这个时代传到了中国。同样,似乎完全是出自伊朗的马球比赛变成了中国上层阶级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之一。但是,随着新的宗教崇拜传入甘肃诸城市、长安和洛阳,伊朗的影响则主要是在宗教领域中。

景教于5~6世纪在萨珊朝的伊朗广为传播,它后来又先后传到赫拉特、巴尔赫、撒马尔罕,并且还进入了今新疆地区的西部诸绿洲。它似乎在中国打开西域道路的大规模反攻的翌日就传入甘肃的商业城市和渭河流域。竖立于长安义宁坊并被断代为781年的古叙利亚文和汉文的著名双体碑(17世纪中叶,它的发现在耶稣会传教士中轰动一时)叙述了在中国最近期的布教历史:《圣经》是于631年由一位其汉文对音名字叫作阿罗本的波斯人传入长安的。7年之后,唐朝朝廷准许基督教教团布教和造寺。在则天皇后执政年间(690~705年),新宗教成了佛教徒们的仇视目标,而它在玄宗(712~756年)时代又重新利用了皇帝的保护。这是一种于其教理、仪轨和辞汇方面都已经伊朗化的基督教,在中国称作“波斯经教”和“大秦”教(“大秦”一词系指于431年在以弗所会议上受到在拜占庭帝国之绝罚的宗教的发祥地)或“景教”。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从未有时间和在西域归化信徒,并在842~845年间对外来宗教的大迫害时遭禁,后来则似乎完全消失了。它主要是在粟特商人和西突厥人中吸收信徒(《福音书》被译成了粟特文和突厥文),稍后不久又传入巴尔喀什湖西南楚河流域的克烈部蒙古族人和鄂尔多斯汪古部人中。正是这种草原基督教在蒙古时代成了我们中世纪有关约翰(Jean)长老基督教王国传说中的基础。元代,在长江下游的浙江、扬州可能包括杭州都有景教教团,但它却没有很大的发展。

249

另外一种源出于伊朗的宗教可能有更深刻的影响。摩尼教(明

教)是于 694 年在武则天皇后时代被允许信仰的,它似乎相当牢固地扎根于曾从 8 世纪中叶起在吐鲁番、甘肃和陕西起过一种巨大政治和经济作用的回鹘人或者是定居突厥人中。摩尼师们的影响可能在星相与天文学领域中都使人深切地感觉到了。正是他们首次向中国传入了其日子与七曜有关的星期,而以前中国的传统却采用将时空分为四至五个阶段的划分法,每周仅有 5 天。摩尼教如同其他外来宗教一样,在 9 世纪中叶遭禁,它在 11 和 12 世纪时却很奇怪地重新出现在福建和浙江沿海和其他地区。不过,它却依附于佛教和部分是道教的背景之中。这种新奇的宗教信仰在那里煽动已反叛并建立政权的秘密会社。但摩尼教的影响也可能在中国一直持续到 14 世纪,明王朝的名称本身“明”(1368~1644 年)字也可能是对元代秘密会社中的传说的持久回忆,它影响启发了该王朝的创始人。

至于继大食人征服之后而可能从伊朗消失的琐罗亚斯德的祆教(拜火教),它似乎从 6 世纪下半叶起在周和齐王朝时代渗透进了中国北方。隋唐的军事开拓无疑在那里增加了祆教的信徒,7 世纪时在敦煌(沙州)、武威(凉州)、长安(631 年建寺)和洛阳都有祆教的寺院。武威和洛阳的那些祆教寺中演出的幻术节目似乎获得了某种的成功。但到 10~13 世纪似乎仅仅剩下该宗教的一些遗迹了,中国人赋予它一种“祆教”(拜火教)的名称。

7~9 世纪的中国和伊斯兰教

在从 7 世纪一直延续到 13 世纪的整个时代,欧亚大陆的两大文明就是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唐朝向西域和河中地的开拓与阿拉伯人一直将伊斯兰帝国推进到西班牙和俄国突厥斯坦的大规模征服正相吻合。唐和宋的中华帝国(前者是大陆和尚武的,后者是海洋性和经商的)与倭马亚(伍麦叶)和阿拔斯(黑衣大食)帝国是同时代的,属于欧亚大陆上的同一个历史时代。东亚和伊斯兰世

界甚至似乎经历了一种类似的发展,军事征服取代了经商活动、文学、科学和技术,已处于一种以城市为中心而蓬勃发展的时代。中国和伊斯兰教诸国同时经受了被蒙古征服的可怕考验:旭烈兀汗(1218~1265年)的军队于1258年夺取了巴格达,伯颜(1236~1294年)的军队于1276年进入了南宋的首都杭州。

250

伊斯兰社会和中国社会之间的交流始于唐代,它们一直延续到元代(13~14世纪)的那种由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创造的大政治范围内。

最早交流接触发生在阿拉伯人于650年左右到750年前后向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巴尔喀什湖之间地区进行扩张的时代。唐朝在世界这一部分地区的全部政策就是抵抗和阻止阿拉伯人入侵的胜利推进。但中国与倭马亚征服的受害者之间的结盟游戏无法推迟其发展。萨珊朝时期的波斯于624~652年间被征服,河中地诸绿洲从704年起被占据,阿拉伯人于此后的数年间立足于花刺子模、拔汗那和疏勒。唐朝于745~751年间的反攻在著名的怛罗斯战役期间被阻于巴尔喀什湖以南。怛罗斯战役爆发于普瓦蒂埃战役的18年或19年之后,它标志着唐朝在河中地以及在疏勒地区的远大抱负与覬覦的结束。中国在帕米尔山脉内外影响的退缩又由于安禄山在755~763年的叛乱而引起的危机被进一步加速了。

中国与伊斯兰社会的接触交流可能使中国的某些技术通过西域传到了伊斯兰社会和欧洲。纸张的情况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自公元2世纪以来就在中国得到改进的造纸程序从撒马儿罕传到了巴格达和大马士革,接着又从那里传到了埃及和马格里布。然后又于10~11世纪传到了穆斯林的西班牙。在意大利制造的最早纸张应断代为13世纪末。如果没有中国北方12个世纪之前发明的这种技术的长期传播,那末西方社会就既不可能懂得印刷术,又不会出现近代社会。传说中说,是由751年怛罗斯战役中被阿拉伯人俘虏的战俘向他们传授了造纸术。事实上,中国在河中地和波

斯的影响要早于 8 世纪初叶,中国纸张的制造者、纺织工、金银匠和画家在阿拉伯征服时就已经定居在库法(巴格达西南的卡尔巴拉)和撒马尔罕了。

虽然中国军队与阿拉伯骑兵在河中地与喀尔巴什湖以南处于对峙的战争中,但这不会阻止中国人与穆斯林教徒之间建立的政治联系。一个无疑是由波斯人和伊拉克人组成的军团于 756 年被派往甘肃,以援助受到安禄山叛乱冲击的肃宗皇帝。不到 50 年之后,在唐朝和阿拔斯王朝之间缔结了一项反击吐蕃人对西域进攻的盟约。哈里发诃伦(Hārūn al-Rashid, 766~809 年)于 798 年遣使抵达长安。

但经过西域的这些外交关系与 762 年建成巴格达之后在印度洋并一直到达西域伊斯兰社会的航海发展是同时代的。自从大马士革迁都到巴格达以后,由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口锡拉夫出发赴印度、马六甲海峡和中国南方的海上旅行就发展起来了。中国沿海地区与印度洋之间的贸易交流涉及到了豪华奢侈品(到达时带着象牙、神香、犀牛角和黑奴,离开时携带丝绸、香料和主要是在福建制造的瓷器)。

8 世纪中叶的大海港广州也就是阿拉伯商贾们所说的 Khānfū(广府),那里是一座移民城市,其港口后沿仍由土著部族居住,在约为 200 万的居民之中,包括着许多深色面孔的外国商人:昆仑人(马来人)、波斯人(伊朗人,当该词并不是指东南亚的另一个国家时)、婆罗门(也就是印度商人)、越南东海岸的占婆人、越南人、高棉人、苏门答腊人……信仰正统教规的穆斯林和什叶派信徒们都在藩坊拥有他们的清真寺,藩坊位于广州河的南岸。外国人有关广州的一份最古老资料是《中国印度见闻录》,它为商人苏莱曼所著(Suleyman),并被断代为 851 年。

756 年,由于以海南岛为基地的伊朗和阿拉伯海盗们对该城进行放肆的抢劫,接着 8 世纪下半叶被任命赴“市舶司”上任的宦

官太监们的贪婪,使得部分贸易转向了越南北方和位于福建边境附近的潮州地区。但是,苏莱曼的游记被断代为一个其施政行为更为公正的时代,正是这一公正才使自9世纪初叶以来在广州恢复经商活动。黄巢起义于公元879年将该城洗劫一空,数年之后在巴士拉爆发了非洲奴隶暴动,后来又是公元977年摧毁了锡拉夫的大地震等,它们导致波斯湾与热带中国大港口之间放慢了贸易交流。在11~14世纪蒙古人侵占中国南部之后,最活跃的港口为广州港,但也包括福建海岸的泉州(也就是穆斯林商人们所说刺桐)。

三、唐代文明的影响

254 中国王朝于7~8世纪在亚洲开拓的结果是加强了唐朝文明在所有邻邦中的影响:西域、蒙古、吐蕃、河中地、高丽和日本、东南亚国家。中国中原文化的某些因素传到了鄂尔浑河流域的突厥人中(历法、十二生肖……),突厥语词汇直到今天仍保留了向那个时代的汉语所借鉴的内容。下嫁突厥和回鹘可汗以及吐蕃赞普的唐公主把汉文经典传到了游牧民的帐篷和拉萨的王宫之中。继唐朝宫廷与吐蕃王族在7世纪中叶之前数年和亲(第一位许嫁赞普的唐公主于641年到达拉萨)之后,打通的唐蕃古道使中原进香求法之人经吐蕃首府和尼婆罗前往佛教圣地。玄照和尚于651年、玄奘和尚于7世纪下半叶正是这样前往印度的,无疑还有甚至未曾留下名字的其他许多人。非常奇怪,佛教影响在8世纪下半叶是从中国中原而不是从相对更近的印度传入吐蕃的。

此外,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使唐帝国获得其在整个亚洲的巨大威望的大部分原因,它以其大型阿兰若、著名的朝圣求法人、著名的“法师”而成为佛教的重大中心之一。唐朝对这种大宗教和其他外来信仰的垂青无疑始终都未能摆脱其政治思想背景。

中国在日本的影响

中国影响的传播于唐代在日本国形成了一种特别大的规模，它从公元7世纪初年起就在那里骤然引发了一股政治集权的发展高潮，这种发展本身也促进了文化的引进与借鉴。

中国的影响无疑从未停止，这在日本群岛(更具体地说是在琉球)已令人强烈感觉到了。日本国从中国在朝鲜设府郡的时代起，就与汉朝开始交往了。在朝鲜于公元4世纪初叶形成三个王国之后，日本与中国北方和长江下游之间的这些关系仍被维持下来了。但中国对东亚的威望从未比它在7~8世纪所形成的更高。中国在日本的影响也从未再像唐代那样普遍和深刻。这些影响先于602~622年，后于646~671年间，以相继的高潮传来，它们扩大到了所有领域(政治和行政制度、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宗教)，并很快就将日本变成了一个具有中国文明的国家。

在奈良(710~784年)和平安(794~1068年)时代，甚至已不再是指自发的借鉴了，而是指一种有意的和系统的模拟政策。所以，更善于保护自己和对付外来侵略的日本，直到今日仍得以保留下来了许多可追溯到唐代的中国传统。

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以及8世纪日本的其他许多司法和行政律令集，都非常严重地受到了《唐律》和同时代的中国条法的启发与影响。710年营建的新京师平城(奈良)以及793年营建的平安(京都)二城的城建平面图，均受到长安城布局的启发影响。日本最早的官修历史《古事记》(712年)和《日本书记》(720年)均是根据中国断代史的模式写成的。日本所有的佛教大教派(净土宗、天台宗、真言宗、禅宗……)都是唐代的佛教教派在日本土地上的根孽，其教理与经文是由有时是日本有时又是中国的出家人传入日本的。比如，原籍为江苏扬州的僧侣医生鉴真(688~763年)于753年在另外4名中国出家人的陪同下东渡日本，并于763年

255

在奈良结束了其一生。

在前往中国向大法师求学并朝圣巡礼于最负盛名的圣地名刹（长安、洛阳、浙江的天台山、山西的五台山……）的最著名的日本高僧中，我们可以举出：玄昉（？～746年）和尚，他于716年出使长安并在18载之后将500卷汉文佛经和其他法器携回国；空海（774～835年，弘法大师），他是真言宗的著名立教法祖，曾于804～806年在华旅行；其旅伴最澄（767～822年，根本大师）和尚于805年返回其国；僧常晓和圆仁（799年生于京都）于838～839年莅华；圆仁留下了一部详细的游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他曾被中国当局和842～845年的大规模法难激怒了，此人于838～847年间先后赴扬州、淮河流域、山东海岸、山西北部五台山、长安和洛阳巡礼旅行，后经山东和朝鲜海岸而返国。继圆仁之后，我们还可以举出于842～847年在华巡礼旅行的惠运、圆珍（814～891年，智澄大师，853～858年在华）、宗叡（862～866年在华）等和尚。我们在求法进香人和使节之外，还应补充贸易交流关系；在唐末，曾提到了在日本港口的大量中国商船。

受中国影响比较悠久和比较深刻的高丽也不会摆脱唐朝文明那特别强大的吸引力。当新罗于668年吞并了百济和高句丽国的时候，那些中国移民很多的地区就被纳入到了新帝国。在7世纪末和8世纪初的50多年间，唐朝与新罗之间的关系由于大批使者以及朝鲜的僧侣和学生入华旅行而变得很密切了。此外，朝鲜在这个时代于东北海洋中还占据着一种统治地位。一些朝鲜人聚落，建于山东海岸以及从长江下游，直到河南与山东交界处的大运河经过的商业城市中心。

四、“民族主义”的反抗和回归中国传统之源

中国文化生活的一大转折点开始于800年左右。这主要是由于某些人出于一种深刻的返归中国传统之古老本源的愿望，同时

也是对于自汉代末年以来非常广泛地渗透进中国的外来影响的一种敌视态度。继一个朝廷或上层阶级对于外国人、具有异国情调的生活方式和产品持特别欢迎的时代之后,这种反抗的大部分原因,似乎可以通过安禄山叛乱所具有的民族主义的失败心态,以及继这些悲剧性事件之后的气氛变化来解释。玄宗时代的统治者向全部军事将领,特别是向胡族血统的指挥员们表现出了应受谴责的宽容(安禄山本人就是粟特父亲与突厥母亲的儿子),这几乎葬送了帝国,后来又使之变得非常衰弱了。那些唐朝曾被迫向之求援的胡族人盘踞在中国西北并在甘肃和陕西为所欲为。劫掠成性的吐蕃人把皇家种马场中的马匹洗劫一空,并在763年一直入侵到长安,在770~850年左右立足于甘肃的某些城市中;回鹘人垄断了马匹贸易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或在京师成为放抵押贷款者,以毫无慈悲心肠的高利贷者的身份行事。定居在唐朝大城市中的胡商的财富可能煽起了某些排外反应,在起义暴乱期间则表现得更为明显。760年,数千名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被由田神功领导的反叛集团屠杀于扬州;一个世纪之后,黄巢的军队于879年也在广州攻击胡商。与民间的反抗相吻合的,正是在上层阶级中的某些政治态度:在特别漫长的时间内维持了政权的混血贵族,似乎从其胡族先辈那里继承了一种能够接受外来事物的更大本领和军事冒险情趣;有人认为自4世纪以来的胡族入侵潜移默化地败坏了中国的纯洁性,腐蚀了纯朴古风并由此而引起了中国的没落,这种想法逐渐地在文人和通过科举而选拔的官吏中形成了,而这些官吏的原籍大都在中国的东南部。他们对于战争事务不大关心,而认为军权应该严格地服从民权。在这一切之外,还应补充佛教僧伽那异常多的财富、僧侣们的势力、他们与后党和阉党所维持的密切而又秘密的关系。然而,其势力在800年左右正处于飞黄腾达期间的太监们,成功地控制了宪宗时代(元和年间,806~820年)的政权并主宰了立废皇帝大权。世风日下这件事本身,自从“关内”失去其经济

和政治优势之后，便导致了陕西与甘肃东部贵族的衰落、传入最大外部影响的西域道路的断绝，这一切都促使那些自认为是中国正统支持者的人作出反应。外来宗教和所有宗教中的第一种——佛教现在身处远离了其发祥地的境况：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克什米尔、印度与伊朗的边境、波斯。中国正准备收缩后退并作反躬自省。

257 使用“民族主义”一词于此可能具有时代的错误，但这确实是类似在安禄山叛乱之后形成，又在中国历史上利用其他机会而多次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的反抗。这种对于一种可能会由于外来因素而受到损害的真实传统的执著、这种返归思想和正统伦理的纯洁与虚构的本源之愿望，既然它们并未涉及到最新的民族思想而是指文化思想，那末到底应该怎样为它们定性呢？为了表达这一切，也可能应该杜撰一个生硬的词——“文化主义”。

“古文”运动

相当奇怪，复古的愿望首先是通过关注文风和文体的关注才形成的。这里是指使中国的赋（散文）恢复它在汉代和上古时代末期所具有的那种纯朴、简练和生动之特征。第一位为写“古文”筚路蓝缕的是柳宗元（773～819年）。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形式离不开内容，六朝时代讲究文采的作风与在伦理方面的一种彻底冷漠是相吻合的。然而，文学并不仅仅是一种美的消遣。如果它丝毫不表现正确的和强有力的思想，那末它就仅仅是一种遭人蔑视的卖弄技艺的表演，而它在上古时代所具有的教育、伦理和政治功能与其形式是不可分割的。继司马迁之后的一位最大的散文作家韩愈（768～824年）是著名的排斥佛教者和正统文人，他于819年为反对伴随迎佛骨而举行的集体发狂的场面而作的抨击性文章永世留名。当然，自初唐以来的某些史学家和诗人都是柳宗元和韩愈的先驱，特别是贞观时代（627～649年）的福州刺史柳冕，他认为自汉代以来，古人那集智慧和真理于一体的“道”已经丧失。古文运动正是因

为韩愈和柳宗元而具有了其贵族文学的特征。正是从他们开始才形成了激进的发展,它在 11 和 12 世纪时可能导致了由“伦理学”形成的这种“文艺复兴”。所以,大家在韩愈的直接继承者之一身上就已经发现了一种预示着宋代理学思想家出现的哲学方向。为了更好地批驳佛教,李翱(卒于 844 年左右)研究了佛教哲学,而且还精通禅(日文作 Zen)宗思想。这些研究又把他导向原来主宰宋代整个哲学方向的有关“心”与“性”之概念的新观念:圣人的天性受到了“情”的干扰,但他们的性和情就如同光明和黑暗一样不可分割。真理是完整的“诚”,它超越了任何区别以及性和情的任何对立。人们于此又一次发现了移植到经典《孟子》词汇中的禅宗的基本辩证技巧。

法难的镇压和佛教的衰落

258

在 842~845 年间导致了大规模禁废外来宗教和这些宗教中的第一种——佛教的运动,“民族主义”与排外的特点在当时引以为据的动机中表现得明显。早在 836 年,一道诏令就禁止汉人与“色目人”有任何联系,“色目人”一词系指原籍为位于帕米尔以外地区和东南亚的人:伊朗人、粟特人、大食人、印度人、马来人、苏门答腊人……炮制法难的诏令是于 845 年才事后颁布的,当时已经实施了所有的具体措施,它指责外来宗教佛教是短暂的南朝(如晋、宋、齐,特别是梁和陈诸王朝)在伦理和政治上削弱的原因。更具体地说,它指出了如果让景教徒(大秦穆护)和袄教徒还俗,那是由于他们“不杂中华之风”。诏令中提到了此后将呈现的“清净训人”和“简易齐政”之风。对佛教的反对既是情感方面的,是对所有外国人以及他们在 755 年之前获得的宗教特权的一种弥散性的仇视;它又是审慎的,也就是说反佛须符合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太监宦官们的势力,虔诚的、迷信的、没有文化和唯利是图的佛教徒,佛寺在田产、人员、钱币和黄金方面的赃财,而当时正逢国库空虚和

缺乏铸币之铜。佛寺以法器、铸钟和供像等形式占用了帝国中的一大部分贵重金属。当时采取的措施之一是令人将钟与像化作铜钱，但由于害怕亵渎宗教，民间拒绝使用这种货币。

然而，如果认为禁废外来宗教是突然的和粗暴的，那就错了。当时是逐步地过渡到采纳最激进彻底的措施的。起初仅仅是根据一种大家可以奉为传统的观念而纯洁清理佛教僧侣界，以便从中驱逐那些无文化的僧侣和假出家人。接着人们又根据一种对佛律经文的狭义解释而没收僧侣们的私产（因为他们发愿保持贫穷），并在官方的宗教礼仪中取缔佛教仪轨，以及采取越来越多的还俗措施（845年是每天还俗300人）。最后，还对寺院的教产做了全面统计，此后便是没收土地、奴婢家庭、钱币和金属。26万名佛教男女出家人被还俗和被重新列入纳税人之列，15万名过去曾摆脱了国家税役的依附于寺院的人又重新被统计在两税户的户籍中，4600余座寺院被拆毁或被改造为公共设施，4万座招提和兰若被拆除或派作他用，仅有几座具有官方地位和由少数僧侣主持的寺院被保留下来了。起源于伊朗的宗教（祆教、摩尼教和景教）则遭受了更为严酷得多的命运，它们最终都被禁废了，为数仅有数千名的从教人均被还俗。

这些非常严厉的措施均对中国佛教造成了特别严重的损害。武宗皇帝（841～846年）的继承人并没有在法难刚过去不久就缓和于843～845年所采取措施的严厉程度，或允许相当数量的还俗者恢复其宗教生活和重建某些寺院。但是，法难的诏令无疑仅仅在京师才如此严厉地实施，到处都有（甚至在执政官吏的等级上）一种暗中的反抗，它无疑可以使某些距离长安遥远的地区宽容出家人及其宗教信仰地。唐代的中国就如同我们中世纪的欧洲一样辽阔。所以，佛教僧伽的势力于10世纪在福建闽国和吴越国中被维持了下来，甚至还得到了加强。在宋代，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僧侣阶层，佛教僧伽又恢复了其大部分权力。但这是一种自我残存和似乎

失去了其灵魂的教团，因为学问深奥的僧侣精英都被遣散，其教派传统已由于 845 年的大规模法难而中断了。

自 8 世纪末叶以来，中国佛教与亚洲的宗教大中心被隔绝了，而在近 500 年以来，其虔诚灵感之源都是从哪里传来的。它再也无法接触圣地了，佛教本身在印度和伊朗边陲受到了伊斯兰教扩张发展的威胁。继唐末之后，唯有一个教派仍真正活跃于中国，这就是禅宗，它事实上更应该是中国的而不是佛教的教派。印度经文的译经越来越罕见了，那些佛经的大译师、疏证者和诠释者都已圆寂。佛教史学家们在宋代对过去做了一番总结。《景德传灯录》问世于 1004 年，共包括 1701 篇禅宗和尚的传记，它丝毫没有最早佛教高僧传的那种朴素自然的虔诚；《佛祖统纪》是受世俗史学家们的方法启发的一部内容广阔的文集，它似乎是在 1269 年对佛教通史作了一番最后总结。

总而言之，我们觉得鼓动 6~7 世纪人的巨大宗教虔诚暂时减低了。这种现象的原因无疑是多种多样的，但也可能应该到社会的变化中去寻找其深刻的和主要的原因。佛教曾适应的社会变化，也就是 3~8 世纪的那些变化（实行族内婚制的贵族、庄园和寺户、市民和农民区），受到了在 8~9 世纪之间产生的城市和货币经济全面发展的触动。大寺院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拥有它自己的庄园、寺户、碾碓、油梁、邸店，同时成了中国伦理、宗教和经济权力的象征。在六朝时代和唐代的大寺院与世俗贵族之间，所具有的似乎不仅仅是一种相似性和命运的共同性，而是一些密切的关系。²⁶⁰ 845 年的法难确实是对佛教僧伽的非常沉重的打击，但社会的发展可能足以毁灭当时已遭严重动摇的基础。没有任何一种宗教不是将其根系延伸到它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去的。



自宋至明的官僚帝国

第五编 中国的“文艺复兴”

从 12 世纪开始浸透了中国历史之全部观念的伦理正统,再加上将其过去全都简化为一些失去了任何时间维度之事件的传统史学范畴(它们只关心中央政权的生存和行政管理),使我们发自内心地坚信中华世界的社会和政治形态、基本制度、经济、思想和技术的永恒性。但世界上一些最深刻的变化和最令人震惊的新生事物却被中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欧洲历史上被认为是标志着一个新社会出现的事件,在中国历史的传统视野中却只不过是一种“改朝换代”。如果说中国社会的历史与欧洲社会具有如此根本性的差异,那末这首先表现在人们对此所作的描述中。这一切无疑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因为我们的整部世界史都是以西方至上论及其历史的进化特征以及其他文明相对的停滞性为基础的。²⁶²

公元 1000 年左右,于东亚出现的新鲜事物一旦被集中起来,便形成了一个以其严密性和规模而非常感人的整体,以至于必须事先阐述清楚这一切:中国社会在这个时代经历了一场真正的变化,其意义并不比上古时代末期在那里产生的变化小多少。

人们于此采纳了“文艺复兴”一词。它可能会招致批评,即使这两个事件之间的相似性相当多也罢,比

如在复归古典传统、传播知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印刷术、炸药、航海术的发展、排气钟……)、新的哲学和新的世界观等方面。经过全盘考虑之后,人们就会发现中国社会也如同西方一样具有它固有的和独到的特征。但对于这种历史上的暗示不应作纯然字面上的理解,它仅仅是对于各种文明和在其发展中定期联系起来的相互关系史上一种普通相似性的简单回顾。

10~14 世纪年表

外蒙古	西北边陲	东北边陲	华北		华南
		辽帝国(契丹)(946~1125年)	山西的晋国(895~923年)	五代(开封)后梁(907~923年) 后唐(923~936年) 后晋 936~946年 后汉(947~950年)	蜀国(907~923年),四川。楚(907~951年)和荆南(907~963年),湖南 南汉(911~971年),广东。闽(909~978年),福建。 吴越(907~978年),浙江。吴和南唐(902~975年),江西。
			北汉国(951~979年)	后周(951~960年)	

续 表

外蒙古	西北边陲	东北边陲	华 北	华 南
蒙古帝国，由成吉思汗于1206年创建，于1227年吞并了西夏国，1234年吞并了金国，于1271年采纳了“元”的王朝称号，1276～1279年吞并了南宋王朝。 蒙古人被驱回了蒙古地区。	西 夏 国 (1038 ~ 1227 年)	金国(女真，1115～1234年)，于1126年吞并了中国北方。	北宋(960～1126年)，开封。	
			南宋(1127～1279年)，杭州。	
			1368年，在南京创建了汉族的明王朝。	

第一章 新社会

264

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

但这个新社会是生活在连续不断入侵的威胁之下的，这些入

侵最终大获全胜,于 12 世纪初叶肢解了其北方诸地并于 1273~1279 年间占据了整个中国。这种外部的威胁绝非与宋代的经济和

这一系列的胜利无疑可以部分地通过以下原因来解释：由后周建立的制度的有效运行、宋王朝缔造者于 960 年夺取其统率权的军队的战斗力。但与在 7 世纪时所发生的情况不同，军事开拓仅仅局限于中原地区，并没有向满洲、高丽、蒙古和西域以外地区发展。它确实在东北被于 10 世纪期间形成的强盛的契丹帝国所阻，在西北被扩张到了青海、甘肃和陕西的吐蕃人所隔。最后，向西南的开拓则由云南南诏国的继承者大理王国封锁，该王国直到 1253 年才被蒙古军队所平灭。至于越南，它成功地于 939 年脱离了在中国建立在广东的南汉国的统治，并最终于 968 年形成了一个统一和独立的帝国（丁朝）。上述年份中的第一个，标志着中华帝国和中国南部诸王国自公元前 2 世纪以来，在红河盆地和安南海岸行使的几乎未曾间断过的长期霸权的结束。981 年，越南成功地挫败了宋朝的一次军事远征。1009 年，由黎氏新王朝（1009～1225 年）创建的“大越”国于 1073～1077 年间对越南北部、广西及其海岸的中国军队和海军发动了一场战争，在这些热带和瘟疫流行的地区，给宋帝国制造了无数困难，那里的形势又由于大量土著民的存在而复杂化了。

在宋代第三位皇帝真宗（997～1022 年）统治时期，当时处于其势力之鼎盛时代的辽族之契丹帝国，向河北和山西发动了频频获胜的进攻，迫使宋王朝签订和约（黄河流域的澶渊之盟，1004 年）。宋朝根据该项条约而保证每年向辽纳重贡。但这项盟约以及 1044 年以增加宋帝国的负担而补充的另一项条约，都并不足以确保中国天朝在其新边境地区有一种令人满意的安宁，而使一种更加严重的威胁压在了西北诸省的头上。由吐蕃人、汉族人、突厥人和蒙古人杂居的地区，在 11 世纪上半叶于古牧民唐古特人的统治下，形成了一种广泛的政治统一。该帝国以“西夏”（1038～1227 年）之名著称，从南蒙古一直延伸到青海（库库诺尔），并践踏了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山西、陕西和甘肃诸地区。宋朝也被迫在公元

1044年与之签订了一项代价昂贵的条约，却仍不能使自己避免受到新的攻击。

西夏的威胁在11世纪下半叶与经济的困难同时变得严重起来了，中央政权起用一位名叫王安石的大臣(1021~1086年)，他拥有充分的权力，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涉及到了社会、经济和军事结构，但长此以往却引起了大地主和大富商界的强烈反抗。王安石在其保护人神宗于1085年晏驾之后被排斥出了政权。守旧派的魁首司马光(1019~1086年)主政并废除了变法。削弱帝国的这些党派之争一直延续到满洲那已经汉化的民族女真人的突然入侵时为止，而正是这次入侵才灭掉了辽王国并于1126年占据了整个中国北方。

267 在长江下游的南方寻求避难处的宋室最终在杭州建立行宫(临安行宫)，这就是南宋时代(1127~1179年)，它是由于与宋代历史上的第一个阶段(960~1126年)相对而称的。守旧派最终复出掌权，但在收复国土派和支持与女真人的金帝国妥协求和者之间，又出现新的对抗。面对女真人的战争势力，向北反攻复国的努力失败了。宋军的士气低落且缺少骑兵。因此，该帝国转向了由宰相秦桧(1090~1155年)主持的一种妥协政策。然而，与金人缔结的和约却由于政权的更迭而未能取得效果。和谈数次中断，而连绵不断的战争引起了物价飞涨和税额的骤增。经济困难又相继引起了社会动荡。政治上集权确保了在12~13世纪相继出任的宰相们有一种几乎是专制的权力。如秦桧、韩侂胄(1151~1202年)、史弥远(?~1233年)、贾似道(1213~1275年)。帝国的衰败直到1276年(杭州陷落的时间)灭掉它的蒙古人入侵时一直在加剧。

新的国家

直至宋代第二位皇帝太宗(976~997年)的统治时代，也就是在帝国巩固的时代，新国家的基本制度才得以选定或补充。当时建

立了一种真正的情报、控制和指挥的神经中枢系统，它一直扩大运用到该帝国最偏僻的地区，确保中央政府对于全部领土都具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特别彻底的控制权。中央集权在元丰（1078～1085年）改制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使丞相扮演了一种事实上使皇帝黯然失色的作用。

由 5～9 名成员组成并由皇帝主持的御前会议负责基本政策方面的事务。一个负责起草官方文书的机构附属于它，这就是由其成员有时充任大臣的翰林学士院。但在所有情况下，政府都会得到大量上谏，所有决策都是在可以表达各种观点的辩论之后才作出来的，皇帝所作的一切仅仅是批准已经选择的建议或进行最后的决断。有三种机构负责接受官吏或普通百姓的意见、建议或诉讼。它们彼此之间互相独立，其成员都享受连皇帝本人也不能提出质疑的一种绝对的豁免权。这样，政权就可以确保一定程度的客观性。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即由其社会地位差异很大的人员提出的形形色色的计划和建议在宋代（更具体地说是在 11 世纪）都大量地涌向官府诸机构，直至中央政府。

经过对唐代那臃肿政府系统大加简化之后，中央政权似乎变得更能发挥功能了，它共被分为三大部门：

——经济和财政（三司），负责国家的专营权、预算、人口。

——枢密院。

——中书门下，负责司法权和人员的权力（开科取士、任命官吏、晋升官吏……）。

在各路（道），那里的县又被集中编为府（州），其中有的具有一种更为严格的军事（军）或产业（监）特征。皇帝委任负责具体使命和根据其权限来监察刑法、税物、经济或军事事务的官员。 268

除了彼此相互独立的调查和监察机构之外，还存在着权力和权限的极其严格的划分。宋代政治制度的两大特征值得于此强调指出：一方面是负责经济问题的机构日益增多，这是由于国家的主

要收入均出自贸易或产业；另一方面是选拔和晋升官吏制度的有效运行，这是由于有了促使选拔优秀人才的机制。

科举制在宋代达到了最完善的程度。它后来却蜕变了，在明清的独裁专制帝国中变成了一种沉重的机制，是遏制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了。为了粉碎军事贵族那过分庞大的权力，这种制度在7~8世纪的唐代形成（最早的科举应追溯到隋炀帝执政时代的606年）。人数极少的投考举子是由地方当局举荐的（直到737年，每个州只有二至三名），或来自建于京师的国学。当时存在着多种考试（经典知识、律令、文字史、算学、同时还有赛箭术和体力比赛的军事才能科目），但最有权威和最受欢迎的仍是考试普通文化和包括诗词在内的写作本领。在10世纪末和11世纪期间，宋代采取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三种不同水平的考试，以便扩大选举官吏的规模（各州的选举，在京师由中书省复试，在金殿上面对皇帝组织的殿试）、最终仅仅保留了一类考试并通过诸如闭卷形式（保持卷子的匿名）等各种措施来确保其客观公正性。

正如在唐代或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一样，科举场上的成功并不一定就能在皇家政权的范围内被封官，唯有在皇榜上名列前几位才会很快得到职务。升任官吏还使用其他方法，其中的一种就是荐举制，而荐举者要为其保护人的缺点和错误负责，从而使其评语尽最大可能地公允客观。

269 科举制在11~13世纪的发展可能使文官队伍在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具有了相当大的份量。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代，“官吏”们都未能对国家的政权实施过如此有效的控制。宠妃、皇后及其家族、太监等所有接近君主的人都熟悉宫中的隐情，他们在其他时代都成功地决定了国事的方向或者在事实上主政国事，但他们在宋代却似乎没有任何影响了。皇帝们自己也只能起一种大为逊色的作用，而将其前台留给了大臣们。

政治习惯也证明了官吏队伍的这种势力和主宰作用。人们在

11 世纪时首次发现具有对立倾向的政治大党派发展起来了，他们的对峙表现了某些社会分化。然而，这远不是当代议会制度所特有的形式（大家更多地会联想到东方国家的现行制度），而对立各方以他们的整个生涯为赌注的严酷程度（因为政治方向的改变必然会导致对从政人员的一种非常广泛的更换）揭示了宋代政治生活的紧张程度。

变法运动

在中国历史上，11 世纪是对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作出重大尝试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改革变法运动与当时的思潮紧紧相联，其密切程度超过了历史偶发事件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以辽和夏王朝的进攻所招致的困难，它们成了矫治防御体系缺陷的尝试之起源。但如同军事问题从来都不会与其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相脱离一样，那些对于国家和社会形成一种全面看法的贤明之士的业绩——变法，最终触及到了一整套制度。

刚刚于 1038 年创建了西夏帝国的唐古特人的威胁，促使宋朝起用了一位名叫范仲淹（989—1052 年）的地方官吏，他提出了一项旨在遏制西北部强国之势力的计划。宋王朝于 1044 年与西夏人签订的和约似乎是一种部分的成功，其功劳应记在范仲淹的帐上。范仲淹奉诏主政，他与其“朋党”确实实施了一种共分 10 项的变法计划，其中涉及到了官吏的贡举和晋升制度、农业和赋税制度等。

但范仲淹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对现行制度的整顿。在 11 世纪下半叶实施的改革变法，却显得要大胆勇敢得多，并具有更为彻底的特征。大家可以通过它们引起了强烈反对并挑起了统治阶层分化成两个对立营垒的事实来理解这一切。

近代都用“社会主义”一词来指称王安石（1021～1086 年）的“新法”。我们可以肯定，一种社会公正和有时甚至是平均主义倾向的理想鼓舞着 10～12 世纪的知识分子与农民中的某些阶层。但同

样也显而易见,王安石的目的绝不在于对社会和政权的基础提出质疑。影响他的是一些自由化观念和行政官吏的那种注重实际的思想。王安石对专制主义很仇视,坚信法律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的调节功能,他似乎拥有一种社会学的推理。在他看来,单独负担直接税收和徭役的小农所遭受的事实上的歧视,乃是国家衰败的深刻原因。他认为,一旦改善他们的处境和在分配负担方面恢复一定程度的公平,就有可能更有效地把他们团结在抗击北方帝国的蚕食和入侵的斗争中,这正如贫苦农民在困难时刻被迫接受高利贷的剥削一样,也正如小手工业主和商人要忍受由富商把持的商行

贸以抵制高利贷,当时在水利灌溉和传播农业科学知识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人们同时也在寻求已不再是小农之负担的新的收入财源,让国家参与巨额贸易。这些措施得以明显增加公共收入同时又将土地税压缩一半。

王安石的另一抱负是向国家提供一支忠于它和除了为公众谋利益之外再无其他杂念的官僚队伍。他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才决定大幅度地增加国家工作人员的俸禄。除了18世纪中叶之外,中国的官吏们可以说从未再有过宋代那样的丰厚报酬。他改革了过分注重形式的科举制,而实用知识(经济、律令、舆地……)最终在科举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由特定田产确保其日常生活的官办学校都在府和县一级创建了,以便扩大科举的基础。 271

但革新变法在军事领域中的规模特别大。在一个如果雇佣兵过分膨胀便只会加重国家的负担而又无法确保有效国防的时代,王安石决定以建立农民保甲兵的办法,将对确保其自身安全的关注归还于民。这些保甲分成每10户一甲并坚持日常训练和供应兵械,从而减少了常规军队中过分庞大的兵员。

王安石的“新法”遇到了很强烈的反抗,这无疑有经济和社会因素,因为改革触及到了极多的特权和已获得地位的人。但还有其他因素,20多年间(甚至在两位主要对手死后也如此),在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与由史学家司马光和数学家邵雍领导的守旧派发生冲突的激烈斗争中,所出现的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利益之争。人员、气质和教养的对立于其中似乎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们没有理由排除那些公正不倚的行为,难道变法运动不正是在11世纪时赋予每个人(无论其地位如何)将其意见向上传报之特权的这种典型处境中诞生的吗?

人们无疑会把民间救助制度的建立归于这场运动:孤儿院、收容所、医院、诊所、公墓、常平仓……它们在城市的社会环境中较为多见,无生活来源的人都涌向了那里;人口的集中提出了一些困难

的问题。这些机构都是根据 6~7 世纪的佛寺创立的慈善机构的模式而设计出来的,国家为它们调拨不可剥夺的土地和固定收入的来源,这类基金在宋代得到了广泛发展。这样一来,不仅国家使用这种办法来确保某些固定收入,而且继范仲淹以其“义庄”作出表率之后,豪门望族也在其氏族内部把它用于互助的目的。这种佛教机构的世俗化以及国家负责起过去由寺院负担的接待和慈善功能的做法本身,就是 845 年法难的时代深远的影响之后果。

二、军队

从募兵制到雇佣军制

如果说宋王朝非常关注其防务,如发明了新的军械、增加了其军队的兵员、在女真人入侵时建立了一支战船队、并从 10 世纪末到 13 世纪末都将其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了战争的话,那末相反,它却从未停止维持和巩固民权较之于兵权的无可争辩的至上地位。此外,鼓舞该王朝的思想恰与其北方对手的思想相反,前者完全缺乏能够引起赞扬的粗犷的暴力、如饥似渴地进行征服和统治的勇士特征,而这一切恰恰是其令人生畏的女真和蒙古对手们的天性。人们经常指责宋代中国缺乏战斗力,这是不言自明的,我们也不必提及它的莫名其妙的天生不变的本质。

由宋代新王朝继承和采用的雇佣兵制不再使行武生涯成为所有人的事业,而只是一种经专门分工的兵役了。然而,自从秦代以来,中国军队的势力就是在募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是募兵制提供了主要的兵员,非常幸运的是还可以由胡人部队来补充,比如以其耐力和战斗力而受到高度好评的游牧民和山地人的军队。但宋王朝却缺乏由胡人辅助部队组成的这种宝贵补充,而且还深受雇佣军的所有弊病之苦,如开销骤增、在无战事的漫长时期内军纪涣散,以及军队如同一支与帝国无关的队伍一样行事的倾向。募兵

的代理人成了乡间一大公害。如果说有时士兵会被遣散，那末他们也很快就会结成匪帮。此外，当时更愿意在那些背井离乡的人、违犯放逐令的人、有条件赦免的罪犯或在某次暴动之后沦为任人宰割者的南方土著民中征募兵员，以便不对农民的经济造成损害。因此，文职权力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自我保护以对付军队势力的自动增长，这就是采取化小单位、分割职权和增加控制的办法，从而使军事将领们失去任何主动性。一些官僚主义的习惯也削弱了防御体系，如官方统计中所包括的兵员人数已不再是真实情况了。早从宋帝国创立伊始，开国元勋们就很注意把宫中禁军的这些精锐部队分成三个不同的单位，并置于枢密院的控制之下。从10世纪末直到女真人于1126年的大举进攻，宋军（驻扎在京城附近的禁军及各路中的厢兵）的战斗力在不断低落，而其人数却在膨胀，975年被限定的兵员为37.8万人，而到1045年却增加到125.9万人了。由王安石于1068~1085年间从事的改革（遣散部分军队、创建乡兵和藩兵，日常训练军队）使形势得以扭转。但宋朝于12世纪初叶所拥有的又重新是一些数目膨胀和无战斗力的军队；当时的军费开支消耗了国家预算的绝大部分，并导致了经济困难。虽然在963~979年参战的军队中包括许多个游牧民和山人的兵团，但宋帝国现在却不能征募这些宝贵的辅助军队了。此外，自从牧业区被西夏国占据以来，中原部队就缺少马匹，而王安石为在完全是纯农业的地区（主要是黄河下游）发展养马业所作出的尝试则以失败告终。

273

然而，11~13世纪是中国社会中军事技术取得明显发展的一个时代。这些进步可能改变了战争的特点，在长时期内对世界历史也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们似应与作为这个时代之特征的研究、创造和实验精神有关。

尽管并非始终都被严格遵守，但在募兵时却有着某些客观的标准：未来的兵丁都是经过一系列考核之后才选拔出来的，考核涉

及到了他们的体质、能力(跑、跳、视力、善射程度……)。根据其身材和身高进行分类,而最魁梧者被分配到精锐部队中,尽管并不适用于此种分类的特殊部队不断增加,如使用放火军器的士兵、坑道兵、使用投射器的士兵等。从10世纪末起,与对兵器装备问题表现出强烈兴趣的同时,包围战的理论和技术也发展起来了。一些新型的兵械都被发明创造出来并被做了核准调试,如弩炮手、连发弓、兵车等。发明创造受到了金钱奖励;新兵器在由军械库成批订购之前要做试验。1044年出版了曾公亮的一部有关军事艺术的著作《武经总要》,其中在新发明中特别提到了一种石脑油投火枪,其机理是由一个具有双重作用的活塞组成,因而可以连续喷火。

从1126~1127年起,宋朝向长江流域的撤退刺激了一支庞大舰队的发展,其基地可能位于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我们应该提到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以一种脚踏盘或一种连杆来带动的桨叶船,这种船甚至包括多达25个轮子。它们都是在1130~1161年抗击女真人的海战中用到的。这类航速很快的船舶早在8世纪时就出现了,其历史可能会追溯得更为古远。欧洲最早试用的桨叶船却出现在1543年。

尤其是由于用于军事目的的炸药的发现及其用法的改进,宋代中国才在人类的整部历史中占据了一席极其重要的地位。

火 器

首次提到火药配方(木炭、芒硝和硫磺)的记载出现在1044年的《武经总要》中,但直至1285年,在一部欧洲文献中才发现相同的记载(罗杰·培根于1267年首次提到火药)。它的发现出自唐代道教界中的炼丹术研究,但很快在904~906年间就被用于军事目的了。这里指的是一种被称为“飞火”的燃火投射器。从《武经总要》时代起,火器就已经是多种多样的了。这部著作确实提到了发烟和放火的炸弹、抛射“飞火”的投射器,而这已经是可以爆炸的炸

弹了(霹雳火球)。在 1161 年安徽采石的战斗中使用了“霹雳炮”，从而确保了宋军对于女真人(辽)的胜利。在 13 世纪初叶，蒙古人大量使用了带铁皮的投射炮——“震天雷”和“铁火炮”。当他们于 13 世纪末企图入侵日本时，本打算使用这种武器，它们在当时以 teppō(汉文“铁炮”的日文对音)之名而著称。因此，最早使用火药的历史说明，其最初的尝试仅在于利用它那发火和放烟的性能，但人们很快就利用其爆破力了。第三个阶段可能导致将火药用于火药管中的助推剂了。现知最早的这类试验应断代为 1132 年。这是指几种用粗竹管或木管制成的白炮或火箭炮，由于使用了更大比例的芒硝而使火药的爆破力减缓了。中国人将发火的引信与竹管配制在一起，从而最早发现了火箭原理。带铁或铜等金属管的最早白炮出现于 1280 年左右的宋元战争中，为了指称这种兵器而创造了一个新名词“銃”。

因此，13 世纪末传到欧洲来的已不仅仅是火药的配方了，而是在东亚作过长期摸索探讨和多次试验的创见与成果；人们可以把这种炸药用作一个管子内的推动剂。这种传播似乎是通过伊斯兰地区的媒介作用而完成的(在 1248 年卒于大马士革的安达鲁植物学家伊本·巴伊塔尔的著作中，用于指“硝”的阿拉伯文名词的意义是为“中国雪”；它的波斯文名称则意为“中国盐”)。人们在传统上都认为蒙古人于 1241 年在匈牙利的绍约战斗中使用了火器。人们也知道火器于 14 和 15 世纪的发展可能对于欧洲历史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它促进了中世纪武士贵族的崩溃。相反，这些新武器的发明却对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组织未产生任何影响，它仅仅是在国家军队的范畴内加入了同时得到改进的各种武器的整体之中。无疑正是以后的东亚战争的基本形势(特别是在明代的蒙古)，解释了为什么火器在中国未能再得到系统发展的原因。

此外，人们还发现，甚至当火箭尚未在欧洲出现之前，对反冲力投掷器的采用就已改进了攻坚艺术。对于要塞城堡来说，这种武

器也如同炮轰一样危险，它是阿拉伯人对于很久以来就在中国社会中使用的一种武器的引进，这就是“砲”。它的力量和发射速度既不是由同一根绳子，又不是如同在亚历山大或拜占庭人的投射器中那样由拉紧一根弹簧所获得的，而是由在一根大杠杆上产生的反冲作用而获得的。

三、新社会

一个食租的阶级

一整套不同的因素(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收入的增加、文化的传播、国家对于官吏的需要)在11世纪时导致了受过教育的和相对较富裕的或相当富裕的家庭的发展。于是，我们便发现了一类新人、一种新思想、一种以一个靠其土地资本收入为生的食租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出现。自汉至唐，在地区或宫中颇具影响的豪门望族都倾向于形成一种封闭的和只关心其家世的贵族。在中国北方，其中的某些贵族将其威望归功于他们的黠武传统以及某些成员得以光宗耀祖的武功。这一切并非仅仅是指简单的消遣之地或乡间别墅时，他们所拥有的庄园可以自给自足，而且其产品则是多种多样的。庄园包括菜园、磨房、鱼塘、作坊、油坊等。正如在汉末和南朝诸帝国中的情况那样，这些庄园有时也利用机会而得以加强自卫以对付土匪强盗和暴动，有时也可能会对抗国家的苛政。至于这些乡绅与其部下(客、部曲、奴婢)所维持的关系，则具有宗法的特征。这类主与客、主与仆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习惯的认可和法律的批准。

276 8世纪时，以“口分田”名义分配土地的制度被废除、根据耕地而征收主要税赋(一直到这一时代，税役都是根据处于能劳动年龄的人数而计算的，由此而出现了强加给大地主的限制和向小业主分配土地的做法)、水稻耕作的发展(新的纳税制度似乎受到了小

麦和水稻混合耕作区所固有条件的影响),尤其是农产品的商业化,可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望族和寺院的私有庄园的那种扩张和蚕食农民土地的倾向在唐代的下半期激化了。庄园在从募兵制向雇佣兵制转换的促进下获得了全面发展,它是在10~11世纪时完成的。从此,再不是中世纪类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贵族的、雇佣与业主关系的庄园了。这里更应该是简单地指承租、挣钱的劳动和地租,亦即一种正常收入之源了,由此便可以使某些家族于城市里生活在舒适的环境中。即使新社会始终如它之前的社会一样是以对最软弱者的剥削为基础的,但依附者的情感和结构仍然是有差别的。此外,统治阶级队伍(那种通过教育可以进入政权并在地方一级行使统治权的统治阶级)大幅度地扩大了。其家庭一般都包括一个正妻、一个妾和约十多个孩子。此外,很少有大地主居住在农村的情况,他们拥有自己的庄园(庄园,不是指农村,后者与庄园和佃

家庭(也就是第一和第二类)提供大“弓手”(卫兵,他们的任务是确保公共秩序)和在县府作为乡镇的代理人。此之谓“三役”:庄长、负责收税人和维持治安的人。但大地主事实上脱离了这种分类并摆脱了只以小耕民为基础的税收。

当然,这种情况既不是对所有地区(无论是在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还是在中国北方,大地主的人数要少得多),也并非对宋朝历史上的所有时代都适用。但毫无疑问,经济因素的自由作用在11~13世纪期间加强了贫富之间的差异,在农村加重了社会紧张状态。从1069年起实施的部分变法,是受到了在强加给小农的负担和大地主的特权之间从未有过的明显差异之影响。在1064~1067年间,估计在2400万公顷的耕地面积中仅有30%被迫纳税。如果所采取的有利于小农阶级的措施以及反对偷税的斗争,于1068~1085年间在王安石丞相主持下的大改革期间,曾产生了一种较好的局面,那末形势在徽宗(1101~1125年)统治年间却又重新恶化了。

当时在浙江内地发生了一次短暂而又严重的农民起义。起义发生在一个出产茶、漆、制纸用桑树和樟木的地区,江西和福建之间的贸易都要经由那里。这次暴动是由于为建开封皇宫而横征暴敛激起的,是由一个秘密会社煽动起来的,其教理实质上是佛教的,但也混杂有摩尼教的影响。其信徒们都是严格的吃菜事魔者。起义军的装备很差,他们由方腊领导,对贵族、富豪和官吏进行屠杀。方腊于起义一年后被活擒,从而导致了起义的结束,并且在该教派的成员中引起了一股集体自杀的潮流。

在1126~1138年的大崩溃期间,湖南的洞庭湖地区同时受到了女真人的入侵、一个腐化政权的敲诈勒索,和一支半地方、半官方的地方军队(它是为了抗击入侵而创建的,使人联想到了我们中世纪的“大连队”)所带来的苦难。由钟相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于1130年爆发的。此人同时兼具战争将领、巫师和医师的才能。大家

把这样的颠覆性口号归于了钟相：“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钟相很快就被擒并处死，但其军队却在洞庭湖沼泽地壮大和巩固起来了。钟相最初那种具有破坏性和平均主义的起义转化成了一种盗匪行为。为了消除妨碍组织抗御女真人的这一毒瘤，宋王朝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镇压活动并一直持续到 1135 年，其指挥权于最后这一年委托给了名将岳飞。

在整个南宋时代，由于土地被兼并到了少数特权阶级的手中，所以农村形势的恶化不可能停止。在最终划定两国边境的宋金和约签订之后，位于淮河以南并在 1130~1140 年间深受战争之苦的整个水稻生产区又被重新开发了。但这项工程是以仅仅有利于富裕地主的形式完成的，因为唯有他们才拥有必要的资本。13 世纪中叶，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农村和环绕太湖而延伸的大生产区，形势变得特别具有爆炸性，税收亦特别难以征敛，以至于由丞相贾似道（1213~1275 年）试行了某些深刻改革。这一切在中央政权以及在集中了大地主代表的中书省遭到了激烈反对。贾似道的计划旨在把田产限制于 500 亩（约为 27 公顷）并由国家出资赎买近三分之一的多余土地以建立“官田”，其收入将被用于战争开销。从 1263 年到贾似道逝世之间，这些改革被部分地实施了。到了宋朝末年，长江下游 20% 的土地可能均被改造成“官田”。蒙古人收回了这些土地以把它们分配给可汗家族的宗王或者将其收入专用于兵营的给养。

278

因此，作为结论，我们可以指出，从唐末开始，由于社会和经济背景便产生了一个佃农和雇农（农业工人）阶级。他们更为接近近代的这个阶级而不是早期的附庸阶级。

如果说由于经济大潮，城与乡、大行省与小地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农村社会对于价格的变化更为敏感了，那末，它在目睹着失去土地或最贫困者时提供了新的谋生手段。自 10 世纪以来，由雇佣兵组成的军队便从贫困者之中招募了大批兵员。手工业由于

设备的规模、丰富的劳动力、有时也由于技术水平而吸引了一大批比唐代的盐业和国家工匠的人数还要多得多的无产阶级。劳动力在矿山、冶炼厂、瓷器厂、纸厂、印刷厂和盐场的需求量最为显著。但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趋向大型的商业中心。

这些大商业中心接受了城市中以小职业为生的全部流民：店铺雇员、客店伙计、酒馆和茶肆的跑堂、搬运工、公共场合的杂耍表演者，尚且不谈诈骗者、弄虚作假者、偷盗犯和女娼男妓。最后，在开封和杭州豪门和巨商家族的私人客棧相当多，它们收留了数目多得惊人的奴仆，由管家主持的这些人的任务既非常繁杂又颇具特长。所有这一切新生事物，可以通过农村经济的变化、商人和市民生活的发展、豪门或仅仅是富裕家族数目的增长来解释。

城市的飞速发展

一个其人数比在唐朝多得多的“小商富贾”——这种差异很大的阶级的出现，复以特大商业中心的发展，确实是宋代的特征。居民稠密和很活跃的城市不仅在内地，尤其是长江流域发展了起来，而且也在宋朝的边陲（今河北保定附近的雄州、甘肃东部天水附近的秦州）和沿海（浙江的杭州和温州、福建的福州和泉州）发展了起来。

开封做为自 907 年起陆续建立的五代都城和 960~1126 年的北宋京师，可以被视为 9~11 世纪城市发展史的明证。

该城的第一道城墙断代为 781 年。但从 9 世纪开始，在南部和东部正门的门口大路两旁均由商号、手工业作坊和客店占据。那里自发地建立了市场，这种经商活动摆脱了政府对于保留给城市手工业主和商贾们的场地所作的控制（如同 7 世纪长安的情况那样）。这些于唐末在城市边缘日益增多的城外市场以“草市”之名著称。当开封于 918 年变成京师之后，很快就使人觉得其城内变得很狭窄了。954 年修建了外郭，但城市居民区（厢，如同建筑物的“厢

房”一般,这是相对于原有建筑物而言的附加部份)仍然无法阻止地很快就在这两道城墙之外形成了。但如果城市围绕其古老中心的发展并未同时发生触及城市特征本身的一种变化,那末它就只有一种相对的意义了。长安和7~8世纪的其他重要城市首先是贵族和官府的城市,那里的国家政权极力将所有的商业活动都置于其严格的控制之下,但开封却提供了商业生活和消遣娱乐活动占突出地位的居民区的第一个例证。政权机构及其人员从这个时代起就与大部分是由平民组成的典型城市居民保持着直接接触;而经济发展高潮也突破了所有那些倾向于使城市保留其贵族特征的古老规则。开封从1063年起取消了灯火管制,大家于夜间可以自由行走。贸易和消遣地点(瓦子,即后来于杭州获得了巨大发展的娱乐区)直到黎明都始终开放。但将商业和手工业活动限制在特定区域(厢坊)中的规章似乎失效得更早:店铺和作坊建立于整座城市中,各厢都失去了其最早的城墙。所以人们并不是通过该城中的厢名本身,而是通过其街巷名,才会发现自己置身于该城市中。厢名都具有官方的起源,街巷名则起源于民间。街巷变成了中国新城市的典型做法之一。一旦过去在城市的“坊”与乡村的“里”(直到唐代,它们都被用同一个“里”字相称呼)之间再无任何区别时,城市居民点从此就非常明显地以其生活方式及其人员类型而与乡村区别了。

281

一个流动性更大的社会

11~13世纪的人要比唐代、六朝或汉代的人更频繁地和更乐于迁徙。确实是商业大潮引起了人员随之流动,如船工、脚夫、水手以及有时定期往返旅行于非常遥远的地区之间的商人。其数目日益增长的官吏们也必然要迁徙,他们既不能在其故乡充任公职,又不能在同一职位上留任三、四年以上。最后,农村生活的艰难、城市小业主的数目之巨和名目繁多、城市的吸引力、财富和娱乐中心

等,这一切都引发了流民和贫苦农民涌向大城镇的浪潮。此外,运输手段也都很方便且费用低廉。大家到处都可以用低廉价格租用车或船。

在这个比先前几个世纪更为流动的社会中,在财产方面受挫折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人们可以理解一些新型关系的发展:重新集聚和结社的倾向(这一切在高层阶级中就如同在市民界的百姓中一样)与自我隔离的威胁是同样大,故互助行为更显得必要了。在官吏之中,党派之争和将主子与其保护人联系起来的荐举制度,可以通过裙带关系的作用,以始料不及的方式导致每个人的失败。在同会会员、同科高中的年兄年弟、考官与举子、师傅与弟子之间结成了牢固而持久的关系。在所有的阶级中,在平民百姓、文人和流动商贩之中,人们发现由原籍为同一地区者或同乡人之间组成“会”的倾向变得普遍化了。这样就可以解释某些远离其发祥地的地区性宗教信仰的难处了。最后,自从由国家控制的市场制崩溃以及商铺和作坊分散遍及城市以来,商人与工匠诸“行”的发展似乎应符合每种专业成员之间的和睦与自卫之需要,“第三产业”活动的丰富性解释了这类同业行会那令人震惊的专业性。

281 这种互助的必要性不会与文人阶级大家族的巩固风马牛不相及,这些家族以其组成、道德准则和伦理而形成了宋代的新鲜事物之一。为家族确定特殊准则的最早人士之一是改革家范仲淹,人们应该把一部含有治家格言的文集与“义庄”的创建归功于他。“义庄”就是设立一些特殊的和不可转让的土地,其收入用于确保家族的共同需要(特别是教育儿童的需要)和对其处境最糟的成员提供帮助。人们以一种很近似的方式译作“公平”的“义”字,事实上是指包括互相帮助和无偿教授的所有关系。

四、经济的发展

食物的增加

长江流域和中国南方水稻种植区的发展在 8 世纪时随着采用插秧术以及新的耕作与灌溉农具的出现而开始形成。水稻种植业的这种发展高潮于此后的几个世纪中仍在继续、巩固和扩大,它无疑就是当时东亚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东亚文明因此而恢复了元气。与中国宋朝同时代的吴哥王国的鼎盛期应断代于 11~13 世纪。早在于今天的爪哇发现人口的高度稠密之前,在越南的红河河流域或中国东部的某些地区,水稻种植业就已经把大批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了。它提供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显得是为文明发展始终必不可缺的储备粮,也就是说为 社会和政治组织、艺术、技术与思想的发展不可缺少的积蓄。在所有的大农作物中,水稻确实是公顷单产量最高者。位于长江下游南部平原的产量过剩(宋代的一句谚语说道:“苏〔州〕常〔州〕熟,天下足”),有利于促进地区间交流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手工业的高涨和大城市的兴盛。中国人口在 10~13 世纪期间经历了其历史上的第 2 次增长高潮,因为人口在 8 世纪中叶从 5300 万左右增长到了接近于 1 亿的数目。

水稻种植业在 11 世纪期间仍在继续发展。1012 年之后,一些可于冬季成熟并能使收成倍增的早熟稻品种被从占婆(越南的东南海岸)引进,又由中国官府系统地扩大种植。这些早熟品种以“粳”(粳)稻之名著称,被传到了太湖地区、福建和江西,从而很快就使种植面积倍增。自宋代开始通过选种而获得的新品种又补充了早熟和抵抗力强的水稻品种系列;并在明代(1368~1644 年)继续扩大。在 11 世纪时,每年都有 700 万石(4200 万担)稻谷沿着连接苏杭地区与河南开封的大运河外销。12 世纪上半叶的悲剧事件的结果也只能是刺激中国长江流域农业的发展。为了以围湖泊和

282

沼泽而造田的方法来扩大耕田面积,曾经作出过巨大努力(这就是由大堤围绕的“圩田”)。此外,来自北方的移民向长江流域的干旱土地传入了小麦和绿肥植物的种植技术。

手工业生产和经商的的发展

因此,11~13世纪中国农业的发展显得如同是其经济膨胀的基础,它使很大的一部分人口担负除了生产粮食(每年的水稻和其他粮食收成达30万担)之外的其他任务。

用于纺织业的植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了(麻、供养蚕用的桑树、从13世纪开始在许多地区传播的棉花)。茶树的种植在淮河以南和四川丘陵地区发展起来了,而漆树的种植则发展于湖北、湖南以及浙江的北部。整个手工业生产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也是北宋时代冶金业的情况,它由于最富有的大地主的家族所提供的资本以及技术的改进而得以复兴。当时,煤已取代了木炭,水力机器被用于启动鼓风设备、炸药被用于开发矿山……1078年的生铁产量超过114000吨(英国仅仅在1788年才达到68000吨)。除了在空闲季节招收农村农民的小企业之外,在河北的南部、山东的中部和江苏的北部,还有一些大型设施雇佣长期的和专业的劳动力。人们在江苏的利国铁矿共统计到3600名雇工。这些大型企业是为国家而生产的。

一般来说,整个矿产品在11世纪时增长得很快,铁、铜(铸币所必不可缺的)、铅、锡等许多矿藏都被开发了,特别在帝国最南方的地区更是如此。

瓷器手工业同样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当时在许多地区都有瓷窑和作坊,11世纪最著名的器皿出自开封和河南其他城市的官窑,同时还有河北定县的官窑,而在12和13世纪时则出自杭州、泉龙、福建的建阳、江西的吉安和景德镇。作为中国的荣耀之一的瓷器制造术,在12世纪时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

几乎每个地区都具有自己的著名产品：河北南部的铁，太湖周围的稻米，福建的蔗糖，四川和浙江的纸张，成都、杭州和长江下游城市的刊本书。……交通运输的发展确实可以使产品广泛流通。在 28.3 整个帝国，特别是在长江下游、四川、福建和浙江沿海地区，大型商业中心的出现引起了大城市中所运行的商业渠道的全面整顿、本地区内部和各地区之间交流的发展。如果说 8 世纪时最大宗的运输是国库流通物（织物和粮食），那末私人贸易量则要远远超过由国库提取的食物量。但特别有意义的是，中国于其历史上首次充分利用了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庞大航运网，它由长江及其支流组成，同时还有把浙江的杭州与镇江、扬州和开封连接起来的从华北向华中延伸的漕运网。在分布于 5 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这片漕运网中，有世界上直到那时所拥有的最密集和种类最繁多的船队穿行。在长江的某些地点，运输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导致了一些真正漂浮城市的形成。宋代的中国也利用了一条络绎不绝的、分成数段的、具有大量适宜停泊之避风港的、从浙江的东北角一直延伸到越南边境的海岸线，来为沿岸航行提供便利。

至于 11~13 世纪中国经济扩张的基本原因，则应该从城市市民阶级（由地主和富商组成）的发展和内地需求的增长中寻找。这里实际上已不再仅仅指向皇宫供应豪华奢侈品了，因为豪华奢侈已经变成了更多的一部分居民的特权。富裕家庭的数目增加了。建筑物及室内的富丽堂皇的装饰，庭院的艺术布置，以及在梳妆和烹调方面追求精益求精，成了宋代城市各界的特征。在 11~13 世纪，如果瓷器、建筑术、纺织术及所有产品的艺术与技术都触及到了取得非常迅速发展的日常生活中的起居，那也并非只是事出偶然。

其时进口物品主要是由豪华奢侈品〔香料、奇石（光玉髓、玛瑙、琥珀、樟脑……）、象牙、珊瑚、犀角、乌木、檀香木……〕所组成的外贸，给中国造成了逆差，故必须用铜钱和金属（铅、锡、金和银）来支付其部分采购物。宋代发行的铜钱流传于亚洲的所有地区；西

夏国、辽国和金国、东南亚和印度洋国家。其数目在日本如此之大，以致于在那里铜钱被当作地方钱币使用。

284 而中国在外部也显得如同是一个奢侈品工艺国，最令人觊觎及其交易最有利可图的产品均出自于其中。对于作为中原产品的交换，北方诸帝国只能提供马匹、绵羊和皮毛，以进口茶叶、盐巴（其中一大部分走私进入了西北）、织物和金属。所以，当夏和辽于11世纪上半叶强加给宋朝一些条约时，便要求宋朝纳贡，为发展他们与西域和中东的贸易提供必不可缺的产品：茶叶、丝绸、白银。此外，丝绸和瓷器成了自浙江和福建经海路出口的主要物品。中国瓷器向东亚和印度洋的所有国家（人们甚至直到欧洲还发现了它们）如此大量地出口，以致于完全可以借助于保存在日本、菲律宾或婆罗洲的样品来描绘中国瓷器的历史。

商业的国家

宋朝，国家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对店铺产品和商品运输实行了比较灵活的商业税制，以取代国家政权在整个中世纪时代都行使的对价格和市场的控制以及征调工匠的政策。这场运动与在农业税领域中出现的动向相似并同步发展。过去最常见的是用实物来交纳佃租，并以人的劳动力为基础来服徭役，同时对家庭实行控制并向耕农分配土地，但现在上述做法主要是被以土地收入为基础（而非按人口）的纳税形式所取代了。当然，事实可能更为复杂一些，根据地区不同而有差异。徭役和人头税在宋代依然坚持下来了。当时，在某些地区存在着传统性的特殊税、取决于地区性习惯的税率表、附加税。税制的复杂性和地方或区域间的变化性，使大家只能指出一种基本发展。但这种发展却是完全不容置疑的，它与农产品的商业化、商业经济的扩大、贸易和商业潮流的全面发展有关。在宋代，国家不仅提取了强加给手工业和商业的税收中的很大一部分，它还创建了由其官吏们管理的作坊和商业企业，并且系统

地发展国家垄断，以维持其军队的给养及其战争开销的剧增，由此国家本身也变成了经商者和生产者。

宋代的整部政治史确实是受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防务和政治问题之间密切关系的主宰，专营制度在边境导致了一种使夏、辽和金国致富并得以加强的走私，而国家的经济特权则在内部导致了偷税，越来越沉重的税收负担也加重了农村社会的困难和不稳定性。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思想认为，中国始终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但其实恰恰相反，从宋代（甚至从汉代）到明末和 18 世纪，中国的主要财富均出自商业和手工业。瓷器、丝绸、铁和其他金属、盐、茶叶、酿酒、纸张和刊本书等等都成了一种活跃贸易活动的对象。它涉及到了整个帝国，而国家又是其主要受益者。那些贸易税和国家专营税在 11 世纪和 12 世纪初年确保了国家的税收，²⁸⁵而这种税收已经与农业收入相等了；在南宋和 12~13 世纪时，它又远远地超过了农业税。

国库的收入包括以下诸项：

1. 国家对于盐、茶叶、酿酒和香料的专营收入。
2. 国内贸易税、在边境与通商口岸征收的关税。
3. 其中很大一部分变换成了用现钱交纳之税款的徭役。
4. 人头税。
5. 土地税。

——1077 年的这些收入可以分解为：

6 万两（每两约合 37 克）白银，而国家银矿的年产量共达 215400 两。

——558.5 万贯（每贯 100 枚）铜钱。

——1788.7 万石（每石约合 60 公升）的大米和杂粮（即近 1100 万公担）。

——267.2 万匹丝绸。

该王朝初年仅具有 50 万贯钱的海关收入,而到 1189 年则高达 6500 万贯了。那些同时负责海关和治安职责的“市舶司”分别设置于山东青岛地区的胶州以及杭州、宁波、泉州、广州。当船只到达时,官府要根据进口的商品而提取货物的 10%~40%,船舱中的剩货则可以用纳正常税的条件自行出售。

货币经济的发展

11~13 世纪经济发展的条件之一是支付手段相当可观的增长和货币经济的扩大。在五代时期,从 10 世纪初直到 963~979 年的统一,曾经瓜分了中国的 10 多个独立国各自发行了它们自己的货币。中国北方始终是铜钱的领域,但铁币和铅币则在中国南方(福建、广东、湖南和江西)出现了,而且都模仿了四川的做法——那里由于铜之稀缺,沉重而笨大的铁钱始终流通,在宋代仍继续使用。新帝国成功地于 960~1000 年左右在其整个领土上重新恢复了唯一的一种铜币。但持续地进行战争可能更加激励了国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加这种钱币的发行量,尤其在 1038~1055 年间于西北的严重军事困难期间[后来停止使用的当十钱的新钱(折十钱)也是在此期间发行的]和 1126 年女真人入侵之间的时代更为如此;铸币的纪录数字是于 1073 年间以 600 万贯之巨而创下的,而北宋时代的全部货币发行量被认为是 20 亿贯。

尽管其产量极其巨大,铜币仍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及战争开销的增长所造成的全部需要。五代时期在长江下游以南和四川开始推广使用的未轧制成币的白银,于 11 世纪时扩大到了中国的北方,那里与中东国家作交易的西域回鹘人,因其进口白银而促进了这种新支付手段的流行。

9~12 世纪发行钱币的数目(贯,1000 枚铜钱)

年 代	钱币数目(贯)
804	135000
820	150000
834	100000
995~997	270000(三年的平均数)
1000	1350000
1007	1850000
1016	1230000
1021	1050000
1073	6000000
1080	5949000
1106	2890000
1124	3000000

首先,由各道官府在京师的代理人于 9 世纪为商人们发行汇兑票或“便换”票(大家当时称之为“飞钱”),然后就是从 9 世纪末起以私人的名义由四川成都的富商和金融家个人来发行私票,它们成了于 1024 年在四川由国家首次印刷的“交子”(银行支票)的先驱。在 11~14 世纪期间,这种惯例在中国社会中获得了巨大发展。后来由于它落得失去了信誉,所以人们便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使用它了,但它却强有力地促成了宋代私有和国有经济的发展高潮。这种惯例也使南宋时代得以减少铜钱的发行量,尽管对强行发行的这种新钱币的滥用,最终加剧了蒙古人入主中原前夕时的经济混乱。

纸币以“交子”、“钱引”、“会子”、“关子”等不同名称而为人所知,它在 12 和 13 世纪时变成了主要的钱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元代末年,在此期间也曾扩大运用到辽和金王朝。在南宋时代,其

发行量达到了4亿贯。但就在使用纸币的同时,使用商业票据的做法也在商业界发展起来了:支票、记名期票和汇票都在11世纪时出现了。换铺(寄附铺、金银铺、兑房、交子铺、交银铺、质铺、钱户……)成了宋代商业经济的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航海的发展

从11世纪起,中国航海术的发展无疑是亚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奇观之一。11和14世纪的欧洲和阿拉伯旅行家们提供的资料在此问题上不容置疑,福建、浙江和广东诸大港口的商务在当时与欧洲国家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宋元时代的内河与海洋贸易的规模、战船在12~13世纪保卫南宋的战争中以及在13世纪末当蒙古人企图入侵日本和爪哇时所起的作用、明帝国于1405~1433年间从事的直到红海和非洲东海岸的大规模海上远航都清楚地证明:在从宋帝国的巩固到明帝国的创立之间长达四个半世纪的大规模远航时代,中国曾是最强大的海上国家。这种现象可以通过既取决于政治背景和经济又取决于技术史的整体形势来解释。

从新石器时代和直到公元初年左右,航海似乎都是沿海岸而利用附近的岛屿进行的。所以,对马岛和壹岐从史前时代起就方便了朝鲜东南沿海与日本九州岛之间的交往,位于山东东北部的蓬莱地区与旅顺地区之间的岛屿无疑也在很早的时代就使满洲与中国东部连接起来了。而作为季风地带的亚洲之特征的经常性与规律性的风向变化状况,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也被利用于环绕该大陆东部和南部的海洋中。在这些海洋中航行远不像在地中海中那样令人担惊受怕,因为后者的风向变化无常,或者干脆就没有风。因此,一支根本不知道上古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地中海世界的奴隶水手们所知道的海滩暗礁的帆船队,便在世界的这些地区发展起来了。帆船结构的发展相当早熟。对于作为中国船舶典型特征的前后帆,从公元3世纪起就有人作了详细描述。

季风的变化规律促进了不作停泊的长途旅行,同时也迫使这类远航接受了一种对文明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年度变化规律;冬季的东北季风和夏季的西南季风把在亚洲的长途航行变成了一种定期的活动,从而导致了在印度、东南亚海岸和从长江口直到广东地区的中国港口中大型外国人移民聚落的形成。从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开始,南印度和锡兰的海岸便被与苏门答腊不作中途停泊地连接起来了。把巨港与广州分隔开的遥远距离之间,从公元7世纪起似乎就定期有航船往返行驶。

在东亚的航海技术史上,大家似乎可以区别出两大类地域;其一从浙江沿岸一直延伸到朝鲜和日本,其二则覆盖了整个东南亚和中国南方。第一类地域是一支船队的活动领域,它的发展应归功于辽东、朝鲜、山东以及在稍晚时期的日本沿海居民;第二类地域是过去产生了操“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的航海居民的散住区,从中国南方一直到美拉尼西亚和马达加斯加,那里从该世纪初开始便是那些其来源地和技术都相差甚殊的船队的集散地。如果说在中国中部地区洞庭湖的船只使用的一种风帆一直传播到了非洲东南海岸上的桑给巴尔,那末一些很明显的差异相反却把阿拉伯船只与中国广东和福建海岸的船舶区别开了。广东和福建的中国航海家、马来人、苏门答腊人和爪哇人也都与印度—伊朗和阿拉伯船舶保持接触。这还是在稍后也即从16世纪初叶起使人了解到西欧国家的船舶之前。

因此,各种不同影响都得以促使中国远海大帆船于10~11世纪左右出现。其诞生地似乎确实是在长江大港湾,江河航行与海洋航行之间的转变是以不惹人注目的方式完成的。该江的主流和支流一直深入到内陆约150公里处,而在该港湾处宽达10~20公里。

完全如同自上古时代以来的所有中国船舶一样,中国帆船也都是由一个呈长方形的船体构成,其底舱被舱壁隔开,而舱壁又形

成了同样数目的密封小舱(这种布局后来于19世纪初叶才被西方人巧妙地采纳)。艏柱的竖壁可以让人在那里装配一种舵。有关航海史上的这项重大发明的最早资料是由可以断代为公元1世纪的一只广州陶瓷船提供的。艏柱舵于1180年才出现在欧洲,它几乎是与航海罗盘同时诞生的。宋代的中国帆船是有四桅或六桅大帆的船舶,备有12面大帆、四层甲板并能运载1000多人,它是长期积累经验和创造的产物。锚、舵、滑动舳龙骨、绞盘、根据顺风或逆风而使用的粗布帆和表面坚硬的席帆、可以避免帆索发生变化并引起了阿拉伯航海家们惊讶的旋转帆(中国人的技术是唯一一种可以使许多帆船在最近距离内航行的技术)、带有在前进和后退运动中自行旋转的自动冲角的桨、密封的船舱、航海罗盘,所有这些具有数世纪古老历史的或很近期的改进措施都促进了此种惊人的成功。很久以来就被勘輿(看风水)专家们用来计算的罗盘也作为指南针而被运用于航海中,从而增加了在远海航行的安全。一部其序言被断代为1119年的著作——朱彧的《萍洲可谈》首次记载了罗盘于11世纪末被用于广州之船舶上的情况。它在欧洲于1190年才由萨兰的居约(Guyot de Salins)提及,而且在1280年之后才在船上广泛使用。

但其他的许多改进对于10~11世纪中国航海业所取得的进步也是必不可缺的。它们不仅仅涉及到了定向的方法和测量航距,而且还涉及到了大海的深度和海潮的知识。自3世纪以来出现的以一种南—北和东—西等距经纬线理论为基础的中国地图绘制术,于宋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中国地图绘制术不但要比当时尚受宗教羁绊主宰的中世纪欧洲的地图学先进许多,甚至比阿拉伯人的地图学还要先进。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精密和最准确的地图学,正如流传给我们今天的那些镌刻在石碑上的地图所证明的那样。

航海技术的发展只是使一场航海高潮变得可能了,其深层的

原因则取决于政治形势和商业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社会与西域的交通道路被切断,而它在向北方和西北的开拓中又被在其边陲地区形成的大帝国所阻隔,所以它便毅然转向了海上。其重心已向东南的商业和航海地区转移,也就是说转向长江及其支流的巨大航行网向内地延长的地方。起源于阿拔斯王朝并将波斯湾与印度、东南亚和中国海岸联结起来的航海潮流无疑也不会与海洋的诱惑力毫无关系。从爪哇直到朝鲜和日本的东亚航海民族自古以来就经常猖獗地从事海盗活动,在中国船队发展的整个时代却被镇压下去了。苏门答腊东南海岸上那个在 8 世纪时如此强大的海上帝国室利佛逝(Çri Çri Vijaya)在 11 世纪时正处于垂亡之中。14~15 世纪爪哇中部的满者伯夷(Majapahit,麻喏八噠)、15 世纪的满刺加(Malaka,马六甲)帝国和 16~17 世纪爪哇苏门答腊西北海岸上的亚齐(Atjeh)王朝的制海权都是很晚的事了。

宋代海上贸易的发展激发了有关描述东南亚和印度洋诸国的志史著作的修纂。与先前时代的出使官吏或取经僧人撰写的游记故事不同,这些外国传记记录了取自中国或外国商贾处获得的资料,这些人习惯于从中国海岸、菲律宾和婆罗洲直到红海之间做长途航行。正如在汉代一样,大家甚至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有关地中海国家的资料。这种体裁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是问世于 1178 年的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其序言被断代为 1225 年的赵汝适的《诸蕃志》。

第二章 中国“文艺复兴”的文明

290

公元 1000 年左右正在发生或者是已经发生的变化并不仅限于社会和政治形态、经济和技术。它们涉及到了一种层次更深而又不太明显的现实——人:其世界观、时空观和人生观。以复古传统为特征的 11 世纪标志着自公元 5 世纪以来对中国社会所施加的

高于一切的佛教霸权影响的结束。无法估量的时空、有生物种(魔鬼、牲畜、地狱生灵、人类和天神)以及通过它们的转世而形成的这一整套宇宙幻象都消失了,完全让位于可见世界了。人类重新变成了在一个有限的和可以理解的宇宙中的人类了,而只要对这种宇宙进行探索就可以理解它。大家所怀疑的和通过对著作之分析所揭示的正是这一整套心理变化。11世纪时,中国精英界的人物与其唐代的先驱们之间的区别,就如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与中世纪的人物之间的差异一样。

291 以其显著特征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实用唯理主义的出现,它以经验、对发明创造的考验、思想和理论为基础。这也是一种与知识的所有领域(艺术、技术、自然科学、数学、社会、制度、政治)都有联系的新奇事物。这就是对前人的所有成果进行总结和对所有知识进行综合的愿望。在此后的一些时代主宰了中国思想的一种自然哲学在11世纪时发展了起来,并于12世纪形成了其最终的表现形式。

社会和经济变化、豪门富户数目的增长、都市的发展并非与文化生活的这种深远复兴毫不相干;另外,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一种对写成文献进行迅速而廉价印制的印刷术的情况也是如此。

一、复兴的条件

学术文化和民间文化

宋代可能比其他许多时代更好地说明了艺术和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密切关系。在7~8世纪的时候,一个胡族混血的贵族阶级使人接受了对剧烈运动(马球、马术、狩猎……)的爱好,而11~13世纪的那个由经常是生活在市民间而又以土地收入为生的富裕和有文化修养的统治阶级却鄙视体力锻炼,表现出他们与草原传统和民间娱乐所保持的距离。在唐初非常受尊重的行武职业,自

从军队由从社会最底层征募的雇佣兵组成以来,便失去了其全部威望。艺术和文学在中国上层社会中的那种深邃文化知识和有时是审美的外貌形态,在宋代就已形成了。它在明清王朝时代仍占突出地位,尽管也出现了那些倾向于为诸如李贽(1527~1602年)或颜元(1635~1704年)那样孤僻的思想家们的军事艺术与自然科学活动恢复荣誉的声音。除了特殊情况之外,中国文人此后就成了一种纯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要把戏和田径比赛仅仅对平民百姓才有益。这种在统治阶级中的对于个人锻炼和身体技巧根深蒂固的鄙视一直持续到我们今天,而体育运动直至近代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影响下才被重新传入中国。学术价值很高的文学、绘画、书法、书籍和艺术品集、庭院的整治等,它们自宋代以来仅仅受到文人阶级的青睐。

不过,这些文化阶级却学习古典诗和那些根据乐曲而写成唱诗的新体裁(词),诸如苏轼(苏东坡,1036~1101年)或黄庭坚(1045~1105年)那样的高级官吏,均在这方面出人头地;他们还从事于徽宗(1101~1125年)时代在皇宫中曾取得成功的具有科学价值的绘画,或者如米芾(1051~1107年)那样致力于绘画研究。市民阶层的娱乐活动高潮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民间文学的发展,它成了整部中国文学史中最丰富和最活跃的源泉之一。

在宋代的大型商业中心,由其店主和小手工业主形成的小市民以及大批苦力、雇工、仆役和职员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其情趣和需求与上层阶级有着深刻的差异。城市生活倾向于使消遣与娱乐活动失去其周期性的特征以及它们与集市和农民市场的关系,它同时也解脱了这些活动与节日庆祝和宗教活动的联系。它赋予了说唱艺人和江湖术士们的作品一种特殊和独立的特征,使之成为一种专业活动。宋代的城市,特别是其京师开封、杭州以及金朝和蒙古人的北京,都变成了经常性的消遣中心。那些娱乐区(瓦子或瓦市)与表演戏剧和音乐的教坊不同,后者在唐代密切地依靠

292

帝国的官府,而前者则被用作大众的聚会地点,所有表演专业人员都集聚于那里:不同体裁的专业说唱艺人(历史、言情、侦探和宗教的故事……)、以音乐伴奏的独幕滑稽剧演员、音乐家和歌手、木偶表演者、驯兽师、皮影戏专家、口技表演者等,城市是诞生新文学形式的发源地或中心。它从13和14世纪起就与深层次文学(如传奇小说和戏剧)同时发展,它们都使用了其中充满了方言特征及其文风通俗的语言,并保持了它们取自本源的生活和民间情趣。

木版和活字印刷术

在纸张上用活字印刷的技术,与在革皮纸上抄写手稿相比,在西方从15世纪中叶起标志着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步。事态在中国社会中却是以迥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9~10世纪时,一种迅速而廉价地印刷某些已写就文献和图像的方法之传播,其影响在那里似乎并不像是一种具有革命性质的事件,虽然从全面权衡来看,其后果从来都不比印刷术在欧洲传播的意义小多少。但这种反响的差异是完全有根据的。欧洲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代中便从中世纪的在罕见而又珍贵的载体上的抄书过渡到了刊本书。它在12世纪时才获知从伊斯兰地区进口的纸张,但于13世纪末便开始自己在意大利造纸,而于1380年左右又非常热烈地欢迎雕板印刷术并于1430~1460年间成功地使用了最早的活字印刷术。可中国社会却经历了一种既进步得很快而又性质不同的发展。对于翻印文献显得是必不可缺的纸张,在中国从汉代末年起就变成了文字的普通载体(中国最早的纸张是在被断代为公元2世纪的古老汉燧中发现的)。使用载有文字或图案的石碑拓片(用湿纸作拓片,然后再晒干、上墨和利用涂刷法在纸上翻印),在中国文明的所有地区至今仍是获得雕刻图像或著名书法作品的真实而又廉价的复制手段,它主要发展于汉代和木版印刷术的初期。此外,印版也是可以使人以翻印而获得文字印迹、图案或宗教神像的印刷品。出现

在 8 世纪期间的木板印刷术就如同是这两种方法(拓片和印版)的结合一样。现知的最早例证应断代为 8 世纪末叶,即于敦煌发现的那些带有短文的佛教画,此外还有保存在日本的很可能是于 764~770 年间在中国印刷的巫咒。在其中包括刊印于 9~10 世纪的大批刊本文献的敦煌文书特藏中,以木版印刷的第一种重要文献是一部《金刚经》,它已被断代为 868 年。在近期也发现了其他一些刊本文献;其中两种来自吴越国(长江下游和浙江),并载有 953 和 974 年的时间;另外一种被断代为 975 年,发现于杭州。在这个时代,木版印刷术在四川的红土盆地以及从杭州延伸到长江下游平原上的非常商业化和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变得用途极其广泛。人们从 9 世纪起就在这些地区发现了有关秘术的小书、历书、佛经、书典、民用简明全书、初级童蒙课本、为科举而使用的范文集、史书等等。可能是受刊印宗教文献之需要的启发而产生了一种技术,我们有必要在此强调最初应用这种技术时的商业和民间特征。对此,统治阶层和文人阶级毫不迟疑地利用了这种新的印刷方法。在冯道(882~954 年)的倡议下,已经于 932~952 年间奉钦命而在开封刊印。书籍于 944~951 年间也在四川刊印。以后,佛经于 972~983 年间在成都刊印。它们共包括 1076 部,分成 5048 卷,系用两页一版的 13 万块雕版印刷而成。从 1024 年起,木版印刷术被用于四川的第一批纸币的印刷以及所颁布的诏令和官方律令。1027 年,医药书为了其传播而被校订和付梓刊印。

木版印刷术可以使人以准确的方式翻印文献的手书文字和图像,因而于 10 世纪期间蔚然成风。它可能在中华文明的所有地区(中国、日本、朝鲜、越南)都保持了一种优势地位,一直到活字印刷术的产生和 19 世纪在西方发明的机械印刷术传来为止。

然而,活字的发明在中国要比欧洲早得多,东亚国家可能在木雕版的同时使用了活字印刷术。中国对于活字的首次记载出现在一部笔记中,此书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到了科学和技术史,这就是

294

1086年出版的沈括的《梦溪笔谈》。此项发明被归于沈括的一名门人——毕昇，而且还被断代于1041~1048年。在蒙古人占领中国南方期间，王桢在其发表于1313年的《农书》中提到了使用锡制活字，同时还建议使用一种旋转盘以在其中排列按韵分类的活字。但现知最早的大规模活字印刷则发生在朝鲜，它是在中央政权的倡议下于1403~1484年间完成的。1403年共铸造了10万个汉文方块字，在15世纪期间又完成了其他几次铸字。江苏无锡的两大印书家族安氏和华氏都使用铜铸活字。在1574年，卷帙浩繁的故事集《太平广记》就是用活字印刷出版的，它当初在10世纪末曾以木版印刷过首版。在一个稍晚的时代，康熙时代的插图巨型类书（共包括近1亿个方块字）《图书集成》于1713~1722年间也以活字刊印。

所以，汉族文明圈中的东亚（但也包括受汉人影响的附近地区：维吾尔族人、藏族人、蒙古人、满族人，他们都曾使用过拼音字母）在11~18世纪期间都有过一种独立于欧洲的活字印刷传统，而且其技术上也有差异，因为中国的活字印刷不包括印刷机。如果大家通过其出版物的规模来判断，那末这种传统就远不应受忽略。但活字很少能有机会在机械印刷术发展之前在中国文化圈地区取代木版印刷。事实上，如果说活字排版印刷术的发明显得如同是欧洲的一大重要发现，因为那里的几百个字母就足以可以印刷一切可能存在的文献了，那末它在一种其财富之一恰恰就是其文字符号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社会中却不会具有同样的意义。

与大家通常想象的情况相反，活字印刷术在西方形成了一种相对于木版印刷术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步，所有的进步都不能与这种较为复杂和巧妙的印刷术相媲美。西方印刷术的优越性仅仅是缓慢形成的，直到它于19世纪实现机械化时才变成无可争议的了。而直到那时之前，它始终是一种相当缓慢而又昂贵的印刷文献的手段。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7世纪初叶指出，中国的木

版印刷工匠用于刻写其木版的时间不会比欧洲木版印刷工用于排他们每页版面的时间更长。木刻版可以被重新刻写、修订,并与后来的印刷形式相反而可以在库房中保存下来以供再版使用。欧洲印刷术的传播是通过作品传统的贫乏化表现出来的,因为出版者不可能冒险出版一些不能确保相当畅销的书籍;而中国的木版印刷在操作方面要远远高于 15 世纪欧洲的木版印刷术(由于印章技术和拓片艺术的成果,同时也是由于使用了特殊的纸张而使需要印刷的行文在背面以倒置出现),它的最大优点是成了一种不太昂贵和使用很灵活的印刷手段,而且不需要巨额资金。因此,从 10 世纪起,它就使人能够获得数目极多的印刷版次,甚至是印数有限的、以私人或官方名义进行印刷的版本。此外,一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图画在中国文化圈的地区中是与木版印刷文献同时发展起来了,而插图在西方的刊本著作中仅仅是于较晚的时代才变得常见。从木版印刷术的初期开始,大部分中国书籍都是植物志及技术、考古和建筑术的论著、小说、宗教经文……它们都配有有时质量极佳的插图。木版印刷文字和插图在 11~13 世纪时取得了巨大发展,在万历年间(1573~1619 年)达到了其顶峰。在这个时代可以印刷一些三色、四色有时甚至是五色的套色图版。

尽管其中的一些差异取决于技术和文化传统,取决于它们各自特有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但它们也解释了这种技术在东亚和欧洲为什么未曾经过同样的发展道路。无论如何,中国在印刷文献和图案方面要比欧洲先进 500 年的时光。人们可以认为,直到 18 世纪中叶,在中国刊印的书籍比在世界上其余地方所印刷的总数还要多。没有任何一种文明中的文字传统(以碑铭、稿本和木刻本书的形式出现)会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二、科学和哲学

新技术很快就导致产生了一种很活跃的印书手工业及其商

业。它引起了文字产品的迅速增长并使知识的传播比过去更广泛得多了。当佛寺与京师的太学形成唐代的主要知识中心时,学堂和公私藏书阁也在11~13世纪时日益增多了。在所有地区,特别是在长江下游的南部,于宋代创建的书院直到17世纪中叶都在中国文化史上扮演着一种重要角色。最重要的藏书馆阁之一是978年创建于皇宫的那一家(三馆),它收藏有丰富的8万卷书,其目录由变法家范仲淹和史学家欧阳修于1034~1036年间编写。

宋代的文字作品和科学的发展

11~13世纪显得就像是第一批大文集、大类书和大目录编成的时代。早在10世纪末,就已经编写和刊印了著名的四大文集(宋代的四部巨书《宋四大书》):《文苑英华》,这是作为《文选》续文的一部文集,涉及到了从6世纪中叶到10世纪初叶之间的时代,编修于公元982~986年之间;《太平御览》,这是于938年完成的一套共100部的类书,而内容极广泛并共分成500卷的神奇传说和故事集;《太平广记》则首次刊行于981年,以上两书均于977年由李昉(925~995年)主持编印;最后是《册府元龟》,这是一部文献和政论集,于1005~1013年间编辑,共包括1000卷。

但在宋代主要是以私人名义和不受任何官方主宰而完成的著作,其数目也与日俱增:历史著作、笔记集、具有科学特征的论著、方志、文学作品等。

这种比早期更丰富得多的文字产品的某些方面可以与11~13世纪编修集册的巨大潮流联系起来:绘画和书法集,其中最丰富和最著名者系由爱好艺术的徽宗皇帝(1101~1125年)所集,后来可能是被女真人的入侵毁掉了;奇石集、古币集、墨集、玉集等;自然科学论著数目也很多,当它们被保存下来时就会对植物和动物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比如有关蘑菇、竹子、菊花、芍药、果树、飞鸟等等的论著。我们于其中要特别提到傅肱的《蟹谱》

(1059年)和韩彦直的《橘录》(1178年)。

编辑具有科学、技术、文学或艺术的笔记文辑也是当时的风尚,它们均以《笔记》或《随笔》之名而著称。其中对于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史来说最重要者是沈括(1031~1094年)的《梦溪笔谈》。沈括是一位令人惊讶不已的具有近代特征的思想家、天文和博物学家,人们于其书中可以发现对活字发明的首次记载。

我们所掌握的有关中国建筑术的最古老和最具体的资料应断代为宋朝。这是一部令人心悦诚服的图解著作,刊印于1103年,即《营造法式》,由其本人就是建筑师以及开封佛寺与官府衙署建造者的李诫所著。

在医学与地学、算学、天学诸领域中,宋代都以其令人瞩目的进步而名闻遐迩。在11~13世纪的诸多医学著作中,我们可以指出现在已知的第一部法医著作的问世,这就是1242年出版的宋慈³⁰⁰的《洗冤录》。一部200卷的世界舆地类书是乐史(930~1007年)的《太平寰宇记》,它于979年刊行于世。继它之后的是一部宋帝国的图解舆地书,共分1566卷,这就是1010年完成的《诸道图经》。宋代中国的地图学达到了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具体和准确程度。沈括曾设想绘制一些立体地图。一种里程车的草图被绘制出来,并于1027年制造出来。

11~13世纪以及蒙元时期(13~14世纪中叶)是中国算学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尤以代数的发展引人注目。这个时代有三位伟大的学者:邵雍(1011~1077年,大家应该把有关回归年的一种计算归功于他,它准确到了近4分钟)、李冶(1192~1279年)、一部重要算学著作《数学九章》的作者秦九韶(卒于1262年)。秦九韶是使用零的第一位中国数学家,而且这还是在零与阿拉伯数字出现在意大利的同一时代。

当时在天学和计时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业之一是于1090年在开封制造了仪象台(一种浑仪),它靠纵系统的齿轮结构和传动索

来制动。它即使不是世界上发明的第一种此类浑仪(因为中国在8世纪时就有过一次先例),至少也是最完善者之一,并是缓慢的、规则的和持续转动的较古老的机械之一。苏颂(1020~1101年)的仪象台由一个轮子制动,由一个水面固定的缸供水来连续装满转动水斗以调节其移动。这种时钟机制具有过去从未达到过的最准确程度。

科学考古的发轫

作为宋代特征的科学倾向也表现在考古学领域中。新的发现激起了学者和艺术爱好者们的热情。某些被断代为10世纪前的古物、青铜器和玉器都于徽宗执政年间(1101~1125年)在安阳地区,亦即在可以被考证为公元初的遗址上(如商代末京的遗址)发掘出土。对古物的酷爱产生了两种相似的后果:它一方面引起了对艺术传统的丰富(古文物和仿古文物的时兴,制造赝品古董的技术在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得到了改进,这是文字的古风对于书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激起了考古学和考证题铭学的发展,它们从11世纪起变成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有关古代钟鼎的最早著作以及导致产生了一些复制仿造品的第一批插图著作就应被断代为宋代。吕大临于1092年发表了他的《考古图》,这是第一部有关科学分类以及对于第二和第一个千年纪的青铜器进行断代的论著。公元12世纪末,洪迈(1123~1202年,一部著名志异故事集《异坚志》的作者)之兄洪遵(1120~1174年)出版了其《古泉》,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古钱币学论著。

301

但进展最显著的则主要是在题铭学领域中,这无疑可以通过中国对其文字史始终都表现出来的激情来解释。其中最著名的论著是赵明诚(1081~1129年)及其夫人——女大词人李清照(1084~1141年?)经过长年研究而完成的。他们的《金石录》共统计到2000多种古文献,同时还修订了由史学家欧阳修于1063年汇辑

的古代碑铭目录《集古录》中的错误。

考古学以及自 8 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史,都促使人们把过去的历史设想得如同是一种从上古一直绵延到当代的不间断之发展。

史学的新倾向

由刘知几于 8 世纪初叶开创了批判性反思运动,这是因为唐初编写的官修史书的陈腐与刻板特征引起的。最早的历史类书同时也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史学家应在不顾及传统的范畴与划分的同时涉猎较长的时代和亲自从事其研究事业,而那具姓名的汇辑本说明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任何深刻意义的著作。在 8~9 世纪开始的那场运动于 11 世纪时导致了历史研究的一场真正更新。人们发现在这个时代形成了对更多科学严谨性的关注,同时也形成了对伦理精神的新关注。

但历史必须首先恢复这种文献著作的特征,也就是最早史学著作固有的特征,如司马迁的《史记》(约为公元前 90 年)、班固的《汉书》(约为公元 82 年)、陈寿的《三国志》(公元 3 世纪末)。公元 800 年左右的最早的“古文”支持者和捍卫者均以创新派人物的面孔出现,该派于宋代初期取得了胜利。古文被诸如苏轼和黄庭坚那样的诗人以及王安石那样的政治家们所采纳。欧阳修(1007~1072 年)用“古体”文写成了《新唐书》,从中删去了大部分对佛教表现出的某种好感的段落。《新五代史》的情况也如此。《新唐书》(1060 年)和《新五代史》(约为 1070 年左右)是两部直到今天仍以其文学价值而受到重视的著作。后一部著作是其作者根据鲁国编年史《春秋》(公元前 722~481 年)的模式设计出来的,仅仅从其使用的辞汇来看,它就是对从唐末到宋王朝开国之间的混乱和分裂时代所作出的一种不明确判断。这些具有伦理说教性的倾向、对于王朝合法性问题的强调以及对于历史的一种伦理意义的研究,都是宋代

302

的典型特征,并且与中国哲学的新方向相吻合。

11世纪最大和最著名的历史著作,亦即其影响可能最深刻者,是有关中国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之通史的一部著作,它修纂于1072~1084年间。这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模本只能是司马迁那令人赞叹不绝的《史记》。尽管作者非常注意把事实彼此联系起来,但他仍然忠于按年、月、日进行划分的纪年传统。不过,这部著作却以其两大明显特点而与众不同:关心高屋建瓴地研究各种内容的史料(包括文学作品和金石文)和已经可以称之为科学的文献考证。《资治通鉴》于其354卷中还包括30卷“考异”,其中讨论了在对同一事件之不同或矛盾的传说中指引作者决定取舍的原因。

司马光的这部巨著受到了如此一致的赞扬,以致于它激发人们在12和13世纪时写成了数部其他类似著作。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写了一篇纲目并于晚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就是《通鉴纲目》,其中形成了一种历史伦理观念。司马光巨著的续编陆续地出现:李焘(1115~1184年)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李心传(1166~1243年)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127~1130年)。最后,为了纠正逐年划分历史的弊病,袁枢(1131~1205年)把《通鉴》的资料重新按内容作了划分,这就是《通鉴纪事本末》,它撰写于1173~1175年之间,成为一种经常被后人模拟的新著作体裁的模式。

宋代也以其史学类书而著称。郑樵(1104~1162年)是一部专论集《通志》的作者。此书论述了世家、七音、地理、草木和昆虫、艺文、金石等。作者对于文人们的书本知识充满了鄙视,他自己就是自然科学的高度酷爱者。郑樵是一名极端古怪的思想家,故而于其时代不能受到高度评价。他的历史著作在引起当代学者们的注意之前只是到了18世纪末才由章学诚恢复其名誉。另外一部史学类书涉及到了社会制度史,这就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马端临生活在南宋时代末期和蒙古人占领中原时代的初期。此书仅仅在1317

年才完成,为杜佑(732~812年)《通典》的续编。

宇宙论和伦理学,一种自然哲学的形成

303

完全如同未经加工处理过的事实不能成为历史、而事实内在的自然动力也渗透进了史学家的推论之中一样,绘画的真正目的也不在于有形地反映可见之物,而在于对存在物之变化的感知。《梦溪笔谈》卷17是有关绘画和书法的,其中包括一段著名文字,作者于其中竟至宣称绘画创作与对原物的相似性的庸俗要求无关。使艺术作品具有价值的因素确实是超越了事物之外在直观,归根结蒂是由于作品表达了其作者的思想、文化和人格。

人们无疑会在宋代之前的中国思想史中发现一些先例和类似的方面,但社会中思想的内在性从未被以如此明确的方式表达过,也从未被如此清楚地设想过。所以,可以解释自然界以及人类世界的精神与世界之密切关系,或者更应该说是其根本一致性的第一种哲学理论,是在11~12世纪确定的。运用这种包罗万象的、自然主义的和唯理主义的哲学表述,就会达到中国思想史上的顶峰之一,也会达到古典时代或成熟时代。第一批入华耶稣会传教士们所接触到的和除了伟大的莱布尼茨之外的欧洲人无法理解的无疑正是这种哲学,它变成了明清时代专制帝国的基础以及解释伦理与自然的依据。

11世纪的文人们非常仇视佛教,但却颇受佛教的布教方法及其苦修传统的影响。这些人希望恢复他们所认为的自孟子(约为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以来被中断的真正儒教传统。这种复古之风起源于继安禄山叛乱之后那时代久远的“民族主义”之反抗,同时也起源于人们称之为“古文”的运动。在返朴归真的中国传统思想中以及在自佛教胜利之后遭受冷遇的经典中,都包括有一种一旦显露出来就会使人确保社会和睦和良好政治秩序的思想,它是由韩愈提出来的,后来于11~12世纪确定的某些方向也曾由卒

于韩愈之后约 15 年的李翱揣测到了。这股思潮在 11 世纪所获得的新内容——坚信教育和严格伦理的良好效果以及改革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导致了这个时代经常翻印文献的特有现象。这也是一种系统化的愿望,是对于可能会取代宗教解释的对世界的全面解释以及对于宗教和佛教哲学的研究。欧阳修揭示了自六朝以来在政治功能(治)和文化(教)之间出现的脱离:前者若无后者就只能会失去灵魂和导致变质,后者若无前者就会丧失与现实的任何联系和任何深刻的意义。对欧阳修来说正如对当时的所有人一样,其时代任务就是振兴上古时代的理想、国家和社会,在他们看来,治国和教育本为一体(大家将会发现这些观念在后来很晚时代于 18 世纪末的史学家和哲学家章学诚身上得到了充分发展)。

但在 11 世纪的思想家们之中,最大的问题是人与天地的结合以及人性与天命的统一问题。许多人都对宇宙演化、时间周期和世界和谐的问题表现出了狂热。他们极力对此作出一种图解。周敦颐(1017~1073 年)、邵雍(邵康节,1011~1077 年)、张载(1020~1077 年)都曾到《易经》中去寻找其启示灵感。这部秘术经典在 3~4 世纪的玄学中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热潮。邵雍认为,对于宇宙的关注是以一种具有普遍性指向的符号为基础的。至于与其兄程颢(1032~1085 年)同为周敦颐弟子的程颐(1033~1108 年),则把对《易经》的研究与对孔夫子《论语》的研究、对《孟子》的研究与取自《礼记》的两篇(《大学》和《中庸》)的研究结合起来了。从宋代开始,这四部著作便比真正的经典都更受赏识,后来又被称作《四书》,形成了 11 世纪时正在定形的唯理主义的、伦理说教性的和作为形而上学之基础的基本文献。继宋室向长江以南撤退之后,朱熹(1130~1200 年)对在 11 世纪文化思潮澎湃的气氛中表现出来的非常错综复杂和特别丰富多彩的思想作了一番总结,又把一种注疏经典的新方法记到了自己名下并运用到《图书》中。他果断地重新抛

弃了训诂的拐杖,用一种试图达到深刻意义的哲学诠释取代了自汉代以来就实施的逐句解释。朱熹及程氏兄弟的程朱学派以“性理

学”为研究对象,以“理”为最高范畴,以“格物致知”为方法论,以“居敬穷理”为

三、结论

纵观 11~13 世纪的整个中国社会,大家便会得到一种经济和文化均取得了令人震惊之发展的印象。马可·波罗在 13 世纪末的惊讶并不是佯装出来的。东亚和基督教西方之间的差距极为引人注目。我们只要在各个领域(贸易总量、技术水平、政治组织、科学知识、艺术和文学)中把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与基督教社会进行一番比较就会坚信,我们欧洲落伍得相当远了。毋庸置疑,11~13 世纪的两大文明是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西方的这种落后也没有任何使人感到惊讶的地方。中世纪末叶,受一种新生活鼓舞的意大利城邦均位于亚洲通商大道的终端。而欧洲则位于欧亚大陆的一端,处于文明大潮流和商业大潮流之外,而且其地位也解释了至少它的西部始终都避免了最严重的入侵。就在蒙古人立足于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孟加拉湾之间的地区而导致伊斯兰世界衰落的时代,欧洲仍处于发展之中。它还利用了由一个从朝鲜到多瑙河之间的蒙古大帝国的创建所引起的交流和借鉴新潮。这样一来,在一部事实上仅被归结为西方史的世界史上,我们习惯于认为是开创近代社会的因素,实际上仅仅是在蒙古人

306 入侵之前从地中海到中国海之间的都市和商业文明之发展的反应。西方接受了这种遗产中的一部分,并从中吸收了后来使自己得以发展的因素。12~13 世纪十字军东征和 13~14 世纪蒙古帝国的扩张促进了这些因素的传播。简单地列举东亚对这个时代中世纪欧洲的贡献(直接借鉴或在中国技术启发下的发明创造)就足以说明其重要性:纸张、指南针和 12 世纪末的艏柱舵、把水动力用于纺织业、在火器军械发展之前打乱了战争形势的那种使用反冲力的投射器,最后是 13 世纪的两轮车、炸药、纺车、跟在中国一样导致了产生活字印刷术的木版印刷物以及 14 世纪末的铸铁。再加上一些其意义稍小些的新鲜事物,大家于此便会发现这完全可能是

促使西方近代到来的所有伟大发明创造了。

仅仅由于其海上扩张才摆脱了其相对孤立的西方之发展,产生于亚洲的两大文明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由于蒙古人的剥削以及长时期的起义与战争而于 14 世纪被大大削弱了,它必须作出巨大努力以恢复其农业经济并重新得到平衡。新的社会分配和政权的新贵族倾向,在明代(1368~1644 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飞跃发展。

307 第六编 从汉化诸帝国到蒙古人人主中原

308

10~14 世纪的游牧民和山民

如果大家考虑到它在数世纪间的发展,那末游牧民社会就会显得比我们刚一接触时借先天推论对它的想象要复杂得多和游移不定得多。它那不停的变化是由于其民族集团的日益增加、饲养类型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定居民们那远近不同或深浅不等的影响、政治上的聚和与分裂……在6~7世纪的唐代,西北部那令人不安的邻居吐谷浑人就是4世纪时定居在满洲南部牧马人的后裔。这些古老的部族逐渐向西迁移并最终定居在今青海省的库库诺尔(青海湖)地区,他们在那里与当地的其他民族杂居并转化为饲养牦牛、绵羊、马匹和骆驼的民族,从而不再是游牧民而是半定居民了。满洲东部饲养马匹的通古斯部族的女真人之先祖于12世纪初叶征服了辽帝国,他们似乎曾是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的西伯利亚森林中的狩猎民族。但一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在这些居民中区别出那些曾与定居民保持接触者,也就是在满洲南部、内蒙古、中国北方诸省的边陲和鄂尔多斯河套地区的汉族人的近邻,同时还有外蒙古和阿尔泰山谷的那些更为遥远的民

族。前者因商业交往、政治关系、农民于他们控制的领土上的存在、科举、汉族施政官吏和匠人等因素而受到了汉族影响的感染；后者则地处更为偏僻的地区，不大容易被这些影响渗透进去，并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了他们固有的传统和风俗习惯。

属于第一类的居民是契丹人和女真人，同时还有大概是在 10~12 世纪之间于汉族社会的东北和西北边陲创建了一些汉化帝国的唐古特游牧民。蒙古人就属于后者，并且在这方面显得如同是公元前 2 世纪时的匈奴人和 6~7 世纪时的突厥人的继承者。蒙古人也像他们一样定居在贝加尔湖以南的鄂尔浑河流域，他们也和匈奴人和突厥人一样，能够为自己的利益而创建一个游牧部族大联盟。

三代游牧骑兵

东亚在 10 世纪时正处于草原民族的一次大推进前夕，这一次比在先前几个时代所经历的数次推进更为波澜壮阔。从匈奴人到突厥人，从突厥人到宋代的契丹人和女真人，这一发展过程是非常明显的。人们可以严格地区别出三代游牧民：直到公元 4 世纪之前是第一代，他们根本不会用马蹬，而马蹬在此后的时代却为骑射部队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坐骑，从而加强了他们的进攻力量，故突厥人显得比匈奴人更为可怕了。至于第三代，也就是说先是契丹人和女真人、后是蒙古人的那一代，他们由于把草原作战传统与定居民军队那更为巧妙的作战手段结合起来而在作战方式方面取得了具有决定性的进步，特别是使用了围点战（攻坚战）的技术。契丹、女真和蒙古的勇士们，其装备都要比他们在唐代的前人更精良，而且使用了更重型的装备。每个人都自己穿戴或携带盔、锁子甲、弓弩和箭矢、斧钺、狼牙棒、帐篷和奶酪，而马匹均由一种皮制或金属制马衣所保护。一种如此笨重的装备必然会导致拥有大量的牲畜和运输手段。所以，装备辎重队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蒙古人为运

输兵械和给养而大量使用的马车也在这些奇特的征服者所取得的成功中占据很大的份量。每个骑士都拥有 4~8 匹坐骑,绝不会接连两天骑同一匹牲畜。他们仅仅在近战中即当军队从不同道路上集合起来并非常接近其目的地时才跳上马鞍。这里是指以连续的和越来越重型的武器的攻击高潮来使敌人疲惫,这些攻击的持续时间及其频率都经过了准确的计算。

战争的目的及其技术也都同时发生了变化,既不再是为了获得通商口岸而发动的入侵,也不再是于秋季和冬季当粮草稀少时发动的抢劫行为,而是成了征服性的战争。但直到 10 世纪之前,草原人都是在经过缓慢的渗透(他们也于此期间被逐步汉化)之后才在中国北方就地夺取政权、创建国家的。契丹、女真和蒙古人都采用攻坚战、为了他们有条不紊的系统开发而力求对农业地区的征服。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肯定就是中国北方自安禄山(755~763 年)叛乱后出现的经济和人口的锐减,同时也是由于中国 9~14 世纪陆疆防卫的连续削弱。

在定居民中,与草原居民的势力增长相对应的就是战略和装备的进步。在 15 世纪时,新的兵器品种被制造出来了,防御手段也都得到了改进。当宋王朝于 12 世纪初叶被迫向长江以南撤退时,大家将会看到一支庞大的海军发展起来了。

第一章 汉化诸帝国

辽人的契丹国

当各个不同民族于 9 世纪瓜分了中国的北部边陲(甘肃西部的高昌回鹘人、青海的吐蕃人和吐谷浑人、鄂尔多斯河套的唐古特人、山西北部的沙陀人、河北北部的契丹人、满洲的勃海国人)时,契丹人很快就表现出他们是从 907 年起相继在开封建立的诸王朝

之最可怕对手，他们不失时机地组成了一个国家。

这些契丹人是4世纪鲜卑人的后裔，他们是西拉木伦河（西辽河）流域的游牧民，牧民和农民生活方式在这些地区结合在一起了。大量汉族农民在那里与突厥或蒙古血统的部族杂居。与汉族地区的为邻解释了契丹人必定要迅速采纳他们近邻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原因为。从924年起，契丹人向西发动了一次攻击，以便确保与唐古特人和吐谷浑人的结盟。他们于次年摧毁了勃海国。在他们对北京地区发动大获全胜的进攻并且将北京作为其京都之一（南京）时，便为其新生的帝国取名为辽，这是西拉木伦河（辽河）的汉文名称。946年，他们长驱直入地入侵到开封并导致了后晋的崩溃，在那里俘虏了后晋宫廷的人员和匠人，洗劫了那里的地图、官方档案、镌刻有经典的石碑、滴漏和乐器。他们在更大幅度地侵占了今河北和山西诸省之后，便于986年一直推进到满洲。辽王朝很快就达到了其势力的鼎盛时期。他们的侵犯活动于11世纪初年到达了黄河流域，宋王朝被迫于1004年在黄河下游的澶渊与之签订和约（澶渊之盟）。辽帝国的疆域不仅覆盖了满洲和东蒙古的大部分领土，同时还包括山西北部的大同地区和北京地区。 311

但辽帝国事实上的统治权却扩大到了从满洲和朝鲜直到天山一带的整个草原地区。满洲北部的女真部族、高丽、鄂尔多斯的唐古特人，甚至宋王朝本身都被迫承认是它的附属。辽王朝与日本和阿拔斯王朝保持着关系，而巴格达宫廷曾向契丹的一公主求婚。甚至在蒙古人扩张之前就这样经过草原地区而建立了关系，这无疑解释了为什么“契丹”（其单数形式为 Kitan，复数形式为 Kitat）一名在13~14世纪时便被蒙古人推广开了，它以 Kitai 或 Khitai 的形式变成了波斯文、西突厥文以及在东斯拉夫文中的“中国”的名称。众所周知，该名称也被强加给了那些曾赴东亚蒙古帝国旅行的欧洲人。马可·波罗就认为，中国北方是“契丹国”。

比草原人的政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贸易中的作用，这

种作用推动了“契丹”一名向帕米尔以外和欧洲地区的传播。宋代中国的中原王朝从1004年起向辽王朝纳的岁贡可能被它用于这些半外交半贸易的活动了。据汉人的观念认为,这些活动目的在于加强一个王朝的威望。澶渊之盟(1004年)强加给宋王朝的岁贡被定为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丝绸。但到了1042年,继辽帝国为宋王朝反击唐古特人的战斗提供援助之后,岁贡被增至20万两白银和30万匹丝绸。如果说这些巨额财富的一部分流入西域而成为过境贸易的商品,那也没有任何出乎意料的。因此,宋王朝的经济发展可能在其近邻和甚至是更为遥远的地区引起了震动与反响。

此外,中国中原的影响似乎在契丹人势力的形成、发展和衰落中都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从10世纪初叶开始,这些民族就已经被深刻地汉化了,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农业生产、钢铁厂、纺织车间和城堡。从920年起,他们就感到需要为记录他们的语言而创造一种近似汉文方块字那样的文字,这是在后来采用模拟回鹘文的记音体系之前。³¹² 辽帝国的国家机构都是从中国中原的模式中抄袭来的。随着政治制度的巩固和社会的变迁,他们的文化也趋向于和中国中原文化相结合。在辽王朝统治期间,就如同在继他们之后的金王朝统治时代一样,全部文化活动都集中在北京地区。如果说北京是一座对草原影响广泛的开放城市,那末它仍然和首先是一座汉族城市。

可能各种原因都推动了辽王国一开始的削弱和后来的衰落。早从11世纪中叶开始,契丹人就丧失了战斗士气并对其近邻采取了一种防御姿态,建筑了城墙、城郭和防御要塞。作为一种“无害”宗教——佛教的影响、中原王朝的财富及其文化的影响,似乎都对他们的风俗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12世纪初叶,继一系列灾难性的旱灾、涝灾、皇族宗室的内讧以及那些以“女真”之名为人所知的通古斯部族在东北取得进展之后,帝国的衰落加剧了。宋王朝曾与之结盟以反击辽王朝的是位于今黑龙江省女真人,其压力从1114年

起变得更加强大了,它导致了1124~1125年间契丹帝国的崩溃。

契丹的一部分贵族可能迁徙到了新疆的回鹘人中,他们在这些人的帮助下于1128~1133年间在伊犁河流域创建了一个以“喀喇契丹”(Karakitan,黑契丹)之名著称的王国,或者根据汉人的说法是“西辽”王国。这个突厥—蒙古族的王国已被深刻地汉化了,但它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并被基督教景教派所渗透。它立都于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巴拉沙衮(Balasaghun),可能一直扩张到疏勒和撒马尔罕地区。中原王朝的影响又通过它的媒介作用而重新传到了位于帕米尔山脉两麓的地区。它于1141年在撒马尔罕附近取得了对塞尔柱(塞勒术)突厥人的胜利,这无疑促进了西方有关约翰长老王国的中世纪传说的形成。它已经向基督教世界提示说,在亚洲可能有他们的一些反对伊斯兰教的盟友。西辽王国最终是被成吉思汗的军队于1218年摧毁的。

牧民和骑兵的西夏帝国

在中国西北地区,吐蕃人的入侵似是宋王朝直到1036年左右的主要关心焦点,但其他民族在这些地区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集团。鄂尔多斯的牧民唐古特人实际上是一个与唐代羌人具有亲缘关系的民族,他们于1002年一直扩张到西蒙古和甘肃。1028年,他们由于经商而变富并夺取了两大贸易交流中心,即直到当时仍由吐蕃人统治的武威和回鹘人控制的张掖。1038年,他们创建了一个帝国并用一个古老汉文名字自称“夏”,立都于兰州上部黄河河道附近的今银川(古宁夏)。这就是“大夏”人,根据汉人的称呼就是西夏。其统治阶级是由鲜卑的混血民族唐古特人(他们是5~6世纪北魏帝国的缔造者拓跋氏人)和吐谷浑人组成的。这些统治者是民族混血的产物,统治着一个其居民差异极大的国家,其中包括唐古特人、汉人、突厥人、回鹘人和吐蕃人。那里也有多种生活方式混存:农民、骑兵、游牧民、半定居的牧民等。西夏国在扩张到甘

肃的鄂尔多斯、陕西的北部和满洲西部的边陲时，确实吞并了草原和沙漠地带、绿洲和农业区。如果说其经济主要是以饲养马匹、绵羊、骆驼，以汉人普遍和种植的小麦、燕麦和谷子为基础，那末经商活动在该帝国中也具有某种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夏人确实控制了宋帝国与西域之间的贸易交流，稍靠北方又控制了经由通过鄂尔多斯而把东南蒙古与甘肃、青海和吐蕃联系起来的道路转运过境的一切商品。其中最大宗的交易当然是与宋代中国中原的贸易了。在边市之上，“出口”的物品主要由马匹、骆驼、黄牛、绵羊、蜂蜡、地毯和皮货组成，而“进口”的物品则由丝绸、香料、药品、瓷器、漆器组成。不过，主要是涉及到汉地盐的大规模走私促进了西夏帝国的富庶。此外还有其他的物品：由于宋室无力排除西夏人的入侵，被迫于1044年签订迫使它纳贡的条约，其总额为13.5万匹丝绸、7.2万两白银和3万斤茶叶。正如宋王朝向契丹人纳贡的情况一样，这些财产中的一部分很可能被西夏人用于转口贸易和当作交换货币了。无论如何，对于茶叶的记述值得于此提到，因为它证明了茶叶的使用自唐末以来就在草原地区的所有游牧民和吐蕃的山民中广泛传播。

宋王朝为摆脱西夏人在西北的这种令人窘迫的存在而作出的努力均一无所获，它于1081年发动的攻击，除了削弱王朝之外再无其他作用。但西夏国于13世纪初叶也开始遭到了蒙古人的最早入侵。它于1225年与蒙古人结盟以反对金帝国，但这也未能使它避免最终于1227年被成吉思汗的军队所摧毁。

这个骑马人和牧民的帝国就这样寿终正寝了，其居民的大部分均由汉族农民和市民组成。西夏帝国的这种混合特征也表现在它那些本来就是同时模拟了中原汉地和吐蕃的社会制度之中。其统治阶级所操的语言（大家最近才知道它是指一种近似中国西南的彝人或罗罗人语言的藏缅语言）从未被书写下来。他们最早曾像在吐蕃那样企图创立一种模拟印度文的文字，然后又使用了一些

根据汉文的原则而设想出来的文字。我们应该相信,这种非常复杂的记音体系要比印度类的语言符号更适合西夏语,所以这种体系被采纳和普及了。人们还掌握着用这种文字撰写的大量文献、辞书、佛道经文、译作西夏文的汉文经典以及刊本著作。

女真人的金帝国

女真人(Jürchen 或 Jürchet)是今黑龙江省的通古斯部族,他们灭掉了辽帝国。他们也是后来于17世纪初叶采用了满族之名、征服了满洲的中国诸省并于1644年夺取北京的民族之先祖。12世纪的女真语是满语的一种古老形式。

这些部族的发展是极其迅速的。我们所掌握的首次记载应断代为1069年。但从1115年起,他们的首领阿骨打(Aguta)便定居在今哈尔滨的东北,取帝名并称其王朝为“金”,据说这是暗示该地区盛产金沙。正是在这前后,他们开始对辽人发动了进攻,其作战本领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他们只用了10年时光就消灭了那个已被削弱的、被经济困难和内讧毁掉的辽帝国。1120年,女真人与宋王朝结盟,宋朝与金帝国的军队于1122年共同配合以攻击辽帝国。女真人于1124年被西夏人承认是东北的最大势力,并于1126年被高丽承认为强国。但在辽王国崩溃的第二年即1125年,女真人就废除了他们与宋王朝的友好条约并将其攻势一直推进到河南与山东。开封于1126年陷落。徽宗皇帝及太子和皇室的3000多人被解往哈尔滨地区囚禁。契丹人于11世纪初叶的入侵并没有超过比黄河流域更远的地区,而女真人的骑兵却一直推进到了长江流域和浙江以北,当时宋朝皇室和原来朝臣中的部分成员即避难于那里。在1126~1135年之间,中国东南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城市均被投入火与血之中。南京和杭州于1129年被攻克,女真人于1130年推进到浙江东北端的宁波。金与宋之间于1138年缔结了第一项和约,宋王朝于同年迁都(行在)杭州。而他们于1142年又

签订了一项更为持久的和约，将两国的边境确定在淮河流域并迫使南宋每年交纳过去送给辽人的贡品。女真人占据的领土再未被收复，尽管宋朝有时也发动一些略取小胜的攻势并且支持山东农民的抵抗。

315 女真人向中国北方和长江流域发动的攻势也伴随着一种向满洲和蒙古扩张的势力，而其帝国于 12 世纪中叶达到了鼎盛。它吞并了河北、山东、今江苏和安徽省的北部、河南、陕西南部以及更靠北部的东蒙古与满洲。金人对于他们亲自治理已并入其帝国中的大量定居人口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所以从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些政治单位，让已经归附于他们的宋朝旧官吏（汉人）来治理。此外，他们对于起义暴动的畏惧可能导致了他们在各地都保持驻兵部队以控制民众。但他们后来又不失时机地取缔了这些封国。“楚国”（位于黄河以南，他们将其统治权交给了张邦昌）仅仅在 1127 年间持续了几个月；一直扩张到今山东、河南诸省和陕西南部的“齐”国则由刘豫（1078~1143 年）统治，存在于 1130~1137 年间。

征服中国北方之后的金国政治史可以用几个年头来归纳总结。在 1153 年从哈尔滨地区迁都北京之后，它对南宋发动了新的攻击，但一场内讧危机却导致了 1161 年的篡权谋政。其后紧接着便与宋室实施了睦邻政策。在 13 世纪初叶金章宗（1189~1208 年）统治年间，也就是蒙古人大举入侵的前夕，在黄河泛滥之后南宋发动的连续进攻，以及金人不顾蒙古人的进攻而为在东蒙古立足所作的努力，导致了经济困难。在此后的年代，金人随着蒙古军队的推进而被迫撤出满洲，并于 1214 年迁都开封，那里与北京相比较易避开攻击。在蒙古人于 15 年之后发动攻击时，事态急转直下。1272 年，金朝宫廷受到了入侵的骚扰，在河南逐城地转移，直至其遭宋朝与蒙古联军包围的皇帝于 1234 年自杀为止。

人们在女真人中又重新发现了与其后裔满族人相同的那种战争本领与令人瞩目的同化能力。此外，原来已被汉化的旧契丹人在

金帝国中的存在以及汉族人口的数量,也解释了让人迅速地感觉到汉族的影响的原因。女真人的政治和行政组织、经济、文化都是中原汉式的。但其贵族的汉化程度特别从 1132 年起(人们正是从这时起才在上层政权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汉人)和 1153 年迁都北京之后迅速加剧了。这种汉化程度来势如此凶猛,以致于它招致了一种“民族主义”的反响。金世宗皇帝(1161~1189 年)曾力图振兴女真人的风俗、语言和传统。女真语于 1173 年被强行应用于为黑龙江旧部族后裔们设立的科举考场中。但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这种语言依然倾向于越来越遭人遗忘。它先是于 1120 年借用了一种可能是模拟了契丹字(“大字”)的文字进行拼写,后又于 1138 年利用“小字”来记音,后一种用法从 1145 年起开始普及。许多碑刻与刊本著作都为我们保留下了这种文字的大量例证。事实上,金人的官方文书在被译作汉文之前是用女真文写成的(直到 1191 年才用契丹字书写),这与后来清朝的满文文献于 17~18 世纪被译作汉文和藏文一样。

第二章 蒙古人人主中原

316

蒙古人于 13 世纪初年进入历史舞台并即将彻底改变亚洲大陆东北部的政治地图。金帝国从 1211 年开始承受来自鄂尔浑流域的新征服者的这些冲击。该王朝很快就被肢解掉了其满洲部分,而北京地区也于 1215 年被蒙古人占领。西夏王朝经过一段时期的战争(1225~1227 年)之后遭到摧毁。最后,在首次受到攻击的 23 年之后,金帝国最终崩溃了,而整个中国北方都被蒙古人征服了。蒙古人还需要再等 13 年才能最终立足于四川,然后又用 15 年左右的时间使长江流域的中国和南方诸省最后落入自己手中。蒙古人在向缅甸和越南的扩展中遇到了极大困难,他们于 13 世纪末向日本和爪哇的远征也完全失败了。蒙古人向东亚的缓慢渗透与他们

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西亚和欧洲的推进形成了鲜明对照。当然,成吉思汗的军队向高加索北部、乌克兰、克里米亚、罗马尼亚和 1221~1224 年间直接向波兰南部的疾速入侵可能仅仅被认为是一种考察活动,而只是在稍晚不久才征服了一些领土并且独自形成了一些汗国,如在阿勒泰山和准噶尔盆地的窝阔台(1224~1310年)汗国,在 317 西域、帕米尔和河中地形成的察合台(1227~1338 年)汗国,在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部形成的伊利汗国(1259~1411 年),在从欧洲的俄罗斯(鞑罗思)到叶尼塞河流域形成的金帐汗国(1243~1502年)。然而,领土的征服和蒙古政权的建立在欧亚大陆的东部终归比在西部更容易实现。1236年,蒙古人进入了哥 320 疾宁(喀山)地区;1237 年他们向莫斯科进军;次年,他们到达了诺夫哥罗德地区并向顿河下游盆地进军。1239 年受到威胁的乞瓦(基辅)最终于 1240 年被攻克。在 1242 年回师伏尔加河下游之前,蒙古人越过了加利西亚、匈牙利、奥地利、西伯利亚和达尔马提亚。他们只需数年的时间就于 1258 年夺取了阿拔斯帝国。西亚和东欧的干旱平原和人口稀少的地区,无疑要比四川山区以及淮河流域和长江盆地那人口稠密、由湖泊江河占据的平原更适合于在外蒙古草原中训练出来的那类军队的渗入。但东亚的定居民也具有与草原人同样的长期经历,他们在自 10 世纪末以来不停的攻击中可能改善了其防御手段,在蒙古和女真军队后方形成了游击战。相反,奇袭的效果似乎在欧亚大陆西部发挥了充分的作用。

蒙古人在欧洲大陆的推进阶段

1206年,铁木真被拥立为“海洋皇帝”成吉思汗(1162~1227年)。		
欧亚大陆的西部地区	东 亚	
<p>1211~1224年 1211年,征服西辽国(喀喇契丹)。 1218年,征服新疆的西回鹘王国。 1218~1223年,征服花刺子模和对斡罗思的第一次攻击。 1224年,进入印度的西北边陲。</p>	<p>1225~1227年,向甘肃发动攻击并消灭西夏国。</p>	<p>1210~1215年,对金王朝(中国北方)的首次攻击。1215年夺取北京。</p>
1227年,成吉思汗的晏驾和蒙古帝国的分裂。窝阔台(1229~1241年)		
<p>拔都汗(1207~1255年)于1236年离开哈喇和林,创建了金帐汗国;1237~1239年,向斡罗思的第2次进攻;1240年,夺取基辅,进入波兰;1241~1242年,进入波西米亚、匈牙利、奥地利、西伯利亚和达尔马提亚。</p> <p>旭烈兀汗(1218~1265年)于1253年离开哈喇和林,创建了伊利汗国;1258年,夺取报答和消灭黑衣大食;1259年,征服伊朗。</p>	<p>1236~1239年首次进攻四川。</p> <p>贵由(定宗,1246~1248年)。</p> <p>蒙哥(宪宗,1251~1259年)。</p> <p>忽必烈(世宗,1260~1294年)。1253~1259年在四川发动第2次攻击,进入云南、缅甸北部和越南;1253年,灭大理国;1257年,占领河内;1274年,首次远征日本;1281年,第2次远征日本;1282~1283年,进攻越南的占婆,入侵柬埔寨;1287~1288年,新的一次远征越南。</p> <p>1292~1293年,远征爪哇;1300年,缅甸之战的失败。</p>	<p>1231~1234年,对金人的第2次攻击;1231年,开始对朝鲜的进攻;1233年,围攻开封和洛阳;1215年,夺取北京。</p> <p>1257年,首次围攻襄阳;1272~1279年,征服中国南方;1272~1273年,第二次围攻襄阳并夺占襄阳;1276年,占领杭州;1277年,夺占广州;1279年,消灭南宋。</p>

一、蒙古的社会制度

蒙古人剥削制度的建立

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于1210~1227年间尚没有任何真正的行政组织。大屠杀之后残存下来的人口（工匠和宗教人士在此期间被慷慨地免于遭难了）都被作为奴婢而在蒙古贵族成员之间分配，许多耕田都被改造成了牧场。全部领土被分成了独立的行政区，它们实际上成了由对其居民拥有一切权力的封建领主们治理的私人庄园。一种部族和军事组织代替了官府，它们为西域蒙古汗国提供了其基本框架。与契丹和女真人相反，蒙古人在他们开始征服之前从未受到过中原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对于他们来说也始终是表面化的。直到成吉思汗晏驾时，他们与中国北方居民们的接触都非常有限。仅仅到了在窝阔台（1229~1241年）执政时期才最终完成了其占领，中国北方的财富始被有条不紊地开发。为了形成一些稳定的政治单位和继续其扩张，蒙古人首先必须联合起来并使被征服的民族为自己服务，因为他们仅仅占集中于自己统治之下的非常繁多和差异很大的民族中的一个很小的少数。对中国南方的征服以及对日本、缅甸、越南、爪哇发动的远征是由蒙古人以就地征募的中原军队、高丽和中国中原的船队组成的。为了剥夺中国中原民众的财富，这些对于和平时代的活动没有多少天赋、对于定居民充满不信任的征服者可能同时受到了汉族制度的影响，更愿意求助于金帝国的契丹和女真旧民族，而不是原籍为西域、近东或欧洲的藩民。正是由于征服中国北方的进展，才使人感觉到了使用中间人的需要。使蒙古人转而采纳汉人治国术的主要人物是耶律楚材（1190~1244年）。他是契丹贵族的后裔（正是耶律氏创建了辽王朝），也是在成吉思汗于1215年夺取北京时归附并为之效

劳的金朝旧官吏。自从窝阔台于1229年即位起，耶律楚材就向新君主论证了一种正规税制的益处（据他认为，征调和赋税可以使岁入达50万两白银、8万匹丝绸和2万多吨粮食）。他被敕封为中国北方的总管（中书令）。在被征服民族的影响下，蒙古人的政治转变了方向，某些起源于中原的社会制度逐渐被采纳。1229年，首次建立了驿站，制订了一种土地税制度，设立了官仓。1236年，首次发行纸币。同一年，又设立了翻译机构以使用蒙文编写汉文本经典（经筵译文官）和官修历史著作（扎鲁忽赤）。元朝铨选官吏的第一次科举是于1237年组织的，次年又在北京创设皇家文阁。在忽必烈统治时代，于1261年在翰林国史院中编修《辽金史》，仅仅是稍后于1344~1345年才完成官修的宋、辽和金史，它们由脱脱（Toktagha）主持。

另外一位其影响仅次于耶律楚材的大臣是刘秉忠（1216~1274年）。他是佛教禅宗的还俗僧侣，曾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刘秉忠于1249年被忽必烈召入哈喇和林，他向蒙古汗上万言书，陈述了其政治和治国术，其中载有取自汉代的一句名言：“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但由刘秉忠主张的宏伟改革计划仅仅从1252年起才开始实施。1267年，刘秉忠奉命于北京筑元大都（汗八里）。中央政府从位于距北京1500公里之遥的哈喇和林（位于今乌兰巴托以西，库伦）向辽和金帝国中心的这次迁移，是蒙古人政治视野变化的标志。当时已被征服近半的中国中原显得如同是一个人力和财力取之不竭的宝库。322 新京的总建筑师是一名由许多汉人辅助的穆斯林。1267年开始的城墙建筑到1292年才竣工，而皇宫则从1274年起才开始建造。在此期间，蒙古人于1271年选择了一种汉式的王朝称号——元王朝。

这种逐渐受汉族制度归化的过程并不能阻止蒙古人坚持他们对于中国旧官吏的不信任态度。兵权始终保留在蒙古人的手中，财权（户部）则被委托给了原籍为西域和中东的那些已经伊斯兰教化

地区的人,结成被称为“斡脱”(Ortaq)的行会的穆斯林商人完全夺取了征税这种颇为有利可图的垄断权,他们为此而受蒙古人的特派部队保护。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也曾为占领者的利益而工作过;大家还可以举出一名斡罗思人的情况,他于1321年在北京考中头名状元之后,于1341年被任命在浙江担任重要职务。

民族歧视

蒙古人在东亚制订的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实际上就是在已归附的和被征服的不同民族之间实行歧视。它不是根据真正的种族标准,而是根据归附民族被纳入到帝国范畴内的时间先后而确定的。有关由蒙古人引入中国中原的民族歧视政策的主要史料是陶宗仪的《辍耕录》,这是于1366年完成的一部“笔记”著作。这部著作中特别包括有关14世纪中叶中国东南部民间起义的资料,列举了由蒙古人区别出来的不同民族等级。全国人口共分成主要的三大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既非蒙古人又非汉人,而且未经汉化的人)和汉人(中国北方的汉人和已经汉化的人)。在游牧民中共区别出72个部族集团,而且在他们之中还呈现出在军事贵族和下层居民之间的明显区别。在“色目人”中共计算到31个不同部族,其中包括突厥血统的民族(畏吾儿、哈刺鲁、乃蛮、秃八……)、吐蕃、唐兀、原籍为阿姆河流域的那些以“撒儿塔”之名著称的伊朗商人、斡罗思人等等。至于“汉人”一名,蒙古人认为它具有有一种很广泛的辞义,因为它同时指定居在中国北部和东北部的那些已被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和高丽人,又指真正的汉族人。总而言之,该名称系指辽金王国的旧居民。在这些北方汉人之外还应再加上从1273~1275年起被冠以“新附人”之名的中国南方人,他们在元帝国中的地位可能最为低下。

323 这种分类被当作一种行政、司法和税赋歧视的基础。掌权的职位只能由蒙古人占据,而且还是取以世袭的方式。各行省的文职长

官或者出自蒙古人,或者很罕见地出自色目人,而帝国副长官的职务一般都委托给一名木速蛮(穆斯林)。

在刑法方面,最严酷的处罚也只留给了汉人。所以,在偷盗时烫金印的惩罚仅仅适用于他们。汉人对蒙古人的任何凶杀都会招致死刑和被迫为殡葬提供补偿(烧埋银),而蒙古人杀死一个汉人则仅仅课以一种普通的罚款。只允许蒙古人而禁止汉人拥有兵器。正是蒙古人在他们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及其帝国的专制特征而进行了深刻修改的汉地法律中,引入了专门对重罪犯们所施的“凌迟”刑。

在1315年最早组织铨选进士的科举中,相当大的份额是根据举子们的出身而决定的,在总数为300名的高中名额中,有四分之一留给了蒙古人、四分之一留给了色目人、四分之一保留给了原籍为中国北方的人,四分之一留给了南方汉人。这是对中原科举制的一种滑稽模仿,因为蒙古人和各不同种族的“色目人”均无多少文化修养,而大部分文人家庭都居住在中国南方长江下游的城市中。

因此,蒙古人在中国建立了一种严格的社会隔离政策,禁止由他们确定的不同种族集团之间有任何通婚。这种隔离是全面的,它既适用于世袭其军队统帅职务的蒙古贵族,又适用于被强行限制在其地位中的低下阶级。国家的工匠(也就是那些在征服战争中被

税制和对中国财富的掠夺

324

甚至就在被征服领土上的政权组织起来的同时,农民阶级就在北方被迫接受一种人头税和一种会使人联想到初唐时期的税制(租庸调),虽说对私有财产的控制和对土地的分配很久以来就不再流行了。除了徭役之外,纳税人还必须每年都交纳根据其具有劳动能力之年龄的成员而确定的粮食税(租)和布帛税(调)。在中国南方却相反,那里实行的是唐末的“两税法”:夏季征收调(帛),秋季征收租(粮食),其数额是根据耕地面积和家庭的税收等级而确定的。在这些税收之外,还应加入非常沉重和难以忍受的负担,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都由官府要求的轮差和无偿服的徭役所组成。然而,蒙古人非常需要服徭役者,以供他们在中原本地大规模发展起来的驿站以及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和军队征用。

税收的压力在中国南方似乎越来越严重了,蒙古人从中获得了他们近半数的收入。税收在长江下游(那里在1351~1368年间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叛中心)和沿海诸省的某些人口非常稠密的平原上变得令人不堪忍受了。这些地区那一触即发的形势可以通过其纳税人很小的数目以及由蒙古人在征服的翌日所采纳的政策来解释。在为了其利益而没收由贾似道于南宋末年创建的“官田”之后,他们也极力避免损害大地产,而这恰恰是水稻大生产区所忍受的社会不平衡的原因。这种谨慎态度以及这种丝毫不改变被征服地区的社会秩序的愿望赢得了南方有产阶级对新政权的一种中立或同情态度;而对于入侵者的仇视在北方则更为普遍一些,北方是小业主和官吏们的地区,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从被征服伊始就被剥夺了土地及职务。大地产先是在南方受到维护,后又在整个帝国中得到发展(蒙古贵族的庄园、寺院地产、富商们的土地),再加上农民地位的恶化,遂使元末的起义具有了很大的气势。特别当对占领者的仇恨和对富人的仇恨结合在一起时,更加大了这种

气势。

在征服长江流域的中国之后，蒙古人可能突然间拥有了比过去多两倍的资源。但这种财富很难向北方流动。直到12世纪初叶仍在使用的漕运，自从它们被遗弃之后就无法航行了，人们想找到一条比由隋朝人于600年左右疏浚的航道更短的道路。它可能将太湖周围的水稻大产区与蒙古人在征服南方之前数年就成为帝国京都的北京地区直接联系起来。元王朝立即组织了从长江口直到天津地区的海上运输。一部可以断代为明初(14世纪末)的《海道经》提供了有关绕过山东半岛把南京和天津联接起来的道路的资料，它无疑是重复了先前蒙古时代的航海指南。但人们同时也为修建大运河(这就是后来明清时代的皇家大运河)而劳动，它于14世纪初叶才彻底竣工。其北段建于1279~1294年之间，地面状态和平面的崎岖度迫使必须艰难地修建许多船闸。大运河的开通和投入使用并不能中断海上运输，最大部分的贸易交流直到该王朝之末仍由海路进行。

325

蒙古人是在中国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入主中原的。他们本应利用这种发展高潮，但他们的统治却加速了贸易发展和货币经济扩大对社会的影响，贫富之间的差异在他们统治期间扩大了。在宋帝国中发行的纸币只在特定地区和在特定时代流通，而蒙古人于1260年却创建了一种真正的“国币”，其有效性不受时空方面的任何限制。1260年发行的纸币即“中统元宝交钞”，当它被禁止兑换成金银币时却大大贬值了。继此之后，紧接着便是1287年发行的“至元通行宝钞”。它直到该王朝末期的严重通货膨胀之前，都保持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市价。

此外，蒙古人为西域和中东的商人们提供了便利。这些人中多是伊朗血统，他们后来归化了伊斯兰教，熟悉穆斯林世界的信贷活动，有时也在中国内地负责征敛地租，并都与经常向他们放高利贷的蒙古贵族维持着关系。因此，受其新主子剥削的中国通过古丝绸

之路和草原之路的媒介作用而参与了世界经济大流通，而它自己却未能获利。这种形势与大清帝国于 19 世纪所经历的那种局面并非毫无相似性。当蒙古人在中国强迫推行独一的纸币时，据某些史学家认为，中国的白银却大量地外流到了该大陆的西部地区。一般来说，大家可以笼统地认为在元代产生了一种中国社会的贫困化。中国白银向中东和欧洲的流失，解释了在 14 世纪末叶明王朝开国初期所遭受的那种银钱严重匮乏之原因。

起义和对占领者的抵抗

从 14 世纪初叶起，继位问题的争执削弱了中央政权，而蒙古贵族却越来越公开地表现出了其不驯服的姿态。皇位在内乱、阴谋和篡权之中迅速地承袭。仅仅在 1320~1329 年间，就可以共计算到 4 位君主。大臣和高官们成了北京之主。而当时在各行省中，官府和越来越腐化的地方政权也随心所欲地行事。但王朝在对付自己贵族反叛的同时，还必须对付汉民族那日益增长的敌对情绪。

从 1300 年左右开始，起义日益增加。蒙古人剥削的严酷程度、国家政权人员的腐化、异族的仇恨和富人的特权足以绰绰有余地解释这一切。但其他一些更特殊的原因也可能起过作用：从 1276 年起就已经令人明显感到了物价的飞涨，它无疑是由于投机或者是已经触犯了农民感情的专制和愚笨措施所挑起的。由此，1315 年采取的削平耕田中坟头以增加耕地面积的措施招致了暴动。反对国家政权的势力都集中于不断遭受禁止和迫害却始终都会复兴的秘密会社中。某些秘密会社也都具有一种更明显是宗教而不是政治的方向。白莲教的情况即如此，它是一个旨在崇拜阿弥陀佛的秘密会社，于南宋时的 1133 年之前由苏州的茅子元创建。它主要是在贫苦农民中吸收其信徒，他们遵守一种严格的素食信条，拒绝纳税和服徭役。这也是白云宗的情况，其立教祖师是公元 1100 年左右的某位杭州僧侣孔清觉（1043~1121 年）。该宗主要是

立足于长江下游以南地区。当时还存在一些千年至福的运动,人们在那里等待未来救世佛弥勒佛的降临。弥勒教徒的起义于1335年爆发于河南,1337年爆发于湖南,而在以后的数年中又爆发于广东和四川。但最重要的秘密组织则为红巾军(1351~1366年),此名源于其成员的红色头巾,这种做法在宋代的叛乱运动中已变成传统了。在1351年黄河下游爆发的大起义运动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正是红巾军。继一次水灾之后,红巾军在数年间发展到了安徽并最终导致了该王朝的崩溃。宗教和政治抱负在元末的起义军中密切地糅合在一起了。在迫害的影响下,似乎出现了一种由各种影响结成的诸说混合的理论。这些影响主要是佛教的(对阿弥陀佛的崇拜以及对于弥勒的千年至福之信仰),但也有摩尼教甚至还可能有袄教的影响。

二、东亚、基督教社会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

直到12世纪,东亚国家都与希腊化的印度—伊朗世界保持着关系,后来又与伊斯兰世界建立了联系,而且都是通过塔里木盆地和河中地的一系列绿洲以及通过海路而维持的。蒙古人扩张的结果,是于13~14世纪之间赋予了这条草原古道一种新的重要地位,而这条古道从新石器时代起就经过准噶尔和哈萨克斯坦而把蒙古和伏尔加河下游联系起来。这条直接通向东欧平原的道路曾由在那里推广中国驿站制度的蒙古人作了系统的规划整治。从1229年起就采用的这种制度于1237年得到了改进和统一。官仓、牧场、种马场、驻军等都使布满草原之路沿途的驿站变成了一种卓越的组织,它与一方面是外蒙古和北京地区、另一方面是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关系的发展绝非毫不相干。蒙古地域中各个民族的人来来往往,其中有西域和中东的穆斯林,有原籍为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金帐汗国的正统鞑罗思人,有中国北方辽金亡国的臣民,还有由于与鞑罗思和近东的贸易关系而一直把他们带到

蒙古甚至直达北京的热那亚人和威尼斯商人。由于蒙古人的政治制度把商业和政务联系了起来,所以某些异族人甚至倾向于在元帝国中为官。如果说用一种回鹘字母拼写的蒙古文(由吐蕃喇嘛八思巴创造并于1269年采用的方形文字未能被广泛使用)在中国变成了行政语言,那末在商业领域中以及在把大不里士与北京联系起来的通商大道上,最常用的语言则是波斯语。然而,俄语在草原之路上似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蒙古人对亚洲的统一似乎激励了相当多的鞑罗思人一直冒险深入到蒙古和中国中原。某些史学家们认为蒙古人的征服曾是鞑罗思最早向西伯利亚推进的起因。

基督教国家的使节和商人

许多外交和政治原因促使西欧国家向哈喇和林和北京派遣方济各会传教士,圣·路易、最后十字军时代的国王和教皇都曾对与蒙古人结盟和归化他们寄予过希望。

1245年,诞生于佩鲁斯的意大利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 1182? ~1252年)受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教皇派遣,离开里昂而出使哈喇和林,于两年之后才返回那里。我们掌握着他有关蒙古人风俗习惯的札记,这就是其名著《蒙古史》。

1253年,原籍为佛兰德的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ck)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和英诺森四世派遣出使蒙古,他在第6次十字军远征时出发,旨在促使蒙古与之结盟而抗御穆斯林。他经过黑海和克里米亚之后,又沿顿河逆流而上以到达草原之路,并在哈喇和林会见了于1253~1254年住在那里的蒙哥汗。

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约翰·孟德高维诺(Jean de Montcorvin, 1247~1328年)在到达伊朗之后,于1291年在霍尔木兹(那里当时是通向东亚海路的起点)乘船出发并在福建的泉州登陆。他于1307年继出使成功之后又被克莱芒五世教皇任命为北京(汗八里)的大主教。数年之后,又为他派去了一名助理主教。但在他

1328年于北京逝世之后，罗马基督教的任何踪迹都在中国消失了，以至于明末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方济各会士先驱。

另外一位意大利的方济各修道士鄂多立克(Odoric de Pordenone, 又译和多理)于1314或1315年出发前往东亚。他访问了君士坦丁堡,渡过了黑海并到达伊朗。他又从那里经海路到达印度,然后抵东南亚,并在广州登陆后又乘船赴福州。鄂多立克经内陆道路从福州到达杭州旅行,后又经大运河到达北京并在那里居住了3年。以后,他再次经亚洲内陆而返回欧洲,于1330年回归意大利。他的游记被其朋友纪尧姆·德·索拉尼(Guillaume de Soragne)汇辑成书。328

除了这些天主教传教士们的名字,大家还应该补充那些著名威尼斯商人的名字,这就是尼柯罗(Niccolo)、马泰奥(Matteo)和马可·波罗(Marco Polo)父子。他们于1254年从威尼斯出发以从事一次把他们一直带到中国北方的旅行。尼柯罗和马泰奥兄弟于1269年返回了意大利。他们于1271年再次从那里出发并携其儿子和侄子波罗(1254~1324年)同行,先后经过了帕米尔、绿洲之路、甘肃(他们在那里于甘州或张掖定居了一年以从事贸易),再穿行中国北方,在距今北京以北270公里的夏都——上都拜见了忽必烈,然后又于1275年到达北京。马可·波罗奉命治理商业大城扬州,并多次被蒙古人委托各种使命。他于1292年从泉州乘船出发,访问了越南、爪哇、马来亚、锡兰、马拉巴尔海岸、乌克兰和伊朗的东南沿海,于1294年到达霍尔木兹。第二年,他在滞留东亚近四分之一世纪后返回威尼斯。他在被热那亚人俘虏之后向鲁思梯谦用法文口授了其回忆录。这就是著名的《世界珍异记》。

欧洲人在东亚的蒙古帝国中与来自亚洲各地区的商人和官吏们亲密交流。例如,当鲁布鲁克在哈喇和林时,一名叫作海顿(Hayton)的亚美尼亚国王也下榻于蒙哥宫中。但这些外国旅行者

中大部分都未曾留下过回忆录。著名的伊本·拔图塔(又译伊本·白图泰, Ibn Battûta, 1304~1377年)于1325年从事了一次赴埃及、麦加、伊朗、阿拉伯半岛、叙利亚、黑海、西亚和北印度的旅行。在德里度过8年之后,他又乘船赴东方,先后在苏门答腊和爪哇停留,并在泉州登陆后又访问了广东,最终通过大运河而从杭州到达北京。他在返程中取海路到泉州,重新到达波斯湾,先后经由巴格达、麦加、埃及,于1349年又重新到达丹吉尔。伊本·拔图塔是与马可·波罗完全不同的观察家,他在其有关中国的游记中描述了水力机器、纸币、煤炭的使用、制造船舶和瓷器等。

329 外国人都在中国留下了他们的行踪。如果蒙古人的统治不是那样短暂的话,那末他们的影响就会使人更为深刻地感觉到。一座基督教徒的墓葬(热那亚女子卡特琳娜·德维利奥娜的墓,已被断代为1342年)和一座穆斯林墓均已在扬州出土,而泉州地区的大批伊斯兰教、景教和天主教、摩尼教和印度教石刻近期成了一批考古发掘报告的内容。这些石刻都是用阿拉伯文、古叙利亚文、八思巴文(尤其是在景教碑的情况下)和泰米尔文写成的。此外,一切都似乎说明福建这个大港口的活动在蒙古人于1276年征服之后仍未减少,甚至还可能从这一时间起反而增加了。但大家还应该指出,当时是草原之路终点和元帝国京都的北京,作为所有外来影响在中国的聚汇地,自1274年左右起起到过特殊作用。

赴欧亚大陆的零散中国人

如果说在蒙古时代到达中国中原的异族人很多,那末一种相反的运动也产生了,而我们西方对此显然没怎么注意。

某些在中世纪从中国北方到达中东或者直至欧洲的人都是我们所熟悉的。道教徒长春真人(其俗名为丘处机,1148~1227年)是全真道的北七真之一。他过去就曾受宠于金世宗皇帝并被其召往北京,1219年又被成吉思汗召到了阿富汗。长春真人从他隐居

的山东出发,于 1220 年率其弟子中的 18 人登程上路,穿过了外蒙古和阿勒泰,经由撒马尔罕,从南方绕过了兴都库什,并于 1222 年到达喀布尔地区的成吉思汗幕帐。在 1223 年于塔什干附近告别了成吉思汗之后,长春真人于 1224 年返回北京,留下了一部游记《长春真人西游记》。

另外一位名叫常德的中国人于 1259 年受蒙哥汗派遣出使伊朗。他从哈喇和林出发,经过天山北部、撒马尔罕、大不里士,访问

一端。

因此，蒙古人的统治确保了某些中国技术在伊利汗国和金帐汗国的传播。中国在波斯细密画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蒙古时代的伊朗瓷器、音乐和建筑术中也如此。某些人甚至（但这一切的猜测性很大）在 14 世纪的意大利绘画中，特别是在洛伦采蒂（Lorentzetti）的《休达屠杀方济各会士》（约为 1340 年）中寻找中国影响的踪迹。但有关东亚之鼓动和贡献的问题，主要是在欧洲近代大发明方面提出来的。

14 世纪时，纸牌、印花布和纸币传入西蒙古帝国中，这肯定不会与木版印刷术在欧洲的出现毫无关系；进一步推论，它也不会与活字印刷术的发展无关。纸币是在大不里士印刷的，那里是一个世界性的大中心，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回鹘人和汉人于 13 世纪末在那里相会。曾在其《有关契丹国科学的伊利汗宝鉴》（1313 年）中介绍了伊朗的中国医学史专家拉施特（Rashid al-Din, 1247~1318 年左右）是第一个提及此种木版印刷术之发明的人。在现代印刷术发明之前数年才为欧洲所熟知的木版印刷术在那里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印刷了神像、纸牌，图文并茂的小书……至于使用活字的思想，我们应该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其文字很不适宜这种发明的中国人却从 11 世纪初叶起就已经想到它了。

在有关近代的另外一大发明——火器的发明的问题上，人们大都知道它在宋、金和蒙古人于 13 世纪初叶的战争中得到了发展。蒙古人于 1241 年在匈牙利的绍约河战斗中首次在欧洲使用了这种新的兵器品种。

如果人们忽视了由于蒙古人的扩张而在东亚形成的汉人的零散居落，那末对这种扩张的影响就只会有一种不完整的看法了。

宋代的海上贸易无疑可以解释中国商人在东南亚、锡兰和马拉巴尔海岸的存在。周达观在 1297 年左右于其《真腊风土记》中指出的那些在吴哥的中国商人，肯定是在蒙古人征服华南之前定居在

那里的。而没有任何迹象说明福建和广州等大港口与东南亚和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贸易曾因蒙古人的占领而受到影响。一种被断代为 1349 年的资料强调了一个中国移民聚落在单马锡(Tomasik)的存在,那也正是后来发展成华人居住的大城市新加坡的地方。在 1273~1279 年,对南宋帝国的征服似乎还促进了中国向东南亚移民的发展,因为当时引发了中国人同时向越南和日本的移民。蒙古人于 13 世纪末向越南、柬埔寨、缅甸和爪哇的远征很可能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因为远征军大部分都是由在南宋故国中征募的汉人组成,这就是“新附军”,其中的一部分士兵就滞留在原地。因此,蒙古人在东南亚的进攻为 15 世纪初叶的大规模海上远征开辟了道路。

中国社会对中世纪欧洲的技术贡献

331

中 国	欧 洲
最后的十字军时代	
航海技术 航海用的罗盘,从 1090 年起就已经出现,但肯定从 10 世纪起就使用了。 艏柱舵,出现于公元 1 世纪末,公元 4 世纪末才固定在船尾的框架之上。 合理套马 马胸带,公元前 3~公元 2 世纪;套马颈圈,公元 5~10 世纪(中国和西域的交界处)。 独轮车 公元 1~2 世纪。	约为 1180 年左右。 约为 1190 年左右。 约为 1200 年。 约为 1250 年。
蒙古人扩张的时代	
兵器装备 反冲力投射器(投射机),公元前 5~公元 4 世纪。 炮药,发明于 9 世纪,最早记载的炮药配方是 1044 年。 军事上首次应用炮药,904 年~906 年。	14 世纪。 1285 年。 14 世纪下半叶。

续表

中 国	欧 洲
拱洞桥 至少是公元 610 年。	1340 年。
纸张、木版印刷术、印刷术 纸张,公元 1~2 世纪。	最早从伊斯兰社会进口的纸,公元 12 世纪;在意大利制造的最早的纸,公元 13 世纪末叶。
最早的木版印刷书,8 世纪。	1375 年左右(莱茵河流域)。
最早使用活字,1041~1048 年,从 1403 年起的大型朝文版本。	从 1430~1460 年起才发明活字。
闸门 11~12 世纪。	约为 1375 年。
铸铁,钢铁冶金 首次提及铸铁,公元前 513 年。 改进冶金技术(使用水力、风力、生产钢),公元前 2 世纪~公元 1 世纪;同冶法,公元 6 世纪。	约为 1380 年(莱茵河畔)。

蒙古人占领下的文学、科学和宗教

在蒙古人作为绝对专制的主人而统治的一个帝国中,汉人仅被授予一些低下和次要的职位,而征服者对于其庶民的文化不大感兴趣也是正常现象。对此略通一二的第一位蒙古汗是脱哈帖木儿(Tuq Temür, 1328~1338 年)。所以,对宋代“理学”的青睐不应使人产生错觉,它们是在较晚于 14 世纪初叶才出现的。1313 年,朱熹的理论被奉为正统;1315 年,科举制度得以推广。朱熹派的著作(其中包括《大学衍义》,这是 1229 年在南宋写成的著作)都被译成了蒙文。但这些都不能弥补蒙古人时代(就如同在辽金帝国中一样)在经典和汉地哲学研究方面的空白。我们不消说西夏帝国了,

那里没有任何可以与北京相媲美的大型文化中心；即便是蒙古人的政权，也比直到16世纪初叶的明代专制者的统治时代更不利于中国思想的发展。

但科学和技术并未受到异族统治的蹂躏。在蒙古人那游牧民的思想感情中保留了对工匠、技术人员的一种如同对宗教人士那样的虔诚崇拜。这样就可以解释他们对于诸如水利工程师、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郭守敬(1231~1316年)的崇拜。他于1268年被引荐给成吉思汗，于1271年奉命负责所有灌溉工程和调节水流；后来到了1276年，他又负责改革历法并于1281年完成了计算。在宋帝国中出现的中国数学的发展高潮一直延续到元代，直到明代才停止。两部数学名著于1300年左右问世，这就是《算学启蒙》(1229年)和《四元玉鉴》(1303年)，均由朱世杰(1273~1337年)撰写。道教徒和舆地学家朱思本(1273~1337年)刊布了一本大地图集《舆地图》，他为此而在1311~1320年间花费了9年劳动的心血。王大渊于1350年左右写成了其名著《岛夷志略》，这是根据他于1330~1344年在东南亚的多次旅行期间所作的笔记写成的。大家应该把一部重要的农技书《农书》(1313年)归于王祯(生卒年月不详)。王应麟(1223~1296年)的一部共包括200卷的大型类书《玉海》曾于宋元战争期间失传，后来又于1341和1368年间复得并被刊行于世。

蒙古人的统治促进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正是在元代形成了 334
中国北方和云南的穆斯林教团。云南行省的政权从1274年起被委托给了一位名叫赛典赤(Sayyid Ajall)的布哈拉穆斯林。他们的后裔后来完全与讲汉语和具有汉族文化的民族融合在一起了，但他们直到近代却仍在寻求保持其人格并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自治倾向。归化了伊斯兰教的中国人在甘肃东部、中国北方(北京今天共有25万名穆斯林)和云南总数很多，若再加上新疆的穆斯林人数，在上次世界大战之前估计为5000万人。这些居民的那种互相猜忌

的本位主义及其地处边陲的形势、中国官府的笨拙手段和敲诈勒索在 18 和 19 世纪时都激起了大规模的流血起义。

伊斯兰教的影响,特别是已经伊斯兰教化的伊朗的影响,在元代不可能不让人在中国社会中感觉到。蒙古人将营造他们在北京(汗八里)的宫殿的任务委托给了一名穆斯林。穆斯林建筑术的例证在蒙古和中原比比皆是。在云南、四川、甘肃、西安、泉州和广州都建造了清真寺。

在“回回国子学”中进行了对阿拉伯著作的翻译,而“回回国子学”是在忽必烈统治时代根据中书省的大官吏麦术丁(Moiz—al—Din)的建议创设的。伊斯兰化之伊朗的影响无疑在数学和天文学领域中最为明显。在 1258 年将巴格达城洗劫一空不久,蒙古人在大不里士南部的马刺舍(Marāgha)修造了一座观象台,所有地区的天文学家都被召至那里,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人。1267 年,由天文学家和舆地学家扎马鲁丁(Jamāl al—Din, ? ~1301 年左右)编定了一种新历书,他还于 1286 年向蒙古宫廷呈奏了带插图的汉文舆地书。蒙古人在北京建立了一座“回回司天台”,明朝的开国皇帝后来曾模拟它而在其执政的元年(1368 年)就于北京设立了一处“回回司天监”。1362 年,一本带有日晷的天文学著作由赛夷·阿扎里为中国的一名蒙古王子写成。归根结蒂,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和数学的代数学方向(以 1231~1316 年的郭守敬和朱世杰为其著名代表)都受到了伊斯兰化伊朗所提供内容的鼓励。

如果说蒙古人的统治从来都不会有利于作为文人和政治家之特权领地的学术性的严肃文学,那末它似乎是受到了作为一种补偿的刺激,这就是所有的民间表达形式,首先是现实和讽刺体裁的歌曲,往往由对蒙古人和对受到占领者宠信的集团(西域穆斯林、吐蕃僧侣、归附的汉人……)的仇恨所启发激励;但也有故事、传奇小说,特别是戏剧,总而言之全部是通俗语言和方言文学,而其中大部分都未为我们保留下来。这种诞生于大城市居民区中的文学

活动中心要么在中国东南部的大商业区,要么在世界性的城市北京。从宋初开始,也就是说从人们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用通俗语言写成的文献的 11 世纪起,这种文学就表现出了一种持续的发展,未受 11 世纪末和 14 世纪中叶之间的政治动乱之影响。这些动乱包括河北北部被契丹人占据、女真人于 1126 年的入侵、蒙古人于 1215 年夺取北京、中国长江流域于 1275~1276 年间被占领、元末的起义等等。其发展高潮始于金朝(1115~1234 年)的北京戏剧——杂剧。这是一种人物角色众多的节目,它由曲、舞和道白组成并以音乐伴奏,应为元代最大的文学荣耀。它们经常是由无名作者写成,现已大部分失传。在所知的 1000 多种剧目中,仅有 167 种流传给我们。其中最著名者出自马致远(12 世纪中叶人,他是《汉宫秋》和《黄粱梦》的作者)和关汉卿(13 世纪下半叶)笔下。大家应该把不朽的爱情和浪漫性著作《西厢记》的剧本归于北京人王实甫(约为 1300 年左右)。继蒙古人征服宋代中国之后,许多戏剧作者都前去长江下游地区定居,那里的戏剧传统与北京不同。在元末定居于这些地区的作者中,我们应该提及《琵琶记》的作者高明(高则诚)。

蒙古人的宗教政策在于根据当时的利益而相继地促进不同教派,并把帝国宗教事务的全部领导权都委托给他们。其后果可以通过政权的个人特征、蒙古人在宗教方面的态度、他们对哲学问题的冷漠以及对巫术和对奇迹信仰的好感来解释。尽管成吉思汗于 1221 年把道教大师长春真人召到了身边,但那却绝不是出于对全真道之文化和苦修形态的好奇心;虽然长春真人属于该派,而它却是由王纯阳(1112~1170 年)于山东创建的。该派的立教人曾希望清除道教中的所有秘术修持并对老子的哲学、《般若波罗密多经》的佛教和《孝经》作一番综合。成吉思汗的召见仅仅是由于在金代就于北京的女真贵族中颇为受宠的长春久负盛名,而蒙古贵族很难想象一位著名的出家人会不具有巫术的能力。在 1223 年授予道

教教派控制所有宗教的权力之后,蒙古皇帝们从1242年起又在佛教僧侣海运(1202~1257年)和刘秉忠的影响下,将其宠信转向了禅宗派佛教徒。由于佛教确实在契丹、唐古特和女真人的帝国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在蒙古帝国中感到它的影响就是很正常的现象了。汉文佛教大藏经于辽代的1148~1173年间在山西西南的平阳刊印。它在金代又被重新刊印。而在蒙古人统治时代,出现了一部自源起到1333年的佛教通史《佛祖历代通载》,它模拟了1269年的《佛祖统纪》。但对于汉地佛教的这种兴趣自蒙古人于1252年进入吐蕃之后便很可能让位于对藏传佛教的强烈爱好了。藏传佛教的巫术—宗教形态、使用真言(曼荼罗和陀罗尼)及坛场等都更符合蒙古人的宗教敏感性。从忽必烈于1260年登基始,政权的全部青睐都转向了喇嘛教团。

吐蕃喇嘛八思巴(1239~1280年)于1253年到达北京,并于1260年奉命总摄帝国中的所有教团。继他之后,一位名叫桑哥(?~1291年)的操多种语言的畏吾儿喇嘛成了忽必烈的宠臣。喇嘛在中国的势力使他们能够不择手段地发展宗教团体。桑哥从事金融投机和敲诈勒索,成了抢劫和多次凶杀的罪犯。在元朝征服南部中国之后,于杭州创设了一种新的宗教事务领导机构。该机构从1277年起被委托给了一位名叫杨连真甲的吐蕃僧侣,此人也以其罪行而臭名昭彰。在汉人的心目中,他最大的罪行是于1278年偷挖了位于绍兴附近的南宋皇陵以窃取其中的财宝。

因此,蒙古人对喇嘛教教团的宠信促进了汉人对于其主子的仇恨。它还产生了其他后果:一方面是吐蕃的影响在汉地佛教艺术中的渗透,这在供像和建筑术中最明显;另一方面是具有更严重后果的一种影响,即喇嘛教在草原地区的传播。

第七编 专制君主和太监的统治

337

对于明王朝(1368~1644年)漫长时代所作的历史分析,可以使人从中区别出三个界限清楚的阶段。首先是在洪武(1368~1398年)和永乐(1403~1424年)年间,这是一个重建经济的时代,朝廷建立了一种具有特别新颖特征的制度;同时也是外交和军事发展的时代,此种发展不仅仅涉及到了蒙古、东南亚和印度洋,而且也涉及到了西域。这种开拓的努力(消灭和击退蒙古的旧占领者以及草原部族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被阻止了,后来于15世纪中叶继在蒙古遭到失败之后就停止了。15世纪下半叶和16世纪初是一个收缩和防御的时代。最后,从1520年左右起,出现了中国的第二次“复兴”,它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化为标志。无疑是继政治制度的僵化之后,这种发展导致了从16世纪末年起相继出现的一系列危机:贸易和手工业危机、非常深刻的政治危机,然后是一直延续到满族入主中原时的全面起义。

第一章 重建和开拓

一、元帝国的解体和明王朝的建立

导致元帝国崩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也如同经常出现的那样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政权机构的杂乱(其中使用了无数互相矛盾的法规)、蒙古和穆斯林官吏们混杂在一起并贪得无厌、纸币极端迅速的膨胀、控制了整个中国僧侣界并干涉政治事务的吐蕃喇嘛教僧侣们的腐化、汉族居民每天都受到的压迫和农民阶级日益增长的苦难。蒙古人在全中国的统治归根结蒂是短暂的。他们仅仅是在1234年占领了整个中国北方并于1279年才完成了对南方的征服。但可能是灭掉了其帝国的起义暴动却开始于1351年,而中国的一大部分领土从1355年起就脱离了元朝的统治。从这一时代起,在大部分行省都形成了起义中心,已被解放的地区一直扩大到河南、陕西、河北、山西和四川。

领土的解放

即使是部分社会精英在起义爆发后也都参与其事,但所有这些爱国主义的起义都缘起于民间。在起义发展最为广泛的地方,可区别出两大地带。其一位于山东附近的行省,那里的千年至福运动(预言救世菩萨弥勒很快就将降临)始终都很活跃,置身于这种运动中的人相信宋朝即将复兴。那里的大部分起义军均出身于农民。黄河的泛滥可以解释中国这一部分地区的长期不稳定状态,这种泛滥自1327年起进一步恶化并几乎每年都引起一场导致大量死亡的饥荒。1344年,黄河大堤继持续暴雨后于开封下游决口。河水淹没了大片土地,只是等到5年之后,经过8个月的工程,决口才得以堵住。但为了大规模修堤工程而集聚起来的大批农民却促进

了革命的宣传。在整个中原地区以及稍靠南部的安徽，占统治地位的是红巾军的秘密会社，其第一位首领是韩山通，此人被奉为弥勒的化身。其子韩林儿于1355年自立为新的宋王朝之皇帝。

另外一个起义的重要策源地是在长江下游的盐工、船夫和私盐贩子中形成的，那里的暴动者的首领是一位叫作张士诚的人。他将其势力一直扩大到浙江沿海的海员和海盗之中，其军队则由方国珍统率。

另外一个不太重要的反叛中心在长江中游地区，在那里发展起了一场类似红巾军的“邪教”运动，其首领相继为徐寿辉和陈友谅。至于很快就成功地摆脱了蒙古政权控制的四川则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情况，因为那里是一个偏僻的省份，其独立传统相当强烈而活跃。

可能是从这种形势中诞生了一个新的帝国，而且在历史上是首次由起源于民间的运动很快就导致了一个新王朝的建立，而又未能在起义暴动时代与此后的时代之间形成断裂。如果解放运动不是非凡地组织起来的，那就无法解释它能如此容易地协调起来的原因。在被红巾军解放和控制的地区，经济、行政、军队等甚至在元朝政权被从那里驱逐出来之前就正常地运行了。

341 明帝国的缔造者最早在红巾军起义蔓延的地区显得像是一名次要的起义军首领。朱元璋诞生于1328年，他取年号为“洪武”（1368~1398年）。其祖父是江苏的一名淘金工，其父是安徽的一个四处觅工的长工，其母是一位师公之女。在1344年的大饥荒中，朱元璋出家为僧以求生存。从此时起，他就受到了当时流行于其行省的有关救世主降临传说的影响。他于1348年成为一支起义军的首领，这支起义军后来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在1352年夺取了安徽东北部的一座小城。他与红巾军联合之后，又频频获胜，于1359年占领南京及其附近地区，再于1360~1362年夺取江西和湖北省。次年，他成为中国中部之主并于1364年自称“吴王”（吴国王）。

在 1365~1367 年间,他消灭了其在长江下游和浙江的对手张士诚与方国珍,并于 1368 年在南京创建了大明王朝。他在中国中原和中原之外发动攻势,仍以过去所获得的那种凶猛势头而越出了汉地省份边界之外。1368 年,也就是在新王朝创立的那一年,他夺取了元王朝的主要京师南京(即现在的北京);1369 年夺取东蒙古的上都(开平);1370 年在蒙古围困蒙军;1371 年收复四川;1372 年收复甘肃;1382 年收复了尚有一支蒙军核心残存的云南。1387 年,整个中国最终完全统一了。这种发展在外部又由在蒙古东北部的捕鱼儿湖(Buिनor)的重大胜利(1388 年)、1392 年创建的李氏朝鲜王朝的归附以及向西域和东南亚的扩展所巩固。这种旨在恢复中国在东亚威望的政策一直持续到 15 世纪中叶。

农业经济的恢复

然而,在新帝国刚创建时,却面对着经济混乱所提出的最严重问题——中国已被蒙古人的剥削和战争搞得衰微破败了。整个淮河流域都可怕地受到了起义之害,安徽的一大部分地区已完全荒无人烟。土地、堤坝和灌渠,在各处几乎都遭遗弃。当时必须作出恢复经济的巨大努力,它后来在 1370~1398 年间终于如愿以偿了。

在洪武年间为恢复农业而作出的努力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似乎可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建国之初所作出的努力相媲美。在 20 多年间,于灌溉、开发土地和植树方面完成的工程是相当宏伟的。无数大大小小的灌溉或治水计划于大部分省份中均付诸实施。1395 年,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共整治或修造了 40987 座水库。大面积的土地都被复耕,荒芜地区又都有组织地由移民重新居住。移民在那里获得面积很大的耕地,享受到了国家的某种帮助和多年的免税待遇。重新开发的耕地面积增长很快。在 1370~1380 年间,最高的数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1371 年	575965 公顷
1373 年	1911692 公顷
1374 年	4974069 公顷
1379 年	1485572 公顷

粮食累进税的情况也如此。这些税在蒙古人占领时代高达 1200 万石(约为 700 万公担),而它们在全面光复仅 6 年后的 1393 年,便几乎达到了 3300 万石(近 2000 万公担)。

但最为令人震惊的却是,在这个时代做出了重新绿化中国的努力。1391 年,在南京地区共栽种了近 5000 万株梧桐树、棕榈树和漆树,其目的在于将来建造(实际上是于 15 世纪初叶完成的)一支从事海上扩张的远海船队。1392 年,安徽移民土地上的每个家庭都必须植 200 棵桑树、200 棵枣树和 200 棵柿树。两年之后,种植 200 棵桑树和 200 棵枣树的义务扩大到了整个帝国。1396 年,共有 8400 万株果树被栽种在今湖南和湖北诸省。据某些史学家估计,洪武时代的植树总数高达 10 亿株。

明初对于农业经济的重视似乎既是一种必要也是一种选择。在一个惨遭荒芜的中国,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确保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但就在此同时,也为未来确定了一种崭新的方向,即明清帝国的主要基础将是农业。因此,在 14 世纪的国家经济中产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宋代国库的大部分是由经商税所维持的,而商业经济在蒙古人统治时代仍保持着一种重要性,那末国家的主要收入此后就将由农民提供了。

对于农业税的重视解释了在洪武时代对帝国中所有土地的地契和户籍的建立何以极端关注。这些任务中的第一项共用了 20 年的时间而于 1387 年完成,这就是《鱼鳞图册》;至于户籍或《黄册》,它们是于 1381~1382 年间编制的,后来于 1391 年又作了一次修订。

人口的控制

343 由明朝开国君主建立的社会制度的另一种引人注目的特征在于对人口的职业性划分。众所周知,在洪武时代的中国,人只要生于农民、士兵或工匠之家,那末他们注定要父子相袭地始终如此。农户、军户和匠户附属于在当时占据着非常重要地位的三个部;它们各自控制了一部分人口并拥有独立的财务与行政的自主权,拥有自己的金库、仓库、粮库和兵器库……这三个部就是户部(提供大部分税收的农民家庭依附于该部)、兵部和工部。这种对人口的职业性划分与一种地理划分是相联系的:军户在边陲和沿海地区为数最多;匠户在京师地区为数最多,他们必须在那里居住或必须前往那里的皇家作坊中轮流当差;而民户则在所有重要产粮区为数最多。

明王朝的缔造者可能是受到了蒙古社会制度之先例的影响,因为职业的世袭权是蒙古人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原则之一。但这种社会制度在一个由征服者阶级统治和剥削的帝国中是可以理解的,而它于15世纪初叶就在内部因素的作用下开始迅速地分崩离析了。身份的变化越来越频繁,其地位被认为是最劣等级之一的军户减少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后来必须征募雇佣军了。然而,在洪武时代制订的户籍(黄册)却一直延存下来了。此后的时代,人们仍旧参照它;尽管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人口数字从15世纪起就不再符合事实了,故真正的收税额与在理论上确定的应纳税额必有差距。从15世纪开始的明代人口普查被认为是整部历史上最不值得信赖的普查。此类普查竟使15~17世纪的人口显得全面减少了,而且这种现象似乎恰恰出现在人口正常增长的时代。

税收组织的基础是所谓的“里甲”制,即对官府负责的10户集团,它负责在其成员之间公正地分配各种课税和徭役,并集体确保维持秩序。这种自治的制度可能很快就被其最强大和最有影响的

成员用来为自己谋利了，他们在当地居民和皇家官府机构之间充当了中介人。这种行政框架的弊端以及留给村社的相对自由，可能会致使最贫穷的家庭转入贵族和富农的附庸之中。从15世纪初叶开始，从事经营的小地主阶级就逐渐消失了，而庄园佃农的数目却成倍增长。当逃民和破落户再也无法借秘密开发矿山、走私、当强盗或海盗而维生时，便会部分地为军队中征募的雇佣兵所吸收。地方惯例在财经和行政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是明代的特征。为了有效地控制其治理的人口，所需要的官吏数目过份庞大，故他们必须比过去更能适应地方惯例并依靠贵族以执行其政令。我们在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叶的整个帝国中，共计算到10000~15000³⁴⁴名官吏。每个县平均有5万名居民，而县是最小的行政单位，它由一名朝廷命官和一些乡试中选拔的“吏”协助管理。

专制主义的倾向

明帝国是由一名农民创建的，他对于文化阶级似乎表现出了一种本能的不信任，故而只能更加密切地控制中央政府和各官府。这样的出身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洪武在促进科举和晋升出自平民界的官吏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洪武毫不迟疑地转过头来反对那些曾帮他登上最高权位的人，因为他们变得令他怀疑并觊觎其权力了。1380年（洪武当时62岁），发生了有关其昔日战友安徽同乡胡惟庸的大案件。胡惟庸的权势变得过份强大了，他被指控策划了一次叛乱并被怀疑与蒙古人和倭寇有过勾结。15000人都被牵涉进了这场大案件，最后导致胡惟庸被处死。对于洪武帝来说，这是一次把所有权力都集中于自己一人手中的天赐良机。他取缔了中书省并将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都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他同时也对兵权进行了一次改革，创设了一个他完全控制的“五军都督府”，从而确保了他对于军队的更为严格的控制。

1385年又发生了新的清洗，在此期间处死了大批被指控行为

非法或犯上作乱的官员(洪武带有一种病态的怀疑思想,甚至把使用某些文字也视为对他个人及其出身的含沙射影的攻击)。1390年,重审胡惟庸及其朋友和盟友的案件,共有15000多人又被牵涉进了这场官司。

明帝国从其一开始就孕育着后来在15~16世纪表现出来的专制倾向。如果说宋朝的政治制度是以互相制约和各自具有不同情报来源的独立机构的共存为基础,当时的政治决策都是进行辩论的内容,而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自由表达;那末明朝政府从14世纪末起却是以一种把所有权力都完全集中在皇帝手中,并以有限和秘密进谏的方式来施政的倾向、皇帝权力的彻底孤立、负责监视各不同级别政权的秘密警察的发展为其特征。锦衣卫是一种政治警察,其任务是侦察窥伺高级官吏。它由洪武于1382年创立,从而为其后任作出了一种令人憎恶的表率。

345

蒙古帝国的先例也可能与明朝新帝国的专制特征不无关系。许多迹象都使人联想到了这一切。例如,大家后来都指出《大明律》(1367年颁布,后又分别于1374、1389和1397年修订)受蒙古立法的影响非常明显。

明王朝缔造者的业绩对于他晏驾后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仍显得至关重要,所以人们直到该王朝末年都如对待英雄般地尊崇他,这也完全是正确的。洪武确实以一种集体的巨大努力为代价而恢复了中国的物质繁荣。他恢复了中国在外部的势力与威望,赋予了中国政治一种直到15世纪中叶尚能感觉到的推动力。最后,他确立了一个新帝国的根本制度。但很明显,这位开国君主也成了明代中国备受其苦的政治和社会弊病的祸首。在他执政年间出现的怀疑气氛从未被驱散过,而在中央政权及其代理人之间,不和与猜忌只能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恶化。中央集权以及专制和秘密施政的倾向也在洪武的几代继承人身上得到了加强。此外,他企图强加给中国社会的乌托邦式的法制和在他执政期间建立的机构始终是一种崇

拜的对象。尽管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变化,但人们仍在继续参照它们。这样就使现实与以14世纪末的人口普查和纳税额为基础的施政理论之间的失调越来越严重。由此而产生了妥协与权宜之计的胜利、地方惯例所占比重的增加和具体条例的大量积累。最后,税收制度的弊病和当地富豪与豪门望族的实权,可能很快就进一步加重了失宠阶级所遭受的压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稳定性。

二、继续扩张

蒙古、满洲和越南

洪武晏驾一年之后,明朝的第二代皇帝曾根据其心腹亲信们的上谏而试图削减皇室宗王们的势力,此类宗王中的某些人在边境地区掌握着兵权。此类措施成了皇帝的一个叔叔燕王朱棣叛乱的原因(他当时正在北京地区,兵权在握)。朱棣于1401年发兵进攻北京,并于此年在支持他的太监们的帮助夺取了该城,取年号永乐(1403~1424年)。他在位的时期是明帝国史上最光辉的时代之一。洪武时期为恢复经济而作出的努力于15世纪前25年结出了硕果,此时才有了全面繁荣。帝国的势力在外部得到了加强,其外交和军事扩张的意志并未放松。尽管在1401~1403年间出现了一次严重危机,但中国似乎仍在继续前进。 346

在蒙古人于洪武时代向北撤退之后,还有两个强大的部族集团在终有明一代仍继续存在:西北部的卫拉特(Oirat)人事实上是一个多种民族的集合体;而东北部则是鞑靼人(Tatars)。这后一个名称可能被欧洲人讹变成了Tartares,而且还被武断地使用到了本为通古斯而不是蒙古血统的满族人身;他们同样也与本为突厥血统的苏俄鞑靼人没有任何关系。在于洪武的继承人燕王统治下爆发内乱的时候,卫拉特人表现出复兴的势力,但永乐帝又成功

地对蒙古部族发动了进攻并五次大规模地御驾亲征，而于 1410 年在乌兰巴托东北的鄂嫩河流域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也正是在他统治期间，一直到阿穆尔河口的满洲均被明朝占据。从 1404 年起，在阿穆尔河口以南，于努儿干建立起了这个泰加森林地带的都司。

一支由 20 万人组成的中国军队于 1406 年在距那里 5000 公里之遙的越南北部的大越国进行军事干预，并最终灭了阮氏王朝。但这次军事占领以及对红河盆地和中部越南事实上的吞并绝不是毫无困难地维持的。于 1418 年开始的一场解放运动终于到 1427 年驱逐了占领者，其首领黎利创建了新的越南黎氏王朝（后黎朝）。

这些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使永乐时代的中国恢复了元帝国的边界，甚至向南扩展一直把越南囊括在内；同时从日本到爪哇岛和从印度支那到中东也开展了紧张的外交活动。许多使者被派遣出使西域。在洪武统治年间，一位名叫宗泐的佛教僧侣奉命出使，他承担的使命无疑同时具有外交和宗教特征。据认为，他携回了西域的一些佛教经文，并于 1382~1386 年间在亚洲腹地旅行。在永乐在位期间，陈诚曾于 1413、1416 和 1420 年三次被派遣出使西域。他一直到达了帖木儿·兰（瘸子帖木儿）帝国并在返归时写下了第一篇出使报告《西域行程记》以及《西域番国志》。大约也在同一时代，一名宫中太监（中官）侯显也于 1403 和 1406 年前往吐蕃和印度、于 1413 年赴尼泊尔、于 1415 和 1420 年经海路赴尼泊尔，并于永乐晏驾之后两年的 1427 年最后一次返回吐蕃。

大规模的海上远征

永乐时代以其大规模的海上远征而出名，它们于 15 世纪初叶揭示了中国的技术优势。他们在这一方面远远超过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后者的船队仅仅是在这个世纪的最末期才在远海中从事长途航行。中国的这种先进性可以通过上溯到 11 世纪的航海传统的

持续性来解释，人们无法相信它曾经中断过。蒙古人于 13 世纪末为入侵爪哇而下令建造的船队是在长江下游组装的，它们无疑也就是在宋代建造战船队和商船的船坞中制成的。远海大帆船时代包括了从 11 世纪到 15 世纪初叶的大远征之间的整个时期。因此，这些远征并非形成了某种一纵即逝的和特殊的事件，而更应被纳入一个更为全面的背景——中国社会的面貌及其航海活动的背景之中。正由于永乐时代的远航是官方的活动，所以那些断代史学家们才强调这一切。如果大家忘记了当时的中国与已被认可接受的思想相反，而在作为西域的一个草原和高原大国的同时还是一个航海家和探险家之国，那便将难以理解这一切了。

15 世纪初叶海上远征的原因何在？人们就此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这到底是军事还是外交远征？是扬国威的行为还是仅仅旨在为皇宫供应豪华物与异国珍宝呢？很可能同时具备所有这些因素。我们最好是指出，此类活动不仅符合在洪武时代形成的计划目标，而且从当时起就已为在海外地区的一场紧张外交活动作准备了。正是为了海上远征和建造一支远海船队，中国于 1391 年才在南京地区植下了 5000 多万株树。从其开国时代起，明代的中国就开始吸引外国使节。东亚所有国家的使节都莅临北京：1369 年是来自高丽、日本、越南、占婆的使节，1371 年是来自柬埔寨和暹罗的使节，1370 和 1390 年是来自马来半岛诸王国甚至来自科罗曼德尔（裸人国）的使节。大家今天在南京郊区还可以看到一位婆罗洲国王的寝陵，他曾经携全家和在大批侍从的陪同下到明京朝贡并于 1408 年驾崩于那里。其墓志铭的一些使人足以考证其身份的片断近期已被重新发现。

在太监们率领下的中国使节也于 1403 年到达爪哇和苏门答腊、满刺加，并一直到达南印度西海岸的柯钦。我们可以假设认为广州、泉州、福州的大港口自 13 世纪以来就不断与这些遥远地区进行着贸易，因为人们根本无法以其他的方式来解释外交关系的

恢复。此外,明朝明显具有一些扩张主义的企图,它重温了蒙古人的美梦,虽然其风格已发生变化。这里已不再是为了经济剥削而从事的简单征服了,而是为了让人承认明帝国在东南亚和在印度洋的威望。永乐时代的海上大规模开拓、在越南进行军事干预和于1406~1427年占领该国是同时代的事件。

350 这些海上远征是由一位名叫郑和(约为1371~1334年左右)的太监所主持的。他是云南的穆斯林,其父哈只吉曾赴麦加朝觐。他作为太监而在洪武帝于1382年征服云南之后,进入了后来成为永乐帝的北京燕王的宫廷。他本姓马(马哈迈德名字中的第一个音节),但却于1404年获得“郑”姓。他被任命担任了重要军职,并率领了在永乐(1403~1424年)和宣德(1425~1435年)年间成行的七次下西洋。下面就是其时间和路线:

1. 1405~1407年:占婆(越南的东南沿海)、爪哇、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古里(南印度的西海岸)。在爪哇王国满者婆夷,郑和卷入了一件王位继承案;在淳林邦(巨港,苏门答腊的东南)又卷入了一场地方政权和汉人移民聚落之间的冲突。

2. 1407~1409年:古里、柯钦(同样也位于马拉巴尔海岸)和锡兰。在这三个地点,郑和下令竖起了一些宣布古里、柯钦和锡兰对明帝国之附庸关系的石碑。

3. 1409~1411年:暹罗、满刺加、马拉巴尔海岸、锡兰。郑和反对满者婆夷对满刺加的奢望并在那里竖起了一块碑。他在锡兰岛上使王家军队遭受了一次失败。

4. 1413~1415年:古里和位于波斯湾进口处的忽鲁谟斯(霍尔木兹)。这支船队的一部分在离开苏门答腊时,直接地和未经停泊港口地经过大约6000公里的航行,到达了前意属索马里的摩迦迪沙地区的非洲东海岸和亚丁。

在这次远航期间,中国军队卷入了苏门答腊西北部亚齐的苏门答腊波斯苏丹国的内部事务。

5. 1417~1419年:又重新到达霍尔木兹。这支船队的一部分从苏门答腊前往索马里海岸和阿拉伯半岛。它于1420年在完成了该时代经由亚丁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最远一次航行之后返回。

6. 1421~1422年:当郑和的船队前往苏门答腊时,另一支船队却扬帆向东非和波斯湾驶去。

7. 1431~1433年:占婆、爪哇、浣林邦(苏门答腊的东南)、满刺加……马拉巴尔海岸、霍尔木兹。其部分船只从古里前往麦加的港口吉打,接着在经过亚丁和阿拉伯半岛南海岸之后,与主船队会合。

1424年,在第五次和第六次远航之间,又有一支船队曾前往浣林邦。

这几次包括了数十艘很大的和每次都载有2万人的帆船的远航,似乎实现了所有的预计成果。中国在东亚的所有海洋、东南亚的岛屿与半岛和印度洋中,都获得了巨大的威望,而且以入贡的形式与这些地区所有国家维持的经商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从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就与近东建立的交流,这无疑是埃及的玛木鲁克王朝(奴隶王朝)两次遣使南京的原因,其中一次是在15世纪的前25年,另一次则在1441年。中国海军的优势解释了于该王朝初期开始在中国海岸出现的倭寇到了15世纪上半叶几乎完全灭迹的原因。选择一位无疑其人格和才学都非凡的穆斯林,作为首席指挥官和正使,而前往一些伊斯兰教很久以来就得以立足或刚开始渗透的国家,似乎是特别明智的。郑和在东南亚的成功于那里留下了非常强烈的记忆,以至于他在那里被神化了,而且对他的崇拜至今仍未消失。供奉他的庙宇被称为:“三宝庙”,这是暗示郑和享有的官号“三宝太监”。完全如同向其他遥远国家遣使时的情况一样。在1405~1433年间的海上航行之后,紧接着就出版了一些舆地学著作,它们在中国澄清了和具体解释了海洋和海外的知识。这些著作中的最著名者是于1434年出版的《西洋番国志》、1436年的《星槎

胜鉴》和由郑和的旅伴之一——曾参加了第一、四和七次远航的太监马欢于1451年刊布的《瀛涯胜览》。

郑和下西洋所产生的效果，是加强了中国人与东南亚和南印度港口贸易，以及向那里移民的历史悠久的潮流。

收缩的开始

人们可以认为郑和在1433年的最后一次远航归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完结，也就是中国在四个世纪期间作为亚洲最大海上强国之时代的结束。中国海军于16世纪，也就是恰恰当海盗的攻击达到了其最激烈程度时的衰落，这也已经由欧洲人所证实（他们已开始东亚的海洋中冒险），并由平息海盗时遇到的困难所清楚地证明。但中国船队的这种软弱性却不会阻止贸易交流和走私，中国沿海、日本、菲律宾、暹罗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似乎从未曾像16世纪那样活跃过。但中国当时已不再像在15世纪那样成为海上强国了，自郑和下西洋结束之后，它就放弃了继续扬威于海上的政策。

15世纪中叶，与海防的这种收缩相对应的则是从草原一侧的退却。继永乐年间（1403～1424年）之后，明朝在蒙古的攻势遇到了游牧民们的更为顽固的抵抗，后者开始转入了进攻。这就如同在历史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那种情况一样，对于与草原人作交易所强加的限制，造成了一系列的困难和入侵活动的再度泛滥。为了阻止卫拉特人增强其势力，也可能是为了把其主要可能是蒙古人供应的马匹采购限制在必须的最小程度内，明朝政府维持了对兵器、铜和铁器交易的禁运，而且还对在边界上重开新马市不太感兴趣。在正统年间（1436～1449年），卫拉特部族被也先汗（？～1454年）所统一并进入了东蒙古。从此时起，对中国北方的入侵就变得越来越频繁。1449年，在冀北土木堡的著名事件中，正统皇帝被蒙古人俘虏，而到了1457年才被赎身释放。土木堡事件除了它在北京引起

的严重政治震动之外，在外部也标志着开拓时代的结束和向一种防守政策的转变。

蒙古人于 1438~1449 年间的攻击对于中国的防卫体系来说确实是灾难性的，因为它迫使明朝向南作大规模的收缩撤退。至于 1403~1435 年间在河北和山西北部修造的万里长城，它基本上是沿 6 世纪中叶北齐和 585 年隋朝修造的旧防御工事走向的轮廓线延伸的。蒙古部族的发展推进使得在正德年间修建第二条防线（内长城），在成化年间（1465~1487 年）于鄂尔多斯以南修建一条新防线变成必不可缺的了。这些长城的总长度（在某几段是两层或三层）达到了近 5000 公里。在中国北方直到北京附近，大家至今尚能看到其大段残垣断壁的正是这些长城。

从 15 世纪中叶起，再未为了把北方诸省从草原的压力和威胁下解放出来而作过任何略具规模的努力。继 1449~1457 年的妥协时代之后，在英宗（正统）皇帝被囚禁期间，明王朝仅限于以化费巨资来确保其边境的防卫。这种消极的政策导致了 16 世纪中叶的一种危机形势，而帝国勉勉强强地才从中解脱出来。

第二章 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迁

355

继 14 世纪末叶和 15 世纪初叶洪武、永乐年间的大规模发展之后的那个时代，一方面以在该王朝缔造者身上就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的秘密和专制政府倾向的加剧为特征，另一方面又由以越来越显著的方式改变在洪武年间建立的制度的一系列变化为标志。

一、政治的发展

太监和秘密警察

356

明朝的特征之一是太监宦官们获得的巨大影响,他们的权力在某些时期甚至是至高无上的。它是一种专制的、过份武断的中央集权和秘密施政政府的自然产物。正是其职务的家庭特征造成了太监们的权力和神秘影响,因为太监们负责那些涉及到了皇帝本人及皇家宗室成员们人身的事务。他们正是以这种名义来接受皇宫卫军的指挥权,从而可以使他们晋升至高级军官职位。他们同样也是以这种名义而奉命管理向宫中供应奢侈豪华品的作坊,控制由各布政司和藩邦奉起的“贡物”,并被敕封为出使亚洲内地、东南亚海洋和印度洋国家的使节。管理皇家作坊并控制贸易和对外关系,从而很容易地为他们提供发财致富的机会。因此,太监们控制了军事力量和贸易的财源。他们与皇帝保持接触,熟悉宫中内幕,所以可能获得了对专制官员们的一种决定性影响,而这些官员们在各布政司都不信任皇权的合法代表。因此,明政府的专制倾向使这些能言善辩、手段巧妙、办事灵活和行为忠实的仆人们的飞黄腾达变成不可避免的了。

明王朝的缔造者曾禁止太监们读书学习,并规定他们若参与政事便处以死刑。而半个世纪之后,太监们实际上控制了全部政权,主宰了中央和各布政司官吏们的任用和晋升大权。在加强中央集权和设立一个“内阁”(它从1426年起逐渐地取代了正常的政府机构)时,皇帝作出了有利于太监们的反应,使之可能最终混入了权力中心本身。这些宫中仆人们的特殊权势是由于他们善于安插秘密特务,这是明朝专制政权最可怕的武器之一。在永乐年间,继承了由洪武创设的锦衣卫的东厂很快就被置于太监们的控制之下了。而在1465~1487年间,则是西厂的红衣骑卫为太监们充任秘

密使者、间谍和唆使者的角色，利用其无限的和秘密的权力从事敲诈勒索和贿赂收买活动。失去了任何信息和控制手段的皇帝只好仅仅根据控告而并不过堂地审判被告。

太监们的势力使皇家官吏们增加了面对他们依附的专制权力时的不安全感，它促使他们腐化并加深了他们对于中央政府的疏远感。最清廉和最忠于皇帝本人的官吏们都被置于了悲剧性的矛盾中。在他们仇视太监的政治因素中，又增加了由血统和教育的差异造成的对立。大部分太监们都是北方人并出生于平民家庭，而官吏们则大都是出自长江下游和浙江北部的文人家庭。

迁都

357

一项具有严重后果的决策不但可能加剧了中央政府与其官员们之间的分裂，而且还以一种更为普遍的方式加深了以宫廷为一方面而以全体文化精英为另一方之间的鸿沟。1421年，北京被升为正京，而南京直到此前始终是中央政府和朝廷的所在地。但由于只有在1411~1415年间重新疏通大运河后才变得有可能的迁都事宜必须循序渐进，其部分机构始终留在南京，仅仅到1450年左右才最后完成迁都。大家对于这样一项决定可能会感到惊讶。北京确实是一座偏僻的城市，在那里始终可以感到草原的影响。此外，它也相对更明显地暴露在蒙古人的入侵面前了，并在16世纪中叶曾受到蒙古人攻击的严重威胁。当然，元王朝于1271年曾立都于北京，元王朝之前的契丹和女真王朝也都在一个如此偏北的地区安身。但这次却是一个汉族血统的王朝首次定都于一个特别偏北的地方。永乐皇帝可能对此地有某种偏爱，因为他做王子时曾住在那里，而当他南征时亦曾在那里获得了支持。他也可能是对长江下游的人士表现出了某种不信任和反感。但更可能是另外一种原因促使他这样做的，即北京地区对于控制东蒙古人和控制东北领土都具有战略意义。事实上，正是在永乐统治时代，帝国的边境再次

358

向前推进到了遥远的阿穆尔河流域。因此，迁都表现了一种向草原地区和满洲发展的意图，反映了在亚洲恢复元帝国于 13 世纪末和 14 世纪中叶之间在亚洲所占主宰地位的远大抱负。

但是，帝国政权在建都于北京时，却远离了中国长江下游和浙江北部的那片人口最稠密、最富有活力、贸易最活跃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这必然更易于脱离与这些地区的精英们的接触。

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为了对 15~16 世纪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有一种全局观点，就必须密切注视每个领域和每个地区的具体情节。这项庞大的工程尚有待于人们去做，研究者目前还只能满足于某些散乱的资料和笼统的印象，也就是一种以对简单事件的记述让人猜测的那种更深刻发展的印象。

某些变化触及到了农业社会，那里的活动和生产似乎在某些技术进步和经济变化起作用的同时也变得多样化了。但在农村基本富裕化的同时，也发生了最贫穷和最软弱者的迅速败落。从 15 世纪初叶起，一场广泛的地位再分配似乎已开始形成：洪武年间的小地主变成了佃农、明朝缔造者建立的三类家庭地位的变化、普遍寻找新的生活手段。其出发点无疑是由于贫苦农民的土地被更富裕的地主缓慢兼并，而官府也无力控制这种在农村一级的持久性经济压力。经济发展高潮以及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普及使用银锭和银钱的做法把一切都搞乱了，但同时也促进了发展。这至少也是我们权且对全局得出的印象。

军户问题

明王朝的缔造者想使军队变成一种独立的机构，而其人员与收入应该由世代具有特殊地位的家庭提供，这就是定居在军屯领土上的军户。每十人中就得有三个人被派去服兵役（守城），另外七

个人从事农业劳动(耕田)。防务和生产活动结合的这种历史已经很古老了,而且也已由最暴露于游牧民入侵面前的地区的供应困难加以证实。但当时却也形成了一种新鲜事物,即决定把这种制度扩大到整个帝国并把某些土地的收入用于军事开支。他们在这方面沿用了蒙古人的先例。蒙古人为了更好地把居民控制在手中,曾将其军队分散在全部领土上,使之占据一片飞地。但他们同时也受到了一种类似佛教基金会那样的原则的启发,也就是把一笔不可转让的资本的利息用于维持一座阿兰若或一处收容所的日常开销。这类基金会自11世纪以来在世俗界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以至于大家忘记了其宗教起源。洪武时代的军屯是以“官田”开始的,这些官田又是从蒙古人手中收回的,或是从与朱元璋相对立的军阀和起义暴动的支持者们手中没收来的,以及在诸如山西那样的北方布政司、大同地区或满洲南部的辽东重新开发的荒地或新垦的田地。这种制度似乎相当快地就在社会现实中扎了根。从14世纪末叶开始,军屯对农村社会就产生了一种相当大的吸引力,以至于贫苦农民自动地置身于其依附之下,从而形成了一支名为“军余”户的社会地位低下的劳动力。

军屯集中于南京和北京地区、辽宁、北部边境沿线,最后是西南的云南和贵州等布政司。军队是一种很活跃的和独立的组织,并且分布在全部国土上。它们自15世纪中叶起的布防是朱元璋在开国之初所发布的敕令的结果,除此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当然也会获得一种地区性的专业化地位。由此,我们可以区别出五类军队:

——从辽宁到浙江的驻兵,他们保护帝国来自海上的威胁,同时也确保对这些地区的海上与陆地的防卫。

——从位于紧靠北京北部的地区直到甘肃以及长城内外的驻兵,他们负责保卫北部布政司以对付来自草原的入侵。

——非汉族居民人数众多的西南诸布政司(广东、云南、贵州、

湖南)的驻兵,负责镇压那些企图独立的部族的起义。

——负责保卫两京以及屯集在北京和南京附近的军队。

——最后是驻守在所有农业大生产区和京杭大运河两岸的军队,其任务是供应给养和运输。

360

建立于洪武年间的制度也可能逐渐地发生了某些变化。军户的最早核心是由开国君主原先的战友们组成的,并逐渐由于蒙古军队中某些已归附的成员、囚徒和农民的加入而扩大。但从15世纪初叶起,其户数由于开小差而开始缩减。从任何方面来看,他们的地位都被认为是最不令人羡慕的。但还有更多的原因:在人数递减的同时,被用于军屯的土地面积由于富裕地主的非法购买而于15世纪中叶突然递减了。所以,已经由军户和军屯制度解决了的严重问题又开始向中央政权提出来了,这就是征募兵员、支付军费开支和军需给养的问题。因而,明王朝被迫恢复了在宋代实行的做法,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征募雇佣兵。特别是继1449年的大灾难之后情况更是这样,当时在河北和河南组成了被称为“民壮”的雇佣军单位。但当时很少会组成地方守卫性的、如15世纪末创设的“土兵”那样的民团,或者如在下一个世纪中叶当倭寇的袭击变得比较严重时形成的农民军。尽管他们非常胜任,但中央政权却不信任这类军队,因为它们始终都可能成为一次反叛的核心。至于由军屯的消失而引起的亏损逆差,则一部分由税收,另一部分由设立在北方诸布政司中的由富商巨贾们负责经营的御赐庄园来填补,这就是“商屯”。作为其通过雇工而开发屯田并向军队提供军需的补偿,商屯的商贾们获得了经营盐的许可证。这种制度无疑成了山西商贾与金融家们自明末开始迅速发财致富的原因。

匠户的逐渐消失

一种类似导致军户消失那样的发展可能也出现在匠户的情况中。在把一种特殊地位强加给匠人时,明王朝的缔造者是沿袭了蒙

古人的先例,后者曾把匠人中多达 26 万名左右的最精巧者留供自己使用并把他们与其余人口分隔开了。然而,这种特殊的地位可能在明初扩大到了所有匠人身上,同时又在他们之中区别出了两类家庭:定居在属于工部的作坊中的“住作”,以及每年必须在那些有时距其住处相当遥远的作坊中提供一定天数的应差劳动的“轮班”。一方面由于匠工们所处的不利地位(付薪低于常价,有时强迫他们前往南京或北京作长途旅行、减少他们自由工作的时间……);另一方面,由于长江下游和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高潮,那里的工匠需要量大而且须用现金支付报酬,这一切都可能同时发生作用并导致附属工部的匠户不断地减少。同时,货币经济的发展也促使国家逐渐用税来取代役。从 1485 年开始,定居在各布政司的工匠们就可以用交纳现钱的方法来支付他们本需轮流在京城进行的服役,这种做法得到了普及以至于被 1562 年的立法所认可。在此时,工匠们被迫轮流的服役被现钱税所取代,因此这个特殊的工匠阶级就完全消失了,而“住作”工匠在该王朝期间也不断地减少。在永乐时代的 1403 和 1424 年,人们在皇家作坊中还计算到约 207 万名左右的工匠,每位匠师都平均指挥 3~5 人。但在 1615 年,大家却只能计算到 15139 名匠人了。在满族入主中原的前夕,匠户的户籍实际上已完全消失,新的清王朝最终于 1645 年取消了这种户籍。 361

因此,在 15~16 世纪期间,由于经济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手工业得到逐步解放,而这种手工业最初却要程度不一地附属于官府。

社会动乱

因此,由洪武设立的世袭职业户的三个阶级从 15 世纪初叶起就开始解体了。这种现象不仅触及到了军户和其数目要少得多的匠户,而且民户也不失时机地摆脱了他们的最初地位。原来小片土

地之主被税收和各种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又被富户剥夺去了土地,从而变成了“逃民”。这些人人都要重操走私、秘密经营矿山或海盗的旧业,除非他们去租种别人的土地。某些地区的大部分民户都试图以副业活动(小商小贩、小手工业)来补充其微薄的收入。

362 15 和 16 世纪的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似乎是职业的始终不稳定性和寻求新的维生手段的失业者人数剧增,这些新的维生手段包括开矿、走私,特别是海盗行径。人们无疑可以提及传统性起义暴动的次数。由一名自称为“佛母”的女幻士唐赛儿领导了 1420 年的山东益都起义,其军队进攻了鲁东南部的城市。我们还可以提及非常著名的非汉族民众的起义,如西南省份的傣、藏—缅甸族、苗和瑶族于明王朝初期的起义。有时在这些起义和由汉族农民发动的暴动之间还出现过联合行动。1516 年,一位名叫普法恶的人借宣布救世菩萨弥勒的降临而煽动起四川的藏—缅甸民族。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新鲜因素。相反,沿海海盗行为的发展和由于政府在开矿方面的犹豫不决而挑起的起义却都是明朝的典型特征,同时也证明了 15 和 16 世纪所产生的经济变化,它们在后一点上正如自 16 世纪以来的城市工匠起义一样。为了阻止开发铁矿、铜铁和秘密制造兵器,蒙古人曾禁止进入某些山区。这种政策又由明王朝的缔造者所继承,但它既未被在所有地方都行使,也未被始终以相同的铁腕来实施。矿山有时对私营开放;有时又遭禁止,而官府在此情况下就可以动用武力。受到遭驱逐威胁的矿工们遂在山上组织起来以抵抗政府的军队。

矿工们的抵抗有时也与农民起义结合了起来,如在 1448~1449 年于浙江和福建交界处爆发的邓茂七大起义即属此例。在福建北部平原和江河流域,由于人口过份稠密(那里自 9 世纪以来连续出现了几次移民潮)和土地缺乏,于是便在传统稻田种植业之外又刺激发展起了手工业生产,如甘蔗、靛蓝、茶叶、荔枝、纸张、苧麻布、钢铁,它们使获得了农民土地的商人致富了。居住在城市中的

富裕地主阶级和赤贫的、被公私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佃农阶级之间的反差，制造了一种具有爆炸性的局面，它成了暴动反叛的根源。邓茂七的军队很快就与由叶宗留领导的闽浙边境地区的银矿暴动的矿工军队会师在一起了。起义由于夺取了乡镇和城市并占领了军械库而得以扩大和加强。它不只是一种普通绝望的大爆发，也是一场革命运动。起义军首领都非常清醒地知道在其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形势、该王朝之中央集权和专制的政治制度、官府与地方绅士之间那不可避免的复杂关系等等。

在 1450~1458 年间，对于秘密开发矿山的禁令不太严厉了，特别是在汉水上游地区，移民的人数非常多。最后，政府试图作出反应，而镇压又招致了一系列起义。我们共计算到 150 万遭驱逐或被杀害的人。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 1476 年。秘密矿工反叛的另一例证是由 1565 年发生在介于浙江、安徽和江西之间山区的起义所提供的，这些地区已经饱受过 16 世纪中叶的海盗入侵之苦。

经济的变化

363

14 世纪末，当中国经济还在遭受由反击蒙古人的战争和内战而引起的破坏之折磨时，大部分交易都是以实物进行的，国家的主要收入也来自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然而，在中国明代就如同自 11 世纪以来的情况一样，仍在发行纸币。国家试图以各种措施来强制推行宝钞的使用：1394 年用纸币收购铜钱、在 1403 年的交易中禁止使用白银和黄金、用宝钞支付官吏们的俸禄……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显得差强人意。无法兑换的纸币也像在蒙古人统治下一样迅速贬值。其价值于 1375 年被定为 1000 枚铜钱（一贯或一吊）和一两白银的大明宝钞，在数年之后就贬值三、四成了，而到 1445 年就不足一两白银的千分之一了。纸币的使用只能借国家及其官吏们的不公正行为和专断干预来维持。所以，虽然宝钞一直到 1573 年左右仍在流通，但早在 1450 年就停止发行它了，后来只很

少量地恢复过。最后，当帝国的存在本身受到了民众起义的威胁而其经济又正处于崩溃中的时候，国家可能最后一次使用了宝钞。在近代钞票发行之前，于中国印制的最后纸币可能发行于 1643 年和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次年之间。自大清帝国开国伊始，有关使用纸币是施政无能之标志的观点已成为一条约定俗成的信条。这样一来，中国在世界上首先采纳的一种国家制度又是在中国结束的。它在该国的历史中揭示了一种基本矛盾，亦即在一种国家经济与它无法控制并从多方面越出其范畴的贸易活动之间的矛盾。至于为确定支付手段的价值而相信专制措施的有效性，亦即由一种国家经济的悠久传统所强加给人的信任，则可能会被银钱的全面获胜彻底推翻。

从 15 世纪初叶开始，使用银锭的习惯在某些商业和输入银钱的地区也被强迫接受了，如在已用这种钱币交纳税收的广东。1423 年，人们发现这类支付扩大到了长江下游。那里的官府决定，为了交税，一两(tael，这是一个被欧洲人采纳了的马来文名词)合 36 克的白银相当于四石(也就是近 240 公升)粮食。白银的使用在 15 世纪下半叶到处扩大地盘。用白银支付的有：自 1465 年起各布政司的贡物、从 1475 年起的制盐工之税、1485 年免除工匠们轮流应差的徭役之税。从 1480~1500 年起，已经接受农民阶级也可以用交纳银钱税的办法来摆脱某些徭役。

364

因此，我们应该承认流通中的白银数量在 15 世纪期间大量增加了，而这无疑就解释了与这种金属的主要出口国日本的秘密交易以及地方生产的发展。经济的这种变化在西班牙人 1564~1565 年于菲律宾落脚并于 1571 年建立马尼拉城之后，伴随着来自美洲的大量白银而大大加强。当产品税在一段时间内被对矿山的固定税取代时，在进口的发展中可能又同时加入了 1590~1605 年间的“淘金热”的影响。

货币经济的这种发展似乎产生了重要后果，其影响在 16 世纪

时还可以被充分地感觉到。它最初促成了于1530~1581年间完成的税制改革,此种改革在1570~1580年间被系统化并被称为“一条鞭法”。这些改革的目的在于简化其复杂程序已经变成了无数弊端之祸源的税收手续,但它们同时也认可了银锭和从美洲进口的银币在中国经济中的全面流通。此后,几乎全部税赋就都用白银支付了。大家可以从这中洞察到了这种经济清偿法对社会的全部影响。

三、外患

在16世纪中叶,也就是大约是在从1540年至1560年之间,中国中原受到了其北部边境的蒙古人和整个沿海地区的海盗们的联合夹击。这些危及到了其独立的外部压力似乎是由一种限制交流的政策招致的,此种政策在海上交往中显得似乎与贸易活动的一种强大发展相矛盾。

蒙古人的攻势

蒙古人在1438~1449年间的推进,结束了中原王朝向北大举开拓的时代,并导致了一种维持现状的关系。他们自1540年左右开始发动并于1550~1552年达到了最激烈程度的一次大举进攻,最为严重地揭示了草原部族正趋向统一的发展,而一个游牧部族的新帝国正在形成危险性。大清王朝后来被迫于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发动了艰难的斗争,才排除了这种始终存在的危险。16世纪中叶的攻势是由一位似乎是具有伟大征服才能的蒙古首领领导的,这就是阿勒坦汗(安滩,俺答汗,1507~1582年)。他的祖父达延汗诞生于1464年,曾成功地将鞑靼诸部统一到自己的权力之下,并于1482~1525年左右统治了蒙古。在嘉靖年间(1522~1566年)初期,阿勒坦汗日益频繁地对山西和北京地区发动入侵。仅仅在1542年的一个月间,他就屠杀或俘虏了20万人,掠夺了100万头家畜和马匹,焚烧了数千幢住宅并践踏了辽阔的耕地。他于

1550年围困北京达三天之久，并于次年获许在山西最北端的大同和北京东北的宣化开放马匹市场。1552年，他在汉族起义军的帮助下夺取了山西的部分地区并占领了外蒙古的故都喀喇和林。他力图将其权力扩大到整个西域。阿勒坦汗于1559~1560年间夺取了青海，于1572年挫败了柯尔克孜人和哈萨克人，并于1573~1578年进入了西藏。他于1570年接受了与明朝皇帝的一项和约；蒙古人与中原人之间自1573年起建立了一种临时妥协。但新的危险很快又在东北部出现了。日本人于16世纪末进入朝鲜。而一种新的强大势力于16世纪初在位于北京北部的地区形成了，这就是很快就取名为满族的女真人。

海盗行为

中国在16世纪中叶面对着一种来自海上的严重威胁，这就是以“倭寇”之名著称的日本海盗（“倭”是一个用于指日本人的古老名词）。1540~1565年间，海盗的威胁达到了其最激烈的程度，而最危险的时代则处于1553~1555年之间，也就是紧接着在由阿勒坦汗率领的蒙古人的最危险攻击之后。海盗行为在当时无疑并非新鲜事，它似乎在历史上都以不间断的方式肆虐逞凶，而且似乎系由东亚的所有海洋民族所为：朝鲜人、沿海地区的中国人、越南人、马来人、苏门答腊人、爪哇人……所以，对于“海盗”一词不应该作狭义上的理解，即使倭人（日本人）自14世纪末到16世纪初叶形成了海盗行为的最大队伍也罢。这其实是一支多国部队，其活动极其多样化，以至于大家只好以“海盗”这样一个笼统的名字来称呼。我们在他们之中发现了一些“浪人”（如雇佣兵骑士一般的人物），他们都附属于松平大名和中国海岸，原是商人与海员。倭寇在16世纪中叶的首领是一名叫作王植的安徽籍汉人。他既是大商人又是海盗，与日本、吕宋、越南、暹罗、满刺加做交易，同时也从事用于制造炸药的硫磺以及丝绸和织锦的走私。他以琉球南部的岛屿

为大本营,使人感到如此恐惧以至被称为“净海王”。后来他被骗至杭州并于1557年被处死。但我们在海盗的队伍中还可以发现更为普通的人物:小规模走私商人、中国或外国血统的远海航船船长以及如同穿梭般来往于海岸与荒凉半岛之间的船民,那些几乎是荒凉的岛屿被他们充作中转站、仓库或巢穴了。最后,这种与走私贸易沆瀣一气的海盗行为在大陆上找到了大量同谋犯:船东和商人、贵族,有时甚至还有皇家官府中的官吏。 366

自14世纪末以来的发展十分明显:当时的海盗行为显得似与使明王朝的缔造者跟其敌对者对立起来的斗争有联系。洪武的某些逃到了日本岛上的敌对者在那里与日本海盗勾结了起来。在他们之中还有方国珍(1319~1374年)的旧部,这个令人大惑不解的人物同时把希望寄托在蒙古占领者和抵抗运动身上,而他的军队就是浙江沿海的走私犯和海盗。倭寇在1364和1371年间也出现在朝鲜。其中的某些人从这一时代起就冒险来到长江小港湾、前去抢劫崇明岛、苏州地区或更靠南的浙江与福建沿海的城乡。因此,从该王朝创立之初起就使人感到了威胁,而最早的防御措施正是从此时起采取的:组成一支战船队、统一海军的指挥以及加强山东、江苏和浙江沿海的防御。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布署,再加上明朝在日本的外交活动及其制海权,海盗们的袭击在15世纪的前几十年被平定了。但这些攻击从未完全停止过。明朝政府对其重视的证据之一是由军队组织本身提供的:军队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保卫从辽东半岛直到广东沿海地区。它并不仅仅是指保卫北京和满洲这些战略要塞地区,而且还要追捕海盗并确保防止他们入侵内地。

然而,海盗活动在16世纪时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高潮。大家似乎洞察到了这种现象的原因:它好像从根本上是与这个在从日本到印尼群岛的整个东亚海面从事的海上贸易时代之非常明显的发展相联系。明王朝针对这种发展却相反地提出了一种既缺少

连贯性又缺少坚定性的限制政策,这肯定可以由本质上既是战略又是经济的原因来解释。当控制不能充分有效的时候,一种统治的和国家整体性的经济就必然会导致这类外部纠纷。他们怎能巡视2000~3000公里的海岸呢?在那里正从事一种秘密的、利用群岛的、与一大批人员相共谋并在社会的不同等级相勾结的经商。同样的困难又随着欧洲人在19世纪上半叶的走私活动而重新出现了。官方的条例和贸易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强加给贸易的限制可能会使人联想到,中国恰在海上贸易最活跃的时代采取了一种孤立政策。如果说与日本的官方交往只能通过浙江东北端的宁波港来进行,那末福州则被专门用于跟菲律宾的交易(在1368~1374年间以及在1403年之后的永乐时代,泉州承担了一种类似的角色)。第三大港广州则拥有一个“市舶司”,担负着与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发展关系的使命。与此相反,私人贸易则根据当时的规则而以或公开或秘密的方式沿漫长的海岸进行。所以,厦门附近的一个非常活跃的港口海澄就既与日本和琉球又与满刺加和摩鹿加(位于苏拉威西和新几内亚之间)经商。在于16世纪的东亚海面上非常活跃的所有贸易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在日本和中国海岸之间所从事的贸易,它主要涉及到了黄金、白银、铜钱和丝绸。这样就可以解释当时“倭寇”活动重新猖獗的原因了。

但另外一种因素似乎曾经促进了海盗活动的发展,这就是中国内地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以及最低下阶级的地位的恶化。走私和海盗活动最具有吸引力,就如同它们的灾难最深重和利润最高一样。大家已经看到,它们形成了与以不同的秘密程度开采矿山属于同一类的活动。皇权的犹豫不决、反复无常的宽容和不妥协的态度,也同样既扩大了海盗活动,又引发了矿工们的叛乱。

倭寇于16世纪中叶加剧袭击的直接原因,是与日本官方关系的恶化和明朝政府当时为遏制秘密交易所作的努力。过去,日本的使节自永乐年间(1403~1424年)起曾非常有规律,现在却每10

年仅接受唯一的一个使团，而其船只的数目也被限制为 2 艘，使者的人数亦被限制在 200 人以内。这些数字于 1432 年被提高到 3 艘船和 300 人。但事实上却会经常超过这些数字，而使节也要比规定所允许的来往次数更为频繁。尽管明王朝决定停止遣使，但人们在 1432 年之后的数年中还总共计算到 17 个日本使团，故官方交往的规模似乎仍相当大。日本人利用遣使的机会，在每次旅行时都把多达数万把的东洋刀从日本输入中国，同时还输入数千万斤的硫磺、作染料用的冷杉木、扇子等等。至于返程的运载货物，则主要由丝绸、书籍、绘画和铜币组成。

我们还应该顺便指出这些使节在中国影响日本的历史中的重要意义。这些使团的成员中包括不少日本佛教僧侣，他们有时也负有官方的使命。这些僧人往往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不仅关心佛教，也热爱中国的艺术、世俗文学和哲学。直到 1403 年，一直允许他们拥有在中国行走和居住的完全自由，而且在永乐年间还允许他们在那里居住了整整一年。由于这类遣使，共有 100 多名日本著名高僧于 15~16 世纪间前往中国，在从宁波到北京的路上先后访问了杭州、苏州、淮河流域、天津，广泛地与中国文人接触。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佛教高僧大师们也利用出使的机会被派往日本，从而促进了当时的中国文化在日本国的传播。我们还要指出一位原籍为浙江名叫宋素卿(? ~1525 年)的中国富商，他与日本做生意并于 1510 年定居在那里，后曾于 1523 年作为一个日本使团的成员在宁波登陆。部分是由于官方的关系和通过佛教高僧的媒介作用，一些中国的著作、书画才得以收藏于日本。

然而，明朝与日本之间的这些关系约在 1552 年起恶化了。就在这一年，中国中央政府面对海盗攻击的再次爆发而决定终止它在 15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所采取的宽容态度。次年，两个日本使团之间在宁波发生了争论，二者各自都企图被承认为合法使节。而被中国当局拒绝承认其官方性质的那个使团则抢劫了该城，这些

第三章 近代中国的开始和明末的危机

一、城市的复兴

使用银锭的货币经济的普及推广,似乎冲破了由明王朝缔造者建立的体制,同时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全面多变性。它造成了自从16世纪初叶便出现并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深刻的变化。

大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高潮

从1520年左右起,直到那时之前始终受土地吸引的资本却离开了土地而转向商业和手工业企业。土地的价格不停下跌,在16

混乱更加鼓舞了强硬派的支持者。1530年,日本人不再被允许向宁波遣使了。海盗行为在这个时代得到了迅速发展,其成员的征募扩大到了中国内地。海盗们的主要基地位于浙江海岸东北部的舟山群岛、厦门地区和泉州、广东东北部的潮州以及日本群岛的南部列岛。从山东北部直到广东西部的中国全部海岸,甚至深入到内地100多公里的地区都受到了蹂躏。在长江以北的富裕而又人口众多的地区,海盗们径直进入到南京和安徽省的南部。对海岸的防卫很难确保,以至于官府被迫征集渔船。只是在1553~1555年的大规模蹂躏和屠杀之后,明朝才开始组织反攻。1556年,在浙江海岸形成了一种相对和平的局面。次年,继胡宗宪将军发动攻势之后,又在福建恢复了和平。但中国海岸实际上只是继俞大猷(?~1573年)和戚继光(?~1587年)于1560~1570年间的军事行动之后,才摆脱了海盗活动。

海盗们于16世纪中叶的入侵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但对当时危局的反思也加强了国家政府控制外国人和限制私人贸易的传统倾向。

世纪最后几年间突然彻底崩溃了。这种现象在南方沿海省份和位于杭州与江西东北部之间的地区特别明显；其实，也就是在以银锭和进口银币为基础的货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经济的危机与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的发展高潮已同时发生。那些受倭寇入侵的地区同时也是与日本、菲律宾、暹罗、印度尼西亚等从事走私贸易的地区。然而，看来很可能这类贸易在 16 世纪期间从未停止其发展，尽管官方发布了禁令，而且在沿海地区还呈现出了不安全的局面。控制和危险反倒增加了走私财产的价值。某些商船被装备起来以抵抗帝国海军的攻击。在内地，传统农业的困难引起了小职业（贩运、制造漆器和竹器、墨、笔……）的剧增，同时也引起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经济作物（工业原料作物）的发展，如棉花、植物油、靛蓝、甘蔗、烟草等等。那些向矿山迁移或加入海盗和走私圈子的最贫穷的农民，也在向城市迁移，试图在小商业和手工业中就业，作为仆人而受雇于富裕家族，或在官府中成为其数目不断增长的小吏。小作坊变成了大型的手工业企业，其中一些雇佣了数百名工人。大批农民受雇于上海西南淞江的棉织造厂。根据当时的记述，织造行业中的工人已经成为被认为是工业化时代之特征的一般劳动力。当时已存在着一个按职业区别的劳务市场，熟练工在那里被以高薪录用，而其他入却形成了一支贫困的劳动力大军，等待着被雇佣于大作坊的外围。中国手工业的某些部门确实是从 16 世纪下半叶开始就具有某种工业生产的特征了。丝绸和棉花织造、瓷器和冶金业作坊的情况即如此。我们在那些主要的私营或官办企业中应该提到：鄱阳湖东面的景德镇，那里建造了许多瓷窑；大棉纺中心淞江；当时的原材料产品（淞江附近和杭州以北的辽阔耕地面积都被栽培了棉花）尚不能满足它的需求；还必须从河南和河北运来其中的一部分原料；以其豪华的丝绸而著名的是苏州；位于长江沿岸南京上游的芜湖是个专门从事印染的城市；位于河北省南部的磁县是冶铁厂的巨大中心……人们在 16 世纪末建于江西的 30 多

家造纸厂中,总共可以计算到 5 万多名工人。

中国丝绸在日本能够以高于在中国 5~6 倍的价格出售,这就解释了中国与日本群岛之间贸易的规模。整船的瓷器离港驶往长崎。于 17 世纪由荷兰人在福建和浙江采购的茶叶开始向北欧出口。如果大家相信顾炎武(1613~1682 年)所说的情况,那末海上贸易商品就要被课以 20~30% 的税,而这可能会抵销国家于 16 世纪末的半数开销。

技术的发展

明末出版的大批技术著作揭示了某些手工业技术的明显发展:带 3~4 个线轴的丝绸纺织机、棉织机的改进(棉织品衣服自 14 世纪以来使用得很普遍)、三色和四色的木版套印方法(后来在 1573~1619 年的万历年间则为五色)、出版业引人瞩目的进步、在松江为铸活字而发明的铜和铅的合金、白糖和冰糖的制造方法。人们所知道的明代瓷器那令人震惊的成功,尤其在宣德和成化年间(1426~1487 年)更是如此,因为当时还未因大批产品(其中一部分经海上外销)的需要而引起器皿质量及美观性的某种倒退。

但技术的进步并不仅限于手工业部门。它们也涉及到了农业并使它得以多样化。明末出现的农业技术论著描述了新的田间耕作、灌溉、播种以及加工农产品的新机器。改良土壤的方法、选择新的品种,尤其是引入新的农作物等一系列做法在明末导致了农业技术的全面发展。先是葡萄牙人,后是西班牙人于 16 世纪期间在华南海岸港口经商,并把来自新大陆的作物传到了中国。其中的作物之一是花生:从 1530~1540 年间起它就种植在上海的沙土地中。花生在 19 世纪成为山东地区居民们的基本食物之一。1563 年在云南首次提到的白薯似乎是经西南和海路传到那里的。于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叶,白薯在云南广受欢迎;由于它效益很高,所以取代了中国的芋头。白薯也如同花生一样适应于土壤贫瘠而灌溉

条件又不好的土地,它在18世纪时成了福建和广东人的一种其地位可与大米相比的食物。另外一种作物——高粱在更为古老的年代就已为人所知了,它似乎是经缅甸之路而传入中国的,并在15~16世纪期间广泛传播。唯一的一种美洲作物是玉米,它与烟草从17世纪初叶开始传播,但其速度不如花生和白薯快,对它们的种植只是在我们今天才变得重要了。

这都是一些辅助作物,种植它们可以利用一些比较贫瘠的和尚未开发的土地。这些新作物的收成可以帮助过冬和丰富食谱,但尚未引起18世纪的那种农业大革命,大家可以认为它们的传播影响从明代末期就已经开始令人深深地感受到了。

我们最后还要指出,在16世纪时出现了一种地区性的经济专业化。自新石器时代末期直到公元7~8世纪,从渭水流域至黄河下游并向东扩大到整个中原的弧形地区,是小麦与谷子的大种植区。其优势从9~10世纪起又转向了长江下游乃至从淮河流域到浙江北部的水稻种植区。这些地区不仅仅能够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而且还可以向中国北方提供一部分剩余,所以它们曾在宋代、元帝国和直到明代的前半叶都扮演过一种重要角色。然而,做为大米的重要出产和外销区的这种角色,在15和16世纪期间转移到了长江中游的两个布政司,也就是湖南和湖北,而在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却偏爱商业和手工业。

与明代的人口普查所说明的情况相反,洪武年间(1368~1398年)之后的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代,一切都会使人联想到中国的人口在14世纪末和17世纪中叶之间稳定地增长。某些史学家们提出,明王朝初期的人口为7000万左右,而在其末期则为1.3亿。这一切均属可能,因为这种增长似与在16世纪时产生的经济高潮和农业发展相吻合。

市民和商人的新社会

自1560年起,继蒙古人攻势和倭寇袭击时期之后,便是明朝历史上最有政绩的时代之一。万历年间(1573~1619年)的整个第一阶段(1573~1582年)都特别繁荣,但到了万历末期,社会的活力和矛盾又带来了直到满族入关结束以前始终具有的一种特殊意义。中国社会史上这一时期所发生的急速发展也表现在社会变迁之中:一个无产阶级和一个市民小资产阶级形成了,农村生活变化了,农村生活中渗透进了城市的影响,大商业阶级和商人的地位也在上升,山西的易钞商和钱庄老板都在北京设立分号,湖南洞庭湖地区的富商、在福建南部的泉州和漳州于海上贸易中致富的船主们,特别是新安(今歙县,安徽的南部)的巨商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这可以使人联想到欧洲资本主义初期的商人,如果其思想情感、社会和政治地位不是那样相差悬殊的话。最富裕者应该将其财富归于他们介入了国家经济活动并扮演了军需供应商的角色。商业交易涉及到了重要消费品——大米、盐、粮食和布帛。山西的银号钱庄老板在清代将其业务扩大到了外蒙古和西域,并与后来介入了整个长江流域的新安商人分享了交易和金融活动。

374

但这种发展也表现在文学体裁、思想和知识的发展与复兴之中。从16世纪末叶起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危机,而这些危机似乎又是因为在维持一种本身就是与其时代相矛盾的专制和集权的政治制度时,它最终由于满族的入关和占领而受到了损害。明末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史给人一种印象,认为它于此时产生了一种如同是中国的第二次“复兴”的现象,但却被外来征服所中断并于后来又走上了新的道路。

二、最后50年的危机时代

在由蒙古人的进攻和倭寇的袭击引起警觉之后,一种使人感

到相对安定的局面随着外来危险的淡化而形成了。以隆庆年号(1567~1573年)的名称掌权的皇帝是一位开明的专制君主,颇为关注社会公正和改革。在他执政期间开始执行的政策一直持续到万历年间(1573~1619年)初期;压缩宫廷开支、保护受大地主剥削的小农、疏浚黄河和淮河的河道。一名刚正不阿和政绩昭著的官吏张居正(1525~1582年)在万历幼年期间事实上受命主持国政。但在张居正于1582年逝世之后,太监们重新夺取了他们过去已失去的权力。国家财政的放任自由和迅速衰落又重新出现了。

财政危机

皇宫挥霍无度。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宫廷的豪华了,这就是1584~1590年间为万历皇帝建造寝陵一事。该陵墓是被偶然发现的,并在1956~1959年间作了发掘。它的建造耗银800万两。其砖头都是从山东西北的临清经大运河运去的,其石块来自同一省的一座大山,而用做支架的木料都是四川和西北诸省的雪松。但是在宫廷的奢侈开支之外,很快又增加了由外来危险所引起的开销。同时在1592年间,黄河上游附近宁夏地区的蒙古首领哱拜在制造分裂、贵州遵义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叛乱,而日本人丰臣秀吉将军(1536~1598年)则率兵于朝鲜登陆。明王朝于1595~1598年间对日本军队发起的长期军事行动以有利于中国的方式而结束,但它却耗尽了国库。20年之后,在与日本人作战时曾帮助过明朝军队的女真王子努尔哈赤反戈进攻明朝,而中国中原再也无法于东北诸省中对其作出有效的抵抗了。

375

1593~1598年的朝鲜战争共耗去国库白银2600万两。然而,这次战争的结束并未减轻17世纪初叶军费开支的压力。晚明的军队是一支雇佣军,它具有过份庞大和缺乏战斗力的双重弊病。兵员人数自14世纪末以来增加了一倍,但与这种增长相对应的却是军队素质的下降。利玛窦(Matteo Ricci)在其写于17世纪初叶的中

国札记时,对这个时代的军队作出过严厉的批评。他写道:“所有那些应征入伍的人都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既不是出于对其国家的热爱,又不是由于忠于其国王,更不是由于对名誉和荣耀的酷爱,而是由于受为供职者效劳的约束才从事这种职业的。”根据利玛窦的说法,王师的马匹是蹩脚的劣种马,只要草原马匹的一声嘶鸣就足以吓跑它们。军队就如同是社会的一个垃圾收藏坑:懒汉、扒手、无恶不作者和拦路行劫的强盗等等都去从军。

财政亏损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向皇室成员支付年金而造成的。洪武皇帝的24个儿子均被剥夺了全部权力,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篡权的危险。但他们反过来却享有辽阔的采邑封地,并在北方诸布政司拥有牧场,而且占有3000~19000名私人护卫并为之支付丰厚报酬。这个皇家贵族逐代地增加,以至于到明末大幅度地加重了国家预算。仅仅庆成的一个王子就有94位直系后裔。在万历统治时代(1573~1619年),共计算到每年领取年俸1万石(相当于600吨左右粮食的银钱)的一级宗王45名、级别较低的贵族23000名。在山西和河南的税收(74万石)中,共有半数以上(40.4石)被用于支付这种年俸。这种局面可能在1573~1628年导致了停止允许宗王婚配和封敕贵族尊号。

明朝政府从16世纪末起遇到的财政困难迫使它采取了一些大部分都只能加重社会苦难的措施。为了补偿因为在这个时代似乎颇具规模的遗弃土地现象所造成的亏损,明政府又加重了商业税,在长江和大运河上增设了一些收税关卡,从而使农民的负担更不堪忍受了。商业税的暴涨导致了手工业企业的一次危机。在山东临清,73家布店中的45家、33家绸缎店中的21家都于17世纪初叶被迫倒闭关门。城市中工匠们的暴动也日渐增多。1596~1626年间,在直到那时为止始终都是最活跃的地区中,如在苏州、松江、杭州、北京和所有重要的手工业中心,几乎每年都出现市民

暴动。1603年，位于北京以东^① 30公里处的门头沟私矿中的矿工向首都进军以示抗议。既由于紧缩措施和解雇国家职员又由于税役猛涨而加剧的不满情绪，可能导致了1627~1644年的大规模暴动；在此之前，于1621~1629年间，由于强行征兵而在云南、四川和贵州边陲地区也引起了非汉族居民的大起义。

政治危机

1615~1627年又以一场严重的冲突而引人注目，这场冲突中的对立双方，一方面是由清廉刚正的官吏和忠诚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集团，另一方面是太监们的秘密权力、以在宫中的阴暗处策划的阴谋诡计为基础的权力、在宫廷内外勾结起来的共谋以及一种由于腐化和恐怖而变得很驯服的政权的消极性。集中了这些出身很复杂的人员的党派是以那些“书院”为中心而形成的，而这些书院在明末往往都是文学和政治自由争鸣的中心。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要追溯到12世纪，它是由福建的一位名叫杨时(1053~1135年)的文人官吏创建的。它于1604年被恢复，变成了反对派的主要中心之一。其成员都是具有独立思想的文人或被罢黜的旧官吏，他们学习了《孟子》中的反专制思想，并用正统的理学的政治和伦理准则来反唇相讥朝廷和中央政府。这类行为在直到满清入主中原前的历史上都是经常不断的。被西方人夸夸其谈的“儒教”往往更多的是反对派手中的武器，而不是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东林党的支持者首先是立足于合法性和习惯的正统性立场上的。

万历末年，三个与皇宫有着密切关系的事件使得群情激荡并制造了危机。这就是1615年的一次据认为是刺杀太子的未遂事件(挺击)、1620年的被怀疑系由太监们毒杀的泰昌皇帝的令人置疑的晏驾(红丸)、太监们于同一年对于一名旧嫔妃的离去而做出的

^① 原文如此，门头沟应位于北京的西部——译者。

对抗(移宫)三案。某些人自信从这些案件中已经看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太监魏忠贤的插手。史书中记述说,魏忠贤(1568~1627年)曾是一个地痞无赖,他为了偿还赌债而入宫,坚信这样就能在宫中谋到一个职位。他自幼不识字,却由于后来的天启皇帝(1621~1627年)之乳媪客氏的支持而迁升司礼。1621年,在新皇嗣立时,他又治皇祖陵。那些其权威在万历年间的一段时间内曾获得承认的东林党成员,于天启初年又恢复了权力,但他们的影响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魏忠贤组织了他的同谋网并很快就借助于秘密警察而控制了整个政权。从1625年起直到天启皇帝晏驾,爆发了对东林党成员及其同情者的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镇压,他们中许多人都死在狱中。发表了一份包括700多名高、中级官吏的《占将录》,它造成了一种全面迫害。曾作为反对派中心的书院被关闭。魏忠贤曾设想在所有地区都为自己及其邪党颂德立祠,谓之“生祠”;其中第一座是为了纪念浙江布政司潘汝楨而立于杭州西湖畔的,而且每座建筑都耗资巨大。为了增加其势力,魏忠贤成倍地委任亲信和大批假想的官吏,而腐化行为也就日重一日了。这名可怕的太监在明代末帝(1628~1644年)登基时被诛,而东林党则被平反昭雪。在苏州,随着又被称为“小东林”的“复社”(它显得是一个政治—文学圈子)的出现,东林党也显示出了一种复兴。它后来共包括2000多名成员,其中近四分之一是官员,但他们在施加了某种影响之后又被从政权中排挤出去了。

1615~1627年间的危机在这个时期的数代人都产生了深刻的政治、伦理和文化的反响,并导致抛弃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哲学——王阳明(1472~1528年)的哲学,因为它过于脱离政治的具体问题了。人们由此而对与其文化传统相矛盾的专制制度提出了质疑,并最终酿成了一种思想上的混乱,而它又是由满族入关引起的更大混乱的先兆。

人民大起义

除了政治危机和国库的悲剧性亏损之外,从1627年起又增加了女真人在蒙古和辽宁地区以及人民起义的威胁,后者的发展可能最终导致了该王朝的崩溃。

从1627~1628年起,连续干旱造成了一连数年歉收,从而在陕西的农民阶级中以及在该省的给养不足的北方的军队中引起了混乱。动乱迅速地扩大到山西、渭水流域和四川。政府在开辟财源的同时于1629年决定遣散被派去守护驿站的部分军队,而这项措施又在帝国的西北激起了新的起义。1636年左右,中原、北部和西北诸布政司都摆脱了北京的控制,各反叛首领不但与皇家军队作战,而且彼此之间也在相互冲突。最后有两位首领得以立足并消灭了其对手:李自成,原是一名羊倌,后来进入驿站而成为驿卒,他占据并统治了整个中国北方;张献忠(1606~1646年),原为延安籍的一名士兵,他控制了长江流域和四川。

从1640年起,李自成获得了一种稳定的地位。他把两名旧“举人”(在乡试中得中者)李岩和牛金星争取到了自己一边,他们为他带来了吉兆并且直到最后仍为其出谋划策。1644年农历正月,李自成自立为大顺王并建立了一个正规的政权。他当时拥有步兵40万和骑兵60万。三个月之后,他进入了北京,而崇祯皇帝在那里自缢于皇宫以北的煤山。此时,统帅已撤退到河北与辽宁之间的山海关并抵御着满族军队的王师的吴三桂将军,便与后来的入侵者相勾结,并向首都进军。李自成从那里逃回西安,并于1645年在西安称帝。他后来继续向南撤退:襄阳、武昌、岳阳。最后他撤退到了湖南西南部的一座小城,在那里为两位农民所杀。他们将其首级奉献给了追赶他的军队的指挥官。其侄李过出于孝道而用一颗草头补全其身并葬之于罗公山脚下。

当李自成在中国北方扩大其帝国的时候,张献忠则占据了江

西、湖南、广东和广西的北部。就在李自成于西安称帝的同一年，张献忠也在成都自称为王。其军队于1646年被清军击溃，他本人也在其京都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被杀。虽然李自成和张献忠两人起义的目的都是为了推翻现政权，但他们的性质却不尽相同。李自成依靠的是在中国北方的人数较多的小地主阶级和没有财产的知识分子。他占据了地盘并建立了政权。张献忠相反却活动在大地主地区，依靠着民间苦难最深的阶层，并以恐怖进行统治。富裕地主、贵族和皇家官吏均被其杀害；张献忠因其对豪华的仇恨而毁坏了全部财富。他解放了所有那些因其经济地位而沦落至附庸地位的人，并创设了一支女兵（婆姨军）。大家可以理解四川的富户对他怀有的仇恨，他们在清军到达时建立了一些反动的民团以支持入侵者。张献忠与入侵者作战两载，于1646年战死。他的一位名叫李定国的部将又转入云南，在那里坚持抗清直到1662年左右。

满族的威胁

379

遭到入侵前夕的明帝国的形势，解释了满族人何以未费吹灰之力就能入主中原并在那里夺取了政权。一切都对满族人有利：全面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经济的崩溃、由于皇帝的自杀而使中央政权的恐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为保卫京师而驻扎在河北的军队软弱无力、最后是中原人的分裂以及入侵者在部分民众中找到了同谋者。在上层社会中，许多人都更愿意与外部的敌人结成一种他们希望是权宜的联盟以期战胜人民起义。某些人甚至长期以来一直与中国的未来征服者保持着接触，准备与之合作。吴三桂的情况并非绝无仅有的例证，正如明军的另一位将军洪承畴（1593～1663年）的经历所证明的那样。洪氏曾于1634～1638年间积极地参与了镇压李自成军队的战争，后于1639年应召保卫京都以抵御女真人的威胁。他于1642年被俘，归附于满族人的旗帜之下。

从战略观点来看，满族人的主要胜利是在1621年夺取沈阳

(盛京)和辽阳、1642年夺取直到山海关的满洲这两件事之间获得的。事实上,明帝国在东北的防御体系是由河北、辽宁和山东(辽东半岛和山东的北海岸可以借24小时的海路联系起来)三个布政司组成的。与朝鲜的结盟有助于该地区的安全。但这些防御体系很脆弱,因为在满洲平原上没有任何天然屏障,而山海关又是河北与辽宁之间的唯一一条通道。为了弥补缺乏天然屏障的不足,明王朝在从鸭绿江的出海口西部到北京以北300公里处的开平之间设置了一道防线,而另外一条防线则从山海关到吉林。这些“柳条边”是由为阻止女真骑兵所挖的壕沟和所栽的柳条篱笆组成的。这类防御的失败以及辽河流域的被占领,把北京置于入侵者的直接威胁之下了。

380

第四章 明代的文化生活

381

人们无法对一个开始于我们的中世纪末和结束于路易十四登基的特别漫长时代作出全面的判断。方法上的错误和无知有时会导致抨击这个时代,把它看成一个文化贫乏、在艺术和文学领域中只有缺乏独立精神之模拟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后阶段也是中国社会的文化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时代。它经历了一种小说文学的奇特发展、一种在语言训诂方面的学术考证的开端、一种思想新方向的开始、对实学知识的一种新兴趣以及自由和新奇的思想。这后一阶段的新生事物可能在清代一直延伸到17和18世纪。但在这个漫长朝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专制主义和正统的有害影响互相配合而窒息着思想的自由发展。

一、正统派和独立派

382

发展时代的最大荣耀是15世纪初叶奉钦命编纂的一部卷帙浩繁的各种著作的文集,它以《永乐大典》之名著称。这项工程开始

于1403年，四年之后始告结束，其中共包括22877卷书。虽然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不大经心，但该丛书仍显得极其宝贵，它于18世纪末曾供名为《四库全书》的另外一大套丛书的编纂者们使用过。《永乐大典》的一部稿本确实于1772年由翰林院获得。这部独一无二稿本的绝大部分可能是在1860年英法联军于北京从事抢劫和放火焚烧的时候被烧毁了。剩余部分已失散，今天残存的远不到最早稿本所包括的11095册中的60册。

在刊行出版和文献汇编的领域中，中央政权的事业是一个似乎特别平淡无奇时代的最重要事件。在哲学领域中，他们仿效蒙古人于1313年的做法，从1384年恢复科举时便采纳了理学正统。这种学术思想体系就相当于我们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繁琐哲学或经院哲学，它的发展随着1415年宋代哲学文集《性理大全》、疏证《五经》和《四书》的两种教科书《五经大全》和《四书大全》的问世而加强了。这批著作中的第一种汇集了周敦颐（1017～1073年）、张载（1020～1077年）、邵雍（1011～1077年）和朱熹（1130～1200年）的一些重要著作。

心学派的发展

然而，朱熹学派在当时占据着突出地位，他的诠释疏证被认为是科举中的唯一正确者。但这并不能阻止独立思想潮流的发展。这就是人们可能是错误地称之为“直观主义者”的人，也就是“心学派”信徒，他们与“理学”派信徒相对。心学派形成了一个思想家的系谱，该世系于16世纪初叶先传到了王守仁（王阳明）后传到了其弟子们。这场离经叛道的非正统运动诞生于那些拒绝进入仕途的具有独立倾向的文人中。这就是吴与弼（1391～1469年）和胡居仁（1434～1484年）的情况；陈献章（1428～1500年）的情况也属此类，他是一位过着隐居生活的广州人，坚持禅宗佛教徒式的静修和“静坐”。他阅读的著作也不大正统，包括小说、佛经和道藏。陈献

章率先对当时的主流派哲学采取了一种后来所有在明代试图摆脱正统控制的那些人的典型姿态，大家于16世纪末在李贽身上发现了这种态度。这种态度主要是参照其他(民间和宗教)传统，而不是文人传统。

最经常被以其号王阳明(1472~1528年)而称呼的王守仁，既属于这个世俗隐修的派系，又属于朱熹的对立面和同代人陆九渊(1139~1193年)那一派。王阳明重复了陆九渊的基本论点：理(天地和万物之秩序，内在之理)并不是一种心理之外的天理。受佛教玄学影响非常明显的朱熹成了一个坚定的理学派(格物致知，先知后行)，而王守仁则认为“知行合一”。其哲学的最重要概念之一是“致良知”，这是他借鉴自《孟子》的一句话：“人之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的心学在于恢复知的原始无差别状态，人与天地的差别出自坚信自我和物利。唯有圣贤才向理敞开，才能在他能够维持的最初无邪状态中做得既无主体又无客体。所以，某些诠释者在称王守仁为主观唯心论者时，无疑是犯了一种错误，虽然其哲学是受“正心”和“致良知”的主宰。

这种倾向与那些大家可以认为是对社会和政治观点之反应的观念相吻合。王守仁希望能够把村社从其崩溃中拯救出来，在他那个时代，高利贷、富豪官吏与其代理人的压榨剥削以及经济变化本来就正在瓦解村社。他为此目的而设计出了一项直至在具体问题上都向前推进的改革计划：一些以“乡约”为基础而建立的“十家牌法”，安排一位保长及其助手们主持之；这是一种村社的自我管理法，包括一种收支帐目，并要求团体对其成员思想进行控制(公开赞扬和指责)、在一种忠诚誓言下举行公开集会，每个人都于其中自发地自责其错，以及对于揭发告密者进行保护。这位哲学家看来，在一个货币经济、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开始打乱传统的范畴并挑起了一种全面的不稳定状态的时代，这正是使思想、经济和政治复兴的手段。

二、1550~1644年间的“文艺复兴”

如果说于16世纪初叶开始的发展解释了王守仁在政治和伦理方面的不安,那末它却并非与其哲学的深远倾向无关。从他死后开始时代的更激烈的变化、社会的不稳定性以及明末的危机,都成了于该王朝最后一个世纪在大部分领域中出现的文艺复兴的背景。中国的这第二次“文艺复兴”不仅以其内容本身及其新颖特征,而且还因其直到当代仍会使人感到的影响而值得特别注意。它孕育着在17世纪下半叶和下个世纪的哲学家中得以充分发展的倾向。

与王守仁相联系的是所谓的左右两派。第一个派别被认为始终忠于该大师的教义;但带有抽象思辨倾向的第二个派别在它那里却占据着统治地位,它在满族人入主中原时形成了一种实证主义反响之源。第二个派别相反却代表着它的一种极端主义的偏差。在左派的支持者中有王艮(1483~1541年,原是扬州地区的一名坚持自修的制盐工)、1498~1580年的王畿、1515~1588年的罗汝芳和1527~1602年的李贽,他们的思想重点置于自发性和反传统性方面。禅宗佛教的影响在这些从与文人格格不入的传统中寻找灵感的人们中间十分明显。

反传统主义

李贽的情况可能是最有意义的。他诞生于福建的一个过去曾归化了伊斯兰教的旧商人家庭,其先祖中的某些人曾作为通译而于15世纪期间参加了中国商人赴伊朗的旅行,而其中之一曾于1437年访问了霍尔木兹并在那里娶妻。这种血统可能解释了李贽的好奇心和思想的自由性。李贽既不相信他怀疑具有虚伪和晚期特征的那些有关上古时代的传说,也不相信已经被训诂学家们打开缺口的经典的真实性。他的某些朋友很关心由欧洲人传入的新

鲜事物、相信利玛窦翻译并于1596年在南昌刊布的译著《交友论》和《天主实义》，他本人也曾三次（其中有一次是于1599年在南京）会见过这位耶稣会传教士。该传教士因李贽与佛教僧侣界的关系而怀有戒心，所以并未试图与他作更广泛的交往。李贽是通俗语言文学的业余爱好者，他曾评点过《水浒传》，突出了那些具有侠义感的草寇；他还点评了《三国志演义》，高度评价其中的军事策略和战斗故事。某些近代专家认为李贽的影响可能比《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身上表现出来，后者那无视正统观念的狂热激情与李贽的思想相当吻合。他确实对袁氏三兄弟施加过某种影响（袁宗道，1560～1600年；袁宏道，1568～1610年；袁中道，1570～1623年），他们是所谓“公安派”诗体的发起人，也是一种简练、直接和接近口语的语言的支持者，反对模仿古人的模式。李贽对著名武夫和草寇的钦佩赞赏以及对战略问题的关注，也与当时被普遍接受的理念背道而驰。李贽严厉批评对倭寇采取的防务政策，并且还揭露了它对贸易和民众的灾难性后果。他觉得由雇佣兵组成的政府军缺乏战斗力，而自动组织起来的民壮（民兵）却表现了其抵抗力。但他尚未发展到既对弱者和受压迫者（女子、受到官府刁难的少数民族）充满保护热情、又对违背了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的佛教和道教著作充满强烈兴趣。

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作为某些激起公愤的著作的作家和具有自发倾向的哲学家的李贽会招致众口一词的反对。他由于其思想的独立性和反传统主义，完全成了城市发展和新鲜事物与传统之矛盾的时代的著名人物了。

在17世纪上半叶的危机时代，再未出现过像李贽那样新奇的人物。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此时的政治反思在改革派阵营中得到了深化。清代初期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史学家均出自这些人中，均为东林党以及继它之后的复社的成员。

科学新思想和实学新兴趣

一种具有科学特征的新思想方向可能以不同程度的松弛方式与李贽的反传统主义以及他对待经典传统的怀疑态度联系起来，而这种经典传统在中国社会中扮演过类似于基督教传统在西方扮演的那种角色。

386 人们一般都把创造一种文献和历史考证的科学方法归功于顾炎武(1613~1682年)以及18世纪的那些大训诂学家们。事实上，人们可以把清代训诂学派的起源上溯到16世纪。从1543年起，梅鹗就揭露了历史经典《古文尚书》的伪作特征，认为它应断代为汉代。陈第(1541~1617年)是最早触及到历史语音学研究问题的人，这些问题于稍后由顾炎武在其《毛诗古音考》一书(1606年)中作了充分发挥。我们应该把第一次在字典中将汉字分为214个部首(偏旁)的做法归功于梅膺祚，这种分类从其时代起就变成传统了。该字典即《字汇》(1615年)，其中共收33179个汉文方块字。

在宋末和元代曾被大量学习研究的数学，在明代似乎遭到了遗弃，此种情况直拖到耶稣会神父们和其中最著名者利玛窦重新引导大家注意数字科学的时代为止，他们于17世纪初叶起引发了对中国数学及其历史之好奇心的一种复兴。但天文学和历法科学在16世纪仍是人们研究和出版的内容。宗王朱载堉(1536~?年)热衷于数学和律学，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确定了平均律的人。事实很可能正如李约瑟指出的那样，由1584年出版的其《律学新说》所阐述的研究成果成了欧洲在1605~1608年间出现的平均律的来源。

但当时的新思想主要表现在实用知识领域中。数目相当多的具有技术或科学特征的著作在明末问世了。它们几乎涉及到了知识的所有分支(药典、植物学、农业、手工技艺、舆地学……)，并且无疑表现出了在16世纪实现的一些进步。

《工部厂库须知》(1615年)是有关中国技术史的最丰富的资料宝库之一。紧接着它的便是于1637年出版的《天工开物》，这部图解著作也全面论述了农业以及纺织、瓷器、冶金、漕运、兵械、笔墨和纸张等等技术。王徵(1571~1644年)在其诸多著作中描述了由他发明的大量农业、水利和军事机械。他也与德国耶稣会士邓玉涵(Johann Schreck)合作写成了《远西奇器图说》一书。在明末也出现了大批农业论著：马一龙(1490~1571年)的《农说》、有关明末浙江北部平原之农业方法的《沈氏农书》、《农圃六书》(1636年)，特别是利玛窦的弟子和欧文科学著作的翻译家徐光启(1562~1633年)的《农政全书》，后者是有关中国农业技术的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其中也包括有关西方水利技术和地理的资料。

在16世纪初叶和17世纪中叶发表的医学卫生(保健学、营养学、针灸学、妇科学等)和药学著作中，我们应该特别提及李时珍388(1518~1598年)的植物学和药草志的不朽巨著《本草纲目》。这是一部于1552年开始，经过16年的艰苦工作而于1578年完成的内容非常广泛的著作，共包括对于可作药用的1000多种植物和1000多种动物的记述，在1596年配以精美图版而刊印。我们于其中发现了对一种种痘或接种术的首次记载，其基本原理与后来在西方产生了免疫学的那种方法没有多少差异。

军事科学同样也证明了技术的这种基本发展，17世纪初叶的一部如同是于11世纪中叶的宋代问世的名著《武经总要》之对应本的军事艺术名著出版于1621年，这就是茅元仪的《武备志》。他提供了有关火器的资料，并利用这一大好机会而于其中重提这类兵械从其开始在中国发展(10~13世纪)的时代起的历史。中国式的火炮在明代仍保持了一种重要角色，它们在1407年的越南事变中曾被广泛使用。威力更大的新火器(炮和轻武器)从德国修道士贝特霍尔德·施瓦茨(Berthold Schwarz, 1310~1389年)的实验开始而在欧洲被改进，此后它们可能是由葡萄牙人在16世纪期间

传入了东亚。它们在中国不大受重用,因为那里的人始终都依恋和重视传统类型的白炮,但它们却在日本获得了巨大成功。曾在16世纪中叶蹂躏中国海岸的倭寇已经使用了火枪。由于这是引入种子岛(Tanegashima)的武器,所以该岛名在日本变成了对这种武器的通称。当明朝军队于1593~1598年间在朝鲜反击由丰臣秀吉将军率领的日本侵略军时,这些新武器无疑给它造成了麻烦。明朝正是从此时起寻求采用欧式火枪,它们在中国以“佛朗机铳”之名而著称。为了在辽河流域反击满族人,明朝通过耶稣会神父们的斡旋而让澳门的葡萄牙人铸造火炮。

但中国人很可能是通过葡萄牙人之外的其他渠道而在16世纪了解到了欧洲火炮。在嘉靖年间(1522~1566年),出版了一部著作《西域土地人物略》。它论述了西域、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直到君士坦丁堡的山水系统、物产和人物,它似乎为明代中国和当时地中海沿岸的近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某些证据。

其他的舆地学著作也都揭示了明末对于外国之知识的进展。《殊域周咨录》(其序写于1574年,刊印于1583年)论述了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吐蕃、西域和蒙古。福建人张燮的《东西洋考》(完成于1617年,刊印于1618年)主要是论述东南亚国家的,但它也提供了有关日本人、荷兰人和航海技术的某些珍贵资料。正是在出版物非常丰富的17世纪的上半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舆地学家徐宏祖(徐霞客,1586~1641年),他是第一位对地形和地理产生极端强烈兴趣的学者。他的著作是直接考察并于30年间穿过中国南部和西部旅行期间所作笔记的结晶。徐霞客发现了广东的大江——西江以及长江的源头。他考察印度支那诸大江大河的上游时发现,与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相反,萨尔温江和湄公河在其上游是具有明显区别的。但这位舆地学家的伟大才华主要是通过其记述和地质考察的价值表现出来的。

市民文学

一种用更接近口语方言而不是古典语言写成的消遣文学在明末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它是针对贫于消遣娱乐的市民大众的,这些人的文化修养不高,但却不受由经典培养所灌输的文化束缚力的限制。大家在大量通俗出版物中发现了这类大众占读者重要地位的直接佐证。在万历时代(1573~1619年)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术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次廉价出版物的高潮;出版了大量通俗性类书的福建北部的书局从1571年左右开始成为这类出版物的主要中心之一。

明末的传奇文学出自可以追溯到11~13世纪开封与杭州的娱乐场所的悠久传统,它后来脱离了其原形并表现出了某些只能通过风俗习惯的深刻发展来解释的新奇特征,其中想象、杜撰、心理推测和发挥的成份要比在14世纪的著名小说中大得多,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它们的内容本身也都丰富和发展起来了。其作者们有的是官吏,但更多地则属于那个人数众多和无职务的文人阶级,他们通过一些迫不得已的途径来谋生,即试图从有职有权者的订货中或者在家庭教师或学校教员的职业中去获得微薄收入以维持生计。

明末有两部最著名的小说,即1570年左右出版的叙述高僧玄奘和猴子孙悟空赴印度朝圣取经期间的冒险经历的《西游记》,描述了山东一个富商的生活并可断代为1619年左右的《金瓶梅》,它们提供了风俗习惯的变化和文学艺术发展的资料。前者有一点儿拉伯雷的文风和讽刺挖苦的格调,大量地从差异最为纷繁的灵感之源中吸取资料;后者系现实主义和市民阶级的著作,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风俗著作。与小说(也就是比较简单的故事那经过发挥的形式)相联系的是爱情、侦探、讽刺、言情、英雄或教化故事的整整一个繁荣时代,这些不同的特征经常都融为一体。在1623和

1632年间,共发表了大量卷帙浩繁的文集,这就是《拍案惊奇》和《三言》。其中有许多故事都形成了这类代表作的一部故事集,于1632年和满族入主中原的那一年(1644年)之间刊印,其标题为《今古奇观》。1790年在日本发表的林罗士的《月下清谈》,正是受到了《今古奇观》的启发才问世的。在中国内地,明末的小说对于在18~19世纪用古典语言写成的较有学术价值的文学施加了很大的影响。

和这种为市民新大众服务的文学一道,戏剧也获得了很明显的发展。人们近来发现其中某些戏剧著作因汤显祖(1550~1616年)和阮大铖(1587~1646年)的名望而享有盛誉,后者是与阉党有勾结的高官。人们特别将一部浪漫式的故事《牡丹亭》归于汤显祖,此剧本的主题是理想的爱情,其魅力足以引起美女的春情。

结 论

大家无疑永远不可能以明确的资料来证明,在16~17世纪于大部分文化领域(实用学、哲学、语言学、文学)中所产生的特别引人注目的发展部分是由外来的影响激起的。总而言之,这是中国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如同是我们自己文艺复兴的反响一般。即使人们可以从中辨认出某些相似之处,那末这两种现象也具有深刻的差异;中国社会和西方基督教社会并不具有同样的历史过程,也没有沿同样的道路发展。但从中国历史中得出的教益也使人们不能排斥外来推动力的作用。某些创造发明的来回传播(如同在中国社会中发明的指南针和火器的那样),经过数世纪在外部世界流传之后又传回了那里。这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揭示了各种文明之间的全面的密切联系。东亚在扮演一种开创者的角色之后,又为西方所促进。互相交流和影响直到12~14世纪还仅限于科学的贡献,后来从16世纪起才发展起来。自该时代起的科学和思想的世界史对它们的贡献可能要比大家想象得更大。这里更多的不是指真正的借

鉴(虽然借鉴远不是可以忽略的),而更重要的是指对于加强某些思想方向的微妙而又间接的影响。

三、欧洲的人侵和耶稣会传教士

393

1500年左右在近东和地中海盆地发生的事件,对于葡萄牙向印度洋和东亚海上扩张产生了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影响。法兰克人在叙利亚的殖民地的丧失和奥斯曼人在威尼斯的胜利,注定了威尼斯和乃至整个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传统贸易衰落的命运。埃及玛木鲁克王朝(奴隶王朝)对通商要道的控制迫使时人绕行好望角。继瓦斯科德·伽玛(Vasco de Gama)在阿拉伯舵手艾哈迈德·伊本·马金(Ahmad Ibn Mājin)的领航下,于1498年把马林迪(位于肯尼亚)与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古里)联系起来之后,葡萄牙人率先于16世纪初叶进入东亚的海洋。他们绞尽脑汁地设法渗透进该地区那与海盗行为结合在一起的贸易之中,这种贸易在16世纪期间可能获得了特别大的发展,涉及到了东亚的全部国家: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印支半岛。葡萄牙人也如同马来人一样在东南亚和中国南部之间从事胡椒贸易。他们很快就竭力从爪哇人和苏门答腊人手中夺取了陆路和海上贸易的控制权,并在日本群岛以南和宁波之间与日本人有了接触。

葡萄牙人的大帆船于1514~1516年间首次在广东沿海靠岸停泊。他们从1540年起就活跃在福建,从1542年起又出现在日本。西班牙人于1543年到达东亚海面;其势力初露锋芒的荷兰人也于1600年左右到达那里。远东和东南亚的贸易交流中的这些新来者被称为“佛朗机”人(Francis,法兰克人,指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和“红毛夷”(荷兰人),他们属于世界这些地区的人文背景的组成部分,通过中国人与他们已经在那里设立了商行的东南亚地区联系了起来。我们并不排除某些欧洲的影响是通过他们而从中国南部和东南部海洋地区传入的,这与过去印度、伊朗和伊斯兰的影响

第一批天主教传教士抵达东亚

在相同地区所发生作用的方式相同。但仅仅是从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们于16世纪末年进入中国起,大家才开始掌握可靠的资料。

西方基督教社会最早与东亚——更确切地说是与蒙古和北京地区——之间的接触发生于13世纪中叶和1338年之间,后一个年头正是当时叫作汗八里的元朝京师北京的第一任大主教约翰·德·孟德高维诺逝世的时间。对于教皇和法兰西国王来说,当时主要是希望与一个对所有宗教都表现出了欢迎态度的世界性大帝国结盟以反击伊斯兰教。当第一批天主教传教士们于16世纪中叶继葡萄牙的冒险家们之后在东亚诸国登陆时,这些中世纪基督教传教士的任何痕迹均已消失得渺无踪迹。此外,那里的思想状态也已经起了变化。这是西方贸易扩张的开端,也是海上大发现、宗教改革和科学思想觉醒的时代。16世纪的欧洲受到了一种为中世纪的欧洲所不知和自17世纪起才形成的征服性布教狂热思想的鼓舞。1534年,由依纳爵·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创建的耶稣会修会的主要宗旨就是归化异教徒。

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是在一个海盗行为猖獗的时代企图进入中国的。此外,在此之前,葡萄牙商人还曾捷足先登,他们也显得如同是海盗,其行为似乎从来都不符合当地的法律。人们会很容易地想象出他国人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并对其进行严格控制。所以,耶稣会士们必须使用诡计以进入广东,然后经由梅岭关而进入江西,最终渗透进北京宫廷,并在那里赢得了皇帝的圣宠和某些高官们的同情。

继第一批葡萄牙商人到达位于琉球南部的岛屿种子岛之后,西班牙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aint François Xavier)也从该群岛下船(1549年),并在日本西部和京都开始其布教活动。他在1552年死于广州附近,未能进入中国内地。在中国海岸线上,

天主教传教士们当时能够立足的唯一地点是珠江三角洲以西和面对香港岛的澳门半岛上的一个葡萄牙小商行。澳门(Macao)这个名称是由于那里存在着一个海员们供奉海神的庙(阿妈神庙),由此而产生了被称为“阿妈濠”(广东方言中读作 A-makao)的地名,意为“圣母的抛锚地”。西班牙的沙勿略虽在那里遭到失败,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却可能因其具有耐力和智慧而成功了。他做为这一批传教士中的一员而于1582年到达澳门。他们于1595年到达了江西赣江流域并定居在该省的省府南昌。三年之后,利玛窦获许在北京停留两个月,又于1601年再度返回北京并在那里一直居住到1610年逝世为止。

因此,最早的一批传教区建立在把澳门与北京联接起来的道路上:广州、韶州、梅岭关之前的最后一座广东城市南雄、赣州、南昌、南京、江苏的淮南、山东的济南。它们又于17世纪初叶开始从那里扩大到了长江下游地区(苏州、上海、杭州,耶稣会士们在那里与文人界保持了接触)和福建。它们也推进到了河南(开封)、山西和陕西(西安),甚至直抵四川。 395

有很少一部分传教士经缅甸之路或西域前来。葡萄牙的修士鄂本笃(Benoit de Goëz)于1602年在阿克巴尔统治年间(1556~1605年),从莫卧儿王朝的首府亚格拉出发,以便证实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Cathay)确实就是中国。他经由喀布尔、撒马儿罕、塔里木盆地诸绿洲,于1605年到达甘肃的酒泉。鄂氏从那里致信利玛窦神父,神父为他派去了一名受归化的澳门中国人钟鸣仁(Sébastien, Fernandez)修士。此人于1607年到达酒泉,这正是在鄂本笃逝世之前。我们最后还应该提到,在1661~1662年间,有两名传教士曾从相反的方向旅行,从北京到达了亚格拉,但却经过了西藏和尼泊尔。这就证明了交通路线在历史过程中的令人惊奇的稳定性。这些经由西域和吐蕃的道路曾由6~9世纪的一大批佛教朝圣进香人过往并作过探索。

利玛窦及其教友们最初曾设想穿佛教僧侣们的袈裟。自西域传入的救度宗教——佛教确实与基督教具有许多类似之处,这些相似性后来似乎在乡下促进了归化。但第一批传教士们很快就从其错误中省悟过来了,在明末尚能延存下来的佛教已受到文化精英们的鄙视,只能在李贽之类的异端人士那里才能获得热诚的同情。驳斥基督教的文人们的论据之一便是:自17世纪初叶起,就有人揭发这种外来宗教是在征服泰西胡人之后又返回到中国的佛教的一个变种。因此,才智过人和受过良好科学培养的耶稣会士们很快就明白了,为了赢得中国文化精英们的支持,他们必须采纳文人士大夫们的服装和行为方式;他们试图从事漫长而艰难的经典文化的学习,并极力迎合统治阶层的爱好情趣,即他们对历书、天文学、数学、地图学的兴趣以及对欧洲艺术和发明创造的好奇心。钟表是由耶稣会士们传入中国的第一批奇器之一,利玛窦似乎在较晚时变成了中国钟表匠们的保护神,他于19世纪时在上海被当作“利玛窦菩萨”而受到崇拜。传教士们受到朝廷和高官们的赏识好评,这主要不是由于那些被视为微不足道的机械奇物,而更多地是由于他们的科学。由于他们作为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图学家而为皇帝效劳,耶稣会士们才成功地在北京一直维持到18世纪末叶。

对话的困难

双方的观点具有根本的差异。在传教士及天主教的教阶品级的眼中看来,那些只是作为一种简单归化方法的行为,却在大部分统治者看来成了耶稣会士在宫廷中存在的唯一益处。在证明欧洲的科学和发明的优越性时,传教士们认为他们也就同时一举证明了他们向世界这部分地区揭示的那种宗教的优势。所以,由耶稣会士们翻译成汉文的科学著作都必然会以对基督教的颂扬而开始。但由于某些中国人被传教士们在科学、技术领域向他们提供的内容所吸引,所以传教士们试图归化这些人,后者大部分都仅仅将

《圣经》传说视为往往会被误解和甚至是有伤风化的一大堆神话。事实上,基督教可能在中国会遇到很难逾越的障碍,它们都是由于社会和文明的差异而造成的,其历史参照系、思想范畴、行为和习俗都不具任何相似性。中国社会未能为一种要求全身心投入并引出一种万物主宰存在的宗教提供有利的契机。如果在那里对于宗教虔诚并不陌生,那末中国社会相反却根本不懂得超世存在者的等级。这是因为,它对于一种内在世界的观念同时为宇宙的和人类的、自然的和社会的。此外,耶稣会士们又恰恰是在批判倾向和不可知论开始形成的时候进入中国的,这些倾向于 18 世纪在考证学派的训诂学家中得以发扬光大,开花结果。

因此,基督徒和中国人的对话在一开始就是以深刻的误解为基础的,而这些误解在 18 和 19 世纪变得更严重了。互相不理解的结果首先是在日常接触的基准线上形成的,而后来由某些文人和佛教僧侣界精心发挥出来的一整套不信任与仇视,也是这样造成的。人们很早就指责基督徒们:

——企图败坏中国风俗,因为他们禁止祭祖。经过 17 世纪的相对宽容的时代之后,梵蒂冈的通谕于 18 世纪在这一点上变得不可调和了。但“礼仪之争”也反映了从利玛窦于 1610 年逝世起在传教士们自己队伍中早就爆发的一种冲突。

——摧毁了中国宗教信仰中的供像和圣地。

——崇拜一个遭受过极刑的人。

——为了日本人、倭寇以及沿海走私犯的利益而策划阴谋和间谍活动。

——将七曜置于空中并呈现出一种黄道的倾斜布局,而不是呈现出后来被近代天文学采纳的中国传统的赤道坐标布局(第谷·布拉赫的天文学理论仅仅从 1620 年左右起才由北京的耶稣会士们所采纳,被教会禁止的太阳中心论仅仅在 1760 年才在中国被作了首次阐述)。³⁹⁷

——创立秘密教会(完全如同秘密会社的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供认其入会一样,新教徒们都必须保持不泄露他们属于基督教会的秘密)。

——秘密从事点金术和邪咒巫术。

所有这些批评从17世纪初叶起就成了某些发行量很大的小册子的内容。辟基督教著作的这个冗长系列中最早的一种是《破邪集》,其最后的序被断代为1639年12月。与那些认为在对上帝的古老信仰中,重新发现了一种基督教启示的特别古老踪迹的传教士们的看法截然相反,敌视传教士的中国文人士大夫们却仅仅把基督教视为有时掺杂着借鉴自伊斯兰教内容的佛教的一种形式。这种论据后来被经常利用,特别是出现在1751年出版的《澳门记略》中。

中国人的反应无疑因社会环境而有所变化。在乡下,传教士们似乎首先对新奇事物激起了好奇心。他们的习俗与奇特行为引起了人们的诧异。一名基督徒的葬礼招致了大批居民的争相围观。传教士可能是佛教僧侣的一个变种。基督教无疑是随着它产生了一种诸说混合论才得以立足,而传教士们也不自觉地受到了中国环境的影响。这样一来,人们便在于明末赴山西的传教士方德望(E·Le Fèvre)的书目中发现了多种佛教法师和道教天师的内容:该基督教教士被认为可以接近猛兽而不被吞噬,他具有医病的天才、能以淋圣水而驱散蝗虫的祸害、为受魔鬼骚扰的房间驱邪、准确地预计死亡的时间、其尸体永不腐烂、其坟墓可以避免水灾淹没,并在死后变成了“方土地”。

在18世纪初叶,波尔多籍的神父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年)提出了归化平民的方法:

——运用故事和寓言。

——对“装饰、出神仪式、歌曲、钟声、仪轨”给予很大的重视。

——引起对于“圣像、舍利、圣牌、圣水”的崇拜。

——注重儿童教育。这里主要是由佛教出家人在近 1500 年前于中国采用的方法。

最著名的从教人

398

在官僚队伍中间，耶稣会士们的政策可能在一小批受到欧洲科学和文化新鲜事物吸引的文人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这些归化了基督教的文人中，最著名者是那些大家称之为“开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徐光启(1562~1633年)诞生于上海，于1604年中进士，是最早与耶稣会传教士们开始接触的人士之一。他曾受雇于韶州一富户当家庭教师。他在该城中首先遇到了郭居静(Lazare Cattaneo)神父，然后又于1600年在南京遇到了利玛窦神父。另外一名传教士罗如望(Jean de Rocha)为他举行洗礼并赐他圣名保禄(Paul)。徐光启于1604~1607年间定居在北京，并在那里与李之藻一起接受了利玛窦的施教。他正是从这一时代起翻译了一些欧洲文字的数学、天文学、舆地学和水利学著作(耶稣会士们可能共把近7000册西文书籍携至北京)。我们特别应将1606~1608年的三角学著作《测量法义》(徐光启发现了中国与西方的三角方法是相同的)、《几何原本》(1611年)、《泰西水法》(1612年)的译本归功于他。他于1607年返回长江下游地区之后，又重新与耶稣会士们保持接触。他于1621年最后隐居于上海，在那里翻译了一部《灵言蠹勺》(原文为《论灵魂》。——译者)。1630年，他向朝廷推荐汤若望(Adam Schall)神父以编制一部新历书；推荐龙华民(Longobardo)神父以谈判从澳门购买大炮的事宜。在上海郊区徐氏家族的村庄(徐家汇，上海方言中读作Zikkawei)中，他的住宅附近建造了一座小教堂。正是以该教堂为中心，在19世纪才形成了重要的徐家汇传教区。徐光启的著名农书《农政全书》于他死后在1639年刊印。

391

和徐光启一样,杨廷筠(1557~1627年)也是文人和官吏,他诞生于杭州。1600年,他被任命为北京的监察御史,负责漕运和苏州地区的官府。在1609年于杭州隐退期间,他先是受到佛教禅宗的吸引,后于1611年在李之藻府上会见了郭居静及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神父。他由这两人归化为基督教,并于次年受洗礼而取圣名弥额尔(Michel,弥格子)。他与其亲属和朋友创建了一个“圣水会”并撰写了一部有关基督教教理的著作。他于1628年(原文如此,疑为1615年。——译者)出版了有关科学、舆地学、欧洲哲学和基督教的论集,1621年出版了一本他于其中试图证明他选定的宗教要优于佛教的著作。他参与了1602年由利玛窦以《坤宇万国全图》为题刊布的《舆地全图》释文的写作,这就是1623年刊印的《职方外纪》。杨廷筠于其逝世的那一年(1627年)让人在杭州建造了一座基督教堂。

李之藻(?~1630年)也跟杨廷筠一样原籍为杭州。他在利玛窦1601年到达北京之后不久就与之相晤,并在其府上见到了《坤宇万国全图》。李之藻热衷于地理问题,开始学习地图绘制术和西方科学。1604~1610年间,他作为利玛窦的学生,曾为多种科学和宗教著作充任利氏的翻译。当他于1611年返回杭州之后,便邀请了郭居静、钟鸣仁和金尼阁等神父在该城中布教。当沈淮于1616年首次发动“仇教”并于1622年再次发动仇教时(沈淮提出的理由是从澳门采购的两门大炮爆炸了),李之藻保护了杭州的基督徒。1625年,他为不久前刚刚在陕西西安发现的大秦景教碑(这通用汉文和古叙利亚文写成的双体碑文追述了景教自631年传入唐朝京师的历史,石碑已被断代为781年)写了一篇考证,将景教考证为基督教。后来于1664年在杭州出版的有关这通著名碑文的另一部著作题为《景教碑论》,此书由阳玛诺(Emmanuel Diaz)神父所作,书中还公布了1638年在泉州大港附近发现的两个景教十字架。在其逝世的前一年,李之藻曾与徐光启和龙华民神父一起负责

制订新历书。

相互影响

我们很难完全公正地评价欧洲的文化人与中国的精英界于17世纪上半叶接触的后果。因为除了译著的目录及其明显的传播情况之外,一些无法追踪其传播路线的散乱影响,也以冲击波的方式,在中国社会与欧洲发生了作用和产生了反响。在耶稣会士们的科学当时已经得到应用并且直到18世纪末仍将继续得到应用的三大主要领域(天文学、算学和地图学)中,其贡献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无疑正是耶稣会士们变成了17和18世纪中国算学复兴的主要创始人。欧洲人对于中国技术的兴趣似乎产生过某种影响,正像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实用知识领域中的情况一样。大家可以说,从全面来看,中国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倾向本身已由耶稣会传教士们的影响所强化。

然而,我们必须避免认为,17世纪初叶的欧洲在原则上占有优势;基督教的西方和中国社会在这个历史时代都具有同样多互相学习的内容。

令人相当惊讶的是,正如李约瑟曾指出的那样,中国人的天文学传统当时反而要比利玛窦神父的天文学更为“近代”化一些。中国耶稣会传教区的缔造人不太了解欧洲天文学的最新发展,始终忠于托勒密的原理(天球和黄道宫带的坐标),而这些理论与中国人的思想和习惯又是互相矛盾的。中国的天文观念之一就是“宣夜”论,也就是说甚至是在星辰和行星中也能看到在无限空间飘荡的不可知物的光明。这种无限空间的理论与印度和佛教的时空无限性的观念相吻合(唐代的计算把某些天文学的事件上溯到1亿年之前)。利玛窦有关天球、黄道十二宫带坐标和配伍的古老观念同样也刺激了中国人,他们自汉代以来就习惯于后来从第谷·布拉赫(1546~1601年)起才得以在近代天文学中普遍流行的黄道

坐标与配伍的体系。

无论是马可·波罗的《世界珍异记》(1298年,其虚构资料和夸大其辞之处明显地降低了它的意义),还是被派往中国蒙古汗宫中的方济各会传教士们的简单记述,都不可能对包含了很多神奇内容和基督教启示的中世纪世界观产生明显的反响。一个已变得对于民族和习俗的多样性更为敏感的欧洲,初次体验到了从蒙田(Montaigne)到孟德斯鸠(Montesquieu)时代的人类社会心态,故远非昔日可比了。甚至在耶稣会士们的报告、书简和著作之前,16世纪赴中国南方的第一批旅行家的游记就提供了这种中国知识的最早因素,而其影响在17和18世纪时可能是相当深刻的。

这些游记,特别是经墨西哥和菲律宾莅华的西班牙奥古斯丁会士马丹·达·拉达(Martin de Rada, 1533~1578年)的《游记》以及葡萄牙多明我会士加斯帕尔·达·克鲁士(Gaspar da Cruz)那部刊印于1569年的《中国志》,都被作为门多萨(Gonzalez de Mendoza)的那部于1585年在罗马刊印的《中华大帝国史》的写作基础。此书从首版到16世纪末年之间共出了各种欧洲语言的30个版本。这部著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它直到1656年前都被所有具有文化修养者阅读,此后它才被弗拉芒耶稣会士金尼阁的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译本叫作《利玛窦中国札记》,又称《基督教传入中国史》。——译者)一书(1615年版,1617年出版了法文版)和1661年死于杭州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的《鞑靼战纪》(安普卫特1654年版)所取代。

这些有关中国的最早资料成了可供借鉴的原始史料,而至少有两种借鉴是以可靠的方式为人熟知的。

欧洲建立悬空铁索桥的思想应断代为1595年,这很可能是受到了那些曾得以在广东或福建看到这类工程的葡萄牙旅行家游记的启发。这类桥无疑起源于四川和汉—藏走廊地区,大约从公元
401 600年左右起就开始在中国使用,而欧洲第一次建成这样的桥梁

却应断代为 1714 年,它是奥地利建筑师非舍尔·冯·埃尔拉克(Fischer von Erlach, 1656~1723 年)所提建议的结果,此人明确宣称自己受到了中国先例的启发。

另外一种借鉴是对一种曾在中国的不同时代和在不同地区出现过的做法的奇特移植,这里是指在两轮车上插一根桅杆和一面风帆。荷兰工程师西蒙·斯蒂文(Simon Stevin, 1540~1620 年)似乎曾在阅读门多萨著《中华大帝国史》或《新大陆航行记》时受到启发,而更有可能是在阅读林索登(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的《航行记》(1596 年)时受到影响,设想出了风车(带风帆的车)的建造。这些车辆于 1600 年左右在荷兰北部的海滨地带试验成功,并在 17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持续引起大家的强烈兴趣。他们是最早证明人类可以用迄今未有过的速度在陆地上行走的人。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有关磁性的最早研究和最早理论完全是在中国完成的。磁的极性、感应性、剩磁性和磁偏角等在中国为人所熟悉的时间要比在欧洲早得多;欧洲最早有关静电性和磁性的实验要追溯到吉尔伯特(W·Gilbert, 1544~1603 年),它们在 17 世纪得到了发展。即使假设在物理学这个新领域的发展与中国的贡献之间不能确立任何关系,那末中国人有关磁现象的观念无论如何也与他们的宇宙论有关,其影响可能在 18 世纪才在欧洲令人感觉到。同样,中国人的政治和社会观念、他们的政治制度、艺术与技术对于近代思想的形成施加了一种可能是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 18 世纪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借鉴与关系史倾向于证明的内容。

四、对明末历史的全面总结

16 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相当明显和相当多,以至于大家可以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定于此时。以其对社会的影响而成为最重要变化之一的,可能是白银被广泛作为支付手段而使用。在中国流通的银锭不仅在 16 世纪期间迅速增长了,而且在直到 1820 年左右

的大清王朝时代它还在增长。白银与被用于小宗采购的铜钱并存，直到 20 世纪初叶始终是大宗交易的唯一手段。16 和 17 世纪白银的普及使用与在东亚所有海面上的海洋贸易（贸易与海盗行径）以及都市和城市活动的复兴是互相吻合的。某些手工业技术（特别是纺织、瓷器和印刷技术）得到了改进，而这些改进又使中国得以在 17 世纪中叶的大萧条之后更坚定了作为奢侈品最大出口国的志向。第一批近代欧洲冒险者在东亚海上的出现就应被置于这种经济发展和城市复兴的背景中。这些冒险者中最早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然后从 17 世纪初叶起才是荷兰人。这种现象对于东亚并无多大意义，因为这些新来者仅仅是跻身于远东的贸易交流之中并利用了世界这部分地区出现的繁荣。但这种现象却已经预示了未来的时代。中国应该把最早从欧洲和美洲传来的因素归功于他们：更有效的火器、白薯、花生、烟草（玉米是稍晚才传播来的）以及最早从马尼拉通过阿卡普尔科的帆船而流向远东的银币。如果在这一切之外，再加上先在文化生活中形成和后又于 17 世纪得以巩固的新方向，同时再在不太重要的程度上加上从 1600 年左右起与欧洲的科学、技术和宗教的最早交流，那末大家可能就会认为，可以说一说中国和东亚之近代的开始了。日本的情况也如此，16 世纪末标志着其历史上最大的转折之一。20 世纪的中国史学家们确实习惯于称这个时代为“近代”，以与“传统”中国相对应，后者以不确切的方式泛指过去的时代。但这一名称却掩饰了某些对于涵义的评价，它导致了事实上并非那样明显的一种在中国的今天和过去之间的比较彻底的决裂，它似乎也于与西方历史的发展相比较的方式而否认了直到当代之前的中国社会发展的任何意义。

近代中国

2014年11月

第八编 专制的宗法制度

新的满族强大王朝在开国时,于其征服全中国的过程中,依靠了今东北诸省(满洲)汉人的合作,并利用了全面的混乱局面,但很快就遇到了导致其推迟最终建立政权的困难。这就是受到海盗行为之强劲回潮帮助的南明的顽抗,其后又是在他们征服的翌日就发生于南方诸省的分裂。但在一直延续到1681年的全部平定西南并于两年之后收复台湾的不稳定时代之后,紧接着的却是大清政权迅速巩固的时代,它是由既专制又仁慈的政权之怀柔政策、满族精英们比较深刻的汉化、皇帝为了赢得汉族文人阶级的同情和帮助而作出的努力等一系列措施促成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及贸易交流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它在18世纪是以一种与人口的迅速增长同步的全面繁荣表现出来的。同时,新帝国在蒙古、西域和西藏的外交与军事干预获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从18世纪中叶起,这个汉族—满族的大帝国覆盖了近1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影响广泛传播到了其边界之外。这个时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庞大的国家。

但随着这个特别和谐时代的延续,一个衰落时代的先兆便出现了。边境上的冲突日益增加,新开拓区民众的起义也与日俱增。在繁荣时代尚不太明显的政

治制度的弊病进一步恶化了。最早的几次农民大起义在18世纪末于中国北方爆发。国家政权无法成功地阻止其发展的一个过程开始了。清帝国幅员的辽阔和人口的膨胀,其效益绝对无法增加的经济、过度的中央集权、一种效率不高的政权机构等等,很快就在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经济衰落和倒退的时代时先是形成了严重障碍,并很快即将成为西方先施加压力和后发动进攻的目标。

第一章 清朝的征服与开国

一、满族势力的发展

形成时期

1635年取名为“满族”的民族实际上应该是女真人,也就是曾于12世纪在中国东北和北部领土上建立过金帝国(1115~1234年)的通古斯部族的后裔。他们从1589年起就内附汉人,并曾在明朝军队于1592~1598年反击日本入侵朝鲜的战争中,给予明王朝强有力的支持。满洲东部的女真人部族由他们的一位名叫努尔哈赤的首领所统一。他们应将其实力归于自己的军事组织与财富:独揽了东北的珍珠、皮货和矿产品的贸易,并从人参(其根系以其药性而受好评并被以高价出售)的种植中获取巨额利润。努尔哈赤飞黄腾达的原因是北京以北热河地区的通古斯与蒙古部族的定居化,11~14世纪的草原帝国(辽、金、元王朝)曾在那里按照汉族方式建立过某些府,它们到了明代又被卫取代。努尔哈赤身边有一大批汉族谋臣(汉族人口在满洲东部这一地区相对较多),他得以在该地区创设了一种封建和战争组织。这是一大片由女真贵族首领治理的领地和一些根据中原“卫”的模式而组成的军事单位。这些军事单位被称为“旗”,以其旗帜的颜色相别,它们于1601年开创。

它们在满洲征战期间又由于一些蒙古旗的归附和汉族部队的并入而一分为二，成为由满族人及其附庸组成的内旗和保留给辅助部队的外旗。直到18世纪末，它们始终是东亚曾经有过的最有效的军事组织之一。

女真人与东蒙人结盟以图反击位于热河以西和山西以北的察合尔部蒙古人，从1609年起对中国中原采取了一种敌对的态度。1616年，努尔哈赤自立为女真人之汗，创建了后金王朝。他于1618年夺取了沈阳东部的抚顺，从当年起又开始对中国北方连连发动进攻。1621年，他夺取了沈阳和辽阳，于四年之后立都于被称为盛京(Mukden)的沈阳。在他于1626年薨逝后，阿巴亥(1627~1644年)继位。阿巴亥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和政治活动，继续其前任的事业。由于缺少天资和独创性，锲而不舍的毅力就成了满族人的主要品质之一。阿巴亥从事了对察哈尔部的长期征服，于1638年在朝鲜强行确立了其统治，最终于1642年占据了直到山海关的整个满洲，同时又于1636~1644年间占据了整个阿穆尔河地区(黑龙江省)。阿巴亥的全部政策就在于模拟汉地的社会制度。他的谋臣和武将们大都是汉人，他拥有的近代军事装备也是由降兵从中原为他提供的。从1635年起，阿巴亥便以“满族”的名称取代了“女真”一名。次年，他又改原国号“金”为“大清”。

这样一来，满族人在1644年夺取北京之前，便获得了使他们得以在中国中原夺权并将这个庞大国家归并于其统治之下的军事力量、政治统一、行政组织和战略基地。为达此目的，他们仅需要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

清人人主中原

在征服了满洲这片汉人的殖民故土之后，满族人——热河的女真族人可能在那里得到了在征服和治理全中国方面的可贵的辅佐者。特别是在阿巴亥统治末年(1627~1644年)和顺治统治时代

(1644~1661年),他们的一部分高级官吏都出身于辽河盆地,而且往往都是原籍为沈阳(盛京)及其附近地区的人。早在1618年,范文程(1597~1666年)的情况即如此:他是努尔哈赤时代的四大官员之一,属于明朝的一个旧官员家族,其先祖之一曾在北京任兵部尚书。当满族人于1618年夺取抚顺时,范文程转而为努尔哈赤效劳,于1613年被任命为当时设在盛京的“章京”。那些曾帮助满族人征服中国南北的将军孔有德(?~1652年)、吴三桂、尚可喜(1604~1676年)、耿仲明(?~1649年)、孙延龄等,其原籍均为辽宁,有的还是在满族人夺取该地区时被征募的。

这些最早期的合作者是地地道道汉地施政传统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同时精通汉文和满文的文人,被编入了内旗之中,有时又与清朝皇族宗室联系起来。满族人称后者为“包衣”,并父子相承地蓄养他们为自己效劳。这些包衣在17世纪甚至在18世纪初叶仍扮演了一种作为大清情报员以及与汉族精英交往之中介人的角色。他们负责管理内宫并监督内宫中提供豪华产品的大作坊(景德镇的瓷器以及南京、苏州、杭州的丝绸……),完全是皇家的心腹和谋士。他们应当是占据着一种类似太监的地位,却又未能获得后者在明代独揽的那种过分强大的权力。

满族人入主中原时俨如一个旨在统治奴隶人口的王爷世家,完全如同蒙古人过去做过的那样。从1668年起,他们禁止汉人进入满洲这片汉人拓殖的故土,以便保留一块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纯洁之地并保持对人参开发的专营权。他们禁止与其他民族混杂通婚。他们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中均实施民族隔离的法规,把京城划分成了北部的满族城(所有的旧居民都被从这里驱逐了出去)和南部的汉族城。1645年,所有患有天花病的汉人(事实上是所有患有皮肤病的人)都被从北京驱逐出去了。一些造成人心惶惶的流言在城市中散布,那里的人认为占领者即将灭绝全部汉族人口。这次征服确实是以一种极其野蛮的手段进行的。扬州的一位奇迹般地

逃脱了屠城劫难的居民留下了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述。他是清军于1645年进入长江下游这座富庶的商贾之城时的见证人。这部记事著作的稿本叫作《扬州十日记》，它可能现藏于日本。改换服装和梳妆(扎辫子)的政令从1645年起就被强加给了全部汉族居民并以处死相威胁，从而激起了骚乱，其中有几次被大屠杀镇压下去了，如在江苏江阴和嘉兴爆发的那几次。我们应再重提一下，满族人的先祖女真人同样也曾在金王朝中强迫其臣民们扎辫子，这是草原居民中的一种传统梳妆方式。蒙古人扎数条小辫；更早些时候的拓跋氏人(Tabgatch)在5世纪时也被中国中原汉人称为“索头”，意指扎辫子(绳索般的)头。 408

满族人从发动征服伊始，便剥夺了农民的田产并建成了一些从中排斥中原人的庄园。1645~1647年间创建的这些满族人的“圈”在整个华北为数甚多，尤其是在北京周围和东蒙古地区更为如此。

满族人给予了耕种其庄园(圈)的劳动力(战俘和失去了其地产的农民，他们为了保留一小块耕地而接受在圈地中劳动)一种真正奴隶的身份。这些耕农们被像牲畜一样地买卖，被迫服多种劳役，受到残酷无情的待遇，并被迫在原地定居。因此，尽管要冒着使其家属遭受鞭刑或死刑的危险，他们还是试图千方百计地逃亡。同时，被编入旗中的那些支持清朝的中原人却在满族人身边充当苦役犯的监守和警察的耳目。这样一种制造恐怖气氛并有利于腐化制度，很快就显示出有百弊而无一利的灾难性后果了。满族人清楚地知道一种温和而统一的税收制要比直接经营更有利可图，而且自由人也会比那些沦为奴隶的人劳动得更好，于是他们便逐渐放弃了其圈地，使自耕农又重新取得了其土地的占有权。从1685年起即在诸旗都严禁没收新的土地，而圈地和逃亡奴隶的问题在1700年左右也实际上已得到解决。当然，只要还把各种苦难强加给中国的农民阶级，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清人的错误可以通过他们

企图在整个中国实施仅仅在草原社会的背景下才能实现的做法和观念来解释。然而,即使是循序渐进也罢,政策上的变化却是相当激进彻底的,因为整个中国都应该把它在18世纪实施的一种于其整部历史上最温和的农业税制度归功于清王朝。这种税收制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最大部分的人口归顺了其新的统治者。

二、延搁和困难

南明的抵抗

409 入侵者几乎未经过战斗便夺取了整个中国的北部。他们在南方遇到了长期的抵抗,但由于完全缺乏团结以及在力主抵抗的爱国主义者与倾向于与敌人合作的妥协派之间的冲突,这种抵抗不断地被削弱。实在说,失去了民心的明王朝无论如何也注定要灭亡。清军的推进把那些试图维持一种表面合法政权的明朝皇帝后裔们逐省地驱逐了出来。对这个约15年的历史阶段的记忆可能是在清初那些爱国的大文豪的鼓动下保留下来的。

在北京陷落并在南京扶植了一个新皇帝之后,明人还与满清人进行过一些谈判,当时清人仍被明朝的一部分统治阶级视为其镇压起义运动的盟友。这些谈判被一位名叫史可法(?~1645年)的爱国大臣的奋争打断了。清军对由史可法镇守的扬州发动了六次接连不断的攻打,然后才攻陷该城,而这已经比南京的陷落晚一个月了。明朝皇帝被一名叛将献给了清人。这样就开始了明朝末帝们漂泊流浪的时代。清军将明朝皇帝的后裔们从浙江和福建驱至了广东和广西,最后把他们驱至该帝国的最偏僻省份——云南省。某些短命的皇帝们随着清军的推进而相继即位。有两位皇帝曾同时在浙江和福建宣布登基。而上述两省与四川省在1646年被清军同时占据,清军在四川彻底消灭了明末的原起义军首领张献忠。1647年,前来进犯的清军夺取了广州,而一位新的晚明国

主遂在广西东北部的桂林宣布登基，这就是朱由榔宗王，取年号为永历（1647～1660年）。在南明期间，这是其政权曾起过某种重要作用的唯一一位皇帝。永历曾收复广州并于1648年光复华南大部分领土，但后来又被迫避难到云南。南明在1656年因诸将军之间的内讧而被削弱，此后再也无力抵抗由吴三桂统率的军队于1658～1659年间的进攻了。

永历被迫逃亡到昆明以西500公里多的地方八莫(Bamo)，那里位于伊洛瓦底江畔，地处缅甸的东北部。他在那里于1661年被俘，后于次年在昆明被绞死。永历宫廷在桂林和云南曾接待过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其中特别包括瞿安德(André-Xavier Koffler)神父。这些传教士们声称曾在皇帝的亲信中归化了几名贵夫人，特别是永历的亲生母亲。她根据他们的建议曾向梵蒂冈遣使，而该使者于1659年返回昆明。

海盗活动的猖獗回潮

这次对入侵者的抵抗，其根源出于对明朝皇室家族最后代表人物的忠诚；一种汉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在海盗行为的重新猖獗中获得了可贵的帮助。此外，南明王朝也与东南沿海和广东的海盗们维持着程度不同的秘密联系。

当时有一个诞生于九州佐世保港口海岸平户的中国男子与日本女子的混血儿，他事实上从1650年左右起便统治了福建海岸。这个名叫郑成功(1624～1662年)的海盗首领直至今日仍在台湾被奉为一个民族英雄。他的活动就跟16世纪倭寇们的行为一样，始终具有海盗和贸易的一种混合特征，但同时又与政治有明显的牵连。他盘踞在闽南的厦门一带，抢劫该省沿海的富裕地区，并将其袭击一直推进到浙江的南部和广东的东北部。他同时也与日本、琉球、越南、暹罗和菲律宾从事贸易交流，并与经常往来于东亚海面上的欧洲人保持接触；他还以采取站在南明一边抵抗清人的立

场而试图扩大其影响。他与已崩溃的王朝之残余势力保持的良好关系使他赢得了享有皇家姓氏(朱氏)的显赫权力;由此而产生了其别名“国姓爷”,它被荷兰人拼写作 Coxinga 或其他类似形式。他充当了南明王朝与日本之间媒介人的角色,并曾多次前往日本(1648、1651、1658 和 1660 年等数次),以请求一种从来也未能落实过的帮助。他在 1658~1659 年间再现了日本倭寇们 1553~1555 年间的“业绩”,甚至一直推进到被清军完全占领的南京地区。但他必须且战且退,而且从此后仅满足于沿海的骚扰活动。为了反对“国姓爷”并消除他与沿海省份的“共谋”关系,大清王朝于 1662 年下令在从山东到广州的所有沿海地区疏散人口。对于那些居民来说,这简直是一场悲剧,他们亲眼目睹了其城市和村庄被夷平,而居民们也被迫成群结队地外流。这些野蛮措施对于中国贸易和对外关系的影响是否有人作过估计呢?它们肯定都中断或严重放慢了 18 世纪末的中国贸易,从而促使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等欧洲人在东亚海洋中立足安身。

国姓爷被迫在中国大陆之外寻找一片避难地,于是便在 1661 年发动了对台湾大岛沿岸的进攻,而荷兰人自 1624 年以来就盘踞在那里。他率领一支由 900 只战船组成的船队以及 25000 名士兵,将荷兰人从那里驱逐了出去。其子郑经在他于 1662 年逝世后继承其位,并在与反抗大清王朝的斗争中支持福建兵马大元帅耿精忠。他一直固守台湾,直到清朝于 1683 年发动一次大规模征战为止;这次远征使这个郑氏独立政权寿终正寝了,并将这个面积和比利时一样大并且仍由大量马来一波利尼西亚部族居住的岛屿纳入到了大清王朝的版图之中。

完全跟国姓爷时代的福建海盗们与南明维持着关系一样,蜆家(Tanka)人在广东沿海的活动似乎同样也与明朝胄室的抵抗有关。蜆家人是一个平常居住在船上的渔民土著居民集团,由此而产生了大家有时称其为“船民”的译号。这也是一些捕捞久负盛名的

珍珠的部族。他们的海盗活动给清王朝在广东设置的第一位总镇尚可喜制造了许多麻烦,并因此而间接帮助了南明的顽抗和分裂的企图。

三藩之乱(1674~1681年)

411

大家都知道,在征服整个中国之时,入主中原者沿用了明帝国旧有的政治、行政和军事框架内的机构,也就是说留用了被称之为“旧臣”或“二臣”的那些人。

但是,某些合理的怀疑始终笼罩着这些归附了新政权的官吏们。1656年,发生了多次大逮捕,旧官吏队伍中的一大部分人员从这时起都逐渐被以科举选拔的新官吏(汉臣)所取代。然而,这种清洗却未扩大到更为遥远和控制不太严密的南方诸省,大清王朝在那里被迫留给曾参加过征服和平定南明抵抗的原东北军事首领们以相当大的自主权。

清政府授予那些曾帮助它平定中国南方的将军们以广泛权力,这便走上了一条将导致形成一些实际独立于北京政府的危险道路,满人面临着丧失对其帝国控制权的危险。中国沿海诸省和西南部的总兵们晋升到“王”的爵位,而且可以保持并传给其后代一些在平定南明时被置于其指挥之下的军队。他们可能是利用了自己辖区的独立倾向并且就地获得了为其独立必不可缺的资源。这样一来,他们之中的最强大者吴三桂(1612~1678年)在于1644~1645年间协同满清人的力量消灭了李自成的军队,于1657~1661年又进行了消灭逃亡到云南的明王朝残余势力的战争之后,未使其部队复员。他作为云南和贵州的统治者,事实上同样也控制着云南、陕西和甘肃等附近省份。他既从北京政府继续向他提供的拨款(1667年他为维持其军队而获得3000万两白银)中获得收入,又从他在四川针对井盐、铜矿和金矿、人参和大黄交易而设立的专营中得到财源,这还不把他从与西藏的贸易(茶马贸易)中所获得的

利润计算在内。朝廷利用广州权力的空缺[该地区的总兵尚可喜(1604?~1676年)被解除了职务]之机会,决定撤销诸“藩王”的自治政府。于是,吴三桂便与福建总兵耿精忠(?~1682年)同时反叛,并创建了昙花一现的周帝国(1673~1681年),紧接其后的便是广西桂林的将军孙延令(?~1677年)之乱。1674年,吴三桂争取到了自1670年以来就出任陕西和甘肃提督的王辅臣(?~1680年)的支持,并于1670年又赢得了当时正管辖广东和广西的尚可喜之子尚之信(1636?~1680年)的支持。这一年,吴三桂几乎要收复整个中国并消灭满清政权了。但风云却骤然变化。从1676年起,王辅臣和耿精忠相继降清,尚之信也于1677年归降。吴三桂于次年去世,而其孙吴世璠则继他之后而登上了周王朝的宝座。清军于1679年收复了江西,于1680年收复了四川,又于1681年收复了贵州。吴世璠被困于其都昆明,后自杀身亡。这样一来,便宣告了“三藩之乱”(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的结束。这是新的大清王朝所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对长江以南独立倾向的铲除,标志着中央政权对整个帝国的全面控制,由此结束了新政权的适应和巩固阶段。所以,大家可以认为一直持续至18世纪末的国内稳定时代开始于1681年,这正是最终光复台湾岛的两年之后。

413 第二章 开明专制君主

康熙(1662~1722年)、雍正(1723~1735年)和乾隆(1736~1795年)等一代伟大的盛世明君表现出了一种随机应变的意识和开阔的思想,总之是一种使其特别名副其实地堪称“开明专制君主”的睿智。他们的执政从17世纪末叶起一直持续到1775年左右,显得好像是对“理学”伦理和唯理主义哲学的一种具体运用。

一、思想领域的统治

知识精英的归附

从 1644 年攻陷北京到铲除吴三桂在西南地区创建的区域性政权,共经过了近 40 多年的时间。这一时期完全以对中国北方的入侵、发动剿灭南明的战争、由海盗造成的困难以及南方省份的独立分裂为标志。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部分在一开始都拒绝与入侵者合作,他们自己隐蔽了起来转入地下,并且还掩饰了其危险的思想。但随着曾经经历过明朝最后几位君主执政期和对大清政权抵抗期的几代人的消失,重新控制的做法非常明显地生效了。新国主没有作出多大变化地沿袭了亡朝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以系统的方式促进了他们自己的第一流精英人物的出现,从而确保了对所有要害权力职位的控制。他们很快就理解到,自己不可避免地要赢得旧统治阶级的支持并同时发展一种归附新王朝的思想。⁴¹¹

1656 年重开科举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恢复向帝国提供年轻而又忠于新政权的官吏的规范准则,同时也将文人阶级的全部活动都引向了进入获得荣誉和社会权威的这条唯一道路。在使明朝时期的旧统治阶级与他们的政权密切地结合起来时,开明的专制君主实现了他们最珍视的愿望,消除了怀疑的气氛以及在中央政权与地方官吏(已亡王朝曾深受其害)之间的严重分离。

人们在清代再也发现不了与过去在 1615~1627 年间的那种以阉党为一方和以东林党为另一方的严重对峙相类似的残酷冲突了。完全相反,皇权与汉族文化精英之间在汉—满王朝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呈现出了一派友好相处的盛景。汉族人与满族人之间的对立冲突在 18 世纪期间倾向于缓和,而只是由于 19 世纪末叶~20 世纪初叶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才又使这种对立重新激化了。

此外,自 17 世纪末叶开始的清政府的宽容态度,导致了清政

府对于平静的农村减轻农民阶级负担的关注、对于国家官吏的优惠待遇等,都使新王朝显得最为符合文化界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又最为接近像《孟子》那样正统的著作的人道和宗法理想。康熙时代的官吏们的丰厚俸禄遏制了腐化,而雍正皇帝(1723~1736年)甚至还确立了一种数额巨大的俸禄补充——养廉费,其目的在于“维持廉洁”。

但还有更多的情况。康熙及其继任者成了经典研究和汉族文化的保护主,对汉族文化界采取了一种类似于他们为赢得蒙古和西域佛教化民族赞成其事业所采纳的那种政策。他们希望表现得既如同是中原文化的虔诚信徒,又如同是喇嘛教的最佳保护人。康熙大帝曾耗巨资亲自巡视长江下游城市,那里是中国文化界的中心。康熙共六下江南(南巡),分别为1684、1689、1699、1703、1705和1707年。乾隆于1751、1757、1762、1765、1780和1784年又循旧制数下江南。除了表面讨好奉承和不可告人的秘密政治意图之外,在某些完全被汉族文化折服的君主们身上也有某种真正的同情。做为对科学颇感兴趣者、优秀的数学家、精巧机械师的康熙皇帝,和后来的乾隆帝一样也多少通些诗词歌赋和工于书法。而且正是由这两位皇帝主持了出版丛书的伟大事业(编修《明史》、编纂书画目录、字典、唐诗全集……尤其是于1722~1782年间完成的汉文著作的大型书集),它最恰当地说明了这些开明君主对于中国的巨大文化宝藏的兴趣。这些应官方要求而编纂的著作使大批文人都有了用武之地,从而为他们在多年间解除了衣食生计之忧。此一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人显示其才能和无穷知识的机会,同时它还具有另外一种功德,即消除了大清政权最坚定的敌对者于17世纪恰恰出自其中的那个社会阶层。

政治风俗的相对温和性、由皇帝本人亲自和清朝贵族们采用中原文化、清帝国向外的开拓以及国内和平安定和全面繁荣,这一切都应该有助于平息最不妥协的爱国主义者们的愤恨情绪。

一个“儒教”帝国

但是,如果人们仅限于强调指出 18 世纪三代伟大皇帝之政策的宗法制度,那只能对中国文化精英们的地位产生一种错误的和不完整的理解。这种宗法制度(父权制)其实只是其本质为专制王权观念的另一面。如果说满族人没有反对派,那并不完全是由于中国社会在其整体上并以全面的方式满足了这种社会制度及其生活条件,也是由于反对派受到了无情的追捕。大清皇帝们希望要求其每个臣民都毕恭毕敬地服从他们的权力,对他们个人保持长久的忠诚。他们把借助于“理学”正统,在所有社会阶层中的传播而在全国各地建立一种符合伦理范畴的政权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学校一直分散到农村的现实又使得这种教理灌输变得更轻而易举。他们尤其感到该王朝的异族血统可能会对其合法性构成疑问。这样一来,官方伦理的重点就被置于权威原则和服从美德之上了。这种专制帝国与从明王朝创建以来取得的进展有关的进化过程,均可追溯得更为久远。但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儒教”帝国(把伦理正统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的关系在其中很明显地出现了)的话,那确实就是大清帝国。

强行建立伦理范围内的统治并同时使其权力合法的愿望在 18 世纪的三位皇帝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雍正修订并增补了其前任于 1681 年颁布的《圣谕》,他强迫人们公开念诵它,甚至还要求任何应试的举子都要阅读他为了使大清政权合法化而亲自御制的一部著作《大义觉迷录》(1730 年)。早在康熙在位年间,便出现了一种抵制非正统著作和腐化著作的倾向,这些著作于 1687 年被列为禁书。1714 年,审查制度变得更为严厉了。在乾隆执政年间,所有那些于其中批评了“胡人”或“夷族人”(即使是以暗示含蓄的方式也罢)的古今著作、所有那些其灵感启发之源不太正统的作品,都被为了审查或毁坏之目的而系统地搜罗一尽。1774~1789 年间

那次臭名昭著的“文字狱”由于编纂巨型汉文丛书(编纂巨型丛书或类书成了乾隆年间的最大荣耀之一)的工作而更趋恶化,甚至直到丛书编纂工作完成之后还在继续。这种制度不限于只去审查和破坏可能会对伦理秩序造成玷污的著作,还迫害作者及其亲近者。

这些令人厌恶的专制行为(归化了基督教的满族王公在雍正期间也成了类似迫害的受害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显示器:如果说大清政权最经常地是表现得充满温良,那是因为它坚持传播一种服从和归附的思想。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它使伦理道德秩序变成了其势力和稳定的基础了。

二、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帝国

满族人的使命是在草原中形成的。他们在东蒙古使该地区蒙古诸部归附,从而取得了最早的决定性成功。在他们平定了东北的领土之后,中国关内向其开放的广阔空间就如磁性一般促使他们逐渐地向前推进。满族势力早期强大的力量便决定它能够继续决定新帝国命运的方向,大清帝国必定要变成草原和西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

蒙古、西域和西藏:战争、宗教和外交

大清王朝在亚洲腹地的开拓扩展从开始起就同时与军事和宗教(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末也可以说是外交)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些问题又是由草原居民向满族人提出来的。东蒙古人归附大清王朝一事曾经引起过西蒙古诸强大部族的不安和仇恨,而西蒙古诸部当时则以“卫拉特”(Oirats)之通称而为人所知,其中包括和硕特(Koshots)、准噶尔(Dzoungares)、土尔扈特(Torguts)和杜尔伯特(Torbets)部人。在满族势力于东北形成时,和硕特人则控制了位于乌鲁木齐(今新疆的首府)与库库诺尔(青海湖)之间的全部地区。从1640年起,他们事实上已经控制了西藏。然而,他

们在西藏的这种统治地位在草原部族的心目中看来,只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他们显得如同是达赖喇嘛的保护人一般,借此可以确保他们自己具有一种无限的威望。事实上,喇嘛教自伟大的元帝国时代以来就在游牧民中获得了发展,元帝国与吐蕃出家僧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自1260年左右起便得以确立,而喇嘛教的影响自16世纪末又在整个草原地区得到了加强。继和硕特人统治西藏之后便是准噶尔人的统治,后者于1678~1679年间征服了整个新疆西部并在那里消灭了绿洲中的伊斯兰小王国。他们的首领是噶尔丹(Galdan,1644~1697年),他是17世纪末西域史上的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1686年,噶尔丹进攻外蒙古并威胁喀尔喀(Khalkha)东蒙古人,而喀尔喀人已被置于了大清帝国的保护之下,在整个大清王朝期间都始终为其忠实的臣民。对准噶尔人为了在亚洲腹地重建一个强大的游牧汗国而进行的挣扎,清王朝进行了反击,而且同时是军事性和外交性的。早在1696年和1697年间,他们便占据了位于贝加尔湖以南的地区,那里占据战略地位,而东突厥人于6~7世纪以及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于13世纪就曾对那里发动过大规模进攻。他们对于准噶尔人的最早胜利又在18世纪上半叶由一系列的征战所继续,从而导致了汉一满大帝国向位于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地区和直到尼泊尔的方面开始扩展。

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外交活动则在于进一步增进蒙古人对于西藏宗教政权的好感并使西藏人感觉到天朝的强大优势。1652年,达赖喇嘛应邀赴北京并在那里受到了隆重接待。早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清帝国的京师就变成了藏文和蒙文佛教著作的最大印刷中心,清帝国于18世纪促进了蒙文和满文喇嘛教经文的翻译。雍正皇帝在登基后9年,即于1732年将其在北京的宫殿雍和宫改造成了喇嘛庙。那里成了藏传佛教在京师的圣地之一。当清人于1751年最终成功地在西藏立足时,他们仍然很谨慎地避免在那里过份暴露地显示其权力,而西藏在天朝政府的保护权下也保

留了一种广泛的内部自主权。但其根本目的则是使拉萨这个伟大的宗教中心不会再重新落入蒙古人手中。

尽管噶尔丹在 1696 年遭到了失败并于次年死去,准噶尔人却仍然丝毫未损其势力。在噶尔丹的侄子策旺阿刺布坦(Tsewang Rabtān)或阿拉布坦(Araptān)的统治下,他们成功地建立了从南西伯利亚直到西藏边界的一个辽阔的汗国,包括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伊犁河流域和蒙古的西部。清朝为了在西藏立足而于 1705~1706 年间作出的首次尝试,被于 1717~1718 年占据了拉萨以及西藏主要中心地区的准噶尔人化为乌有了。但从四川兴师的一支汉族—满族军队却于 1720 年进入了西藏高原,他们在把准噶尔人从拉萨驱逐出去之后,在那里留下了一支常驻军队。天朝对于西藏的统治从 1751 年起就变成最终性的了,从此之后从未停止过,尽管英国人曾化费巨大力气试图夺取清朝的这种保护权。

新疆的建制

然而,准噶尔问题直到 1757 年才得以解决。在从 1728 年起清廷与准噶尔人之间的相对友好睦邻时代在于 1739 年划定以阿勒泰山脉为边境的条约之后,这种友好关系开始恶化了。北京政府决定对那些令人畏惧之敌手的战略基地伊犁领土发动一次远征,这就是 1756~1757 年间彻底消灭敌人的战争。大批准噶尔人被杀,甚至连其名称也被废除了,他们从此仅仅以“额鲁特人”(Olöths, Eleuthes)之名而为世人所知。平定伊犁河流域之后,紧接着便是 1758~1759 年对塔里木盆地的已经伊斯兰教化的诸绿洲的平定。清朝诸旗军队进入了阿克苏(Aksu)、喀什噶尔(Kashgar)和叶儿羌(Yarkand)。从阿勒泰直到昆仑山和从敦煌直到帕米尔之间的所有被平定地区,都被置于军队的指挥之下,完全由军队管理。这些地区从此便获得了“新疆”的名称,它就是西方舆地学家们所说的“中国突厥斯坦”。只是在很久之后,到了 1884 年,经过清朝漫长

的拓殖阶段之后,这片从史初时代起就混合了印度—伊朗、伊斯兰教、突厥、蒙古、藏族和中国中原诸种影响的领土才升级为“省”。它自从被划入汉—满帝国的疆域之后,又变成了政治犯和以民法判刑者们的放逐地。

大陆性和世界性的帝国

清帝国于1759年达到了其最大规模拓展领土的高峰。它控制了13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华帝国过去从未达到,此后也再未重新达到如此辽阔的幅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土今天也只有973.6万平方公里。因为,清帝国不仅包括外蒙古和台湾岛,也包括巴尔喀什湖之南以及黑龙江(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下游以东(锡霍特·阿兰山脉地区)的那些后来被俄罗斯侵占的领土。1665年左右,清朝王师甚至一直冒险推进到阿穆尔河以北的外兴安岭;俄罗斯人后来为之命名为斯塔诺夫山脉(Stanovoi),它今天已成为苏联的组成部分。但清朝这个汉—满帝国的影响甚至越出了其边境,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尼泊尔、缅甸、暹罗、越南、菲律宾、琉球、朝鲜)都承认了其宗主权并在不同程度上附属于它。

正如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清帝国也是由差异很大的人口组成的。当时的行政公文经常用满文和汉文写成,但也用喀尔木克(Kalmuk,西蒙古)文、东突厥文、阿拉伯文字和藏文撰写。这样就使官府发表了一些多体语言合璧辞书,它们今天成了语言史的宝贵文献,并因而继承了可以上溯到明初的传统,也就是由会同馆编成的辞书《华裔异语》的传统。

此外,我们还必须指出,清帝国是由诸省、军屯和保护地组成的,它在行政制度方面远不是统一的。满洲只允许满族人进入,享受着一种使之有别于中国其他省份的特殊地位。在蒙古,则是由诸部王爷头人与清朝皇帝的私人忠诚关系,确保其居民依附于大清帝国,而西藏受到一种相当自由的保护地制度的支配,新疆的领土

则由军队占领和治理。

18 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具有伦理等级的国家，它也显得是亚洲诸帝国列强中的最强大者：它对于该大陆绝大部分领土实施的统治、它那无可争议的势力以及西域问题在帝国中所占的突出重要地位等，在对于清帝国 19 世纪向西开拓的进程中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三、繁荣昌盛的时代

这个覆盖了亚洲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的大清帝国，也是世界上财富增加和人口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在 18 世纪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这应归功于其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的史无前例的发展高潮。它以其生产以及内部交易的数额之巨而身居世界诸民族的首位。

农业技术的发展顶峰

中国的农业于 18 世纪达到了其发展的最高水平。由于该国的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的产量，其农业看来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之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在传统的农作物（小麦、大麦、谷子和稻子，其品种自 11 世纪以来日益增加）之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农作物，如甘薯、花生、高粱和玉米等，它们可以使收获期分散到全年、适应贫瘠的或灌溉条件不好的土地，从而也解决了弥补冬季青黄不接的问题。美洲农作物自 16 世纪以来传入中国的影响已经使人充分地感觉到了，而且还引起了一场真正的农业革命。此外，蔬菜和水果也在食物中占据了很大份量，这还不算由小饲养业（猪和禽）和在应用灌溉的所有地区都广泛传播的由科学水产养殖业所提供的额外收入。经济作物（棉花、茶叶、甘蔗……）也都处于蓬勃发展之中。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时代的许多欧洲地区的农业可能 421

显得特别落后。雍正时代和乾隆时代前期的中国农民普遍地比路易十五执政期间的法国同行们生活得更为舒适和更为安居乐业，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也普遍更高一些。中国的公立和私立学堂的数目如此之多，以至于富裕的农民可以很容易地负担其孩子们的教育。事实上，18世纪的某些大文豪出身都很卑微。

此外，清代的农业政策也有利于小农。他们的税务负担很轻，1711年的一道敕令竟禁止增加任何税额，即使在增加人口的情况下也如此。因此，中国农村似乎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出现过一种全面的繁荣。仅仅是在乾隆执政的最后20年间，由于强加给农民阶级的负担飞快增加以及最富裕的地主（唯有他们才能够放高利贷）在类似的情况下施加压力，形势才开始恶化。

中国农业在18世纪的这种特别显著的发展高潮，也受到了与此同时产生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交流发展的刺激，它促使我们要修正今天的某些判断。

东亚某些平原和三角洲（中国北方的中央大平原、长江下游、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中国南方和爪哇的沿海平原……）上那非常高的人口密度，往往都作为季风带亚洲的特征而被人反复强调指出过，大家将此视为这些地区所固有的一种恶性循环圈的内容之一：很高的生殖率和很落后的技术，其技术基本上还停留在手工业方面。这种普遍的极端贫穷化在19和20世纪又由于某些复杂的，甚至有时是矛盾的影响而进一步加剧了，这就是殖民主义的侵入、社会制度加剧了不平等性并阻止了任何彻底的改革。但是，庸俗的外行人倾向于将此视为一种“落后”（或者按照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说法，那是与富裕的和工业化的国家相对照的一种“不发达状态”）的明显例证，而它事实上却是一部以明显进步为标志的历史的归结点。如果“发达”国家的人能够吃饱肚子，那末他们主要不是应该把这一切归功于他们自己特有的才能，而更应该是归于其历史的形势，因为其农业之最为明显的发展仅仅是在一个很晚的时代才

完成的。欧洲是一个遍布草原、休闲地和森林的地区，它从来不缺少可耕地。

18世纪是最能揭示发展差距的历史时代。这样一来，与一个人口密度小而且人数只会缓慢增长的欧洲那产量低的农业相对应的，便是导致了人口高度增长的中国那科学的和多样化的农业。

正是在此时，由于自9~11世纪以来持续积累起来的技术发展，中国和东亚的人口繁衍与欧洲相比大致获得了一种明显的发展。远东的社会不曾落后过西方社会，只不过它们走了另一条道路。

“工业化”的大手工业和史无前例的贸易发展

在衣食生计问题上的真实情况，对于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来说也同样真实，中国社会在18世纪成功地尽最大可能运用了前工业时代的技术。此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这三个领域的巧妙结合也值得强调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中国18世纪的经济发展看来似乎是一次复兴，也就是说继一个世纪的内乱、战乱和万历时代(1573~1619年)的发展之后，又再度兴旺发达起来了。但它又以其广度或规模而超越了过去。

跃居中国所有生产之首位的纺织工业，供应着一种不断扩大的市场，因为家庭劳动又使农民阶级获得了一种额外收入。早从17世纪末开始，上海西南松江的棉纺业便长期雇用了20多万工人，此外尚有来料加工的劳动。

栽培茶树的做法也扩大到了整个长江下游地区，而且在福建和浙江也很普遍。经由海路而出口的茶叶(我们应该指出，西文茶叶的名称 thé 系源出福建话，而在部分斯拉夫语中采纳的该词则很接近于华北的发音)，其数量从1762年的260万英镑增加到了18世纪末的2330万英镑，它在19世纪时也从未停止过增长。由“山户”(茶农)收获的茶叶要在大茶庄中加工焙制，每家茶庄都雇

佣数百名工人,然后再由富裕的商会负责销售,它们在广州与东印度九大公司谈判交易。

位于江西鄱阳湖之东的景德镇瓷窑中有数万名瓷工,他们的劳作既是为了宫廷和富户的订货,又是为了出口。位于湖南长沙附近的醴陵的那个不太重要的制造中心,保持着瓷器生产的最高纪录。青瓷和普通瓷器与日俱增地向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直至欧洲出口。

但我们还必须把在福建制造的纸张和蔗糖、广东新会的麻布、南京上游长江河畔的芜湖钢铁、自明代起便在广州附近的佛山生产的五金制品等计算在内(小五金是向整个东南亚出口的)。诸如南京细棉布、苏州和杭州的丝绸、杭州以北湖州的生丝都与茶叶、瓷器和漆一并出现在一直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中。此外,大家还知道中国装饰品于18世纪在欧洲所掀起的极大热潮。1703年,法国船安菲特立特号(Amphitrite,海神号)的唯一船舱装着中国漆自南京归来。

中国与外部世界,如日本、东南亚、欧洲和经马尼拉的美洲进行着商业贸易。这种交易自从1683年收复台湾之后,因取消了过去强加的外贸限制而发展起来了,这就使中国广受其利。它鼓励手工业和农业生产,使大批银钱流向那里。大家曾经得以作出估计:在1571~1821年从南美洲和墨西哥向欧洲进口的4亿块银圆中,有半数被西方国家用于采购中国产品了。如果这种估计是正确的话,那末它就趋向于证明从新大陆引入了农作物(它们在那里的传播引起了一种农业革命)的中国是最多地利用了美洲发现的国家之一。⁴²³

当然,这种海上贸易的比重在乾隆时代的整个中国经济中始终微不足道。到了18世纪末,对外贸易的税收达到了400万两白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海关收入仅为65万两。中华帝国的疆域之辽阔、人口之众多以及居民之活跃的特征,足以解释这种差异。主

要是涉及到了沿海诸省的这些对外贸易,倾向于在福建和浙江发展,而茶树的栽培也倾向于在沿海省份发展。中国原为成品的出口国,但从18世纪又开始进口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和暹罗)的大米。大米被输往福建和广东等沿海省份,因为那里主要是依靠贸易和手工业为生,其农业生产则入不敷出。数千艘可装千吨货物和180名船组人员的大帆船每年都在厦门(Amoy)停泊,厦门和广州与越南和柬埔寨海岸、吕宋岛(Luzon)、马六甲(Malaka)、暹罗的宋卡(Songkhla)和马来半岛的柔佛(Johore)均有关系。这些沿海省份的经济新方向可以使人理解其明显的“人口过剩”以及在即将到来的19世纪这个倒退时代的灾难。

中国18世纪经济发展的最典型特征之一是商业潮流之规模和由某些商会所控制的地域之辽阔。不仅是某些中国中原地区的省份,还包括蒙古、西域和东南亚,都被纳入了整个中国的商业网。在中国内地的网点显然更稠密一些。每个重要商会(山西的钱庄老板、其势力可以上溯到明末的安徽新安的商贾、其活动的目标在于将淮盐与湘鄂大米联合经营的扬州盐商……)在大城市中都拥有一种聚会点(会馆)、接待过往成员的客栈、货栈、分号和钱庄的“会馆”。

这些有时也形成“名门望族”的富商们又扮演了一种政治角色,这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巨额财富及其对地区的影响造成的。他们往往也都是些文学艺术事业的赞助者和情趣雅致的人物,并由此而无愧于在清代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清代最早几位皇帝执政年间的国家收入
(以百万两银为单位)

年 代	土地税和人丁税	盐 税	商 税
1653	21.28(87%)	2.13(9%)	0.1(4%)
1685	27.27(88%)	2.76(9%)	0.12(4%)

续表

年代	土地税和人丁税	盐税	商税
1725	30.07(85%)	4.43(12%)	1.35(4%)
1753	29.38(73%)	7.01(17%)	4.30(10%)
1766	29.91(73%)	5.74(14%)	5.40(13%)

这些数字同时揭示了出自商业的税收之相对较低比例的增长。出自海上贸易关税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仅占很小的百分比。大家由此会理解英国在18世纪末为增加交流而提出的建议何以只产生了很少的反响。

人口增长和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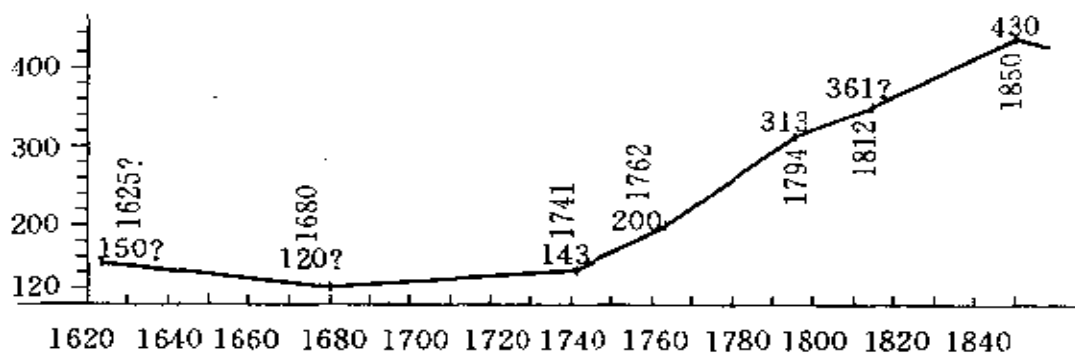
内部的安定、政治风气的缓和,尤其是农业的发展和全面的繁荣,无疑是中国人口于18世纪增长的主要原因。这种人口的发展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还是绝无仅有的。欧洲的人口从1750年的1.44亿增加到1800年的1.93亿人,而人们在中国却计算到了1741年的1.43亿人口、1762年的2亿和1812年的3.6亿口人。

中国的移民拓殖也在新疆地区发展很快,这种移民抵消了中国人口的部分增长系数。在新疆设立了军屯,其耕地在1765年达到了30万顷(近150万公顷)。向东南亚的移民也取得了明显进展。特别是婆罗洲的情况更为如此,那里在印度穆斯林使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化之后创立的苏丹国将其部分贸易留给了客家人(Hakka)血统的中国移民集团。完全如同今天的情况那样,同一个乡镇的移民都精通于同一种职业:开发金沙、农业、饲养业、捕捞业或商业。位于婆罗洲西海岸的坤甸(Pontianak)苏丹国的一个重要的移民区(位于赤道的纬度圈中)组成了某种独立于清帝国的“共和国”(团体),虽然它始终与其故乡(广东东北的潮州地区)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人们在18世纪末叶可以于其中计算到20万中国人。这

个小国内的“兰芳公司”系由一位名叫罗芳柏的人创建，它一直延存到 1884 年。

425 但在中国本土上，在南方诸省（贵州、云南、广西等地）都建立了汉族人口的移民拓殖区。其移民或来自广东，或来自北方诸省，正如现有的方言分布所证实的那样。汉族人口的发展无疑不会与他们在这些地区和傣、苗、瑶和藏—緬部族之间发生的越来越频繁的冲突毫无关系。汉族商人掠夺土地并从事借贷，以及中国官府为扩大和加强其对于少数民族领土的控制所作的尝试，成了多次反叛的原因，这些反叛在 19 世纪时发展到了更大的规模。

中国人口从 17 世纪初叶到 19 世纪中叶增长的曲线概图
(以百万为单位)



根据统计数字，人口增长率在 1741~1794 年间为千分之 14.85，而在 1794~1850 年间减少为千分之 5.66。这种增长在 19 世纪中叶之后便停止了。

426

四、边境冲突

帝国的扩展使大清王朝与边远地区建立了直接联系，从而导致了紧张关系和冲突。在云南与缅甸边境上发生的纠纷导致了中国派遣大军从 1767 年进入伊洛瓦底江的上游，清朝诸旗大军在这

些热带和瘴气地区发动的艰难战争一直延续到 1771 年。缅甸从这一时代起承认了中国的宗主权。但乾隆年间最后一次伟大武功应归功于一次令人震惊的远征：远征军在穿过西藏高原之后，于 1791 年进入尼泊尔，以便在那里惩罚习惯于在西藏南部发动入侵的廓尔喀部族。

在东亚与俄罗斯移民的最早冲突

中国与俄罗斯的接触要上溯得更早，应被断代为该王朝的初期（在 1650~1820 年间，俄罗斯成了一个欧洲国家）。它向北京派遣的使节最多，共独自派出了 11 个使团，而葡萄牙、荷兰、梵蒂冈和英国总共才派出了 13 个使团。事实上，数批哥萨克人从 17 世纪中叶起已经开始考察探索东西伯利亚，他们敲诈勒索狩猎居民，寻求垄断皮货贸易和建筑城堡。太平洋海岸的鄂霍茨克城于 1649 年建成，而贝加尔湖西南的伊尔库茨克城则筑于 1652 年。在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发生的多起俄罗斯人入侵导致了汉—满族军队的抵抗。俄罗斯人的战俘被编入清朝的旗中。1651 年由哈巴罗夫（Khabarov）建立的阿尔巴津（雅克萨）小哨所尤其成了泽亚（Zeya）河地区俄罗斯屯兵和中国军队之间多次战斗的赌注，他们轮番占领该地区。清朝甚至于 1686 年组织了一次海上远征以收复阿尔巴津。但俄罗斯人于 1686 年开始通过荷兰人与清朝谈判。三年之后，俄中第一项条约在尼布楚（聂尔琴斯克，位于北京以北 1300 公里处）签订。耶稣会士张诚（Gerbillon）和徐日昇（Péreira）以翻译的身份参加了会谈，这份用拉丁文、满文、汉文、蒙文和俄文写成的文件划定了清帝国与俄国势力范围之间的边界。在雍正执政年间，于 1727 年缔结了一项新的条约。它签署于恰克图（Kia-khta），这是位于贝加尔湖以南 150 公里处的一座小城，中俄之间 18 世纪的大部分交易，如以毛皮换棉织物特别是丝织物（茶叶从 18 世纪末起占有更大的比重，在 1760 年为 140 万卢布，1800 年为

800 万卢币)都是通过该城而进行的。恰克图条约划定了新的边界并确定了赴北京的俄国商团的规模和期限。

从发现好望角之路到 1820 年间欧洲诸邦向中国派遣使节的一览表

	葡萄牙	荷兰	俄国	梵蒂冈	英国
1521	☆				
1655		☆			
1656			☆		
1661		☆			
1664		☆			
1670	☆				
1676			☆		
1689			☆		
1693			☆		
1705				☆	
1715			☆		
1719			☆		
1720				☆	
1725				☆	
1726	☆		☆		
1753	☆				
1767			☆		
1793					☆马戛尔尼出使
1794		☆			
1805			☆		
1808			☆		
1816					☆阿美士德出使
1820			☆		

移民人口的起义

清朝对于少数民族实行的章程规则可能没有同时代的沙皇制

度那样专横暴虐,因为 17 万名喀尔木克人(卡尔梅克人,即西蒙古的土尔扈特人。——译者)于 1770~1771 年从塔尔巴哈台(Tarbagatai,位于准噶尔的西北方)逃到了新疆。但全面来看,这种制度在 18 世纪期间似乎强硬起来了,也可能是由于汉族人口(操汉语和具有汉族文化的居民)的增长,导致了清政府越来越实行一种干涉性的政策。在雍正执政年间(1723~1736 年)尚很罕见的起义与镇压战争,在乾隆执政末年却成倍地增加了,同时增加的还有帝国边境上的治安行动。对于这种于乾隆时代末期得到加强并与 1774~1789 年间的大规模“文字狱”相吻合的强硬政策,可以部分地由负责维持边境和非汉族居民区治安秩序的总兵和将军们的主动提议来解释。

早在 1726~1729 年间,云南和贵州的总督们就试图剥夺只对中国当局负责的少数民族土司们的权力,同时也试图使土著人服从中国行政区的合法官府(改土归流)。由此而产生了涉及面很大的动乱,并遭到了野蛮镇压。清政府在四川西北部的险峻山区金川一带也遇到了麻烦,那里的具有藏族文化的土著居民自 1746~1749 年发动叛乱。只是在经过为时漫长和耗资昂贵的征战之后才恢复了秩序,其中仅 1771~1776 年的最后一战就耗库银 7000 万两,比平定伊犁盆地和新疆西部多耗银 2 倍以上。由澳门葡萄牙人制造的大炮在最后的军事行动期间被应用了。

新疆的已经伊斯兰化的居民和甘肃的中国穆斯林的“回乱”,在平定伊犁的领土之后爆发得更频繁了。回乱首先在 1758~1759 年爆发于新疆西部,接着又是 1765 年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乌什绿洲爆发的叛乱。另外一次叛乱爆发在甘肃,对它的镇压活动持续于 1781~1784 年间。台湾土著民的起义于 1787~1788 年间被从大陆派遣的一支远征军淹没在血泊中了。最后,在乾隆在位的末年 1795~1797 年,又爆发了湖南和贵州的少数民族们新的和严重的叛乱。

越南人的海盗活动

海盗活动的重新猖獗在 1800 年左右爆发于南方和东南方沿海,亦即爆发于越南(一个既独立而又是清帝国附庸的国家)1787 年的事变之后。一些越南将军占据了首都河内。清帝国于次年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支持黎氏合法政府(由黎利于 1428 年创建的黎朝)。汉--满族的军队由广西地界的陆路和广东的海路进兵,但却于 1789 年被打败并撤退。越南的一个新王朝宣布成立了,这就是阮氏王朝,它一直维持到法国人占领该国为止。“大越国”的名称被“越南”所取代。继政权变化之后,大量仍然忠于已亡王朝的越南人亡命到中国,有些人定居在南京,其他人则定居在像喀勒干(张家口,位于北京的西北)那样遥远偏僻的地区,甚至直到西域、伊犁河流域的屯垦区和巴尔喀什湖以南都会发现他们的踪迹。但越南事件在中国还有一些比较久远的影响。它事实上是由越南人和中国人从 1795 年起在广东、福建和浙江沿海从事海盗活动的起因。对他们的镇压首先是由福建的海军将领李长庚(1750~1808 年)领导的,它从 1800 年一直持续到 1809 年。越南海盗的船队于 1800 年在浙江海岸的一次风暴中被摧毁,但中国海盗仍继续骚扰中国南方和东南方的沿海省份,并于 1806 年对台湾沿岸发动了一场胜利进攻。

五、政治和社会风气的腐败

腐化的发展和最早的农民起义

429 乾隆末年是一个缺乏远见和挥霍浪费的时代。在西域、尼泊尔、缅甸和西川进行的遥远而又艰难战争、抚恤金和恩赐、维持一个人数众多而又苛求的朝廷之开支,耗费了一大部分国家收入。但是,除了已开始使纳税人口感到了重压的这些负担之外,还应该

补充由舞弊行为的同时发展而造成的负担。如果必须承认腐化是政治制度的一种固有弊病，那末相反亦可以肯定这种弊病也经历过某些暂时平静的阶段，曾受到为反对腐化官员而采取的监督和惩罚的有效打击。在清朝最初几位皇帝执政期间直至乾隆执政的初期，所呈现的全面繁荣和风气都有助于缩小其影响。但在 18 世纪的后四分之一年代，腐化却似乎在整個中国官府中得到了迅速发展。皇帝和朝廷的表率行为似乎在上层阶级中传播了追求富贵和豪华的风气。

但这种发展也可以通过乾隆政策的那种越来越独裁专制的特征来解释。从 1775 年起，越来越年迈昏庸的皇帝宠信一位名叫和坤（1750~1799 年）的年轻旗人将军，后者在中央政府中对于帝国政权施加了一种既隐蔽又强有力的影响。他于 1781 年奉诏前往甘肃以在那里平定回民起义，结果却表现得如此无能和不能称职，以至于很快就被召回。但和坤却身兼数职，而且不失时机地将其亲信安插在重要位置上并组织了一个广泛的腐化网。他尤以镇压中国中部和西部的贫民起义而出名。这些贫民结成了秘密会社白莲教，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和坤的敲诈勒索才铤而走险的。和坤及其心腹福康安、和琳、孙士毅等故意拖延战机，以大量增加军费开支中饱私囊，他们还把屠杀无辜居民谎报成平叛胜利。

因此，清代这些早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既可以通过强加给农村人口的负担之增加，又可以通过和坤的敲诈勒索来解释。苦难和邪恶突然又使白莲教的古老组织重新恢复了生机。它曾先于 14 世纪中叶在元末的农民起义中后又于明末重新扮演过重要角色，并且和大部分这类遭禁的秘密会社一样以隐蔽的方式持续下来了。白莲教的起义只是在 1799 年铲除和坤之后才遭到有效的镇压，但它却一直持续到 1803 年，从而增加了清朝国库财政的亏损：仅仅 1798~1801 年间的军事开销就达 1 亿两白银。

和坤执掌朝政期间促进了从乾隆末年起在社会风气中流行的

腐化,这种影响在一个关键领域中也令人感觉到了,这就是维护堤坝和河流调节工程。奉命负责这些工程的官吏们侵吞国家资产。尽管拨给修葺河堤决口的款项数目非常庞大,在嘉靖年间(1798~1820年)就发生了黄河的七次大水灾。这些犯罪性的贪污舞弊行为于1855年导致了可怕的灾难,当时黄河在洪水最泛滥期间其洪峰流量可能达到了每秒20000立方米,以致其河道从北向山东半岛的南部移位,其距离相当于将勒阿弗尔(Le Havre)与波尔多(Bordeau)分开的间距。这条流量基本均等的河流在此前的最后一次改道发生在蒙古人统治时代的1324年,而同类的下一次大水灾可能发生在1938年。

政治制度的弊病

统治阶级的习俗和思想是政治制度的产物,对于它们的分析和评论首先由17世纪的哲学家们完成,后又由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们重复。中间始终忍受着一种中央集权的病态发展之苦。北京希望解决所有问题,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在这个辽阔帝国的所有部分都做到这一点。它的征服使该帝国扩大到了亚洲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故独自形成了一个世界。根据地点、人口、自然环境和地方性习俗之不同,形势也有所变化。然而,国家法律制度的繁琐臃肿以及法律的专制性都将皇帝的代理人完全束缚在他们各自的省份中了。由极端形式主义的文牍行为造成的超乎寻常的规模、都察院不宣而至地巡视之威胁、地方官吏冒着陷入唯有一些精通法制的师爷才能使其避免劫难的无数陷阱的风险、官吏们无数的任务以及对于所统治地区的无知(这种无知迫使他相信在当地选拔的官吏并借助名门望族的善意帮助和建议),所有这些条件就足以解释在职官吏的那种畏首畏尾的谨慎态度了。这种态度又被一种自从宋代“理学”出现以来就加强了其抑制的教育强化了。

此外,在文人阶级生活的这种长期不安定的处境中,于三年一

度的三级会考中的成功者(生员、举人、进士是分别在县、省和北京的帝国考试中获得的称号)以及此后的步入仕途,便形成了一种应该尽快利用的意外收获。高中者应将其成功归于其父母、朋友以及那些有时曾把希望寄托于其成功之上并曾资助过其学业的人。习惯认可了官吏们利用其在任期间获得某种程度的舒适安逸并完成他们的义务。他们从乾隆时代起享受的俸禄很低、落在他们身上的沉重公私负担迫使他们征敛税役,而这些横征暴敛又只是由习惯法所承认且根据情况而有所变化,以至于在合法和非法间的界限也不太明确了。我们无法断言从什么时候起有了贪污公款的现象,因为官吏们所需要的最合法的财政收入从一开始起就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来确保的,公务开支和私人开支之间的区别并非始终都很清楚。最后,官吏们陷入了一种社会关系网(裙带风),使交换使用 431 优惠照顾对于妥善处理公务是必不可缺的了。即便在此问题上,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划定一条明显界限也要冒风险。习惯法要求的礼物和礼仪变成了奉献的或索求的贿赂,而大家又无法具体说明腐化是从何处开始的。人们最终会觉得明清大专制帝国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是将其法家传统与其人文主义(也就是“儒教”)传统的内容结合起来了,只不过是唯独保持了一些有害和不利的形式:一方面是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表现得如同是权力交易的人际关系。大家不能指责当时的人们,因为许多人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形成其中一个齿轮的国家机器以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弊病,甚至许多人也具有了廉洁和一心为公的思想,但他们遇到了一种超越和限制他们的制度。

腐败的发展和官俸的大幅度削减,使人在乾隆晚年看到了一种制度的弊病,而这种制度倘若在全面繁荣的时代尚可使人们接受。从19世纪一开始,就显得大事不妙:国库的财政危机、腐化的发展、农民暴乱等都是令人非常不安的征兆,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由于伦理范围内的统治和歌舞升平的年代而被搞模糊了。皇权被簇

拥它的崇拜和敬仰孤立开了,而它本来就希望向其臣民灌输这种思想。

432

第三章 17世纪中叶~18世纪末的文化生活

在一直延续到1683年左右的那个耻辱、不安定和动乱时代,中国思想界始终受到国家关系与社会关系问题的主宰。而在18世纪这个政治上社会巩固和经济上神奇腾飞的年代,中国思想界变得更为平静了。它不是与前一个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倾向彻底绝裂,而是进入了另一个方向。我们在18世纪发现了一种科学思想的胜利,它被运用到文化传统的整个领域中了,而它的哲学蕴涵是非常明显的。

一、17世纪的哲学家

433

从清军于1644年进入北京开始到吴三桂在昆明自杀(1681年)结束之间的这一整个时代,也是一个思想自由和对专制帝国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基础进行彻底批判的时代。正是在这时,以深入的方式分析了专制主义的弊病,批判了哲学传统和传统的教育方法,并更为明确地确定了以属于一个共同体和一种文化为基础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满族人入主中原似乎引起了一种伦理危机,而这个时代(这是自由多产和新颖思想最丰富的时代之一)的最著名的思想家们都成功地通过反思而克服了这场危机。此外,对于他们来说,书斋工作似乎是受形势所迫而放弃的一种直接活动的后果或替代物。

17 世纪文化思潮的连续性

但这些人同时也是继承者。从这个形成于万历年间(1573~1619年)的社会与经济的复兴及变化的时代起,他们继承了一种作为17世纪之特征的缺乏遵从旧制的意识、一种开放的和新奇的思想。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批判倾向延长了一股反思潮流的持续时间,而这种思潮是由国势的衰败和太监们的无限权力引起的。此外,明末的改革运动与满族入主中原时代的政治哲学高潮之间的关系是明显而确凿的,清初的那些大思想家们均出自明末的反对派中,他们大部分人均属于“复社”,这是一个作为崇祯年间(1628~1644年)东林党的一种再现的文学和政治俱乐部。他们觉得清朝的征服看来是已亡帝国的政治和社会弊病的后果,从而希望首先批判一个已与实际情况失去了任何联系、而知识界的大部分人仅满足于其抽象或主观主义理论的时代。

因此,尽管发生了外来入侵,但中国的持续性仍颇为引人注目。虽然其著作的一部分要晚于1644~1645年的灾难事件,但诞生于1610年的金圣叹仍属于明末文艺复兴的时代。我们于他身上重新发现了类乎李贽的那种对于非正统文学的兴趣。金圣叹对于经典感到厌倦了,他最喜欢读巨部佛经《法华经》,当然此外还有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和《水浒传》。他恰恰是针对这后一部小说而于1641年发表了一些文学评论性的研究,并于1656年又连续写成了有关元代著名剧本《西厢记》(言情和浪漫性著作)的其他研究论著。在1661年借顺治皇帝晏驾而组织的一次仪式中,金圣叹站在了抗议的童生一边,因而被斩首处死。

在17世纪下半叶,小说作家和剧作家们继承了前人的传统,亦即明末的典型特征。正是在这个时代出版了洪昇(1645~1704年)的名著《长生殿》,它以杨贵妃和唐玄宗之间的爱情故事为内容;同时还有孔尚任(1648~1718年)的《桃花扇》。在科举中不幸

名落孙山的李渔(1611~1680年?)决定将毕生奉献给戏剧和小说的写作事业,并与同时代的金圣叹一样始终坚持作明末遗民。在其他的诸多著作中,大家特别应该将一部著名的言情小说《肉蒲团》归于李渔。

绘画也同样继续表现出了一种生命力并在“狂僧”阶层中表现出一种惹人注目的新奇特征,这些“狂僧”中的最著名者是“八大山人”(明末清初)和石涛(17世纪下半叶)。最为新奇和别具一格的同时代艺术家们的世系都与这些具有独立倾向的画家们相联系,如赵之谦(1829~1884年)、任颐(任伯年,1840~1895年)、吴昌硕(1844~1927年)和齐白石(1862~1957年)。

文人、艺术家和哲学家们于清初尚未受到由于恢复伦理秩序而对下一个世纪施加的影响。

批判专制主义和中国文化史初探

为了说明清初政治哲学的发展高潮,最好的办法无疑是至少简单追述一番这一代最著名思想家们的形象,虽然他们的某些基本大方向是共同的,但其中每个人都过份“异行”而使大家难免要对他们作单独论述。所有这些都对同时代的思想施加过一种决定性影响,此种影响启发了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维新改良家与革命家。

他们这一代人中的最年长者黄宗羲(黄梨洲,1610~1695年)诞生于浙江宁波地区的一个官吏世家。他成长在一个反对宦官专制者们的环境中,年轻时亲眼目睹了东林党的秘密斗争。其父参加了该党,后来根据魏忠贤的命令而于1626年被在狱中处死。4年之后,黄宗羲在南京加入了复社。他招致了阮大铖(1587~1646年)对他的不共戴天之仇。阮大铖是一名很有才华的剧作家和信奉享乐至上的文人,也是一个腐化的高级官吏,他在曾作为其忠实盟友的魏忠贤被处死之后又复获上宠。黄宗羲只是在最后的时刻由

于清军向南京的推进才得救,但却立即参与了抗击入侵者的斗争。1649年,他与其他抵抗首领共赴日本长崎以便向日本请求援助。看到一再的努力均毫无成效之后,他便放弃了斗争并返回祖国,以便在国内全神贯注地投入历史、哲学、天学和数学的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明夷待访录》(1662年)是对明末专制制度的全面批判,其政治观点是自由化的。他认为,君臣都应为民效力,而不是相反。他强烈地反对满族人,曾于1678和1679年拒绝了为他谋求一个职位的提议,同时又拒绝了由康熙皇帝倡议的编修《明史》的合作计划。黄宗羲本人是南明史以及该抗清时代之人物史的专家,更始终以第一位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物而著名。黄宗羲最著名的两部著作是有关明代哲学学派的研究文集《明儒学案》(1676年)和到死仍未杀青的宋元时代(11~14世纪)的中国哲学通史——著名的《宋元学案》。⁴³⁵

这些研究均受到了对于明末危机和中原王朝面对异族入侵所遭到失败之根本原因进行反思的影响启发。它们可以通过黄宗羲对于培养人才问题的强烈关怀和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来解释。他那于其中往往表现出勇敢有时还有革命性精神的全部著作,看来是对当时的国家与社会的一种批判。

进化论的社会学

比黄宗羲年轻9岁的王夫之(王船山,1619~1692年)出生于湖南衡阳,他也曾属于复社。王夫之应后来成为南明永历皇帝(1647~1660年)的桂王宫廷之召而来到广东,参与了抗击入侵者的斗争。但他后来却如其他许多人一样,突然决定在一种勤奋的隐退中寻求无疑既是一种逃避又是一种新活动行为的生活方式。他在生前不太著名,其著作全集仅仅在19世纪前半叶期间才首次被刊印,它的雕版后来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1851~1864年)被毁。王夫之在许多方面都颇接近于黄宗羲,对于明末直观和主观哲学

的批判、自由主义和反专制主义的观念、对于抗清史的关注等都是他们的共同点。但王夫之的历史反思却比黄宗羲更深远，一整套不明确的哲学(据说是自然主义的和“唯物论”的)均出自其有关历史进化论的观念。据王夫之认为，人类社会的变化是自然力量的产物。这样一来，从封地采邑到作为古代社会末年大革命之特征的行政区域的转换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正是这种现象造成了把最上古的社会视为黄金时代的传统，而它事实上是与大家可以对历史所作的理性推论背道而驰的；人类的历史始终都以一种不间断的发展和社会的持续性进步为标志。上古时代的君主们使他联想到了湖南的苗族或瑶族的酋长们，因为他曾经在这些人中居住过。这种大不敬的比较并非受到了喜欢打听丑闻之兴趣的影响，而是出于对真谛的酷爱！此外还有更多的因素，人们在王夫之的著作中发现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历史“结构论”的观念，它在一个整体性始终为其基本观念的社会中，远不像它在西方表现得那样出乎意料。据王夫之认为，特定时代的社会制度形成了一个大家无法以这样或那样的做法将其分割开的统一整体。在发展中不仅有必然性，而且在这种发展的每个阶段的社会与制度之间都有迭合性。这样一来，汉代行用的由地方选择和官吏推荐(乡举里选)的古制再也无法被行之有效地使用了，因为能使之维持下去的所有条件都已消失。同样，如果在所有制观念发展以后再想恢复均田制，那也是纯属幻想。那些试图以恢复旧制而医治当代弊病的怀旧者都将其希望寄托在一种历史前景的根本错误之上了。

在这种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敏感意识之外，王夫之又增加了一种透彻的社会学感想，使之变得对于致使各种文化之间对立的多种差异更敏感了。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在生活方式和传统方面比汉人和草原民之间的差别更大了。而在王夫之的心目中，这正是抨击清军入关并为对新政权的抵抗进行辩护的原因。王夫之的著作后来被清末和民初的人狂热地阅读。大家知道毛泽东也

曾属于一个研究王夫之著作的学社“船山学社”，该学社在 1915 年创建于长沙。王夫之看来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位理论家，而这种民族主义又是以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共同性为基础的。他的反省思考一直扩大到了动物群体中：动物界（如蚂蚁界）就是根据两种主要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即“保类”和“卫群”。人类社会的情况也应该如此，对国家来说再没有比维护文明类型和保护其国民不受外来攻击更重要的功能了。

顾炎武——近代史学和训诂学之父

顾炎武（顾亭林，1613～1682 年）通常被认为是他那一代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出生于苏州附近的昆山，在青年时代属于反对派并于 1642 年加入过复社。他在一段时间内曾为当时在福建的南明唐王效过劳。顾炎武热衷于经济、军事防务和行政问题，从 17 世纪中叶起便在华北旅行。其秘而不宣的意图是访问仍在坚持抗清游击战的地区并为进行一场抗清战争而研究这些地区的有利条件。这些次数颇多的旅行（他的第六次亦即最后一次旅行是于 1677 年拜谒北京北郊的明皇陵），对他来说乃是持续地丰富其舆地、金石、历史、经济学识以及深入发展其反思的良机。他最早的著作之一《天下郡国利病书》是其对于与经济和防务问题有关的舆地研究的硕果，其价值在于一切均是出自他个人的地理知识。顾炎武比较了由他全面潜心攻读过的明代方志所提供的资料，但形成顾炎武 437 之特征的因素则在于他经常关注其实用性（经世致用）。据他认为，知与行绝不能互相分离。他将有关经济和行政特征的具体思考结合在一起了。

顾炎武最著名的著作是他在大量阅读期间逐日所作的笔记集《日知录》。该书附有一篇被断代为 1676 年的序，于顾炎武死后在 1695 年付梓。这部著作的内容极其丰富，触及到了非常广泛的主题：经典、历史、政治、社会、地理、心理、伦理等。

顾炎武被认为是于18世纪获得辉煌成就的文献与历史考证新学派的创始人。他扩大了历史领域,为它首次提出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的观点,并运用下述辅助科学——金石学(我们应把《金石文字记》归于他)、考古学、历史音韵学(顾炎武于1677年发表了其《音学五书》)、舆地学。他为研究经典而提倡同样严格和合理的分析方法,从而开创了恢复最古老的注疏家传统的学风,尤其是开创了可一直上溯到最古老的注疏学家——汉学派和特别是伟大的郑玄(127~200年)的复古学风。

顾炎武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与他的科学观念是吻合的。他攻击了“性”(人性)与“心”(思想)之概念的含糊和抽象特征,这些概念自宋代以来就变成了伦理学和哲学辩论的唯一内容。在他看来,属于自然范畴的理学派仅仅是佛教哲学的一个平庸的变种,而现在则是迅速用一种注重实际的态度来取代有关性与心的学术以及永无成效的辩论的时候了。必须复归到真正的人和具体的事,并向所有的知识形式开放。顾炎武在为其后人指出道路方面的功劳比他个人的做为还要大得多。

在政治方面,大家在顾炎武的书中发现了对国家衰败原因的一种深入分析。他对于明末的政治和行政制度作出了比较严厉的评价,但这种制度却被新的大清王朝未作多大变化地保存下来了。人们从他身上又重新发现了已经由黄宗羲提出的思想,也就是说他认为过去为民效劳的君主后来却把帝国当作他们的个人财产了。但政治制度之弊病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在中央政权与其在各省的代理人之间、另一方面在统治者和民众之间都出现了分裂。对官吏们的怀疑、典章制度数量的膨胀、控制和监督层次的成倍剧增,都使行政官吏们的权威缩减到微不足道的程度,而且也迫使他们依靠一个知识分子的小官僚机构,而这些知识分子们都熟悉当地的环境以及一种能使任何主动行为都陷于瘫痪的复杂局面。这样一来,天子的权威竟然发展到不仅存在于被官府委任的官吏们

身上,也存在于其知识分子的下属之中。这种内容后来经常被重复论述,特别在19世纪时更是如此。对于这种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极端行为只有一剂良药:在政治制度中重新引入一定程度的地方独立性,把主动性的欲望及其责任感归还给各省的官吏,同时也把他们已失去的权力归还他们。

恢复实学和新教学法

17世纪下半叶的基本倾向是对明代文化传统的批判以及恢复实学。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们都表现出了对实用科学知识的强烈兴趣。顾炎武是舆地学家、经济学家和战略家,他通过实地调查研究而验证了他那博深的书本知识。但他并非是其时代绝无仅有的人物,例如比他小18岁的顾祖禹(1631~1692年)就撰写了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学著作《读史方舆纪要》,这是他于28~50岁之间始终不停地思考、阅读和旅行的成果。黄宗羲不仅是第一位中国思想史家,他也留下了有关数学、天文学和音乐理论的8部著作。稍后不久的梅文鼎(1632~1721年)非常熟悉西方数学,也就是利玛窦(Matteo Ricci)及其继承人向中国揭示的那种数学,他将此与中国数学作了比较并为之恢复了名誉。

但人们却是在颜元(1635~1704年)身上找到了对“实学”的最矢志不渝的捍卫者的形象。颜元年轻时代受朱熹派传统的熏陶,全身投入对《性理大全》的研究。《性理大全》是一部于1415年编纂成的有关人性和自然之理的巨型哲学类书。但后来他突然又发现自己本为其祖父的养孙,由此所产生的一场严重神经发作的震动使他背离了原有的兴趣。他从此刻起便变成了“理学”传统的最尖锐批评者之一,其思想倾向于全盘抛弃经典文化,认为它从本原来说是错误的,而从后果来说是有害的。对于上古时代的研究导致他坚信古老文化主要具有实用的特征,它主张一切都要为射箭、驾车和数学让路。颜元为体力劳动和灵巧的手工业恢复了名誉。与只

能产生一些胆怯的、懒散的、不能付诸行动和无法做出决策的人的书本教育方法针锋相对，他提出了一种能动员整个人类并赋予实用知识适当地位的施教方法，这些实用知识包括农业、医学、拳击、骑术、武备、军事等学科。1696年，颜元于河北主持了一家书院，并将武备、军事、箭术、骑术、拳术、机械、数学、天文和史学纳入到其教学计划之中。

这是对经典研究的一种全面摒弃。在颜元看来，经典研究已经在长篇累牍的注疏和再注疏的掩饰下失去了其本意。颜元将其反对“浮文”的基础建立在一些哲学观念之上，即认为艺能（手工劳动）以及与具体实际的接触为一种知识形式。更为精彩的是，若无“行”并将“行”付诸实际，那就不会有真正的“知”。在事物之外，还会有什么理（天理、事理和生理）呢？

440 当然，我们不应把颜元视为一种特殊的孤立现象。在他与诸如明末李贽那样的反传统的人士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他的哲学与其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倾向相吻合。但他实际上却并不为同时代的人所熟知，其思想主要是在他死后由其弟子李塨（1659～1733年）传播的。

二、开明专制君主统治下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

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全部伦理气氛都发生了变化。对已亡前朝的留恋、中国中原人的爱国主义、对入侵者的仇恨、热衷于批评社会制度以及继满清入主中原之后数年间的整体动荡的局面逐渐地趋于消失了。文化精英们归附了新政权，开明专制君主们与此同时却似乎执著于清楚地证明君主专制制度和社会传统的美德，而这一切又恰恰是17世纪哲学家们攻击的目标。大家正是在他们的统治时期才目击了专制帝国和伦理正统之最后和最辉煌的一次发展高潮，这次高潮后来证明是中国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它也受

到了历史背景的促进。

在文学和思想领域中,国家的行为应该同时具有有害和有益的表现形态。一方面,反对所有反抗形式的无情斗争以及建立伦理秩序的后果,就是遏制了 17 世纪的社会与政治批判的巨大潮流,同时也导致了做为明末特征的这种市民和平民阶级文学的消失。另一方面,康熙皇帝及其继承人成功地与旧文人阶级建立起来的全面融洽关系、繁荣和内部和平、国家的鼓励和数量很大的订货数量,又使 18 世纪变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兴盛的时代之一。中国文人无疑从未如此将他们文明中的美学、文学和哲学传统都集于自己一身。18 世纪的中国文人,或者至少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都是博学多识的思想家和天才的学者,但同时又是爱好纯朴和举止稳重的风雅之士。虽然在人文背景方面确实差异很大,但他们都是我们启蒙时代的文人和哲学家的真正同代人。

伦理范畴

从明朝继承下来的社会制度强有力地帮助了大清新政权的巩固,1656 年的重开科举比其他任何机制都更明显地有利于此。此举的迫切目的在于更新政治和行政官吏队伍。在指导整个活动的方向、调动和利用旧统治阶级的所有雄心抱负的时候,从乡村一级直到中央政府一级,科举制长期以来都将他们与行使职权一事密切地联系起来了。作为获得荣誉和政治职责的唯一仕途渠道,科举被用于向他们灌输必须忠诚和服从专制帝国的道德。它们也耗尽了数代文人的精力,考试的虚伪特征自从规定写八股文起就已暴露出来了。据顾炎武认为,八股文从 1487 年起就被强行通过了。这些虚浮和无聊文风的习作,其目的在于分八股而发挥引自某部经典的某个句子或某个句子组成部分的意义,完全如同我们今天的论文也都带有引言、命题、反命题、合题和结论一样。

441

此外,大量配备有良好藏书楼的私立书院是自 16 世纪中叶起

于明代创建的，它们很快就变成了自由辩论和反体制的中心。但它们在东林党于1625~1627年间惨遭失败后大都被关闭了。大清王朝对于所有形式的批评都比明朝更警觉和更不可调和，故对讲学和书院实施非常严密的控制。清人自己于1657年建立的那些书院都由国家扶持保护，在那里只能写八股文。

新政体除了为发展一种官方教育和增加学校数目而作出了巨大努力之外，还针对那些已被证实或者仅仅是受怀疑仇恨异族王朝和具有恶意的作家们而制订了审查与迫害制度。这种强硬态度在雍正年间(1723~1736年)进一步加强了，并最终导致了从1774~1789年乾隆年间的大规模文字狱。共有10231部171000卷书被列为禁书，其中有2320多部完全被销毁。同时又采取了一些粗暴的措施以迫害那些作家及其亲属们：处以极刑、流放、强迫劳动、没收财产……20多年间，官府在整个帝国的范围内查抄禁书，因为它们表现出对清朝缺少尊重，或者因为它们仅仅存在着一些已列入避讳的文字、批评了历史上的胡夷族人、似乎受到了异端邪教的影响或提供了具有战略价值的情报。告密行为受到了重奖的鼓励，持有可疑的书籍或保持共谋性的沉默都要受到最严厉刑法的惩处。由此而产生了一种争相为官府效忠的卑鄙或愚昧倾向。

乾隆时代大规模的文字狱历来臭名昭著，它的规模和效力来自于它和下述活动的联系——把当时已为人熟知的著作编成《四库全书》。不过，它与在18世纪三位明君统治时期经常存在的不安心情也是相应的。从康熙执政年间开始，皇权对于伦理正统性的关注和对于不忠诚或反对的任何一点迹象所表现出的怀疑都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这样一来，1660年刊印和被认为具有颠覆行为的简明《明史》的作者的亲朋均于1663年在浙江省被判处死刑和流放。

443

从17世纪末开始，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淫海著作的活动。那些伤风败俗的著作都于1687年被列为禁书，而书籍查禁检查制度

也在1714年变得更为严厉了。新的大清王朝是严格的清教徒,对于用一种近似口语的语言写成的消遣文学持敌对态度。这种文学在康熙年间几乎完全消失,让位给更精致和学术性更强的体裁了。国家在该领域中的行为是否会更符合文人界本身所希望的那种观念呢?它很可能也与社会的变化和某种读者阶级的消失相吻合,而这一文化修养不太高的市民阶级是从明末发展起来的。在所有的情况下,如果消遣文学要生存下来,就要改变性质,当然也要改换读者群。蒲松龄(1640~1715年)的故事集(《聊斋志异》,约为1700年左右)、袁枚(1716~1798年)的《子不语》(1788)、大文豪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1789~1798年)等,都是用很难理解的、充满文学模糊记忆和隐喻的古典语言撰写成的。长篇通俗小说(诸如14世纪的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或17世纪的《西游记》)流行的时代业已过去了。小说巧妙地变成讽刺性的了,如吴敬梓(1701~1754年)的《儒林外史》;或者变成心理分析性的了,如曹雪芹于1763年逝世时未完成的著作《红楼梦》;或者变成高度学术性的了,如夏敬渠(1705~1787年)的《野叟曝言》。

尽管伦理界似乎结束了曾形成明末清初之特征的政治哲学和通俗语言文学的发展,但伦理和政治束缚的压力却似乎既未窒息深刻反思,又未压抑批判思想,甚至也未遏制想象力。尽管存在着对渎君犯的迫害,而且大清体制也具有专制的本性,但全面来看,18世纪仍为一个处于平衡状态的时代。虽然像戴震(1723~1777年)和章学诚(1736~1796年)那样的大思想家们丝毫未放弃其批判精神,但他们却都与其时代完全协调。像他们一样的具有独创精神的自由派诗人袁枚(1716~1798年),也不会因为害怕丑闻而畏缩。袁枚在文学内容方面是自由表述派的信徒。他远没有为诗词指定一种伦理目的,而仅仅赋予了诗词一种表达诗人情感和人格的目的,此外别无他求。他以解放妇女的保护人自居,宣称他反对一夫多妻制和自宋代以来广泛流传的裹脚陋习等。相同的女权主

义倾向于 19 世纪初叶又重新出现在北京人李汝珍身上。李汝珍(约为 1763~1830 年)是语言学家和撰写于 1810~1820 年的百回著名小说《镜花缘》的作者,该书后来于 1828 年付梓刊印。根据一种在欧洲文学中风靡一时而且大家在日本也曾遇到过的做法,他通过对一个想象中的国家——女儿国(这种神话在中国已经很古老了)的描述而达到了讽刺的效果,因为该国中的性别情况与大家在清帝国中发现的那种完全相反。

444 这些隐蔽的或直接的批评并没有重大后果,也并不很重要。此时与 17 世纪思想家们的社会和政治批评已相差很远。在开明专制君主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大体上对他们的命运表示满意。18 世纪文人们的通信可能以其独特的方式证明了这种感情,这种书简文学与我们启蒙时代的那类文学具有同样丰富的内容,它以一种亲密、纯朴、直接和有时又不拘礼节的口气为特征。例如郑燮(郑板桥,1693~1765 年)在其他许多人看来是一位具有骑士般骁勇风度的奇人,同时他还是充满想象力的书法家和一部《家书》的作者。至于这种朴实而深奥的文风,则可以在一部于 20 世纪初叶由一名失意文人撰写的充满魅力的自传——沈复的《浮生六记》中被发现。

皇帝和富商们对文学艺术事业的赞助

自宋代以来采用的科举制,因其梯次的等级和考生的众多,而导致了官职的名目倍增,但它们却从未达到过帝国官员们特别向往的状况。这些缺乏其他收入来源的文人们被迫过一种不安定的生活,被迫自行寻找一些保护主并作为豪门富户的私塾教员、官吏们的私人文书、学堂的普通先生、有时甚至以从事不光彩职业而谋生。为科举论文所写的写作教科书、传记、墓志铭、小说、故事或剧本、预订的作品或具有商业特征的作品等,均构成了这些人的一种珍贵的补充收入。因此,这样的经济现实无疑不会与中国自宋代以

来和尤其是明清时代的文字作品毫无关系。然而,我们确实感到,全面的繁荣和大量的国家订货,在18世纪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文人阶层中的一大批人来说,曾经确保了一种较大的稳定性。

事实上,从康熙时代(1662~1723年)起,官方就雇佣了大批文人从事刊布文献以及编辑著作、考证或学术著作的浩繁工作。康熙年间第一项最大的出版事业是修纂《明史》。其计划从1679年起就已经制订好了,而其监修工作于1682年被委托给了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1631~1694年)。一个人数众多的史学家小组致力于编修这部卷帙浩繁的断代史,它比直到当时为止修成的任何断代史都更为广泛和更为精确。这项开始于1679年的工程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的1735年才告完成,全书共包括366卷。

正是在康熙执政年间,又开始了五部浩繁的图解类书的编纂工作,这就是《古今图书集成》。它于1706年由一位叫作陈梦雷的人以私人名义编修,可能直到1725年才完成。陈梦雷因牵涉进了福州的一次叛乱事件而被判处死刑,但却享受到了减刑,被发配到盛京(沈阳),而在康熙晏驾之前又蒙赦返京。他后来又被康熙的继承人重新流放,因为该皇帝要求陈梦雷的名字不出现在这部代表着他一生心血的著作中。这部多达1万卷的类书包括以下几编:1. 历象编:乾象、岁功、历法、庶征;2. 方輿编;3. 明伦编(历史);4. 博物编:艺术、神异、禽虫、草木;5. 理学编:经籍、学行、文学、字学;6. 经济编,法律和制度。它后来于1728年用铜铸活字刊印,共包括近1000万个方块字。

我们还应该提到,在康熙年间编纂的唐诗总集被称为《全唐诗》,这项事业由一名“包衣”(Booi)的旧仆人黄寅监修,他是著名的《红楼梦》作者的祖父。《全唐诗》完成于1703年,共汇集了由唐代2200名不同作者所写的48900首诗。

按韵尾分类的二、三个字的短语辞书《佩文韵府》提供了引自从经典到17世纪的不同著作中的例证,成书于1716年,共包括

558 卷。正是在同一年出现了著名的《康熙字典》，它从出版起直到 20 世纪初叶始终是西方汉学家们的基本工具书。这是一部由 30 名语言学家组成的小组完成的著作，他们为此而工作整整 5 年。它提供了按照从明末开始使用的 214 个偏旁的体系而分类的 42000 个字的字义和用法。

我们总共可以计算到康熙年间的 57 部官修的或由国家保护和资助的巨部出版物。但最重要的和最著名的一部著作，却应是在乾隆时代编纂的《四库全书》。它汇集了保存在皇家文阁中的或私藏的全部刊本和稿本著作。由 360 位文人组成的一个小组从 1772 ~ 1782 年共为此下了 10 年的功夫。对书籍和稿本(无论是通过自愿或强迫而获得的)的搜求持续了很多年，似乎基本是全面的。此书共包括 79582 卷(15 世纪初叶的一部类似著作《永乐大典》仅仅包括 11095 卷)，依“四部”(经、史、子、集)的体例而分类。当时共雇用 15000 名抄书人来誊抄这部巨集，而以当时的手段则根本无法付梓刊印。一种提供了有关其作者、版本和文献价值的目录提要又附于全书之外，后来于 1782 年刊印。此书的书名叫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中国所有书目提要论著中的最珍贵和最完整者。

除了国家的这种非常有利于文学、艺术和学术发展的行为之外，还应补充非常富裕的商贾们为赞助文学艺术事业而作出的努力，这些人都是珍稀书籍和字画的搜集者，同时也是文人和学者们的保护人。其世系可以一直上溯到明末江苏扬州的盐商者，就是 18 世纪最著名的文学艺术的保护人。如马氏兄弟，也就是诗人和藏书家马曰琯(1686 ~ 1755 年)及其弟马曰璐(1697 ~ ? 年)，同时还有后者的儿子马裕。诗人和语言学家抗世骏(1698 ~ 1733 年)和历史地理专家全祖望(1705 ~ 1755 年)，在扬州时都是马家的座上客。在享受过富商们保护的最著名文人中，我们可以提到齐召南(1706 ~ 1768 年)，他是有关江河和运河史、历史年代、温州大港及其浙江地区方志著作(《温州府志》)的作者；钱大昕(1728 ~ 1804

年),史学和金石学家;另外还有戴震。甚至还有其他某些人,如数学家、舆地学家和经典专家阎若璩(1636~1704年),均出身于富商家庭。阮元(1784~1849年)的情况亦如此,他是一个百科全书般的思想家,大家应该感谢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有关绘画史、数学、古典语言学、金石学、地区方志的著作(他写成了一部有关广东的方志,即《广东通志》,但他特别以其对经典的疏证著作集《皇清经解》而著名)。

因为从1800年左右开始的铜钱贬值而破产的富商大家族的衰落,可能与国家订货的迅速锐减和重大出版事业的结束互相吻合。由此而出现了19世纪文化界中的深刻变化。

三、18世纪的文献考证高潮和哲学家

447

考证派的形成

运用由顾炎武及其同代人所确定的文献和史料考证的科学原则,可能导致对有文字记载的传说中最受人尊重的内容提出质疑,这就是对经典的考证。这种做法在中国社会中要先进一个多世纪,它在当时就起了类似希伯来文献在西方的《圣经》研究领域中所起的那种作用。这样一来,大家就可以把顾炎武或者更应该是他最著名的继承人之一戴震比作勒南(Ernest Renan);同样的科学严格性以及对于真理的同样关注心情,影响了中国的戴震和西方圣经研究的奠基人。

到了17世纪末叶,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大(1633~1683年),与他那个于1679~1692年间参与了编修《明史》计划的兄弟万斯同(1638~1702年)一样,也指出了《周礼》绝不像大家直到那时还坚信的那样是周初的一部著作,而是于战国时代(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完成的一部晚期的汇编著作。阎若璩(1636~1704年)重新开始了梅鹗过去有关《尚书》的研究工作(梅鹗的著作发表于1543

年),并在其《尚书古文疏证》中为古文传说的伪作特点提供了新的佐证。他也驳斥了把朱熹派的《四书》之一的《大学》归于孔夫子的弟子曾参的做法。胡渭(1633~1714年)宣称,曾在理学的宇宙论中起过一种重要作用的著名图案《河图》和《洛书》是宋初的作品。

但18世纪的训诂学家们在对自宋代以来最受尊重的传统进行批评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一些,他们毫不犹豫地犯下了大家可以认为是可怕的亵渎先圣的错误:袁枚(1716~1798年)是自由主义的、异行的和矫揉造作的诗人,他出于追求哄动的癖好而炫耀一些女权论的思想并使自己受到许多女弟子的殷勤讨好。他是第一个把颇受尊重的《诗经》中的《国风》视为普通情歌的人,这种理论后来又由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年)所重复并给予高度评价。汪中(1745~1794年)竟敢把自宋代以来就高升为正统思想保护主的孔夫子从其宝座上赶下去,获得并恢复了孔夫子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时的应有位置,从而只是与当时和他同样著名或者比他更著名的墨子齐名。崔述(1740~1816年)拒绝有关作为道德楷模的上古时代君主们(尧、舜、禹……)的传说的任何价值,其根据是这些传说是随着大家在时代的前进中发展和丰富的新的具体情节。中国传统中的所有神话都发现自己逐渐受到了怀疑并被化为乌有。

作为18世纪主要荣耀之一的文献考证的伟大运动是从17世纪下半叶启动的,起初看来是在反对朱熹派哲学和王阳明的心学派哲学。宋明时期的几代人大不关心将他们的疏证诠释建立在对历史著作和文献的严格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他们都不由自主地趋向于歪曲古人真实理论之本质的思考。甚至某些人在满清入主中原的翌日就揭露了自11世纪以来哲学家和经典疏证家所受的佛教影响:朱熹派的二元论观念、王阳明及其继承人的主观唯心论部分地起源于佛教哲学,其他则起源于禅宗思想。因此,必须回归最古老的传说并摆脱自宋代以来积累起来的一整套诠释。新的文献

考证运动一般均以“考证学”一名而为人所知，有时又称之为“汉学”。但严格地说，“汉学”一名适用于从17世纪末就在苏州一个文人家族中发展起来的文献考证传统，该家族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1721年)一样,醉心于数学史的研究。他有关耐普尔(Napier, 1550~1617年)计算规则的知识,可能激励了他去运用中国古老的用小草签策进行计算的方法,它至少从13世纪起就可以使人解多元方程。这就是策算(1744年)。他写了一部有关测量圆的论著《勾股割圆记》(1755年),研究并重版了宋元时代的数学旧作。但戴震实际上在训诂学研究方面尤其表现为当时最伟大的大师之一。他注释了公元前3世纪屈原的抒情诗(这就是《屈原赋注》,1725年)、从事了历史音韵学的工作、评注了形成《地官》或《周礼》最后一部分(无疑应断代为公元前8~公元前5世纪)有关上古时代技术的论著(这就是《考古记图注》,1746年)。但其精力的大部分则被用来编纂不计文献出处的大型官修丛书《四库全书》,他从1773年起便成为其主要的主持人之一。

449 戴震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最著名学者之一,也是其时代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在训诂学方面所采取的科学态度是与某种哲学不可分开的。他在这方面最著名的著作是《原善》(1776年)和一部有关孟子研究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1772年);出于非常系统的怀疑以及对于上古社会的无限崇敬,他在书中揭示和暴露了宋代新儒学家们使孟子思想遭受到的歪曲。他敌视理学正统,因为这种理论认为大自然是由“理”和“气”所组成的。他仅仅在这两个术语中保留了他自己认为可以解释所有现象的后者。他在这方面忠于中国思想的深刻倾向,并从这种有关实际生活的一元论观念中得出了结论。他认为,即使是最崇高的伦理也派生自我们的意愿和本性。这不是由于伦理的基础存在于自私之中(这将是一种简单化的解释),而是由于它分占了人性中最根本的因素。维护自己的本能、饥饿、性欲等都是“道”的表现形式。这也并不是由于没有抽象的才能(正义、公正、人道、礼仪、意识),而是因为并无脱离肉体的和独立于需要与情欲的知识。他认为希望消灭人欲要比希望阻止江河奔流更危险。伦理道德的目的不在于抨击和遏制人欲,而在于和谐

地利用这一切。因此,大家在戴震身上发现了对于自宋代以来便确立了其威望的遵守习俗的伦理的彻底批判,这种伦理以“理”的名义,阻止了最卑微的人与最年轻的人去自由表达其意愿和满足其向往。在他的心目中,这种伦理是犯罪与反目失和的主要根源。

对戴震在当时似乎曾引起很多反响的哲学观念,追随者甚寡。但他相反却在学术研究中拥有一些著名的继承人。三位大训诂学家到乾隆末年甚至直到19世纪初年都在继续着其事业。这就是戴震的直传弟子段玉裁(1735~1815年)、王念孙(1744~1832年)和王引之(1766~1834年),他们是18世纪曾大放异彩的“考证派”的最后代表人物,该派从19世纪初叶起便已开始丧失其优势地位了。

一种历史哲学

比戴震小15岁的章学诚(1738~1801年)与戴震一样是18世纪最深邃和最新颖的思想家之一。但在一个其时尚是学术研究、文献考证和经典疏证的时代,章学诚在他所代表的反对派倾向之范围内显得像是个例外。历史编纂学的方法和历史哲学都是其反思的主要内容。这样就可以解释他于其时代只能引起很小一点公众舆论的原因了。但在20世纪时日本和中国的汉学家们已为他恢复了名誉。

章学诚和王夫之、顾炎武一样,对于地区性的实际问题颇感兴趣,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了解中国地区的历史。中国的地域与整个欧洲一样辽阔,不可能视之为一个非常统一的整体,而只有借助于不同地区的史籍、利用方志和编写新方志(章学诚本人曾热衷于编写一部方志,但令人遗憾的是却失传了),才可能转向与中国社会史同样复杂的历史。因此,重要的是通过向老人叩头调查和搜集直接资料而建立地方档案,收藏金石碑刻以及稿本著作、口碑传说等手段。章学诚也和顾炎武一样,认为历史资料应该是百科全书式

的无所不包。但他在该领域中却表现得更激进一些：所有的成文著作，无论其性质如何，也包括真正的经典著作，在他看来都是历史资料。然而，一旦搜集到这些很全面的文献之后，便不再按照公元7世纪时的一个历史修纂小组那样的方式进行机械编纂了。历史应该是人的作品，同时又是对过去的确切反映。最佳的史学著作是一些个人的作品，这就是所有史学著作中的最令人仰慕者——司马迁《史记》的情况。

最奇特的情况是，对编修历史的这种关注通向了一种哲学，这就是章学诚的一句名言：“六经皆史。”由这句话便反过来断言史书甚至与经典一样具有崇高地位。史学中渗入了一种哲学原则，它本身就包括“道”；道却又是不可见的，人类只能了解它的一些历史表现形式。而人类社会又必须受这种本为“道”的自然之理的支配。现实本身也是历史，它为宇宙之理提供了论据，甚至由于这种原因而具有与过去同样的崇高威望，这与酷爱上古时代的人们的观点截然相反。如果说文献考证运动代表着反对朱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之极端行为的一种良好反响，那末它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学术研究的成功往往都伴随着放弃任何思考和综合。追求细节变成了目的本身，最细小的发现也满足了学者们的虚荣心。因此，最重要的是
451 回归到下述基本的真理：可见世界是由一种内在的“道”赋予其外形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观念，它与黑格尔的看法不谋而合，但根据像章学诚那样一位史学家的目光，却唯有通过亲身履践以及和以往的历史直接接触，才会形成哲学的观念。

四、耶稣会士的业绩与中国对欧洲的影响

通过明末入华的首批耶稣会传教士而开始的对话本不应被中断。恰恰相反，耶稣会士们于大清前两位皇帝执政年间在中国更为牢固地立足了。直到其修会于1773年被取缔，他们在北京的存在是被允许的，尽管梵蒂冈采取了不调和的态度，而且雍正与乾隆皇

帝对于传教活动也持有戒心。由于传教士们的活动,欧洲学术界才获得了丰富的有关中国和处于鼎盛时期的大清帝国的科学情报和其他资料,而当时中国自己也接受了从欧洲传去的某些新内容。大家无疑尚未充分地公正评价这些交流的重要成果,尽管已经就此写了大量著作。

科学事业和耶稣会士在华的影响

耶稣会传教士们相当巧妙地置身于明末的宫中以及首先在充满混乱的起义暴动、然后又有清军侵入并镇压抵抗运动的各省份中立足,他们可能从顺治和康熙皇帝那里获得了一种同情,而这种同情又要受对其归化活动的政治后果之恐惧的限制。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年)神父出生于科伦(Cologne),他于1622年到达北京,并在满清入主中原时曾在京师任钦天监正。正是他通过其外交活动成功地保护了传教区在中国新政权下的利益。1650年,他获准建造了北京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南堂,该教堂在两年之后竣工。但由于受到了一位归化了伊斯兰教的中国人杨光先(1597~1669年)的攻击,汤若望处境艰难。杨光先是耶稣会士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写了一部辟基督教的著作《不得已》(1659年)。汤若望于1655年被判处死刑,而只是在最后一刻才为一次天赐的地震之良机所拯救。他的继承者佛拉芒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年)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在1688~1689年间战胜了杨光先及其盟友,极力证明了欧洲天文学的优越性并由此而加强了传教士们在该帝国中的地位。

完全如同在明代最后50年中的情况一样,宗教归化活动由于文明的差异(统一的政治社会组织、佛教僧众们的地方势力、汉族的风俗习惯、欧洲那格格不入的伦理和宗教传统)所造成的深刻障碍而仅限于宫中和某些省份中。可能满族贵族要比汉族文人向基

· 督教的开放程度稍大一些,这是由于基督教与草原宗教传统的相似性。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利玛窦对于中国的风俗和习惯所采纳的宽容态度从这位伟大的传教士逝世起未在教友中引起反响,如果上述做法并未最终被教廷否决,那末耶稣会士们的影响就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正是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恶化了18世纪中、欧之间的所有关系。问题在于需要知道,大家是否可以把中国经典中的“上帝”概念视为一种可能是产生于中国上古时代的一种启示(对此的记忆仅仅是逐渐消失的)的残余,或者把中国人的观念基本上视为无神论和不可知论性的,并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礼仪视为异教类的。同时,至关紧要的是必须知道,中国人的“天”是上帝还是纯物质,而若它既非此又非彼,那就是内在的宇宙秩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它是由龙华民(Longobardo)神父于1610年之后挑起来的。这位对利玛窦持不同意见的人抱怨说,中国人不承认与物质分离的精神实质,而且在人类社会的伦理原则和宇宙的自然原则之间不作任何绝对的区别。不过,仅仅是在18世纪初叶,这场冲突才公开爆发。入华耶稣会士们的努力当时已由于他们在欧洲成为攻击对象而受到了影响,而且他们对中国人的同情本来也是早就受到了怀疑。梵蒂冈于1705年决定派遣铎罗(Charles de Tournon)主教出使中国,他的使命是禁止传教士们对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有丝毫宽容同情以及崇拜孔夫子和古代的其他圣贤或为死者举行仪轨……两年之后,铎罗主教在南京抨击了中国人的迷信活动。结果,这种教条性强硬态度破坏了自17世纪初叶以来以特别大的努力完成的业绩。叛教者很多,归化活动变得更罕见了,而对于外国和中国基督徒们的仇恨却日益增长。数年前尚对耶稣会传教士们投以青睐的康熙帝(他把他们视作为自己效劳的人),现在却对耶稣会士们从梵蒂冈接受命令怒火冲天。然而,就在文化气氛和政治形势使传教士们的地位变得更艰难时,“礼仪之争”却以有利于反对宽容派的结果而告终。正统的发展以及西域问

题在帝国基本国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也许使雍正执政年间(1723~1735年)成了最不利于传教事业发展的时代之一。被基督教归化的满族王公们都成了仇教的受害者。雍正的同情心主要是转向了喇嘛教(大家知道喇嘛教在这个时代的政治意义),或更笼统地说应该是转向了佛教。他将其旧宫雍和宫改造成了喇嘛庙(1732年),鼓励重刊佛教大藏经,并于其晚年创建了一个研究宗教(佛教和道教)的机构。宋君荣(Gaubil)神父介绍了皇帝于葡萄牙使节拜访的翌日——1727年7月21日所讲的这样一段话:“如果朕派遣僧俗赴尔等欧洲诸邦,贵王子是不会允许这样做的。”

耶稣会应是在1773年由教皇克莱芒十四世的“救世君主”教谕所解散。

完全如在明末一样,主要是传教士的科学知识和著作,有时还有他们的画家和音乐家的才能,才使他们赢得了在皇帝身边的全部威望。这些人几乎个个都才学横溢,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一项伟大事业,同时从事下述活动:学习汉语和满语、测绘和天文研究、编制地图集、地理学著作、中国历史和年代纪(这种年代纪对诺亚洪水的时代提出了质疑)的深刻研究、译书,此外还有他们自己使徒的使命和宗教义务。他们分别来自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弗拉芒地区、德意志、法国,有的甚至来自17世纪的中欧,而于18世纪又补充了数量相当多的法国人。路易十四的政策有利于耶稣会士们,确实在康熙的容教圣旨(1692年)之后使他们获得了一种显赫的地位。路易十四时代有过两次最早的布道团,第一个布道团于1685年从布雷斯特出发,其中包括洪若翰(Fontaney)、李明(Le Gomte)、张诚(Gerbillon)和刘应(Visdelou);第二个布道团启程于1698年(安菲特立特号首航中国);此后还有其他数次出使。此外,18世纪的法国是维持着与中国最密切关系的国家,在这里由于发现中国而挑起的哲学争论也最为激烈。

毫无疑问,耶稣会士们的著作有助于加强考证学派的科学倾

向,同时他们也促进了有关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他们受到了皇帝慷慨保护的鼓励,完全和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出版类似著作的待遇一样。他们之成就的一大部分毕竟应归功于以康熙和乾隆的年号行使统治权的开明专制者们。

除了他们的天文学和数学著作之外,耶稣会士们又继承了可以上溯到利玛窦神父的一种传统,在地图学领域里也大放异彩。康熙大地图《皇舆全览图》是由张诚(Gerbillon)神父提议的,它是在1707~1717年间持续进行的测量和其他工程的结果。此图于1718年被雕刻在铜版上,它要比欧洲同时代的地图好得多。在乾隆时代,中国以其1769年根据1756~1759年进行的测绘而绘制的《乾隆内府地图》仍处于地图绘制术的高峰,这是由于皇帝的保护、耶稣会士们及其中国的优秀合作者们的通力协作才告成功的。

454

乾隆是具有好奇心和开放思想的一代明君,他酷爱绘画、西方建筑术和机械学。安多(Antoine Thomas)正是应他的要求于1702年根据地球子午线而计算了“里”的长度,这比确定公里长度的时间早90年。中国画家焦秉贞是《耕织图》(1696年,代表着田地工程和丝绸加工之各不同阶段的图集)中46幅著名版画的作者,他也曾研究过欧洲透视法的绘画。1676年,徐日昇(Peireira)神父面对康熙而演奏羽管琴,数年之后他又与一名意大利神父合作写了第一部有关欧洲音乐的论著,在中国出版时题为《律吕正义》。

乾隆命人装饰其位于北京西北的夏宫圆明园,并于1747年又根据传教士们的建议,令人在那里建造了意大利式的楼台亭榭,他还令人建造了喷水池。用来装饰的绘画是由郎士宁(Giuseppe Castiglione)和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神父完成的。该宫殿后来遭法国军队抢劫并于1860年被英国人烧毁。郎士宁神父具有相当高的绘画才能,他在近50年间(直至亡故)始终在皇宫中效劳,绘制风景画、人物肖像画、室内画、宫廷画,并与中国名画家们共同工作。他与王致诚和安德义(Jean-Damascène Salusti)神父

合作而翻印了代表伊犁战役主要战斗场面的 16 幅著名的乾隆得胜图,其雕版于 1774 年完工于巴黎。

在所有的这些文化、科学和艺术的交流中,中国所接受的东西可能比大家最熟悉的那些借鉴能令人联想到的东西更多。

随着耶稣会的解散和乾隆帝的驾崩,由学者和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北京宫中的传教士们在中欧关系中占据突出地位的时代结束了。此后的传教活动是在与 17 和 18 世纪的情况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向中国的借鉴和欧洲的反响

人们还远未能揭示和正确评价欧洲自 16 世纪发现中国以来受到的全部影响。归根结蒂,它很可能是以人们很难相信的巨大份量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形成。事实上,自从中国社会遭到衰落和蒙受欺辱的时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思想、技术与艺术在 18 世纪所掀起的强烈热潮中被人遗忘了。西方以其迅速的发展而傲慢一时,意欲将全部功德都归于自己。大家将来有一天可能会对其发展作出更具细微差异的判断。

1705 年 8 月 18 日,莱布尼茨(Leibniz)在致韦朱思(Verjus)神父的一封信中指出:“我发现你们的大部分传教士都严重倾向于鄙视地谈论中国人的知识。然而,他们的语言和文字,他们的生活方式、技巧和手艺,甚至他们的娱乐活动都和在我们这里一样千差万别,只不过他们是属于另一个星球上的人物。在我看来,甚至对于他们之中的行为做一种不加修饰而又准确的描述,也不会比许多学者酷爱的有关希腊和罗马人之礼仪与家具的知识具有更多和更有益的透明度。”甚至由莱布尼茨草拟的提纲也只是由 18 世纪的人才很不圆满和很不完整地来完成的。我们认为这位哲学家非常正确地预感到了两个世界之间的这些交流的深刻影响。

根据传教士们搜集的资料而编写的巨著,于 18 世纪期间相继

问世。这就是《耶稣会士书简集》(巴黎 1776 年版,共 34 卷)、杜赫德(J. B. du Halde)神父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 年,4 卷本)、格鲁贤(J. B. Grosier)的《中国志》(巴黎 1785 年版)和《中国杂纂》(1776~1749 年巴黎版,16 卷本)。诸如莱布尼茨那样的哲学家、尼古拉·弗雷烈(Nicolas Fréret,1688~1749 年)那样的学者,曾组织过对中国技术做系统调查的亨利·贝尔坦(Henri Bertin,1720~1792 年)大臣那样的政治家,他们都与入华耶稣会士们保持着频繁的通讯关系。这些日益增多的接触不致于始终都无效。

初看起来,人们无疑可以把以下现象视为普通的新奇物:大黄于 18 世纪末传入欧洲;采纳在 14 世纪产生了整个风琴、口琴和手风琴家族的活动簧[这是由沃格勒(G. J. Vogler,1749~1814 年)从汉一傣族人社会中的口琴借鉴的;他在圣彼得堡研究过一架中国笙];风车的采用;养蚕业和瓷器技术的发展[最初的尝试是由博特格(J. F. Böttger,1682~1719 年)作出的,已被断代为 1705 年];有意地模仿船舶上密封舱的布局等等。当时在欧洲尚不为人所知的大量花草和树木都于 17 和 18 世纪传到了那里。1675 年,一个俄国使团曾要求向俄罗斯派遣一些中国技术专家以在那里建造桥梁。中国自 16 世纪以来流行使用的天花接种方法是向病人的鼻孔中吹入少量天花脓疱,这甚至要远远早于在欧洲发现的种痘术。欧洲种痘术是使用了中国人医术的原则:中国人曾寻求减少病源毒素之毒力的方法。这种方法于 17 世纪期间传入了土耳其,并于 18 世纪初叶开始在欧洲为人所熟知。1785 年,英国出使君士坦丁堡使节的夫人拉迪·蒙塔古(Lady Montagu)让人为她全家种痘。1796 年,琴纳(Eduward Jenner)确定了预防天花的接种术。在这些可靠资料(其统计表尚不完整)中,还要加入那些具有很大可能性的资料。

当时向传统借鉴的那些不同而又新奇的技术可能会具有出乎预料的丰富性,这类粗浅手段可以显示出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文

化传统和社会制度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说18世纪的欧洲对中国产生了强烈兴趣,却又往往形成了一种有关中国的荒谬而理想化的形象,那末对中国的赞扬则往往通过一种自然反响而引起了对该国的诽谤和诋毁。既然对中国的认识被哲学家们当作了攻击教廷和旧制度之恶习的借口,那末它却并未失去任何积极意义。456

无论大家对18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评价如何,事实上文化和政治权力在那里乃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的特权,正如在我们19和20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一样。不过,中国并不知道欧洲对于“旧制度”(即法国1789年前的王朝。——译者)的高度重视。这种由启蒙时代进行了如此广泛发展的内容——“风俗和法律”,在那里却是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中国提供了文明、富裕和强盛国家的第一种例证,该国的这一切均与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而似乎是建立在理性和自然法基础上的。它就这样强有力地促进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形成,甚至直到它的某些基本制度,无一不被欧洲所仿效。

中国的“考试制度”(科举制)首次被门多萨(Mendoza)于1585年作了描述,后来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于其《奇异观察集》(1615年)中以及蒙特夫尔·德·弗内斯(Montfort de Feynes)于其《从巴黎到中国的陆路旅行》中再次作了叙述(1615年)。接着,为了公职而铨选仕官的考试思想从18世纪末也在欧洲逐渐发展起来了。魁奈(François Quesnay)于其《中国的专制主义》(1676年)中提议,在国内应该有一个从社会所有阶级中选拔的智囊团作为心腹,如同中国的官吏一样。中国的例证与由法国大革命于1791年采纳的通过考试而选拔官吏的制度不会毫不相干。同样的制度在1800年被东印度公司运用于印度,它后来又在1855年和选拔文职官员的考试制度一起传到了英国。

沃班(Vauban)曾向路易十四上谏按照中国人的方法进行人口普查,中国自汉代以来就实施这种制度。现知的西方国家的最早

人口普查是1665年在法属加拿大以及1749年在瑞典完成的。近代的整套人口科学都来源于一种无疑迟早要出现的做法,但它首先是因中国人揭示而实施的。

清代中国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启发了重农派学者魁奈(F. Quesnay, 1695~1774年)及其朋友们的思想;米拉波侯爵(Marquis de Mirabeau, 1715~1789年)和杜邦·德·内穆尔(Dupont de Nemours, 1739~1817年)将“理”(天命)的概念传入了西方,并且宣布了农业生产对于在他们看来从总体经济的角度是缺乏效果的手工业、工业和商业活动的优先性。中国的观念通过重农派学者们媒介作用而成为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起源。

457 审美观本身也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大家知道18世纪的欧洲极为时兴康熙时代青白色瓷器、中国家具和古董。中国的花园和建筑术由于钱伯斯(W. Chambers, 1726~1796年)的缘故而在伦敦附近的丘郡颇为时髦,中国促使人们改变了自然情感,使之趋向于由浪漫潮流发展起来的方向。

所有这一切在很久之前就已经为人所熟知了。但仍有必要重新进行研究,把严格的分析扩展到这些含混的影响和假定之上,唯有这样才可以使之变得可靠翔实。事实上,中国的启发并不仅限于政治和社会思想、社会制度和技术诸领域,它很可能曾对近代科学思想的形成施加过影响。如果这些中国影响有朝一日能够被证实,那将成为需要收入诸文明之间密切关系的无数证据之档案中的一份至关重要的资料。

中国汉文字的“数学”特征已经使14世纪的波斯人感到惊讶。拉施特(Rashid al-Din)在《伊利汗国有关中国科学的宝鉴》(1313年)中认为,中国汉文字在它和发音独立无关方面要优于阿拉伯文字。这个问题也引起了莱布尼茨(1646~1710年)的注意,并且还可能促进了欧洲数理逻辑的发展。当然,莱布尼茨应该是相当快地发现了汉文方块字的字义由于历史积累而远不是单义的,并且其

字义根据前后文而有所变化。然而,中国思想的特征之一是根据象征物的支配而行事,莱布尼茨的推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确的。

这种思想的另一种独有的和根本性的特征是空泛和自发范畴中的概念,而不是直接和机械行为的概念。然而,莱布尼茨曾以一种强烈的兴趣注视着由入华耶稣会士们提供的报告并与闵明我(Grimaldi)神父保持着通讯关系,他用一种由无数机体组成同一机体的思想取代了世界是一架机器的思想。这种单子论连同其宇宙等级以及前定和谐论的最终观念远不是与早期的西方传统相联系,它无法不令人联想到有关“理”的“新儒学”观念,即在宇宙整体的所有水平上都表现出来的基本范畴的内在原则。这样一来就使每种生灵在宏观上都拥有一份“理”,并且还与既无定向又无机械推动力的“天理”合作。正是由于一种使人联想到在中国社会中被最广泛接受观念,莱布尼茨才成功地解决了直到其时代之前曾统治了整个西方思想界的神学唯心论与原子唯物论之间那不可克服的对立。为了使近代科学思想得以发展,恰恰必须使西方放弃在事物之外寻找真实,放弃那种于其文化传统中深深扎根的思想,不再认为自然界与世间万物是由一架机器及其驾驭者、或身体和灵魂组成的,甚至进而发展到如同中国人一样假设认为事物本身就包括全部真实的及最微小的奥秘。热心于中国的学者莱布尼茨处于直达科学思想最新发展之链索的顶端。简言之,这至少是一种 458

由中国科学史的最杰出专家李约瑟(J. Needham)提出的假设。

非常惹人注目的是,16世纪发展起来的实验科学所拥有的典型“近代”内容,均与中国人的观念(磁学、力场概念、微粒旋转论、波传动论、组合逻辑、有机整体和机体自动调节论……)相吻合,而它们都曾为西方传统中所缺乏的内容。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结合仅仅是偶然造成的。

19 世纪上半叶的特征是社会风气的持续堕落,其多种多样的原因还从未被人分析过,它们包括:要追溯到在乾隆执政末年那疯狂开销时代的国家财政收支不平衡、自从乾隆帝的宠臣和珅开始腐化行为在统治阶级内部和官府职员中的蔓延、19 世纪持续的人口增长、一个移民区数量很大并受到屯民越来越大压力的帝国的过分拓展、1820~1825 年间贸易的巨额亏损、继繁荣和欣欣向荣时代之后的特别明显的经济衰退。压力和不平衡的各种原因最终在 1850 年左右导致了中国社会中所经历过的最奇特的社会大动乱。太平天国的起义(1851~1864 年)以及响应它而一直持续到 1875 年左右的一系列大起义,形成了 19 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这次社会和政治大危机在统治阶层中引起的巨大震动、为克服危机而必须作出的努力、与这些事件相伴生的巨大损失和破坏,成了整整一系列变化的原因。这些变化是:在镇压起义的战争中形成的一支新的政治队伍、中央政权的削弱和经济的衰落。在大规模内战之后不久复兴的帝国再也不能与它在此之前的情形同日而语了。

正是在这种衰落和危机的背景中,从 1840 年起形成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首次入侵。但英国人于 1840~

1842年发动的与反鸦片走私相关的进攻仅仅于事后才能推论出其历史意义；这是殖民主义者干涉政策的首次表现，其性质和目标是随着西方工业化列强之工业力量的发展而变化的。内战、重建的努力以及清朝在西域所遇到的困难，进一步便利了1857~1860年西方的新举措，特别是迫使中国统治者实行了一种妥协政策，他们当时在其工业化努力中迫切需要外国的资本和技术专家。但从1870年起，外部压力变得越来越强烈了，从而加剧了在妥协行为的支持者与不调和行为的支持者之间、与外国有联系的近代化派和对于时代的实况视而不见的传统派支持者之间的矛盾。同时，若要使某种彻底而迅速的变化成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又显得疆域过广和人口太多了，故与发展加速的小国相比显得更趋落后。曾经利用了其相对孤立来仿效西方国家的日本于1894年击败了中国的军队和舰队。马关条约开创了中国社会史中的一个新时代，那是它饱受奴役的时代。

第一章 大衰退

461

一、衰退的内部原因

令人不安的国家和社会平衡遭受损害的迹象，产生于乾隆执政末年和19世纪初叶。清代最早的农民大起义是于1795年在西北与河南开始爆发的，同一年又爆发了湖南和贵州土民的起义，而且当时在广东和福建沿海也有海盗肆虐。在18世纪末，乾隆的盛世政权似乎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时代，当时的国库积蓄被不计其数地挥霍了。宫廷和国家以超负荷的方式生活，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的中央政权，以及宠臣和珅之有害影响的推波助澜，贪污腐化行为从1775年起便没有限度和节制了。被谎报的本章欺骗了的朝廷对于诸省形势和军屯的实情一无所知。清朝的最早几位皇

462

帝表现得特别节俭,据说在康熙执政的 36 年间,宫中开销的全部金额尚不及明朝末代君主们一年的开销;但满清贵族和宫廷的开销在乾隆执政的后半期却失控地膨胀了。远方的征战、对土民和穆斯林起义的艰难镇压、皇帝的慷慨赏赐,都最终于 18 世纪末年耗尽了国库。仅限于削减宫中开销的乾隆帝的继承人未能成功地挽救大局和改变逆境。国家的积蓄在雍正年间(1723~1736 年)增加到 6000 万两,而当时的货币发行量并不太多,在太平军著名的大起义之前夜的 1850 年仅为 900 万两。他们再也无法遏制腐化了,而大清军队(也就是那些于其鼎盛时期曾将中国的主权扩大到了亚洲大部分地区的诸旗)也削弱了。

在 1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笼罩了中国的盛世,对于长远利益来说无疑具有不幸的后果。无论是在政治领域里(它使大清政权的宗法专制主义得到了加强),还是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它都引起了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但还有更为严重的情况:看来更符合一个幅员不算辽阔和人员不算太多的国家之所需的生产技术和商业活动,在一个控制了辽阔领土和其人口似乎在一个世纪期间增加了 3 倍的帝国中,却变得很不相宜了。在 18 世纪曾引起了特别显著发展的人口之增长,到 19 世纪上半叶却似乎对中国经济施加了负面影响。这种经济在人口膨胀的势头仍在发展的时候却被窒息了。如果大家相信人口普查数字(它们是清代中国历史上最准确的普查),那末清帝国的人口在 1802~1834 年间就增长了 1 亿,负责掌管人口普查的户部于这最后一个年头宣布该帝国共有 4 亿多人口。

因此,乾隆留给其皇位继承人嘉靖(1798~1820 年)和道光(1821~1850 年)皇帝(后两帝的执政期占据了 19 世纪的上半叶)的是一种困难的局面,而且这种局面又由于国势的恶化和人口的持续增长被进一步恶化了。受白莲教蛊惑的农民起义到 1803 年才被镇压下去。但数年以后,这场运动可能又卷土重来,再度猖獗。在

黄河下游、河南、河北和山东省，从 1811 年起又爆发了新的动乱。属于白莲教之变种“天理教”的起义军在朝廷的某些高官中找到了共谋者，因为这些官员们不满意嘉靖皇帝的严峻政策并习惯于乾隆时代的豪华生活。与起义军勾结起来组织的一次共谋活动终于在 1813 年爆发于北京，但它在即将夺取皇宫时却遭到了失败。叛乱在一年之后被挫败了。

白莲教的起义固然是可以被镇压下去的，农民暴动的原因本身却未能被消除。这是因为，尽管开垦了荒地和增添了新的农作物品种（玉米、白薯、花生），但却始终存在着耕地短缺。此外，各种税务负担都加重了、铜币与自从美洲白银的进口量下降以来就越来越少的银钱相比而大大贬值、与土地价格迅速上升相联系的地租已经减少、土地以有利于某些富裕地主的方式而被兼并与高度集中（特别是在南方）、土地的小经营者向佃农的转化，所有这一切都在农村社会中造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压力。

虽然这些农民暴动再未引发过 1796~1804 年间中国西北曾经历过的那种大规模的起义，但它们在 19 世纪上半叶都从未停止过。几乎在中国所有的省份中都出现了农民起义，甚至在中国南方的省份中也首次发生了起义。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于 1832~1833 年爆发在湖南和广西交界处的山区。那里的气氛有利于土匪活动的发展和秘密会社的发展，这些宗教道会门的成员们通过盟誓而互相联系并且彼此以近亲相待。在 19 世纪上半叶，以“三合会”或“天地会”之名而著称的秘密会社及其数目众多的分支在中国南方牢固地站稳了脚跟。

还有，对于中国南方和新疆西部的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领土上的土著人口的控制，始终都很软弱和困难。青海的藏族人于 1807 年反叛汉—满族政权，贵州的瑶民也于 1833 年起义。由一名叫作张格尔（Jehangir）的突厥火者领导的新疆西部的穆斯林于 1825 年制造分裂，而喀什噶尔和叶儿羌诸绿洲则经过三年战争之

后才于 1828 年被清朝彻底平定。

由输入鸦片引起的外贸不平衡更增加了一个受到如此多的衰弱原因威胁的帝国的困难。另外,其统治阶级内部也已经分化。

二、走私和海盗

464 向那些没有工业的殖民化地区输入成品产品,标志着形成今天第三世界地区屈从于富裕国家历史的一大转折点。但这种转折仅仅在 19 世纪末叶才随着机器大生产的发展而产生。1786 年获得了与广州贸易之垄断权的东印度公司,于 1800 年左右从约克郡(Yorkshire)向中国出口了一些棉织品和毛织品。但在印度找到了买主的英国纺织品在中国的销售情况却很不好,因为中国的棉纺手工业非常发达并能满足其所有需要。中国棉纺品仅仅在 19 世纪最后几年间才受到了大量进口美国纺织品的威胁。况且,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不是以出售成品商品而是靠走私毒品来获取其主要利润的,在微小体积下掩饰着毒品的巨大价值。使当时仍为一种冒险行为的赴华旅行变成了高收益的活动。

贸易逆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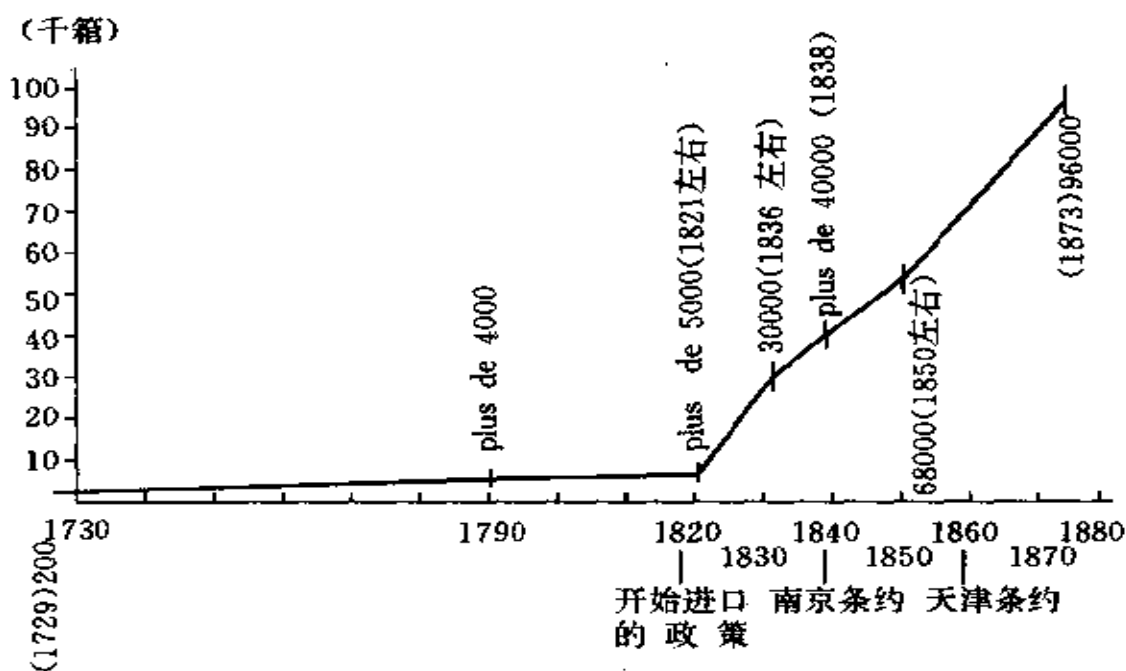
虽然鸦片仅仅在 20 世纪初叶才开始在中国大面积地种植,但它自明末以来却已经在那里广为人知了。鸦片已由李时珍在其著名的药草学著作——16 世纪末的《本草纲目》中提及,并以其阿拉伯文 afyûm(阿芙蓉)之对音名称出现。它于 17 世纪被葡萄牙人输进福建。其进口量在下一个世纪初叶达到每年近 200 箱,而在 1729 年成了一种遭官方正式查禁的物品。这项禁令于 1731 年扩大到了整个帝国。但鸦片的种植从 18 世纪末起继英国人占领印度之后却发展起来了。东印度公司于 1757 年获得了它在孟加拉的最早领土权。它于 1765 年将其领土权扩大到了比哈尔(Bihar),1773 年,它又夺取了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垄断权。它先是在孟加拉、后又

在中印度的马尔瓦发展罂粟的种植业。从 1810 年起,它共迫使广州进口了 4000~5000 箱(每箱装有约 65 公斤的毒品)鸦片。尽管中国政府颁布的禁令从 18 世纪末起成倍地增加(如 1796、1813、1814、1839 和 1859 年),但鸦片的进口量也在迅速地增长。

19 世纪期间中国进口的鸦片的统计表:

年 代	箱 数
1817~1819	4228(平均数)
1820	4244(可能平均为 5000 箱?)
1821	5959
1823	9035
1826~1828	12851(平均数)
1829	16257
1830	19956
1836(左右)	30000(约数)
1838	40000(最低数)
1850(左右)	68000
1873	96000
1893	进口量由于价格上涨而开始疲弱。
1917	进口完全停止。鸦片在中国本地的产量已经足以满足所有需要了。

在 1816 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很快就受到自由贸易之竞争(该公司于 1833 年被解散),于是它决定系统地发展这项收益颇丰的贸易。从英国的属地(首先是孟加拉,其后是马尔瓦)并在很小的程度上从土耳其进口的鸦片,从 1820 年左右直至整个 19 世纪期间不停地增长。这种毒品的销售可能在 60 多年间于英属印度与中国贸易关系中形成了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正是由于这种毒品,英国的在华贸易才避免了当时出现逆差。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几年间，鸦片进口无疑突然增加了，它解释了北京政府的震惊与不安。我们暂且撇开吸毒引起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伤害不谈，因为最经常的是只有地方上的小官吏和衙门中的官员们才会吸食它。事实上，鸦片的走私产生了严重的伦理、政治和经济影响。它于鸦片战争（1839~1842年）的前夕在广东制造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而只有通过严厉的措施才能解决。由于在所有级别上都编织了一整套阴谋网，以供船老大、走私海盗、搬运工、商人、官府职员和具有各种衔爵的官吏们使用，它便扩大和加剧了腐化。此外，无疑正是经济原因最大限度地刺激了中央政府做出反应，因为这种走私破坏了中国那本来就被18世纪末连绵不断的战争和人口压力削弱了的的经济。正是鸦片的输入在1820~1825年左右引起了中国外贸差额的突然不平衡。外贸直到那时为止都对有利，但从这一时期起却变得具有逆差了。

尽管对中国产品的采购自18世纪末以来仍在继续发展，但在

中国销售鸦片再也不能通过购买中国货来抵销和平衡了。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最重要的是茶叶，它自宋元时代以来就是亚洲腹地最重要的商品。茶叶从1730年左右起在欧洲的传播，导致了其采购量的持续增长（尤其是从1760~1770年起）；它们从1720年左右的12700吨增长到1830年左右的36万吨。这种重要的商业变化在中国引起了反响：茶叶种植园的发展（主要是在广东、江西和安徽，但也包括福建、浙江、江苏和湖南）、茶叶的手工业组织和外贸。其他的中国产品在向欧洲的出口中只占据着一种不太重要的位置，但它们的发展也不能说不太明显：丝绸的采购从1750年左右的1200担发展到1830年左右的6400担；欧洲对被称作“南京土布”（米黄色布或紫花布）的细棉布的购买量从1785~1791年间的338000匹发展到1814~1820年间的1415000匹。

但中国贸易的这种发展仍不足以抵销由鸦片走私引起的逆差。

在1800~1820年间，共有1000万两白银流入了中国。而在1831~1833年间，则共有1000万两流出了中国。由于相继强加给中国的“条约”，主要由于购买鸦片引起的中国白银外流在19世纪始终未停止过（在该世纪末，鸦片仍占全部进口量的30%）。太平天国战争期间（1851~1864年）的大部分贸易都是上海成交的，但仅在广州港就有3000万两白银外流。由于从1832年起着手进行的盐政改革，国库的赤字可能是被压缩了，但人口的增长和新财源的缺乏又导致了物价飞涨和全面的贫困。国家不可能毫无举措地眼睁睁地看着其货币的外流。

第一次鸦片“战争”

统治阶层意识到了一种系统地禁烟政策所代表的危险和困难。由此而产生了中央政权那明显的犹豫不决和在采取措施时的意见不和。在北京共出现了三种倾向。某些朝臣支持禁烟的彻底

措施；其他人则主张使进口鸦片合法化；最后一批认为合法限制会导致往往是最糟的灾难，并认为倘无章程条例就会使鸦片地下交易，从而失去其主要利润。当 1836 年进口剧增时，许乃济为了阻止白银流出中国和增加国库收入，建议对进口鸦片课以重税并迫使外国人作为回报而购买中国产品（丝绸、棉布、茶叶、瓷器……）。但在三年之后，全面禁烟派随着林则徐（1785～1850 年）的干预而取得了胜利，这也可能是因为危险变得更迫在眉睫了。林则徐于 1839 年被派往广州，下令没收了 20000 箱鸦片并勒令英国商人在短期内全部滚开。在由这些极端措施造成的一种具有爆炸性的气氛中，英国人先是在珠江口以海盗活动进行袭扰；后来，他们又在浙江沿岸报复，在那里占据了舟山群岛中的大岛定海岛；在更靠北方一些的地方，他们又威胁着天津港。中国也不让步。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后，英国人于 1841 年又恢复了进攻。外国人又重新夺取了珠江港，占据了厦门（Amoy）、宁波、定海，威胁着杭州和长江下游地区，而英国舰队从那里一直深入到南京。为了结束这种局面，中国政府接受了谈判，签署了臭名昭著的 1842 年的南京条约，而其长远的影响无疑要比中国谈判官员们当时的预料严重得多。照他们看来，英国人的进攻仍然只具有传统的性质，类似过去外国人犯下的海盗罪行，或者是希望在中国的门户打开市场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倭寇海盗的攻击以及国姓爷的攻击都曾威胁过中国沿海诸省和长江下游地区，而且其程度要比 1840～1842 年英国人的进攻严重得多，况且草原地区的某些入侵也曾经具有更大的破坏性。1841 年进攻广州的英国军队仅有 2400 人，他们于次年接受的援兵也不超过数千人。归根结蒂，清政府向侵略者作出的让步绝没有与它所冒的危险相适应。致使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代所表现出的软弱性的原因，即不在于其大炮那陈旧过时的特征（草原人和满族人从来就不对火器感兴趣，明末在铸炮领域中做出的努力未能持续下去），或王师缺乏战斗力和纪律性，又不在于其政治局面

或很快就由令人生畏的太平天国起义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危机。一个深受繁缛的规章制度之苦和拘泥于细微末节的政府之腐化与软弱无力、帝国的过分中央集权，同时又缺乏协调以及过分遥远的距离（广州距北京有 2000 公里），致使在北京采取的措施太晚了，这无疑才是中华帝国衰弱的主要原因。如果说清政府以投降而告终，那是由于它甚至在英国的进攻尚未开始之前就在应采取的对策上优柔寡断和各持己见。道光皇帝本人也不太熟悉情况并且犹豫不决，对于国库开销也表现得很吝啬。他于 1841 年派往广州的钦差自作主张，未待北京同意便接受了撤退中国军队和向英国人赔款 600 万两的要求。道光帝开始时被强硬派的支持者林则徐说服，但后来却倾向于妥协，接着于 1841 年又决定重新发动进攻。为了抵抗外夷而作出的努力确实是不可低估的，它们包括铸炮、建造其传统要上溯到宋代的带涡轮叶片的战船、封锁港口等。此外，于 1841 年又在广州地区组成了民团“平英团”并成功地制止了英国人的盗 468 窃抢劫活动。但是，在 19 世纪时抵抗外国入侵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团练，在当时却不受各地官府和中央政府的重视，因为他们害怕这些人会倒戈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

南京条约暂时地解决了这些难题。中国让大英帝国租借香港小岛，向英国赔款 2100 万银元，接受厦门、上海、宁波和广州港对外开埠通商（主要是对进口鸦片开放）。它同时又接受了取消“公行”（该词自 1720 年以来便指广州诸商行的官方联合会）的垄断专营权。这种公行本意要配合官府而调节与外国人的通商活动（包括东南亚、印度洋和欧罗巴），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要由中国商船来承担。在 1843 年的附加条约中，使用了最早的治外法权（英国侨民摆脱了中国的司法权）和最惠国条款（由其他民族所获得的优惠也将自动地扩大运用到英国）。领事权和首批“租界”的建立打开了第一批缺口，从而使西方列强依靠其军事和经济势力的发展而对中国实施越来越强大的控制，并且始终都越来越严重地限制其独

立和主权。

通货问题

由毒品走私引起的冲突和鸦片的输入(其数量从 1820 年起直到 1894 年日中战争前夕一直不断增长)产生了直接后果,这一切对于中国的经济和通货施加了虽不太明显却又是很深刻的影响。

东亚的银币史尚未被做过深刻研究。但把这种金属用作支付手段的做法在中国却一直维持到民国盛期(1912~1949)。而从这种银币经济开始受到金币经济的竞争那天起,它无疑就成了中国经济衰落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的经济变得越来越依赖金币了。当黄金的诱惑对于从欧洲直到印度和美洲的海上大扩张来说显示出是决定性因素之一时,中国却对于这种贵金属毫不垂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这种金属在除日本之外的东亚十分稀有、它在中国社会中又无疑被认为具有一种特殊价值,以及国有经济在中国对于商业市场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随着白银变得相对丰富和价格稳定,和纸币不同的是,它和铜钱被同时当作支付手段而在中国确立了权威并让人接受了。白银的使用在 15~16 世纪时变得很普遍了,进口来自美洲的鹰洋也于 16 世纪下半叶增加了银钱在广东和福建的流通量。在中美和南美大量铸造的银元或墨西哥银比索(Peso)也都出现在广州和福州,其用途一直存在到近代。

但就在作为中国 16 世纪末~18 世纪末长期富裕之标志的银锭增加的同时,白银的价值与金价相比却不断下跌。直至 16 世纪末叶以前,白银在日本始终作为东亚主要的贵重金属出口国的整个时代,都保持了其较高的价值(金银的兑换价为 1:4),但它从 1575 年左右却贬值了。1635 年,一两黄金就已值 10 两白银。中国在 1820~1825 年间打破了贸易平衡,这与白银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新的暴跌是同时发生的;而西方列强在 19 世纪下半叶采取的金本位制更加速了银价下跌,当时也恰逢中国经济最大限度地受到了

贸易竞争以及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战争赔款之苦。1887年,每两白银尚值1.2块鹰洋,而到1920年仅值0.62块鹰洋了。

就在中国的货币在世界市场上贬值的时,其白银又于19世纪期间不停地大量从国内外流。尽管鸦片价格下跌(每箱鸦片在1821年前能出售1000~2000块鹰洋,在1838年后却只能售700~1000块了),但中国白银的外流却未能好转,它的价格以损害铜钱价格为前提而上升,正如下表所示:

1820年之前	每两(约36克)白银约值1000枚铜钱
1827年	1300枚
1838年	1600枚
1845年	2200枚或更多一些

然而,白银价格的上涨给组成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最贫穷阶级带来了一种最严重的损害。因为正是这些人掌握着大部分铜钱,而他们的税役却又是以银币为基础而计算的。

大家从这些非常简单的指数中就可以得出一种笼统的和权宜的结论:正如银—铜的复本位币制在中国本土上促使最落魄阶级的地位向恶化的方向发展一样,黄金和白银的复本位币制又促使中国经济在19世纪期间崩溃了。这些货币机制加速了成为19世纪上半叶特征的经济衰退,同时也促进了从1850年左右开始的令人闻风丧胆的大起义。

三、中国和西方

470

西方在中国的影响经常是以有利于欧美各国自尊心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西方人促使中国走出了数千年的与世隔离状态,使它初次感受到了科学和工业文明,迫使它向世界的其他部分开放。与中国人的循规蹈矩的思想、官吏们的腐化、皇帝们的专制、自认为处

于世界中心的幼稚思想和一个令人蔑视的民族之迷信相对立的，则是创业的思想、进步的概念、科学和技术、自由、西方的宇宙论和基督教。

此外，西方国家对东亚的入侵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地区就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其撞击是如此剧烈，以至于远东历史上的传统观点似乎在这种入侵刚开始就彻底改变了。大部分史学家都认为，英国炮舰最早在珠江上的轰击便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新时代似乎更适于纳入世界的范畴，它成了据认为其发展从来都是整部世界史之主体的西方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社会史中所有那些不能与这部世界史联系起来的早期阶段，由此便倾向于失去其内涵和意义。

但这是对各种文明间联系的误解，是对中国过去曾扮演过的世界角色一无所知，不熟悉它与西域、伊朗、印度、伊斯兰世界和东南亚的关系，不了解商品、技术以及宗教不停地穿越欧亚大陆的过程。若无这一切，那末欧洲国家就不可能有近代。这无疑是把中国社会的特有结构和传统视作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了。但实际上，在19世纪时，来自外部的危险具有特别大的威慑力，其发展也特别深刻，而其内部问题又从未停止显得那样突出，中国社会正是根据这些结构和传统才发生了变化。这样便可以解释把今天的中国与昨天的中国联系起来的某些姿态和某些特征的顽固性了。

在人们从整体上将中国和西方两种文明对立起来并将历史简化为它们之间的对抗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又忽略了时间这个基本事实。大家用一句口头禅取代了同时影响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一系列相继变化。在清帝国和欧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史上，必须不仅考虑到在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生活中的变化，而且还要考虑在西方国家那里发生的变化：殖民扩张、工业发展、军队和舰队的加强、对外政策的演变都是分阶段的。19世纪最后几年的英国已经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时的英国具有

很大差别了。我们最好重新提一下，欧洲和美国最显著的技术发展仅仅在 19 世纪的下半叶才出现。1830 年，西方的海军舰队中以叶涡轮推动的蒸汽轮船尚不到 3%，蒸汽机仅仅是于 19 世纪中叶从采用螺旋桨起才真正地发展起来。最早的钢壳舰从 1880 年起才造成，也就是苏伊士运河开通（1869 年）后 10 年，这是欧洲国家向印度和远东进行殖民扩张的一个重要时刻。而铁路仅仅在 1850 年之后才开始大规模发展。

铁路网的长度(公里)

1840 年	7700	1870 年	210900
1850 年	38700	1880 年	373500
1860 年	108100	1890 年	618400

当煤的使用于 19 世纪中叶在欧洲和美洲得以普及时，只能开采 9000 万吨（其中 5600 万吨出自英国）。其总产量在 1913 年增至 13.4 亿吨，当时发现了新的能源——石油和电力。而内燃机和格喇姆(Gramme)电动机仅仅在该世纪初叶才开始使用。

贝氏(Bessemer)转炉的发明时间为 1855 年，马丁(Martin)炉或平炉的发明时间为 1864 年，托玛斯(Thomas)炼钢法(碱性转炉炼钢法)的发明时间为 1878 年。1850 年铸铁的总产量为 1000 万吨，而 1913 年达到了 7800 万吨。

英国棉纺织品的成本在 1850~1870 年间下降了 80%，这是由于机械化生产的发展。但仅仅到了 19 世纪末，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才使机械化生产得到了大规模发展。这样一来，由于技术越来越快的发展，欧美工业化国家（后来很快又加上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变得真正使中国望而生畏了，但在 50 年前，情况却绝非如此。最后，难道不应该重新提一下吗？当大家认为中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时，1830 年在欧洲还计算不到 20% 的市民，那里其居

民达到 10 万人的城市只有 20 多座。

472 英国对 19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所形成的真正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军事方面,而是在经济领域。输入鸦片进一步摧毁了一个大帝国的经济,而这个帝国的财经政治和行政制度自 1800 年左右起已经开始衰落。这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种衰落导致了令人担惊受怕的社会大爆炸以及受殖民统治的居民的起义,它们在 1850~1878 年间震撼了整个帝国。

在 1850~1870 年间,显著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官僚队伍、经济税收、文化生活诸因素的,绝不是西方列强的行为,而是太平天国战争这场可怕的社会和政治危机。西方史学家们几乎是排它性地重视欧美的经济和军事渗透史,使人曲解了这种观点。

外国于 1858~1860 年间在华的新举措恰恰发生在这种内部

会大爆炸,而且 50 多年来的大量先兆迹象早已显示出来了:中国北方的白莲教和天理教的叛乱,广东、福建和浙江沿海海盗活动的重新猖獗,中国南方的农民和非汉族居民连绵不断的起义,邪教派和秘密会社的迅速扩散。

备受大水灾之苦的黄河下游地区以及可能会突如其来地出现旱灾的华北干旱地区,始终是人民大起义的舞台。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起义却发生在中国的热带地区,它在那些半世纪前还属于最繁荣地区行列的省份爆发并如导火线般地扩大。中国南方诸省对于导致经济活动的兴衰变化最为敏感,它们无疑比北方诸省更强烈地感到了 19 世纪上半叶的衰退。先是输入鸦片所引起的银钱匮乏和物价上涨,后是自南京条约(1842年)签订之后贸易从广州向上海转移,这一切都加速了广东、广西、湖南的经济衰落和社会风尚败坏。在 1845~1858 年间,自广州出口的茶叶从 7600 万磅下降到 2400 万磅,而它于同一时期却在上海从 380 万磅增加到 5130 万磅。经济衰落引起了在广州地区依靠经湘江与赣江流域而在内地大路上从事贸易的内河航运商、行商和坐商等一大批居民的破产。这些人为太平军大起义提供了其最早的部分军队。从 1849 年起,大运河上的贸易的全面停止也以同样的方式使内河船夫家庭陷入贫困,从而也促进了暴动地区的扩大。

一、太平天国

因此,1850 年左右在热带地区爆发的大起义,无疑是由具有革命倾向和宗教色彩的秘密会社介入筹划的。自从南明的抵抗时代(1644~1661 年)和 1674~1681 年间的分裂时代以来,那里对于满族人的仇恨情绪始终都很强烈。贫困和不公正,再加上参加“三合会”(又称“天地会”)的秘密组织的地下工作,导致了太平军运动的迅速发展,它扩大到了广西省并蔓延到了广东省和长江中下游诸省。

一种革命传统

后来成为太平军大起义之首领的人物，正是出自由客家(Hakka)人组成的受鄙视的中国少数民族集团，他们都是迁至华南的古移民。洪秀全(1813~1864年)出生于广西东部的一个贫穷家族，曾受过基础的传统教育，但却于科举中落第。这是一个具有宗教幻想的人，他因其气质而具有这种特征，但也可能是由于其出身和当地的宗教传统。读罢不久前由定居在广东的新教传教士们散发的揭帖之后，他决定选择救世主弥赛亚(Messie)。作为太平军运动之显著特点之一的神秘平均主义思想，起源于洪秀全与传教区布教活动的这些最初接触。他于1847年与一位名叫罗孝全(Roberts)的美国传教士建立了联系，同时又开始在广西东部的一个地区布教，那里自南京条约签订和外贸从广州转向上海以来，特别感到了经济的衰落。他由于其布教的成功而变得胆大起来了，于是便创建了一个拜上帝会，其名称本身就令人联想到了由新教传教士们所采纳的 dieu 的译名(上帝)。他在二三年间便吸收了近3万名信徒成员：广州港以及将广州与湖南湘江流域联接起来的商道上的艚公和失业的脚夫、矿工、贫穷农民、土匪和逃兵。教会也在客家人和粤桂两省的土著人中吸收信徒。

拜上帝会的成员很快便以“太平军”的名称而为人所知。他们首先在广西消灭了一个对手——为反对在该地区肆虐的土匪而结成的共同防御联盟，后来又吸收了一些反满的秘密会社。这次起义于1850年爆发于广西东部的金田村。太平军以其蓄长发和抛弃发辫为标志，因为发辫是屈从满族人的标志(所以太平军有时也被称为“长毛匪”)。他们向所有满耕田年龄的人平均分配土地，这是沿用了与唐代农业法所确立的那种原则相似的均田制，而且还受到了《周礼》中“井田制”理论的影响和启发。《周礼》是一部其真实性受到怀疑的著作，汉代的篡权者王莽和唐代的武则天皇后均企图

依托它的权威名望。同样，在太平军中将个人和家庭组成准军事性的集团，也既符合古代的行政传统，又符合秘密会社的人员配备制度：每 25 户形成 1 个“库”并拥有其“礼拜堂”，每 5 人形成 1 个“伍”，每 5 个“伍”组成 1 个“两”，每 4 个“两”组成 1 个“卒”；如此类推，一直到由 2500 人组成的师（相当于 13156 户的集团）和 125000 人组成的军。军事和行政的职务都互相结合在一起。太平军建立了一种集体性的制度，其中的任何人都不拥有独自的财产，人员均被严格地作了军队编制。在取缔了任何私人交易之后，每个人必不可缺的需要均由集体承担，而其政权则以神权政治为基础。这一切绝非如它表面上显得那样新鲜，这种制度已将其根深扎在中国古老的政治和宗教传统中了，而已消失的有关黄金时代的神话在其中又与未来的理想国结合在一起了。在公元 2 世纪的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黄巾军也创建了一个等级性和神权政治的社会，其目的正是要创造这样一个公正和纯洁的时代，而且也叫作“太平”。拜上帝会的信徒们后来又重新使用了这一名字，而其新国名——天国也以其独特的方式使人联想到了这一点。如果说基督教的影响在太平军中确实很明显（平等是派遣洪秀全前往救世的无所不在的上帝的理想），如果说其信徒们都坚持参加每周的宗教义务活动，那末大家还应该指出其他影响，因为基督教的新贡献是在典型的中國模子中铸造出来的。如果说以神的启示实施统治的洪秀全自称为耶稣——基督的幼弟，那末其他的起义军首领和反叛者也都以同样的方式被认为是救世佛弥勒的化身。佛教、道教、孟子和朱子的经典传统都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标志，基督教传教士们都对长毛起义军中的基督教的那种深刻的异教形态感到吃惊。

476

这场运动不仅是平均主义的和革命性的，也是清教徒式的和女权主义的。它抨击了姘居和自宋代以来广泛流传的少女裹脚的陋习，其目的在于保证男女在工作 and 战争中绝对的性别平等。女子

477

也要接受与男子相等的一份土地，她们也组成了全是女子的军队。太平军严禁任何无用的豪华，严禁赌钱、酗酒、抽烟、吸鸦片。但这些清教徒的（同时也是无视传统观念的）倾向以及新教传教士们的布教活动的发展，没有形成一种彻底的新生事物。明末由张献忠领导的起义运动也同样受到一种反对奢华和富豪的破坏性狂热所煽动。而且张献忠也创建了一些“婆子军”。

太平军起义的发展和遭镇压

1851年，洪秀全创建了太平天国并自称“天王”。他也将同样的尊号封给其大臣和军事首领们：翼王、东王、西王、南王和北王。其中的杨秀清（约为1817~1856年）是一位天才的组织家和军事家；而石达开则是具有特殊才干的将军。1852年，太平军占领了广西的东北部（桂林地区）和湖南的西南部，然后又向长沙和长江中游的城市（岳阳和汉阳）推进，一直到达位于南京西南的地区（江西的九江、安徽的安庆）。次年，他们便夺取了南京并为之定名为“天京”。直到南京于1864年陷落为止，它始终是太平天国的政治和行政中心。他们接着又连克长江下游地区（镇江和扬州），在那里切断了皇家大运河上的交通。1853~1854年间，新的帝国一直向北和向西扩展。太平军一直冒险进入到天津地区，并威胁着北京。但他们又因为寒冷和饥饿而被迫从那里撤了出来，并于1855年在山东遭到了失败。然而，太平军在整个长江流域始终占领着许多地区。

477 面对起义军的这种出人预料的胜利发展，清政府在一开始时惊慌失措。清军诸旗无法制止起义军的推进潮流，而由向荣率领的政府军则于1856年遭到了一次致命的失败。税收突然锐减，运输也因为长江上的船队停航以及丧失了帝国最富裕领土而陷入瘫痪。1855年，黄河爆发了特大水灾，其河道从山东半岛的南部向北部改道，只是到了1870年才被整治好。但在经过最初几年的惊慌失措和无能为力之后，清政府却有效地组织了防御，而且这种防御

不仅由是中央政府主持,还基于中国各省的官府和文人阶级的主动行动,因为它们都直接感到了一次损害着现有秩序和所有传统的叛乱的威胁。一些新的领导人物出现了,从地方上征募的新军也组成了。在西部是湘(这是对湖南的一种文言称呼)军,它被置于湖南人曾国藩(1811~1872)强有力统率下。此人创建了一支战船队以在长江上从事活动,并获得了中国乡绅们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同时他又借发行纸币和由清政府于1853年确定的“釐金”(对于准许国内贸易交流而收的新税)来为战争筹集资金。湘军于1854年收复了长江右岸的武昌,4年之后又成功地推进到镇江,然后又进军九江并威胁南京。不过,有系统的收复仅仅在1860年才开始。其主力是曾国藩率领的湘军、由另一名湖南人左宗棠(1812~1885年)统率的楚(楚是长江中游一个古代王国的名称)军,以及由原籍为安徽中部合肥的李鸿章(1823~1901年)组织的淮军。

但太平军却极力使他们的军队现代化,并在洪仁玕(1822~1864年)的推动下改组其政府。洪仁玕是天王的堂兄弟,曾在香港和上海接受过西方教育,他于1859年出版了一部政论性著作(《资政新篇》),于其中鼓吹采纳美国式的政治制度、修建铁路、从事矿业和工业的开发、设立银行、发展科学和技术。但太平天国却由于领导人之间的内讧而削弱了,因为这些内讧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激化。分配土地导致了中小地主之间的斗争。领导人不尊重强加给其大批信徒们的清苦生活准则,相反却花天酒地。战争和不停的转移使得现代化的纲领计划始终成为一纸空文。建造蒸汽轮船、铁路和工厂的计划最终被放弃了。在军事方面,太平军在长江流域推进得太快,却忽略了牢固地于农村内部立足。在1856年之前,他们未能设法与中国北方的起义军——捻军联合行动;另外,他们为了与西方列强保持良好关系而极力克制自己不去夺取上海,徒劳地希望获得西方列强的支持;最后,他们也未能拥有骑兵,这就使

之失去了快速行动的任何手段。直到那时为止一直保持相对中立态度的西方人最终于 1862 年站在了清政府一边,因为他们当时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太平军向上海推进的威胁。一支雇佣军队伍由此组织起来了,他们在著名的英国冒险家戈登(G·J·Gordon, 1833~1885 年)的指挥下与中国政府军队并肩作战。

1864 年,左宗棠收复了杭州,并于同一年开始了对南京的围攻。南京陷落后,天王服毒自杀。然而,为攻击太平军的某些残余势力,战斗仍在福建持续了两年。太平军的其他势力转到了台湾,还有一部分转到了交州(越南),他们从 1867 年起在那里形成了负责与黎氏王朝的旧部和土匪活动作战的团练。他们以“黑旗军”之名而著称,并积极地参与了对法国入侵的抵抗。

太平军的起义提供了对过去其他大规模起义进行反思的机会。那种希望中国王朝一直持续到农民起义以使“天命”转移到其他人手中并从而导致恢复先前状态的口头禅,与历史事实并没有多大关系。它不仅不了解各种起义之间非常大的差别(起义军的社会和职业的出身、起义军与其他社会集团的联系、地区特征和起义在地理领域中的扩展、组织、观念与目的),也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出现起义时的特殊社会和政治背景。独立于中央政权的军队之构成、贵族家庭之分裂、栖身于中国境内的古游牧部族的渗透和反叛、来自草原的入侵,都在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中扮演了更大的角色。

此外,“农民起义”(jacquerie,本意指 1358 年法国的扎克雷农民起义。后来泛指一切农民起义。——译者)一词也并不适合于被用来泛指被推向绝望的农民们的无政府和无组织活动;相反,暴动在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是它在大部分情况下形成了编制结构和等级制。这是以秘密方式建立起来的一种独立的村庄政权,它取代了被起义成功地驱逐了的由皇家官吏治理的地区官府。那些具有千年至福论倾向的大型秘密会社始终保持着忠于村庄的或专

业行会的基本特征；如会费的交纳、内部的会章、会员之间基本上是家庭性的联系、互相的义务、职务等级、加入会社在家庭内部的继承权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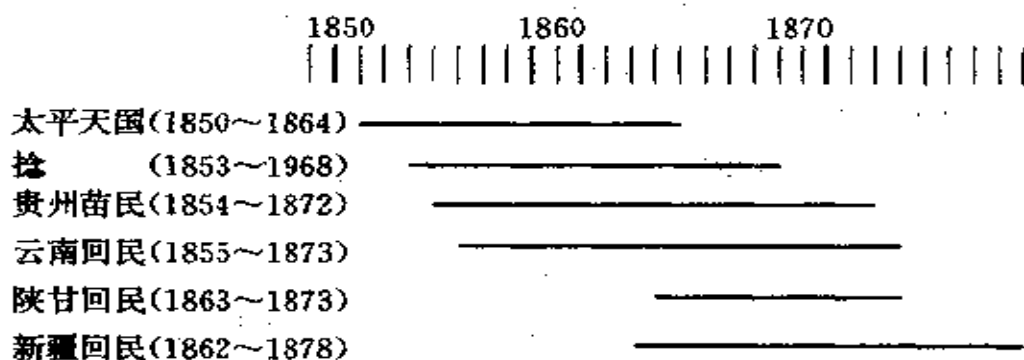
此外，大家曾希望把太平军向基督教的广泛借鉴视为一种激进的新生事物之标志和西方影响的确凿证据。这是根本不了解邪教在历史上的大规模暴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由合法政权保护的官方宗教信仰和遭国家攻击的宗教活动(淫祠)之间的对立。道教、佛教、摩尼教就这样为民间起义提供了对于一个和平、和谐和全面繁荣的社会之救世希望，太平军中的基督教也属于这种范畴。

二、其他的起义

481

然而，太平军的暴动仅仅是在整个叛乱的大背景下的一次主要起义。大家可以说这次大暴动在北方促进了捻军的起义，它开始于稍晚的时期并持续了更长的时间。这两次起义之间存在着联系。在捻军与中国西北部的回乱之间也有联系，而这些回农起义又与新疆西部的回乱有联系。但这些起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和社会气氛的表现。时代的苦难、最不得意者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统治阶级的腐化，足以导致混乱的时局。

1856~1878年间的暴动和起义表



481

捻 军

在中国北京以及山东、河南、安徽和江苏边界地区,于1851年开始的动乱被归咎于一个秘密会社,也就是捻(该词义为旋转着抓弄或拧搓东西,即捻东西;也可以指用作点火的纸捻)。它很可能是白莲教的一种复兴。其参加成员都是贫穷农民、走私盐贩、逃兵,此外再加上某些科场失意的小文人。这场运动是革命性和反满性的,但却似乎缺乏非常明确的目的;以强夺豪取或者通过对富人的压力而重新分配财富,这似乎就形成了捻军的主要活动。这次起义从1853年起便开始变得对于中央政权具有威胁性了。它确实向河北和从山东向河南扩展。1855年的大水灾又于数年之后扩大了起义军的数目。

设置了加强防御工事的村庄及其骑兵小部队、进行骚扰并在遇到危险时作全面撤退的策略、士卒们在农村所得到的共谋,所有这一切都使被派去镇压捻军的皇家诸旗和由汉族军队组成的“绿营”感到相当棘手。这些机动性不大和战斗力不强的军队在太平军之战初期就表现了其无能,现在也无法阻止捻军起义的发展。捻军在太平军于1854~1855年向南京方向发动进攻时曾帮助过他们,而且还于1856~1863年间试图与太平军协调行动。但太平天国于1864年崩溃之后,摆脱了最严重威胁的中央政府便对捻军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进攻。在朝廷点将让蒙古将军僧格林沁出征之后,他成功地重新恢复了对山东的控制,但该将军却在1865年对捻军发动大规模胜利反攻时被杀。清政府接着又转向了那些过去战胜过太平军的新人。在捻军的鼎盛时期,曾国藩被任命为镇压捻军的统帅。1866年,起义军形成了两个大反叛区:其一为山东—河南—湖北—江苏,另一个的中心是与3年之前爆发的中国回民起义建立了联系的陕西。1867年,他们向北京进军。曾国藩将其指挥权交给了李鸿章,次年,随着陕西的起义军向山西和河北的推进以及山

东和河北的起义军向北方的联合推进,对北京的威胁更加明显了。但李鸿章却于同年成功地平息了叛乱。

移 民

下述事件与其他动乱是同时发生的。它们是:从 1854 年起,被土地兼并和中国官府的敲诈勒索逼得走投无路的贵州土著民的起义(这些起义直到 1872 年才被完全平息),从 1855 年起在云南和于 1862~1863 年间在西北和新疆爆发的中国穆斯林和西域伊斯兰化诸民族的起义。除了受到外国势力鼓励的新疆回乱之外,大部分这类起义的基本原因无疑都是持汉族语言和属于汉族文化的人口的压力,其人口的增长从 18 世纪中叶起一直在持续发展。

由外来穆斯林和汉族混血产生的中国穆斯林集团从蒙元时代起就向云南和西北诸省(陕西和甘肃)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些生活在汉民族边缘的社会集团,它们坚持保护着以其宗教归属以及其民族学上最古老的远祖为基础的特性。他们那生命力极强的地方主义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民族至今仍被计算在“少数民族”之列。⁴⁸³ 他们受到了来自汉族和帝国官府的歧视,此乃他们 1855~1873 年起义的根源。在云南,这一事端开始于 1853 年汉族和穆斯林锡矿民工之间的冲突。1855 年开始的反叛在次年被奉命镇压的官吏们所组织的对穆斯林的一次大屠杀激化了。起义军的领袖之一是一位名叫马德新的伊麻目,此人曾赴麦加朝觐并在君士坦丁堡居住过两年。马德新很关注加强他自身势力的影响,最终于 1861 年与清政府谈判归降问题。他与一位名叫杜文秀的人接触,此人于距云南府(今昆明)400 公里处的大理地区创建了独立的苏丹国(即平南国),还使用了苏莱曼苏丹的名号。这次起义在汉人和该省的土著人中获得一些支持者,同时也得到了缅甸方面的支持。仅仅到了 1873 年,在伴随着全国的破坏和屠杀被缓慢平定之后,这次起义才被消灭。

甘肃和陕西省的穆斯林,他们最后的大规模叛乱要追溯到1781~1784年间;但继太平军于1861~1862年间向陕西方向的进攻之后,他们为支持太平军又在1862年重新开始骚乱。这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一名叫作马化龙(?~1871年)的穆斯林改革派人士,它很快就从渭水流域向甘肃西部并从蒙古边陲向青海的东北扩展。

1868年末,北京政府调来了镇压太平军的最权威将领之一的左宗棠,他的办事效率和组织观念使得西北诸省得以缓慢而又稳定地被平定。在这次西进的沿途造成了可怕的屠杀和破坏。陕西于1869年末被彻底平定。1871年,左宗棠的军队向甘肃中部推进。1872年,左宗棠的大营扎在省府兰州。最后,经过长期围困而夺取了肃州(甘肃西部古代和现代的酒泉)。这即使不算一次彻底的恢复和平(因为动乱一直持续到1877年),至少也标志着这些地区的全部严重威胁的结束。

左宗棠从他建立大本营的肃州继续向哈密方向推进,因为甘肃的一部分旧暴动者藏身于那里。他同时也向新疆全线挺进,那里自1862年以来一直在闹分裂。这场大调动是从新疆西部的绿洲开始的,那里的突厥和伊朗血统的穆斯林居民曾脱离了汉族—满族王朝的控制,恢复了曾于1825~1826年间作过的尝试。太平军战争和同时代的起义导致了清政府对西域控制的松弛。1873年左右,在左宗棠发动远征的前夕,全部新疆领土都陷入了叛乱之中。起义军的首领是一个叫作阿古柏(Yakub Beg,约为1820~1877年)的人,他是统治锡尔河上游浩罕家族的王公,后来成了从帕米尔直到罗布泊的整个塔里木盆地之主。英国人和俄国人都与他建立了联系,以图削弱中国并谋求在西域获得一种实力地位。尽管左宗棠遇到了部分政府成员的反,但却获得了外国银行的一笔贷款,并组织了一次远征。1878年初,整个新疆地区都被平定,这种赫赫战功又赋予了拒绝与外国人有任何调和的极端派爱国者们一

种信心。

三、后果

清帝国曾经几乎处于灭亡的最后边缘了，为此已具备了所有条件。同治年间(1862~1875年)的复兴该帝国的传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切合下述事实的：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的中国与继此之后的中国之间的断裂相当彻底。经济、财政、政府人员的队伍、帝国力量的分布、伦理和文化气氛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也都大相径庭了。

最直接的后果便是由起义军队和镇压军队之间激烈战斗所引起的物资和财富的巨大消耗，以及全面的屠杀和系统的破坏。在人员生命方面的损失超过了历史可以提供例证的任何一次。从南京一带直到太湖和杭州一带的整个富庶、人口稠密、以其工业和文化中心而闻名遐迩的地区都遭到了蹂躏。在许多地方，由这次灾难留下的痕迹在50年之后尚未被完全消除。大家不知道死亡的具体数字，但最合乎情理的估计是在2000~3000万人之间。据说，云南人口的近半数都在镇压回民起义期间失踪了。在陕西和甘肃省，人们估计受害者的人数为数百万人，而在贵州则为500万人。在所有的战斗地区，其空缺只能在19世纪下半叶被缓慢地填补。这样一来，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来自河南、湖北、湖南、苏北和从绍兴到宁波之

及被遣散复员的兵卒们提供一种维持生计的手段：恢复耕田，重建城市、堤坝、水库、粮仓，为新垦殖移民预先垫支必不可缺的农业资本（种籽、农具、耕畜），还要最大限度地减轻农民阶级的负担。人们估计，同治时期的农业税与太平天国大规模暴动前几年相比，平均减少了30%。大屠杀之后的普遍疲惫以及为支持农民而做出的努力，解释了为什么在19世纪末之前没有更多的农民暴动。

因此，在紧接着天国之后的几年中，令人感到了一种较好的形势。出自悠久历史经验的这种本能反应，鼓励人们首先恢复农业经济，遂使中华帝国得到了某种平衡。但这种扩大到了中国内地近半数地区的重建努力，可能对帝国经济的压力太重了。当时必须找到新的财源，而又只有贸易和手工业部门才能提供这一切。如果说大屠杀立即就为农村社会带来了某些缓和，那末政治和社会制度却和暴动之前一样，会重新有利于大富豪地主和贵族，因为帝国正在持续和全面的贫穷化。

被迫加重贸易负担

贸易和手工业既受到了1850~1865年间破坏的严重摧残，又必须承受重建的主要负担。中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仍是成品的大生产国，但后来就倾向于变成一个几乎是纯农业经济的国家了，近代舆地学家和史学家们都将此视为前工业国的典型特征，但它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相对较晚的发展结果。

1853~1857年间，为支付镇压太平军战争的开销而创设的一种新的税收制很快便扩大到了所有的省份，从而改变了帝国的传统财税平衡。这种叫作“釐金”的税制要对中国内地的商品课以占其价值2%~20%的税收（从理论上讲，每枚铜钱重一两），但却不被用于进口的商品，它一直延续到1930~1931年间。一旦加重了自1860年勉强发展起来的

486

了。商业税和全面的贫穷化又促使各省份、各地区和各县越来越趋向于依靠自己过活。

以下的中央政府的收入表,揭示了成品贸易和生产所承受的负担(由此而以间接的方式涉及到了全部生产)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增加。

	1850 年之前	1890~1895 年左右	1900~1910 年左右
粮食税	30	32	33
盐税	5~6	13	13
中国对外关税	4	1	4
西方关税	0	22	35
釐金	0	15	14
出售尊号和官职	1	5	4
总 数	40	89	103

以百万两为单元所作的估计

粮食税的总量在太平天国之前的时代和 20 世纪初叶之间事实上没有多大变化,其他类别的收入却在同一时代增加了 7 倍。盐政的改革、从太平军战争时代起出售官职的做法以及釐金的创设,同时促进了间接税收的这种发展。

由赫德(Robert Hart)自 1863 年起从事的海关机构改革,可能确保了中央政府在从太平天国战争之末到中日战争期间获得其收入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年代	釐金	海关收入
1885 年	14	14
1889 年	14.9 左右	21.8
1894 年	14.2 左右	22.3

但除了由赫德主持的对外海关机构在1863~1911年间的收入(这些收入从1901年起完全被支付庚子赔款耗尽了)之外,其他形式的税收也是大量转移资金的机会,但大家却绝对无法由此而估量事实上强加给中国居民的负担。不仅进口税和普通税收入不能全部交到北京政府和各省政府手中,还存在着整整一套未被列入任何会计帐目的常规税收,且不说官府的官吏和职员们又在所有的级别上施加各种压力。

政治变化

因此,起义暴动严重地削弱了中国的抵抗能力。不过,它们也产生了改变政治力量基本划分的后果。

太平天国起义的最初几年,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炮舰那地域很有限的攻击更彻底地揭示了传统军队的软弱和分裂(以满族八旗及被其同化者为一方,而以汉族军队所组成的“绿营”为另一方)。但是,面对抵抗太平军的失利,在中国上层阶级中便产生了一次力量总动员。只有官吏和地方贵族们的个人主动性、商贾和富裕地主们的资金帮助,才可以改变如此灾难性的结果了。这样一来,就逐渐形成了一些自主的军队,而独立的军队后来才是真正的军队。

在鼓动人们到处搜求和晋升最有才干者的同时,战争也发现了一些过去被埋没的天才人物。在已于战斗中表现出权威的重要军队将领们周围,也形成了一支人才队伍。组成这支队伍的,是那些参加过战斗并形成了许多司令部之组成部分中的朋友、亲属、弟子等等。这个时代的三大巨头是曾国藩(1811~1872年)、左宗棠(1812~1885年)和李鸿章(1823~1901年)。此外还可以补充胡林翼(1812~1861年)、李鸿章之兄和曾国藩的弟子李瀚章(1821~1899年)、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1824~1890年)和刘坤一(1830~1902年)。但其他许多人在战斗期间也扮演过稍逊一筹的角色,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和文化史占有一席之地。太平天国战争诞生了新生力量和新的政治人员队伍,其影响从 1864 年夺取南京到中国人在 1894 年失败之间非常突出。在 1870 年左右最有份量的人物是李鸿章(其军队在两年之前挫败了捻军)和左宗棠(他平定了西北和西域的回乱)。唯有他们二人才掌握着组织严明的重兵和能征善战的队伍。他们与旧部和下属保持的联系、在其省中拥有的支持、直接从自己建立的活动基地所获得的收入等,都确保了他们对于中央政权的某种独立性。事实上,正是镇压起义所造成的形势背景导致了其主要是地区性的特征。 488

但抵抗太平军的运动也因其他特征而引人注目。中国的旧统治阶级惊醒了:战胜太平军最终导致了原有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破坏以及所有古典传统的衰败。新军将领都是行政官吏和文人,本来没有任何因素会促使他们从事行武职业。但威胁到传统秩序的危险却把他们团结在共同捍卫帝国和王朝的事业中了。太平天国之危机不仅是政治性和军事性的,也是伦理性的。在帝国捍卫者们的心目中,叛乱的成功乃是堕落的征兆,也是削弱旧道德标准的标志。忠于皇帝、社会和家庭的等级观念可能比在任何时候都被更多地灌输给全体臣民了。因此,太平军的起义引起了正统的反响,它在统治阶级中引起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地顽固执著于传统伦理和道德标准。这种出自 1850~1864 年危机的正统之反响,乃是 19 世纪下半叶历史上的主要事实,因为直到 1894 年的中日战争期间,它都激发了中国人对于外国企业和西方新生事物的反感。

军队和工业现代化的最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们也是正统观念最热诚的捍卫者。几乎这方面的所有努力均出自镇压太平天国大军之司令部的幕僚们。战争的需要促使这些军队的首领们与西方人建立了接触,因为外国的掮客、商贾、银行和政府可以为他们提供军械、发放信贷、帮助建立兵工厂和工厂。在该时代的所有统治者

中,正是这些出自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新人在军队和战争工业现代化的问题上思想最为开放,也最容易接受对外国让步。但对于他们来说,现代化则与维持传统的政治和社会形态以及加强正统的观念有联系。

矛盾的产生

489 中央政权的削弱,长时间内被由太平军大暴动以及此后发生的所有起义而在统治阶级内部导致的神圣联盟掩饰起来了。但在同治(1862~1875年)和光绪(1875~1908年)统治期间,一次深刻的政治分化从1860~1861年间的危机时代起便初见端倪,因为当时出现了法—英殖民军向北京方面的进攻、朝廷的大部分人都逃向了热河、外国联军进入毫无设防的京城、咸丰皇帝那令人生疑的晏驾、孝钦(慈禧)皇后的政变等等事件。此后,与一小批新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其盟友)相对立的是满族的大官吏和汉族高官中的大多数人,而与主张跟外邦调和的派别相对峙的则是最不妥协的爱国派。这种政治分化在更大程度上符合北方人(出身于从经济观点来看是不太活跃的地区,而且与外国人没有接触)与南方人(更开放一些,更了解情况和更不好战)之间的由来已久的对立。中央政府的成员总的来说对镇压太平军的军事首领们的势力增长心怀不满,他们害怕这些人的地区性独立倾向日渐发展,而这种潜在的倾向确实于19世纪末就已形成了。他们同时也抱怨新派人物对外国人实施的借鉴和妥协政策。事实上,随着满清贵族的衰落和直接由土地税收入供养的地方政权的发展,朝廷便倾向于变成与帝国真实形势并无任何关系的一个阴谋场所。所以,大家只能把少数高级满清贵族列入新派政策的支持者之行列,文祥(1818~1876年)和恭王奕訢(1833~1898年)均属于最著名的此类例外情况。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外国人的全面仇视态度从其参与1860年北京谈判之日起便彻底改变了。但反对派从1870年的天

津事变起却变得更为强烈了。慈禧因其覬覦政权的激情而从 1875 年到她 1908 年逝世间统治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她善于利用这一切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即在“现代派”和“保守派”之间活动,并以煽动其中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的办法来维持其政权,从而使当代的真正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第三章 现代化的失败和外国人侵的加剧

490

其最早的表现形式是于 18 世纪末和 1830 年左右出现在英格兰的工业化时代的大变革,在世界上的任何部分,都不是未经危机和悲剧就可以完成的。这种长期的现象因地区而异地和不均等地触及到了欧罗巴的不同国家。在大农业国俄罗斯,奴隶制仅于 1861 年才被废除,必须等到 1880~1890 年才形成一种现代大工业。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旧结构处处都对由技术、生产手段、交通和运输的发展所引起的相继变化造成了强有力的抑制。在一个像中国那样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其历史包袱当然会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令人感到更大的压力。

但人们却不能断言中国从技术观点上来看比西方许多国家落后很多。第一批现代军工厂以及制造蒸汽轮船的新船坞早在 1865~1870 年间就出现了。人们也不能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工业化,因为 19 世纪末的这类中国企业被认为装备得和英国的同类企业一样精良,而汉阳铁厂(汉冶萍煤铁矿公司)则比 1896 年由日本政府在八幡创办的炼钢厂早两年。由詹天佑(1861~1919 年)与一些中国工程师和工人建筑的从北京到张家口(Kalgan)之间的铁路,其造价远低于由外国公司修筑的铁路,并以其路面的难度和完成的速度而成了一种真正的技术功业。

中国也并不缺少能使它吸收 19~20 世纪西方科学新发展的科学传统。

491

如果说中国社会未能在合适的时机成功地进入其工业化的时代,而这种失败又成了它从19世纪末开始的悲惨命运之根源,那主要并不是由于其固有的无能,而更应该是由于一种特别不利的历史机遇。在清帝国于19世纪上半叶所经历的衰落和倒退之后,有两种同时出现的现象又加强了由华夏世界中的社会和政治传统所形成的障碍,这就是1850~1875年间国内的严重危机,另加外国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压力。西方商人在中国获得的特权更有助于削弱中国经济,西方国家对该帝国的包围、由传教士挑起的事端(教案)、外国的苛刻要求和频频进攻,都引起了传统势力的强烈反应。中央政权的削弱和政治分裂、中国农业的衰弱、资本的严重匮乏、新工业主要用于军工方面的特征,都阻止了政府在手段与实际活动的任何改革,从而非常严重地限制了现代化的努力。说到底,中国既没有时间又没有办法去适应时代的变化。

一、现代化问题

工业化的最早努力

向西方人采购武器并在中国制造由欧洲军火模拟而来的武器,是一种要上溯到16世纪的传统。明朝在反击满族新兴势力的战争中,曾为了以葡萄牙人使用过的那种更有效的大炮来代替已过时的铸炮而作出努力,但在此之后,草原上的那些习惯于骑兵战斗的满族人则似乎不太关心改进他们的大炮了。此外,18世纪的那些以山区(西藏、四川西部、云南和缅甸的边境)或西域为战场的战争,也使重炮面对往往是行踪不定的敌人而变得不适用了。这些形势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仅仅从英国于1840~1842年发动进攻之时起才恢复铸炮。但主要是从震动一时的太平天国战争起,形势才有所变化:起义军和镇压起义的将领们都向欧洲掮客们购买了军火,努力组成一支舰队、寻求获得贷款和技术帮助以建立军火工

业。1853和1860年间根据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倡议在湖南和江苏创建的小兵工厂和造船厂,以及1859年发表的《资政新篇》等,都应被纳入到这样的背景下。《资政新篇》是洪仁玕发表的,他是天王的堂弟,曾与上海和香港的传教士有过接触。洪仁玕那雄心勃勃的计划考虑到了创办铁路、工厂、矿山和银行,并鼓励学习科学和技术。但是,内乱、外患、外国人从1862年起不再喜爱太平军等事件,都解释了起义军中现代化尝试的失败。相反,从皇家一方来说,与西洋人的贸易却可能从1861~1862年起得到了促进,这是由于外国人自北京条约之后开始实行了合作政策,清朝创设了一个负责对外关系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1861年)。

由此,镇压1851~1878年起义的三位主要将领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都得以在西方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创办新的军火工业。他们在太平天国战争末期,甚至还利用了外国雇佣军小部队的支持,其有效的战斗力促进了暴动的崩溃。在这个时代的新工业企业中,最重要的是由李鸿章和曾国藩于1865~1867年间在上海创建的兵工厂和船坞(江南制造局),同时还有利用法国技术由左宗棠于1866年在福州附近的马尾建造的船厂。中国最早的炮舰于1868年在马尾船厂造成;1870年左右,而上海船坞则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左宗棠还在西北取得了进展。他奉命在那里平息回民起义,也在那里创办了矿藏勘探业、军工厂和纺织厂。

从1872年起,始终由一小批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脱颖而出的新派人物领导的工业化运动取得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它利用了从事与外国人通商而致富的富贾们的财政帮助和经验;大家都用一个葡萄牙文辞汇来称呼这些商人Compradores,在汉语中叫作“买办”。这样一来,李鸿章于1872年便筹办了中国的轮船局,于1878年创建了开平(位于天津和山海关之间的唐山附近)矿务局,于1879年创办了开平的煤矿铁路,于1880年创建了天津电报局。1882年,他又建立了上海织布局,但它仅仅从1883年才开始运

行,在1893年被一场大火烧毁。

在中国于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遭受失败之后,看来直到那时为止的努力都不充分,故内困和外患可能鼓动加强军事能力。在强烈感到外来压力时,大家发现,应该去振兴整个中国经济。因此,本应作出新的努力来修建铁路、开发矿山、建造炼钢厂、创办技术学校,却反而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筹办现代化的陆军和舰队了。1894
493 年的灾难性失败后,马关(Shimonoseki)条约的苛刻条件非常明显地削弱了中国的国势、独立性和抵抗力。除了其军队和舰队所遭受的损失之外,还有沉重的战争赔款以及被日本占领了战略要地。中国从这次严重失败中很难再振兴起来,因为它在6年之后又遭到了非常沉重的庚子赔款的打击。大家甚至还可以说,从1895年起,任何振兴的希望都在很长的时间内被排除了。在半个多世纪期间,中国社会在重获独立之前经历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考验。

1840~1894年间的工业化努力

1840~1842年	铸炮、造涡轮和踏轮船
1853~1860年	在湖南、江苏和江西制造兵器与小船坞
1855年	江西兵工厂
1861年	安庆(安徽)兵工厂和船坞 设立负责外国事务的总理衙门
1862年	筹设上海大兵工厂和造船厂(江南制造局),在各省制造火药 设立同文馆,即设在北京的西方语言和科学学校
1863年	在上海设立一所类似北京同文馆那样的学校
1864年	开设广州的同文馆
1865年	南京军工厂
1866年	福州附近的马尾船坞
1867年	福州船政局的设置
1868年	中国第一艘汽轮船出自马尾船坞

1869年	西安和福州兵工厂
1870年	上海兵工厂成了当时世界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
1872年	西安兵工厂迁至兰州 创设中国轮船局 32名上海学者被派往美国
1876~1877年	向英法和德派遣中国舰队的学员
1877年	开采开平煤矿
1879年	修建开平铁路
1880年	天津电报总局和电报学校的建立 开始组建北洋舰队
1881年	铺设上海至天津间的电报电缆 吉林工厂开放
1882年	上海电力局的建立
1886年	天津军事学堂的建立
1887年	创办广东海军学堂、广州兵工厂 天津铁路局的建立 黑龙江流域莫河金矿的开采
1888年	北洋舰队的组建
1889年	汉阳大兵工厂 上海织布局开始生产
1890年	汉阳高炉的建成 湖北大冶铁矿的开采 湖北织布局
1893年	北京—山海关铁路的通车 台湾铁路的建造

失败的原因

494

留给中国去创建一种现代工业并革新其军队和舰队以抗击其外敌日益增涨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时间很短，只是在从1864年收

495

复南京到 1894 年的悲惨失败之间,它与此同时还必须平定暴乱、恢复其在东亚的权威、从事大破坏之后的重建并四处抵抗外来的进攻。清政府必须不停地对付最紧急的情况,与西方诸国谈判、与外国银行订立借贷合同(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到 1894 年间,共借贷 4000 万两白银),以解燃眉之急。然而,中央政权在这个时代已失去了它的一大部分势力和收入。它与在平叛战争中建立起来并掌握着其军队与独自收入的地方政府分享实权。对于从过境贸易中征收的“釐金”,中央政府仅仅能得到五分之一左右,而且对于其他税收也只掌握四分之一。朝廷对于这些新派人物在各省中获得的势力非常猜忌,对于强硬派爱国者们的论点十分同情,对于当时的真实情况也一无所知,因此很快就被迫自我反省。当一些幼年或少年皇帝们相继即位时(同治于 1862 年 6 岁时登基,光绪于 1875 年 4 岁时即位,宣统于 1908 年 3 岁时被拥立皇帝),朝纲却由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智慧和诡计都用于维持其权力的女子把持。因此,19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从理论上讲是由中央政权统治的,但该政权却既无法理解现代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又无法确保对此的领导权。它不仅是被动的,而且还倾向于反对新生事物。外国对中国内地的进攻以及对帝国边疆地区施加的压力都引起了纷纷议论,它们转而反对为现代化而巧施匠心的人们了。事实上,正是这些人变成了形势的主宰者,他们在与外国人谈判并始终都被迫向外国人的新特权让步。此外,公共舆论害怕创办工厂、矿山和铁路会增加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便于西方人的渗入、增加失业和以有损于中央政权的结果而加强地方政府的势力。

明治年间使日本的工业和军事得以发展的两大条件在中国都不具备:日本既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又没有固定的资源。正是由于向农民征敛的税收,日本才得以改造其工业和建立其军队。然而,中国的农业却无力承受进一步加重的负担了。由内战和起义暴动造成的破坏、由银价上涨而造成的贫穷化、越来越频繁的饥荒和

水灾,都使得中国农业经济于19世纪下半期停滞或倒退了。那些主动采取措施来创办兵工厂、工厂和船坞或造船厂的高官和地区总督们,除了利用在与外国做生意中变富的商人的资本之外,再无他计可施。但这些资本却显得非常不足。此外,买办资本家们也不会对于其利率为8%~10%的企业表现出丝毫热情,因为这种利率远不如每年可以赚取20%~50%利率的传统投资(农业信贷、古式的中国银行、典当铺、土地)。也完全如同资本投资一样,为技术和科学培训而作出的努力要远远低于在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度中本来应有那种水平。如果说工业化计划的促进者们善于利用买办商人从外国公司中获得的经验,那末他们相反却缺少中国的技术人员。新企业中技术性最强的方面都要委托给外国人。

在这些障碍中,最严重的无疑是缺乏由中央政权保证的领导机构以及缺少资本。与此相联系的又是无效的官僚机构的负担、过高的股息分配以及一个穷途末路的国家所造成的压力。由此,北京政府于1899年从各省中抽取了280万两税银。然而,这种抽税办法的主要受害者将是中国轮船公司和上海电报局,因为这些企业在财务上与汉阳铁厂、萍乡煤矿和上海华生纺织厂有关系。国家不是按照本应去做的那样保护其新生工业,而是根据一种古老的反应本能去非常沉重地打击最具有活力的企业。这样就可以解释,在经过一个为时长短不等的最初成功之后,何以大部分新企业都面对外国的竞争而表现得收益不佳或者变得亏损了。

人们会颇感惊奇地发现,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障碍,但现代工业的首倡者们,也就是受到古典文化培养的官吏们(没有任何因素注定他们来负担这项任务),却在一切部门中都成功地取得了明显成果,比如在重工业(铁矿和煤矿、高炉、兵工厂和造船坞)、轻工业(纺织和供单人使用的武器)、金融(现代银行)、交通(轮船公司、电报线路、铁路)等领域。直到1894年,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实际上几乎与大家普遍认为是比较先进的日本旗鼓相当。两国所投入的

资本也具备同样的规模。只是，中国的企业之分散以及它相对于其庞大人口而言显得微不足道的数目，冲淡了中国工业化的成果，而日本的集中化却产生了一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此外，内战和外来威胁也促使中国将主要精力集中到一种非生产性的战争工业上了，而这居然是在为近代经济发展所必不可缺的基础被建立起来之前。相反，日本的努力却比较好地根据由明治政权执行的一种基本政策而有所分布。这些情况以及最后于1895~1901年间强加给中国经济的沉重负担，解释了两国的不同发展：外贸在日本和在中国一样享受到了优惠待遇，但1880年90%的对外交易尚掌握在设于该国的美国和英国公司手中，这种比率于1890年下降到80%，后来到1900年又下降到60%。就在外国于中国加强控制并使古老的清帝国成为一种多国殖民地的同时，日本却获得了其经济独立。

此外，明治时代的日本历史也不能与中国历史相提并论，正像不能如大家经常做的那样把日本人善于表现出来的适应观念与中国人那顽固因袭守旧的传统互相对立起来一样。这两个地区的幅员是根本无法比拟的。其中之一绝不会比不列颠群岛辽阔多少，而另一个人口最稠密地区却和直到俄罗斯边境的欧洲面积一样大，并且也具有几乎同样的差异性。它们的历史背景也相差甚殊。日本从未经历过可怕的内战、破坏和国内的困难，而这一切却恰恰正是从19世纪中叶到1875年左右的中国之命运。日本同样也未经历过外国人曾不间断向清帝国施加过的那种经常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从最早大规模输入鸦片开始直到1830年左右却在清帝国不断增强。中国对处于蓬勃发展高潮中的西方工业来说显得像是一个取之不竭的市场，而日本却只对西方的覬覦具有很少的一点吸引力，而且它自己也不失时机地亲自参与了角逐。如果说正当中国遭受无穷折磨的时候，日本却能广泛地向外国借鉴并为现代工业奠定基础，那末这是由于后者置身于这场大角斗之外，并且更好

地保护了自己不受西方国家经济、军事和政治压力的毁灭性影响。

日本的社会特征、民族主义和尚武传统确实促使它适应了现代社会并采纳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典型的征服精神。但在这个弹丸小邦与庞大的清帝国之间的不成比例性及其历史背景的根本差异性，则起到了更有利于日本的作用。

对于中国来说，直到 19 世纪末叶仍有时间纠正其原有的错误并赶上多年积累起来的落后。需要达到的目标已经公诸于众，必要的改革已经确定，有能力的人才也绝不缺乏。但中国必须为此受到保护，以对付外国经济的巨大压力并享受到一种国际援助。可是后来发生的情况却恰恰与此相反。

自由企业还是国有经济

497

人们曾试图在中国缺乏那些使西方得以发展自由企业的因素中寻找中国的落伍和工业化尝试失败的原因。其实，人们在中国社会中没有发现任何与此的可比因素。经营企业和竞争的思想、节俭的风气、利润和收益观念不光在中国始终缺乏，而且还与中国的整个人文主义传统背道而驰；社会的成功在那里不能被简化成一种庸俗的富裕化，而首先要包括使人获得权力和政治权威的荣誉与官位。中国人的伦理主张忠于国家、个人修身、敬让和谦虚。甚至在经商中，真正的资本也并不具有经济特征，而具有社会特征，它是由伦理信誉、职位和权力形成的。人们正是根据由已获得的名望、裙带关系、所建立的联系网带来的信誉进行谈判交易的。

如果说在中国自明末以来就存在着巨商和巨富钱庄老板（亦即那些操纵兑票并得以形成巨额财富者），那末这些人却与欧洲资本主义初期的企业大老板们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活动也似乎是与纳税的农庄而不是与交纳国家固定税的私有企业相似。他们都希望赋予自己半官方的特征，不是试图反对官府，相反却是作出努

力以尽可能地与此结合起来。他们贪图官号与公职(这些人在国家处于困难时便向帝国捐献大量金钱),其理想是与高级文人官吏们平起平坐。他们搜集书籍字画,充当文学艺术的赞助人。这些人生活于豪华之中,受占统治地位的伦理道德之驱使,想使其亲属们富裕起来。

政治功能凌驾于其他一切的特性以及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经历,解释了这些传统性的行为。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才华。但当解释中国对于自身现代化之无能为力时,大家正是忘记了这一点,而指责其政治制度和在经济方面的统制经济之传统。但全面权衡,中华帝国的制度并不比其他许多制度更令人憎恶。同治年间(1862~1875年)的统治者们懂得表现其精力、积极能动性和才学,他们的业绩是不容忽略的。他们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时代背景和缺乏最高领导,而不是一种本质上的无能。中国新的工业企业受到了良好的保护,它们本来是能够得到发展的。它们的数量很大,本来足以改变传统经济与行为的面貌。自由企业的发展并不是拯救中国的必备条件。在我们今天向着集体化和国家经济形式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更为接近其古代传统,它始终忠于其独有的民族特征。

498 以类似的方式采纳模拟西方国家议会制的做法,后来也显得没有意义了。这绝不是因为中国对于自由民主尚不“成熟”,而是因为这种借鉴的制度与中国的传统完全格格不入。自由企业和自由民主是西方民族之特有发展的结果。如果认为所有社会都必须经过西方一劳永逸地提供的一种直线性发展的所有阶段,那就是对于诸文明的差异性及其固有特征一无所知。

二、外国入侵的加剧及其后果

人们无疑不应把西方对中国的反复侵略和外来民族强求的极大特权视为中国现代化失败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但这些侵略

和特权却要对此种失败负很大责任。如果说西方人获得的特权进一步破坏了一种已经被内战严重削弱了的的经济,那末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攻击则在其他方面产生了更严重的后果:它们更加坚定了工业化努力的军事性主导方向,而未能给中国留下余暇,以便为其经济现代化打下必不可缺的基础。此外,这些入侵还挑起了一场越来越激化的仇外运动,以至于很快就变成了必要变革的主要障碍之一。

西方入侵中国的历史也是整部中国史中最为西方人所熟悉的方面。由此便产生了观察视点的一种歪曲或失真。英国或法国的任何一次稍许炫耀武力都会比动摇了清帝国在 20 多年间动员了全部力量的、改变了中国政治背景及经济的激烈内战更引人注目。东亚国家的历史在西方的发展史以及它在世界这部分地区的征服史面前几乎完全黯然失色了。但如果大家能理解西方国家是怎样入侵中国的,那末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正是在中国近半数的省份摆脱了合法政权之控制的时候,正是在内战猖獗的时候和平叛大军组成之前,英国以及步其后尘的其他西方国家都从中国掠得了比它们在第一 次鸦片战争中的所获多得多的权力。

被奴役地位的加重

499

英国曾借国内困难之机而从 1850 年起扩大向广东和福建沿海的鸦片交易。1856 年,受到中国当局稽查的走私船亚罗号(Arrow)事件为一系列新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口实,西方史学家们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共有 5000 名英国士兵于 1857 年包围了广州。次年,英法两国的炮舰摧毁了守护距北京之门户天津不远的海河口的大沽炮台。清政府在胁迫下于同一年签订了天津条约(1858 年)。10 座新的城市向在那里获得了租借地的外国人开放,在北京又设立了一些领事馆。天主教和新教获许自由地在中国内地建立传教区并在那里成为宅院与土地的主人。一项新的战争赔款被强

501

加给了中国，它被迫向大英帝国支付白银 400 万两，向法国支付 200 万两。中国承认俄罗斯和美国也拥有与这两个国家相同的权力。然而，尽管签订了“条约”，战斗却再度爆发，中国的抵抗也相当有效，从而使法—英联合舰队于 1859 年在大沽炮台前遭受了沉重失败并不得不发动第二次远征。次年，一支由英国和法国殖民军组成的近 2 万人的远征部队向北京进军，进城后马上就抢劫和火烧著名的圆明园，那是一颗乾隆皇帝在耶稣会传教士们的建议与帮助下命人修建和装饰成的艺术明珠。

1860 年在北京签订的条约迫使中国作出了新的牺牲。天津向外国人开放，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被租借给了英国，中国政府还要支付 1600 万两白银的新赔款。最后，又补充了另外两项经济领域中的条款：西方的英国以及任何其他民族试图在中国市场上倾销的纺织品均被免征关税。此外，外国舰队也获得了在中国内河航运网中自由航行的权力。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产生在一种与 1842 年签订南京条约时完全不同的背景中。第一次鸦片战争仍属于帆船和商业冒险时代。在 1857~1860 年，当发生外国人的二番进攻时，大工业已在最发达的欧洲国家中处于蓬勃发展中了。那些后来被中国一方谨慎遵守的已签订的条约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而外国人所获的特权也很快就使中国经济受到了影响。

502 中国最终不仅失去了其海关自主权，也失去了对它自己海关机构的控制权。英国人对于从 1863 年起被苏格兰人赫德 (Robert Hart, 1835~1911 年) 改革过的中国海关的控制，无疑立即就产生了有利的效果，因为它排除了所有舞弊，并为帝国提供了正常的收入。但它也使外国人得以在合适的时候最终夺占中国的海关收入。从 1911 年起，当中国被迫以这些海关收入作为庚子赔款之沉重不堪的债务负担的抵押时，这种结果便产生了。

1858 年的条约和 1860 年的北京条约也标志着租借地发展的

再次猖獗，它是摆脱了北京政府权力的、在中国自己领土之上的真正外国飞地；它们同时也标志着由于传教士们在整个帝国中的立足而不断挑起的教案的开始。

外国人从 1860 年起大量在中国定居，他们由于其商业、宗教和政治利益的压力以及与中国当局和居民们的冲突，越来越频繁地进行干涉并始终都要提出更有利于自己的要求。天津和北京条约很快就被其他条约超越了，每个西方国家（甚至是像比利时那样的小国）也都坚持要享有同等的权力并一直不停地扩大其特权。任何一点微小事件都会被用于炫耀武力和加重中国附庸地位的借口，以要求赔款与赔礼。这样一来，在一位英国翻译于云南和缅甸边界被杀之后，中国被迫于 1876 年与大英帝国签订了芝罘（山东东北部的烟台附近）条约，除了直到那时为止的大约 15 个通商口岸之外，又增加了 5 个新的开放通商港口。

四面包围

除了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加的这种长期压力之外，甚至还应该补充以英国、俄国、法国以及很快便加入的日本对于清帝国的边陲地区以及 18 世纪对中国组成部分的蚕食侵犯活动。

西方民族不再局限于梦寐以求地在东亚建立商行以确保对贸易交流的控制，它们梦想占领世界这一部分地区并将之改造成殖民地。

早从 1858 年起，俄罗斯就占据了阿穆尔河（黑龙江）下游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锡霍特山脉（Sikhota Alin），该地区自 13 世纪以来便属于中华帝国。在 10 多年之后，俄国突厥斯坦政府利用中国在塔里木盆地遇到的困难和阿古柏（Yakub）在新疆带头制造分裂的机会，于 1871 年一直入侵到了固勒札（宁远城，伊宁）这个战略城市以及伊犁河流域。自从左宗棠于 1878 年初最终收复塔里木盆地起，朝廷便派遣满人崇厚（1826～1893 年）出使圣彼得堡以要

求归还被占领土。崇厚是因其对外国的知识而被选择担任这次使命的，他曾在1863~1869年间参与了各种条约的制订以及在天津签署协议的工作，然后又参与了天津争端的解决并于1870~1872年间领导了应法国要求而道歉的代表团，崇厚在里瓦几亚(Livadia, 克里米雅的雅尔塔附近)接受了被清朝朝廷和公众舆论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条约；俄国人仅仅归还了很少一部分被侵吞的领土，还获得了5000万卢布的补偿。1881年的新谈判又使中国以支付9000万卢布的赔偿和放弃位于鄂尔齐斯河(Irtysh)上游其他领土的条件，收复了对其更大一部分领土的主权。

已经开始形成其近代工业和军队的日本对中国的最早进攻发生于1874年。台湾是日本一种始终未产生速效的袭击目标，而始终是清帝国附庸的琉球群岛也同时被日本占领了。中国于1881年被迫承认了日本的吞并。此外，日本于1876年又把一项类似西方人苛求中国的那种条约强加给了朝鲜，从而使朝鲜将某些港口向日本贸易开放并承认了日本的经济特权。这就是导致中国介入朝鲜并在那里挫败日本压力的漫长过程的开始，它终于导致了1894年的冲突。

外国的威胁在越南显示得更早。越南是另一个属于中国势力范围的国家，它与中国的关系密切而悠久。在1862~1867年间，越南就已在法国的侵吞蚕食下被肢解了其南方省份(交趾支那)。但法国殖民军在红河(SongCai)流域的推进却于1881~1882年遇到了非常顽强的抵抗。越南人在那里获得了中国黑旗军的支持，这支军队主要由逃到越南北方的太平军旧部组成，由刘永福(1837~1917年)指挥。从广西、广东和云南等毗邻省份开来了中国军队。尽管法国在越南的行为在中国激起了义愤，但始终支持妥协的李鸿章却仍于1884年谋取了一种权宜性的解决方法。中国军队被迫撤退了。然而，朝中势力很大的强硬爱国派人士的反对，又引起了一次在当时的中国对外政策中非常多见的突变，从而揭示了中央

政府政权的分裂和犹豫。慈禧罢免了奕訢，他是对外妥协和对内加强统治之政策的主要制订者之一。于是，朝廷发出了抵抗的命令，新军被派往了红河流域。法国人在凉山遭到了失败，遂将战争发展到了中国沿海地区。在福州附近的马尾船坞制造的中国新舰队的部分船只被海军司令孤拔(Courbet)所摧毁，此人同时也组织了对台湾的包围。次年(1885年)，法国人包围了宁波，占据了澎湖(Pescadores)群岛，并试图用阻止驶往中国北方的海运船队的方法使北京挨饿。中国被迫在天津签订了一项新的条约，但却未附有通常都会有的相当于彻底投降的“战争赔款”。法国从此在越南可以自由行动，而中国则放弃了它与这个属于中国文明的古老国家的传统关系。此外，西南部的中国也必须向法国贸易自由开放。

504

经济的后果

外国人在中国获得的特权应该具有两大类后果，而其作用又随着中国工业能力的发展而加强。第一类属于经济范畴，这些特权削弱了已经由太平天国大危机非常严重地损害了的中国经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引起了处于衰落的传统部门与依附于外国人并受其控制的现代化部门之间的越来越明显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由于在西方人介入最强烈的地区的发展而表现得有损于内陆省份；开放的港口事实上成了吸引外国资本和中国人口的焦点。同时，外贸的发展倾向于使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依附于世界市场，因而也越来越对这种市场之无法控制的变化感到束手无策。

外国产品在进入中国时只交纳5%的统一税，而免交沉重打击了中国产品的“釐金”。这些非常有利的条件使进口得以增长，但这种增长却要比外国公司本来希望的那样慢得多，因为消费大众太贫穷了，无法吸收富裕国家工业产品的剩余。不过，随着进口货改变了农村经济的脆弱平衡，它们也对传统手工业和农业产生了深刻反响和作用。棉花、烟草和鸦片的种植以有损于粮食作物的方

式发展起来了。

品 种	1871~1873 年	1881~1883 年
鸦片(公担)	37408	42777
棉纱(公担)	37791	118020
铁和铜(公担)	142806	273717
煤油(加仑)	0	176513915

505 此外,外国(主要是英美)的航运公司,从 1862 年起越来越大地吞并了直到当时仍由中国的内河船舶和海帆船在长江运输网与沿海承担的货运。内河和远海贸易之最大份额的利润都落入了外国公司的手里,而部分中国运输工人却沦为失业者。李鸿章为对抗西方人的这种控制而于 1872 年创建的中国轮船公司,遇到了英美公司突然大幅度降低运价的严重挑战。

西方介入中国引起的另一类后果是政治和伦理范畴的,它包括外国人和当地居民之间越来越频繁的摩擦和冲突、对西方人之仇视的发展、一场反对和仇视新生事物的广泛舆论运动的形成。

心理和政治

外国人在中国的存在及其行为方式,他们的自负和财富、他们使中华帝国及其居民蒙受的耻辱,都引起并发展了一种仇恨,它还经常被扩大到对外国人传入的新生事物上。这是一种大家无法忽略的因素。如果说 17 世纪的耶稣会士们都是一些有文化修养、博学并希望与中国精英们保持接触的人,那末 19~20 世纪的殖民主义大扩张的代理人却往往无文化教养。他们仅仅与中国社会边缘的人物(如仆人和商业经纪人)保持接触,从而形成了一个自身封闭的国际社会。由于他们的养尊处优、其高傲的情感、由中国的风俗习惯以及中国忍受的苦难和劣行所形成的常见情景使之萌生的

鄙视心态,便使他们孤立于中国社会环境之外。他们对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一种文明很少感兴趣并很难接近它,觉得它已处于彻底衰落之中了。然而,西方国家正是通过这些人的资料才形成了一种同时代的中国形象。

在他们看来,西方的科学、技术、商业活动和政治制度本身就形成了一种财富,一切可以使中国对其影响开放的因素最终也只会对中国有益。但外国人在中国的举止行为、经常地炫耀武力或使用暴力,却理应具有严重的心理影响。它们造成了一种不理解、不信任或仇恨感情之源,从而影响了中国与其外国占领者之间的关系,它们在中国人中间制造了一种低人一等的复杂心情。这可能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对同时代大变化的适应能力。

这种冲突摩擦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原因,源于基督教传统教士们从1858年的天津条约起所享有的特权地位。由于对不理解某些中国习俗而造成的事故、某些布道师们不调和的做法、利益冲突、传教士们的所做所为造成的怀疑自17世纪初叶以来广泛传播的揭帖、有时会恶化成流血的教案冲突以及随后的暴力镇压。传教士及其慕道友(往往是社会底层和受此吸引的中国人,但却受到了全部居民们的恶意看待),都由列强的武力保护来维持。享有治外法权之特权的外国人获许对其敌对者进行严厉惩罚,同时又可获得巨额赔款(在1862~1869年间,由于13次教案而获赔偿40万两)。仅举一个例证便足以说明其总体行为了:1870年初,在哄动一时的天津事件之前,法国一名普通代办罗淑亚(Julien de Rochechouart)伯爵率领4艘炮舰沿长江逆流而上,以迫使与传教士们发生教案之争的中国当局就范。在由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而造成的教案事件之冗长的统计表中,1870年6月发生于天津的那些教案因其严重性和后果而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们成了对外国人特别是法国人的一次仇恨大发作的起因,因为这些外国人以官方名义控制着天主教传教区。它们使支持对西方民族采

取调和政策的人们处于非常狼狈的窘境,使全面敌视外国人的运动获得了活力,从而伤害了中国近代化的尝试。

1840~1894年西方国家和日本在华的战争行为与侵犯活动统计表

1840年	英国人占领浙江舟山群岛并进攻宁波。
1841年	英国人对广州、厦门、宁波和上海发动进攻。
1842年	英国人对上海和南京发动进攻。大英帝国吞并香港。
1844年	英国在厦门建立租借地。
1845年	英国在上海建立租借地。
1849年	法国在上海建立租借地。
1850年	俄罗斯违犯1689年和1727年的条约而吞并阿穆尔河(黑龙江)河口。
1854年	阿穆尔河北岸被俄罗斯人吞并。
1856年	英国人炮轰广州。
1857年	英国人和法国人炮轰广州和海河炮台。
1858年	广州和海河河口被占据。俄罗斯人占据了位于阿穆尔河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
1859年	对海河炮台的新进攻。
1860年	进攻海河炮台和入侵河北。英法殖民军进入北京,抢劫和烧毁了圆明园。英国人吞并了九龙半岛。英国在天津建立租借地。
1861年	英国在汉口和广州建立租借地。法国在广州和天津建立租借地。
1862年	英国在九江(江西)建立租借地。
1863年	在上海建立国际租借地。
1868年	英国人炮轰台湾的安平港。
1871年	俄国人占据伊犁领土。
1874年	日本人进攻台湾和吞并琉球群岛。
1881年	俄国人最终吞并自1871年起占据的伊犁部分领土。
1884年	法国海军司令孤拔炮轰福州。中国舰队在马尾沉没,垄断了上海和华北之间的大米运输,怀着使北京挨饿的希望。
1885年	法国人占据澎湖列岛和台湾的部分地区。
1887年	葡萄牙最终吞并澳门。

慈善堂中的修女们对那些向她们提供孤儿的人给以奖赏，某些人亲眼目睹了这种传统信仰。人们据此认为，基督徒们借婴儿的眼睛和心脏来从事巫术活动。面对着由一位中国官吏率领的代表团，法国领事冲昏了头脑，竟下令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其影响立竿见影：人群四散，共有 20 多名外国人被杀，而天主教设施亦遭摧毁。中国政府为此被迫处决了 18 名嫌疑犯、罢免了一些地方官吏，向法国交付一笔 490 万两的赔款并派出了一个谢罪代表团。

继这些事件之后，奉行与西方调和之政策的人士遭遇到了一场诋毁运动。攻击的主要手段之一是散发以“清议”之名而著称的小册子。那些采取了外国人生活方式的中国人、受基督教归化或利用过西方文明的人，都被指责为叛徒。像李鸿章那样的试图和中国的敌人合作来兴建兵工厂、工厂或铁路的人受到了严重怀疑。曾国藩的宦官生涯从 1870 年起受到了损害，这是由于他在解决天津事件时似乎讨好外国人。这些论战性的小册子（“清议”）都表现了一种被推向激进爱国主义的公共舆论，它们在由于对中国主权带来的损害引起的所有危机中都扮演了一种重要角色。上述危机包括：日本于 1879 年干预琉球群岛、同年发生的伊犁事件（里瓦几亚条约，当时的中国代表表现得非常和解），或李鸿章于 1883 年与法国的谈判。由支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抵抗的人发动这些攻击，阻止了略有不同的和比较现实的观点的发表，以至于这种隐蔽的爱国主义与其目的背道而驰了。在现代化方面，中国倾向于以排外情绪来拒绝它若在一种独立处境下本会非常乐于接受的东西。

外国的压力在中国只能起到煽动的作用，它同时也仿佛是一种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心理上的抑制。由某些知识分子从事的在儒教传统中寻找一种救助意识的失望追求、许多爱国者的隐蔽保守主义，都说明了这种本质上如此正确而效果上却如此有害的民族自豪感的反作用。这是一个本身就分裂了的中国，很难辨认出其真实面目来，很快就会自食其言，而外国自 19 世纪末年就开始互

相争夺它了。

做为所有殖民地国家之特征的这种悲剧，在中国也与它做为最大文明之一的国家规模相一致了。中国今天仍保持着这种深刻精神创伤的标志。

三、结论

直到中国的商业资产阶级在 1900 年左右发展起来为止(这种发展与外国的资本和工业在开放港口的介入有关),工业化努力的倡导者们都是受过传统教育的官吏。他们仅仅从中央政府获得了很有限的支持。尽管他们忠于国家的和社会的传统观念,但却遇到了一股强大的反对潮流。他们迫于形势而对外国人实行了一种妥协与谅解的政策。这些支持向西方人借鉴其方法和技术的人,成了最虔诚的爱国主义者们攻击的靶子。在这后一批人的心目中,保卫中国和保卫其传统同为一项事业。能使中国人得以自强的工业发展,实际上要求这个被长期的和耗资巨大的战争搞得精疲力竭的辽阔帝国(由于左宗棠向外国银行筹借了巨额贷款才于 1878 年平定西域)得到某种喘息之机。在严格坚持条约条款的情况下,必须避免与西方和日本的任何冲突。中国急需资本、技术人才和专家,而这一切又只能由其侵略者们向它提供。但这样一种做法同时也冒着加剧外国控制的危险。这种畏惧心情解释了从 19 世纪末叶起开始的借贷和工业化计划所引起的日益增长的不信任状态。最后,在一个正处于经济大衰退之中的国家,运输和生产的现代化可能会引起失业,而失业又代表着一种真正的危险。

为了使现代化支持者们的立场不受伤害,就必须使来自外部的攻击不再重新出现。然而,继 1860 年北京条约之后的暂时缓和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在 1870~1890 年间,对中国本土和受中国影响地区的压力空前加大了:俄罗斯人占领伊犁,日本干涉朝鲜、台湾和琉球,法国在越南北部和中国本土上发动进攻,这都招致了

削弱革新派地位的危机。最后,1894年的失败预示着全体侵略者们瓜分中国的大规模行动的序幕。从此之后,要使这个已被深深伤害的大国重新恢复平静,已经为时太晚了。

可能使中国失去了所有复兴机遇的事件,确实发生于19世纪的最后几年。自1876年变得很敏感的日本对朝鲜的入侵,确实是北京政府所关注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如同在中国一样,外国的压力在朝鲜也促成了一种传统主义和倒退潮流,而清王朝在将袁世凯将军派往该半岛时也曾极力支持这种势力。1894年初,一个受宗教和排外影响的秘密会社——东学党(Donghak)举行起义,从而恰恰在日本的军事潜力得到有力加强之时挑起了一场严重危机。由以其头目翁同龢(1830~1904年)为首的支持进行干预的保守派人士向改革派发出了呼吁,使其观点战胜了李鸿章的主张,而后者不会不知道被财政困难瓦解的中国舰队之可悲处境。在中国与日本于朝鲜发生对抗的短期冲突期间,中国军队遭到了一次严重失败,而北洋舰队实际上已在海湾被摧毁了。 509

在将本渡与琉球分隔开的海峡中的马关签订了条约,其后果相当大:在1895年至20世纪的初年,中国事实上已丧失了它在经济、领土、政治和军事中的独立性。就在富裕国家的工业加速发展之时,中国却进入了其整个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时代。

历史的连贯性足以解释中国的失败,但又没有必要对其政治、社会和文化传统提出质疑。在其他的背景下,中国可能会适应工业化时代的巨大变化。它既不缺少具有组织观念的人才,又不缺乏科学和技术传统。朝中的挥霍浪费和冷漠、腐化、迷恋过去以及抵制现代化的反响,更应是时代的产物,而不是中国社会固有的因素。

第四章 19世纪的文化潮流

510

1800年左右,基本气氛发生了变化,文化生活开始了一种新

511

的发展进程。这些变化可以通过国家政权的削弱来解释,而直到那时以前,它都令人感到了其极大的势力,把中国知识分子同时置于自己的保护和控制之下。这些变化也可以通过社会气氛和政治风气的恶化来解释,由此即使没有产生对现秩序的疑问,至少也对政府和行政管理的实际问题产生了强烈兴趣。与这种在技术领域进行改进和施政方法进行革新的愿望相对应的,则是一种看上去最为公正的研究新方向。

考证学派曾在戴震时代(1724~1777年)大放异彩,产生了一种无论从质量还是从广度上来看都十分了不起的成果,它与18世纪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相联系,亦即与一个强大而繁荣的,由赞助文化事业和文人皇帝统治的中国相联系。在康熙和乾隆年间由国家主持的大规模出版事业,对于这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一种决定性的鼓动作用,它属于使汉族文人解除对满族人最初敌视情绪之政策的组成部分。这些事业在乾隆执政年间结束。1798年之后出版的唯一一部官方编纂的大文集是《全唐诗》(共包括4万多首诗和2000多名诗人),共花费了6年时间而于1814年完成。曾经建成收藏丰富的藏书楼和艺术藏品阁的扬州盐商们,曾资助了出版、接待和帮助了许多名气很大的文人。但由于铜钱的贬值,他们均于1800年左右破产了。人们应把他们和19世纪的伍崇曜(1810~1863年)归为一类,后者是广州商人,曾在鸦片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资产,我们应把一部以《粤雅堂丛书》之名汇辑的广东文学作品的精辟文集(1853年)归功于他。这一切似乎都在19世纪初叶促使考证学的训诂和考古评论的伟大传统走向衰落。戴震的弟子和该学派的大学者们于19世纪的最初30多年间都逝世了。钱大昕逝世于1804年,纪昀死于次年,段玉裁死于1815年。王念孙死于1832年,其子王引之死于两年之后。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此种传统从这个时代起就中断了,它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上半叶,1895~1949年间的大部分中国大学者都应该属于这个具有科学严谨性

并受到唯理主义影响的学派。这个考证学派是随着清代初年恢复自由和爱国的哲学而复兴的(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我们仅引证其中的最著名者)。

改革后的儒教

与考证学派的失势相对应的是一些新倾向的发展,它们是由帝国的衰落以及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相继危机引起的:1800年左右的白莲教起义、政治习俗的倒退和经济的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的进攻、太平天国时代的社会大爆炸等等。此时对于汉代以来被忽略的(事实上是遭遗忘的)文学与哲学传统又表现出了一种新的强烈兴趣,这就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公元前175~公元前105年左右)与何休(公元129~182年,《论语》公羊注的伟大诠释家)的“今文”传统。因此,一个被称为“公羊学”或“今文学”的新学派于19世纪初叶发展起来了。该学派的支持者们认为,篡改和歪曲经典之真义并非肇始于宋代,而是早在秦帝国崩溃的汉代初年就已发端,当时除了以口传和用今文保留下来的文献之外,又出现了最终被认作真实经典的用古文写成的文献。新学派否认的正是这种文献的真实性,而它同时又以近代的观点以及对宗教的关注心情(这里是指辟基督教)重复了董仲舒和何休的观点;经典中包含一种隐蔽而深奥的意义,它对于人类的政府和社会组织具有实用价值;鲁国史《春秋》是由孔子撰写的,它不仅是一部编年史,而且还是一部志在深刻改革风俗和社会制度的著作;孔子是所谓“素王”(有德之君主),与上古时代的圣君一样。最后,根据今文文献诠释者们的观点,人类注定要经过不同的历史阶段,继此之后便可以达成统一、和谐与普世和平。⁵¹²

与公羊学的激进改革主义相联系的,则是在19世纪期间由中国社会苦难和不幸所加强的神秘论与末世学的倾向。面对征服了西方人的基督教,中国文人们被鼓动起来将其大贤及其著作神圣

化了。面对外部的威胁,他们宣布自认为的真正经典传统具有改革和进化的特征。进而,19世纪大部分改革派的大学者和政治家都与今文学派相联系。如果大家把一位纯粹的训诂学家——第一个关心今文的先驱庄存与(1717~1788年)不计算在内,那末使中国思想向着改革之新路发展的荣耀就应归于刘逢禄(1776~1829年)。刘逢禄为现代今文派的两大著作恢复了名誉。其一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他认为此书是对孔子之未遭任何篡改的真正思想的正确诠释;另一部是何休对《公羊传》的诠释,他于其《公羊春秋何氏释例》(其序的时间为1805年)中对之作了系统研究。

刘逢禄的两位主要弟子是龚自珍(1792~1841年)和魏源(1794~1856年),他们都生活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并且适逢发生了这些事件的时代。1839年,龚自珍致信刚刚到达广州的林则徐,鼓励他对外国人采取不调和的态度。林则徐认为英国人的鸦片贸易破坏了中国经济,并特别强调了以创建现代兵工厂来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重要性。龚自珍则反对传统的科举、少女裹脚和迷信。他写了一些有关社会和政治的著作,它们对于19世纪末的改革变法家,尤其是对于康有为施加了巨大影响。至于历史和舆地学家魏源,其具有改革倾向的关心焦点同样也是以公羊学的新哲学为基础的,他的著作可能在19世纪上半叶为他带来了很广泛的影响。林则徐于1838~1841年在广州居住时曾调查了西方人的兵器、海军和战略方法,并在其《四洲志》中通过对外国出版物的摘录而补充了他的资料。魏源曾参与了1840~1842年的抗英斗争,并可能于1853年组织了镇压太平军的民团;受林则徐《四洲志》的影响和启发,魏源于1842年撰写了其名著《海国图志》。这部著作于1844年首次刊印,后又于1847年和1852年增订再版。它建议使用外国人的技术并根据“以夷制夷”的古老原则而使进攻中国的国家彼此对立。此书不仅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早在1854~1856年间就被译成了日文并在那里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它可能与

导致了明治维新的近代化运动不无关系。

因此,今文派的发展看来似乎是与一股强大的关注实际问题(行政、社会和政治组织、经济、税收、战略和兵器、农业……)的潮流相联系,这场运动早在19世纪初叶就已诞生,比英国炮舰的初次进攻还早。1827年,与魏源保持着联系的政治家贺长龄(1785~1848年)编辑了由江苏的官吏与文人们撰写的有关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这就是大家所说的“经世”)的著述,取名为《皇朝经世文编》(这部著作的一些经过增补的新版本及其续编从1882年起又开始出版)。1837年左右,贺长龄支持贵州的丝绸和棉花手工业,并在那里禁种已开始传播的罂粟。包世臣(1775~1855年)从其青年时代起就关心军事、农业、司法问题以及运输事业,他充任了高官的技术谋士。1834年,湖南人陈鸿谟着手从事有关广东防务的官修志书(《广东海防汇览》)的工作。

对于西方国家及其科技的兴趣(或者更应该是指这种兴趣的回复)并非从鸦片战争才开始。吴兰修根据由一位名叫谢清高(1765~1821年)的中国海员所提供的资料,在19世纪初叶撰写了《海录》,他在青年时代也曾在欧洲船舶上服务并游览过欧洲的许多国家。另外,李兆洛(1769~1841年)根据他在广州向欧洲人所作的调查而写成的《海国纪闻》则出版于1823年。

正统派的反抗和改革派的复兴

太平天国的危机可能从19世纪中叶起导致了中国文化生活中的深刻动荡。许多藏书楼和艺术品收藏处都毁掉了,珍贵的古今手稿都损失了,而大部分文人都被动员入伍以参加平叛和政治复兴的努力了。在镇压太平军的将领们的司令部中,由于与战争的日常实践活动相接触,所以形成了新的统治阶级和新的中国知识界。这次大规模暴动挑起了正统的反抗和安徽桐城古学派的复兴,该学派在1800年左右由姚鼐(1731~1815年)所代表,而在暴动的

514 前几年则由方东树(1772~1851年)所代表。方东树和其先行者一样也忠于宋代的“理学”传统,并指责考证学派的支持者们在研究学问中有伤伦理。继19世纪中叶之后,在镇压太平军方面大获全胜的将领曾国藩成了这些反抗倾向和伦理化倾向的最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央政府一级,李棠阶(1789~1865年)是同治年间的1862~1865年间复兴运动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也宣扬伦理的完备性和对于情欲的抑制,并非常赞赏受王阳明直觉论影响的新儒学传统的哲学家汤斌(1627~1687年)。桐城派的潮流一直持续到清代末年,将西方文学和哲学著作译作汉语文言文的大翻译家林纾和严复均属于这个学派。

在强有力地促进正统派之反抗的同时,1851~1864年间严重的社会危机也削弱了在19世纪上半叶表现出来的改革思潮,并损害了现代化的努力。如果说由镇压太平天国而产生的领导人认为必须向西方借鉴技术而增强中国的军力,那末更重要的则在于恢复传统和振兴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国正是应该到淳风化俗和恢复伦理传统中去汲取救国的必要力量。

政治改造问题还未被触及过。大部分最坚定的现代化支持者们都将维护传统制度视为根本。西方人的习俗和行为与中国有着过分深刻的差异。这两种文明如此明显地对立,以至于只能向外国人借鉴其技术和科学。所以,可被看作太平天国战争以后现代化运动之理论家的冯桂芬(1809~1874年)很注意把根本性的东西与次要的东西区别开来。这就是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另一方面则是西方人的实用知识。冯桂芬是一位在行政和财政问题上很开放的思想家,同时也是算学、地图学和文字史专家,他对西方科学充满了好奇心。但他也完全和现代化的其他支持者们一样,属于关心工业发展和加强兵力的保守派。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功能可以通过改革而得到改善,故应该排除改变风俗和政治组织的做法。这与大家在克列耶夫斯基(Kiréievski, 1806~1856年)和霍米雅可夫

(Khomiaikov, 1804~1860年)时代的亲斯拉夫主义者(Slavophile)中发现的态度相同,他们都追求“西方的机器而不是西方的思想”。这句话与冯桂芬的名言具有出奇的相似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但是,帝国蒙受的一连串屈辱、法国在1885年使之遭到的失败,再加上1894年的军事灾难,都使改革运动有了新的推动力。由于公羊学派影响的扩大,维新运动在马关条约后不久因康有为(1858~1927年)而取得了胜利。事实上,这位著名的维新变法者向公羊派的学者和哲学家们(主要是廖平,1852~1932年)借鉴了其大部分思想,他的主要著作《大同书》也可以被认为是由刘逢禄于19世纪初叶创立的该学派之有倾向的最终结果。康有为的3种主要论点各自形成了其3部主要著作的内容:

——大部分古文文献都是由前汉末年的国师刘歆撰写的伪著。这种论点后来又被在1891年出版的《新学伪经考》中作了发挥。

——作为中国之基督的孔夫子的观点被刘歆和古文学派的支持者们彻底歪曲篡改了。真正的孔夫子是一名民主主义的改革家。这是那部于1897年问世的《孔子改制考》中的论据。

——根据一种已由受到《礼记·礼运》以及《公羊传》启发的刘逢禄提出的类似模式,人类于其发展中应该经历三个阶段,而其中的最后一个将会看到边境和社会等级消失、形成一种世界文明并建立一种最终的和平。近代的社会制度(君主立宪制、国会制……)、贸易和工业的发展都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中所表达的思想。此书在1897年就已写成,但一直秘不授人,只是到他死后才于1935年刊布。在这种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中,那位改革家考虑到了消灭家庭、国家、私有财产并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他甚至在最小的细节问题上也预见到了未来世界的生活准则:公用的寝室和饭堂、集体育婴室、由集体负责的儿童

教育和训导、持续一年的婚姻、对死人的火化等等。

复归被遗忘的传统

康有为的观点使人联想到了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孔德 (Auguste Comte) 的实证主义 (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相继的阶段并希望建立一种世俗的宗教)。然而,这种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教条却并未受过西方哲学的任何直接影响,他是从具有不同程度之异端特征的地道中国传统中汲取其灵感的。但这种与西方思想潮流的聚合却提出了一个属于笼统范畴内的问题,它涉及到了从欧洲人进入东亚开始的整部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的影响直到 1900 516、年左右对中国人来说还茫无头绪和几乎不可捉摸。它们未能产生直接的效果,但它似乎却鼓励中国社会在其特有的传统中寻求由通过最复杂途径传入中国的外国观念的相似性。

这样就可以通过时代的独特需要而同时解释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对于战国时代的哲学、清初之自由和爱国的思想家以及佛教传统表现出的新兴趣。公羊学派的文人戴望 (1837~1873 年) 研究了战国时代思想家们的著作,并于 1869 年发表了有关颜元和李塨的一部著作,颜、李是康熙时代的两位哲学家,均为恢复“实学”的支持者。冯桂芬 (1809~1874 年) 于 1861 年出版了一部政论文集,他本人又是一位熟悉中西数学的数学家、地图学家和研究公元 100 年时的重要字书《说文解字》的专家,同时他也是清人入主中原初期的自由派和爱国派学者顾炎武的衷心崇拜者。

科学的思想与方法、实证哲学、对专制制度的批判、以一种文化类型和一种共同体的存在 (国家的功能即在于保护这种共同体免受外来侵略) 为基础而对汉“民族主义”所下的定义,这就是清初训诂学家、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贡献。18 世纪那个欣欣向荣的时代已多少被人忘却了,但那些自由主义的和反满的思想家们对于从 19 世纪最后 30 年开始的中国思想发展方向却施加了一种深

刻的影响。

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生活在接近我们的时代的同时却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最为错综复杂的思潮结合起来并融为一体,要想追溯它们的历史是特别困难的,因为这还是一个尚未被做过多少研究的领域。中国在19世纪对于西方的了解一般来说只限于技术上的新发明,而中国人的人文传统则倾向于将此视为相对于确保社会运作的伦理准则而言仅仅是次要的因素。唯有那些与西方社会保持长期和经常接触的人,才能深入理解某些根本差异,并试作具有社会学特征的比较。这就是王韬(1828~1897年)的情况。他从1848年起就与上海的英国传教士们保持着联系。在一段时间内,他曾受到太平军的吸引,并在1861年为太平军服务。由于这种原因,他被迫化名逃亡香港,并在那里成了苏格兰汉学家李雅各(James Legge, 1851~1897年)的合作者。此种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1874年,王韬帮助李雅各翻译了七经和四书。1868~1870年间,王韬住在李雅各在苏格兰的家中。返回香港后,他于1871年写了一本《法国志略》,次年又写了一本有关1870年法国—普鲁士战争的精辟史著《普法战记》,还有一部有关大炮的论著《火器图说》。做为中国最早的记者之一,他在香港创建了《循环日报》,并于1884年出任上海一家大报《申报》的主编。

王韬的西方经历导致他对国家盛衰的原因做了深刻反思。他被已经变成了航海、工业和贸易强国的小邦英吉利这个例证吸引得入迷了。他从该国的煤炭储量中发现了其经济飞跃发展原因之一,但又断言财富与势力归根结蒂要依靠更为全面的因素——政治,它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经济和技术。英吉利的财富主要来自其领导人和社会精英受同一种思想的鼓舞,来自那里的决议都是共同作出的,因而人人都自愿为全国的集体努力作出贡献。英国奇迹的基础在于其政治制度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谅解。同样,中国衰败的主要原因则在于中央政权与精英之间的鸿沟。使过去

的帝国得以了解各省思想状态的古老御史制度,随着自明初以来专制帝国的发展而消失了。为了使中国恢复其势力,必须使皇权依靠有权势的望族,而这些望族的命运又与皇帝的命运息息相关。然而,中国恰恰苦于下述原因:在原则上应为一切决议负责的中央政权竟失去了与可以支持它并与它合作的人之间的任何接触。灾难尤为深重的是,中华帝国形成了一个比自我封闭的欧洲小邦要辽阔得多因而也松散得多的实体。

王韬无疑不是一个很新派的思想家,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运用的思想早在王夫之(1619~1692年)及其同代人身上就已出现了。但他对于政治因素的注重却成了当时整个中国思想的特征。如果行政方法不适宜,如果国家的基础已遭破坏,那末采用外国技术也没有任何益处。无论对于维新派人物还是对于保守派人物都一样,伦理和政治总要优先于获得财富与势力的手段——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

西方科学的影响

如果说哲学领域中的西方影响很混乱,只是从1900年左右发表译著起才开始施加某种直接影响,那末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中,领会和吸收的现象则要早得多。这里所完成的是一整套使外国传来的东西与中国传统进行比较和结合的工作,其开端至少要追溯到利玛窦时代(即17世纪初叶)。但这股潮流在19世纪下半叶扩大了,具体说来是从1862~1864年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创建语言和科学研究机构,以及附属于1865~1870年间建造的兵工厂和船坞的技术学校开始。传教士们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中的作用是绝不容忽略的。最后,从1872年起,有些中国学生也被派往西方国家深造去了。

518

在1872~1875年间,共有120名中国学生被派往了美国。有一小批学生于1875年离开了福州的海军学校,前往德国学习操纵

大炮、制造兵器、海战的战略和技术。1876年，福州兵工厂的30名学生赶赴法国和英国，以在那里的造船厂、矿山、冶金企业、机械工业部门实习。我们还应该提到，1881~1882年间有4名中国女学生在美国获得了医学文凭，她们归国后便成了中国的首批女医生。其他几次向欧洲和美国派遣留学生的活动发生在1880~1890年，但由于这类派遣的代价非常高昂，引起了财政困难，迫使中国于19世纪末非常明显地对此进行了削减。

最早向国外派遣的几批留学生，其组织工作很糟，只能产生微不足道的成果。被派往美国的青年学生在那里过早地完全美国化了，而派往德国的福州海军学校的学生又年龄太轻，无法适应那里的一切。相反，于1876年前往法国和英国的福州兵工厂的学生和徒工们却非常有效地参加了中国新舰队的建设，但该舰队不幸于1894年被日本摧毁了。

从19世纪初开始在中西数学传统之间建立的对话，一直持续到19世纪。随着11~14世纪的中国数学被重新发现，一项重要的比较和总结工作已在中国完成了。像戴震和阮元那样的人物热衷于研究和重版那些曾一度失传的著作。阮元于1797~1799年间写成了其有关中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传记集(《畴人传》)，还附上了关于他们著作的提要。我们还可以提到罗士琳(1853年在太平军对扬州居民大屠杀期间逝世)于19世纪初叶的活动。19世纪时，与比较研究西方和中国传统、翻译数学和物理学著作相联系的人名是：罗士琳以及在上海的伦敦传教会的英国传教士中翻译数学著作的李善兰(1810~1882年)、一部于1835年出版的光学著作《镜镜论痴》的作者郑复光，此外还有华衡芳(1833~1902年)。

甚至在那些中国的传统与西方不久前完成的进展相比较已经明显落后的领域(化学、植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也都从19世纪末开始与整个中国科学结合起来了，20世纪初叶中国学者们在大部分科学研究领域中的贡献是远不应被忽略的。

当代中国

第十编 灾难深重的中国

灾难年代的开始

520

1894 年的中日战争(甲午战争)在中华世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崩溃中开创了一个新阶段。这次失败的后果在所有领域中都非常严重,以至于大家只能认为中国从这个时代起就不再是掌握它自己命运的主人了。中国在困难的条件下试图组建的舰队被消灭了,同时还被迫支付 2 亿两白银的赔款(这相当于清帝国政府年收入的 3 倍),此外还要再追加 3000 万两,以使它继续保持辽东半岛数年。日本吞并了台湾和澎湖列岛(Pescadores),还在中国东北(满洲)获得了统治地位。日本的这种领土野心又刺激了西方列强也争相吞并中国领土并将中国瓜分为它们的“势力范围”,这些势力范围事实上是开发这个古老帝国财富的一种“禁猎区”。

德国于 1897 年夺取了青岛和山东东南的胶州地区,大英帝国于 1898 年夺取了威海(威海卫)和山东半岛的最东端地区,俄罗斯夺取了辽东半岛南部的大连(在日文中读作 Dairen)和旅顺地区(被西方人重新命名为 Arthur 港)。法国的野心则转向了中国西南,它于

525

1899年仿效列强而夺取了广东西部的湛江(广州湾)。

此外,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深受崇敬的政治家李鸿章,在1894年的失败之前曾竭力阻止此种事态的发生,但在马关条约以后的几年却做不到这一点了。外国的工业在中国内地的开放港口和新的“租借地”立足,中国在经济上依附外国的现象骤然发展起来了,这种现象包括外国资本的入侵、银行金融业务的发展、工厂、手工制造业、由西方和日本公司管理的矿山。外国企业在被占领的城市和地区利用了非常廉价而贫困的劳动力。

521 外国干预所造成的全部危机在于:它恰恰产生于西方国家的工艺和工业(通过其影响日本的渠道)发展最快的时代,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却正处在崩溃之中。1895年和1901年强加给中国的战争赔款为2亿两(即4.5亿个银圆),它对于这个时代的富裕民族来说可能并不算是一笔特别庞大的款项,但对于一个财源枯竭的国家来说却是一种沉重负担,因为这个国家发现外国市场对其茶叶和丝绸关闭了,而对外国产品入侵其城乡则无能为力。此外,大家还将会发现马关条约的赔款促使日本于1897年采纳了金本位制,这对于日本1900年左右的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瓜分中国的详情表

1895年	日本吞并台湾和澎湖列岛,德国在汉口和天津建立租借地。
1896年	汉口的俄国和德国租界建立。
1897年	德国吞并山东的青岛和胶州地区。苏州(江苏)和杭州(浙江)建立日本租借地。
1898年	英国人吞并山东威海地区,俄国人吞并了辽东半岛南部的大连和旅顺。日本在汉口、沙市(湖北)、天津和福州(福建)建立租借地。

续表

1899年	法国人吞并了湛江地区(广州湾),日本人在厦门建立租借区。
1900年	殖民主义列强的联军抢劫北京和皇宫。 瓦德西(Von Waldersee)将军对中国北方许多城市发动惩罚性的远征。 俄国在天津割占租界。
1901年	日本在重庆(四川)建租借区。
1902年	比利时、意大利和奥地利在天津占据租借。
1911年	外蒙古落入俄国控制之下。
1914年	西藏中部和西部落入英国控制之下。 日本人在原来由德国占据的山东领土上立足。
1931~ 1932年	日本人入侵并吞并了满洲。
1933年	日本人进入热河(蒙古的东南)和河北的部分地区。
1937年	日本飞机轰炸上海与南京。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

这种经济控制又伴随着军事控制,外国人甚至在中国也维持着舰队和随时准备入侵的军队。与在大城市所获得的并且为了迎合重商主义之需要而建立的租借地不同,割让的地盘首先表现得如同是军事的基地和支持点。

失败造成的思想和政治后果也非常严重。唯一具有一定权威并在近四分之一世纪期间掌握着整个中国政策的领导人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之后被排挤出了政坛。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真空,是当时任何最具强权的人物都无法填补的。继李鸿章出任北洋军队统帅的袁世凯只不过是一介缺乏气魄的武夫,而统治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方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则主要关心如何维持他们那避开了国际漩涡的统治权。缺乏任何坚定的领导、统治阶层的分裂

522

以及知识界的惶然不知所措，这就是中国在 1900 年左右之关键时刻的政治生活特征。

惶恐的表现

在 1898 年 6 月 11 日到 9 月 21 日之间，以维新派大文人康有为(1858~1927 年)为首的一小批知识分子成功地使北京政府接纳了他们，从而推出了一系列受日本和俄罗斯启发的社会制度改良措施：科举现代化、改革政权机构、公布国家预算、设立一个经济部门……这就是大家所说的“百日维新”。维新派在一开始受到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但继保守派对它表示反对之后却又被最终抛弃了。袁世凯投到慈禧太后一方，后者重新控制了局面。维新改良派的六君子被处死，其中包括哲学家谭嗣同(1865~1898 年)。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1873~1929 年)同时亡命日本，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保皇会。

中国近代史上的这段短暂时代，其本身可能不会毫无意义，它特别揭示了当时政局的不稳定性：中国可能是被重新投入到一个受凌辱的和惶恐的时代背景中了。维新变法明显是一剂假药，因为当时甚至连中国的领土也成了外国民族瓜分的对象，而且中国的经济也崩溃了。由于西方国家和日本异常迅速的发展，在工业化国家与一个始终保持农业的辽阔帝国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了。

面对工业化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控制，中国照样表现出惊慌失措和根本性的无能。它解释了北京宫廷何以因恐慌而一时头脑冲动，竟决定支持一次民间暴动。农村苦难的加重、由纺织品和煤油的进口以及现代化运输(铁路和蒸汽轮船)的发展而引起的失业、由外国人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传教士们的行为)而挑起的仇恨，都成了 19 世纪最后几年在农民中爆发的一次全面动乱之根源。秘密会社又死灰复燃了(哥老会、大刀会)。从 1898 年起肆虐于山东的饥荒和水灾，又在那里激起了一支白莲教旧部的发展高

潮,这就是义和拳(义和团)运动。人们练习中国拳术以训练身体和思想,为此而从西方人那里获得了 Boxeurs(拳师)之名称。义和拳是强烈的排外派,其成员因信仰巫术活动而狂热至极,自信巫术能使他们变得刀枪不入。他们袭击铁路、工厂、出售洋货的店铺以及已归化基督教的中国人和传教士。他们先被袁世凯以强硬手段从山东驱逐出去,然后这场起义运动便于1900年初波及到了山西与河北。在天津—北京—保定地区都存在着起义军,而那里的外国人人数量很多,故使得这些事件的发展势头更猛烈了。其侨民受到的威胁,导致了外国列强的干涉。主张支持义和团运动的人当时在朝中占上风,这就等于大清帝国向西方国家正式宣战了。不过,在省一级负责中国政治的官员们却主要关心维持其地方权力不受侵犯,故无疑只把朝廷对义和团的支持视为一种绝望的行为,从而便置身于冲突之外。在1900年6~8月间,八国联军夺取了天津,再向北京进军。皇帝和慈禧太后却逃到陕西的西安(慈禧仅仅于1902年1月6日才返回京城)。北京被洗劫一空,德国军队又在华北的城市中组织了惩罚性远征。1901年在北京签订的条约强迫中国赔款高达4.5亿银圆、禁止任何仇视外国人的活动、禁止进口武器、拆毁大沽炮台、由外国军队控制津京铁路、惩罚高级官吏和向外国人派遣谢罪团。

523

义和团事件标志着中国受外国奴役束缚的一种新发展,并且为俄罗斯占领满洲提供了良机。俄国人占据东北又成了1904~1905年俄—日战争的原因,沙皇的军队于此期间被新兴的军事强国日本击败。

第一章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崩溃

524

研究1895~1949年间中国史的历史学家们最关注的内容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形成、无产阶级的出现、新思想在知识分子中的传

播、政治运动和党派的存在。正是这些近代的发展才使他们联想到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发展过程,而且中国也似乎进入了与欧美工业化国家在很早之前的发展相同的过程。但在赋予中国近代史的这些形态一种特殊意义时,他们也都倾向于忽视某些不能与西方早期历史作任何比较的基本数据,这些数据就是中国的经济枯竭、它对于外国的依附性以及被昂贵的国际借款装备起来的军队所扮演的越来越具有主宰作用的政治角色。甚至在其中出现并发展起了大家乐于视为中国“现代化”之证据的背景本身,就不应与西方历史作任何类比。进而,它还使人对一种普遍接受的解释产生疑窦。1895~1949年间的中国“现代化”表象远不是代表着一种进步和充满希望的发展之起点,而更应被视为中国社会之异化和解体的明显征兆。这里事实上更应该是指寄生性的和几乎是病态的发展,它与向中国本土引进的外国资本和工业有联系,同时也与其最沉重的负担已经落到农村大众身上的普遍贫穷化有关。大家只是由于过份地滥用语彙词汇才把以下集团视为与西方的那些集团一一对应的“社会阶级”:失去了根基的知识界、作为外国在开放港口和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区之殖民行为副产品的资产阶级、与由苦难驱向大城市的无收入来源之大众没有任何区别的悲惨无产阶级等等。以其美国风格的摩天大厦、银行、外国和中国的工厂而扩大的上海,如同肿瘤般地扩展。它并不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证据,而是其异化的明显象征。

当时农村大众经常陷入一种深重的苦难中,以至于他们除了自己眼下的生存之外,无法关心其他事。因中国社会解体而产生的新社会集团确实迸发出了极大的爱国热忱,它一时间将本来是互为路人的不同派别联合起来了。但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阶层和无产阶级的软弱与无能是很明显的。商人以及银行家、工厂主和进出口企业的老板,都在下述矛盾中摇摆不定:一方面是其对祖国的热爱和独立的愿望,另一方面则是其对大银行和外国在华企业的

依附。无产阶级既生活困苦又为数甚少，这使他们直到1927年（当时蒋介石弹压下去了第一批工人组织）都无法起到有效的作用。知识分子们则受到一些矛盾思潮的束缚并处于一种深刻的恐慌之中。但是，尽管主宰权在20世纪的整个上半叶都落入了大军阀手中，但由学生和知识分子们施加的持续压力长此以往却不会不对政治的发展产生影响。尤其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思想的觉醒和一种远远超出了知识分子、学校与大学的相对有限范围的思想发展之开始。

如果将1911~1912年短暂的辛亥共和革命与法国在18世纪末经历的那种类型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相提并论，那是非常荒谬的。中国的实权从未属于资产阶级，它始终都被操纵在掌兵权者手中。正是由于另外一类不再属于寄生性而是因与农村人口紧密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军队，中国才得以摆脱了外国的入侵和本国的军事政权。

因此，中国的政治生活（甚至也包括文化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显示了一种不自然的状态，而政治运动之脱离社会的特征却又强化了这种状态。在日本、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区以及开放口岸（西方在中国的一种飞地），这种政治运动在失去了根基的知识界和已经习惯了外国生活方式的资产阶级中，产生了以下的以军阀间权力交替为标志的历史并不囿于上述的政治动荡：

——1895~1916年，旧制度在此期间崩溃和消失了。这几年⁵²⁶受北洋陆军的军阀袁世凯政治霸权的控制。

——袁世凯生前在各省安置的总督（军阀）于1916年起互相争斗，并在各自在中国占有势力范围的外国列强（日、英、法……）的支持下瓜分了中国，这就是军阀时代（1916~1928年）。

受到自1919年以来加强了国民政府的支持，蒋介石登上了政权宝座，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作为军阀继承人的蒋介石，在与外国在华利益有关的中国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

下,强行建立了其专制政权,这就是“南京政府的10年”(1928~1937年)。

——日本的入侵迫使蒋家政权亡命四川。民国政府与上海断绝了关系,其经济迅速恶化。但日本的入侵也促进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游击战的发展。从日本投降的1945年到1949年最后几个月之间,最终的斗争当然是转变得有利于游击队一方了。中国在受极大爱国主义热情鼓舞的农民军中找到了其解放的秘诀。

一、中国经济的崩溃

战争赔款的巨大压力

与受西方民族控制的国际贸易中所使用的黄金相比较,中国银钱的贬值从19世纪末起变得更加严重了,而当时又恰逢中国被迫向侵略者支付沉重战争赔款之际。38克一两的白银在1887年值1.2块鹰洋,但在15年之后却失去了其近一半的比值,到1902年仅值0.62块鹰洋了。银钱的贬值一直在持续,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曾略有回升。中国货币的这种根本的脆弱性又由于贸易赤字和战争赔款而更加恶化了。直到马关条约为止,这些赔款尚限制在中国经济能够承担的数目之内,但从1900年左右起却发展到要毁灭中国了。日本在其胜利之后强加给中国的战争赔款就已等于该国年收入的3倍了。但6年之后的庚子赔款却最终使中国注定要破产和陷入混乱之中。如果大家再加上中国为了还完其债务而被迫缴纳的很高利息,那末这4.5亿块银元(应为4.5亿两。——译者)事实上就成9.82亿块了。1911年,中国的国债高达2亿块鹰洋,而在1924年则达到了8亿块鹰洋。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个陷入最深刻的灾难中的国家再也不能履行当时世界上最富裕和最繁荣的国家强加给它的过重负担之义务了。

外国强加给中国的战争赔款统计表

1841年	向威胁广州的英国人支付 600 万两
1842年	向大英帝国支付 2100 万两
1858年	向大英帝国支付 400 万两 向法国支付 200 万两
1860年	支付 1600 万两,其中一半赔给英国,另一半则赔给了法国
1862~ 1869年	继传教士和中国居民之间的教案之后,赔款约为 40 万两
1870年	继天津事件之后赔款 49 万两
1873年	继日本入侵台湾之后,赔款 50 万两
1878年	向俄国赔款 900 万两(里瓦几亚条约)
1881年	向俄罗斯支付 900 万两,这次赔款使中国重新收复了它对伊犁河流域的部分领土的主权
1895年	在中国战败之后赔款日本 2 亿两
1897年	作为由日本军队撤出辽东半岛的代价而赔偿日本 3000 万两
1901年	向入侵河北时的西方联军赔偿 4.5 亿块鹰洋
1922年	作为撤出山东胶州领土的代价而赔偿日本 6600 万金法郎 继传教士和中国人之间的教案事件之后,又向中国索求了多次赔偿,但对 1870 年之后的赔偿则未被列入本表中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不久,中国便向法—俄财团借款 4 亿法郎,并以海关收入作抵押。在 1896~1898 年间,又加上了向另一外国银行财团的两次新借款 1600 万英镑。在 1902~1910 年间,北京政府得以以庚子赔款的名义支付了 2.25 亿两,这些钱是从其收入中提取的,北京政府还在各省利用了外国要求付款的压力。海关收入显得相当不够,遂使中国的整个税收制度(釐金和盐税)都落入到了外国人的控制之下,他们攫取了中国的收入。

从 1895 年起,中国受到了战争赔款、向外国财团借款以及重建现代化军队的三重负担之苦。除了这种严重的影响之外,某些同时改变和削弱了中国经济的更为典型的因素也在起作用。这种经

济确实变得越来越随着世界市场而变化,因而也更为脆弱。手工业和农业因发展新作物(这样做却以损失粮食作物为代价)或新的加工方式(如纺织进口棉纱)而适应了外部条件。由此而在某些部门出现了继武力镇压之后产生的繁荣阶段。棉纱的进口曾在1870~1880年间从3.3万担猛增到38.7万担,但后来又由于大量进口廉价棉纺织品而锐减。中国的棉纺手工业则由于1893~1899年间欧洲(主要是英国)纺织品以及1899~1900年间美国棉纺织品的入侵而破产了。进口棉织品于1920年达到了其最高数目,后来则由于灾荒而缩减。茶叶的出口在1830~1880年之间增长很快,从3000万镑猛增到1.5亿镑。但由于印度、锡兰和日本栽种茶树,而且那里正朝着工业生产技术的方向发展,所以茶价从1880年起开始暴跌。7年后,中国十分之八的茶山已经荒芜了,遂造成了中国经济中直到那时为止始终繁荣的一个部门的破产。一种类似的变化触及到了丝绸的生产,丝绸的出口曾于1885~1887年显示出了一种明显的上扬,但它们很快就受到了日本、里昂和意大利生产的丝绸的竞争。

经济上受外辱

继使中国工业向外国人开放的马关条约之后,出现了西方和日本资本向开放港口和租借地的涌入。外国公司确实希望既利用贫困而廉价的劳动力,又在最佳条约下倾销它们的产品。根据某些估计,在华的外国资本从1896年的7.87亿美元猛增到1914年的16.1亿美元。我们在1890年共计算到499家在华的外国企业,到1923年则达到6865家了。

中国经济似乎由于这种金钱投入和工业发展而振兴了。外国人定居的城市都处于蓬勃的发展之中,主要是上海,但也包括天津、青岛、武汉、香港等地。新的工业使大批无收入来源的人获得了工作,使附近的农村重新获得了生力。大城市构成了有利于一大批

小作坊和交易发展的环境。但这种繁荣是虚假的和具有欺骗性的。外国资本的进入加剧了位于沿海的工业中心与生活条件不断恶化的辽阔大后方之间的不平衡。虽说在1920年左右居住于中国的30万外国人在那里消费了其部分收入,但其利润的最大部分却被外国公司返还国内了。由此而产生了对中国之微薄财富的一种新攫取。最后,西方和日本资本的渗入又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附性。

1920年左右,中国的整个经济都依附于设立在上海、香港、青岛和汉口的外国大银行以及像日资三井洋行那样的大公司之下了。海关、盐政、邮政均由截留了其全部利润的外国人管理。西方与日本的舰队与商船队在港口、沿海和长江水系到处游弋。除了艰难地并且最终成功地与它们的竞争进行过斗争的几家企业之外,中国工业的整个现代部门(纺织、烟厂、铁路、航海、水泥厂、肥皂厂、面粉厂以及城市中输送煤气、水电的机构,此外还有公共交通部门),都被控制在外国公司手中了。中国的银行、工业和商业资本数量远不及英、美、俄、日、法在华投资的资本数量。上海的西方大银行控制了中国的主要收入——海关和盐税。此外,它们还吸收了所有寻求可靠保护的私人资本,因为在中国银行中无法得到这种保护。 529

中国企业受到了严重的竞争,仅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才经历过一段较好的光景。在1913~1918年间,从英国的进口减少了51.5%,从法国的进口减少了29.6%;而从1917年到中国参加反德战争期间,从德国的进口则完全停止了。当时唯一处于发展中的日本地位,亦因多次抵制日货而受到了损害。在1914~1921年间,中国的纱锭增加了125%。中国经济的相对改善于1918~1919年间通过商业的复苏和中国银圆的增值而表现出来了。但这种缓和只是短暂的,1919年之后竞争又重新出现并导致了大批中国企业的破产。日本的纱锭在1913年只有111926个,在1922年

则为 621828 个,3 年之后却达到了 1268176 个。

然而,代表着最重要的经济领域之一的纺织业的例证却特别能发人深省。当中国企业非常艰难地在极其狭窄的市场上寻求资金时,日本工业却拥有充足的资本,可以使之以 3% 的利息借款给中国工业,这比中国银行的利率要低 10%。此外,由于与航运公司的一种默契,日本纺织企业支付来自印度的粗棉运费时要便宜 30%。最后,它们的产品在中国都被免征沉重的过境税——釐金,而所有的中国产品都要被征收这种税。较大的金融便利条件、较低的利率、免税和减轻负担以及最佳的组织,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生产成本的差异:中国棉纱品的售价要比日本企业在中国生产的棉纺织品贵 114%。

530 中国在 18 世纪是棉纺成品的大出口国,而在一段时间内仍为细棉纺织品的重要生产国,并且直到 1880 年左右仍为丝绸或茶叶的出口国。从 19 世纪末起,它竟致于不仅要进口钢铁、机械、铁路器材、军火等等,还要进口日用品了。最早还仅限于城市市场,而在 19 世纪最后几年大量进口的美国和英国棉织品却最终蔓延到了整个中国农村。甚至连照明用的煤油也要进口,中国的桐油小手工业无法与之抗衡,1910 年的煤油进口量已达 7309000 百公升,而 1923 年则达 9761000 百公升。这个庞大国家的农村大众不得不省吃俭用,忍受着地方病般的营养不良,因此又必须从国外进口部分食品:食糖、大米、面粉。大饥荒迫使它大量采购,所以中国于 1920 年就必须在东南亚采购 530 万银圆的大米,于 1922 年又采购了数额高达 8000 万银圆的大米。

西方国家用了很长的时间才纠正其错误,认识到中国并非取之不竭的财源。它们在 1840 年左右所认定的这个新的“黄金国”,如果其经济得到发展的话,那末本可以变成名副其实的黄金国。在 19 世纪末叶,它们与中华帝国的贸易交流总额不会超过 5000 万英镑,比诸小邦的外贸额还要少得多。中国的贫穷化是这类交易薄

弱的根本原因。不过,只是当中国经济在 20 世纪末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之间崩溃时,西方国家才开始对中国失去兴趣。1914~1918 年的大屠杀以及继此之后在西方出现的困难,又进一步促进了这种漠不关心的状态,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混乱和苦难局面。继西方国家在 1900 年左右所经历的大发展之后,投资速度放慢了。某些国家为了支持南京的蒋介石政府而放弃了在华的特权,其他国家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这样办了。西方人把这个可怜的猎物丢弃给了日本。

自然灾害

时近 20 世纪末叶,中国似乎变成了受命运嘲弄的对象,而它对此也已不再拥有任何对付的手段了。这是人与自然的一次世界性的共谋。1850~1950 年间的中国,成了历史上最令人敬畏的农民起义、外国炮舰的进犯、入侵和内战的国家,同时也是爆发了严重自然灾害的国家。在世界历史上,受害的人数从未如此众多。

从 17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末,中国很少遭受过饥荒和水灾,但从 19 世纪上半叶起,自然灾害却日益频繁起来了,尤其是表现出其史无前例的规模。事实上,大农业区的人口密度增加及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官府的昏庸腐败和无能,这一切因素积聚在一起,便会使任何一点不正常的气候酿成大灾难。缺乏储备、赈济工作组织不当以及交通运输的困难,解释了中国北方连续性干旱所造成的严重饥荒。而堤坝维护不善以及河床增高,也导致了 1850~1950 年间大水灾。饥饿和灾难确实迫使大批贫苦农民去开发山坡并在那里扩大玉米的种植。但是,19 世纪对于植被的滥加破坏却导致了水土流失,而泥土冲积又升高了河床。保养维护不佳的堤坝在发生大洪水时已不再能遏制水流量了。在这一串连锁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农民阶级从 19 世纪上半叶起已经感到了对土地的渴望,史学家林则徐(1785~1850 年)、地理学家魏源(1794~1856 年)和

531

水利专家王士铎(1802~1889年)已经认识到这种情况了。这引起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洪荒,它不再仅仅侵犯到黄河下游地区,而且比过去更严重和更经常地触及到汉水流域之低洼的山谷和长江下游地区。这些水灾除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一时的破坏之外,也成了瘟疫传播之源。黄河于1855年在开封以西决堤,并从淮地改道流向济南地区。1938年,它再次打开了一条通向安徽以北的新河道,但又于1947年放弃了。1931~1935年间在长江下游地区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水灾。

严重的旱灾在中国北方产生了更让人惨不忍睹的结果。1876~1879年间在山西、河北、河南和山东的部分地区爆发的严重旱灾,导致了900~1300万人口的死亡,而1892~1894年^①的水灾造成了近100万受灾人口。不过,铁路网自1900年左右起的扩大却在和平时期减少了大灾荒的悲剧性后果:我们在1920~1921年间只计算到50万人的死亡,但由于政治形势,于1928~1931年仅仅在陕西省就有300万人死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中国的绝大部分领土于1942~1943年间被日军占领时,饥荒在河南省就造成了近200万受害者。

1919~1949年间的中国是一个丧失了任何希望的士气低落的国家,一个使慈悲和公正再没有任何意义的世界,在那里恐惧变成了家常便饭。1938年,国民党的军队在黄河上打开了一些缺口以延迟日本军队的推进,而水灾使中国农民死了数十万人。

^① 原文如此,显为“1892~1894年”之误——译者。

二、人口的迁移和社会的变迁

534

人口的外流和迁移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一个穷国,其大部分生产技术自 19 世纪初叶以来未有过任何发展,其绝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只能勉强维生的极限上。除了无止境的剥削之外,自然灾害以及国民党军队或外国军队的抢劫与破坏也时有发生。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在中国根本不是新事物,那里的农民很久以来便倍受高利贷、有时可达占收成半数的地租、税务官勒索、年景欠佳和兵痞暴行之苦。但是,大家肯定从未见过如此的灾上加灾和难上加难。如果把这一切都仅仅归咎于传统的作用和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制度,那将是特别不公正的,正如简单地将外国帝国主义视为唯一的罪魁祸首也同样不公正一样。历史的连贯性成了如此众多苦难的原因。一个能成功地养活如此之多人口的国家不会不因其经济的任何一点不平衡而吃尽苦头。

南京条约时代的西方人觉得中国像是一座具有取之不竭廉价劳动力的大水库。从 1845 年左右起,在闽南的港口厦门和广东东北的港口汕头,组织了一个向美洲和特别是秘鲁的金矿与古巴的甘蔗种植园出口苦力的网络。曾在 18 世纪依靠手工业过活的中国沿海地区,在当时确已受到了 19 世纪经济衰退的影响,其农业生产已经出现了歉收。这些不幸的人受到过一种最优越生活之希望的诱惑,在出发前被圈禁在大木棚中并在途中拥挤在舱底,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此悲惨,以致于许多人死于途中;承担这些有巨额利润可图之奴隶交易的,是所谓“漂流地狱”——船舱。1866 年,中国政府曾提出过一项条约草案,却遭到了西方列强们的拒绝。1850~1873 年,黄金生产的高速发展又使移民运动有了新的活力。大家从 1867 年起便会发现一次为加利福尼亚(中文叫作“旧金山”)

539

536 大量征募广东劳工的活动,因为1848年在那里发现了金矿;中国后来又向澳大利亚(“新金山”)出口劳工苦力,那里从1851年起也发现了金矿。这些被煽动的或自发的移民引起了美国工人工会的仇恨,那里的种族仇恨高涨起来了。早在1880年,美国政府就在工会的压力下阻止了中国移民潮流。到了5年之后的1885年,罗克斯普林斯(怀俄明州)的骚乱使中国矿工有29人死亡。中国对于迫害其侨民的暴行提出了一次新的和徒劳的抗议。美国强加给中国移民的待遇以及禁止任何移民的命令,于1905年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广泛的抵制美货运动。正是在这一年出现了一部中文小说,其中描述了美国南部省份的悲惨生活(《苦社会》)。

因此,向美洲和澳洲的移民速度在20世纪初期放慢了。在20世纪中国向西方国家移民的历史上,唯一重要的事件是1917~1918年间向法国派遣了14万中国劳工。他们可能在那里为帮助战争而作出努力,然后返回其祖国。随着山东和黄河下游的农民定居于东北,那里的人口从1910年的1500万猛增到1940年的4400万。同时,广州人、客家人和福建人向东南亚的法、英、荷殖民地的大规模外流,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上最重要的人口现象。新加坡的中国移民从1866年的5.4万人增加到1911年的22.4万人;在同一时期,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口从17.5万人增加到了29.5万人。但确实是在20世纪上半叶,向东南亚移民的运动才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了。在1900~1930年间,这类移民普遍增长了50%~60%。这股新的移民潮流淹没了中国人原有的移民地。这样一来,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Penang)、堤岸(由在满族入主中原时的难民创建)变成了几乎清一色为中国人的城市,而马来半岛上几乎有一半人口原为广东和福建的农民,这就是韶州人、厦门人、福州人、广州人或华南客家族的集团。

受由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东南亚的发展所掀起的经济活动之吸引,这些移民在那里融合为一体并起到了一种中介人的

作用。人们在那里的锡矿、橡胶种植园、茶园、菠萝种植园、稻田、花园、药店、建筑业、银行中都会发现他们。其中绝大多数的人满足于仅去从事如下职业：小商人和匠役、种植园的农民和工人等等。其中的某些人要比当地的土著人更活跃和更具创业精神，并成功地积累了巨额财富。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中国大商人，他们和本世纪初叶美国那些靠自身拚搏而创业的同行一样，最终在马来亚、泰国、缅甸或法属印度支那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到1936年左右，东南亚华侨所占有的资本已高达6.44亿美元。

这样一来，在海外便形成了一种中国资产阶级，它与本国开放港口中的资产阶级相类似。他们都与外国的利益相联系，并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他们在中国对于议会民主制的尝试虽无成就，但其影响和作用却是不能忽略的。他们也对共和派人士以及由孙文(孙逸仙)和黄兴于1905年在东京创建的同盟会给予了思想与金钱上的支持。海外华侨对其广东和福建家族所提供的帮助，较为普遍地减轻了那里人的苦难。⁵³⁷

一部分这类移民的财富和影响及其放高利贷的行为，也解释了土著民的嫉妒、不信任或仇恨。东南亚的原英、法、荷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获得了独立，与此同时所产生的民族主义对他们是不利的。

人们还将会发现，中国南方沿海省份因生活苦难而掀起了向马达加斯加、西域、印度、大洋洲等地的移民运动。中国人集居区扩大到了全世界。

有关东南亚的中国人侨居区的最新统计都很难说明问题，这是因为由侨民居住地区所采取的政策经常迫使中国人改变国籍，但同时也是由于混血和同化的原因。因此，官方的数字仅仅提供了一种大概数字。

东南亚的华人侨民统计表
(1958 年的统计数字, 据《远东经济杂志》
于 1958 年 3 月份的统计)

国 家	华人人口	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
泰国	3500000	18
马来亚	3013000	44
印度尼西亚	1598000	2
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1221000	4
新加坡	861000	77
缅甸	400000	2
沙捞越(婆罗洲西北)	164000	27
菲律宾	154000	1
北婆罗洲	83000	
累计	10994000	

〔由伯塞尔(V·Purcell)针对 1960 年提供的数字则会得出一个略高一些的总数:11227000 人〕。

538

中国社会的解体

伴随着使某些农村变空, 和因而有利于开放口岸与周边地区(东北和东南亚)的离心运动, 又出现了中国社会的瓦解。在资本外流的同时, 人才也离开了内地的辽阔农村。全面贫穷化的全部重压最终都落到农民阶级的头上了, 他们受到自己那令人不寒而栗之命运的支配。在那里再没有任何人替他们讲话了。过去的社会精英有着强韧的地方关系并且毕竟与农村社会保持着某种接触, 他们出于传统而多少还关心一些农民阶级的利益。但对商业资产阶级和开放口岸的知识分子来说, 情况却大不相同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范围以及深受西方影响的思想意识, 都使他们越来越远离农民阶级了, 并使之对于所有农村和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皆视而不见了。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们鄙视这个苦难而又迷信的社会, 那

对于他们来说只代表着过去。对大部分地区来说，西方已成了它们的榜样，但西方也只以其工业和商业势力的表象而出现在它们面前。

不过，在中国内地的农民阶级和通商口岸之边缘地区的特权阶级之间的这道鸿沟，只不过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特征之一。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全面的创伤败坏了这时的中国社会。民国的缔造人孙文说过：“吾人如同一盘散沙。”借政治和经济异化之机而出现的新集团均混杂而不统一，彼此间完全陌生，往往分化成敌对的小派别。它们从整体上对时局的视野不太宽阔，其民族意识不如中国古代精英人物们那样明确。湖南的张之洞(1837~1909 年)和长江下游以北贫穷的南通地区的张謇(1853~1926 年)之类的旧派文职官吏们，极力反对外国控制，在其省份中发展钢铁生产、创办纺织厂和近代学校；而已失去了其基本文化的商界中国新资产阶级(外国大公司的旧商业经纪人、买办和因与外国交易而致富的外国公司的商人)，却只以追求私利为目的。他们确实受到了依附日本和西方公司以及竞争之苦，甚至可以由此接受爱国主义。但他们受到了束缚，缺乏全局观，无法摆脱由外国人建立的殖民剥削制度。此外，他们的活动根本无助于使中国经济摆脱其受束缚的地位。由于资金的短缺和竞争的严酷，中国资产阶级的工业企业为数始终不多。该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促使他们转向了金融和投机活动。

539

在日本或西方国家培养的人才，其视野更开阔一些，对于其国家越来越严重的丧权辱国也更敏感，他们更善于判断和比较。他们的爱国主义比商业资产阶级更强烈和丰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便爆发了知识分子和学校青年的运动，它以其激烈程度和规模而令人吃惊。但知识分子和新的“干部”也未能摆脱全面低落的士气。他们的生活条件极不稳定(大家可以计算到大批技术工程人员都失业了)，除了从政或教学之外再无其他职业可选。他们成

了失去一半根基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故乡断绝了关系，并且生活在一个受弱肉强食的“森林之法”主宰的社会中。当社会的凝聚力解体时，维生或发财致富便成了生活的唯一目的。这样就可以部分地解释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因素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获得成功的原因，这些因素包括：浪漫地赞扬个人、为生活而奋斗等等。从1927年起，马克思主义又使他们越来越觉得是唯一的救国理论了。

中国的无产阶级始终是一支新生力量，它是外国资本入侵和农村贫穷化的产物。矿山、铁路、企业、码头和工业中心的工厂都吸收了悲惨农民阶级中的剩余人口。但这个无产阶级很难与无固定收入来源的大批民众区别开来，而后者又极力试图在差异极大并且有时是最不体面的职业中寻求维生的手段（乞丐、赌博、卖淫、敲诈勒索、犯罪、走私鸦片……）。失业者的人数特别大。失去社会地位者、原来的农民或被遣散的兵痞在1926年左右为数约2000万人。

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要比工业化初期的欧洲工人糟得多：每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任何职业保证、在遇到疾病或事故时缺乏保险、妇女和儿童被雇来做工……这个无产阶级完全依附于包工头（招工的代理人）。直到1920年左右，除了传统的互助团体之外再未有过其他组织。这种传统的互助集团就是原籍为同一村庄或同一地区者的会馆。完全与迁往东南亚的劳工一样，工人们保持着与他们故乡村镇的联系，为其家庭寄去其微薄收入的一部分。工人组织仅仅在1919~1921年间才开始出现，这还是利用了巴黎和会之后的爱国与革命运动。但它们到1927年都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了。由民国政府创建的官方新工会受到了黑社会和警察的控制，它们后来妨碍了中国脆弱的无产阶级在1928~1949年间扮演任何角色。

在这些四分五裂的派别之中，我们还应该再加上一个由军阀

及其部下组成的小集团,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一般都很低,但却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中国面对外国压力而表现出软弱无能的根本原因之一,亦即它在20世纪上半叶之灾难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是仿照自10~11世纪以来的传统做法而使用了雇佣军队和职业军队。在1840~1842年间英国人发动进攻时,在广东组成的农民“平英团”乃是一种未产生结果的自发抵抗。因为,在根据传统而由满族贵族主宰军事问题的大清帝国,其政治观念排除了直接利用民众的主动性。同样,由湖南、江苏和安徽的志愿人员组成并由地方官吏在太平军起义时组织起来的团练组织,也无法引起观念与行为上的变化。因此,从这个时代开始组成的军队随着中国政权的削弱而变成了被置于军阀直接控制之下的独立势力。由此而造成了缺乏统一的指挥,其影响在1884~1885年间法国发动进攻时令人感受尤深。地区独立倾向的发展使中国军队不再是一种其首要目的在于保卫帝国之基本政策的工具,而相对来说比较自主并且独立于中央政权机构。因此,随着国家的衰落,军队及其将领们便无法避免地表现为中国政治生活的真正主宰者。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的惊慌和政治空缺(罢黜了李鸿章),导致了像袁世凯那样一名普通军人的高升,他成了1900年左右装备最佳和训练最好的军队之首领。因此,正是可以上溯到太平军战争时代的一种发展在20世纪上半叶将中国军队改造成了寄生的军团,其功能绝不是反击外国的控制和侵略,相反却是为了在内政方面承担一种再不能由任何其他权力机构起到的作用。

要使中国恢复统一并且同时摆脱这些雇佣兵团和入侵者,只能使用一种新的志愿兵机制,也就是逐村和逐镇地组成农民团练(民兵)。这正是王韬等人从1870年左右起就在考虑的在帝国法制的范围内解决民族统一问题的良策。

第二章 20 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发展

一、袁世凯时代

旧制度的灭亡

清政府被 1894 年的失败和义和团的冒险事件严重地削弱了，遂从 1901~1903 年起转向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使人联想到了康有为及其朋友在 1898 年主张的那些改良：于 1903~1906 年创设诸部、从 1908 年起公布国家预算、废除传统的科举制（1905 年）和教育改革、创设咨议局（1909 年）、颁布新法律（1910 年）。所有这一切都是著名法律学家沈家本（1837~1910 年）的杰作，他受到了西方立法的启发。濒于死亡的朝廷开始顺应潮流了。它甚至对中国集权表现出了某种薄弱愿望，以此来掩饰它实际上对金钱的急需。其做法是：恢复满清贵族的势力以便控制在各省仅存的效益好的企业。其势力引起了北京不安的袁世凯在 1907 年被免除了“北洋陆军”统帅的职务并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与此同时，两湖（湖南和湖北）总督张之洞应召入京，被迫离开他在长江中游的独立王国。盛宣怀（1849~1916 年）是一名腐化官员，先是受李鸿章后又受张之洞的保护。由于向日本的两次借款，他于 1908 年夺取了对中国轮船公司的控制权，同时也夺取了对汉冶萍铁矿公司（汉阳制铁厂、湖北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这都是张之洞的业绩）的控制权。就是这位盛宣怀，在 1911 年 5 月又带头大举向外国银团借款并对铁路实行赎买和国有化。这样做可能同时引起了爱

国主义的和各省之地方主义的反应,并且导致了该王朝的崩溃。^①旧制度主要不是因其笨拙和轻率的行为,而是由于经济崩溃和它所处的窘迫处境,才注定要对各省施加压力,并在向西方和日本银行筹措借款时“把中国出卖给了外国人”。由此而产生了在旧统治阶级和通商口岸的资产阶级之间、保守派和现代派之间日益加大的疏远。

除了国势衰败这种根本原因之外,还应该补充以反满和反君主政体潮流的次要影响,这股潮流在不同阶层中发展起来了:侨居日本的留学生和知识分子、东南亚的中国新资产阶级、中国南方和湖南的秘密会社、在由外国教官主持的军校中培养的新军军官。日本自1896年以来就被中国奉为楷模,并且自从它于1905年在对马海峡战胜俄国舰队后便备受崇拜,在这种发展中扮演了某种关键角色。那里的各种团体确实向不同的政治难民集团提供一种并非始终都是无私的支持。侨民中最重要的思潮是由仿效日本君主立宪制的支持者们提出来的。这一派的代言人是原维新改良派人士梁启超,他因其犀利的笔锋而在知识精英中享有非常广泛的威望。由孙文(1866~1925年)所代表的共和倾向事实上并非中国独有的,他在西文中更以其广州读音的名字 Sun Yat—Sen(孙逸仙)而著名。孙文与梁启超不同,既未受到过经典教育,也没有史学家和哲学思想家的气质。他是一个背井离乡者,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国度过的,为的是寻求支持和赞助。他诞生于澳门附近,成长于檀香山(火奴鲁鲁),并在香港学过医。孙文最早表现为一个与广东秘密公社有联系的小小谋反者。他于1894年创建的会社(兴中会,为复兴中国的公社)和1905年在东京创建的会社(同盟

^① 原文如此,意指中国近代史中的“保路运动”。但似应补充一点:川汉、粤汉铁路本来已归民办,而清政府在将其收归国有后,旋后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财团,这才引起了“铁路风潮”。——译者。

会),更像阴谋家的集团而不是真正的政党,其活动方式是策划阴谋和注定要失败的突然袭击。最著名的起义尝试是于1911年4月27日在广州爆发的,共造成72名受害者(72烈士)。孙文的共和意识相当简单:“三民主义”将重点置于民族主义、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但理论对行动并不重要,孙文的支持者们[其朋友湖南人黄兴(他与该省的秘密会社有联系并与新军的革命界保持着接触)、1883~1944年的汪精卫、1879~1936年的胡汉民、1868~1936年的章炳麟]天真地认为拯救中国的大任落到了他们身上。

旧制度崩溃了,但共和派革命党人之混杂的集团却并未对此作出过真正贡献,仅仅充当了无足轻重的支持力量。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不像大家为了把它纳入到固定的历史模式(其雏形是由马克思主义有关欧洲的或人类的五个发展阶段的理论提出来的:原始共产主义、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而声称的那样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而仅仅是中国政权解体的一个简单插曲。共和派人士的成功是出乎预料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湖北)的一次兵变掀起了一场广泛的分裂运动,并很快蔓延到了大部分省份。12月初,华南、华中和西北各省和各军成立一种联盟之后便宣布与北京断绝关系。孙文不失时机地从美、英返国并在南京被选为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就职。但就在同时,他却提议将共和国总统职务奉送给袁世凯(假如袁氏准备保卫新制度的话)。这件事本身就暴露了这个根本没有兵力和收入的共和国的极端软弱性。归根结蒂,在一些政治难民的帮助下,这个共和国只不过是抛弃了由北京政府组成的中央政权之虚假权力的绅士们的旧省议会的延续。事实上,虽然贵族们都希望使参议院(国民议会)中有本省的代 表,但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了袁世凯,他是唯一拥有经过良好训练和装备精良的部队的人,同时也是唯一在外邦面前具有某种威望的人。这次事实上未经流血而完成的革命,首先源于一个只能靠从各省抽取款项和向外国财团借款来维生的王

朝之不可避免的消亡。

袁世凯的独裁

袁世凯于1911年10月应召入宫，他利用动乱而自行攫取了非常广泛的主宰权，当他与非常软弱的南京政府进行交易时便利用了这种有利地位，在溥仪（宣统皇帝，时年6岁）于1912年2月14日逊位的两天之后，这些谈判便达成了如下协议：袁世凯取代孙文成为共和国的元首并将政府迁至北京。废除议会制和袁世凯继此之后的独裁，成了各种对峙力量之较量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中国南方以及长江流域获胜的共和派联盟事实上不仅缺乏军事和财政支持，也缺乏团结一致。它是来自各省的属于正处在灭亡中的旧统治阶级的绅士、获得了新思想的军官、外国的支持者（其成员为归附了共和制的君主立宪派集团）以及共和派人士本身所组成。袁世凯那本来便已很广泛的权力在数月间得到了巩固。1913年3月22日，共和派及民主主义新党——国民党的组织者、国会制的虔诚捍卫者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数月后，黄兴和孙文都被迫再次东渡日本。 544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解散了议会。他于5月间颁布了一部几乎将所有权力都归于其个人的宪法。1916年元月1日，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恢复了帝制。这当然不是指恢复旧制度，因为旧制度的机构及其士大夫在1895年之后就开始受到损害，而当时已经最终消失了。此外，地区的倾向和外国的（特别是日本的）压力始终很强大，而这种军事专制也跟1901~1911年间行将灭亡的王朝一样软弱并受到威胁。在1913年7~8月间，华南和华中的七省都督奋起反抗袁世凯将其控制权扩大到各省的努力。他们受到了一小批议会民主的信徒们的支持，因为这些人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感到失望。这种分裂的尝试在历史上称作“二次革命”。袁世凯利用这一机会而在中原各省安置了一些亲信：冯国璋在南京、段祺瑞在

二、军阀混战时代

内政与外国的干涉

安庆(安徽)、李纯在南昌;而这些人又不失时机地表现出了对其保护者的独立愿望。当时的形势特别有利于粉碎这一政权。此外,袁世凯也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并在这种压力面前让了步,由此遭到了绝大部分公众舆论的反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起,日本便夺取了德国直到当时还在山东占有的铁路、军事基地和领土。1915年1月,日本驻北京的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苛刻的要求,其目的在于使中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地。袁世凯被迫承认日本对满洲、蒙古和山东的控制是一种既成事实。他作出让步,允许日本单独控制中国的那些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如汉冶萍铁厂、汉阳高炉、大冶和萍乡铁矿与煤矿等。

从1916年初起,也就是在袁氏临死前的6个月,这个独裁专制者已开始遭到了来自其心腹亲信们的反抗。华北的段祺瑞和南京的冯国璋已经作为其对手而出现。云南总督唐继尧在日本的支持下宣布独立,中国南部和西部的八省也很快都闹起了分裂。这是军阀混战的最初阶段。在此期间,共有10位北洋军的旧军官从受袁世凯保护的人变成了独立的军阀。

完全和1901~1911年间那个濒临灭亡的清王朝一样,袁世凯及其1916~1928年的继承者们也只能通过向外国银团的借款来维持自己,并以外国人对其正常收入(关税和盐税、邮政利润)的控制作为偿还向外国银行借款的担保和抵押。但这些借款只能根据中国政府在外国人心目中的保障程度而获得。故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是,外国银行拒绝向软弱的孙文共和政府提供它们稍后不久同意给予袁世凯的那种贷款;袁世凯被他们认为是中国在1912~1916年间的“强人”。最重要的一笔贷款是在1913年答应发放的,

共为 2500 万英镑(但提前截留 400 万镑),预计在 1913~1960 年间共须偿还近 6800 万镑。德、英、法、日、俄的财团借给了袁世凯这样一笔 2100 万英镑的贷款,而作为交换、它们确保了对于盐业收入和储蓄在中国银行中的资本的控制权。这样的借款当然不可能给予一个威胁要结束外国在华特权的政权,而由孙文领导的政权于 1923 年和 1925 年间便在广州发出过那种威胁。

因而,20 世纪前 30 年间政治生活的基本机理是:外国虽未直接干预这个财源枯竭并且深陷混乱的国家的内部事务,却彻底阻碍了它对未来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那些将这个古老帝国瓜分为势力范围的列强之间的对立故态复生并促进了政治分裂,由此而导致了英国新闻界称之为 Warlords(军阀)的登台。他们都是些独立的督军,拥有自己的收入和军队。由此也出现了在军阀之间的复杂联盟游戏并形成了彼此对立的军事集团。这些大军既包括拥有现代化装备(西方列强得以在中国推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尚未动用的武库中的部分武器)和便于运输(铁道、轮船)之设备的部队,也包括一些土匪。他们在行军中依靠农村而生活,从事抢劫和各种形式的敲诈勒索。军阀们的政治武器对外是阴谋诡计、交易和突如其来的变化,对内则是腐化和恐怖。在整个军阀混战时期,中国的国内形势不停地恶化。这就是通货膨胀、有增无减的土匪行为、贸易的彻底停滞、作为军阀们主要收入来源的鸦片种植的大发展等。中国的农民阶级在灾难和困苦的阶梯中又下降了一级新台阶。 546

政治大棋盘是随着军阀间的勾结和外部的影响而变化的。在袁世凯死后的几年间,日本的势力范围——满洲成了奉天(辽宁)系军事集团之首领张作霖(1875~1928 年)的地盘。段祺瑞(1865~1936 年)和徐树铮(1880~1925 年)在日本的支持下统治了从华中直到福建的地带,段祺瑞于 1918 年从日本那里获得了一项很重要的帮助(四洮铁路借款)。这就是所谓的安福系(安徽和福建)集

团(皖系)。作为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被所谓直(隶)系集团所占据(1862~1938年的曹锟和1872~1939年的吴佩孚)。英国又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华南,那里的政治形势可能会影响到香港。至于尚未放弃其进入中国西南之美梦的法国,则在云南支持原来受日本保护的唐继尧(1882~1927年)。

1920年7月间,安福系(皖系)集团被奉天(奉系)和直隶(直系)集团击败。1921~1922年冬季,华盛顿会议在促成阻止日本于东亚扩张的同时,也导致了政治力量的一次重新分配以及在日本利益的代表者张作霖和由英国保护的吴佩孚之间的军事冲突。不过本处无法具体追述一种极端复杂形势的不停变化。主要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基本关系,它把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生活与外国列强自身间的冲突以及它们为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而施加的压力结合起来。

从孙文(孙逸仙)的奋斗到蒋介石的胜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市民各界的爱国浪潮、学生的游行、产业工人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抵制外国货等等,都不可能产生任何明显而持久的影响。那些打算把中国从混乱中拯救出来者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被迫在国外寻求支持,而这些支持不可能是无私的,再加上军阀之间的联盟又始终都是临时性的。这样就可以解释孙文(孙逸仙)的那些努力何以一无所成了。

孙文被迫于1913年8月再次亡命日本,仅在袁世凯死后才于1916年夏季返回上海。次年7月间,他怀着使华南军阀支持其事业的希望到达广州,但很快便感到失望并于1918年再度前往上海。1919年5月4日,一股极大的群情激昂的潮流使学校、知识分子各界以及市民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被煽动起来,因为此时传来了巴黎和会的安排,其中同意将德国在华的所有特权和土地都转让给日本,而当时日本在列强们眼中显得是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制

度的最佳盟友。发起于北京大学的这场运动蔓延到了所有大城市。紧接其后的便是抵制日货以及海员、铁路工人、纺织工人的大罢工……1920年12月间，孙文试图利用两个月以前在华南出现的事件：那里的一名新军阀陈炯明（1875～1933年）把直到当时始终都很强大的桂系集团成功地从广东驱逐了出去。孙文作为胜利者进入了广州，他于1921年5月5日当选为这个地区共和国的总统并极力在那里建立一种符合其民主向往的政权。但英国的敌视以及孙文与陈炯明越来越公开的冲突却迫使他重新离开其故乡省份。作为华盛顿会议之结果的政治力量的重新分配起到了不利于孙文的作用。孙文在1922年6月返回上海之后，便等待广州的形势重新好转，以便于次年初再回到那里。正在这时，他在外部又找到了个新盟友，也就是其利益在于削弱西方国家在远东之地位的苏联。1923年秋季，孙文未来的妹夫——由日本培养的军人蒋介石被派往莫斯科并在红军中实习。一个苏联代表团（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伦）也于同期到达广州。1924年1月，国民党根据苏联模式作了改组，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分等级的、官僚化的和具有绝对权威的、必然要将其控制扩大到国家和军队的所有部门与机构中的政党。1924年5月，在苏联顾问们的帮助下，于广州郊区创办了黄埔军校。它为一支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军培养了军官，这支军队后来被置于蒋介石的控制之下。1924年10月，北京的形势发生了出人意料的突变：“基督徒将军”冯玉祥（1880～1948年）成功地夺了权并鼓励孙文与中国北方的新主人寻求谅解。孙文到达北京以商讨联盟事宜，但却于1925年3月12日在那里去世了。

由于其军队的发展（共包括85000人，其中有6000名出自黄埔军校的军官）而得以成功巩固起来的国民党，最终于1926年7月间尝试发动北伐；孙文曾朝思暮想此事。北伐军与重要的军阀力量结盟（在蒋介石指挥的六路大军中，有五路系由经改组后的军阀部队组成，第六路则由国民党新征募的军队组成），势如破竹地向

长江流域挺进，而一部分地方军也与之联合。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在1927年2~3月间都被占领了。

548 这样一来，蒋介石便利用其军权而确保了他绝对主宰由国民政府拼凑的联盟的地位。他确信可以获得与外国利益有关的上海商业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与在长江中游的武汉建立的国民党派别断绝了关系，于1927年4月12日血腥镇压了人民起义，后者是在国民党军队进逼上海时爆发的。也许那些在中国有利益的外国从此之后就可以确保对抗革命的任何威胁了，它们都准备支持蒋介石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建立的新政权。

三、南京政府的10年

蒋介石的得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那非凡的善于利用矛盾的本领、广施策略和玩弄政治交易的天才；他事实上可以与最狡猾的军阀们齐名了。但他获胜的深层原因却在于其对手们的软弱和分裂，同时也是由于经济和政治力量的自然作用对中国命运的支配。在通过流氓土匪而确保上海的治安并将在中国的这个真正的经济都城爆发的起义淹没在血泊中时，蒋介石一举获得了设在上海的外国大公司的可贵中立以及中国商业大资产阶级的同情，因为商业大资产阶级对军阀间的冲突感到厌倦并对国民党内出现的革命倾向表示惶惶不安。在南京建立的新政权不失时机地联合了大部分有产者，它也逐渐地表现得能够维持为继续经商必不可缺的秩序。南京政府一方被迫与在华有重大利益的列强合作，这是由于它对于革命者的仇视和不由自主地将中国商业资产阶级与外国大公司联系了起来。做为它正极力联合或在不能完全联合时便试图消灭的军阀们的继承者，该政府应将其势力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由苏联顾问们于1924~1925年间建立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组织；一党制确保了对政府、官府、军队和治安的绝对控制，它使蒋介石得以牢固地掌握政权。外国向这种长期以来就盼望的强大

政权表示：准备给予为确保其经济平衡所必不可少的手段。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在1928~1931年间收回了大清王朝被迫割让的部分权力：通商口岸中外国租借地的数目减少了，海关关税以及盐税和邮政收入都被收回到国民政府手中了。“大元帅”就这样掌握了种种固定收入（海关关税占其中的接近一半）。

统一进程取得了迅速发展。从1928年起，国民军便占领了已经失去“首都”尊号并被命名为“北平”的北京。继其父张作霖之后成为东北诸省之主宰者的张学良，也归附了蒋介石。1930年，蒋介石重新恢复了他一度曾由于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基督徒将军”冯玉祥领导的联盟而在华北受到损害的权威。 549

民国政权的基础与特征

因此，看来蒋介石从南京时代（1927~1937年）一开始就是军阀中的最强大者。与其对手们相比，他具有巩固的组织（以苏联为楷模的一党制）、以越来越严密地控制金融界的办法而极力巩固一种本来就不太坏的经济基础，还有所有外国的正式承认使之获得的威望。南京政权由此而与军阀政权不同，它比其前任们与商业界有更多的联系，特别与集中了中国90%金融资本的上海商业界有联系，它同时也更向西方的影响开放。其官吏和政府成员中的大部分都与外国保持着联系或者是在国外培养的。它来自开放口岸那已经西方化的资产阶级，这本身就可以解释：尽管它炫耀其发展农业的意图，但实际上却并不关心农民阶级的悲惨命运。

但南京政府也应该将其独有的特色归于其时代。它恰恰是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高潮中形成的；当时的议会民主却由于美国的经济大倒退而受到了损害，而斯大林主宰的官僚和警察制度又在苏联横行一时。蒋介石强烈仇视革命运动并非常欣赏强权制度，他极力模仿这种制度的宣传方法并传播一种重新风靡于世的“儒教”。这就是“新生活运

动”，它是一种与对孔子的崇拜和对中华民国的缔造人的赞扬有关的伦理秩序。而政治警察机构“蓝衣社”则奉命搜捕自由主义者和革命者。

蒋介石的主要成功之处在于，他以对银行系统越来越严密的控制而确保了该政权的财政平衡。

550 中国的银行创办人是先与帝国政府有联系后又与袁世凯和军阀政府有关系的商人们。这些银行在为战争开销准备经费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它们代表着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在蒋介石发动政变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的势力当时正处于充分发展的过程中，这是由于资本流向了上海的经济大中心，而上海银行的存款在1921~1932年间共增长了245%。中国银行在这个大都市中的数目从1919年的20家增长到了1923年的34家和1927年的67家，而到1937年竟达164家之多。但自从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起，它便强制推行与银行金融界越来越密切的合作；而作为该领域对国民党为确保财政和填补财政赤字所需支持的交换条件之回报，政府给予了金融界巨额利润和更广泛的投机便利。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它可以使民国政府确保随时得到商业界的支持并将其法律强加给过于独立的资本家。该政权的所有财政收入很快都落入与南京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几家大银行巨头家族中了，这就是宋（宋子文，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和蒋介石的姻弟）、孔（出身于山西商业家族的孔祥熙）、陈（陈果夫及其弟陈立夫，出身于江苏的商业资产阶级）。国民党于1934~1935年间利用了由于美国在1933~1934年冬季期间决定大量购买银钱而造成的银行大量破产来进一步加强其控制。由于1935年11月3日颁布了银钱国有化法令，中国的货币（圆）稳定下来了，物价亦停止猛涨。四大国立银行在当时控制了金融市场，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发行债券来为战争开销和国库赤字提供资金；债券的利息在20%~40%之间，其主要受益者是政府的高官。

商业界与国民党之间的这类密切关系以及这种虚假繁荣解释了如下事实：尽管农村陷入了深刻的苦难，但该政权仍很稳定。

当代中国的大部分史学家都把 1927~1949 年的地主阶级视为旧制度士大夫阶级的继续和农民苦难的主要原因。但在民国政权时代，大权在握的商业资产阶级已与清帝国的旧统治阶级毫无共同之处了。虽说居住在城市的占人口 3% 的乡绅和地主掌握了全部耕田的 26%（这种形势特别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稻田平原上更真实），但那种将政权与地产权联系起来的陈旧观念，已不再适用于一个农业收入极其微薄和全部资本均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时代。事实的真相是，压在农民阶级身上的负担如此沉重，竟使任何一点财富的不平衡都会变成一种剥削手段。在农村集团内部，甚至最富裕的经营者也没有欧洲最贫穷的农民舒适，而佃农也始终不是最赤贫者。如果租地和借债成了农民经济的沉重负担，那末对于国家政权及其在各省的代表机构所征收的赋税以及它们的各种敲诈勒索和军队的征调又该作何解释呢？1927~1949 年间的中国农民阶级经常接近人类灾难的最底深渊。但在如此之深的苦难中，怎能主要是指责社会制度以及穷人和不太贫穷者之间那不可避免的不平等性呢？城市中的特权阶级极力避开的这些苦难并不仅仅是旧制度时代中国所特有的一种社会制度的结果，因为这种社会制度并不比许多其他制度坏多少；它是 50 多年历史的终结点，是由人员和财务向开放口岸流失、过去的生产活动转化成现在的非生产活动（鸦片、烟草、投机、军队……）以及与外国资本介入有密切关系的人治制度造成的，归根结蒂是中国社会自 19 世纪末以来逐渐异化的产物。

农民革命家和日本侵略满洲

蒋介石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扩大和维持他对党和整部国家机器、军队、警察、财政的控制，另一方面则是为新政权建立一支强

大的军事力量。国家支出的半数都被用于军队的装备以及与残存于中国南部和西部的独立军阀作战。但他的另一个对手很快就出现了，这就是先在江南形成并由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协会，后在江西东南瑞金地区建立的农村苏维埃政权。在1931~1934年间，蒋介石为围剿瑞金的苏维埃共和国而发动了一系列征战，而其第五次即最后一次围剿在德国顾问和外国借款的帮助下成功地摧毁了苏维埃政权。

正是从这个时期刚开始，发生了中国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日本于1931~1932年侵占了东北。正在集中全力与“共匪”作战的蒋介石，接受了这种无可避免的领土沦陷，这一大片领土毕竟长期以来就受到日本资本的侵略，而且那里的军阀也常与日本勾结，再说张学良也才刚刚归附了他。此外，正在组建中的国民党军队当然也无法对侵略者那经过良好训练和装备精良的部队进行直接的正面抵抗。对一个刚开始巩固的政权来说，一场冲突就可能造成致命的失败。但是，日本侵占的这片领土却比法兰西还要辽阔，居住着4000万人口，拥有良好的港口和煤矿以及整个东亚最密集的铁路网。这次入侵会明显增强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为日本确保了一个难得的征服中国的战略基地；它可以迫使民国政府实施绥靖政策，并且面对日本入侵华北的推进而节节撤退。

由于日本军队侵略满洲对蒋介石政权之命运的威胁以及它可能对中国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将此视为这个时代中国史中最重要的事件。

552

事与愿违，国民党政权对于自由派和革命派的进攻，反倒促进了极端激进派的成功。事实上，令人瞩目的是，继军阀混战时代所出现的最多样化的政治文化思潮之后，从1928年起却越来越显示出共产党人在政治反对派中和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入侵所采取的绥靖策略以及农村民兵的爱国斗争，可能最终使越来越广泛的反对派大众转而支持共产党了。

共产党人取得了最终胜利，所以事后来看，就会赋予其建党初期和广州时期（1923～1926年）一种远远超乎事实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由某些关心在通商口岸组织发展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所创建的一个政治小派别。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忠于由其苏联顾问强加给它的准则规范和从根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莫斯科发出的遥控指示，那末他们可能就永远无法获胜。事实上，正是某些先验的观点在这第一个阶段期间于党内居主宰地位，同时还存在一种静止不变的观点，认为只有一条道路才能通向革命，这就是俄国曾经历过的道路。对无产阶级革命志向的绝对信仰，再加上对农民阶级的深刻不信任，这就是共产主义正统的基础。由此而必然导致了共产党与国民党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暂时结盟，其目的在于等待工业资本主义的酸果子在中国成熟。这样一种政策当然会导致共产党被镇压和工人领袖遭屠杀。一场农民革命运动在农村是因违背苏联的指示并与正统的腔调背道而驰才得以发展起来的。大家在中国所发现的不是根据西方的陈旧传统和确保十月革命夺权的突发性城市起义，而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漫长过程。

农民协会和从1927年形成的农村苏维埃的主要领导人，与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市民的中共第一批领导人（1880～1942年的陈独秀曾在日本和法国学习过，1889～1927年的李大钊曾先在一所北洋军校中受训后又留学于日本）有所不同，他们都是中国内地省份中的人物，从未涉足国外：朱德于1886年出生于四川一个佃农家庭，毛泽东于1893年诞生在湖南长沙附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唯一的例外是周恩来，他出生于1896年，曾赴日本、法国和德国留学。农民共产主义运动远离受到西方影响渗透的大城市那很虚幻的环境，而与中国社会最真实的革命传统相联系起来。实践取代了理论，而对于农村的剥削制度与开放通商口岸的资产阶级（他们自己又与外国资本的控制不可分割）的政治统治之密切关系的直

553 观也代替了推理论证。为了冲破这种恶性循环,则必须确保农村社会对于城市社会的胜利,因为农村社会是外国资本和中国资产阶级双重压迫的受害者。为了达此目的,根据迫于形势而采取的必要策略(这种策略的中心在1927~1934年间与国民党政权对抗时,被置于社会公正方面,后来又被置于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爱国战争方面),则必须有坚强的领导和不可征服的毅力。必须在战斗中逐渐造就最适于领导职务的人才。为此则必须不知疲倦地教育和灌输。由此便既可以通过一种典型的中国方式来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思想中的抽象概念和理论以及特别注重实际的特征,又能解释它在西方人心目中那表面的软弱性了。

四、从日本侵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日本在1937年7月从东三省发动的大规模侵略以及在8月间对上海不宣而战的大轰炸,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就是国民党政权衰落和抗日运动高潮的时代。

重庆时代

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末撤退到汉口,然后又撤退到长江三峡之外遥远的四川重庆,而日本军队则在此期间占领了位于黄河以东和以北的全部省份、直到洞庭湖的整个长江流域以及位于郑州—广州铁路线以东的全部大城市。侵略以及此后对它发动的抵抗战争,引起了大量难民的逃荒和惶恐。在1938年末~1939年中期之间,遭到日本飞机疯狂轰炸的古老省城重庆的人口从20万增至100多万。对于该政权来说,断裂太快了,它突然失去了其主要收入来源——关税及向现已被日本占领的地区征收的税额。它与经济大都市上海、构成其政治基础和支持者的金融以及国际环境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了。该政权流亡到了实际上完全陌生的中国内地——重庆。它不再占有由中国银行收回的资本以及外国为它提供

的最初有严格限制的援助，特别是苏联的援助（苏联直到抗战胜利都不理睬农民共产党人，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在1937~1939年间高达2.5亿美元），此外还有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援助。但日本1941年12月7日对珍珠港的袭击却使中国国民党政府从此时起足以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当然，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的20多亿美元的美援，若与美国拨给反击德国及其盟军的所有参战国的总额达500亿美元的援助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但这笔巨款在重庆国民党中国那种可怜的经济中却占据着很大份量。在确保其政权苟延残喘的同时，美援对于该政权也具有深深的腐化作用。

中国的制度随着一部巨大官僚机器和一支膨胀军队（其兵员一度达到500万人）的发展而暴露出其寄生特征。它很快就受到了极容易爆发的通货膨胀之制约。由此而产生了物价越来越快的飞涨和中国钱币（圆）的迅速贬值。

1944年，圆的价值与日本入侵前相比贬值到了其五百分之一。货币的崩溃、外国的援助以及美国的插手（这种插手因其军事基地、飞机、仓库、运输工具、广播设施而显得空前重要），均诱发了投机、权力交易和腐化。旧的特权者中的一部分（该政权的小干部、教员），归根到底是所有那些因其地位而使之无法通过非法手段发财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之中，他们对国家政权越来越感到疏远陌生和忿忿不平。

由于军事行动很少奏效，再加上蒋介石对正和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斗争的共产党人的支持者们之顽固不化的仇视态度，这种不满情绪被进一步激化了。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士兵和干部被1931~1934年的围剿击败了，他们于1934年10月间向西撤退，并通过川西山脉而到达陕北。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下，那些进行12000公里长征的人被迫在最荒凉的不毛之地打开了一条通道，写下了中国共产主义的一部伟大史诗。他们出发时有10万余人，但仅有7000~8000人到达了目的地。幸免于难的共产党人很

快就把延安变成了一个苏维埃新基地的中心,组织了抵抗占领军的斗争,并不断地在农民阶级中征募新的支持者。蒋介石于1936年被迫与共产党人合作,两年后却又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只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他才违心地和有保留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受了统一战线原则。

1946~1949年间的内战

日本在1945年8月的投降骤然改变了全部现状,似乎为蒋介石政权注入了新的生气。收复由日军撤退出来的一大部分领土、还都南京、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参加一系列国际会议,这都掀起了一时的狂欢。该政权得到了所有国家的支持并且拥有一支被美国装备得非常精良的大军,只需一劳永逸地摆脱“共匪”了。这样一来,1946年便爆发了当代历史上最大的内战之一。

敌对双方彼此具有根本性的差异。与以寄生方式靠国家过活、抢劫和在农村敲诈勒索的传统型大军相对峙的,是其兵员要少3倍的、与农村的平民百姓结合在一起的、进行消耗战和突然袭击以及在有限地域内战斗的农民军队。日本的失败对他们并不像对掌握了重要运输便利条件的国民党军队那样有利。即使是在共产党人抵抗日本占领军的地下斗争期间,于那里牢固立足的东北地区,国民党军队也得以在苏联军队撤退时夺取了主要中心地区(苏军是在将这个工业区的工厂设备拆卸成零件并全部向西运走之后才撤退的)。然而,国民党人的优势主要是表面性而非实质性的,他们的交通运输线延伸得太长,其军队只占据着城市。该政权也无法根治其弊病。随着战争时间的拖长和游击队战术优势的形成,该政权便被越来越深入的民主化摧毁了。当农民游击队重新集结成大军,而且其军纪和战斗力使之获得了首批重大胜利时,整个公众舆论都向共产党人一方偏斜了。1947年中期,红军在东北转入了反攻,

并将国民党的力量孤立了起来。1948年,红军夺取了河南的洛阳和开封,然后又夺取了山东济南。红军于是便进入了反攻的最后阶段,大兵团开始调动,其全部装备均来自战利品,部分兵员也是由携带武器和辎重投诚的士兵组成。在1948年9~10月的反攻期间,整个东北都被解放了,国民党人损失了40万兵力,其中一部分是他们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大决战是于1948~1949年冬季在徐州地区(江苏北部)爆发的,国民党的55万军队失去了战斗力。进入北京和天津的共产党军队又于5月间攻克上海,并于10月间进入广州,于11月间进入重庆。国民党政府逃亡到台湾避难,而中 556
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建立。

大家都说民族感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原动力。其实,这种说法只是对最近的阶段,亦即抵抗外国占领军的战斗阶段才适用。中国的爱国主义在过去始终是一种无力的向往,它主要由学校里的青年和知识分子所代表;而这些人长期以来却被剥夺了能够表达其思想的唯一手段,即独立于外国利益的人民军队。在日占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农民和红军士兵结成了联盟。由此而产生了其力量、成功以及对解放运动的广泛同情。在20世纪前30年的政治动乱与江西和延安时代的农民苏维埃组织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它把梦想与现实(即在引进的思想和破烂堆中寻求救国真理的知识分子之惶惑)分开了,并把梦想与在将这种梦想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战士们(他们都与农村的人民建立了联系)的信念区别开了。

第三章 哲学和文学的发展

557

西方的影响在19世纪以弥散方式产生作用,刺激了儒家学派的革新和正统派的反对;而20世纪上半叶的整部中国思想史均受到西方外来因素的主宰。但大家不应该误解这种现象的意义;这种

563

与中国传统具有深刻差异的外国传统的大举入侵,仅仅是中国社会异化的表象形态之一。此外,它也与做为中国这一时代之特征的受尽凌辱和惊慌失措的背景不可分割。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强加给中国的一切灾难所造成的一系列低贱地位的受害者。这些灾难包括:马关条约、占据“租界地”、辛丑条约、以中国仅有的正常收入作抵押的借贷、把铁路出让给外国人、巴黎和会将德国原来在山东占据的地盘转让给日本、上海租界的巡捕于1925年5月30日的开枪屠杀(死13人)和同年6月23日在广州的大屠杀(死52人)、日本侵占东北诸省……更不用说中国人每天都在国内国外忍受的侮辱了。这个时代的文化生活是与政治史水乳交融的。

558

西方思想的浸透于20世纪初叶就已在哲学领域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了;随着旧制度下士大夫阶级的消逝和一个新知识分子阶层的发展,它变得更加严重了。由于这些新知识分子是在日本、美国和欧洲;甚至是在中国本土上的那些由外国人执教的学校或教育机构中培养出来的,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转而赞同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居住在由于外国人的存在而呈现出虚假繁荣的开放通商口岸。许多知识分子以及追随他们的学校青年竟然发展到认为拯救中国的出路在于全盘摒弃所有传统并系统地模仿西方。由此而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求知热潮,还有思想和理论方面的一种无政府状态的大沸腾。从西方零散地、随机而偶然地和极其混乱地传入的东西,均受到了热烈欢迎。可是,他们在数十年间却无法与一整套文化遗产直接接触。尽管他们失去了根基并形成了暂时的迷恋,大家却会发现他们仍是通过原有传统的棱镜来解读这一切的。当然,永远不可能有任何借鉴看上去不像地道中国思潮的延续。

我们可以相当容易地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中区别出三个阶段来,它们与政治史的分期相吻合。第一阶段从1900年左右到旧制度消亡,它是以一种适应努力为特征的,而这种适应又反映了当时取得极大成功的程度不同的变法倾向。这个时代的最著名

知识分子仍属于正在消亡中的旧士大夫阶级。第二个阶段相反却是大混乱和西方的影响在中国开放口岸造成大震荡的时代。这种令人震惊的汹涌大潮在相当于蒋介石专制期的最后一个阶段中逐渐平息下来了。罗曼谛克的个人主义以及对资产阶级西方之不得体的模仿,面对马克思主义那缓慢而又扎实的进展而黯然失色了。艺术和文学要为革命服务。在政治发展的促进下,情况开始变得明朗化了,中国似乎重新找到了其思想凝聚力的道路。

日本的影响和进化论哲学的发现

正是诸说混合论的倾向形成了 20 世纪最初 10 年政治、哲学和文学运动的特征。此时正值激进程度不同的变法维新获胜的时代,其捍卫者和代言人仍属于消亡中的旧制度下的士大夫阶级。他们无法理解自从马关条约以来,尤其是自从中国被划分为势力范围和义和团事件以来,中国的悲惨命运便在劫难逃了。连最优秀的思想家们也都认为日本的道路(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调和的道路)仍是可行之路。这种幻想无疑源于中国的政治机构尚未崩溃的事实,当时还存在着一个内地的中国。于是对于那些无论其倾向和根源如何的变法维新者来说,其地理方位和文化更接近中国的国家——日本便显得在一切领域中均可被奉为楷模(教育、军队、制度和公共伦理)。由于大批中国留学生前往日本的大学,技校或军校中完成其教育(大家估计其数目在 1906 年左右为 1.5 万名),也由于政治流亡者从日本各协会和明治政府方面得到了欢迎(从 1989 年起便设立了“东亚文化协会”,以便扩大日本在远东的影响),还由于日本在 1905 年战胜俄国军队和舰队之后所增长的威望等,日本的影响又得到了加强。中国学生经常正是通过日文译本而在这时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学和哲学作品。 559

革命派和共和制的共同策划者们也从日本得到了某种鼓舞,但他们仅仅代表着边缘性的、少数的和秘密的思潮。相反,维新变

法者们(也就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的支持者们)当时却在文化界和青年中具有最广泛的影响。他们的代言人是梁启超,此人看来是一位优秀的论战文作家。他自从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便亡命于日本,并在那里展开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试图以其在报刊中发表的文章、抨击性短文和著作来鼓励同胞们分析中国衰落的原因,从而吸收当时的新思想并使之适应于中国传统,如进化论、自由论、创业精神、崇尚科学……最重要的是造就一代新人,因为弊病来自大家都惯于受辱的心态,必须用竞争的和斗争的精神、民族主义和不调和行为、以及西方诸国和日本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品德来取代温顺、驯服、容忍的思想,取代与已消失的和过时的文明类型及政治制度相联系的传统伦理。

我们在梁启超的一位同代人身上又重新发现了对深刻改造公共伦理之必要性的强调,此人就是福建人严复(1853~1921年)。他在接受了传统教育之后,又曾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在那里学习了英文并接受了技术与科学培养。当严复在英国皇家海军大学学习时,他发现了达尔文(Darwin)和斯宾塞(Spence)的著作。他非常注重英国的法律和制度,在19世纪末年返归中国后便成了英国进化论哲学著作的最早翻译家之一。他于1898年翻译的赫胥黎(Huxley)的《天演论》(本意为《进化与伦理》)使其名噪一时,接着便是1900~1910年间的一系列其他译著:斯宾塞的《群学肆言》(本意为《社会学研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本意为《国富论》)、穆勒(Stuart Mill)的《群己权界论》(本意为《论自由》)、孟德斯鸠(Montesquien)的《法意》(本意为《论法的精神》)。

560 严复所谓“信、达、雅”的译文,是用很讲究的文言文形式翻译的,充满了文学隐喻,有时还非常含混,其中并附有他个人的注释。它们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向时人灌输了一种认为物竞天择不仅是被强加给动物界的法则而且适用于各民族的思想。严复及其同时代的人对于达尔文进化论和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学的这种兴趣,

确实有一种政治背景，上述学说为传播一种受到西方启发的公共伦理学提供了佐证：尊重个人、自由、民主将逐渐深入到中国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中。

这里并不是在抄袭西方，而是受到了西方的启发，这种意图在其形式本身中就已很明显了。严复的译本是用文言文翻译的，并夹杂着个人的看法，同时，西方文学著作的第一批译本也都是以文言文出版的。实在说，这更应该是编译而不是真正的译本。它们应被归功于严复的一位同代人——福建人林纾（1852～1924年）。林纾在19世纪末很快就名倾学界，因为他翻译了大仲马（Alexandre Duma）的《茶花女》。林纾根本不懂任何外文，只是根据别人的口译而采取了非常自由的译法，他共译出了160多部西方小说，其作者也林林总总：司各特（Walter Scott）、笛福（Defoe）、狄更斯（Dickens）、塞万提斯（Cervantes）、易卜生（Ibsen）、雨果（Victor Hugo）等等。

新内容与传统方式的这种结合，构成了20世纪初两位主要翻译家著作的特点，而它也出现在文学创作中了。在1900～1910年间，共有1000多部小说问世。所有的小说均与维新变法运动有关，它们受到了关心国家命运之思想的启发，旨在进行社会和政治批评。但它们始终因为分章回叙述情节、人物的多样性和现实主义而沿袭了18和19世纪中国小说的主要模式。其中最著名者为大文豪刘鹗（1857～1909年）的《老残游记》（1902年）、吴沃尧（吴趸人，1866～1910年）在1900～1910年写的30多部小说，李宝嘉（李伯元）的以当时的腐化官场为靶子的著名小说《官场现形记》等等。

西方的人侵

从1915～1917年起，政治和文化气氛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思想动荡、知识界沸腾、西方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入侵之重要时代的最早先兆。此种现象从1919年起达到了顶峰。文化生活变化的

原因无疑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应将其分别归于由封建王朝的旧士大夫阶级的消亡而引起的反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行径(占领山东领土、二十一条、日本对中国经济控制权的扩大)、因滑稽模仿议会民主以及袁世凯复辟帝制并重新尊孔的独裁而引起的失望、在外国特别是西方培养的留学生数目的增加。但我们首先感到在这个时代似乎产生了很深的代沟。这场运动是由学校的青年与从国外归来的学生们发动和开展起来的。

越来越多的曾在日本、欧洲与美国学习过的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传统感到了深深的羞耻。在中国的败落状态中,无论是传统的风俗习惯还是文人的文学艺术,旧中国残存下来的一切在他们看来都像是一幅令人厌恶的讽刺画。与过去的历史作任何妥协都变得不可能了,而必须与中国的所有传统断绝关系,以使中国超越其精疲力竭的状态,唤醒尽可能广泛的民意。

这场即将锻炼青年学生和居住于开放口岸(内地则由于其苦难及其孤立处境而实际上始终被抛弃在一旁)的那些不同程度地受西方影响的新知识分子的运动的最早表现,是创办了杂志和成立了文学会。其中最早和最主要的杂志是1915年陈独秀(1880~1942年)在上海创办的。陈独秀原是在日本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后来于1921年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该杂志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新青年》,其法文标题为 *La Nouvelle Jeneusse*。陈独秀的第一篇文章是《敬告青年》,它像是对中国伦理传统的一场宣战,因为中国的伦理与西方的主观能动性和创业精神处于全面的对立中。两年后,该杂志又发表了一位名叫胡适(1891~1962年)的年轻留美学生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此文的目的在于提倡对文字运用习惯进行彻底改良,他主张在使用文言文的传统领域中放弃它,取消陈词滥调和文学隐喻,使用受口语启发的一种简单而直接的语言(白话文)。从这个时代起,白话文的使用便取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至于陈独秀,他也由衷地呼唤一种革命的、生动的和

现实的文学。

在巴黎和会宣布将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之后,北京的大学生们发动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最终推动了极端激进的政治和文学思潮的发展。接着出现了其他的游行示威、罢工和抵制外国货的活动,它们都表达了一种不满情绪,这是由于对在1917年加入了反德联盟的中国之主权造成的新伤害煽动起来的。北京的大学生们的首倡标志着一个政治动乱时代的开始,而军阀政府所采取的镇压措施更加速了这种动乱。政治和文学社(俱乐部或协会)成倍地增加,正如那些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短命的杂志一样。西方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了。译著越来越多,在互相对立的哲学观点的支持者们之间展开了辩论,模仿欧洲范本的一种新小说也出现并发展了起来。

这种文化界的沸腾在其深层上要比表面的判断更混乱和更复杂,它不应被总结为受西方思想影响(科学、民主、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的一次爱国主义大爆发。它源出于中国社会的异化,表达了青年一代和知识分子的失落和不适应,这些人深深感到了使之受害的各种矛盾。仅就行动的愿望来说,这是面对无出路的形势的逃避、失望、自省和病态的浪漫主义,它们都在哲学观点和文学著作中表现出来了。气质和教育的差异、继承自中国传统的思潮与受外国影响思潮的复杂性,这一切都导致了人员的千差万别以及学派和倾向的丰富多彩。 562

产生这种西方生活方式及思想入侵的背景本身,就解释了以下问题:为什么当这种狂热减落之后,便再没留下很明显的痕迹。1917~1928年期间的许多文化思潮都以其短暂的和人为的特征而引人注目。它们的成功多应归功于中国和西方传统的某些接触。这样一来,大家便会在柏格森(Bergson)的哲学和王阳明的心学之间、在英美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和 中国文人的某些典型态度之间、在道教和达尔文主义之间发现某些相似性等等,而这些相似性

已由作者们自己指出过了。

和 20 世纪初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影响占了主导地位,因为英国人已在中国立足并在美国培养出了大批中国留学生。他们中的胡适向中国人介绍了其老师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年)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于 1919~1921 年间邀请他赴华访问。英国的新实在论者和逻辑学家罗素(Bertrand Rusell)也于 1920~1921 年间来华。德国和法国在华影响的程度则要略逊一筹。1917 年在北京大学搞改革的蔡元培(1868~1940 年)曾赴柏林和莱比锡求学,他翻译了鲍森(F·Paulsen)的《伦理学》并撰写了《中国伦理学史》(1917 年)。他的做法又促进了大学者和大史学家王国维的治学活动。王国维于本世纪初叶在其《静安文集》(1905 年)中最早向中国介绍尼采(Nietzsche)和叔本华(Schopenhauer)的德国唯意志论。我们还应该指出与秘密会社的平等概念有关的一股无政府思潮。它很早就 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所创办刊物《新世纪》(1907~1908 年)中表现出来了,该刊物的创始人是蒙特佩里埃生物系的一个学生李石曾。他生于 1882 年,是克鲁泡特金(Kropotkine)著作的翻译者。1922 年来到巴黎的作家巴金,在其青年时代也曾赞同无政府主义运动,并为其笔名取了他崇拜的作家巴库宁(BaKounine)和克鲁泡特金各自名字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节。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曾形成了统一,但接着便是一个激烈争论的时代。伦理学家们和一种纯科学社会观的支持者们互相对峙。反对西方商业和机器文明的批评声甚嚣尘上。最早的批评是梁启超于 1919 年从欧洲归国后提出来的,后来又由生于 1893 年的梁漱冥在其有关东西文明及其哲学的比较研究论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作了重复和进一步发展。该作者在其书中把使主观愿望适应于经济和社会需要的中国传统视为人文主义的一种最高形式,它与据他认为是形成了西方文明之特征的矛盾激化以及其传统在于灭我和除欲的印度社会的过度逆反行为形成了对照。但这些学

术辩论很快就让位于革命派和地道的大学教授们之间的根本的对立了。1928年,其影响自1917年之后曾占过绝对优势的胡适,看来已过时了。接力棒由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之一郭沫若(生于1892年)接过去了。

在文学领域中也产生了一种类似的发展,它在1917~1928年间也以其丰富而又极端错综复杂的倾向为标志。该时代最伟大的小说作家鲁迅(1881~1936年)又是评论家和论战者,同时也是果戈里(Gogol)、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卢那察尔斯基(Lounatcharski)、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s)以及日本、波兰和匈牙利作家们之著作的翻译家。除他之外,我们还可以计算到大批才华卓绝的作家:叶圣陶(生于1892年)、郁达夫(1896~1945年)、茅盾(生于1896年)、巴金(生于1904年)、女小说作家丁玲(生于1907年)……他们的那些灰暗并且常常是悲惨的著作,表达了愤慨或失望的心情。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与半殖民地中国所受的压迫以及作为帝国主义之母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关的大发现,发生在1919~1920年间。这是一小批知识分子的活动结果,其头面人物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888~1927年)。自鸦片战争首次受到攻击以来,解开中国社会特殊历史的钥匙是由人类史的一种全面解释提供的。中国又重新获得了在其伦理和传统观念破灭时所丧失的这种普遍意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崇拜个人、宗教的不宽容性、为自己谋利、自由选择职业)以及中国社会存在两种相反的深刻倾向的原因,突然间均同时变得明朗化了。当然,许多相似性都解释了中国非常迅速地受马克思主义吸引的原因。由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任何超出人类认识之外的现实均采取否定态度,所以它似乎就更符合中国思想的一种定势。那种出于一种社会—经济学的辩证法而认为人类从原始共

产主义发展到未来社会主义的五阶段理论,使人联想到了公羊派有关“大同”的末世观点,该学派由其时代距当时尚不太久的康有为代表。它也使人联想到了17世纪中国哲学的某种历史观,其影响从未中止过。太平军在19世纪中叶实施的消灭私有财产的做法既符合中国革命传统的深远向往之一,也与某些更古老的国家传统相吻合。在所有的西方哲学中,马克思主义无疑距中国思想之基本方向最近。

此外,共产主义也让人看到了某种行动的可能性,并且提供了与中国秘密会社相似的革命组织模式。苏联的帮助似乎更坚定了这些希望。

无论如何,共产主义在中国可能适应了非常特殊的如下国情:辽阔广袤的农村地区、失去了经济独立性、受可怕贫穷化的伤害、过于软弱和悲惨的工业无产阶级在其中未起任何决定作用的社会背景,同时还有从1927年直到1949年最终胜利的持续武装斗争(在日本入侵前后是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日本占领时是与日军的战争)。如果中国共产主义首先表现为农民、军人和爱国主义者的信仰,那就应将这一切归于上述特殊背景。

新信仰的第一批信徒付出了最早牺牲的代价。那些坚信可以在开放口岸开展工人运动的人受到了中国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家的联合抵抗,而他们却在莫斯科指令的压力下自愿地或违心地与其天敌结盟。在李大钊于1927年被北京军阀政府处死之后两年,被克里姆林宫不顾其不情愿而强迫他负责政治事务的陈独秀遭到党的开除。城市的知识分子只好让位于农村的那些默默无闻的战士,日常的活动取代了那些正统的理论。

从蒋介石就任起,一切似乎都起到了有利于共产党人的作用:国民党警察对自由人士的迫害、民国政府面对日本入侵的消极性、为反对与由共产党人代表的抵抗运动之间的摩擦、蒋介石政权的腐化和越来越快的衰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

来越赞同马克思主义了。所有的人都在接近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在 1935~1945 年间成倍地增加,最受欢迎的热门作者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布哈林。文学已接弃了它曾受到的“资产阶级”西方的影响;反省、怀疑和罗曼蒂克般地赞扬个人都不再时髦了。它倾向于变成一种为革命服务的武器,并由于延安的主观努力而被鼓动走上了这条道路。毛泽东正是这样于 1942 年确定了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革命功能,他还告诫作家们,要尽可能地借鉴中国古老传统中的那些可被用于现实斗争的因素。

历史科学和精确科学

565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发生了时代的悲剧,而且生活条件也极不稳定,但中国的学者和科学家却仍在继续他们的研究和努力,以在中国发展科学教育。中西传统之间活跃的交流以及跟欧美学者建立的联系,对于在混乱和苦难中从事的这种令人惊奇的坚持不懈起了很大作用。但中国能保持其科学传统,主要应归功于其科学家和学者们的爱国主义。

在中国表现得极其早熟并且自 17~18 世纪以来就拥有一种坚实科学传统的历史学(历史、金石、考古)和语言(训诂)学领域中,某些重要发现对科学研究作出了新的推动。它们包括:从 1899 年起对第 2 个千年纪末的甲骨文碎片的发现、从 1927 年起对河南安阳最后商都遗址(公元前 14~公元前 11 世纪)的发掘、从 1900 年起在甘肃西部敦煌附近对非常丰富的 5~10 世纪的纸卷特藏的发现、从 1906 年起在敦煌和西蒙古的居延地区对汉代木简和竹简(公元前 1~公元 1 世纪)的发掘出土、北京皇宫的明清档案(15~19 世纪)的开放。其中的内容足可以使对中国社会最遥远的过去、金石和考古知识、文学史、宗教和艺术史的整体历史视野焕然一新。

那些合作利用这些新资料并极力在中国文明的丰富遗产中找

到与西方传统具有相似性的某些被忽略的传统(民间文学、戏剧、辩证学、逻辑学、佛教玄学……)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并属于所有的政治层次。但是,他们中的最著名者均属于浙江派,是18世纪考证学派的继承者。在1900年左右,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为俞樾(1821~1907年),他是史学家、文学家和关于公元前4~3世纪中国哲学方面的专家,其名望一直远扬日本;孙贻让(1848~1908年)是有关第2个千年纪末的金石文的最优秀专家之一,也是对收藏于日本的汉文著作进行过精心搜求的书目学家和墨子著作的刊布者,更是近代浙江学派的推动者。20世纪上半叶考证学派的最著名和最后的代表人物是章炳麟(1869~1936年)。章炳麟出生于杭州,曾是孙文和黄兴的朋友与盟友(他们三人曾被奉为“革命三尊”),同时也是俞樾的弟子。他在一段时间内曾受康有为变法改良思想的吸引。但当他于1899年到达日本并在那里结识孙文之后,便不失时机地转向反对君主制的阵营了。

566

罗振玉(1866~1940年)和王国维(1877~1927年)也应同属于浙江学派。罗振玉年轻时很关心据他认为是治国之本的农学问题。在马关条约之后,他为研究东亚文明而创建了一个学社(东文学社),它具有某种实际的目的并邀请了某些日本教授加入。他在1909年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去国并在1912~1919年亡命日本。罗振玉于1925~1929年间任原宣统皇帝——年轻的溥仪的家庭教师,后又在日本人扶植的满洲国中任职。他是从事敦煌写本、甲骨文和故宫档案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另一位死心踏地的保皇党人王国维于1898年加入了上海的东文学社并在那里修习了日文和英文。他于1902年在日本学习物理,归国后先在南通、后在苏州师范学堂教授哲学,并于这个时代发现了德国哲学(康德、叔本华和尼采)。他对清王朝1919年的崩溃痛心疾首,遂和其朋友罗振玉一样亡命于日本。于是,他放弃了西方哲学回归考证学传统,发表了有关宋元戏剧史(1915年)、经典、史

学、周代青铜铭文的著作。大家应该把对于敦煌和居延出土的汉代文献、安阳甲骨文和敦煌写本的研究论著归功于他。在同一时代，另一位史学家以其考证的方法和历史编纂学的观点而大大地促进及革新了有关古代中国的视野，这就是顾颉刚（生于 1893 年），他曾是章炳麟和胡适的朋友。

虽然精确科学领域中的教学和研究的发展不大为人熟悉，但无疑其成绩却更为辉煌。它主要应归功于部分在中国和部分在外国（特别是自 1927 年后的美国）培养出来的学者们的推动，他们极力培养弟子、创建学堂和实验室。中国的科学在许多领域中都由于他们而达到了国际水平。丁文江（V·K·Ting, 1887~1936 年）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创建于 1922 年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所长，他于 1929 年又出任中国古人类研究所所长（1929 年发现了北京猿人）；数学家陈省身（生于 1900 年）和曲线几何的先驱者之一周炜良（生于 1911 年）、生物化学家吴宪（1893~1959 年）、物理学家严济慈（生于 1900 年）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的老师吴大猷（生于 1907 年），都为国防科学发展作出过举世公认贡献。其中的某些人，如原子物理学家钱三强（生于 1910 年，弗里德里克和居里夫人的弟子），如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研组织和军事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575 **第十一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新篇章**
章

567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起,到其缔造者和鼓动者毛泽东于1976年9月去世为止的四分之一世纪,理所应当成了历史中的一个特殊时代。它是以悲剧性的动乱、深刻的危机和非常危险的人口增长为标志的。但要指出它在历史上究竟应占据怎样的地位,现在还为时尚早,因为这部历史仍在发展之中。

该时代与此时代之前的断裂是十分明显的,不可能否认使当今的中国与1919~1945年的中国有别的因素,更不必否认它与19世纪之中国的区别了。不过,在外行看来是崭新的东西,有时却与他们的想象大异其趣。现在总是与最近的过去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历过南京10年和中日战争的那一代人到本世纪末才会完全消失,而1950~1975年间的主要领导人也都是在蒋介石主宰中国命运的时代培养出来的。毛泽东本人生于1893年,他生前一直是江西苏维埃、长征和延安时代的铁腕人物。但他与较早的历史也有一些无疑更为微妙而又绝非不算强有力的联系。民间传统的平

576

均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向往,似乎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此外,组织观念、集体纪律、思想灌输、规模宏伟的大兴土木工程,甚至从大乱走向大治的惊人过渡,在中国都并不特别新鲜。无疑是在一种全新的范围内,某些国家性的传统以及某些伦理性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我们当代。尽管其内容已与过去完全不同,其国际背景也相差悬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将现代中国与其历史联系起来的因素却显得非常明显。大家长期以来对当代很容易出现的一些趣闻轶事过于敏感了,这是苦于缺乏资料,或被一种无所不在的宣传所骗。

新政权的创新特征

我们不应忘记使中国与苏联在1960年之后敌对起来的所有深刻分歧。新中国的所有制都是模拟和照搬苏联社会制度的,但569这却未能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忠实配角(这一点对于国民党来说却是真实的)。苏联在中国的影响甚至在新政权奠定基础时就已经很深了。在中国恰如在苏联一样,国家机构完全由党控制,而党则无处不在并领导一切,即使是在它无力这样做的地方也不例外。在政权机构、企业、农村公社、工厂、医院、学校、大学等方面均如此。即便党员并未享有如在苏联那样大的特权(特别是其小干部们的生活相当艰难),但入党照样也会包含许多利益。领导骨干是由最老资格的党员组成的,也就是那些曾参加过解放前的斗争的人。这些老年党员(干部老化的同样现象也出现在苏联)与大批新加入者不一样,后者仅占据较低的职位,或只完成一些执行者的任务。在这种臃肿的等级中,晋升的唯一标准是忠于党和政治上的正统。因此,中国和苏联的政治制度具有一些基本的相似性。正是这一切导致某些当代问题专家们预言,中国一旦平息了1950~1975年间的大动荡,便会经历一种类似苏联的发展。

然而，中国的新政权在其整个初期都显得极其奇异，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对理论说教和思想改造的重视，另一方面是由于某种程度的革命浪漫主义。在1950~1975年间，中国人的生活不停地动荡，有时甚至被一系列的连续“运动”搅得天翻地覆。这些“运动”的目的在于通过坚持不懈地使用一切媒体（告示、报纸、电台、展览和研讨会）来动员全部或部分人口。在家庭和工作现场组织的无数会议中，每个人都必须揭发其亲属和同事中的反对派、消极者和具有独立思想者，否则将会冒严重惩罚的危险。即使是对自身最微小的错误，或对党缺乏忠诚，皆必须进行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的形式一般为：学习班（学习毛著或《人民日报》社论）、思想检查、坦白或认罪。据认为，思想批判可以保持很高的“政治觉悟”并破除人们的反抗精神。由此，广大民众都自动地从其内部消灭了“反革命分子”，并以鼓动性的和不断竞相许诺的方法来自我改造。

570 大家完全可以说，自1950年以来，新中国的主要活动是一种宣传和思想灌输运动，这种运动的物力和人力代价从未被作过估算，但肯定相当昂贵。直到毛泽东逝世，对于改造社会的重视几乎始终都要压倒经济发展和管理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解释“政治”对于经济的这种优先性呢？看来，中共党史不会与此毫无关系，比如宣扬以身作则并设法使人坚信是在农村扎根的，再比如无疑提供了一种较普遍模式的控制原先富农的村农大会（其目的在于促进由党控制的革命并改造人的思想）。但是，在把这一切归于毛泽东的气质及其占绝对优势之影响的同时，还应该归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特有的某些倾向。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就形成了某种对理想国的向往，而这类向往又应追溯到千年至福的古老传统。这就是对“大同”或“太平”的向往，它们从一开始就影响着太平天国起义并于19世纪末叶被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作了清晰阐述。这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统一社会，其中的一切均属于所有人，与官吏主宰一切的社会完全不同。这是一种随时代之发展而非常具有现代特色

的古老神话。这类向往均以下述愿望为基础：认定一切均属可能，而且只要希望就能做到。信仰超越了常识，党的观念超过了专家们的意见。这种唯意志论在李大钊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也是具有毛泽东那类气质的主要成员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所经历的危机和悲剧，其原因往往都是在执行过于雄心勃勃的指令时遇到的困难。这些困难引起了倒退，并使“政治路线”出现偏差，而且暴露了最高层领导的分歧。与要使社会迅速而彻底变化的人们相对立的，则是另一批深知仓促采取措施之危险性的管理专家们和要求一种更能适应人力的发展速度的支持者们。各种倾向间的对立导致了党内的派别斗争，他们各自都在设法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由于干部们的专权和不称职而在群众中引起的不满情绪。这些冲突在文化大革命时恶化成了一种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当时明显暴露出了党的机器的无比强大和青年人的独立向往之间的矛盾。在这些冲突中就如同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大家都非常随意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辞句，其目的在于表达对眼下反对派的思想评论，而不是为了表达对社会的一种客观分析。

一、从与苏联的结盟到决裂

中国的共持续 12 年的内战很快就以有利于共产党人的方式结束了，其原因在于蒋介石政权崩溃所造成的真空以及所有的人在经过漫长的苦难之后都渴望和平。此外，部分居民和大批知识分子还对红军怀有好感。共产党人远不像国民党军队那样抢劫和横征暴敛，他们与农民密切结合，并组织分配田地和消灭对贫穷者的剥削。此外，共产党人的军队确实是唯一能有效抵抗日本占领军的部队。组织纪律性、主张社会公正和爱国主义，为他们赢得了同情。但我们觉得，还是国民党政权的腐化、通货膨胀和全面的厌倦，更具决定性的影响了几乎全部人口都去支持新政权。

虽然共产党干部有时间为他们的新职责做好准备,但胜利对于他们来说似乎还是来得太快了。他们的经验仅限于农村社会和游击战。在几个月期间,他们就必须负责管理大片国土和庞大城市的政权。他们继承了一个悲惨的中国,同时又受到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平和最严重的工业落后之苦;那里自1937年以来便一直内外战肆虐,那里的人很久以来就习惯了不公正和腐化。然而,新领导人很快便成功地铲除了所有的反对力量,在各地都恢复了治安和纪律,结束了通货膨胀,使每个人至少都得到温饱、工厂重新开始运行并恢复了所有的铁路线。从1952年起,恢复重建工作已经完成。怎样解释如此之快的振兴和此后直到1958年的发展呢?它与苏联在1917年后遇到的漫长困难期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人的某些素质(吃苦耐劳、心灵手巧、互相帮助和组织意识)不会与此无关,但同时还有对独立的渴望和自豪感、一个长时间地和不公正地遭受歧视的伟大民族的爱国主义、许多人对新政权怀有的希望,最后是干部们的忠诚与守纪律、掌权者的坚定性以及谨慎的行为。

考虑到其人口之多(1960年为6亿多人口),共产主义革命所流的血并不像大家本来会预料的那样多。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新政权坚持不伤害原来的资产阶级,他们被联合起来共同努力重建公私合营企业。但新中国的领导人却将解放前在红区采取的措施扩大到了整个中国农村。从1950年6月30日起,全国农村人口被人为地重新划分为五个阶级类别(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村民们被鼓动到处控诉地主和高利贷主以及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并在乱哄哄的大会上要求严惩罪魁祸首,而且这类大会又经常导致暴力和立即处决。重新分配土地以使每个人都成为小片地产主人的做法似乎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在开始阶段,经常强调这种谨慎的做法,它表明了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这事实上只是迫于形势而为之,因为人民中国很快就转向严格地仿效苏联模式了。

苏联的模式

从1952年起,土地改革后由私人经营的田产则变成了互助组。而从1954年起,又出现了第一批“生产合作社”,它们相当于苏联的集体农庄。不过,就在土地集体所有制逐渐普及的同时,于1955~1957年又进行了一次巨大努力以发展重工业(钢铁、煤炭、石油、电力……)。在绝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面,中国采纳了苏联模式。此外,当时来自苏联的顾问和军事专家为数很多。当时要求农民阶级作出巨大的努力,他们既必须改变其习惯并养活由于来自农村的移民而迅速增加人口的城市,又必须为从苏联和东欧国家买来的设备付款,此外还必须供应某些工厂所需要的农业原材料。然而,中国在历史上毕竟首次开始拥有为其独立必不可缺的基础工业。这种开发从此就不再像在半殖民地时代那样仅仅涉及到了沿海地区,也不像当时那样仅限于消费工业了。为在内陆省份扩大铁路网而进行的努力也在向着同一方向发展。

但是,在1955~1957年间,这种压力毕竟太大了。必须对强制行为作一定程度的缓和,这一点似乎已被领导层所接受。因土地集体化而在农村引起的困难确实已通过产量下降而表现出来了。因此决定留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和主动性,因为农民们经常被从城市派来的干部们的不称职和专断行为触怒。那时又重新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了。这是自苏共20大之后在全体共产主义国家中刮起的一阵自由化之风,但当时的中国对此并不太敏感,主要是由于放松控制已成为必要了。到处都允许表达基层的要求,尤其是到处都在极力赢得知识分子的支持,因为当时半数知识分子都对政权怀有不满或带有很大保留。他们由于多次被迫参加的“思想改造”而变得非常谨小慎微,故一开始都拒绝像不断邀请他们去做的那样批评共产党方针的不足之处。为促使他们采取这样的决定,必须做出反复的和重压之下的鼓动。但他们一旦被鼓动起来,被称为“百

“花齐放”的那场运动却于1957年导致了一场对政权的真正指责。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揭露了他们在各级参加的民主“滑稽戏”：全部权力都由政治局的6名常委把持，事事和处处都是预先决定的，共产党在一切领域中的经常性干预妨碍了任何严肃的工作，那些决策者往往都是些只会以其驯服表现和炫耀其政治正统的手段来抬高自己的无能之辈，而工作和才能所得到的报偿远不如弄虚作假的所获丰厚。甚至还有人攻击苏联过去曾拆走了中国东北的工厂设备，而且对它向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提供的援助都要求偿还，连一戈比也不放过。这场运动成了文化革命时期的先兆，青年人在那场革命中如脱缰野马般地反对党内那令人窒息的专断。然而，在中国领导人中出现了普遍的震惊，他们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一种不满和对自由的深切向往。1957年6月末在武汉爆发的学生动乱使得重新控制局面变得迫在眉睫了。当局以激烈的方式巩固了共产党的权威，“百花齐放”的试验最终结束了，它共持续了5个星期。因此，知识界的自由化尝试转成与政府的对抗了。在农村中的情况也如此，控制的全面放松和自由市场的再生使得农民忽略了集体阵地而将其注意力转向了个人致富的门路。在那里，为了阻止该体制的崩溃，也不可避免地进行了急煞车，它不单恢复了旧有的局面，还成了一种狂热的并酿下灾祸的试验。

大跃进

已经对非斯大林化感到愤愤不平并被苏联人对中国蔑视触怒的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巨大的集体努力，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跃进”。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尝试，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改变城乡组织、在数年内赶上工业化国家，利用同一机会根除由于全面分权而出现的官僚主义。它表现了毛泽东的革命浪漫主义及其对于人民创造性的充分信任。毛泽东认为，如果说知识分子和农民利用了自由化措施转而批评政治体制并恢复传统行为，如果说一个特权官僚阶

级已经发展起来了,那是由于思想改造尚不很深刻,故必须做出一次新的和巨大的努力以彻底改造整个中国社会。在1958和1959年间,进行了一次神奇的全国总动员。在宣传和组织方面所做的努力是空前的。苏联式的集体农庄被放弃了,转而发展广泛得多的自主机构并取名为人民公社。这些公社分别集中了2000~20000 574 户人家,他们必须自我管理并要自行解决有关他们的所有问题:农业、工业、商业、社会事务和治安保卫工作……一切都被集体化了,连自1957年以来允许农民扩大的小片自留地也未放过。所有的个人财产,即使是那些私有的日常生活用品也都被废除了。家庭生活已消失,转而赞成发展集体生活。他们同时还想取消城乡之间的所有差别,并为此而做出了巨大努力以使乡村工业化:建造了小锅炉,利用了一切人的创造天才以及传统的技术。大家也极力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充分利用所有的土地并使灌溉规划成倍地增加。连有害于农业收成的飞鸟都被有步骤地消灭掉了。在所有的乡村中,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就是深翻土地和密植作物。其目的是为了在两年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的目标并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切似乎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1958年的特大农业丰收似乎证明了全部的希望。在当时出现的占主导地位的竞争气氛中,根据由那些希望获得另眼看待的干部们层层虚夸的谎报数字而编制的统计,令人再受鼓舞不过了。但1959年却歉收,狂热开始冷落,人人都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大跃进是对物力人力的一种巨大浪费,它对于工农业都具有灾难性。在一种最彻底的混乱状态中,到处都草草建立起蔑视农民经验的并被强行推广某些新生活方式,这徒劳无益地打乱了农村的生活。此后的两年是中国新政权历史上最凄惨的时期,继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之后,1960和1961年旱情又是灾难性的,中国又重新面对着它曾认为已经一劳永逸地排除了的灾荒:至少有1300万人死于饥饿,这比在过去的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另一种因素也进一步加深

了这场危机：苏联对中国的独立表现感到惴惴不安和怒气冲天，突然于1960年中断其援助，撕毁了技术和科学合作合同并撤回了所有的技术专家。中国由此而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国际孤立的阶段。

二、从与苏联的决裂到毛泽东的逝世

由于观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之历史的角度各异，看法也始终各不相同。但可能正是在促使中国摆脱苏联的控制及其模式的持续运动中，才能找到这部历史中最明确的因素之一。⁵⁷⁵

首先正是由于与苏联的结盟才促使中国很不情愿地在它刚解放不久，甚至在其重建任务还很急迫的情况下，参加了浴血的朝鲜战争。这场冲突在加剧冷战的同时，也更有效地密切了联结两大国的纽带，使中国投入了受苏联控制的国家阵营。1950年6月25日向南朝鲜发动的进攻立即使美国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美国向逃亡台湾的国民党残余提供了大批武器和资本，从而可能是人为地延长了垂死的蒋介石政权在不久前还为日本帝国所占领的台湾的存在。这就是所谓“两个中国”之虚构的开始，必须等到1971年才能使一个具有8亿多人口的国家进入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美国在将中国孤立于各国之外并在它周围建立了一个从朝鲜、日本直到东南亚的庞大包围圈的同时，也加强了中国的孤立倾向、强化了该政权并日益增加了中国对苏联的依附。中国当时在所有的领域中（工业、科学、技术、教育、对外政策）都完全依附于苏联，它从1950年与苏联建立联盟并签订了一项为期30年的“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苏联所提供的有偿贷款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家技术人员的援助，确实有利于经济的重建与恢复。但苏联模式却显然非常不适合中国国情（向大型工业联合企业的昂贵投资完全不适用于一个劳动力过多的穷国）。中国对苏联的依附形势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荒谬，它迟早要不可避免地结束。这场大转变发生于1959年左右。为了提醒大家注意，我们重提一下，西方的“毛主义”运动也正

是从中苏反目起才诞生的。

中国的第一次独立表现恰恰就是“大跃进”：决定超越通向社会主义的所有阶段并使用一系列从未尝试过的试验手段（人民公社、发展到极端的集体化、农村工业化……），这就是否认了苏联模式并进入异端。苏共 20 大、非斯大林化、和平共处，自 1956 年起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始表现出了一场大“解冻”运动，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都特别不对胃口。他们认为，在他们正为中国做出一种神奇的巨大努力时，根本谈不到放松自己的问题。与此同时，苏联一方的不信任和愤怒也在增长。早在 1957 年 10 月 15 日，甚至还在大跃进尚未被发动起来之前，赫鲁晓夫就宣布废除保证苏联向中国提供制造核武器所需手段的秘密协议（废除协议的决定直到 1959 年 6 月才正式通知北京）。苏联人认为大跃进像是一场大狂热。此外，苏联人也害怕中国人那好斗的任性情绪、中国人解放福建沿海的金门岛的努力、他们与苏联的盟友印度的冲突。在 1959 年对金门发动攻击之前，爆发了随即被平定的西藏大暴动，而正是西藏这个事件又导致了中国在 1962 年与印度的冲突。很快，中国便与苏联本身在有关沙俄掠夺的中国领土问题上发生了争端。如果说冷战密切了苏中关系，那末“和平共处”却产生了某些相反的作用。无论是在内政（有关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还是在外交关系方面，中国领导人都只能与他们很快便称之为“修正主义者”和“新沙皇”的人们分道扬镳。

1960~1965 年的短期恢复

1960 年，中国既须摆脱大跃进失败的影响，又要对付由社会主义国家在最严重时刻突然中断援助所形成的新挑战。中国几乎完全被孤立了，但它却能在无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应付逆境，重新表现出了实践方面的正确理性。从 1960 年起，他们便放弃了某些不受欢迎的标新立异之举：压缩了人民公社规模；恢复了“物质刺

激”，也就是说重新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允许技术人员和专家们讲话并尊重他们的意见。与这种方向的变化同时发生的则是领导班子的人事变化以及事实上排斥了毛泽东（毛泽东自1959年4月起便被刘少奇取代了其共和国主席一职）。在上层和在某些知识分子中，人们都用隐晦的词汇批评了毛泽东的冒进政策。大家认为，正是这种政策导致了灾难，现在应当纠正航向并优先发展永远不能质疑的农业。从此之后，全部注意力都转向农业发展、建立化肥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机械化方面了。不过，大跃进的后遗症尚未完全消除：农村的作坊和小工厂始终全部表现出了对于摆脱中央控制的关切，而这与苏联传统是背道而驰的。从1963年起，中国摆脱了饥荒，而始终承受着工业化沉重负担的农民也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略有改善。最后，从1962年起首次执行一种限制生育的政策，虽然它令人遗憾地只产生了很少的实效。因为，必须承认这个时期的中国领导人的功德（他们后来在文革中成了猛烈攻击的对象），他们懂得如何将中国从灾难性的处境中拯救出来。

577 但这个掌权的班子并不是在绝对平静中行使政权的。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仍保持着很大的威望，他在军队中得到坚强的支持，其原来的战友之一林彪从1962年起便极力在军队中推广学习毛泽东思想。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一全会上，毛派开始了反击。人民解放军及其英雄人物们都被奉为楷模。军人渗入了文职政权并在其中形成了忠于毛泽东的平行等级，但他们却受到了党的机构的消极抵制。到1965年末，毛泽东将其攻击方向对准了那些在大跃进中批评过他的人，或者那些曾以其态度表达了不同看法的人。首先受到围攻的是一些知识分子（主要是吴晗、邓拓和廖沫沙），大学生们在鼓动之下揭发了其著作在意识形态上的偏差。这场新“运动”本来会和前几次一样遭到失败，因为它遇到了党内的消极抵制，但它相反却在中学和大学中得到了广泛响应。它正由此才被称为“文化大革命”，该词主要是指其出发点。由于文化大革命向青年

人、向其热情和激情发出了呼吁，所以它导致了众所周知的那种奇特的大爆发。大学生和中学生们很快便受到鼓动，其攻击的目标已不再对准某些作家，而是对准党的整个机构（这是毛泽东的真正攻击目标），因为党的机构正站在这个最有权威的领袖的对立面。中学生和大学生们有一种形成了中国的最大势力之一并掌握了政权的那种如醉如痴的感觉。

文化大革命

从1965年11月先批判某些作家，后又罢免北京市长、文化部长及其助手们开始，文化大革命只是从1966年夏季才真正有了一种革命的气势。当时的批判和诋毁目标已不再是某些知识分子或高级干部了，而是国家和党的两个主要领导人刘少奇本人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当于1966年8月间举行十一届全会时，使用了一些巧妙手段使刘少奇的地位下降，并宣布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就在同时，中学生和大学生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在全中国都建立了红卫兵。这些人负担着革命的使命，骚扰、侮辱和甚至有时是粗暴地对待被他们认作反革命的人（地方领导人、知识分子或旧资产阶级）。在狂热中，他们把新制度的受害者和受益者混淆了。在抄家时，他们没收和破坏了古旧书籍与艺术品，侮辱、殴打甚至有时迫使某些人自杀。在发动猛烈攻击时，他们自由地使用火车，成百万地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串联，以在那里见到毛主席并接受他的检阅。文化革命的全部力量和激烈程度均出自中国青年的热烈希望：纯洁和解放的愿望、对一个权威人物的忠诚以及虔诚的需要。它在1966年夏秋之季达到了顶峰，成为这种激情的最好发泄机会。

578

但到1966年末，在整个中国都呈现出一种无政府状态。红卫兵的攻击经常迫使地方领导人放弃其岗位，人们再也不知道到底是由谁执掌政权了。毛泽东所追求的目的已迅速达到甚至超过了：

在一切领域中,任何权威都消失了。某些人对红卫兵的过火行为感到厌烦了,于是便组成了一些同样也仰仗毛泽东名望的对立集团。这些团体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多。在1966年12月~1967年1月间被罢工搞瘫痪的上海竟发生了巷战。就在内战的威胁和所有省份分裂出去的危险正具体形成的时候,唯一得以部分逃脱了全面解体的队伍是军队。毛泽东和林彪越来越经常地使用这支军队恢复秩序和建立一个新的文职与军队政权,这种政权称作“革命委员会”。到处都在寻求困难的妥协,而恢复秩序的任务亦相当漫长:从1967年夏季严重的武汉7月事件起直到1969年春天才完成。这场运动在名义上始终是文化大革命,但这个漫长的时代实际上再无任何革命的性质了。为了重建国家和党,又起用了被红卫兵驱逐的老干部,他们从此便被结合和昭雪了。同时又发动了反击“极左分子”的战斗,也就是说反击了那些希望发动一次真正的革命并且仍在试图这样做的人。许多人面对机会主义的新胜利而感到失望。那些最难被制服的红卫兵们也恢复了理智,借文革起家的少数新干部也被结合进国家机器中了。自1967年起被搞乱的国家 and 党的组织又被勉强重建起来了,但其领导班子却发生了重要变化,军队在其中占据空前的优势。1968年的十二中全会撤销了刘少奇的职务并确认了林彪为毛泽东的继承人。从此时起,那位年迈的领导人便逐渐落入了林彪集团和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小集团的控制之下,其中的主要人物就是林彪和江青。

文化革命不仅是为了使毛泽东重新夺权而设想出来的,在此之前和与此同时也伴随了一次广泛的政治调整运动。其最经常被提及的目的之一就是阻止革命变得温和、不失时机地阻止一个官僚特权阶级的形成,总而言之是防止一场类似于苏联的演变。刘少奇以及那些在大跃进之后得以重建中国经济的领导人,都在对他们发动的大批判中被当作“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文革中提出的高于一切的主题中,毛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这些主题包括:使

社会和行为发生彻底变化的目的、取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任何差异、消灭特权和任何阶级。但在从新政权建立之初就划定的不同家庭出身于此时却被严格地运用并在中国社会内部创造了类乎种姓的制度。那些其父母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变成了真正不可接触的贱民。文化革命的另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形态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林彪的组织下,这种崇拜奇迹般地发展了起来,在数年间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毛泽东的一本语录集“小红书”超过了从未创下的印刷纪录。只有“伟大舵手”的形象、其传记和著作才是真正的崇拜对象。

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从1969年直到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的一段时间,可被视为文化革命的一种延续,其影响在一切领域中仍会使人感觉到。社会和政治危机极其严重,给所有思想家都留下了深刻印象。镇压落到青年人头上以及该政权之最坚信者身上,留下了许多辛酸。对于该政权的厌倦和疏远加深了。犯法和犯罪、舞弊和腐化、黑市和无纪律都长期存在。此外,文化革命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灾难性的。继铁路混乱、罢工和动乱、负责人遭罢免之后,出现了生产的急剧下降。继大跃进之后,刚刚经过很短一段恢复的第二次可怕的考验解释了以下现象:为什么尽管其人民勇敢而又智慧,尽管自1950年作出了巨大努力,但与远东的周边国家相比,中国始终很贫穷和落后。

在教育、艺术和文学领域中的清洗如此彻底,以至于所有出自非官方宣传的东西都被取缔了。学校和大学均被长年关闭(大学只是到很晚以后才重新开放),大批教师都被派去种田,以通过体力劳动而自我改造。在音乐和戏剧方面,只接受了受到已升迁到文化事务领导岗位上的江青保护的几种作品。

文化革命对于政权的发展也不会没有影响。其领导小组是由

一批权贵们组成的一种联盟，它后来变成了一个受宠的和集中在年迈的毛泽东周围的亲信小组，并处于怀疑和阴谋的气氛之中。被指控为企图篡权的林彪在 1971 年的神秘消失，成了该政权的这种发展的第一个征兆。

580

从 1969 年之恐怖的结束到毛泽东于 1976 年的去世，这期间是一个不明朗的以及在国家最高层的对立派别之间开展着斗争的时代。文革尚未被公开否定，其干将尚各在其位并继续盯住受害者，而且这个时代的许多时髦内容也都仍在继续流行。但务实主义者们的活动也成功地令人感到其存在了：在农村受到促进的是农业生产而不再是政治活动；大学生的选拔也不再以其社会出身而是将其才能作为标准了。控制出生率的一种真实努力是从 1970 年起开始的。被文化革命排斥的原领导人（其中就包括邓小平）甚至于 1973 年又恢复了权力。但在 1973~1974 年又爆发了一场针对他们的“批孔”运动，其目标首先对准了自从共产党中国开国以来最精明的政治家周恩来，他也站到了主张优先发展经济、开展政府活动和教育的支持者一边。在战胜其对手之后，周恩来于他去世的前一年（1975 年）又重新发出了他在 1964 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教育和科研现代化）的号召。这实际上是为竞争、知识、技术、科学和生产恢复名誉，而这一切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认为是反动或与革命信仰相比是很次要的。然而，毛派人士于 1975 年春和 1976 年 4 月间发动的反攻又重新把他们排斥到政权之外了。

三、从毛泽东的逝世到 80 年代末的中国

在毛泽东于 1976 年 9 月逝世后，人们本来预料会出现一种人事和政治方向的彻底变化。但与激进派有关系的一位不大为人所知的公安负责人华国锋却继承了他，而务实主义者（其中为首者是邓小平）只是到了 1978 年末才稳定地夺取了政权。非毛化运动

从此就开始了。当时的情况既使人联想到了苏维埃的“新经济政策”，也使人想到了大跃进灾难之后的年代。在农村逐渐恢复了家庭经营，允许创办私有小企业。在报酬和生产之间重新建立的联系立即导致了农村活力的迅速恢复，人们在那里又恢复了以商业为目的的专业化种植。养鱼、果树栽培和饲养业都发展起来了。农民的收入在1979~1985年间增加了3倍。居住条件、运输和能源也都不再像在此之前那样被严重忽略了。新领导人关切着中国积重难返的严重落后，遂决定最大限度地利用西方和日本的技术与资本。与此同时，人民中国的长期孤立状态也从1980年起结束了。但中国始终跟苏联关系冷淡并与它在越南发生了公开冲突。不过，中国又恢复了在重大国际组织中的地位。

581

但控制的放松、集体化机构的逐渐消失也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差异、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管理上的新问题。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飞涨迫使国家以巨额补贴来减缓由于农业产品价格飞涨而在城市中造成的困难。1981年，放慢投资已变得势在必行了。如果说改革在农村获得了成功，那末它在工业和城市领域中却部分地失败了，那里的老干部们仍然呆在原来的职位上。国营企业的工人以及其特权受到了事态新发展之威胁的党内干部当然都敌视改革。

1984年是加速改革的决定性一年，因为发展的迫切性使改革势在必行。管理自由和主动权被还给了那些变得自主和具有竞争性的企业。近半数的价格都放开了。一些经济特区分别在广东、福建和长江下游地区创建，四座沿海城市向外国投资开放。银行贷款代替了国家拨款。这些改革从次年起便通过轻工业和消费品生产那蔚为壮观的发展而体现出来了。但就在同时，由于缺乏任何协调，所以银行银根的放松、通货膨胀、交通运输的卡壳、能源和原料的短缺又迫使在留给企业与各省的价格自由和自主权方面重加限制。这样一来，自从改革派执政以来，便交替采取了经济自由化的和不可避免地恢复限制的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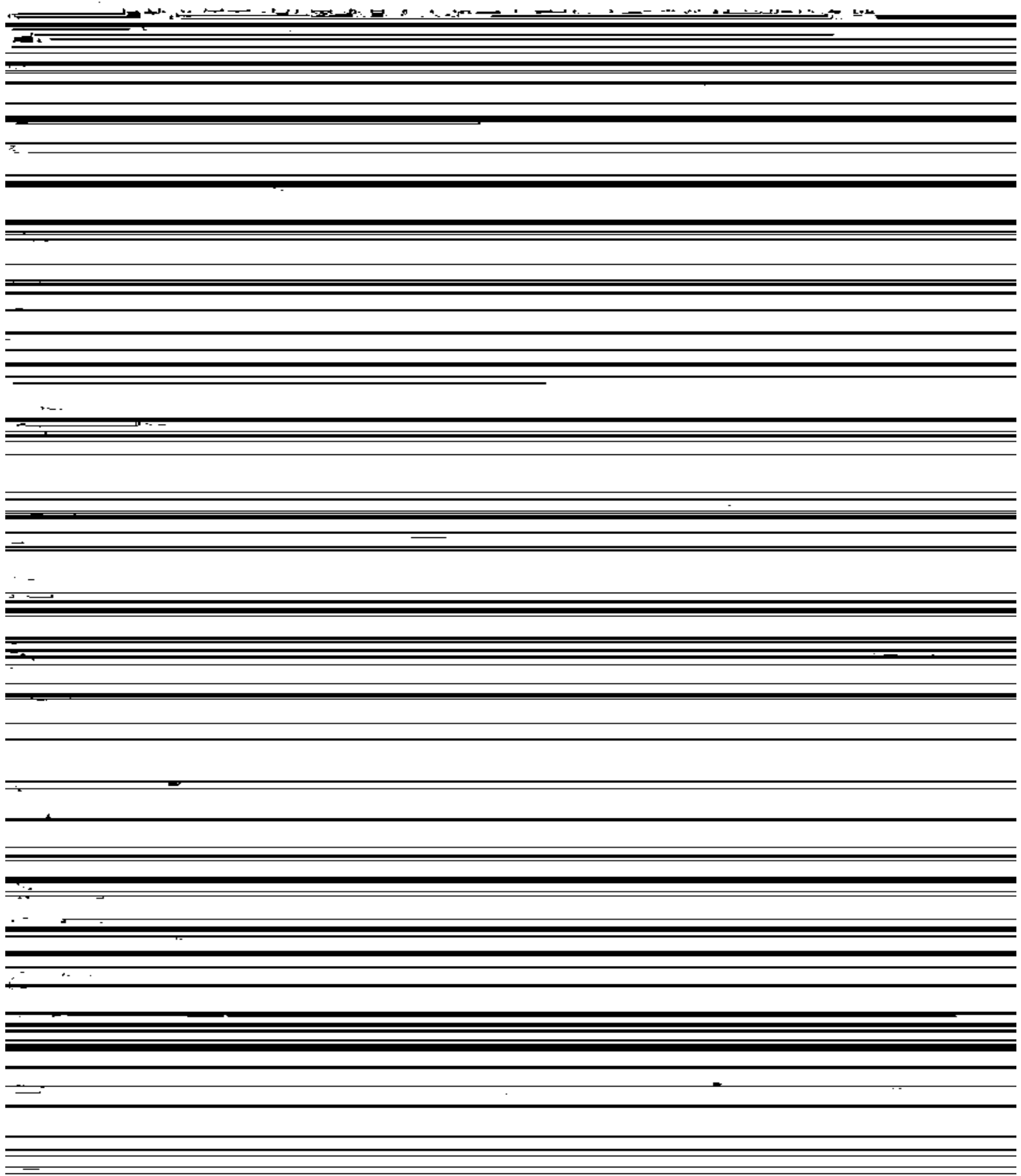
然而,向外国产品、技术和资本的开放,与外国甚至苏联及其盟国的恢复对话,绝不会同时导致该政权的一种真正变化。政治事务的领导权始终由党独自掌管,完全是一个特权等级的事务。在文革的可怕考验之后突然出现了导致不平均的财产之发展、走私和腐化的迅速发展、金钱万能等等,解释了影响自毛时代结束以来的中国社会的严重伦理危机。正如在继大跃进之后的1961~1964年间的短暂时期中一样,在农村中恢复的自由既使旧的社会和宗教活动又重新出现了,也使大家本来认为已被共产主义的伦理和理论教育彻底消灭的家族裙带关系又重新复活了。直到那时为止,几乎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中国人,变得对其国家的落后非常敏感,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失望。不惜任何手段而自私地追求享受,变成了生活的唯一目的。不过,许多迹象也都早已揭示了青年人的极度不满足以及追求自由和独立的渴望^①。

^① 此处删节了两段文字——译者。

跋

中国人不可能忘记,其祖国曾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发源地,这种文明的辐射面影响到了从西域到太平洋沿岸和从西伯利亚到热带地区的一片辽阔地域。直到19世纪中叶,它在那里仍旧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文明。这一点正和西方一样;我们的文明是在中东、地中海沿岸和欧洲发展起来的,在那些地区的某些密切联系把我们的学术传统使我们区别开的内容(如埃及和希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东方”和“西方”)又联系起来。中国不可能忘记它在世界这一大片地域占支配地位的历史和年代,对于一种如此丰富多彩和声名赫赫的历史的记忆并不是一个民族很容易从其脑海中消除的,尤其当从这种历史上保留了如此多取之不竭的文字文献和实物纪念品、而考古发掘又每年都为它提供无数遗迹的时候更是如此。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未曾赋予其历史如此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中国人中有一种理直气壮的自豪感。中国在近代受到了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凌辱,它在一段时间内曾经希望成为穷国之首并向它们指出解放的道路。但毛泽东的那种美好理想——利用一种集体努力的神奇跃进和罗曼谛克地使用人民的创造力以赶上工业化国家,从而建成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官僚主义、没有国家机器、没有城乡差别的社会——反倒成了中国巨大而又无益的苦难之源,导致了悲剧性的失败,从而只不过是进一步加大了中国的落后并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困难了。把中国大陆与东亚地区如今最活跃和最繁荣的地区台湾相比较是不公正的,因为人民共和国从它开国

583



济的发展,但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阶段。大家无法想象处在世界上最活跃的国家周围的中国会长期处于一种落后状态,这些国家恰恰是中国伦理、文化和美学传统的继承者,如韩国和日本,但还有做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大家经常遗忘的“外部中国”、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庞大华人社会。当然, 584 西方过分草率地把现代化和西方化等同起来了,它尚未理解到它对于人类这部分地区及其历史和根基的无知,将对未来形成严重的障碍^①。

^① 对于整个当代中国的部分,我都利用了毕仰高(Lucien Bianco)先生的建议和意见,特此向他表示真切的谢意。

- 《亚洲艺术》阿斯科纳—纽约,1925年始。
- Asia Major, Londres, 1949.
- 《极东》(《大亚细亚学报》),伦敦,1949年始。
- Asiatische Studien, Berne, 1947.
- 《亚洲研究》,伯尔尼,1947年始。
-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Hanoi, 1901.
- 《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河内,1901年始。
-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1929.
- 《远东文物博物馆学报》,斯德哥尔摩,1929年始。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res, 1917.
- 《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伦敦,1917年始。
-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La Haye, 1955.
- 《中亚学报》,海牙,1955年始。
- Far Eastern Quarterly, Ithaca, N. Y., 1941~1956.
- 《远东季刊》,伊萨卡(纽约),1941~1956年始。
-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Cambridge, Mass., 1936.
- 《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36年始。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nn Arbor, 1956.
- 《亚洲研究学报》,安娜·阿波尔,1956年始。
- Journal asiatique, Paris, 1822.
- 《亚细亚学报》,巴黎,1822年始。
-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Leiden, 1957.
- 《东方经济和社会史学报》,莱敦,1957年始。
-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Hongkong, 1954.
- 《东方研究学报》,香港,1954年始。
-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res, 1834.
- 《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伦敦,1834年始。
-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Bruxelles, 1931.
- 《中国和佛教论丛》,布鲁塞尔,1931年始。
- Monumenta Serica, Tôkyô, 1935.
- 《中国文化研究》,东京,1935年始。

- Narody Azii i Afriki, Moscou, 1961.
《亚非民族》，莫斯科，1960年始。
- Oriens, Leiden, 1948.
《荷兰东方学报》，莱敦，1948年始。
- Oriens Extremus, Wiesbaden, 1954.
《远东》，威斯巴登，1953年始。
-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Honolulu, 1951.
《东方和西方哲学》，檀香山，1951年始。
- Problemy Vostokovedenija, Moscou, 1959.
《东方科学问题》，莫斯科，1959年始。
- Rivista dei Studi Orientali, Rome, 1907.
《意大利东方学报》，罗马，1907年始。
-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Varsovie, 1914.
《波兰东方学报》，华沙，1914年始。
- Sinologica, Bâle, 1947.
《汉学》，巴尔，1947年始。
- Toung Pao, Leiden, 1890.
《通报》，莱敦，1890年始。
-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Wiesbaden, 1847.
《德国东方学报》，威斯巴登，1847年始。

2. 通史著作

有关东亚和中国的地理学科的资料，大家可以参阅：

古鲁(P·Gourou)：《亚洲》，巴黎哈切特书店1953年版，542页。

古鲁：《远东的土地和人》，巴黎阿尔芒·科兰书店1947年版，224页。

葛德石(G·B·Cressey)：《中国，5亿人口的国家》，纽约麦克劳—夏尔书店1955年版。

佩泽—玛萨保(J·Pezeu—Massabuan)：《中国》，巴黎阿尔芒·科兰书店1970年版，334页。

特雷扎尔(T·R·Tregear):《中国的地理经济》,莱敦1970年版。

赫尔曼(A·Herrmann):《中国的历史和商业地图集》,哈佛大学出版社1935年版,1966年阿姆斯特丹再版。

布伦登(C·Blunden)和艾尔宛(M·Elvin):《中国地图集》,巴黎纳唐书店1986年版,328页。

在有关中国通史著作中,我们可以引证:

589

埃布拉尔(W·Eberhard):《中国历史》,巴黎帕约出版社1952年版,352页(A·弗兰格1948年于伯尔尼出版的《中国史》的法译本)。

埃希霍恩(W·Eichhorn):《中国史》,载《欧洲之外文化史纲》第2卷,第85~161页,慕尼黑—奥登堡1964年版。

费子智(C·P·Fitzgerald):《中国文化简史》,伦敦克雷塞出版社1935年版,纽约阿普尔顿世纪出版社1950年再版(616页)和伦敦克雷塞出版社1954年版。

弗兰克(H·Franke)和特雷泽特尔(R·Trauzettel):《中华帝国》,收入《世界史札记》第49卷,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68年版,384页。

傅路德(L·C·Goodrich):《中国民族简史》第1版,纽约—普伦敦哈尔卜书店1943年初版,1959年再版,260页。

仅仅是部分论述中国历史的著作:

谢诺(J·Chelsneaux):《19~20世纪的东亚》,法国大学出版社,格里奥1966年版,366页。

麦克·阿拉维(Mc·Aleavy):《中国近代史》,伦敦维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松,1967年版,392页。

格鲁塞(R·Grousset):《蒙古人主中原之前的中国》,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41年版。

龙尔巴(D·Lombard):《中华帝国》,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126页。

马伯乐(H·Mosperro)和白乐日(E·Balazs):《古代中国的历史和制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322页。

谢和耐(J·Gernet):《古代中国》,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124页。

赖肖尔(E·O·Reischauer)和费正清(J·K·Fairbank):《东亚的伟大

传统》，波士顿胡格东—米弗林书店 1960 年版，740 页。

费正清、赖肖尔和克雷格(Craig)：《东亚的近代变化》，波士顿胡格东—米弗林书店 1965 年版，956 页。

恒慕义(A·W·Hummel)：《中国清代(1644~1912 年)名人录》，2 卷本，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版，政府印刷厂印，它对于整个中国清代都是基本著作。

大家还会在以下著作中发现有关中国历史和文明概貌的论述：

《中国的面貌》，戴密微(P·Demiéville)作序，2 卷本，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1959 年版，440 页。

戴密微：《汉学论文选》和《佛教学论文选》，莱敦布里尔出版社 1973 年版，分别为 634 页和 498 页。

道森(R·Dawson)：《中国的遗产》，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 1964 年版，392 页。

鲁维一(M·Loewe)：《中华帝国，近代的历史背景》，伦敦阿伦和昂温出版社 1966 年版，326 页。

白乐日(E·Balazs)：《天朝官吏制》，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 1968 年版，346 页(英译本作《中国的文明和官制》，纽黑文 1964 年版)。

费正清：《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版，438 页。

有关中国的经济和人口问题，我们可以引证以下著作：

何炳棣：《中国 1368~1953 年间人口研究》，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9 年版，342 页。

别伦斯坦因(H·Bielenstein)：《公元 2~742 年间中国的人口普查》，载《远东古物博物馆学报》第 19 卷，第 125~163 页，斯德哥尔摩 1957 年版。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要害部门》，伦敦阿伦和昂温出版社 1936 年版，168 页；纽约巴拉贡书店 1969 年再版。

珀金斯(D·H·Perkins)：《1368~1968 年中国的农业发展》，阿尔杜斯出版公司 1969 年版，396 页。

杨联陞：《中国的货币和信贷简史》，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2 年版。

杨联陞：《中华帝国时代的公共工程》，巴黎法兰西学院 1964 年版，84 页。

有关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史,大家可以参阅以下著作:

李约瑟(J·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已出版 15 卷,剑桥大学 1954~1989 年。

李约瑟:《中国和西方的技术人员与工匠》,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0 年版,470 页。

李约瑟:《中国钢铁工艺的发展》,伦敦新移民会 1958 年版。

马若安(J·-C·Martzloff):《中国数学史》,巴黎马松出版社 1988 年版,20+378 页。

洛埃(J·Hoe):《〈四元玉鉴〉(1303 年)中的多项方程运算法》,巴黎汉学研究所 1977 年版,388 页。

有关中国哲学史问题,请参阅以下著作: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D·Bodde)译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52 和 1953 年版,2 卷本。

佛尔克(A·Forke):《中国哲学史》、《中国中期哲学史》和《中国新哲学史》,汉堡 1927、1934 和 1938 年版。

狄百瑞(W·T·de Bary)、陈荣捷(W·T·Chan)和瓦特森(B·Watson):《中国传统的起源》,哥伦比亚大学 1964 年版,2 卷本,VI+578 和 XI+322 页。

有关中国宗教史的问题,请参阅以下著作:

戴密微:《中国佛教》,康德谟(M·Kaltenmark):《道教》,以上二文均载七星诗社的百科全书《宗教史》,加利玛尔出版社 1970 年版。

康德谟:《老子和道教》,巴黎赛伊出版社 1965 年版,190 页。

樊德隆(N·Vandier—Nicolas):《道教》,巴黎法国大学出版 1965 年版,132 页。

陈观胜(K·S·Ch'en):《中国佛教简史》,普林斯顿 1964 年版,560 页。

芮沃寿(A·F·Wright):《中国佛教史》,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49 年版,144 页。

皮肯斯(C·L·Pickens):《中国伊斯兰教的解析书目》,汉口 1950 年版,72 页。

马丁(M·Martin):《中国伊斯兰教史》,莱比锡汉斯出版社 1921 年版,152 页。

格罗特(J·J·M·de Groot):《中国的教派和道教》,阿姆斯特丹 1903~1904 年版,北京 1940 年再版,2 卷本。

马伯乐(H·Maspero):《中国宗教和历史遗作集》,巴黎吉美博物馆 1950 年版,第 1~2 卷(分别为《中国宗教》卷和《道教》卷)。

施舟人(K·Schipper):《道教修身术》,巴黎法雅尔出版社 1982 年版,340 页。

格罗特(J·J·M·Groot):《中国的宗教体系》,莱敦布里尔出版社 1892~1910 年版,6 卷本。

葛兰言(M·Granet):《中国人的宗教》,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1951 年第 2 版,176 页。

许烺光(F·L·K·Hsu):《在先祖的庇荫下,中国的文化和人格》,伦敦 1949 年版,318 页。

石泰安(R·A·Stein):《壶中九华》,巴黎弗拉玛里雍书店 1987 年版,352 页。

金葆光(H·Doré):《中国迷信手册》,巴黎—香港 1970 年重版,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外国研究中心再版,230 页。

穆尔(A·C·Moule):《1550 年之前的中国基督教》,知识促进会 1930 年版,294 页。

德里贤(P·M·d'Elia):《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122 页。

赖德烈(K·S·Latourette):《中国基督教传教区史》,纽约麦克米伦公司 1929 年版,930 页。

有关中国艺术史问题的著作有:

加希尔(J· Cahill):《中国绘画》,巴黎日内瓦斯基拉书店 1964 年版,214 页。

斯旺(P· C· Swan):《中国绘画》,巴黎提斯纳版本,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伯希和(P· Pelliot):《敦煌石窟,魏、唐和宋代的佛教绘画与彩塑》,巴黎版,伯希和中亚探险团档案,1920~1924 年版,6 卷本,附图版。

蒋彝(Chiang Yee):《中国书法》,1938 年第 1 版,剑桥大学 1954 年再版和伦敦麦冬书店 1961 年版,230 页。

比尔特尔(J· F· Billeter):《中国的书法艺术》,日内瓦斯基拉书店 1989 年版,320 页。

毕梅雪(Pirazzoli—t'Serstevens):《中国》,收入《世界建筑丛刊》,弗里布爾书籍刊印局 1970 年版。

西克曼(L· Sickmann)和索珀(A· Shoper):《中国的艺术和建筑》,巴尔底摩 1956 年版。

博伊德(A· Boyd):《中国建筑》,伦敦 1962 年版。

有关中国文学史问题,请参阅下述著述:

康德谟:《中国文学》,载七星诗社百科全书《文学史》第 1 卷,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第 1166~1300 页。

班巴诺(J· Pimpaneau):《中国文学史》,巴黎比吉耶书店 1989 年版,260 页。

柳无忌(Liu Wu—Chi):《中国文学概论》,布卢明顿—伦敦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版,322 页。

陈宋颐:《中国文学史概论》,纽约罗纳德出版社 1966 年版,322 页。

海陶玮(J· R· Hightower):《中国的文学主题》,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3 年版,142 页。

伯奇(C· Birch):《有关 14 世纪之前的中国文学文选》,纽约格罗夫出版社 1965 年版。

玛尔古利埃(G· Margouliès):《中国文学精选》,巴黎帕约出版社 1948 591 年版,458 页。

查维斯(J· Chaves,刊布人):《哥伦比亚大学藏中国元、明、清朝(1279~1911 年)的中国晚期诗人的作品》,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842

页。

沃森(B·Watson,刊布人):《哥伦比亚大学藏13世纪之前中国古诗诗人的作品》,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84年版,396页。

斯科特(A·C·Scott):《中国的古典戏剧》,伦敦阿伦和昂温出版社1957年版,250页。

鲁迅:《中国小说简史》,杨宪益、杨·G·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59年版。

普实克(J·Průšek):《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布拉格科学院1970年版,588页。

比斯利(W·G·Beasley)和蒲立本(E·G·Pulleyblank,出版者):《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352页。

嘉德纳(C·S·Gardner):《中国的传统史学》,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120页。

戴维森(M·Davidson):《英国、法国、德国的中国出版物的译著统计》,华盛顿大学美国学生联合会1952年版。

诺尔曼(J·Norman):《中国人》,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页。

拉姆齐(R·S·Ramsey):《中国的语言》,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340页。

3. 断代史参考书目

从上古时代到公元前5世纪

张光直:《古代中国的考古学》,纽黑文、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版,450页。

张光直:《商代文明》,纽黑文、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418页。

郑德坤:《中国的考古学》,第1卷《史前时代的中国》,第2卷《商代中国》,第3卷《周代中国》,剑桥大学1959~1963年版。

顾颉芬(F·S·Couvreur):《诗经》译注本,河间府1896年版,献县1926年再版。

顾颉芬:《鲁国编年史——〈春秋〉和〈左传〉》译注本,3卷本,河间府1914年版,巴黎1919年重版,美文学出版社1951年再版。

顾赛芬：《礼记》译注本，4卷本，巴黎再版本，美文学出版社1951年重版。

顾赛芬：《礼记》译注本，巴黎重版本，美文学出版社1951年再版。

顾赛芬：《书经》译注本，巴黎重版本，美文学出版社1950年再版。

凡·德瓦尔(Von Dewall)：《上古时代中国的马和车》，波恩哈伯特出版社1964年版，280页。

葛兰言(M·Granet)：《古代中国的舞蹈和传说》，2卷本，1959年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再版，760页。

葛兰言：《中国的文明》，1929年第1版，1948、1969年巴黎阿尔班·米歇尔书店再版，506页。

葛兰言：《中国的封建社会》，奥斯陆、阿舍堡、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228页。

葛兰言：《中国古代的节日和歌曲》，1919年第1版，1929年巴黎勒鲁书店再版，304页。

许倬云：《变化中的古代中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238页。

李祁：《中国文明的摇篮》，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124页。

勒赫(M·Loehr)：《中国青铜时代的兵器》，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234页。

马伯乐：《古代中国》(覆盖了从起源到帝国时代)，巴黎1955和1965年法国大学出版社修订再版本，520页。

肖孚(E·H·Schaffer)：《古代中国》，纽约时代—生活书店1967年版，192页。

沃尔克(R·L·Walker)：《古代中国的列国制度》，哈姆登鞋带出版社1953年版，136页。

沃尔克：《古代中国》，纽约韦特出版社1969年版。

沃森(Watson)：《汉代之前的中国》，纽约普拉杰出版社1961年版，264页。

沃森：《中国的古代文明》，伦敦泰晤士—哈得逊河出版社1966年版。

卫德明(R·Wilhelm)和贝恩斯(C·F·Baynes)：《〈易经〉或〈变化之书〉》，伦敦1951年版，纽约1950年再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再版，2卷本。

战国时代

顾赛芬:《孟子的著作》,巴黎美文学出版社 1949~1950 年再版本。

顾赛芬:《孔子的〈论语〉》,巴黎美文学出版社 1950 年重版本。

克伦普(J·I·Crump):《〈战国策〉研究》,密西根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

德效骞(H·H·Dubs):《古代孔夫子的仿效者荀子》,伦敦普罗布斯坦出版社 1927 年版,308 页。

德效骞:《荀子的著作》,伦敦普罗布斯坦出版社 1928 年版,338 页。

戴闻达(J·J·L·Duyvendak):《〈商君书〉研究》,伦敦普罗布斯坦出版社 1928 年版。

戴闻达:《道德经》,巴黎麦松奈夫书店 1953 年版,187 页。

佛尔克(A·Forke):《社会活动家墨翟及其弟子们的哲学著作》,柏林东方语言讲座的报告,1922 年版,638 页。

翟理斯(L·Giles):《列子诸书中有关道教的教义》,伦敦姆赖书店 1947 年版。

格拉厄姆(A·C·Graham):《列子著作的新译本》,伦敦姆赖书店 1960 年版,184 页。

格里菲思(S·B·Griffith):《孙子兵法》,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 1963 年版,568 页。

葛兰言:《中国人的思想》,1934 年第 1 版,1968 年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重版,568 页。

霍克斯(D·Hawkes):《南宋的朱子,中国古代文选》,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9 年版,230 页。

寥文凯:《韩非子全集》,伦敦普罗布斯坦出版社 1939~1959 年版,2 卷本。

郭保柯:《中国的两位诡辩学者惠施和公孙龙》,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1953 年版,164 页。

马弗里克(L·Mavorick):《有关古代中国经济的对话,管子著作选》,卡博纳拉 1954 年版,470 页。

梅贻宝(Y·P·Mei):《墨子:孔夫子那被人忽略的对立者》,伦敦普罗布斯坦出版社 1934 年版。

列维(J·Lévi,译者):《商鞅的〈商君书〉》,巴黎弗拉玛里雍出版社 1981

年版,214页。

托凯(F·Tokei):《中国悲歌的诞生:屈原及其时代》,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67年版,226页。

汪德迈(L·Vandermeersch):《法家的形成》,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1965年版,302页。

魏礼(A·Waley):《古代中国思想的三种潮流》,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39年版;其法译本于1949年在巴黎帕约书店出版,198页。

魏礼:《道与政权〈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地位的研究》,伦敦阿伦和昂温书店1934年版,262页。

魏礼:《〈九歌〉,古代中国萨满教研究》,伦敦阿伦和昂温书店1955年版,55页。

王翰铨:《古代中国的铸币》,纽约美国古钱币学会1951年版。

沃森:《有关韩非子的基础知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134页。

沃森:《有关墨子、荀子和韩非子的基础知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140+178页。

戴遂良(L·Wieger):《道教天师》,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50年版,522页。

卫德明(R·Wilheim):《吕氏春秋》译注本,伊埃纳,迪德里克1928年版,542页。

秦汉帝国

白乐日(E·Balazs):《汉代末年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哲学》,载《通报》第39卷,1948~1950年,第83~131页。

别伦斯坦因(H·Bienlenstein):《汉代的复兴》,载《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36卷,斯德哥尔摩1953年版,第1~209页。

《剑桥中国史》第1卷,《秦汉帝国,公元前221~公元22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共41+981页。

卜德(D·Bodde):《中国的第一次统一:秦王朝及李斯(公元前280?~208年)生平研究》,莱敦布里尔出版社1938年版,270页。

沙畹(E·Chavannes):《司马迁的〈史记〉》,1895~1905年巴黎第1版,勒鲁1967年再版,5卷本。

杰溺(J·P·Diény):《中国古典诗歌的起源:汉代抒情诗研究》,莱敦布里尔出版社1968年版,168页。

杰溺:《古诗19首》,载《日佛会馆学报》,新编第7卷,第4期,巴黎法国大学出版1963年版,194页。

德效蹇(H·H·Dubs):《汉王朝形成史》,3卷本,巴尔底摩韦弗利出版社1938~1955年版。

佛尔克(A·Forke):《〈论衡〉:王充的试验》,纽约巴拉贡书店再版,2卷本,1962年版。

加勒(E·Gale):《〈盐铁论〉:古代中国有关国家控制贸易和工业的辩论》,莱敦布里尔出版社版,165页;其续文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第65卷,1934年,第73~110页。

吴德明(Y·Hervouet):《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巴黎汉学研究所1964年版,480页。

何四维(A·F·P·Hulsewé):《汉代法律的残余》第1卷,莱敦布里尔出版社1955年版,456页。

何四维:《秦代法律的残余》,莱敦汉学研究院丛书第18卷,莱敦布里尔出版社1985年版,242页。

康德谟:《列仙传》,北京汉学研究中心1953年版,204页。

克雷默(R·P·Kramers):《孔子家语》,莱敦布里尔出版社1949年版,380页。

孔斯蒂勒(M·J·Kunstler):《马融的生平与著作》,华沙波兰科学院1969年版,224页。

鲁唯一(M·Loewe):《汉代行政文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2卷本。

鲁唯一:《中国汉代(公元前202~公元220年)的生活理想、戏剧、节日、神话及其起源》,阿伦和昂温出版社1982年版,226页。

摩尔根(E·Morgan):《道——大光明,〈淮南子〉研究初探》,基根·保罗1935年版,228页。

594 毕梅雪(M·Pirazzoli—tS'erstvens):《汉代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234页。

鲁道夫(R·C·Rudolph)和闻闾:《华西汉墓的艺术》,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51 年版,68 页。

施舟人(K·Schipper):《道教传说中的汉武帝,〈汉武帝内传〉研究》,法兰西远东学院 1965 年版,132 页。

赛德勒(A·Seidel):《道教中的老子占卜术》,法兰西远东学院 1969 年版,172 页。

斯旺(N·L·Swann):《中国的第一位女文人班昭》,纽约—伦敦 1932 年版,123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食物和货币》,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50 年版,482 页。

詹卓松(T·S·Tjan):《〈白虎通〉:对白虎观的全面理解》,莱敦布里尔出版社,两卷本,1949 和 1952 年版。

王毓铨:《组成汉王朝的中央政府的概观》,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 12 卷,1949 年,第 134~187 页。

沃森(B·Watson):《中国最大的史学家》,纽约—伦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 卷本,1961 年。

沃森:《中国的大史学家司马迁》,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58 年版,276 页。

韦慕庭(C·M·Wilbur):《中国汉朝形成时代的奴隶制》,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 1943 年版,纽约鲁赛尔出版社 1967 年版,490 页。

杨联陞:《东汉的望族》,载由宋任以都和德弗朗西斯(de Francis)出版的《中国社会史》中,华盛顿美国学会理事会 1956 年版,第 103~134 页。

余英时:《中国汉代的贸易和开拓》,伯克利—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7 年版,第 252 页。

中世纪时代(自汉至隋)

白乐日:《〈隋书·食货志〉译注》,载《通报》第 42 卷第 3~4 期,第 113~329 页,莱敦布里尔出版社 1953 年版。

白乐日:《〈隋书·刑法志〉译注》,莱敦布里尔出版社 1954 年版,228 页。

卡罗尔(T·D·Carroll):《晋代吐谷浑史资料》,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出版社,1953 年版,48 页。

陈世骧:《顾恺之传》,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53 年版,32 页。

戴密微(P·Demiéville):《佛教,汉文史料》,载勒努(L·Renou)和菲利奥扎(J·Filliozat):《古典印度:印度研究手册》,第3卷,第398~463页,法兰西远东学院,河内1953年版。

丁爱博(A·E·Dien):《宇文护传》,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162页。

埃布拉尔(W·Eberhard):《中国北方的拓跋帝国,社会学研究》,莱敦布里尔出版社1949年版,396页。

埃布拉尔(W·Eberhard):《征服者和统治者:中世纪的中国社会力量》,1965年莱敦布里尔出版社1965年第2版,192页。

595 方志彤(A·Fang):《〈三国志〉(公元220~265年)译注》,2卷本,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和1965年版,共698和522页。

翟理斯(H·A·Giles):《法显行记》,剑桥大学出版社1923年版,伦敦路德里奇和基根·保罗出版社1956年再版,112页。

古德利奇(C·S·Goodrich):《苏倬传》,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116页。

高罗佩(R·H·Van Gulik):《成就,中国和日本的梵文研究》,那格浦尔版,载《百藏丛书》第36卷,1956年。

海陶玮(J·R·Hightower):《诗人陶潜》,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70年版,270页。

侯思孟(D·Holzman):《竹林七贤及其时代的中国社会》,载《通报》第44卷,第317~346页,莱敦布里尔出版社1957年版,186页。

池内(H·Ikeuchi):《古代朝鲜半岛上的中国郡乐浪与带方》,载《东洋文库研究部论丛》第5卷,1930年。

李雅各(J·Legge):《法显的〈佛国记〉研究》,牛津1886年版,1966年纽约巴拉贡书店再版。

水野和永代:《中国北方5世纪时的佛教石窟云岗》,16卷本,京都1951~1956年版。

罗杰斯(M·C·Rogers):《福建史》,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版,406页。

R·施:《慧皎的〈高僧传〉》,鲁汶大学东方学院1969年版,178页。

施友忠(Shih Yu—Chung):《刘勰的〈文心雕龙〉研究》,纽约哥比亚大学

出版社 1959 年版。

施洛克(J·K·Shryock):《有关人的能力的研究:刘邵的〈人物志〉》,纽黑文美国东学会 1937 年版,168 页。

杨联陞:《中国近代经济史札记》,《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坎布里奇 1946 年 6 月版,145 页。

许理和(E·Zürcher):《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古中世纪中国的传播与同化》,2 卷本,莱敦布里尔出版社 1959 年版,468 页。

隋唐和五代

阿克爾(W·R·B·Acker):《有关中国唐代和后唐时代绘画的文献》,莱敦布里尔出版社 1954 年,414 页。

宾板桥(W·Bingham):《唐代的建立》,巴尔底摩威夫利出版社 1941 年版,184 页。

《剑桥中国史》第 3 卷(589~906 年)《隋唐史》第 1 册,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20+850 页。

沙畹(E·Chavannes):《西突厥史料》,圣一彼得堡 1903 年版,巴黎麦松奈夫出版社 1942 年重版,378+110 页。

戴密微:《吐蕃僧诤记》,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1952 年版,400 页。

爱德华兹(E·D·Edwards):《唐代中国的散文文学》,伦敦普罗斯坦 1937~1938 年版,2 卷本。

费尔泽格拉尔德(C·P·Fitzgerald):《李世民传》,巴黎帕约出版社 1935 年版,248 页;译自英文,原版为剑桥大学出版社 1933 年版。

费尔泽格拉尔德:《武氏帝国》,伦敦克雷塞出版社 1956 年版,芒库弗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1968 年版,264 页。

福尔特(A·Forte):《7 世纪末年中国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研究所,1976 年版,312 页。

格雷(B·Gray):《敦煌佛洞绘画》,芝加哥市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59 年版,70 幅图版。

哈密屯(J·R·Hamilton):《五代回鹘史》,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1955 年版,204 页。

洪煊莲(W·Hung):《中国诗人杜甫》,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2 年版,300 页。

列维(H·S·Levy):《黄巢传》,伯克利—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55 年版,144 页。

卢斯(G·H·Luce):《〈蛮书〉研究》,伊萨卡,康奈尔大学 1961 年版,116 页。

麦肯拉(C·Mackerras):《回鹘汗国(744~840 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1968 年版,187 页。

伯希和(Paul Pelliot):《交广印度两道考》,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 4 卷,第 131~413 页,河内 1904 年版。

蒲立本(E·G·Pulleyblank):《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伦敦—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64 页。

蒲立本:《内蒙古的粟特人聚落》,载《通报》第 41 卷,第 317~357 页,1952 年。

赖肖尔(E·O·Reischauer):《〈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纽约罗纳德出版社 1955 年版,454+342 页。

利科(L·Ricoud):《武则天》,载《印度支那研究会学报》第 34 卷,第 2 期,西贡 1958~1959 年版,172 页。

戴何都(R·des Rotours):《〈新唐书·选举志〉》,巴黎勒鲁书店 1932 年版,414 页。

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和《〈新唐书·兵志〉》译注本,莱敦布里尔出版社 1948 年版,2 卷本,1094 页。

戴何都:《安禄山传》,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398 页。

戴何都:《〈北里志〉译注》,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1968 年版,200 页。

佐伯:《中国景教的文献和遗迹》,东京 1951 和 1955 年再版。

索瓦热(J·Souvaget):《中国印度见闻录》,巴黎美文学出版社 1948 年版,82 页。

谢菲(E·H·Schafer):《明帝国》,东京鲁特兰 1954 年版,146 页。

谢菲:《朱雀:唐代的南方形象》,伯克利—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380 页。

谢菲:《撒马儿罕的金桃:唐代外来物研究》,伯克利—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400 页。

谢菲:《南汉的第一位皇帝刘龚》,伯克利—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

社 1967 年版,380 页。

所罗门(B·S·Solomon):《唐顺宗本纪》,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5 年版,82 页。

苏思(M·T·South):《李贺:元和时代(806~821 年)的官方学派》,莱敦布里尔出版社 1959 年版,495 页。

高楠:《义净对印度和马来群岛佛教活动的记述(671~695 年)》,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240 页。

崔瑞德(D·Twitchett):《陆贽(754~805 年)向皇帝的上谏及其宦宦生涯》,载《儒教人物》,由崔瑞德和芮沃寿刊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84~122 页。

崔瑞德:《唐代的财税机构》,剑桥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1970 年再版, 597 186 页。

魏礼(A·Waley):《白居易(772~846 年)的生平与时代》,纽约麦克米伦公司 1949 年版,238 页。

魏礼:《李白的诗歌及其生涯》,纽约麦克米伦公司 1950 年版,124 页。

王赓武:《中国南海贸易史研究》,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分会学报》第 31 卷,第 2 期,1958 年。

王赓武:《五代时期中国北方的政权结构》,吉隆坡 1963 年版,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258 页。

宋代

卡特(T·F·Carter):《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傅路德增订本,纽约罗纳德出版社 1955 年版,293 页。

谢和耐(Jacques Gernet):《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巴黎哈切特出版社 1959 年版,286 页。

高罗佩:《唐寅秘史》,莱敦布里尔出版社 1956 年版,198 页。

贡德特(W·Gurdert):《洗冤录》,慕尼黑卡尔-罕森出版社 1960 年版,580 页。

吴德明(Y·Hervouet):《1946~1965 年用西文出版的有关宋代著作的目录》,波尔多大学 1969 年版,140 页。

夏德(F·Hirth)和柔克义(W·W·Rockhill):《赵汝适的〈诸蕃志〉详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 1911 年版,阿姆斯特丹东方出版社 1966 年版,288

页。

左滕:《中国的商业联合会——行》,载《东洋文库研究部论丛》,东京版,第8卷,1936年。

柯睿格(E·A·Kracke Jr·):《中国宋初的文职机构》,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262页。

桑原:《蒲寿庚考》,载《东洋文库研究部论丛》,第2卷第1期和第7卷第1期,东京1928和1935年版。

勒加尔(S·Le Gall):《哲学家朱熹的教理及其影响》,载《汉学论丛》第5卷,1894年上海徐家汇第2版,上海天主教传教区1923年第2版,132页。

李渡南(D·Leslie):《中国犹太人的遗存:开封犹太人集团》,莱敦布里尔出版社1972年版,270页。

李淑华:《指南车和圆规的使用》,台北叶文出版公司1959年版,124页。

林语堂:《苏东坡的生平与时代》,纽约J·戴出版社1947年版,伦敦—墨尔本海恩曼出版社1949年版,370页。

刘子键(J·T·C·Liu):《宋初的改革家范仲淹》,载由费正清主编的《中国的思想和制度》一书第105~131页。

刘子键:《中国宋代的改革家王安石及其新政》,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140页。

刘子键:《11世纪的理学家欧阳修》,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228页。

罗荣邦:《宋末元初中国作为海洋政治势力的出现》,载《东方季刊》第14卷第4期,1955年,第489~503页。

李约瑟(J·Needham)和其他人:《天动》,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254页。

598 米诺尔斯基(V·Minorsky):《马韦奇论中国、突厥和印度》,伦敦卢扎克1942年版,170页。

穆尔(A·C·Moule):《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行在”考》,剑桥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0页。

伯希和:《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巴黎麦松奈夫出版社1953年版,138页。

平克(E·Pinks):《宋代初期(960~1028年)的甘州回鹘人》,威斯巴登

哈拉苏威茨出版社 1968 年版, 226 页。

萨尔让(G·E·Sargent):《朱熹反佛》, 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1955 年版, 156 页。

孙任以都(E-tu Zen Sun)和弗兰西斯(J·de Francis):《中国社会史》, 华盛顿美国学会理事会 1956 年版, 400 页。

特劳泽代尔(R·Trauzettel):《奸相蔡京(1046~1126 年)》, 柏林乌尔劳卜出版社 1964 年版, 214 页。

翟理斯(H·A·Giles, 译者):《〈洗冤录〉和法医学概论》, 伦敦巴尔和达尼埃尔松出版社 1924 年版。

樊隆德(N·Vandier—Nicolas):《中国的艺术和智慧:米芾(1051~1107 年)》, 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 194 页。

惠特利(P·Wheatley):《宋代海上贸易革新的分地区札记》, 载《亚洲皇家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第 32 卷, 第 2 期, 吉隆坡 1961 年版。

威廉姆森(H·R·Williamson):《中国宋代的政治家和教育家王安石》, 2 卷本, 伦敦普罗布斯坦出版社 1935 和 1937 年版。

辽、金、夏和元帝国

巴格德(E·A·Bugde):《忽必烈汗的修士:拉班扫玛和马尔格斯的生平与旅行》, 伦敦宗教追随者学会 1928 年版, 336 页。

陈垣:《蒙古人统治时代的西域和中亚》,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版, 328 页。

戴密微:《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宗教形势》, 载《意大利东方学报》, 罗马 1957 年版, 第 193~234 页。

弗兰格(H·Franke):《蒙古统治时代的中国货币和经济》, 莱比锡哈拉苏维茨出版社 1949 年版, 172 页。

弗兰格:《蒙古帝国时代的中国文化史论著:杨珣的〈山居新话〉》, 威斯巴登斯泰纳书店 1956 年版, 160 页。

傅乐欢:《“帐”和“鞑耳朵”:契丹帝国及其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军事组织》, 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 1950 年版, 230 页。

格鲁塞(R·Grousset):《蒙古帝国》, 巴黎博卡尔书店 1941 年版, 584 页。

科姆洛夫(M·Komroff):《马可·波罗同时代的事件》, 纽约博尼和利夫

利奇出版社 1928 年版,358 页。

穆尔(A·C·Moule)与伯希和:《马可·波罗的〈世界志〉》,伦敦鲁特里奇出版社 1938 年版,2 卷本。

奥尔布里希特(P·Olbricht):《公元 13~14 世纪元帝国时代的中国邮政特征》,威斯巴登哈拉索维特书店 1954 年版,110 页。

奥尔斯基(L·Olschki):《马可·波罗的先驱》,巴尔底摩约翰·赫卜肯斯出版社 1943 年版,100 页。

奥尔斯基:《法国艺术家纪尧姆·布歇在大汗宫中》,巴尔底摩约翰·赫卜肯斯大学出版社,1946 年版,126 页。

599 伯希和:《〈真腊风土记〉译注》,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 4 卷,1904 年。

伯希和:《〈蒙古秘史〉译本》,巴黎麦松奈夫出版社 1949 年版,196 页。

拉切聂夫斯基(P·Ratchnevsky):《元典章》,巴黎勒鲁出版社 1937 年版,348 页。

苏尔曼(H·F·Schurmann):《元王朝的经济结构》,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燕京学社第 16 套,1956 年,352 页。

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巴黎麦松奈夫出版社 1948 年版,292 页。

魏礼(A·Waley):《炼丹术士的旅行》,伦敦鲁特里奇出版社 1931 年版,166 页。

魏特夫(K·A·Wittfogel)和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 年)》,费城美国哲学学会,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49 年版,752 页。

裕尔(H·Yule):《马可·波罗游记》,第 3 版,由考狄校订,伦敦鲁特里奇出版社 1938 年版,2 卷本。

明代

阿夫诺尔(L·Avenol,译者):《西游记》,巴黎赛伊出版社 1957 年版,956 页。

狄百瑞(W·T·de Bary,主编):《明代思想的个人与社会性》,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0 年版,516 页。

比肖夫(J·P·Bischoff):《中国通俗故事》,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 年版,144 页。

博克塞(C·R·Boxer):《菲达尔戈斯于1550~1610年在远东》,海牙尼若夫出版社1948年版,297页。

博克塞:《16世纪的华南史》,哈克鲁特学会1953年版,388页。

布希(H·Busch):《东林书院及其政治和哲学意义》,载《华裔学志》第14卷,1949~1955年版,第1~163页。

《剑桥中国史》第7卷,《明史,1368~1644年》,第1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25+976页。

贾永吉(M·Cartier):《16世纪时的一次地方性改革:海瑞于1558~1562年在淳安县》,巴黎、海牙木东出版社1973年版,170页。

张天乏:《1514~1644年间的中国—葡萄牙的贸易》,莱敦布里尔出版社1934年版,158页。

谭霞客(J·Dars,译者):《水浒传》,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七星诗社1978年,2卷本,141+1233和11+1356页。

戴闻达(J·J·L·Duvendak):《有关马欢的初步研究》,阿姆斯特丹北荷兰出版社,1933年,74页。

戴闻达:《中国发现非洲考》,伦敦布斯坦出版社1949年版,36页。

加拉盖(L·J·Gallagher):《16世纪左右耶稣会士们发现中国》,密尔沃基布鲁斯出版社1959年版,616页。

谢和耐(J·Gernet):《中国和基督教》,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82年版,342页。

格里木(T·Grimm):《明代中国儒教的教育和政治》,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出版社1960年版,178页。

高罗佩(R·H·Van Gulik):《狄仁杰三断命案》,东京1949年版,238页。

亨克(F·G·Henke,译者):《王阳明的哲学》,纽约巴拉贡书局1964年600第2版。

何炳棣:《1368~1911年中华帝国发迹的阶梯,社会变动性的几个方面》,纽约—伦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380页。

黄仁宇(R·Huang):《1587年:明王朝衰落的一年》(此书的汉译本叫作《万历十五年》——译者),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244页。

贺凯(C·O·Hucker):《中国明代的传统国家》,托克逊亚利桑纳大学出

版社 1961 年版,86 页。

卡美雷(A·Kammerer):《葡萄牙人于 16 世纪发现中国》,莱敦布里尔出版社 1944 年版,260 页

久野(Y·Kuno):《日本向亚洲大陆的扩张》第 1 卷,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37 年版。

雷威安(A·Lévy,):《凌濛初所著的狐狸爱情故事》,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 1970 年版,285 页。

雷威安(译者):《金瓶梅》,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七星诗社丛书,1985 年版,2 卷本,133+1272 和 59+1484 页。

梁方春:《一条鞭法》,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6 年版,71 页。

米勒(J·V·G·Milles):《马欢和〈瀛涯胜览〉》,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1 年版,394 页。

阮端和和利高(L·Rigaund):《三国演义》译本,西贡印度支那研究会 1960~1963 年版,3 卷本。

帕森斯(J·B·Parsons):《晚明代的农民起义》,托克逊亚利桑纳大学出版社 1970 年版,260 页。

伯希和:《明史中的火者与写亦虎仙》,载《通报》第 38 卷,1948~1950 年版,第 81~292 页。

司律思(H·Serruys):《永乐时代(1403~1424 年)汉族—女真族的关系》,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出版社 1955 年版,118 页。

孙任以都和宋诗倩:《〈天工开物〉:17 世纪的中国工艺》,伦敦帕克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国立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版,272 页。

王长智:《王阳明的伦理哲学》,巴黎大学 1936 年版,217 页。

威托夫(B·Wierhoff):《1538~1567 年之后中国的隐蔽政治》,汉堡东方自然和民族研究会 1963 年版,第 45 卷,235 页。

1644~1798 年

奥库尔(P·Aucourt):《一个杭州市民的日记(1645 年)》,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 7 卷,第 297~312 页。

《剑桥中国史》第 10 和 11 卷:《晚清史(1800~1911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8 年和 1980 年版,16+713 和 20+754 页。

德尔米尼(L·Dermigny):《18世纪(1716~1833年)的广州贸易》,巴黎 601
国民教育刊物出版及销售处 1964年版,4卷本。

埃布拉尔(W·Eberhard):《17~18世纪的中国中篇小说,社会学调查》,
阿斯科纳亚洲论坛 1948年版,240页。

安田朴(R·Etiemble):《入华耶稣会士和礼仪之争(1552~1773年)》,
巴黎朱利雅尔出版社版,302页。

安田朴:《中国化的欧洲》,第1卷,《从罗马帝国到莱布尼茨》,第2卷,
《从中国热到对华不友好》,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 1988和1989年版,共438+
402页。

翟理斯(H·A·Giles,译者):《聊斋志异》,1880年第1版,1925年纽约
的博尼和利维奇出版社再版,2卷本。

傅路德(L·C·Goodrich):《乾隆时代的文字狱》,巴尔底摩沃韦利出版
社 1935年版,276页。

吴德昭(V·Havranek,中译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巴黎加利玛尔

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版,336 页。

庞敬仁:《马勒伯朗士的神学思想和朱熹理学的思想》,巴黎丁·福兰出版社 1942 年版,130 页。

伯戴克(L·Petech):《18 世纪初期的中国中原与西藏》,莱敦布里尔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286 页。

毕诺(V·Pinot):《中国与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1640~1740 年)》,格特纳出版社 1932 年版,480 页。

舒尔茨(A·Schlcz):《西洋楼:乾隆皇帝的“欧洲景”的研究》,施密德和舒尔茨著,1966 年版,98 页。

斯宾塞(J·D·Spence):《曹寅和康熙皇帝:奴才和主子》,纽黑文·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版,330 页。

司买卖:《道教画家》,纽约博林根基金会 1956 年版,2 卷本。

邓嗣禹:《中国科举制对西方的影响》,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 7 卷,1943 年,第 267~312 页。

菲赫勒(E·J·Vierheller):《民族精英——思想家王夫之》,载《汉堡东亚自然和民族科学史学报》第 49 卷,1968 年,共 138+30 页。

魏礼(A·Waley):《18 世纪的中国诗人袁枚》,纽约阿伦和昂温出版社 1956 年版,228 页。

王 C·C(C·C·Wang):《红楼梦》,伦敦鲁特利奇出版社 1929 年版,372 页。

杨宪益和杨 G(译者):《学者传》,北京外文出版社 1957 年版,722 页。

19 世纪

602

贝尔斯(W·L·Bales):《左宗棠:古老中国的军人和战略家》,凯利和瓦尔什出版社 1937 年版,436 页。

毕乃德(K·Biggerstaff):《中国近代早期的文人政府》,伊萨卡康乃尔大学出版社 1961 年版,276 页。

濮兰德(J·O·P·Bland)和巴克斯(E·Backhouse):《慈禧外记》,北京魏智(Vetch)版,1939 年,470 页。

濮友真(Boardman Eugene Powers):《基督教对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 年)的思想影响》,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 1952 年版,188 页。

《剑桥中国史》第 12 和 13 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12~1949 年)》,共

18+1002 页和 19+1092 页,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3 和 1986 年版。

张钟利:《中国的贵族及其在中国 19 世纪所起作用的研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55 年版,250 页。

张新保:《李钦差和鸦片战争》,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318 页。

张相则:《捻军起义》,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54 年版,160 页。

朱昌峻:《近代中国的改革家张謇(1853~1926 年)》,纽约和伦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5 年版,256 页。

朱文长:《中国西北 1861~1878 年的回乱》,海牙木冬出版社 1966 年版,232 页。

崔冬秋:《中国清代的地方政府》,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360 页。

孔宝荣(P·A·Cohen):《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 年》,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392 页。

科利斯(M·Collis):《鸦片战争》,巴黎卡尔芒—列维书局 1948 年版,336 页。

费正清(J·K·Fairbank):《中国沿海地区的贸易和外交,1842~1852 年的开埠通商条例》,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2 卷本,490 页。

费维凯(A·Feurwerker):《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 年)和官僚企业》,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8 年版,312 页。

福尔索姆(K·E·Folsom):《幕友、幕宾和幕僚:晚清时代的幕府制度》,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68 年版,234 页。

谢诺(J·Chesneaux)和巴士蒂(M·Bastid):《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1840~1885 年)》,巴黎哈蒂埃出版社 1969 年版,224 页。

解维廉尔(W·J·Hail):《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起义》,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1927 年版,422 页,纽约巴拉贡书局 1964 年再版。

郝延平:《中国 19 世纪的买办资产阶级》,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0 年版,315 页。

萧公权:《农业中国:19 世纪的皇帝控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60年版,784页。

徐中约:《伊犁事件:1871~1881年的中俄外交研究》,牛津大学克拉伦敦出版社1965年版,230页。

约翰逊(D·Johnson)、黎安友(A·J·Nathan)和罗斯基(E·S·Rawski,出版者):《中华帝国晚期的民间文化》,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450页。

603 弗兰克·金(F·H·H·King):《1845~1895年的中国货币和货币政策》,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

林太一:《镜花缘》(李汝珍著《镜花缘》的英译本),伦敦和伯克利的欧文书店1965年版,310页。

刘广京:《英—美轮船于1862~1874年间在中国的竞争》,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218页。

玛尼克斯(W·F·Mannix):《回忆李鸿章》,波士顿—纽约的胡通—米夫林出版社1923年版,298页。

马士(R·M·Marsh):《官吏——中国精英人物的流动性》,格伦科自由出版公司1960年版,300页。

梅谷(F·Michael):《太平天国起义》第1卷《历史》,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243页。

罗林松(J·L·Rawlinson):《中国1839~1895年发展海军的努力》,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318页。

海克鲁斯(J·Reclus,译者):《沈复的〈浮生六记〉》,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67年版,180页。

施友忠(V·Y·C·Shih):《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及其起源、诠释和影响》,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554页。

斯佩克托尔(Spector):《李鸿章及其淮军:19世纪的中国地区性研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359页。

邓嗣禹:《捻军及其战争》,巴黎—海牙木冬1961年版,254页。

邓嗣禹:《太平军起义历史新探》,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132页。

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于1839~1923年对西方的答复》,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纽约阿瑟诺姆出版社1963年再

版。

魏濮德(F·Wakeman):《门口上的外夷,1838~1861年华南社会的混乱》,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276页。

魏礼(A·Waley):《中国人思想视野中的鸦片战争》,伦敦阿伦和昂温1958年版,258页。

卫清心:《法国于1842~1856年的在华传教政策》,巴黎拉丁文新版本,1960年版,625页。

魏丕信(P·E·Will):《中国18世纪的荒政史》,巴黎木冬和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1980年版,312页。

芮沃寿(M·C·Wright):《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阶段:1862~1874年的同治复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426页。

20世纪上半叶

毕仰高(L·Bianco):《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年》,加利玛尔出版社1967年版,384页。

仓毕德(H·L·Boorman):《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第1卷,从爱一曲姓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484页。

凡·保文(H·Van Bovin):《中国近代文学史》,北京天主教大学(辅仁大学)1946年版,188页。

布里埃尔(O·Brière):《50年来的中国哲学思潮》,载《震旦大学学报》第604 10卷,第40期,上海1949年版,英译本于1956年在伦敦阿伦和昂温出版社版,160页。

卡梅伦(M·Cameron):《中国1898~1912年的改革运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31年版,224页。

陈荣捷(Chan Wing-tsit):《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328页。

张轲(J·K·Chang):《中国共产主义之前时代的工业发展》,芝加哥阿尔丁出版公司1969年版,144页。

谢诺(J·Chesneaux):《有关中国1919~1927年的工人运动研究》,巴黎一海牙木东出版社1962年版,562页。

谢诺:《中国的秘密会社》,巴黎于雅尔出版社1965年版,277页。

谢诺和鲁斯特(J·Lust):《当代中国史研究概论》,巴黎一海牙木东出版

社 1964 年版,148 页。

《中国年鉴》,伦敦 1912~1919 年版,天津 1912~1939 年再版。

周策纵(Chow Tse—tsung):《近代中国的文化革命——五四运动》,斯坦福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60 年版,1967 年再版,486 页。

金保光(H·Doré):《中国迷信研究》,上海徐家汇 1914~1929 年版,15 卷本。

费孝通:《中国的艰巨生活:长江流域地区生活的实地考察》,伦敦基根·保罗出版社 1939 年版,300 页。

法兰西斯(J·F·de Francis):《中国的民族主义和语言改革》,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50 年版,306 页。

弗兰格(W·Franke):《中国的文化革命——五四运动》,慕尼黑奥登堡出版社 1959 年版,90 页。

基林(D·G·Gillin):《山西军阀阎锡山,1911~1949 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334 页。

吉列玛兹(J·Guillermaz):《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 年》,巴黎帕约出版社 1968 年版。

格雷德(J·B·Grieder):《胡适和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0 年版,350 页。

赫梅里(M·Hemery):《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巴黎赫恩出版社 1970 年版,336 页。

夏志清(T·C·Hsia):《近代中国的小说史:1917~1957 年》,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1961 年版,622 页。

伊萨克(H·Isaacs):《中国革命中的悲剧》,伦敦 1958 年版,法文译本于 1967 年由加利玛尔出版社出版,446 页。

恒慕义(A·Hummel):《中国史学家自传》(顾颉刚著),莱敦布里尔出版社 1931 年版,200 页。

郎·O(O·Lang):《巴金及其著作》,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402 页。

李文森(J·R·Levenson):《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愿望》,坎布里奇(玛萨诸塞州),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316 页。

李文森:《中国的佛教及其在现代的命运》,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

社 1958 年版,224 页。

李剑农:《1840~1928 年的中国政治史》,译自汉文,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本,544 页。

林树声:《中国的新闻史》,阿维纳《观察家》出版社 1937 年版,164 页。

林语堂:《中国的新闻与公共舆论史》,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36 年版,180 页。

迈斯纳(M·Meisner):《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坎布里奇 605
(玛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326 页。

鲍威尔(R·L·Powell):《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 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51 年版,802 页。

珀塞尔(V·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伦敦—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1 年版,802 页。

珀塞尔:《义和团起义的背景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271 页。

普实克(J·Prušek):《中国的解放文学及其民族传统》,布拉格阿尔蒂亚出版社 1955 年版,740 页。

赛里丹(J·E·Sheridan):《中国军阀冯玉祥的生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版,386 页。

斯诺(E·Snow):《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译者),巴黎斯托克出版社 1965 年版,439 页。

谭春霖(C·C·Tan):《义和团大灾难》,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55 年版,276 页,纽约阿克塔贡书局 1967 年版。

曾陈(译者):《刘鹗的〈老残游记〉》,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 1964 年版,280 页。

汤姆逊(L·G·Thompson):《康有为的〈大同书〉》,伦敦阿伦和昂温出版社 1958 年版,300 页。

王·C·C(C·C·Wang):《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查佩尔希尔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版,588 页。

芮沃寿(M·C·Wright):《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1900~1913 年》,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505 页。

自 1949 年以后

巴尼特(A·D·Barnett):《早期的共产主义中国:1945~1955 年》,纽约

的普拉杰出版社 1964 年版,338 页。

白吉尔(M·C·Bergère):《1949 年至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2 版,1989 年巴黎的阿尔芒·科兰出版社版。

毕仰高(L·B·Bianco)和白吉尔:《20 世纪的中国史》,第 1 卷(1895~1949 年),巴黎法雅尔出版社 1989 年版,442 页。

毕仰高和谢维里埃(Y·Chevrier):《国际工人运动传记词典·中国》,巴黎工人出版社 1985 年版,846 页。

《剑桥中国史》第 14 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 册《中国革命的事件:1949~1965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共 17+722 页。

费维凯(A·Feuerwerker,出版者):《共产主义中国史》,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1968 年版,382 页。

基廷(J·Gittings):《中国军队的作用》,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330 页。

格尔德曼:《共产主义中国的异端文学》,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344 页。

安通(W·H·Hinton):《中国一个村庄中的共产主义革命》,巴黎普伦出版社 1971 年版,766 页。

雷斯(S·Leys):《毛泽东主席的新外衣》,巴黎自由阵地书店 1971 年版,312 页。

麦克法夸尔(R·McFarquhar,出版者):《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治挂帅》,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1966 年版,525 页。

诺思(R·C·North):《中国的共产主义》,(法译本),巴黎哈切特书店 1966 年版,248 页。

606 巴斯加里尼(J·Pasqualini):《毛泽东的囚徒:在中国劳改营中的 7 年》,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 1975 年版,338 页。

施拉姆(P·Schram):《中国农业在 1950~1959 年间的发展》,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 1969 年版,200 页。

舒尔曼(F·H·Schurmann):《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版,1540 页。

汪德迈(L·Vandermeersch):《新的汉文化圈》,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224 页。

杨庆堃(C·K·Yang):《中国的共产主义社会:家庭和村庄》,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5年版,276页。

二、历史纪年表

607

1. 中国历代王朝大事年表

新石器时代	
<p>—8000年(左右),农业的开始。</p> <p>—6000年——5000年(左右),华北种植谷子,华南种植水稻。饲养犬和猪。商王朝的许多特征已经出现。</p>	<p>神话君主:伏羲、神农、黄帝、尧、舜</p> <p>——2207——1765年,夏王朝(传统上断定的时代)。</p>
上古时代	
<p>—1800年(左右),青铜器、车辆、文字、宫廷文明、许多极小王国的联系网。种植物的极其多样性。</p> <p>——700——500年(左右),大王国的形成,战争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新的兵器、铸铁用具、以合理的方式套马车。</p>	<p>—1765——1122,商或殷王朝(传统的断代时间)。</p> <p>—1122——256,周王朝。</p> <p>—722——481年,春秋时期。—453——222,战国时期。</p>
最早的帝国	
<p>中国的统一,统一度量衡和文字。征兵。</p> <p>在武帝时代(—147——87),取消封地和在亚洲大举开拓。</p> <p>从公元187年起,便是起义和各路诸侯之间的斗争。非汉族人口穴居在华北。</p>	<p>—221——206年,秦帝国。</p> <p>—206——220,汉王朝。</p> <p>—206——9 西汉。</p> <p>9——25年,王莽篡权。</p> <p>25——220年,东汉。</p>

627

续表

中世纪

中国三足鼎立,然后又是短暂的统一。从317年起,中国北方被分裂成非汉族血统的王国。汉族精英们亡命于长江流域,形成了一个贵族阶级。

220~265年,三国。
265~316年,西晋。
317~589年,东晋南北朝。

隋唐帝国

隋统一中国,

581~618年,隋。

7世纪,向亚洲大举开拓。中国的水稻生产得到了发展(长江流域)。税收改革。旧贵族的消亡。中国分裂成10多个小国。中国南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发展,长江流域的发展和旧贵族的消亡。

618~907年,唐。
755~764年,安禄山叛乱。
907~960年,五代。

第一个文官帝国的建立

11世纪时,可以经常重铸文字,中国文人阶级得到了发展,城市和沿海出现了经济发展高潮,通过科举选拔官吏。组成职业军队。

12世纪初叶,金人(女真)占领中国北方。

960~1279年,宋代。
960~1127年,北宋。
916~1127年,东北的辽(契丹)。
1032~1127年,西北的西夏。
1115~1234年,先为金(女真),后来为中国北方的蒙古。
1127~1279年,南宋。

蒙古人在中国中原

中国被纳入了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之范围,从14世纪中叶起的民族起义。

1206~1376年,元王朝(蒙古)。

文官帝国的恢复

1368~1420年,蒙古人被驱向北方,专制主义的加强。1520~1644年,发行银币,城市和贸易发展高潮。

1368~1644年,大明王朝。

1590~1640年,政治危机和大规模暴动。满族人的威胁。	
汉(满)族帝国(大清帝国)	
<p>1644~1663年,大清政权的建立。</p> <p>18世纪时,清朝向蒙古、西域和西藏大举开拓。中国出现了全面的繁荣和人口的迅速增长。</p> <p>从18世纪末起,发生了边界冲突、起义、腐化、经济窒息。</p> <p>从1820年起,由于进口鸦片而引起财政亏损。</p> <p>从1840年起,西方国家发动了进攻。</p> <p>1860~1898年,现代化的失败。</p> <p>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建立飞地,中国逐渐丧失了其独立性。</p>	<p>1644~1911年,大清王朝。</p> <p>1851~1864年,太平军大起义。</p>
从帝国的末年到中华民国	
<p>1911~1927年,军阀混战时代。</p> <p>1927~1949年,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华民国。</p> <p>1937~1949年,日本入侵和内战。</p>	<p>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p>
中华人民共和国	
<p>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p> <p>1950~1957年,重建国家。</p> <p>1958~1959年,大跃进。</p> <p>1960~1961年,大饥荒。</p>	

续表

<p>1962~1965年,恢复经济的努力。</p> <p>1966~1968年,文化大革命,无政府状态和破坏。</p> <p>1968~1978年,文化大革命的继续。</p> <p>1978年,务实主义者复职,非毛化。向外国技术和资本开放。</p> <p>1984年,加快改革。</p>	
--	--

610

2. 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大事纪年表

历史	文明
<p>公元前17世纪,商或殷王朝的建立。</p> <p>-1384年,据董作宾的纪年表认为,商人定居于其位于安阳附近的最后京都。</p> <p>-1025年(左右),周王朝灭商,西周之初。</p> <p>-1000年(左右),在亚洲西部发展了骑马的技术。</p> <p>-827~-782年(宣王执政年间),北方民族的入侵(最早的游牧民骑兵?)。</p> <p>-771年,胡人入侵陕西,周人离开其渭水流域并将其主要住处定居在洛阳。东周的开国。</p> <p>-722年,春秋时期的初年。</p>	<p>前17世纪,黄河流域的青铜器之始。</p> <p>-1384~-1025年左右,安阳(河南)商末甲骨文。</p> <p>-10~-9世纪,最早的青铜钟鼎文,《诗经》中最古老的宗教颂歌。</p> <p>-841年,已被明确的断代的历史开始。</p> <p>-753年,秦国编年史的开始。</p> <p>-722年,鲁国编年史《春秋》的开始。</p>

630

<p>— 704 年,湖北和长江中游已经汉化的楚王国一直扩展到河南的南部。</p> <p>— 688 年,首次记载到用于指一块所获领土的“县”的名称。</p> <p>— 667 年,诸侯国之间的盟誓仪式,从而使山东的齐国成为对付胡族入侵的盟国之霸主。齐国称霸之始。</p> <p>— 632 年,山东的晋国获得霸权。</p> <p>— 606 年,楚国威胁着河南周王朝的国王。</p> <p>— 597 年,楚庄王于其对晋国的胜利后被承认为霸王。</p> <p>— 594 年,山东鲁国实施财税改革。</p> <p>— 589 年,当时的主要对手齐国与晋国发生大规模战斗。</p> <p>— 562 年,鲁国国王被剥夺权力,仅仅保留宗教特权。</p> <p>— 543 年,郑国实施税收改革。</p> <p>— 506 年,吴(江苏南部)国进攻楚国,吴占领楚国国都郢。</p> <p>— 494 年,越国向吴王称臣。</p> <p>— 486 年~— 482 年,吴国通过一条运河一直与山东之南联系起来。</p> <p>— 481 年,春秋时代结束。</p>	<p>— 513 年,首次记载到炼铁。</p> <p>— 501 年,提及四种医疗方法:检查容色和舌苔,最原始的听诊、病人的医疗史、诊脉。</p> <p>— 535 年,在郑编写第一部法典。</p>
---	---

续 表

<p>— 473 年, 吴国被其近邻越国所灭。</p> <p>— 461 年, 秦加固黄河西南端的堤防。</p> <p>— 453 年, 三家分晋(汉、魏、赵)。战国时期开始。</p> <p>— 445 年, 楚国向东侵吴而扩张。</p> <p>— 408 年, 北狄人被挫败。魏将秦驱向西方, 一直扩张到北部的洛水并于那里建造一道防线。</p> <p>— 367 年, 周王室分裂成两个王国: 西周和东周。</p> <p>— 361 年, 法家变法派公孙羊(商鞅)入秦。</p> <p>— 358~—352 年, 魏加强了北部洛河流域的防务, 并将其防卫区一直扩大到鄂尔多斯河套。</p> <p>— 356~—338 年(左右), 商鞅在秦国实行大变法。</p> <p>— 354~—351 年, 河北西南的赵国京都邯郸被围。</p> <p>— 334 年, 楚国吞并越国(长江下游和浙江北部)。</p> <p>— 328 年, 秦朝设立第一位丞相。</p> <p>— 325 年, 秦公称王。</p> <p>— 318~—316 年, 秦进入四川的成都平原。</p>	<p>— 479 年, 传统上认为是孔子去世的时间。</p> <p>— 467 年, 观察到哈雷彗星。</p> <p>— 444 年, 阳历年的计算: 365.25 天。</p> <p>— 395 年(左右), 魏相法家代表人物李悝(李克)去世。</p> <p>— 381 年(左右), 墨子去世。</p> <p>— 350 年(左右), 比较古老的星辰目录。</p> <p>— 335 年(左右), 重己主义的鼻祖——悲观主义哲学家杨朱逝世。</p>
---	--

-307年,山西北部的赵王国建立了一支抵抗草原游牧民的骑兵。

-300年左右,北方的诸王国修造了一道抵御蒙古和满洲草原游牧民骑兵的长城。四川岷江上游大兴水利工程。

-298~-280年,楚国远征四川东部和云南。

-286年,齐国消灭了河南东部的宋国。

-280年,秦进入贵州。

-278~-287年,秦击楚而向湖北和湖南扩张。

-277年,秦国再次远征长江三峡和贵州地区。

-256年,秦灭周王室,东周灭亡。

-246年,未来秦王朝的第一位皇帝秦王政即位。在秦国于陕西修造一条长150公里的灌渠。

-239~-235年,向秦迁移人口以居住在渭水流域。

-237年,李斯继吕不韦出任秦相。

-221年,秦帝国建立。

-221~-214年,远征福建、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

-220年,建立驰道。重建和延长在-300年左右建造的长城。

-300年左右,名家惠施和道教哲学家《庄子》的作者庄周(庄子)逝世。

-289年左右,孔子的继承人孟子去世。

-277年左右,楚国大诗人屈原逝世。

-250年左右,名学人公孙龙逝世。

-240年,观察到了哈雷彗星。约为-240年,齐国五行专家邹衍逝世。

-235年,受法学家影响的具有儒教倾向的社会学家荀子去世。

续 表

613	<p>—215年,蒙恬在蒙古发动了对匈奴人的远征。</p> <p>—214年,远征南越(广州和河内地区)。将50万囚犯迁至南越。</p> <p>—212年,始皇晏驾。</p> <p>—200年,起义和内战开始。由匈奴单于昌顿建立了第一个草原汗国。</p> <p>—208年,陈涉领导的人民起义。</p> <p>—207年,秦二世皇帝遭弑。</p> <p>—206年,秦王朝灭亡。</p> <p>—203年,项羽和刘邦瓜分中国。项羽的楚国在东,刘邦的汉国在西。</p> <p>—202年,刘邦消灭了项羽并自称汉朝皇帝。</p> <p>—201年,刘邦将帝国的部分国土作为封地而封给其旧日的战友。</p> <p>—200年,刘邦立都长安,即今陕西之西安。</p> <p>—200年左右,汉朝的防线全面向长城以南撤退。</p> <p>—198年,齐(山东)和楚(长江下游)的豪门富户被大量迁至长安。与匈奴议和。</p> <p>—191年,秦朝最严酷的法律被废除。</p> <p>—188年,对待商贾们的法律缓和了。</p>	—213年,“焚书”事件。
-----	--	---------------

<p>-187年,再次撤销秦代刑法。</p> <p>-180年,吕后薨逝,吕氏成员被铲除。</p> <p>-179年,南越归附汉朝。</p> <p>-177年,匈奴推进到河南。</p> <p>-175年,允许私人铸币。</p> <p>-174年,匈奴汗国的缔造者昌顿单于薨逝。</p> <p>-167年,使人致残的酷刑被从法典上删除,新设强迫劳动刑。</p> <p>-166年,首次提到在草原边境上的烽燧法律制度(火、烟)。匈奴入侵。</p> <p>-165年,为选拔官吏而首开科场。</p> <p>-158年,首次提到北方边境上的军屯。</p> <p>-144年,匈奴入侵山西和抢劫御马场的马匹。</p> <p>-141年,武帝(孝武帝)登基。</p> <p>-139年(或-135年),张骞出使西域以寻找大月氏。</p> <p>-136年,根据唐蒙的上谏而考察从四川通向缅甸和印度的道路。</p> <p>-131年,为进入云南和贵州而作出努力。</p> <p>-130年,四川与贵州之间的道路建成。</p>	<p>-174年,贾谊(-200~-168年)呈奏王《治安策》。</p> <p>-157年,道教文人和《新语》作者陆贾去世。</p> <p>-140年,第一部汉文炼丹术著作。</p> <p>-135年(左右),《韩诗外传》首次提及雪花六棱水晶石的形状。</p> <p>-133年,派遣方士以寻找长生不老岛。</p>
---	---

续 表

<p>-129年,在陕西与河南之间修建一条150公里的灌渠。</p> <p>-128年,第一次远征满洲和高丽。</p> <p>-127年,在诸王子之间分配封地的法律。</p> <p>-126年,张骞自大宛和大夏返回。</p> <p>-124年,淮南王刘安企图叛乱。</p> <p>-122~ -109年,汉朝向南开拓。</p> <p>-120年,70余万已经汉化的山东人被迁往陕西。</p> <p>-119年,设立国家对盐和铁的专营权。</p> <p>-117~ -115年,创设甘肃诸郡。</p> <p>-115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前往乌孙地区(伊犁河流域)。</p> <p>-113年,在西北地区大举从事灌溉和土地开发工程。</p> <p>-102年,在蒙古设立工事。士兵和苦役犯将长城从兰州延长到玉门关。</p> <p>-99年,汉帝国东部的人民起义。</p> <p>-98年,国家对酿酒的专营。</p> <p>-95年,在陕西修成将渭水与泾水连接起来的100公里的灌渠。</p>	<p>-124年,设立一个由50名新经学家组成的机构。</p> <p>-122年,淮南王刘安就在写成道家著作《淮南子》的宫中自杀。</p> <p>-120年,建立负责搜集民歌和情歌的乐府。</p> <p>-117年,著名的赋作家司马相如逝世。</p> <p>-109年,寻找仙人岛。</p> <p>-105年,公元前2世纪时最重要的经典诠释人董仲舒去世。继遣使出使西域诸王国之后,葡萄和苜蓿传入中国。</p> <p>-104年,对历书实施根本改革。</p>
--	--

续表

<p>—87年,武帝晏驾。</p> <p>—68年,放弃了位于长城之外的哨卡。</p> <p>—64年,汉朝将其力量集中在对绿洲南路一线的防卫上了。</p> <p>—60年,匈奴势力开始衰落。</p>	<p>—93年,发现了古文经典稿本著作。</p> <p>—92年,对皇宫中巫术活动审判的开始。</p> <p>—92年左右,《史记》的作者——大史学家司马迁逝世。</p> <p>—89年,登泰山封禅。赵过发明新的农具和一种划分耕田的新方法代田法。</p> <p>—81年,有关放弃或维持国家对于盐、铁和酒的专营权的辩论。这次辩论会的内容于数年之后发表在《盐铁论》中了。</p> <p>—63年,小亚细亚最古老的水碓。</p> <p>—52年,郭守常发明圆柱线。</p> <p>—51年,宫中召开有关经典诠释的会议。</p> <p>—46年,召募阴阳和预言专家。</p> <p>—41年,国学学生的数目达1000人。</p> <p>—28年,系统地记载太阳黑子。</p>
--	--

续表

<p>-18年,出售官位。</p> <p>-14年,农民起义。</p> <p>-7年,限制私人地产的计划。</p> <p>-3年,鲍宣对时政的批评和农民所受的压迫。</p> <p>-1年,王莽势力开始加强。</p> <p>2年,现在所知的最早人口普查,共有12366470户和51671400口人。</p> <p>6年,平王晏驾后暂掌政权的王莽实施一种摄政,一名刘氏宗王反叛王莽。</p> <p>7年,王莽改革币制。</p> <p>9年,王莽创建新王朝,使土地“国有化”。</p> <p>10年,汉朝旧贵族被沦至平民百姓的地位了。</p>	<p>-26年,皇家典校秘书刘向呈奏其《洪范五行传》。对佚书的研究。</p> <p>-15年,有关汉语方言的第一部著作《方言》问世。</p> <p>-8年,太学的学生增加到3000人。</p> <p>-7年,取消乐府官,刘向作《七略》的图书分类。</p> <p>-6年,《新学》和《说苑》的作者刘向逝世。</p> <p>-3年,西王母的护身符在山东平民中流传。</p> <p>-2年,禁止“殉死”。</p> <p>5年,法制专家和经典学家孔光逝世。</p> <p>8年,唯理主义哲学家和道家学家杨雄逝世,他是古文传说的支持者,也是《方言》与《太玄经》的作者。</p>
---	---

616

<p>11年,黄河决堤并改变河道。</p> <p>17年,人民起义继自然灾害和征兵之后扩大了。</p> <p>20年,王莽在长安从事豪华建筑。</p> <p>22年,为镇压山东与河北被称为赤眉军的起义而发动征战。</p> <p>23年,由王莽建立的政权因人民起义和皇家旧贵族的反抗而崩溃。</p> <p>25年,赤眉军进入长安。刘秀称帝,始创东汉,立都洛阳。</p> <p>27~28年,汉朝新皇帝排斥了其竞争者,镇压了赤眉起义。</p> <p>36年,恢复四川和消灭成汉王国。</p> <p>40年,红河流域和广东西部的人民起义。</p> <p>42~43年,马援胜利平息征侧和征贰姊妹领导的越南人叛乱。</p> <p>50年,内附汉朝的南匈奴人栖身于山西和陕西之北。</p> <p>57年,日本国北部九州的一个使节赴华。</p>	<p>20年,首次提到水动打击乐。</p> <p>23年,皇家藏书阁的典校秘书刘歆出版了古代文献,其中包括《左传》和《周礼》。</p> <p>31年,首次提到将水力用于炼铁高炉。</p> <p>56年(左右),唯理主义哲学家桓谭去世。</p> <p>65年,首次提到江苏北部彭城的一个僧众集团。</p>
--	---

续表

69年,维护500多公里的黄河河堤。

70年,修成河南汴河上的运河。

73~94年,班超将军恢复了汉朝对近60年来失去的西域诸绿洲的控制。

77~79年,于阗变成了汉朝安西都护府的治所。

87年,贵霜使节出使洛阳(进贡狮子)。

88年,取消对盐和铁的专营权。

89~105年,印度使节赴洛阳。

97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东罗马,从安息帝国边境返回。

101年,安息遣使中国。

78年,赋和一种政论著作《明世论》的作者杜笃逝世。

79年,宫中有关诠释经典的会议,其纪要为《白虎通》提供了内容。

82年左右,班固及其妹班昭所修的《汉书》问世。

83年,王充的《论衡》问世,对迷信和世人接受的观点作了批判,对自然现象作了博物学家的解释。选择了研究《左传》、《谷梁传》、《古文尚书》和《毛诗》的专家。

100年,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问世(9353条目)。首次用汉文编译一部印度文佛经。

101年,古文经典诠释者贾逵逝世。

105年,太监蔡伦向皇帝呈献最早类型的纸。

续表

<p>106年,日本的一个公国遣使中国。</p> <p>120年,缅甸掸国的一个使节向洛阳宫中进贡大秦国的幻人。</p> <p>125年(左右),太监们的势力得到了发展。</p> <p>125~150年(左右),汉朝恢复其在西域的统治。</p> <p>132年,首次提到中国与爪哇的官方关系。</p> <p>135年,太监们被允许收养子嗣。</p> <p>140年,浙江会稽地区修灌溉工程。鲜卑人的入侵迫使汉朝让出了很大一块领土。</p> <p>157年,人口普查,共有56486856口人。</p>	<p>118年(左右),张衡的天文学著作《灵宪》问世。</p> <p>124年,张衡造浑天仪。</p> <p>127年,方术专家樊英被召入宫。</p> <p>132年,由张衡造成候风地动仪。</p> <p>139年,天文学家、算学家和诗人张衡逝世。</p> <p>142年,炼丹术著作《周易参同契》问世。</p> <p>147年,安息僧安世高到达长安,他是已知的第一位将印度文佛经译作汉文的译经师。</p> <p>151年,具有法家倾向的作家崔寔的《政论》问世。</p>
--	---

618

续 表

<p>161年,印度使节经东南亚入华。</p>	<p>165年(左右),社会和政治批评著作《潜夫论》的作者王符逝世。</p>
<p>166年,东罗马商人使者到达中国。</p>	<p>166年,首次提及洛阳宫中的佛教仪轨。伟大的经典注释家马融逝世。</p>
<p>175年,太监们的权力扩大。</p>	<p>173年,为弓弩而发明了瞄准窗仪器。</p>
<p>189年,屠杀宦官,董卓抢劫洛阳。</p>	<p>175年,由蔡邕在京师用三种文字将经典雕版。</p>
<p>190年,曹操势力开始扩大。190年左右,五斗米道教派的信徒们在四川和陕南创建一独立国。与西域交通从190年起中断。</p>	<p>182年,该时代新文传统的唯一代表人物和董仲舒的继承人何休去世。</p>
<p>194年,长安发生饥荒。</p>	<p>190年,汉代文集与档案在董卓军洗劫洛阳时失散。190年左右,《数书记遗》问世并被归于徐岳。</p>
<p>195年,孙策身亡,其弟孙权继任。</p>	<p>192年,有关汉代政治制度的著作《独断》的作者蔡邕去世。一部有关今北京地区习俗的论集和一部《礼记》疏注文的作者卢植逝世。</p>
	<p>193年,江苏北部彭城建立佛寺。</p>
	<p>200年,伟大的经典疏注家郑玄去世。</p>

<p>201年,曹操控制了几乎整个中国北方。</p> <p>208年,刘备与孙权联盟破曹,曹军于长江中遭到了一次重大的失败(赤壁之战)。</p> <p>211年,刘备立足于四川。</p> <p>212年,孙权立足于他建国的南京并命名为建康。</p> <p>220年,曹操逝世,其子曹丕称魏帝,汉朝亡。三国时代开始。</p> <p>221年,刘备于四川建立蜀汉国并立都成都。</p> <p>222年,孙权自称吴帝。</p> <p>230年,吴国发动海上远征。</p> <p>234年,蜀汉丞相诸葛亮逝世。</p> <p>243年,扶南(柬埔寨)使节出使南京。</p> <p>249年,司马懿将军在魏国发动军事政变。</p>	<p>220年,诗人与将军曹操逝世。</p> <p>220~225年,洛阳的印度—斯基泰(大月氏)家族的高僧支谦于南京译《阿弥陀经》和《维摩诘经》等大乘经文。</p> <p>226年,曹操之子和曹魏第一代皇帝诗人曹丕晏驾。</p> <p>229年左右,吴国出使扶南(柬埔寨)的使者朱应写成《扶南异物志》。</p> <p>240~248年左右,在洛阳将三部经典(《诗经》、《春秋》和《左传》)被勒石为纪。</p> <p>247年,出身于越南的粟特人家族的文人高僧康僧会到达南京。</p> <p>249年,玄学派哲学家何晏与王弼逝世。</p>
--	---

续表

<p>265年,司马炎在洛阳创建晋王朝。</p> <p>268年,晋泰始年间晋律问世(共计2926条)。</p> <p>280年,晋夺取南京并吞并吴国。</p>	<p>255年(左右),佛经译师高僧支谦圆寂。</p> <p>256年,具有法家倾向的经典学家王肃逝世。</p> <p>259年,现在所知的第一位中国朝圣进香人出发赴西域。</p> <p>260年左右,被认为是“反切”的发明人孙炎逝世。</p> <p>262年,诗人和道教音乐家嵇康归真。</p> <p>263年,诗人阮籍去世。</p> <p>265年,名医华佗去世,医操(五禽戏)、按摩和理疗法应追溯到此人。^①</p> <p>271年,第一位使用一种北—南和东—西格方法的地图学家裴秀去世。</p> <p>279年,在河南的一座墓中发现了一批可断代为战国时代和包括《魏书》与《穆天子传》等著作在内的竹简。</p> <p>282年,针灸著作《鍼灸甲乙经》的作者黄甫谧逝世。</p>
--	---

① 据史载,华佗逝于208年,为曹操所杀——编者。

续表

<p>304年,李雄在成都称王,四川与云南的一部分地区组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已经汉化的匈奴部族首领刘渊在山西创建了一个独立王国。</p> <p>310年,将大批汉族上层阶级的人放逐到南方。</p> <p>311年,洛阳被匈奴雇佣军抢劫一空。</p> <p>313年,高丽乐浪郡被撤销。</p> <p>316年,匈奴人刘曜包围并夺取长安。西晋王朝的抵抗在无政府状态和已经汉化的胡族起义暴动的冲击下崩溃。</p> <p>317年,司马睿在南京称帝,东晋王朝开始。</p> <p>319年,石勒在河北称赵王。</p>	<p>284年,律令学家、《左传》的集解者、工程师和机械发明人杜预逝世。</p> <p>285年(左右),《三国志》(220~280年)问世。</p> <p>286年,竺法护在长安首次将《正法华经》译作汉文。</p> <p>300年,《左传》的诠释者、玄学派哲学家裴颢和向秀逝世。约300年,被归于王叔和的《脉经》问世。</p> <p>310年,鬼神方术高僧佛图澄入长安。由陈卓绘成第一幅天图。</p> <p>312年,《庄子》的诠释人和玄学派哲学家郭象逝世。</p> <p>317年左右,葛洪大师的道教修持术著作《抱朴子》问世。</p>
--	---

620

续 表

<p>347年,晋军一直进入到成都并吞并了成汉国。</p> <p>351年,在长安创建秦国。</p> <p>354年,在甘肃建前梁王朝。</p> <p>357年,前凉第三位皇帝苻坚即位。</p> <p>364年,在晋朝设立“黄册”以统计北方的流民。</p> <p>373年,苻坚占据四川、云南和贵州的部分地区。</p> <p>376年,苻坚吞并了甘肃的凉王国并将其控制扩大到了西域。整个中国北方被统一起来了。</p>	<p>320年左右,发现了从-134年就已经在希腊为人所知的岁差分点。</p> <p>324年,东晋占卜专家、《穆天子传》与《山海经》的诠释专家郭璞逝世。</p> <p>349年,关雒指出在芽庄(越南)的纬度线上,日晷影子转向了南。</p> <p>365年,道安的弟子佛教高僧慧远离开襄阳前往江陵。</p> <p>365年左右,书法家王羲之去世。敦煌千佛洞首批工程开工。</p> <p>374年,道安撰已译作汉文的大藏经目录(共600多种)。</p> <p>380年,佛教高僧慧远定居在庐山(江西的九江地区)。</p>
--	---

<p>386年,拓跋魏或北魏王朝建立。</p>	<p>384年左右,庐山的大佛寺东林寺建成。</p> <p>386年左右,第一位自焚的佛教出家人。</p>
<p>389年,后凉王朝建立。</p>	
<p>398年,魏王朝夺取后燕首都邺。</p>	<p>399年,法显和尚出发经西域赴印度。</p>
<p>400~402年,宋恩在浙江和江苏以北的起义。</p>	<p>401~404年左右,智严和尚在剡宾居住。</p>
<p>402年,晋帝国中央省份之主桓玄反叛并向南京推进。</p>	<p>402年,龟兹的大译师鸠摩罗什到达长安。</p>
<p>404年,桓玄专制政权的崩溃,东晋恢复在南京的统治。</p>	<p>404年,智猛率另外15名僧侣出发以赴西域和印度。慧远的论著肯定了出家人对于世俗政权的独立关系。</p>
	<p>411年,历史上第一位名画家顾恺之逝世。</p>
<p>417年,晋军进入长安并消灭了后秦王朝。</p>	<p>412年,法显自印度、锡兰和苏门答腊返回,于山东海岸登陆。</p>
<p>420年,刘裕篡权并在南京创建宋王朝。</p>	<p>414年,《法显传·佛国记》问世。</p>
<p>422年,北魏进攻宋帝国。</p>	<p>420年,道教民俗著作《搜神记》的作者于宝归真。法勇率另外25名佛教出家人出发赴印度。</p>

续 表

423年,北魏占据河南洛阳并筑一道长1000多公里的长城以抵御柔然的入侵。高句丽(朝鲜)使者入宋。

439年,南北朝时期(440~589年)开始。

450年,名相崔浩逝世,他是北魏变法的主要设计者(汉地的行政方法与汉地法典)。

478年,魏王朝禁止在贵族和平民之间通婚。

479年,萧道成称帝并在南京创建齐王朝。

485年,在魏王朝中开始执行一种分配土地的制度(在大田作物田与桑田之间作了区别)。

427年,著名受道教影响的诗人陶潜(陶渊明)逝世。

430年左右,《后汉书》问世。

433年,受佛教影响的大诗人谢灵运逝世。

435年,印度僧求那跋陀罗抵达广州。

444年,在寇谦之的影响下,道教在北魏被晋升为国教。

456年,刘宋王国著名诗人颜延之逝世。

460年,高僧昙曜被敕封为北魏僧众们的都统。

477年,在一部汉文著作中,首次对马蹬作了描述。

续表

<p>493年,魏迁都洛阳。</p> <p>502年,萧衍在南宋称帝并创建梁王朝。</p> <p>518年,宋云被魏王朝的胡皇后派遣出使印度。</p> <p>525~527年,魏帝国北部边陲的军人和古游牧民起义。</p>	<p>488年,南京宋王朝的断代史《宋书》出版(420~479年)。</p> <p>489年,大同附近的云岗佛教石窟工程开始。</p> <p>495年,北魏新首都洛阳附近的龙门佛教石窟工程开始。</p> <p>496年,河南嵩山佛教名刹少林寺建成,它后来于唐代变成了佛教禅宗的大中心之一。</p> <p>500年左右,文学批评名著《文心雕龙》问世。最古老的绘画批评著作《古画品录》和童蒙读本《千字文》问世。</p> <p>502~549年,梁武帝成了菩萨王和虔诚的佛教徒。</p> <p>508~525年,这是北魏在龙门大举建造佛教石窟的时代。</p> <p>510年,《水经注》(地理学和民俗学著作)问世。</p> <p>513年,梁武帝的谋臣哲学家沈约去世。</p> <p>515年,由僧佑编写的汉译佛经目录《出三藏记集》问世。无疑是在515~518年间,《弘明集》问世,这是支持佛教的一部护教性著作。</p>
--	---

622

续表

534年,高欢迁都邺,建立东魏。

535年,西魏开国于长安。

543年,由东魏建筑防御突厥人的长城。

544年,越南宣布成立大越国。

548年,侯景包围南京。

550年,高洋在邺夺权并创建北齐王朝。

552年,突厥人于522~555年间创建了一个新的草原汗国。

553年,西魏占据四川。

623

555~556年,为在北齐的北疆修建大长城而征募180万民工,自543年以来建成的工程达1500公里。

557年,宇文觉在长安建北周帝国。陈霸先在南京建陈帝国。

564年,北齐律问世,成为隋律与唐律之先祖。

530年(左右),梁慧皎的《高僧传》问世。

536年,梁道教天师陶弘景归真。

540年(左右),著名的农业技术(华北)的著作《齐民要术》问世。

547年,对洛阳及其寺庙的描述著作《洛阳伽蓝记》问世。

554年,魏收在北齐修成《魏书》。

续表

<p>577年,周吞并齐的领地。整个中国北方统一。</p> <p>581年,杨坚将军在长安建立隋王朝。</p> <p>583年,隋战胜突厥和吐谷浑。</p> <p>585~587年,在北部建大长城和在扬州地区建大运河。</p> <p>589年,隋军进入南京,灭陈帝国。</p> <p>604年,隋炀帝登基称帝。</p> <p>605年,大运河水系工程竣工。洛阳大兴土木。</p> <p>614年,隋炀帝第三次征高丽。</p> <p>617年,山西太原留守李渊联合突厥人向长安进军。</p> <p>618年,在扬州弑杀炀帝,李渊在长安建唐朝。</p> <p>619年,唐朝制定了租庸调法。</p> <p>624年,颁布农业法(以永业田的名义分配大片耕地的制度)。</p>	<p>574年,在北周发生了灭佛的法难。</p> <p>594年,汉译佛经目录——法律的《众经目录》问世。</p> <p>597年,佛教天台宗创史人智顓圆寂。</p> <p>600年左右,最早的悬空铁索桥建成。</p> <p>620年,在非洲东海岸发掘出了中国最古老的钱币。</p>
--	---

续 表

<p>630年,唐朝取得了对突厥人的决定性胜利。日本派遣第一个遣唐使入唐。</p> <p>630~645年,唐进入西域并控制了交通要塞。</p> <p>638年,波斯使节入长安。</p> <p>643年,拜占庭使节赴长安。</p> <p>644年,唐朝从陆路和海路向高句丽发动进攻。</p> <p>655年,唐朝为支援受到高句丽和百济攻击的新罗而发动了对高句丽的远征。</p> <p>657年,唐与回纥迫使西突厥人遭到了一次严重失败。</p> <p>661年,中国在劄宾、乌浒水流域、吐火罗和东伊朗的边陲建立政权。</p> <p>663年,中国军队战胜了前来支援百济的倭国军队。</p>	<p>629年,玄奘离长安经西域赴天竺求法进香。</p> <p>631年,《福音书》被来自伊朗的景教徒们传入长安。</p> <p>645年,6~7世纪的高僧传《续高僧传》问世。高僧玄奘自印度返回,《大唐西域记》问世。</p> <p>652年(左右),印度人甲士校卫被录用于钦天台。</p> <p>656年,《隋书》、《算经十书》问世。</p> <p>659年,《南史》问世。</p>
---	---

<p>665年,唐朝在国家养马场中拥有70万匹战马。</p> <p>666~668年,中国人在高丽获胜,灭高句丽和百济国。满洲和高丽被置于了唐朝的控制之下。高丽南部被唐朝的盟友新罗王国占据。</p> <p>680年,吐蕃对西北和西域的入侵日趋严重。</p> <p>684年,武后攫取朝政。</p> <p>690年,武后创建新王朝周(690~705年)。</p> <p>691年,渭水流域的数十万家庭被迁往洛阳地区。</p> <p>692年,通过科举而铨选官吏办法的发展。在西域于龟兹重建护都府。</p>	<p>664年,佛教高僧玄奘圆寂。支持佛教的护教文集《广弘明集》问世。</p> <p>667年,有关律和中国佛教史的专家高僧道安圆寂。</p> <p>668年,佛教百科全书《法苑珠林》问世。</p> <p>670年,饮食学论著《食疗本草》问世。天文学家李淳风归真。</p> <p>671年,高僧义净从广州离开中国而前往东南亚和印度取经寻法。</p> <p>672年,天象图。</p> <p>673年,大画家和中世纪传统的继承人阎立本逝世。</p> <p>681年,佛教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善导圆寂。</p> <p>690年(左右),义净有关前往印度朝圣进香人的著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问世。</p> <p>692年,义净记述印度和东南亚佛教状况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问世。</p>
---	--

续 表

694年,唐朝战胜吐蕃和突厥人。

705年,重建唐王朝。

710年,初设节度使。

712年,玄宗皇帝登基。

694年,摩尼教信仰获武则天皇后允许。

710年,刘知几的《史通》问世。

713年,成为南禅宗之祖的广东高僧慧能圆寂。

716~746年,日本僧玄昉圆寂。

718年,由瞿昙·悉达所译印度天文学著作《九执历》问世。

721~725年,一行和尚为测量从纬度 41° ~ 17° 线的二至点的影子而从事科学考察。

725年,一行发明了漏水转动浑天铜仪。

625

725年,自705年起重建国家牧场并拥有42万匹马。

733年,皇家官吏的数目多达17680名,而地方上选拔的职员人数则多达57416名。

734年,由裴耀卿对漕运系统作了改革。

742年,由10位节度使负责守卫边境。安禄山控制了河北、山西、山东和南满诸军。

745~751年,唐军在河中府和位于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反击大食人。

751年,由高丽血统的高仙芝将军指挥的唐朝军队被大食人于怛逻斯河畔的阿拉木图击败。

<p>755~763年,安禄山和史思明叛乱。</p> <p>756年,安禄山称帝,唐玄宗亡命四川。</p> <p>757年,安禄山去世。史思明继任他为叛军首领。</p> <p>758年,唐朝建立盐业的专营制度。</p> <p>762年,回鹘人抢劫了长安并威胁其居民。</p> <p>763年,安禄山叛乱被平息。肃宗皇帝返回长安。</p> <p>768年(之后),节度使越来越独立地行事。</p> <p>778年,出自专营盐的收入超过了唐朝全部收入的半数。</p> <p>780年,杨炎对税收作了根本改革,由按收入课税取代按家庭收税的税制。</p> <p>787年,唐蕃会盟条约。唐与回鹘人和南诏人结盟以抵御吐蕃人。</p> <p>790年,唐失去了对位于玉门关(甘肃西部)以西的全部领土的控制。</p>	<p>761年,画家和诗人王维去世。</p> <p>761年左右,《manyoshu》传到日本。</p> <p>770年,诗人杜甫逝世。</p> <p>781年,长安竖立汉文和叙利亚文景教石碑。</p>
---	---

续表

626

806~820年,太监阉党们控制了政府。

821年,在长安缔结唐蕃会盟条约,次年在拉萨得到批准,承认了吐蕃人占领甘肃。

826年,一个太监家族匡扶文宗皇帝即位。

840年,回鹘部族四散并分裂。

845年,继大规模的法难之后,又没收了寺院的铜器、土地和奴婢。

797年,汉印僧侣在拉萨大辩论。

800年左右,从上古到800年左右的制度史——杜佑的《通典》问世。

805年,著名舆地学家贾耽和史学家陆贽逝世。

806~820年,最早的期票(飞钱)出现。

819年,韩愈上表抑佛。与韩愈同为“古文”最早卫道士的柳宗元逝世。

841年左右,朱景玄的绘画评论著作《唐朝名画录》问世。

842~845年,禁废外来宗教和佛教。

844年左右,11世纪“理学”的先驱李翱逝世。

846年,诗人白居易逝世。

847年,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问世。

858年,诗人李商隐去世。

续 表

<p>863年,南诏军队夺取河内。南诏入侵四川。</p> <p>866年,南诏面对唐朝的攻击而撤出越南北方。</p> <p>874~884年,黄巢和王仙芝的流浪性暴动。</p> <p>879年,黄巢军队洗劫广州。</p> <p>880年,黄巢军队返回河南,洛阳遭到了刀火之灾。</p> <p>884年,黄巢暴动结束。</p> <p>893年,黄河决堤并改变河道。</p> <p>894年,日本第19次和最后一次派出遣唐使。</p> <p>895年,长安处于混乱之中。</p> <p>902~909年,唐帝国被瓜分为数个独立王国。</p> <p>907年,朱全忠在开封创建梁王朝,五代时期开始。</p> <p>916年,在东蒙古和满洲建立突厥—蒙古族的契丹王国。</p> <p>923年,后唐帝国建立。</p> <p>936年,在开封建立后金王国。</p> <p>939年,越南变成独立国。</p>	<p>860年左右,有关云南史(历史、民族和植物)的《蛮书》问世。</p> <p>862~866年,日本高僧真如法亲王在华。</p> <p>920年(或923)年,契丹人为其语言记音而采纳了一种模拟汉文的文字。</p> <p>932~952年,在开封刊印木刻版九经。</p>
--	---

627

续 表

<p>947年,契丹大举入侵晋帝国并夺取开封,后晋帝国崩溃。契丹取辽王朝的尊号。在开封建立后汉。</p> <p>951年,在开封建立后周。</p> <p>960年,赵匡胤在开封建立宋王朝。</p> <p>969年,在地方上,文职官吏正逐渐取代了军人官吏。</p> <p>971年,宋军进入广州,南汉国亡。</p> <p>973年,宋朝开科取仕。</p> <p>975年,宋军进入南京,江南王国(南唐)亡。</p> <p>978年,宋吞并吴越国。</p> <p>979年,整个中国被宋朝统一。</p>	<p>940年,汉文文献中首次提及舵。</p> <p>955年,在北周发动法难而灭佛。</p> <p>966~976年,汉僧最后一次赴西域和印度的重要取经。</p> <p>967年,《旧五代史》(907~960年)修成。画家和绘画技术革新者李成逝世。</p> <p>970年开始,出现由于离心力、连杆和活塞杆而产生往返和旋转运动的内部变化(欧洲于1450年才出现)。</p> <p>971~983年,成都刊印佛经。</p> <p>978年,可能是首次为传力而使用无限长的绳子(在欧洲于19世纪才出现)。</p>
---	---

续表

<p>983年,设立主管经济的三司:国家专营、农业税和度支。</p> <p>993年,在宋帝国的大行政区中建立盐茶署。</p> <p>1004年,宋与契丹之间签订澶渊之盟,契丹迫使宋每年交纳丝绸和白银的沉重贡物。</p> <p>1012年,宋朝首次大量从占婆进口多种早熟稻。</p> <p>1038年,唐古特人建立了夏王国或称西夏王国。</p>	<p>981年,首次刊印自汉至宋的巨部故事集《太平广记》。</p> <p>983年,类书《太平御览》问世。</p> <p>984年,第一道河渠的闸门造成。</p> <p>986年,6~10世纪的文集《文苑英华》的问世。辞书《龙龕手鑑》在契丹人中问世。</p> <p>990年左右,在一部勘輿著作中提到了罗盘。</p> <p>1004年,禅宗高僧传《景德传灯录》问世。</p> <p>1010年,共计1566卷的宋帝国的图解輿地书《诸道图经》问世。</p> <p>1013年,文献与政论文集《册府元龟》问世。</p> <p>1022年左右,巨部道教类书《云笈七籤》问世。</p> <p>1024年,第一次在四川发行纸币。</p> <p>1027年,造成了一个车辆计程表。</p> <p>1034~1036年,范仲淹和欧阳修编制皇家藏书阁的目录。</p>
--	---

续表

628

1044年,宋与西夏之间签订会盟条约,西夏迫使宋王朝每年纳高昂的丝绸、白银和茶叶的贡品。

1068年,严格行用王安石在税收、行政和军事方面的新法。

1073年,仅仅在1073年间就共铸造6亿枚铜钱。

1077年,黄河在开封下游决堤。

1085年,保守派人士司马光应召参政。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

1040年,兵书巨作《武经总要》问世(通过暂留现象而描述磁性)。

1041~1048年,最早试用活字印刷。

1053年,改革家范仲淹逝世。

1054年,记录到一颗超新星。

1061年,欧阳修修成了《新唐书》(618~907年)。

1063年,欧阳修的石刻碑铭著作《集古录》问世。

1070年左右,欧阳修修成《新五代史》。

1073年,哲学家周敦颐逝世。

1077年,数学家和自然学家邵康节(邵雍)逝世。哲学家张载去世。

1080年,各种杂记集和中国科学史的主要史料之一《梦溪笔谈》问世。

1084年,公元前403~公元959年间的著名中国通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问世。数学著作集《算经十书》付梓。

1085年,哲学家程颢逝世。

续表

<p>1086年,王安石和司马光逝世。</p> <p>1087年,在泉州设立市舶司。</p> <p>1094年,王安石的新法逐渐被施行,改革变法家被从其流放地召回。</p> <p>1115年,女真人在满洲创建了金帝国。</p> <p>1122年,金和宋联合夹攻辽帝国。金人夺取北京。</p> <p>1125年,契丹的辽帝国亡,金大举入侵中国北方。</p>	<p>1086年,苏颂的仪象著作问世。</p> <p>1088年,苏颂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建成。</p> <p>1090年,现已得到证实的首次在中国船舶上使用的指南针的技术。</p> <p>1101年,著名诗人苏轼(苏东坡)逝世。</p> <p>1103年,《营造法式》问世,这是一部有关建筑术的巨著。</p> <p>1105年,著名文学家黄庭坚逝世。</p> <p>1107年,画家和美学家、《画史》的作者米芾逝世。</p> <p>1108年,程颐逝世。</p> <p>1123年,皇帝收藏的绘画和书法作品目录《宣和书画谱》问世。</p> <p>1124年,禅宗“公案”文集(修道内容)《碧岩集》问世。</p> <p>1125年,画家、美学家和文物搜集家徽宗皇帝统治的结束。</p>
---	---

续表

1127年,面对金人的进攻,宋王朝逃往长江以南。南宋王朝开国。

1138年,宋金之间签订和约。

1148年,黄河改道。

1151年,金迁都北京(燕京)。

1154年,金人首次发行纸币。

1194年,黄河由山东半岛之北改道至其南。

1206年,成吉思汗在蒙古夺权。

1141年(?),女词人李清照逝世。

1147年,《东京梦华录》作序的时间,它是描述12世纪初叶开封的著作。

1162年,《通志》作者郑樵逝世,这是一部新体裁的历史百科全书。

1163年,开封犹太教寺建成。

1178年,周去非有关南亚和印度洋的著作《岭外代答》问世。

1192年,心学、哲学家陆九渊逝世。

1193年,苏州的天文平面图(两极投射图)。

1196年,朱熹注《四书》被宋朝朝廷宣布为异端。

1200年,朱熹逝世。

1209年,著名诗人陆游去世。

<p>1214年,金人在蒙古人的压力下迁都开封。</p>	
<p>1227年,西夏国亡。成吉思汗晏驾。</p>	<p>1227年,成吉思汗的宗教顾问道教宗师长春真人归真。</p>
<p>1229年,耶律楚材成为中国北方为蒙古人服务的总管。</p>	
<p>1233年,蒙古人夺取开封。</p>	
<p>1234年,在蒙古与宋朝联合行动的攻击下,金亡。</p>	
<p>1236年,在蒙古人中首次发行纸币。</p>	<p>1235年,宋朝著名诗论著作《沧浪诗话》的作者严羽逝世。</p>
<p>1239年,蒙古人将中国北方收税的包税权交给了西域穆斯林。</p>	
<p>1251年,蒙古人中的刘秉忠开始改革。</p>	<p>1242年,蒙古人移情偏爱佛教禅宗。南宋第一部法医著作《洗冤录》问世。</p>
<p>1253年,蒙古军队进入云南和四川。</p>	<p>1247年,宋代秦九韶的《数书九章》问世,这是第一部使用了符号“0”的著作。</p>
<p>1257年,蒙古入侵越南。</p>	
<p>1260年,忽必烈登基。蒙古人强行使用排除了任何形式货币的证券。</p>	<p>1260年,吐蕃高僧八思巴奉诏主持中国北方的僧众。</p>
<p>1261年,蒙古宫廷一心偏重藏传喇嘛教。</p>	

续 表

<p>1267年,元大都(汗八里)城墙的修筑工程开始。</p> <p>1271年,工程师和数学家郭守敬受蒙古人委托而负责调节全部河水和漕运系统的工程。蒙古人取元朝之名称。</p> <p>630 1274年,蒙古人第一次试图入侵日本。</p> <p>1276年,蒙军进入杭州。</p> <p>1279年,南宋末帝自杀,蒙古人占领整个中国。</p> <p>1279~1294年,蒙古人第二次试图入侵日本。“神风”摧毁了由蒙古人率领的中国—朝鲜人舰队。</p> <p>1285年,占婆和真腊承认了蒙古人的宗主权。</p> <p>1287年,对越南发动新的远征。</p> <p>1288年,越南承认蒙古人的宗主权。</p> <p>1289年,黄河改道。</p>	<p>1269年,采纳由吐蕃高僧八思巴创造的蒙文拼音法。</p> <p>1274年,南宋京都杭州的巨部城市志《梦梁录》问世。</p> <p>1275年,北京景教大主教府建立。南京数学家杨辉的各种著作问世。</p> <p>1277年,一名吐蕃喇嘛被任命为中国南方的僧统。</p> <p>1279年,郭守敬于北京造浑天仪。宋代的数学家李冶(或李治)逝世。</p> <p>1289年,在大臣麦术丁的提议下,于北京创建伊斯兰学院。</p>
--	---

续 表

1355年,起义军首领韩林儿自称宋帝国的皇帝。中华帝国的一大部分领土从这个时代起摆脱了蒙古人的控制。

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在缅甸高原建立了阿瓦掸国。

1368年,朱元璋宣布建立明朝,北京被解放。

1369年,蒙古军队被包围在东蒙古。

1370年,遣使赴占婆、真腊、浮尼、浮淋邦(苏门答腊)和阁婆。

1380年,政治大清洗。审判明朝缔造者的老战友胡维庸。

1387年,整个中国从蒙古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帝国全面实行地契。

1398年,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晏驾(洪武时代结束)。

1402年,朱棣夺取南京并自己称帝。永乐时代开始,1403~1424年。1403~1435年,在中国北方修万里长城。

1365年,论述3~14世纪共1500名画家的绘画与传记论著《图绘宝鉴》问世。

1366年,有关元代中国社会史的札记《辍耕录》问世。

1368年,在明朝首都南京创建钦天监。

1370年,《元史》修成。

1374年,古典派画家倪瓒逝世。

1378年(左右),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问世。

1387年,开始在科举中使用八股文。

631

<p>1405~1433年,明朝向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遣使远航。</p>	
<p>1406年,明军占领越南。</p>	
	<p>1407年,巨部著作汇集《永乐大典》问世。</p>
<p>1411~1415年,元代的大运河又被重新利用。</p>	
	<p>1415年,有关理学哲学、经典和《四书》的学校教科书《性理大全》、《五经大全》和《四书大全》问世。</p>
<p>1421年,明朝决定从南京迁都北京。</p>	
<p>1426年,内阁的特务机构变得主宰一切了,专制主义的加强。</p>	
<p>1427年,越南恢复独立。</p>	
<p>1433年,郑和从最后一次远航印度洋和红海的航行中返回。</p>	
<p>1440~1441年,建北京皇宫。</p>	
<p>1449年,明军在山西土木堡遭到惨重失败,皇帝被蒙古人俘虏。</p>	
<p>1470~1480年,在中国北方建成万里长城。</p>	
	<p>1500年,广东哲学家陈献章逝世。</p>
<p>1505年,太监刘瑾的势力变得非常强大了。</p>	
<p>1511年,亚伯奎在满刺加。</p>	
<p>1514年,在云南开采金矿。</p>	

续表

<p>1528年,重新起用大动河。</p> <p>1530~1581年,以银锭为基础的货币税制得以发展。</p> <p>1540年(从这一年起),沿海海盗行为再度猖獗。</p> <p>1550年,北京被蒙古人包围8日。</p> <p>1555年,倭寇海盗袭击杭州并威胁南京。中国西北大地震,83万受害者。</p> <p>1570年左右,开始进口来自美洲的白银(鹰洋)。</p> <p>1570~1580年,以银锭为本位的货币税得以全面推广。</p>	<p>1518年,哲学家王守仁(王阳明)的哲学著作《语录》第1版问世。</p> <p>1520年,首次使用由明朝向葡萄牙采购的大炮。</p> <p>1529年,王阳明去世。赋和诗作家、仿古派支持者李梦阳逝世。</p> <p>1530~1540年左右,最早记载到花生。</p> <p>1541年,王阳明派哲学家王艮逝世。</p> <p>1543年,梅鹗揭露了古经典之一的古文《尚书》某些部分的伪造特征。</p> <p>1550年,云南南诏和大理国(649~1253年)的历史《南诏野史》问世。</p> <p>1570年左右,记述高僧玄奘及猴子悟空之冒险旅行的《西游记》问世。种痘变成了一种通行习惯。</p> <p>1573年,首次提到种植玉米。</p>
--	---

632

<p>1584~1590年,建造万历皇帝的寝陵。</p> <p>1590~1605年,“开矿热”。</p> <p>1592年,日本军队在丰臣秀吉的率领下于朝鲜登陆,中国军队在平壤遭到失败。</p> <p>1593年,中国军队在朝鲜战胜日本人。</p> <p>1596年,日本第二次入侵朝鲜。从1596年起,中国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商贾们不断发生暴动。</p> <p>1598年,日本人从朝鲜撤退。</p>	<p>1573~1619年(万历年间),中国印刷术发展的顶峰。</p> <p>1574年,用活字印刷巨部文学故事集《太平御览》。</p> <p>1578年,李时珍的巨部著名的药草学论著《本草纲目》问世。</p> <p>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定居于广东。有关东亚和西亚地区的著作《殊域周咨录》问世。</p> <p>1584年,宗王朱载堉确定律吕,第一部汉文天主教教理书《天主教实录》问世。利玛窦的全舆图第1版付梓。</p> <p>1598年,福建人——三一教的立教人林兆恩逝世。</p> <p>1601年,利玛窦定居北京。</p> <p>1602年,利玛窦的汉文全舆图付梓。反传统的哲学家李贽去世。</p> <p>1606年,对丁先生的《欧几里得几何原理》的前6卷编译本《几何原本》出版。</p>
---	---

续表

1615~1627年,陶党与东林党之间发生冲突。

1621年,女真人夺取沈阳(盛京)和辽阳。

1624~1627年,宦官魏忠贤专制。

1625年,对东林党成员残酷镇压。

1626年,女真—满族势力的奠基人努尔哈赤晏驾。

1627年,明末军人和农民大起义开始。

1635年,女真人采纳满族人的名称。

1607年,刊印道藏。

1609年,绘图类书《三才图绘》问世。

1615年,文豪僧侣株宏圆寂。

1619年(左右),著名的风俗小说《金瓶梅》问世。

1621年,巨部兵书《武备志》问世。

1623年,艾儒略神父的世界舆地书《职方外纪》问世。

1623~1632年,出版巨部文学故事作品集《三言》和《二拍》。

1635年,《崇祯历书》问世,这是由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文人们合作写成的一部科学著作集。

1636年,画家董其昌逝世。

1637年,有关技术的巨著《天工开物》问世。

1639年,徐光启的农业论著《农政全书》问世。

1640年,著名地理学家徐弘祖(徐霞客)逝世。

1644年,李自成进入北京,明朝皇帝在那里自缢。李自成后来又被满族人从北京驱逐了出去。清朝开国。张献忠入侵四川。

1645年,满族人强迫汉族人扎辫子和行满族习俗,在中国北方设立了禁地。

1646年,清军占据浙江,福建和四川。

1647年,清军夺取广州。

1649~1662年,郑成功(国姓爷)在福建沿海和台湾地区从事海盗活动。

1657年,重开科场。

1661年,康熙皇帝登基。国姓爷在台湾登陆,将荷兰人从那里驱逐了出去。南明抵抗的结束。

1662年,清朝命令撤空了整个沿海地区。

1650年,在北京建立第一座天主教教堂,1650年之后,方以智有关自然哲学的著作《物理小识》问世。

1656年,王夫之有关政治哲学和中国民主主义理论的《黄书》问世。

1663年,黄宗羲的《明夷代访录》问世,这是对专制主义的批评。

1664年,杨光先的辟基督教文集《不得已》问世。耶稣会传教士们处于困难之中。

续 表

<p>1673年,吴三桂反清和南方诸省闹分裂。</p> <p>1677年,清朝平定了福建和西南诸省。</p> <p>1680年,清军重新占据四川。</p> <p>1681年,清军收复贵州。</p> <p>1683年,清军最终占领台湾。</p> <p>1685年,严禁为诸旗而采取的任何新的没收土地的举措。</p> <p>1689年,清王朝与俄罗斯人签订尼布楚条约。</p> <p>634 1697年,清军占据外蒙古。</p>	<p>1670年,康熙的圣谕《十六字圣训》问世。</p> <p>1676年,顾炎武的史学札记《日知录》问世。黄宗羲有关明代文化史的《明儒学案》问世。</p> <p>1679年,选择修纂《明史》的编纂人。</p> <p>1692年,哲学家王夫之去世。</p> <p>1700年左右,蒲松龄的古典语言故事集《聊斋志异》问世。</p> <p>1703年,唐诗全集《全唐诗》问世。</p> <p>1704年,反传统哲学家颜元逝世。</p> <p>1707年,锋罗主教在南京发动了要求弃绝中国人行为和习俗的通谕。</p>
--	---

<p>1723年,雍正皇帝登基。</p> <p>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p> <p>1729年,创建了政府的最高机构军机处(这是中央集权的发展)。</p> <p>1735年,乾隆皇帝登基。</p> <p>1746~1749年,四川西北金川民众起义。</p> <p>1751年,清朝最终在西藏立足。</p> <p>1756~1757年,清军平定准噶尔,平定伊犁河流域。</p> <p>1758~1759年,清军平定塔里木盆地。</p> <p>1762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共有2亿人口。</p> <p>1766年,重新出现动乱。</p>	<p>1710年,冯秉正和雷孝思神父奉康熙诏令而绘制帝国的全舆图。</p> <p>1714年,哲学家胡渭去世。</p> <p>1716年,有关音韵的大辞书《佩文韵府》问世,《康熙字典》出版。</p> <p>1721年,数学家梅文鼎逝世。</p> <p>1729年,用活字印刷类书《图书集成》。雍正皇帝为捍卫大清王朝之合法性的《大义觉迷录》问世。</p> <p>1735年,《明史》修成。</p> <p>1745~1749年左右,巨部社会批评小说《儒林外史》问世。</p> <p>1747年,乾隆皇帝的夏宫圆明园被按西方方式作了装修。</p> <p>1758年,汉代经典的诠释专家惠栋逝世。</p> <p>1763年,曹雪芹逝世时留下了有关风俗、爱情和心理的巨部小说《红楼梦》(或者叫作《石头记》)。</p>
---	---

续表

1767~1771年,缅甸战争。

1775年,八旗青年将军和坤变成了乾隆皇帝的宠臣。腐化得以发展。全国共普查到2.64亿人口。

1776年,金川起义被平息。

1781~1784年,继由马明心创建的一个穆斯林新教派之后,甘肃发生回乱。

1782年,共有1万多名中国移民被越南人屠杀。

1787~1788年,对台湾起义进行血腥镇压。

1788~1789年,清军远征越南。

635

1791~1792年,清军远征尼泊尔以反击廓尔喀人。

1795~1803年,中国北方爆发白莲教起义。

1796年,乾隆禅位于嘉庆,但事实上仍在继续执政。

1769年,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舆地学家们的集体成果乾隆大地图问世。

1774~1789年,乾隆时代制造大规模的“文字狱”。

1777年,数学家、训诂学家和哲学家、考证学派的最著名代表人物戴震逝世。

1782年,《四库全书》修成,这是用中文写成的所有著作的文集;《四库全书提要》问世。

续表

<p>1799年,乾隆晏驾和其宠臣和珅去世。</p> <p>1811~1814年,山东和河北天理教起义。</p> <p>1812年,人口普查:3.61亿人口。</p> <p>1816年,东印度公司决定迫使中国进口鸦片。</p> <p>1820~1825年,进口鸦片引起了中国外贸的出超。</p> <p>1830年,人口普查:3.9478亿人。从1860年起,秘密进口鸦片猛增。</p> <p>1839年,林则徐被封为两广总督,为禁止在广州进口鸦片而采取了彻底的禁烟措施,从而引起了来自英国一方的海盗行为。</p>	<p>1799年,阮元的《畴人传》问世,这是有关中国数学家和历法天文学家的传记集。</p> <p>1801年,史学家和哲学家章学诚逝世。</p> <p>1804年,数学、地理学、历史学和金石学著作的作者钱大昕逝世。</p> <p>1814年,唐朝的完整文集《唐全文》(1000卷)问世。</p> <p>1825年,语言学家李汝珍的女性小说《镜花缘》问世。</p> <p>1825~1829年,阮元有关经典诠释的巨部考证学论著《黄清经解》问世。</p> <p>1829年,新文经典的大改革派(公羊派)的创始人刘逢禄逝世。</p>
--	---

续表

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广州、上海、厦门、福州和宁波5口岸向进口鸦片开放。

1843年,有利于外国人的最早治外法权。洪秀全创建拜上帝会。

1846年,人口普查:4.2134亿人口。

1850年,太平军在广西东部举行起义。

1851年,人口普查,4.32亿人口。洪秀全自称天王。

1853年,被太平军占领的南京变成了“天京”。捻军起义。

1854年,太平军威胁北京。曾国藩在湖南组织了湘军。

1855年,黄河在山东半岛由北向南改道。云南回乱。

1858年,李鸿章组织了淮军。签订天津条约,将位于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领土归予了俄罗斯。

1860年,法英联军抢劫北京。

1861年,陕西和甘肃的回民起义。设立了总理与外国关系的总理衙门。

1862年,新疆的回民领土闹分裂。将有关过境的釐金扩大运用到所有省份。

1841年,李逢禄的弟子和继承人龚自珍逝世。

1844年,魏源的《海国图志》问世。

1862年,在北京设立同文馆,这是一所学习西方语言和科学的学校。

1864年,左宗棠收复杭州,南京被包围后陷落。洪秀全及太平军主要首领都自杀。

1866年,福建附近的马尾船坞竣工。

1867年,捻军威胁北京,但李鸿章战胜了他们。福建海军学校开业。

1868年,左宗棠奉命在西北平息回乱。

1870年,天津事件。上海江南造船厂成为1870年左右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厂之一。

1873年,中国进口鸦片创纪录。云南的回民起义继大屠杀和全面破坏之后被镇压下去了。整个新疆处于反叛之中。

1875年,慈禧太后独揽朝政。

1876年,芝罘条约。它使6个新城市对外国人开放。

1878年,全新疆被平定。

1880年,由李鸿章主持建造一支新的舰队工程的开始。

1883~1885年,中法之间的军事冲突开始。

1890年,汉阳铁厂建成。

1872年,首次向美国派遣中国留学生。

1874年,改革家曾国藩逝世。

1891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问世。

续 表

637

1894年,朝鲜东学党的起义导致了中日战争的爆发。天津—上海铁路开通。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和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赔偿战争款2亿两白银。康有为发表变法宣言。

1897年,德国侵占了山东青岛地区。

1898年,英国人侵占山东威海地区,俄罗斯侵占辽东的大连和旅顺。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处死了变法派人士谭嗣同。

1900年,义和团占领北京并包围了西方公使馆。外国联军侵入北京并向中国宣战。

1901年,庚子赔款,多达4.5亿两白银。李鸿章逝世。

1903年,邹容发表《革命军》。

1904年,俄—日战争以日本的辉煌胜利而告结束。

1905年,孙文在东京创建“同盟会”。京—汉铁路竣工。

1893年,康有为在武汉创设了一座近代学堂,共包括四个部:外语、数学、自然科学和贸易。

1895年,康有为在上海创设了强学会。

1897年,康有为发表《孔子改制考》,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

1898年,发现第2个千年纪末的金石文。有关北京的节日与风俗习惯的《燕京碎事记》问世。

1900年,严复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富》)。敦煌写本卷子被发现(公元5~10世纪)。

1906年左右,约1300名左右的中国留学生赴日留学。

1908年,古文字学家孙贻让逝世。

<p>1910年,东北被瓜分为俄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p> <p>1911年,武昌十月辛亥共和革命。外蒙古落入俄国的控制之下。</p> <p>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创建中华民国,孙文让权于袁世凯,袁氏将共和政府迁往北京。</p> <p>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日本占领了原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p> <p>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p> <p>1916年,袁世凯逝世。军阀时代开始。</p> <p>1919年,巴黎和会将德国原来在中国的租借地转给日本。</p> <p>1921年,一批知识分子在上海创建了一个由孙文领导的国民政府。</p> <p>1923年,苏俄决定支持广州国民政府。</p> <p>1925年3月12日,北上与军阀集团谈判的孙文逝世于北京。</p> <p>1926年,北伐兴师。</p> <p>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镇压革命并在南京创建了他自己的政府。</p>	<p>1912年,对教育制度的全面改革。京师大学堂被改造成大学。</p> <p>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p> <p>1919年,五四运动。</p> <p>1924年,对西方文学著作进行翻译和编译的林纾去世。</p> <p>1927年,训诂学与史学家王国维自杀。</p> <p>1927~1937年,对南阳附近的商朝末都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p>	638
--	--	-----

续表

<p>1929年,赣南苏维埃共和国成立。</p> <p>1930~1934年,围剿江西苏区。</p> <p>1931年,日本人入侵满洲。</p> <p>1932年,日本人进攻上海。日本人建立满洲国。</p> <p>1933~1935年,日本人在华北取得进展。</p> <p>1934年,长征开始。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p> <p>1935年,遵义(贵州北部)会议,确定了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袖。</p> <p>1936年12月6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捕并被迫答应集中精力抗日。</p> <p>1937年,延安(陕甘宁边界地区)的苏维埃政府建立。日本人发动了对中国北方的全面进攻并夺取了所有的大城市。</p> <p>1938年,国民政府撤退到重庆。</p> <p>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为日本人效劳的伪政权。</p> <p>1942~1943年,河南发生饥荒,约有200万人死亡。</p>	<p>1928年,实行新的国民教育制度。中国中央研究院成立。</p> <p>1936年,伟大的小说作家鲁迅(周树人)去世,大训诂学家和史学家王寿南和革命文人章炳麟逝世。地质学家丁文江去世。</p> <p>1940年,训诂学家罗振玉和哲学家蔡元培去世。古文献的大辑成类书《丛书集成》修成。</p> <p>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讲话。</p>
--	---

<p>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p> <p>1947年,国民党人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夺取了延安和南京。共产党人在满洲取得进展。</p> <p>1948年,在中国北方成立了一个人民政府。黄河回归1855年的故道并在山东从南向北迁移。</p> <p>1949年,共产党人占领整个中国北方。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并占领了南京和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0月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国民党政府亡命于台湾。</p> <p>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在朝鲜参战。</p> <p>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p> <p>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朝鲜战争的结束。人口普查:5.82亿。</p> <p>1954年,美台签订防御条约。</p> <p>1955年,万隆会议。</p> <p>1957年,大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p> <p>1958年,“大跃进”开始。成立人民公社,取缔私人生活和任何形式的私人财产。8~10月间,开始炮轰被国民党人占领的大陆岛屿金门。</p>	<p>639</p> <p>1951~1955年,知识分子受到了批判,这场运动于1955年达到了顶峰。</p> <p>1956~1957年,“百花”时代。</p> <p>1958~1961年,在大跃进期间,出现了科学的困难时期。</p>
---	--

续 表

1959年,西藏叛乱。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排除了其全部异己。

1960年,苏联于8月间从中国撤走了其全部技术人员并停止了其经济援助。1960~1961年间发生了可怕的饥荒,至少有1300万人被饿死。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

1961年,重新注重农业。

1962年,中印喜马拉雅边境冲突。

1963年,城市人口又大量返回农村。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次核试验。

1964年,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开始。

1965年,林彪排除军内异己。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7年,无政府状态和内战。生产悲剧地下降。氢弹试验成功。

1968年,平息红卫兵运动。

1969年,中苏乌苏里江的冲突事件。文化大革命高潮结束,共有2000多万青年“上山下乡”。以军队的巨大支持而重建党组织。

1970年,开始控制生育。

1971年,林彪死亡。中国进入联合国。

1962年,胡适逝世。

1963年,戏剧改革。

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成了知识分子、老干部和旧资产阶级的一大灾难,在所有地区都表现为对过去宝藏的破坏。

<p>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p> <p>1973年,被文化革命排斥的领导干部复职。</p> <p>1976年,周恩来(元月)和毛泽东(9月)逝世。</p> <p>1976~1978年,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出现了新毛主义的时代。</p> <p>1978年,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掌权。</p> <p>1979年,中国对外国企业开放。与美国恢复对话。中国在越南无益而又昂贵的军事干预。</p> <p>1980年,审判“四人帮”。</p> <p>1981年,限制投资热。</p> <p>1982年,取消自毛泽东时代继承下来的社会等级。</p> <p>1984年,大力推动经济改革。与苏联恢复关系。</p> <p>1985年,中国恢复执行一种温和的对外政策。裁军和从事改革。</p> <p>1987年(自该年起)。事实上恢复了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联系。</p>	<p>1974年,广州学生为要求“民主”而游行。</p> <p>1978年,所谓“北京之春”于1979年被镇压。</p> <p>1983年,毛泽东式的反“精神污染”运动。</p>
---	---

三、谢和耐教授主要汉学著作目录

1. 专著

1.《荷泽神会大禅师(668~760年)遗迹》:《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之一,1949年河内版,1977年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再版。

2.《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之一,1956年西贡版,1974年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影印再版,1987年甘肃人民出版社中译本。

3.《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1959年巴黎版,1978年重版。1961年里斯本出版西班牙文译本。1961年巴恩出版荷兰文译本。1962年伦敦出版英译本,1977年再版。1980年出版匈牙利文译本。1983年出版意大利文译本。1980年我国台湾出版中译本。

4.《从起源到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1964年巴黎版,后来又多次重版。1965年东京出版日译本,1966年华沙出版波兰文译本,1968年伯克利和洛杉矶出版英译本,1971年米兰出版意大利文译本。

5.《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与吴其昱合作):巴黎1970年版。

6.《中国社会史》:巴黎1972年版,1976年重版。1978年都灵出版意大利文译本,1979年法兰克福出版德文译本,1972年伦敦和纽约出版英文译本,1985年布加勒斯特出版罗马尼亚文版,1991年巴塞罗那出版西班牙文版,1985年汉城出版韩语译本。

7.《中国和基督教》:1982年巴黎版。1984年苏黎世和慕尼黑出版德文译本,1984年卡萨列蒙菲拉托出版意大利文译本。1986年在巴黎和伦敦出版英译本,1991年上海中译本,1992年巴黎修订第2版。

8.《唐甌及其〈潜书〉》: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92年版。

2. 论文

1.《神会禅师传》,载《亚细亚学报》,巴黎1951年,第1期。

2.《神会遗迹补遗》: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44卷,1954年第2期。

3. 《上古中国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载《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1952年。
4. 《汾山灵祐大师遗迹》: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45卷,1955年第1期。
5. 《中国的经济和人类活动》:载《评论》第103期,1956年。
6. 《宋代城市的商人和匠人》:载《中国宋代的艺术》,巴黎1956年。
7. 《从9~10世纪敦煌的卖契看中国的专卖制度》:载《通报》第45卷,1957年,第4~5期。
8. 《中国人对颜色的表述》:载《颜色问题》,巴黎1957年。
9. 《中国的文字与历史》:载《正常和病态心理学学报》,1959年1~3月号。
10. 《唐代的经济和社会》:载《中国概况》,1960年第1卷。
11. 《论中国5~10世纪中佛教徒的引火自焚》:载《高等中国研究所论丛》第2卷,1960年。
12. 《中国的铁器时代》:载《人文》杂志,第1卷,第1期,1961年。
13. 《远东史》:载《史学杂志》,1963年第2期。
14. 《中国文字的心理表现形式及其作用》:载《各民族文字和心理学》,巴黎1963年。
15. 《公元前5~3世纪中国和希腊思想的发展》:载《布德学会学报》,1964年,第4卷,第3期。
16. 《敦煌旅行中租骆驼的契约》:载《戴密微祝寿文集》第1卷,1966年。
17. 为《法宝义林》所写的《知事》和《知净语》条目:载《法宝义林》第4册,巴黎—东京1967年版。
18. 《中国的文明》:载《人类的奇遇》,日内瓦1967年版。
19. 《中国车辆小考》:载《古代希腊的战争问题》,海牙1968年版。
20. 《论伊斯兰教鼎盛时期中国的城市》:载《伊斯兰城市研究》,牛津1969年版。
21. 为《世界百科全书》所写的《中国佛教》和《中国》(1840年之前的中国史)条目,巴黎1970年。
22. 《中国的第二次文艺复兴》:载《语言、技术、自然和社会》,1971年巴黎版。

23.《论 17 和 18 世纪中国和欧洲的交流》:载《亚洲学报》,东京 1972 年(该文有 1972 年的日译文,载东京《东方学报》第 45 卷)。

24.《论利玛窦的归化策略及 1600 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发展》:载《宗教社会学档案》第 36 卷,1974 年巴黎版(此文有 1975 年的汉译文,载《国外中国学译丛》第 1 卷)。

25.《中国的科学观念和占卜术》:载东京《东方学报》第 45 卷。

26.《李约瑟对中国和欧洲科学技术史的比较研究》:载《李约瑟纪念文集》,南朝鲜大丘 1974 年。

27.为《世界百科全书》所写的《鸠摩罗什》、《慧远》、《玄奘》、《黄巢》和《李贽》等条目。巴黎 1974 年。

28.《小偏差和大偏差》:载《占卜及其合理性》,巴黎 1974 年。

29.《在法兰西学院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讲座中的开课讲演》:巴黎 1976 年。

30.《16 世纪末~17 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载《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巴黎 1970 年版。

31.《论古代中国法律中的责任观》:载《中国法律》,佛罗伦萨 1978 年。

32.《17 世纪基督徒和中国人世界观之比较》:载《第欧根尼》杂志第 105 卷,1979 年巴黎版(此文有 1980 年的英译本,载费城出版的《中国科学》一书)。

33.《戴密微传》(1894~1979 年):载《通报》第 45 卷,第 1~3 期,1979 年。

34.《论 1584 年第一部汉文教理书的不同版本》:载《中国—蒙古研究》,西德威斯巴登 1979 年。

35.《中国的帝国观》:载《帝国的观念》,巴黎 1980 年。

36.《在大海的附近》:载《安田朴的神话》,巴黎 1979 年。

37.《普实克传》(1906~1980 年):载《通报》第 46 卷,第 4~5 期,1980 年。

38.《论 17 世纪的中国史》:载《经济、社会和科学年鉴》,巴黎 1981 年。

39.《静座,宗教和哲学,论理学的静座》: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 49 卷,巴黎 1981 年。

40.《论唐甄的政治观》:载《东亚的国家和法律》,德国威斯巴登 1981 年。

- 41.《戴何都传》(1891~1980年),载《通报》第47卷,第1~2期,巴黎1981年。
- 42.《明末的中国社会》,载《东西方的交流》,巴黎1983年。
- 43.《论利玛窦时代的中国文化形势》,载《第1届利玛窦研究国际讨论会论文集》,意大利玛切拉塔1984年。
- 44.《马伯乐的生平和著作》,载《纪念马伯乐文集》,巴黎1984年。
- 45.《近代中国和传统中国》,载《中国研究》第4卷,第1期,巴黎1985年版。
- 46.《戴密微生平及著作提要》,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报告》,巴黎1986年版。
- 47.《论中国古代的厚葬及汉代的裸葬》,载《学者通报》,巴黎1986年。
- 48.《论胡人的道德》,载《大地上的天堂》,巴黎1987年。
- 49.《16~17世纪中国的俱乐部、书社和会社》,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报告》,巴黎1986年版。
- 50.《中国的历史和农业》,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学报》第30卷,1987年版。
- 51.《论中国人的身心》,载《约翰·彼埃·维尔南纪念文集》,巴黎1987年版。
- 52.为《欧洲在中国》一书写序,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1993年版。
- 53.为荣振华的《中国的犹太人》所写的序,巴黎1982年版。
- 54.《对中国与反改革的欧洲早期进行交流时的不同看法》,载《哥伦布研究国际讨论会论集》,热那亚1987年版。
- 55.为马若安的《中国数学史》所写的序,1988年巴黎版。
- 56.《中国的历史和民族》,载巴黎大学出版社《杂文集》第25卷,1988年。
- 57.为博西埃夫人的《安多传》所写的序,巴黎1982年版。
- 58.《论中国的变化观》,载《中国的变化观念》一书,巴黎1994年版。
- 59.《在中国与反改革的欧洲之间最早交流中的另一方的观念》,载《第5届哥伦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热那亚哥伦布基金会1987年版。
- 60.《中国11~12世纪的组织、准则和实践》,载《为国家服务》,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1987年版。

61. 为英国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的施拉姆(S·Schram)所著《中国国家政权的基础和界限》写的序言,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版;其法文版又载《日佛会馆学刊》,东京1988年版。

62. 《另一方的形象,中国的史学和人类学》:载《17世纪论集》,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3. 为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的《中国数学史》写的序,巴黎马松出版社1988年版。

64. 《基督教于17世纪在中国的同化问题》:载《天主教和亚洲社会》,巴黎—东京1988年版。

65. 《科学与合理性,中国问题的新颖特征》:载《科学史杂志》第74卷第4期,巴黎1989年版。

66. 《中国思想概论》:载《世界哲学百科全书》,巴黎1989年版。

67. 为许理和(Erik Zürcher)的《佛教、基督教和中国社会》写的序,巴黎朱利亚尔出版社1990年版。

68. 为卡詹嘉玲(Catherine Jami)《三角与圆周率的速算法》写的序,法国汉学研究所1990年版。

69. 《论王夫之有关汉代权力的九条注释》:载《中国秦汉的思想和法律》,莱敦1990年版。

70. 《怎样读历史,王夫之思想简介》:载东京日佛会馆1991年版。

71. 《17世纪的中国哲学家王夫之的智慧》:载《世界的智慧》,巴黎1991年版。

72. 《中国最早的基督教》:载《文学和艺术》,1991年9月14~15日,第213卷,第67期。

73. 《论儒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载《儒教和亚洲社会》,巴黎—东京1991年版。

74. 为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著《文士和政权,中华帝国的文字狱》写的序,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1992年版。

75. 为雅胜律(H·Von Senger)所著《三十六计》所写的序,1992年巴黎版。

76. 《中国与欧洲交流中的时—空、科学和宗教》:载《欧洲在中国》文集,1993年巴黎版。

译后记

在各方面的真诚帮助下,译者多年来打算将法国最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教授的《中国社会史》译成中文出版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教授已是中国学术界比较熟悉的人物。他是当代法国最具权威的汉学家,曾长期主持整个法国汉学界的工作。译者已先后翻译过他的《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台湾千华图书出版社1994年再版)和《中国和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此外还译过他有关敦煌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史等方面的不少论文。但为了使本书的读者能对谢和耐教授有更深的了解,不得不再赘言几句。

谢和耐教授于1921年生于当时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尔。他于1942年之前在阿尔及利亚完成其学业,并于1942年入伍参加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战争。1945~1947年间,他在法国巴黎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学习汉语,到了1949~1950年,又在当时设于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学习。他在1951~1955年任国立科研中心的助理研究员,并于1955~1976年任高等实验学院研究导师,于1957~1969年间兼任巴黎大学文学院教授,于1969~1973年又任巴黎第七大学教授。从1975年到1992年,他任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的汉学教授,主持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讲座。1976~1992年间,他与荷兰莱敦大学汉学研究院前任院长许理和(E. Zürcher)共同主编国际汉学杂志《通报》;1980~1992年间,他又任由日佛

会馆主办的佛教百科性杂志《法苑珠林》的主编。他曾多次来中国大陆和台湾访问,进行学术交流。谢和耐教授的汉学著作很多,现已出版专著8部,而且每部都有多次重版或修订再版,并大都被译成了西方多种文字出版。其最新的论著是对唐甄(1630~1704年)的研究以及对其《潜书》的译注本(1991年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其汉学论文共计约80余篇。

谢和耐教授是曾在本世纪50~70年代领导法国汉学界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年)的弟子和事业的继承人。他一方面继承了戴密微先生注重于对中国佛教、天主教、社会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传统,但另一方面又开创了法国汉学界的一代新风,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众所周知,法国的中国学自19世纪以来一直由考据派学者占统治地位,他们并不写或很少写系统的论著,只是对古文献作注释。诸如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韩百诗均为该派的代表人物。谢和耐教授既继承了考证派的某些传统,又很大地突破了他们的框框,向着现代史学大大迈进了一步。这就是说,他已向现代史学方法迈出了一大步,但又没有完全放弃考据派的某些做法。他为以后一代客观论述的汉学家们开辟了道路。他的学生和事业的继承人——现任法兰西学院教授和《通报》主编魏丕信(Pierre Etienne Will)教授则完全成了当代史学方法的代表人物。

谢和耐教授的《中国社会史》一书是他于1964~1972年间写成的。该书于1972年由阿尔芒·科兰(Armand Colin)出版社首版刊行,立即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1988年,该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第2版,1990年再出修订第3版。该书还被译成了西方的主要文字。1982年剑桥大学出版英译本(书名改作《中国社会文明史》),后来又一再反复重版;1985年在布加勒斯特出版了罗马尼亚文译本;1985年在汉城出版了韩语译本;1978年在都灵出版了意大利文译本;1979年在法兰克福出版了德文译本;

1988年又在苏尔卡姆再版；1991年在巴塞罗那出版了西班牙文译本。据作者告诉译者，还有四五个国家已获得了翻译出版此书的版权，可望在未来几年中有译本问世。此书已被英、美以及西方许多大学中用作中国文化史的教科书。由于西方的中国通史大都是许多作者共同完成的，免不了会有观点各异的拼凑痕迹。此书则是当代一位汉学大师的个人力作，观点连贯，内容系统；再加上作者观点公允，论述清晰，诚乃用大手笔写成的通史性著作。

当然，由于此书成书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后来曾作过多次修改，但从中仍可以窥见文革的影响。但从总体上来讲，谢和耐教授能在那种背景下写出这样的书来，不得不令人钦佩。他对于中国历史的评价、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均较为客观公正。尤其是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已被近年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谢和耐教授是译者的老朋友。我于1991年提出打算将本书译作中文出版，他听到后很高兴，并在百忙中为本书的中译本写了序言。此后，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黎德欧(T·Audric)和文化专员齐福乐(Jean—Claude Thivolle)先生又慨然答应给予部分资助，江苏人民出版社亦欣然同意将本书列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遂使此计划得以顺利实施。这套丛书的负责人刘东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于此特致谢意！

法国的阿尔芒·科兰出版社同意无偿转让版权，在此也表示谢忱。

为使读者对本书作者谢和耐教授的汉学著作有个大概了解，书末附上《谢和耐教授主要汉学著作目录》(截止1992年底)。

译者孤陋寡闻，水平有限。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耿昇

1993年国庆节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des Af-
faires Etrangères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部分赞助

LE MONDE CHINOIS

JACQUES GERNET

ARMAND COLIN, PARIS, 1990

根据阿尔芒·科兰出版社 1990 年修订第 3 版译出